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MICHAEL MCFAUL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 著

唐贤兴 庄辉 郑飞 译 唐贤兴 余亚梅 校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世纪90年代，麦克福尔长期住在莫斯科，亲眼目睹了很多事件，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是一部深入了解这个艰难时期的俄罗斯历史的著作。麦克福尔的结论是，任何对俄罗斯向民主化成功转型的分析，必须同时关注它的失败。他说，俄罗斯—苏联的案例揭示了缔造社会契约的重要性，并解释了俄罗斯精英缔结联盟的努力为什么会失败，以至于产生两个对立阵营的暴力对抗和一个迟滞的民主化转型。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既是俄罗斯政治研究的一部开创性著作，也是一部关于制度变迁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对众多行为体如何以及为何会接受一个模棱两可的和无效的制度的解释，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理论解释。迈克尔·麦克福尔通过努力而获得的机会以及他高度的理解力，都是相当令人兴奋的。这是一段使人增长见识的、迷人的、有时是扣人心弦的历史。

——莱利·戴蒙德 (Larry Diamond)，《民主杂志》联合主编

即使是那些完全不同意迈克尔·麦克福尔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俄罗斯政治的巨大变迁所作的解释的人，也会发现这本书是那么的令人兴奋和如此的材料翔实。麦克福尔把理论基础和可读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这完全是个非凡的成就。

——阿切·布朗 (Archie Brown)，牛津大学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MICHAEL MCFAUL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 著

唐贤兴 庄辉 郑飞 译 唐贤兴 余亚梅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
(美)麦克福尔(Mcfaul, M.)著;唐贤兴,庄辉,郑飞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SBN 978-7-208-09024-8

I. 俄… II. ①麦…②唐…③庄…④郑… III. 政治体制
改革-研究-俄罗斯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460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 著

唐贤兴 庄辉 郑飞 译

唐贤兴 余亚梅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5 插页 4 字数 386,000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024-8/D·1662

定价 45.00 元

译者序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A. McFaul, 1963—)教授最重要的代表作。作为当今美国学术界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中生代代表,麦克福尔对当今俄罗斯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其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其对俄罗斯转型的理论建构以及相应的对转型理论的贡献,都是值得称道的。

麦克福尔于1963年10月1日出生于美国的格拉斯哥。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和斯拉夫语言,并在该校获得俄罗斯与东欧研究领域的硕士学位(1986)。1991年,他以《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与大国的干涉:一个关于国际背景下的革命理论》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¹通晓俄语、波兰语和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的他,于2001年被聘为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2004年晋升为教授。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麦克福尔在其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里,都始终是一个积极分子。早在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1988—1990年,麦克福尔就担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并在两年后成为该中心的副研究员。在1990—1991年,他作为访问研究人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以来,麦克福尔担任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人员。自1995年以来,他还一直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研究员。

作为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研究者,麦克福尔的研究兴趣主要是

俄罗斯问题,尤其是俄罗斯转型研究。早在1990年至1991年,麦克福尔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做了两年的访问研究。其实,他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产生了。在其本科学习期间(1983年),他就前往当时苏联的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进行访问学习;两年后,他再度前往设在莫斯科的普希金研究所(Pushkin Institute)访问学习。这些相关的经历和训练为他日后研究俄罗斯问题打下了坚实的语言上、切身体验上以及人脉关系上的基础。1994—1995年,麦克福尔被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派往俄罗斯,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工作了两年。1998—2001年,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俄罗斯国内政治项目的主任。

麦克福尔在当今学术界俄罗斯问题研究领域有着颇高的知名度。这首先是因为其数量惊人的研究成果。他个人的专著,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著作、主编的著作多达近二十部,除了《俄罗斯未竟的革命》(2001年)这部最重要的代表作之外,《后共产主义政治:俄罗斯与东欧的民主前景》(1993)、《磨难中诞生的俄罗斯民主》(1993)、《俄罗斯1996年的总统选举:极化政治的终结》(1997)、《权力与目的: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2003)、《大众选择与被组织的民主:1999和2000年的俄罗斯选举》(2003)、《在独裁与民主之间: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政治改革》(2004)、《共产主义垮台之后:转型教训的比较研究》(2004)等都具有很高的引用率。至于发表在各种专业期刊上的研究论文,到目前为止更是达到了二百多篇。

当然,“著作等身”并不是他赢取学术界知名度的唯一因素。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说,麦克福尔对转型理论的研究和贡献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麦克福尔主要为学生们讲授转型理论和制度变迁,包括新民主国家的制度变迁、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课程。在我上述提及的这些研究著作中,其中心的主题就是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是对这一主题的集中阐述,也是他对其过去十多年里发表的有关转型的研究论文所提出的观点进行的系统整理。

麦克福尔对俄罗斯以及其他“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国家转型

的研究,其内容、方法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这些方面。首先,他用一套“革命的”理论来建构他的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分析框架。“革命”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里,革命意味着进步。但在西方学者的分析框架里,“革命”的话语虽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比如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此后相应的制度转型看做是一种“革命性的过渡”,就像本书作者所坚持的那样),但是,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理论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指代那些任何社会发生的重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所谓的“革命性过渡理论”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后社会主义”研究范式相吻合和耦合的,甚至可以直接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革命性过渡”也好,“后社会主义”也罢,它们既可以指这些重大的制度变迁以抛弃和否定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比如原苏联东欧集团国家的转型),也可以指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实现对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实现制度的重大变迁(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麦克福尔在本书中对俄罗斯的“革命性”转型很少具有价值上的评判,而更多地侧重于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试图来揭示特定社会和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的特定逻辑。其实,麦克福尔的这套分析范式,在其早期的研究文献中就有了较为娴熟的运用。他曾用有关的革命理论来分析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解体后发生在这个地缘政治空间里的新国家的转型。²

其次,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至今仍十分流行的制度分析及其制度变迁理论,是麦克福尔分析俄罗斯政治转型的主要分析工具。在形成这本著作之前,麦克福尔在其众多关于俄罗斯国内政治转型的研究文献中,已经把经济学家的分析工具运用到了转型理论中来。比如,在研究俄罗斯的私有化问题时,麦克福尔认为国家权力和能力的特定状况对制度变迁产生了内在的规定性。³显然,这一理论观点直接受到了道格拉斯·诺斯的影响。同样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路径依赖”的理解和运用上。本书以及他于1999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⁴,认为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根源于俄罗斯转型中特定的路径依赖。当然,麦克福尔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理解和分析,并不是简单地运用经济学家的制度分析的概念和观点。相反,他熟练地运用了政治学

和其他社会科学所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范式来弥补制度分析可能存在的不足。比如,以角色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就是这样。在制度分析者那里,制度的功能,比如制度对行为体的规范和塑造,被置于分析的中心和焦点。但是,制度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各种行为体在制度的起源中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很多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忽视了这一方面。麦克福尔通过对苏联历史的考察,尤其是对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失误的改革,以及叶利钦时期艰难曲折的制度变迁的系统分析,认为个人的角色比结构理论更具有解释力,尽管我们不一定要得出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结论来。选择这样的视角,直接影响了作者的分析技术和对资料的取舍。在数年时间里,作者数十次地往来俄罗斯,对苏联和后苏联的各种政治行为体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访谈对象从高层的领导人到专家学者再到底层的民众,访谈数量成百上千,从而比较系统地采集到了各行为体的偏好及其在变迁中的角色这些重要的分析样本。通过对个人角色和制度结构的有机结合,麦克福尔把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图式和“全貌”给读者揭示了出来。可以说,在以整个俄罗斯的转型为具体的案例来进行深度的和系统的制度分析方面,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超越本书的其他类似著作。

第三,在经过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后,作者得出的很多关于转型理论的有意思的结论性观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于理解其他转型社会的知识。本书作者通篇论述的是,到底哪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拖拖拉拉的转型过程?行为体的偏好,转型议程的设置,对权力平衡的理解和实现权力平衡上的斗争,政治游戏规则制定及其相应的技术性因素,等等,都成为作者考察的中心。从比较政治(包括比较公共行政,比较政策过程等)的角度来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得出的诸多观点在较大的范围里具有较大的适用性。比如,对于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来说,涉及制度变迁的议程设置上,各行为体对变迁议程的争议范围越大,就越不能期望有一个顺畅的转型。所以,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俄罗斯政治中两极化现象的逐渐消失,对于转型是有积极意义的。再比如,制度设计的时机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和机会等因素都是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点,在政党的产生、民主的

巩固和选举之间的关联上表现得尤为明显。⁵

我是2002年在美国佐治亚大学卡尔·文森政府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的。作为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同行,尽管我与他素未谋面,但我还是给麦克福尔打了电话和发了电子邮件,表达了我希望翻译该书的愿望。麦克福尔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许诺他会出面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洽谈版权事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十分热情地表示愿意出版该书的中文版。于是,我回国后就组织力量对该书进行了翻译。然而,翻译和出版的进程是那样的曲折,几乎与俄罗斯本身的转型一样充满着各种变数。首先是因为2003年我的工作性质和研究方向有了很大的变动,我的主要精力不再集中于国际关系理论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上,而是转到了国内公共政策的研究上来了。其次是因为我女儿唐寓清的出生和对她的养育人花去了我很多的时间,使得我的翻译工作只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要不是范蔚文先生持续不断的鼓励和催促,要不是复旦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慷慨支持,这本译著的出版将几乎走入夭折的地步。麦克福尔本人曾说,写作和出版该书花了他十年的时间。现在看来,我们翻译出版该书也花了近七年的时间。可谓好事多磨。

在此,我必须要向范蔚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编辑和出版领域,像他那样对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以及对国际问题研究的支持保持着持久的热情,确实是不多见的。同时,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桑玉成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的肖卫民和左昌柱先生、复旦大学出版资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周桂发先生,因为他们在本书获得出版资助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杨心宇教授和唐朱昌教授——我在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的两位同事和师长——认真地阅读和评价了本书的翻译稿,没有他们的鼎力推荐,就不能想象本书能获得出版资助。我的同事和好友刘军梅博士,这个我国国内俄罗斯问题研究界为数不多的精通俄语的青年学者,不厌其烦地帮我翻译和校对书中众多以英文形式出现的俄文单词。总之,再好的语言也不足以表达对上述这些人士的感谢之情。

本书的英文版本的作者所使用的政治学专业语言是很拗口甚至颇为晦涩的,在翻译和校对过程中极为艰辛。但在对全书的审阅过程中,张笑

天编辑非常认真细致又很专业地指出了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本书翻译的分工如下;庄辉翻译了第五、六、七章;郑飞博士翻译了第八、九、十三章;全书其余的章节以及序言、致谢等内容,都由我本人翻译。我的妻子余亚梅女士对全书的翻译稿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逐字逐句的校译,最后由我完成第二轮的逐句校对。

唐贤兴

2009年10月

注 释

1. Michael McFaul, "Southern African Liberation and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91.

2. 除了他的博士论文之外,其代表性的文献还可分别参见:Michael McFaul, "The Demise of World Revolutionary Process: Societ-Angolan Relations Under Gorbachev,"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3, (March 1990): 165—189. Michael McFaul, "Russian Centr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vol. 9, no. 4, (July-September 1993): 196—222.

3. Micha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2, (January 1995).

4. Michael McFaul, "Institutional Design, Uncertainty, and Path Dependency during Transitions: Cases from Russia,"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1, (March 1999): 27—52.

5. 麦克福尔曾说:"在民主巩固的过程中,没有哪种政治因素比定期的、连续的选举来得更重要。"Michael McFaul, *Post-Communist Politics: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 p. 88.

序 言

1988年春,为了我的专题论文《南部非洲的革命》,我去了莫斯科做一些最后的访谈。由于我对革命过程的国际影响尤其感兴趣,因此当时我想结识一些研究同样主题的苏联学者。那个春天我对非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的访问几乎没有成功。伪装成高级研究员的克格勃分子在安哥拉、津巴布韦或南非等地从事一些煽动革命的秘密活动。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也像他们一样是为同种性质的机构工作的,他们对我的动机非常警惕。该研究所的坦尼亚·克拉斯诺彼夫索娃(Tanya Krasnopevtsova),一个真正的学者,对我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我们避开研究所这个有麻烦的地方,来到一个安全的东正教高级主教的公园里,坐在池塘边的长凳上。坦尼亚·克拉斯诺彼夫索娃告诉我苏联在南部非洲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当她终于得知我的论文是关于革命的时候,她嘲笑我对案例的选择:“革命就在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国家里进行着,你为什么要去研究安哥拉?”

那年春天我与坦尼亚·克拉斯诺彼夫索娃的意外相遇对我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巨大影响。她把我介绍给两个不修边幅、疯子般的、浪漫主义的革命活动家——尤里·斯库布科(Yuri Skubko)和维克多·库申(Viktor Kuzin)。那时候,他们俩正忙于组建苏联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党——民主联盟(the Democratic Union)。这个政党的指导原则是消除列宁崇拜和产生多党制民主。如果说这不是十足天真的幻想,在当时也是非常激进的想法。当时,我并不认为这些民主联盟的活动家会有任何成功的机

会,但我对他们的毅力产生了兴趣,对他们的特殊使命表示同情。在很多方面,他们使我想起那时流亡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的朋友们。虽然他们信奉的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一个组织提倡共产主义,另一个组织信奉资本主义,但是,无论是“非国大”的流放者,还是民主联盟的创建者,他们都表现出了以自由的名义挑战强大政权的勇气,即便这种挑战对他们的个人幸福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风险。1988年我在访问过程中,经常看到一小队黑色伏尔加车(那是克格勃选择的车辆)停泊在民主联盟活动分子的公寓门口。这分明表示,在苏联争取自由的斗争可能就像南非人为自由而战一样是一场持久战。

受到这些革命活动家的勇气的感染,我重新确定了我个人生活和学术生涯的方向。经过1988年、1989年和1990年几次较为短暂的访问,我终于获得了“国际研究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s Board, IREX)1990—1991年度的研究员职位,从而得以在莫斯科从事研究。我在申请中说我将研究苏联对非洲的态度问题,但令我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术指导非常失望的是,我对这个主题只做了几个星期的研究。(我感谢IREX的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利兹·麦科恩(Liz Mckeon)为我新的兴趣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到1990年秋天,形势已经很清楚,苏联特别是俄罗斯正处于社会革命的中途,这次革命的规模堪与现代史上其他几次革命相媲美。如同我现在依然相信的那样,那时的我认识到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将成为20世纪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同时我也认识到,我已经得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那一年,我遇到了很多对本书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有机会同许多这些真实历史的创造者进行联系、面谈和畅饮,当时,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已经开展了。1990年秋天,我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将写出一本关于这些事件的著作。我住在莫斯科期间,正值每周一次发生街头示威的大混乱、军队进入波罗的海三国、法西斯主义分子死灰复燃,以及新共产主义复兴之际。我意识到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将在较远的未来继续存在。因此,我没有立即动笔撰写本书,而是与谢尔盖·马可夫(Sergei Markov)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对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的访

谈。那本《动乱中诞生的俄罗斯民主》* (*Troubled Birth of Russia Democracy*) 打算为未来研究这次革命的学者(包括我自己)提供原始资料。要对新俄罗斯革命有一个更综合性的、分析性的解释,只有等到我们对革命将在何时以及如何结束有一个较好的理解时才有可能。

十年后,我依然在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束点。因为工作的更换、结婚、做父亲,以及其他出书计划的原因,本书的出版一拖再拖,被推迟了十年之久。当然,本书出版被耽搁的最决定性原因,是俄罗斯革命秩序持续的不确定性。要写出一本关于俄罗斯从共产主义统治过渡到民主的书,我需要知道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已经过渡到什么地方了。在苏联解体后十年的今天,要知道这一点似乎依然为时过早。

当然,所有的重大社会革命的开展都要超过数十年,而不是短短的数月或几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十年,美利坚合众国依然没有一部宪法。1799年,法兰西依然处于革命的混乱状态之中。1927年,苏联依然在做市场方法的试验,而斯大林并未完全控制住局势。甚至在这些革命都已经结束了数十年之后,在革命劫荡中形成的规则和制度也解体了。而且那些在当时目睹这些重大瞬间的观察家们,也绝不是善于预见这些革命的最终后果的。今天,政治科学家并没有为我们在急速变迁时期增强预言能力提供多少帮助。因此,本书以一个谨慎的注释结束,充分意识到俄罗斯第二次革命的许多章节还需要展开。

然而,很多东西已然存在,其中一些轨迹是清楚的,而且,人们也可以看到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有可能改变政权巩固方向的那些因素。这些构成了本书的目标。本书并不能穷尽最近15年来在苏联及而后的俄罗斯所发生的所有领域的所有变化,而是紧紧扣住革命性变化的一个方面——政治体系的变化,以此来分析其他的转型(transformation)。在当代本土政治科学中,政权变更被看作是因变量,其他变迁比如领土变更或经济改革则被描述成自变量。

我的立论是由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构成的,而且受到了有关民主化、制度变迁的学术文献中的理论争论的启发和影响,在较小程度上,也受到了

* 该书由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于1993年出版。——校译者注

关于革命的学术争论的影响。我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检讨那些他人考察不同案例而建构起来的理论,而在于以比较的视野分析一个重要的案例,从而实际地发展出一种新理论。不过,对理论论争不感兴趣的人,或对神秘的政治科学理论不熟悉的人,也不必感到惊慌。虽然本书每一章的谋篇布局和分析研究都贯穿着理论论争,但是,我还是有意努力保持生动的历史,避免使用学术行话,这在本书主要的历史章节中尤其如此。冒着让每一个人都失望的风险,我之所以决定写一本同时要讲到一段重要历史的理论著作,是因为我相信,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健康的紧张关系。

最后,本书也许并非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是一本提供文件证据的著作。在最近十来年的经历中,我访问了成百上千的俄罗斯政治家和政客。数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数次让我分享他们的思想。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注释中只出现了一小部分的访谈内容。我在访谈中所得的每一个事实,都尽力找到文字上的出处。然而,也同样由于篇幅的限制,很多难以找到的引证,连同几乎所有的起初对我的研究产生启发的二手文献,都被省略掉了。Archie Brown, John Dunlop, Steven Fish, Jerry Hough, Nikolai Petrov, Tom Reimington 和 Steve Smith, 以及 Michael Urban 的工作对本书的问世尤为重要。对于对这一时期特别感兴趣的学者而言,大部分的访谈录音,以及本书更长的描述及从中引用的文件证据,最终可以从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室中找到。

致 谢

十年磨一书的我,实在亏欠了太多。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以及胡佛研究所一直支持着我的研究和写作。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聘请我作为其在莫斯科的现场代表,这使我得以保持同许多主要信息来源者之间的联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为我1994年至1995年间在莫斯科的另一个家,并自此一直支持我的研究工作。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对本书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这些机构的支持中,我要特别感谢卡内基基金会的默特·阿布拉默茨(Mort Abramowitz),保罗·白乐然(Paul Balaran),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阿诺德·霍勒里克(Arnold Horelick),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hews)和史蒂芬·希斯坦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胡佛研究所的约翰·雷欣(John Raisian)和查尔斯·帕姆(Charles Palm);以及哈佛大学的切普·布莱克(Chip Blacker),戴维·霍洛维(David Holloway),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和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来自纽约卡内基基金会、摩特基金会(Mott Foundation)、全国欧亚和东欧研究会(National Council for Eurasian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斯达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的资助支持着我近年来在多个领域内的研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多年来,在不同地方的多个课题研究过程中,它一直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花费极大精力和时间阅读书稿的学者们。我真心感激这一阅读并评论他人著作的慷慨行为;尤其感谢那些花费了大量时间来阅读比这本书长得多的原稿的学者们,除了在未来通过阅读你们的书稿来偿还之外,我无以为报。我还要特别感谢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Åslund),弗拉基米尔·波克瑟(Vladimir Bokser),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林恩·伊登(Lynn Eden),吉姆·费伦(Jim Fearon),吉姆·戈德杰(Jim Goldgeier),戈登·哈恩(Gordon Hahn),戴维·霍洛维(David Holloway),安德鲁·古晋(Andrew Kuchins);盖尔·拉比杜斯(Gail Lapidus),戴维·莱廷(David Laitin),莎拉·门德尔松(Sarah Mendelson),尼古拉·彼得罗夫(Nikolai Petrov),斯科特·萨根,史蒂芬·施德曼(Stephen Stedman),丽莎·麦金托什-桑德斯特伦(Lisa McIntosh-Sundstrom),史蒂芬·索尔尼克(Stephen Solnick),凯斯琳·斯通纳-韦斯(Kathryn Stoner-Weiss)和巴里·温格斯特,他们的批评和支持都给我极大的帮助。此外,还要特别感谢乔治·布莱斯洛尔(George Breslauer),瓦莱里·邦斯(Valerie Bunce),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马修·伊万杰里斯塔(Mathhthew Evangelista),托马斯·雷明顿(Thomas Remington)和斯维特拉纳·恰里科(Svetlana Tsalik)的辛勤劳动。他们的工作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职责:不仅阅读了每个段落,有时甚至还还不止一次。伊丽莎白·伯恩斯坦(Elizabeth Bernstein)和伊丽莎白·伊克扎霍夫(Elizabeth Ekzarkhov)承担了许多编辑和研究助理的工作;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罗格·海顿(Roger Haydon)的督促促使我将一本生涩难懂的长篇书稿转变成一本易读的专著。在这些年来,研究助理坦尼娅·科瓦连科(Tanya Kovalenko),埃利娜·特伊格(Elina Treyger),阿列克谢·迪科夫(Aleksei Titkov)和安德雷斯·尤姆兰(Andreas Umland),以及秘书图拉·帕潘尼古拉斯(Toula Papanicolas)和维拉·雅库莎(Vira Yakusha)的帮助也让我获益良多。

本书的观点形成于我同俄罗斯多名观察员同事的数次探讨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分析家。我从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Vladimir Akimov),弗拉基米尔·波克瑟,珍妮·比斯特里斯基(Jeanne Bourgault),安德烈·比斯特里斯基(Andrei Bystritsky),列昂迪·彼佐夫

(Leonty Byzov), 詹姆斯·查文(James Chavin), 亚当·爱尔斯坦(Adam Elstein),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 阿纳托利·戈罗夫(Anatoly Golov), 列奥尼德·戈兹曼(Leonid Gozman), 瓦谢斯拉夫·伊格鲁诺夫(Vyacheslav Igrunov), 佛瑞德·海亚特(Fred Hiatt), 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 阿列克谢·卡拉-穆萨(Aleksei Kara-Muza), 伊格尔·哈里乔夫(Igor Kharichev), 瓦莱里·霍米雅科夫(Valery Khomyakov), 坦尼娅·克拉斯诺彼夫索娃(Tanya Krasnopevtsova), 弗拉基米尔·库兹涅佐夫(Vladimir Kuznetsov), 玛莎·李普曼(Masha Lipman), 弗拉基米尔·李森科(Vladimir Lysenko), 亚历山大·米查尼克(Aleksandr Mechanik), 谢尔盖·马可夫, 弗拉基米尔·毛(Valdimir Mau), 鲍里斯·马卡连科(Boris Makarenko), 伊格尔·明徒斯耶夫(Igor Mintusev), 维克多·彼什科夫(Viktor Peshkov), 尼古拉·彼德洛夫(Nikolai Petrov), 安德烈·雷亚波夫(Andrei Ryabov), 阿兰·卢索(Alan Rousso), 玛格丽特·沙比诺(Margaret Shapiro), 维克多·谢尼斯(Viktor Sheinis), 莉莉亚·谢夫佐娃(Liliya Shevtsova), 米哈伊尔·施奈德(Mikhail Shneider), 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 艾琳·史蒂文森(Irene Stevenson), 叶卡捷琳娜·叶戈洛娃(Yekaterina Yegorova), 弗拉基米尔·佐里金(Vladimir Zharikin)和阿列克谢·祖丁(Aleksei Zudin)的不同视角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而,我最为感谢的,则是所有在俄罗斯帮助过我理解这一革命的人们。正如他们竭力创造历史一样,革命双方都尽其所能地帮助我记录下这一历史过程。有时,我必须开着录音机,在最高苏维埃投票的间隙同一名代表边走边采访。有时我会在周日凌晨两点同一些人见面,因为这是他们仅能找到的空闲时间。许多人都非常热情,邀请我去他们的公寓和别墅,并花费数小时同我分享他们的回忆和感想。一些信息提供者一直都是我的朋友;有些则在之后将我视为其事业的敌人。所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会在我的历史描述中找到缺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本书能促使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一革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被继续研究;现在发掘出越多的资料,就对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越有利。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唐娜·诺顿(Donna Norton)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即使在我忙于研究而无法抽身陪她的时候,她也依然理解这一革命对我的重大意义。20世纪90年代,我大约去过俄罗斯五十次,这也意味着我们五十次的分离。但这还不是全部。在1993年12月大选之后,当法西斯的恐怖似乎要威胁到俄罗斯的民主时,唐娜答应跟随我——不,她告诉我我们必须——去莫斯科。她放弃了她的工作和阳光明媚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而移居莫斯科。在俄罗斯,她没有任何工作机会,只懂得一丁点儿俄语,而作为一个南加利福尼亚人,她对寒冷的天气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但她是一个能吃苦并很有毅力的人。她知道生命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不是。在1995年回到美国之后,本书继续萦绕着我们的生活。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去完善本书而不是陪在她的身边。她的耐心、智慧和支持,我将永记于心。

迈克尔·麦克福尔

于华盛顿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译者序 / I

序言 / VII

致谢 / XI

第一章 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革命性过渡：一个模型 /1

过渡理论 /4

路径依赖和重新平衡 /17

方法论的考虑 /22

本书梗概 /23

第一篇

戈尔巴乔夫时代,1985—1991 年

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的设计：改革苏联政治制度 /35

平衡的苏联体系 /36

经济改革 /41

政治改革 /44

国家边界和联邦改革 /53

结论 /56

第三章 苏联的终结 /66

新角色,新思想,新权力 /67

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73

1990年俄罗斯人代会选举 /82

扩大的变迁议程 /90

苏联最后一年间模糊而变化的权力平衡 /93

不确定下的谈判:经济与联邦条约 /100

结论 /112

第二篇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1991—1993年

第四章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制度设计 /133

制度设计的背景:众多的议程,暧昧的委托 /134

解散苏联,建立俄罗斯国家 /140

有关经济体制设计的决策 /150

关于如何设计新的政治体制的构想 /155

第五章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 /176

充满争议的变革议程 /177

合作、分化与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 /192

(重新)制定新宪法 /202

1400号总统令及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终结 /205

结论 /208

第三篇

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诞生,1993—1996年

第六章 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设计 /227

新宪法 /229

议会选举规则 /234

久拖不决的设计议题:经济制度和国家边界 /239

结论 /242

第七章 过渡中的立宪政体 /248

国家杜马的内部结构 /251

大赦投票 /256

宪法问题 /257

经济问题:市场浪漫主义的终结和寡头资本主义的开始 /263

边界问题:苏联、俄罗斯联邦和车臣 /271

结论 /276

第八章 过渡中的选举政治 /287

1993年选举 /290

1995年议会选举:变化中的平衡,持久的规则 /298

1996年总统选举 /308

结论 /321

第四篇

俄罗斯民主的未来

第九章 俄罗斯民主的质量 /335

超级总统制 /336

政党制度 /338

公民社会 /343

媒体 /346

国家 /347

法治 /349

分权化 /351

俄罗斯民主脆弱性的个人态度指标 /353

俄罗斯有缺陷的民主：临时的还是永久的伤疤？ /356

第十章 不完全民主的稳定性 /366

解释转型道路的成功与失败 /369

路径依赖和俄罗斯民主的稳定性 /381

结论 /393

第一章

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革命性过渡： 一个模型

独裁统治在俄罗斯有数个世纪之久。沙皇和共产党首脑的统治是如此之长久，以至于很难想象俄罗斯存在一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体系。一些人甚至声称俄罗斯人有一种产生独裁主义领导人的文化倾向。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种新的统治方法出现了，民主的确产生了。作为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发动的改革的结果，一种不同的政治制度(political regime)最终在俄罗斯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即建构政治的游戏规则——规定，承担政治权力的政治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一旦执政，这些新领导人必须遵守宪法程序。纵然这一体系最终还是崩溃了，但从性质上说，它的出现象征着跟以往俄国和苏联的政治实践的决裂。本书的主题是解释这种新的政治体系即俄罗斯民主的产生。

俄罗斯向民主的过渡并不顺畅，也不是很成功。在描述俄罗斯产生新的民主制度时，我们必须解释制度失败，因为有一些新的重组政治的制度设计已经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新的设计却失败了。如果政治游戏规则的变化引发“变态”政治或“革命”政治时，设计新制度的努力便告失败。如果一个或多个重要的行为者选择了在既定的或修正了的的游戏规则之外去实现政治目标，制度失败的情形便出现了。当两个对立的集团声称都对同一领土范围拥有主权，而最终只有“一个主权政体重新恢复了对政府的控制”¹，上述这些情势就变成了革命。从1985年以来，苏联及而后的

俄罗斯总共经历了两次这样的制度设计的失败或革命性情势。

第一次失败发生在1991年8月。从1988年起,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着手发动了激动人心的国家政府和政治制度改革。这在苏联历史上从未尝试过。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蓝图的最终、最激进的目标,包括改变统治规则、允许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重塑苏联共产党与苏联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产生一套新政治制度来管理苏联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到1991年8月,由于两个对立力量之间的暴力对抗——它们都声称对同一个国家拥有主权权威,戈尔巴乔夫的制度创新努力宣告结束。戈尔巴乔夫试图改革苏联政治制度的尝试失败了。

第二次失败发生在1993年10月。在1991年秋天的政变企图流产之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及其政府,同俄罗斯的议会一起,设计了一套新的治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这一设计起初异常欣快,但没有成功,并以1993年秋天两个集团之间的又一次武装冲突而告终。在这次冲突中,双方都宣称自己对俄罗斯拥有主权权威。

紧随着1993年10月的冲突,叶利钦及其顾问们精心设计了治理俄罗斯的第三套规则。结果证明,这次建构新政治制度的努力比先前的两次要成功得多。在1993年的全民公决中,俄罗斯人投票产生了一部新宪法。这是自古以来俄罗斯第一次有组织的政治。由新宪法所支撑的选举成为新政治秩序的关键要素。1993年、1995年和1999年,俄罗斯人投票选举产生了国家杜马(即议会下院)代表。1996年夏天,公民选举产生了俄罗斯在后苏联时期的第一任总统。2000年3月,第二任国家元首也由选民选举产生了。这些选举是根据法律规定而准时进行的,与1993年宪法不相抵触,而且有大约三分之二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中的欺诈行为(尤其是1993年选举)使选举结果大为失色;但是,所有重要的政治行为体都承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而没有对这一合法性提出挑战。²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很早就成为最有希望的获胜者;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选举中,谁将成为最终的获胜者在选举结束之前是不确定的。在三次议会选举中,原先的任职者在选举失败后都和平地交出其席位,这表明投票有了真实的政治结果。

根据大多数定义,这些选举中的里程碑标志着向民主过渡已经成功

地结束，“变态(政治)已经不再是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特征；也就是说，行为者选定一套几乎是明确的规则并服从这些规则”³。1993年以来合乎时宜的政权(常被称作“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甚至可能达到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程序民主的标准——“个人以通过竞争赢得人民选票的方式来获得权力，从而做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⁴。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5—1991年)或俄罗斯第一共和国(1991—1993年)明显不同的是，在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期间，所有重要的政治行为体都是在新制度秩序控制的范围内追逐其目标和利益的，它们没有为实现利益而向既存的规则发起挑战。

比较而言，俄罗斯从一种政权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过渡所经历的时间，比大多数其他现代国家近来实现向民主过渡的时间要长得多。鉴于最成功的过渡已经同过去的独裁主义相决裂，或已经剥夺了独裁主义者的权力，并且与此同时很快地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苏联—俄罗斯的过渡要完成这样一些任务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尤其是，在俄罗斯，旧政权的崩溃并不是与新政治秩序的建立同步进行的。相反，新旧交替的间隙长时间地存在。⁵这个迟滞的转型给最终出现的政权类型带来了很多后果。尽管事实证明，俄罗斯设计民主制度的第三次尝试和努力比前两次要持久，但是这个新体系依然不是一个自由的民主政治。⁶利益多元的中介制度是脆弱的，以大众为基础的利益集团很少见，有助于恢复权力均衡的制度——比如一个强大的议会、健全的政党体系和司法独立——还没有巩固。支撑民主的这些制度的缺失，意味着俄罗斯的民主比自由民主要脆弱得多。此外，民主稳定的深层属性——精英和社会都对民主过程承担规范性义务——还没有在俄罗斯出现。虽然俄罗斯所有重要的政治行为体都视选举为“唯一可取的游戏”(the only game in town)，并以此检点自己的行为，但是，精英界依然存在反民主的态度，整个社会也一样。黏附在民主原则之上的自利动机没有转化为对民主的规范性义务。

为什么苏联及其后的俄罗斯的两次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是以政治敌手之间的武装冲突而告终的？跟先前两次政治制度改革的努力相比较，为什么第三次尝试较为持久些？继先前两次失败之后产生的政治体系是如何持续下去的？俄罗斯民主的制度缺陷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这

些问题正是本书要阐述的。

过渡理论

“角色中心”研究途径

在解释苏联及后苏联俄罗斯的民主为什么是缓慢地、迟滞地和不完全地出现时,人们提出的第一个论点就是个人创造历史。由于个人依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决策,俄罗斯告别共产主义统治的过渡道路变得坎坷而漫长。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及历史的结构塑造着和制约着个人的选择空间,但是,只有当这些固有的力量最终转化为人的行动时,它们才会显示出因果关系上的重要性。⁷文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也许可以提供历时的重要推论,但不适合解释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毕竟,同样的结构理论不能被用来既解释变迁又解释承续性。⁸

从现在开始数十年回溯,苏联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戏剧性的和反复无常的变化,似乎只是与民主调情的插曲,暂时偏离了俄罗斯更为传统的极权主义道路。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变化最终证明俄罗斯开始走上一条基本全新的和长期的民主轨道,而在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的不利开局就像打了一个小小的反民主之隔。然而今天,苏联和俄罗斯设计民主制度的努力,无论是成是败,都需要做出解释。如果俄罗斯的民主最终又一次失败了,那么,在90年代正是使民主运作起来的努力就值得解释。如果俄罗斯注定永远是一个独裁国家,就像一些文化理论学家使我们相信的那样,那么,俄罗斯人为什么首先开始的是瞎忙民主呢?相反的,如果俄罗斯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一些现代化理论学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那么,早期设计新的民主制度的努力又为什么失败了呢?只有引进个人角色来进行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制度设计尤其是一种精英行为。这一过程使得很多名人成为整个故事的主角,比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的顾问们,以及他们的政治同盟

和敌人。在这急剧的、革命性的变化时刻，一旦制度航标和人类行为的约束机制一起被削弱或坍塌，我们就可以想见个人的选择将意义重大。⁹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结构的复原能力变得更显而易见。历史中短期的蜿蜒曲折曾在当时显得多么重要，可是从长时距来看，经过漫长时间洗礼的历史发展看起来更像是直线式的，其发展轨迹显得是那么明显且不可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结构也开始制约个人的选择和行为。然而，当一个国家处于从一种政治体系向另外一种政治体系过渡的阶段，不确定性程度是很高的，且偶然性也是事实，这使得大多数的社会结果可以从个体行为体上去找原因。通过关注这些个体，关注他们的偏好、他们促进或阻碍变革的能力，本书提出的论点将人的作用和个人的选择置于解释的中心。

把分析重点放在行为体而不是结构上，这在制度变迁研究中并不新奇。相反，最近三十多年里许多研究民主化问题的理论家早已相当注意行为体的作用，特别是精英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并把这些看作是过渡过程的关键事件。¹⁰ 尽管以精英为核心的过渡理论尚未有充分的、详细的和完整的论述，但是，这个模型的大致轮廓或者其中的隐喻却已清晰可见。最初引发转型的深层次原因有着很大的差异，包括从经济的急速衰退到战争。一些学者已经发展出一个相似的由极权主义统治向民主过渡的逻辑，一旦发生这种变迁，便存在着这种逻辑。¹¹ 首先，在旧政权内部出现了妥协派(soft-liners)和强硬派(hard-liners)的分野。妥协派相信某种程度的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强硬派根本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如果妥协派占上风，他们就会实施政治自由化的政策，就会去考虑组织和动员新的社会行为体。这些外在于国家的力量也分裂为两大阵营——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寻求与妥协派协商和谈判，通过形成一套新的规则——民主规则——来组织政治竞争以获得权力。激进派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协商与谈判，而主张推翻旧制度。只有在妥协派与温和派竭力孤立强硬派和激进派，然后就新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民主转型才是成功的。

人们可以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案例中看到这段过渡历史的基本要素，这个变迁首先开始于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¹² 为了对已经觉察到的经济危机作出反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引进了政治自由化，以此作为推

动经济改革的方法。如此一来,戈尔巴乔夫就疏远了苏联共产党内的强硬派,同时也激发了苏联社会里新政治行为体的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甚至可以辨别出这些新社会行为体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到1990年秋,苏联的形势发展似乎告诉人们:民主过渡的时机已然成熟。然而,这样一个平和的、协商式的民主转型并没有出现;相反,随之而来的是1991年8月的对抗,再后来发生了1993年10月俄罗斯精英之间的又一场暴力冲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苏联和俄罗斯会与成功的民主过渡模式背道而驰?重新认识早期研究文献中关于民主化变迁议程的中心假设,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而另一部分答案则只能通过质疑同一文献中关于权力平衡的中心假设才能得到揭示。本书认为,有两个因素对协商式制度变迁(negotiated regime change)和成功地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产生了影响——有争议的变迁议程和对行为体之间权力平衡的理解。

争议的变迁议程

柏林墙倒塌后激增的向民主过渡的新事件,让人们一直处于兴奋之中。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试图把这些新的案例与南欧和拉美国家的旧案例结合起来,一开始便不相信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并高估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和特里·卡尔(Terry Karl)宣称,在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早期几年中,“政治科学家们连同其他领域的专家们在旁观东欧这些事件时常常带着‘帝国意图’,即把这看作是一种(终于)将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吸收进一般性比较分析之中去的机会”¹³。由于施米特和卡尔以及其他众多学者认为,东欧与前苏联发生的变化与其他地方发生着的制度变迁是相类似的,因此,这些理论家们试图运用从拉美和南欧的案例中发展出来的图式解释这些新的转型。¹⁴ 这些案例都被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化第三波——发端于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专制统治的垮台——的组成部分。

这种研究就是要寻找相似的模式。制度变迁的差异性——如果曾受

* 即指东欧国家。——校译者注

到关注的话——基本被解释为各地区中的不同过渡模式。通过协商、契约而形成的过渡往往产生成功的民主结果，相反，通过暴力的非协商性的过渡(non-negotiated transition)往往导致较少的民主、新的专制政权以及内战。¹⁵ 转型模型与新生的政权类型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联，这一假说早已在那些研究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民主化的早期文献里被提出了。¹⁶

探讨过渡模型与政权类型之间的关系，为分析苏联—俄罗斯案例提供了一个好的切入点。苏联—俄罗斯案例显示了未能成功达成契约的过渡的消极结果。尽管俄罗斯的精兵们在几次重要关头都试图通过达成契约完成过渡，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其结果反而是导致了两次暴力冲突和一个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拖拖拉拉的、不完全的过渡。换句话说，苏联—俄罗斯的经历为契约的重要性提供了反面的例证。没有契约，就没有向民主的顺畅过渡。

但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协商达成成功的契约呢？契约与宪法草案相类似，或者说起着临时的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意味着它们必须被看成是结果的一部分而不是产生结果的原因。如果契约可以被看作是临时的制度安排，那么关于契约的假设最好是临时性的，无谓的反复则是最为糟糕的——因为临时的制度安排的成功出现导致永久性的制度安排的成功出现。过渡理论必须确认那些导致契约产生的因素，因为这些影响协商性契约(negotiated pact)的可能性的因素，应该是影响民主转型的同一些因素，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影响制度出现的可能性的因素。

毫无疑问，研究民主过渡的作者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假设。最重要的是，成功的契约必须“限制政策选择的议程”¹⁷。对政策选择的议程越加以限制，协商达成契约的可能性越大，借此，民主产生的可能性也更大。事实上，在关于民主化的文献中，从对拉美和南欧的分析中所得出的一个标准的原则认为，为了新的政治制度的成功，变迁的议程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那些只能称之为政治改革的制度变迁事例，较之那些过渡性的制度变迁而言，达成契约要更容易些，因为过渡性的制度变迁同时牵涉到方方面面新规则的重新表述。

例如，当界定边界的问题同样摆在谈判桌上的时候，民主化的任务就变得复杂了。以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更早的传统为基础，丹克沃尔特·

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就曾极力强调,在考虑能否向民主过渡之前要优先考虑界定政体边界的问题。“国家的统一,”罗斯托谈道,“必须先于其他所有民主化问题”,并且“一旦国家的统一问题为大家不加思考地接受”,它就成为民主问题的前提条件。¹⁸反过来,这一论断也同样成立:当国家的边界还处于争论中,民主化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过渡学家们”(transitologists)往往贬低罗斯托的假设,竭力把所有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看成是共同的第三波的一部分。许多研究民主化问题的专家不去解释为什么有边界争议的国家向民主的过渡一定比那些同质性国家要麻烦得多,而把注意力集中于这类国家是如何通过仔细的制度设计来管理这些多民族冲突。¹⁹然而,苏联—俄罗斯案例强有力地支持了罗斯托最初的警告,那就是在为政府草拟游戏规则前有必要先界定国家的边界。

其他民主化理论家则强调议程的变迁要避开经济转型。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也就是拉美和南欧成功地掀起向民主过渡的浪潮时,激进的经济改革问题几乎就没有摆上议程,因为民主活动家相信,这一系列问题将引起来自旧政体中无法抵御的对抗。政治和经济体制同时协商的情形几乎没有出现过。正如奥唐奈(O'Donnell)和施米特所总结的,“我们早先所知道的所有向政治民主的过渡都守住了一个基本的底线:胜过对方和彻底击败对方都是不得已的。换句话说,过渡期间资产阶级的财产权不可侵犯”²⁰。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提出警告时附和了同一主题,“不能避免地,我们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只能建立在以保持经济关系完整为代价的基础上,这不仅包括生产结构,还包括收入的分配”²¹。总之,变迁的议程所涉及的面越窄,达成契约以及最终产生新的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大多数研究制度变迁的作者们一致认为——并把这作为一种一般的类型学说法——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变迁的议程所涉及的范围要比拉美和南欧从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过渡时其变迁的议程所涉及的范围宽。²²关于经济组织的争论和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边界争端同时摆上了谈判桌,关于政治游戏规则的协商也同时产生。其结果我们可以想见,即从共产主义制度向民主的过渡比起从专制主义制度向民主的过渡更为困难,

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不成问题,国家或者民族也没有边界矛盾。与拉美国家相反,东欧新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为国际国内两股力量逼迫,必须同时着手经济的转型和政治的变迁。共产主义制度的组织意味着,没有经济上的变革,政治上的变革便不可能发生。就像(迄今为止)在中国已经显示的,没有政治变革,经济转型一样能够出现;但是,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变革,政治上的变革就不可能同时发生。在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急剧而意想不到的崩溃将经济和政治的转型问题同时摆上了议程,甚至在那些对经济和政治的同时转型问题呼声不高的国家也同样如此。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一些多民族国家也不得不在议程中加入第三个议题——民族和国家的边界问题。²³ 这些多民族国家——尤其是次国家(subnational)的边界与其族群的居住地相符的那些多民族国家——要么分崩离析,要么在巩固民主政治问题上比那些民族更单一的国家做得失败。²⁴

在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试图通过延缓解决某些问题来对庞大的变迁议程逐项做出决定,但是他们鲜有成功。尤其是,他们试图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经济转型问题和宪法问题,但都失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争议通过冲突而得到解决,变迁议程的范围也变窄了。简单地说,边界争端在1991年8月冲突发生后不久就结束了;另一方面,在1993年10月冲突发生之后的某个时间,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也偃旗息鼓了。俄罗斯领导人也只有等到这两桩事全都完成,才能把精力集中于政治改革上。正如本书第三部分所讨论的,争议的变迁议程中关于边界问题 and 经济转型问题得到解决,使得出现新的政治制度具备了更大的可能性。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可能已经为新的民主制度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结构的制约有助于界定变迁的议程范围。例如,减少民族矛盾的制度设计问题在一个民族较单一的国家就不大可能出现在变迁的议程当中。在资本主义国家,改革计划经济(command economy)的任务不必塞进变迁的议程中。同时,对客观条件的主观态度决定了对变迁的议程产生争论的强度。结构因素影响人们对变迁的必要性及其程度的认知,但是最终,个人选择以及个人选择与其权力之间的战略性互动是产生变迁

的议程的主要因素。改革计划引起争议的强度,是重要政治行为体之间共识程度的函数,也是这些行为体之间权力平衡的函数。意见达成一致的程度越高,有争议的变迁议程所涉及的范围就越小。分歧的程度越高,有争议的变迁议程所涉及的范围就越宽。

例如,将俄罗斯与波兰对资本主义偏好的强度进行比照是有教育意义的。两个国家都同时经历了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迁。然而,有争议的变迁议程所涉及的范围在两个国家却迥然不同。波兰的大多数政治行为体对他们所渴求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形式,较俄罗斯的政治家达成的一致性程度要高得多。²⁵在波兰,共产主义者和自由改革家们都对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所追求的市场改革的形式和速度持不同意见。然而,较俄罗斯而言,分歧的强度和程度却小得多。在波兰,甚至连共产主义者们都同意,在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崩溃之后必须寻求某种市场改革的形式。全国一致的意见也为波兰改革家们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去进行艰难的经济改革。然而,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崩溃后,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们却不相信市场改革的必要性。相反,如本书第二部分所论述的,1991年以后的好几年中,他们都试图阻碍市场改革的进行。

权力的平衡也同样影响变迁议程的范围。权力较小的激进变迁的倡导者们对变迁的议程没有产生现实的影响。如在南非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共产主义倡导者们能力仅局限于使他们的主张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同样,在俄罗斯的案例中,解散俄罗斯联邦的倡导者们就连将他们的议题带上谈判桌的能力都没有。²⁶而且,一些问题又要比其他一些问题容易产生更严重的分歧。在苏联—俄罗斯案例中,无论是在精英之间还是在普通民众之中,有关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以及要不要保留苏联的争论,比草拟何种选举法的争论,产生分歧的强度要大得多。一些问题比其他一些问题要更容易协商些。较早期的有关民主化的文献强调平分肥缺作为顺利过渡的一种手段的重要性。²⁷可一旦利益分配不当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在苏联变迁的议程中最初引出的问题就包括对不能分割且不可逆转的结果的重大选择,这使妥协留下的回旋余地很小。是让苏联继续存在还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俄罗斯是走向市场经济还是继续保留计划经济?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让相关各方陷于互

相吹捧(logrolling)或走第三条道路,而是造成类似那种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的情势。这些问题甚至可能通过民主的程序也得不到解决。正如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所言,“民主的可能性有着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民主仅在大问题的边际发挥作用。的确,民主是为规范边际的政治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发明……如果冲突强烈到使一个或者更多的政党在输掉前就陷入了动乱,那么民主将是失败的”²⁸。

在苏联—俄罗斯案例中,许多最初设计的有关边界和经济的决定,其永久性的后果成为妥协的障碍,因为各种行为体相信,他们正在处理的是在未来难以推翻的基本问题。由于重建一个帝国或重建一个计划经济的代价是非常高的,这些苏联时代制度的倡导者们宁愿冒着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寻求他们渴望的结果。确实,相互吹捧、笼络人心和讨价还价在建立变迁的联盟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种谋略却不能用于在两个目标基本对立的群体之间架起桥梁以填补他们之间的鸿沟。在解散苏联的倡导者与保留苏联的倡导者之间没有契合点。正如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一样。²⁹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如果争议的是利益不可分割且后果又不可逆转的问题,那么较之利益可以分割且后果也可以逆转的问题,行为体之间更容易出现众口难调的局面。

如果行为体在制度变迁的几个方面都存在偏好冲突,那么,在哪些规则必须首先予以改变这一问题上,他们也必定有着不同的偏好。如果行为体对议程的不同部分的变迁问题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这就比在他们之间有着不同偏好的情况下更容易达成共识。另外,为行为体所偏爱的变迁的结果可能对变迁成功的可能性产生影响。为所有的重要的行为体一致认同、共同追求的制度变迁,与主要行为体对变迁的过程有着不同偏好的情况相比,前者完成得更快。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苏联和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前两次政治制度建设的失败,与民主制度的设计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相反,各行为体首先是在主权问题上,而后又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冲突。他们只是等到争议的议程中这两项议题(更为重要?)得到解决或不可收拾时,才把注意力转移到民主制度的设计问题上来。

这个广受争议的变迁议程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关于选择和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因需尽快做出决定而加深。有关美国立法过程的

研究显示,同时拿出多项议程来讨论解决,为交易、相互标榜及妥协创造了机会,而这些能为所有人带来好处。³⁰但是,当一些基本的问题处于悬而未决的境地时,妥协就难以达成。时间也是一个因素。在革命性的变化时期,各种政治行为体没有时间来圆滑地解决这类复杂的问题。在东欧与苏联,制度设计的时刻来得突然而又出人意料,设计者几乎没有时间设计出最佳的解决方案或者以次佳的方案进行实验。多个领域同时性的变迁也可能导致在不同的妥协之间产生“相互矛盾或不利的相互影响”³¹。当诸多领域的变迁处于同时爆发中,政治行为体将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那就是很难形成对未来的共同期待。在制度真空的背景下,对战略后果的计算成为难题。在这种不确定的、独特的情景中,政治行为体由于对议程中的制度设计问题缺乏经验或不甚了了,他们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对不同的制度设计的偏好到底是什么。³²例如,从未参加过真正选举的政治领导人,就很难知道他们究竟是偏向于多数代表制还是比例代表制。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肯定都缺乏选举制度的直接经验。根据定义,通过重复而得到的学习效应难以产生,因为制度设计之时往往意味着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制度变迁的先期经验。在苏联和俄罗斯的经历中,明显缺乏关于市场和民主制度的知识,这使得判断制度设计的效果以及判断不同行为体对这些设计的偏好变得困难重重。

在制度过渡中,有争议的变迁议程越大,新的民主制度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多领域同时爆发的变迁强化了选择与后果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使理性的计算变得困难。如果事情是连续不断地同时爆发,领导人就很难精确估算其制度革新的效果,或很难准确判断其他行为体的偏好。领导人甚至难以决定自己对新生问题的偏好。最终,范围宽泛的议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就可能难以通过妥协来解决。当妥协的利益不能被瓜分,具有不同偏好的行为体就可能激起赢家通吃的动机,这样,制造冲突的策略将多于促成妥协的计谋。

不依赖结果估算偏好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回顾过去,我们不难发现冲突显然是难以调和的偏好的必然结果,相反,合作则似乎是趣味相投的自然产物。在知道妥协的结果之前,我们又如何去评估哪些偏好是不可调和的、哪些偏好又是一致的呢?本书中提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如我们

怎么才能估算出行为体在国家边界、经济性质及政治制度设计等问题上产生分歧的程度？正如本书随后几章所阐明的，偏好的强度可以在一个单一群体或同盟体内部得到改变，这使得辨明我们所说的行为体的真正信仰成为一件困难的事。

本研究采取的策略是折中主义的。首先，将行为体对有关问题的表态进行比较、对照。这些表态来自政党的纲领、演讲、立法倡议和访谈。本书借用这些表态，并置其于比苏联—俄罗斯案例更大且具有对比性的背景之中，以有助于阐明这些区别的显著特点。例如，在苏联崩溃后，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仍然公开鼓吹恢复计划经济。相反，转向社会民主的波兰共产主义者却没有这么做，这表明俄罗斯市场改革的反对者的呼声比之波兰要尖锐得多。然而，表态本身并没有对行为体的偏好问题提供丰富的信息。第二种证明是在这些偏好中的资源投入程度。例如，如果行为体去创建致力保留苏联的组织，那么，为这一目标采取的行动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就比声称要保留苏联的演讲要强烈得多。冒险行动——是指那些因为偏好的缘故而采取的成败难以预料的行动——是有关偏好的最后的信息资源。比如，1993年9月，当俄罗斯人民代表决定武装保卫议会大楼*之时，他们采取的就是胜负难料的危险行动。这种行动偏好的表达发生在双方的军事僵局尘埃落定之前，因而，他们的偏好无需依赖结果就能够估算出来。尽管发生在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在当年的10月份就结束了，但我们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俄罗斯，关于政体组织的争议比那些在过渡期间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的国家要强烈得多。

对权力平衡的理解

除了有争议的变迁的议程之外，第二个对成功过渡的可能性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变量，要算是对在重要的行为体或群体之间进行权力分配的理解了。较早研究民主化问题的作者假定，精英之间（那些拥有权力或正通过竞争获取权力的人之间）平等的权力分配与成功地向民主过渡之间

* 即俄罗斯国家杜马所在地“白宫”。——校译者注

存在着正相关。因为通过对抗的方式不会使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获得胜算,于是他们选择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根据罗斯托的观点,在权力平衡以及挑战者与被挑战者之间的权力尚未极化这样一种情势下,更有可能产生向民主的成功过渡。一旦没有一个政党能提供解决的办法,被拖延的僵局迫使行为体寻找次优的妥协。³³普沃斯基由这个论点中引申出一个假设,即权力之间不确定的平衡更容易走向最民主的安排:“如果每个人都躲在罗尔斯之幕(Rawlsian veil)后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最终实现的民主制度下对自身的政治力量知之甚少,那么他们都将选‘最小最大’的解决方式(maximin solution):建立那种引入制衡并扩大少数派的政治影响力的制度,或者同等重要的,制定对公共舆论的波动极为麻木的政策。”³⁴换句话说,不确定性有可能促进具有民主结果的妥协。³⁵

本书对苏联—俄罗斯过渡的分析,在权力分配及其分配的不确定性,与成功地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二者间关系这一问题上对上述论点提出了挑战。苏联—俄罗斯案例显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权力间相当平等然而又不确定的平衡只能制造纷争而非妥协。在走向1991年8月的冲突与1993年10月的对抗期间,对立双方间的权力分配都相当平等。相反,1993年10月之后,较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秩序,可称为一个极不完美的民主秩序。普沃斯基争辩道:“民主不能产生于专制;它只能在协商中出现。”³⁶尽管普沃斯基关于自由民主产生过程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但是俄罗斯的经验却显示,选举的或非自由的民主却可能通过强制产生。

权力在此仅仅被定义为受人控制、用以实现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偏好的资源。就本书所讲的特定问题而言,权力是指在不政府状态中,也就是在规则不能制约行为或者外部权威不能强制执行协议的情况下,一个行为体战胜对手的能力。³⁷与争议的议程变迁的变量一样,权力对制度的影响既有主观方面的性质也有客观方面的性质,即实际上的权力分配和对权力分配的理解。如果每个人对关键角色(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有着同样的理解,那么,在新制度秩序方面达成一致就较各行为体对权力分配的评定出现分歧时更加容易。

如果先想象出一种理想类型,那么此处的直觉将变得更加清晰。在

一个存在完全信息的世界，对权力分配的充分了解可以预见所有的结果。如果失败者（在证券交易中或在战场上）在战斗前就知道他们必将失败的结果，那么他们就不必付出争斗的代价。³⁸有关权力的完全信息将找到解决争端的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有关权力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程度越大，行为体进行战略性估算就越困难。在这种情势下，行为体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制定对所有行为体都有制约性的规则，以此对不确定的未来两面下赌注。然而，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使得行为体对一切事情都产生博弈心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具有赢的机会。对权力的野心是产生争端的主要原因。³⁹行为者会高估自己的权力而贬低对手的权力，反之亦然。正如杰弗里·布兰尼（Geoffrey Blaney）在分析突然爆发的武装冲突时得出结论，“战争通常在两个国家对彼此的相对实力认识不一致时爆发；战争又通常在两个交战国就其相对实力取得一致认识时停止”⁴⁰。这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国内政治中两支对抗力量间的冲突与和解，尤其是在改革变迁期间、国内无政府主义的乌云遮盖住了理性的估算之时。

正如经本书重新表述过的一样，平等或均衡的权力分配似乎更易为民主政治产生一个更为适宜的新的制度安排。⁴¹僵局并不能保证成功，相反，僵局或对峙只能制造冲突、内战或革命。⁴²在权力分配相对均等的情势下，陷于冲突的双方都想获得胜利。一旦行为体确信他们陷于均衡状态，他们有可能相信打破僵局的唯一出路是寻求宪法外的策略。⁴³对于成功（即一种新的稳定的制度安排）而言，比实际的权力分配更为重要的是对权力分配的共享知识。与不为人知的或不为人所理解的对称的权力平衡相比较，为众人所了解的不对称的权力平衡更容易形成大家所能承受的过渡。权力平衡瞬息万变的动态局势较之静态局势更难以做出判断。⁴⁴

以一个赤裸裸的权力形势为例，有助于说明上述论点背后的直觉。想象你正走在马路上，一个七英尺高三百磅重的大汉伸手向你要皮夹子。除非你是一位高级柔道运动员（对自身权力的隐藏信息），否则你很快就会明白在你俩之间的力量不对称，而后你马上乖乖地递上钱包。这种情形产生的结果很容易预测。现在，想象你正走在马路上，一个身高体重都

和你相仿的没有携带凶器的男人伸手向你要皮夹子。在这种情形下,看起来你俩的力量是对称的,因此你可能想方设法捍卫你的钱包。如果力量的分配确实是均衡的,那么你可能为此打斗很长时间。并且最后,你以前面出现的结果结束战斗——失去钱包。而在第二种情形中,代价则高得多。在第一种力量不对称的情形中,没有出现冲突并且“过渡时刻”很快就完成了。在第二种力量大致对称的情形中,出现了冲突,过渡时刻拖长且双方都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并且结果直到最后才确定下来。

因此,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命题,没有理由假定均等的权力分配还是不确定的权力分配能预先产生成功的过渡。只要过渡成功,这类过渡更容易产生自由民主。强制的过渡——这类过渡在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由一方说了算——更容易导致非自由民主甚至假民主。然而,权力平衡相对平等的情势在协商游戏规则时也容易谈崩,最后还可能导致冲突。在某个行为体明显对其他行为体享有霸权的情况下,在制定游戏规则方面更不易产生冲突。霸权制定游戏规则,其他行为体只能服从。⁴⁵

这个一般假设的推论还与所涉及的行为体的数目有关。数目越大,对权力平衡的估算就越复杂且越不稳定,因此,出现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小。例如,在苏联时期的最后几年,随着新的政治行为体的激增——首要的是包括刚刚选举产生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对权力平衡的判断总体上说大为复杂化了。牵涉的行为体的类型也影响到权力平衡的估算。如果政治自由化在社会内点燃持续的大众动员,那么在旧体制的温和派领导人与社会上的温和派之间就更难达成协议,达成契约。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的是革命而非协约式的过渡,而革命又几乎不可能产生民主的结果。⁴⁶ 大众动员的出现或缺失,再次被描述为一个降低或加剧计算权力分配的不稳定性的因素。在只涉及精英的过渡中,明白每个人的偏好以及估算每个人的权力都较为容易些。群众运动的权力较难估算,因为运动的集体行动能力通常是不可预测的。⁴⁷ 同样,一旦群众运动卷入其中,代表这些群体的领导人能否控制他们的追随者就更难说了。通过聚焦于权力以及估算权力的难度,本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力量当作分析对象的分析框架。

对欧洲和苏联从共产主义制度的过渡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本书发现

相比那些对立双方的权力相对均衡的国家，权力高度不均衡的国家，在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方面的行动更为迅速，并且也更少产生冲突。在中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民主反对派占据权力优势，因此，他们垄断了为后共产主义政权制定民主规则的权力。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权威主义的当权者占据权力优势，因此，为他们的政体制定了专制主义规则。在以上两个极端的例子中，从共产主义制度向民主或向专制的过渡都是顺利、迅速而平和的。在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斯坦、保加利亚和摩尔多瓦，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专制者与民主派之间的权力分配都是相对均衡的，因而没有任何一方有足够的力量垄断新规则的制定。在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制度的过渡迟滞而充满冲突，有时甚至发生暴乱。自共产主义过渡开始之后的十年，很多这类国家一直没有建立起新的巩固的政治体系，而是陷于连续改变的动荡之中。

路径依赖和重新平衡

俄罗斯经历了一个强制性的过渡。俄罗斯的精英们试图将竞争规则强加于彼此，而不是同意让一套共同的政治规则来引导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过渡。在俄罗斯第二共和国，叶利钦明显垄断了制定新的游戏规则的权利。

这样的制度安排也许是不公正的，但并非必然是不稳定的。它们也能代表社会现状的进步，即使它们使得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有。那些强行制定规则的人明显从新的制度秩序中获得了好处，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强行制定这些规则了。然而，那些对界定规则只能施加较小影响的人也能从中获益。尽管弱势的行为体意识到另外一种制度安排或许对自身更有利，但他们仍然能遵循这些规则，因为较之以前，他们在新的规则下仍然能够过相对较好的生活。新规则提供了一个焦点，围绕它，不同的行为体都能平等获得这一系列基本收益，而这些收益在新规则缺失时是无法获得的。⁴⁸一些规则，甚至是“糟糕”的规则，比根本没有规则要好。当反

抗或抵制所要付出的代价大于服从所要付出的代价时,弱势行为体也同意遵循这些强行制定的制度。弱势行为体要比那些垄断规则制定权的人获益要少(无论如何衡量),但是与以前的社会状况相比,他们仍然从新的秩序中有所收获。例如,美国的反联邦主义者(1787年后)和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1993年后)当时都反对接受正在讨论中的宪法。不过,他们都勉强接受了新规则,因为在新的宪法规则下,他们都处境更好,即使这并非他们最想要的结果。重要的是,选择不服从将使他们处境更糟。这些形势意味着,一种较为适宜的制度安排是可能的,但最强势的行为体阻止社会获得这一制度。⁴⁹

然而,强行制定的制度几乎难以产生自由民主的结果。过渡路径或模式影响到最终出现的制度安排或政权的类型。⁵⁰ 冲突的、非协商性的过渡,其结果更趋向于产生较少自由的制度,反之,合作的、协商性的过渡更易产生较为自由的制度安排。由相对平衡的对立双方来完成的协议性过渡最容易产生更自由民主的制度,这一制度将协约过程的所有(或大多数)参与方的政治利益最大化。⁵¹ 非契约性的或非协议性的过渡更趋向于产生较少自由的制度,也就是说,扭曲利益分配的制度有利于规则的垄断者。并且,非契约性的制度一旦出现,强制性的痕迹将一直持续整个过渡时期。

有人认为,在冲突中产生的制度可能随着起初创造这些制度的权力平衡的变化而随时发生变化。就像普沃斯基所警告的那样,“批准暂时利益的制度和产生这些制度的条件一样持久”⁵²。如果力量的平衡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可以料想现存的制度也将随之改变。然而,由力量的对抗或冲突造就的制度,并非注定永远是不稳定的,也并非注定只是起初产生这些制度的权力平衡的结果。在你死我活的结局或过渡时刻结束之后,有几种通往新的稳定秩序的路径可以利用。首先或最为明显的是,先前反复说到的赢者和输者会走到一起并重新协商一系列大家都同意的规则。对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产生根本改变的外来冲击为重新协议提供了契机。然而,这种路径不太可能在冲突的余波中到来。⁵³ 在暴力冲突刚刚平定之时,失败方一般不急于马上和获胜方协商。

其次,失败方经过先前的冲突其力量可能如此单薄,以致根本不用再

考虑他们的利益。换句话说，一些以往举足轻重的行为体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使在力量被削弱的一系列重要的行为体之间有可能产生新的共识。这种新的重组格局经常在国内制度革命之后出现，或在关于国际制度的全方位战争之后出现。1789年之后的法国革命者在设计新政治制度时就不用担心君主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同盟国在设计新的国际制度时也没有过多考虑纳粹分子的利益。

第三，先前冲突中的获胜方可强行制定新规则，其中包括一些约束其自身行为的规则。这必然让获胜方有意识地将他们自己未来的行动与新规则结合起来以增进其自身的可信度。⁵⁴ 推行分权或举行定期的选举不失为民主制度能起制约作用的两个普遍办法。将未来行动与新规则结合起来是促使其他行为体合作的方法；它意味着获胜方很强大，足以主导规则制定过程，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绝对垄断新秩序。对获胜方的约束也可产生于错误估算。在不确定的情形下，即使那些垄断新规则的人设计出的制度安排也会在事后反过来约束其行为，而这在当时设计制度的时候并没有预想到。

最后，为了加强冲突期之后的合作，获胜方会对失败方作出单方面的补偿。他们可以通过提供经济贿赂、财产、新工作或外围管辖权的方法，以促使他们顺从新的制度秩序。

正如随后第三部分所讨论的，俄罗斯1993年秋天产生的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具有这些过程的全部元素。1993年10月后，获胜方与失败方之间并没有出现协商。倒是叶利钦一帮人垄断了新规则。重要行为体的数目减少了，因为最激进的行为体在抵制叶利钦签署的解散人民代表大会的命令后，就不再是强有力的行为体，随后他们在1993年的10月3日至4日的冲突中被击败了。然而，叶利钦也没有强大到足以进行独裁统治。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对自身行为具有某种限制的宪法安排，与此同时促使反对派参与进来。

许多人相信等到下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爆发时，这些新的规则也就到头了。一直到1996年的总统选举，选举的过程几乎偏离正轨。另外，随着1998年8月的经济崩溃，制宪过程也几近废掉。但这些规则历经数次危机和数次选举周期仍然能够幸存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旦所有的主要行为体认可了政治体系中的这一系列新规则,重新平衡就为路径依赖所增强。路径依赖假设,今天发生的变化,哪怕是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对明天发生的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旦特定的制度设计出现,并且行为体也开始在新的制度安排下投入资源,那么,改变既存制度现状的代价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⁵⁵不管是哪些行为体或哪种权力分配状况影响了这些制度的草创,游戏规则在将来都更难改变。既然退出或违背规则的代价在增大,那么承认既存的制度安排能获得的利益也在增长。⁵⁶此外,新的游戏规则存在的时间越长,置身新制度安排之局外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重要群体或大多数行为体协调所达成的一系列规则迫使其他一些行为体加入新的制度秩序,这是因为能有效协调另外的一系列规则的行为体的数目在减少。⁵⁷当规则变成常规而各行为体也在调整自身的行为来适应它们,规则就自然地对结果产生影响,而不再仅仅反映最初产生它们的权力分配。然而,路径依赖也可能有利于非自由的制度。

正是在制度瓦解或发生危机时期,最初决定产生持久的路径依赖影响的可能性最大机遇出现了。⁵⁸如果没有几百年事后认识的积累,我们又怎么知道哪一种渐进决策具有持久的影响,哪一种又没有呢?路径依赖是一个不可靠的概念。它通常等同于历史。争论所谓的“历史问题”——是指历史影响现在——显然既无聊又会陷入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误。的确,过去的事件影响目前的结果,但并非所有过去的事件都影响目前的结果。如果历史一直都很重要,那么也就永远不会有任何变化。指导本书对路径依赖进行分析性探究的前提是,那些促使对一系列新制度最初默从的特定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但是制度本身并不必然同步发生变化。换句话说,那些制度创制者的偏好或权力分配可能发生变化,但制度本身并不必然发生相应的同步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制度的设计者的最初意向与制度的持续性的关联已经逐步减弱,特别是如果原初的制度设计者一起告别政界的话。⁵⁹在最低程度上讲,制度是刚性的,较之原初的偏好和权力,它的变化要来得慢。遵循或投入于一套制度的行动扩大了制度的持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的延续能重新调整那些利用这些制度的行为体的偏好和权力。随着制度限定的行为方式转

化为态度的改变，制度也变得更为牢固。

不过，也有一些制度安排并不产生这种重新调整利益与权力的作用，使得制度安排对变化很敏感。事先就预计制度设计的健全牢固程度难倒了政治科学家们。⁶⁰ 这些新规则必须存在多久才能对失败产生免疫力？或者进一步明确地回到本书的研究对象上来，民主制度必须存在多久才能成为永久性的制度？学者们根据经验观察提出的“两次权力移交”规则（“two turnover” rule）——即高层统治精英必须通过一个选举程序更换两次——是制度巩固的良好指标。⁶¹ 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制度如果能幸存二十年就极有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然而，这些套话对预言制度瓦解没什么理论指导意义。

本书不是选取一个时间长度作为（制度）巩固的指标，而是更为谨慎地辨别可以用哪些监测变量来预测制度持续性或制度崩溃。如果争议的变迁议程的范围又开始变宽，那么制度崩溃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在俄罗斯鲜有人提倡恢复苏联或回到计划经济，这一事实表明未来不太可能扩展旧的争议议程中的重要部分。有关政体的争论仍然存在。然而，作为对民主制度的特别挑战而言，重要的是，组织政权的可选模式必须在挑战既存制度之前由一个主要行为体进行明确有力的表述。⁶² 这种可选模式的观念成为那些对社会现状已经不抱幻想的人的聚焦点。没有聚焦点，各种行为体就会发现无论不满程度有多高，现存的制度仍然是合乎时宜的。制度瓦解的第二个因素是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急剧改变。这些权力转移往往发生在经济危机期间，或在战争之后，或“克里斯玛”领导人或奠基人逝世之后出现。此时，新制度的复原力将首次受到检验。这样的权力转移对制度瓦解而言是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伴之以对可选制度构架的清晰表述。

有关路径依赖的讨论可以总结为另一个假设：一旦各行为体已经默认了一个既定的制度设计，改变既存制度构架的代价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都有这一闭锁过程（lock-in process）。一个拖拖拉拉的、冲突不断的过渡，其部分民主的遗产在过渡结束后仍然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方法论的考虑

本研究尽力吸收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见,将苏联和俄罗斯从1985年到1996年制度变迁的单一的历史现象按时期划分为三个制度变化的案例。两个案例——从1985年到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和从1991年到1993年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被用作制度设计失败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改变政治游戏规则企图在所有关键行为体之间都没能达成共识,反而加剧了矛盾并最终导致武装冲突。相反,第三个制度变迁的案例——1993年之后出现的俄罗斯第二共和国——就成功地推出了一系列为所有主要政治玩家所接受的更为持久的政治规则。差别方法(method of difference)用于分解一组自变量中的变化值。⁶³特别是,将这三个案例予以比较后显示,第三个案例较之前两个案例在变迁议程的范围上要小,权力的分配方面也更为清晰。

很明显,这种分期法是人为的,是刻意将一个单一的政权转型案例根据时间的先后作为三个制度变迁的案例来研究。⁶⁴这些案例或研究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恰恰相反,戈尔巴乔夫时期所做的决定与叶利钦时代早期所做的决定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察看后共产主义的发展轨迹来检讨苏联的终结,或以苏联的崩溃来开始研究,则不能公正地反映历史的发展源流。人们也可以轻易地把本课题,改写为探究单个复杂案例的过程回溯方法。⁶⁵

另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就是如何衡量导致不确定性的主要因果变数。变迁议程的范围和权力平衡同时发生变化,这使得很难辨别到底是哪一种变量导致了变迁的结果。然而,这些方法论上的局限并不足以成为放弃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的理由。在意识到这些研究设计的局限性的同时,本书的分析阐释皆为这样一种信念所支撑,即理解苏联和俄罗斯在这一重大历史时期发生的旧制度的崩溃和新制度的出现是一个在理论上值得密切关注的极为重要的“单一数据点”(single data

point)。⁶⁶同时，有意的比较分析贯穿全书，既有对三个制度设计的明确比较，也有苏联—俄罗斯案例与其他一些在革命时期经历制度变迁的国家的含蓄对比。

着手研究前有必要提及概念上的混乱。本书着重于俄罗斯领土上的制度变迁研究。但是，从1985年到1991年，苏联的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俄罗斯联邦的制度）塑造了俄罗斯的政治。这一事实对本书的第一部分形成了表述上的挑战。在第一部分，戈尔巴乔夫为整个苏联发起的制度改革被世人议论，但议论的焦点仅仅集中于这些改革在俄罗斯产生的结果。

本书梗概

本书的四个部分从不同角度来探索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年）、俄罗斯第一共和国（1991—1993年）、俄罗斯第二共和国（1993年至今）的制度设计尝试及其结果。前三部分以讨论主要行为体的制度设计偏好这一章开始。我们不能假定关键行为体对特定的变迁议程的偏好，而必须全凭经验和观察来发现。本书并不寻求解释行为体对俄罗斯政治或经济改革的偏好的起源，⁶⁷但是我们必须辨别这些偏好以观察它们对政治制度变迁产生的因果效应。前三部分中每一部分的第一章主要阐述偏好。各部分的其他章节则分析这些偏好转化为行动所导致的后果。

第一部分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制度变迁的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制度设计未能成功地制定一套为所有主要的政治行为体所接受的新规则。第二章概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要素和后果，特别关注于戈尔巴乔夫设想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第三章解释了这些制度改革的后果。它回溯了苏联和俄罗斯受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而形成新的政治行为体的演化过程，而后记录了在苏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年中苏联政权与这些新的政治行为体之间战略性的相互作用。这一

章解释了为什么协商性过渡的企图未能成功,反而在苏联政权与俄罗斯反对派运动之间出现极化和矛盾——一种最终在1991年8月突然导致政变的僵局状态。

第二部分的内容涵盖了从1991年8月到1993年10月这段通常被称为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时期。这部分考察了相同的制度设计模式:从上层开始,并最终在极化、矛盾和改革的失败中结束。本部分的结构与第一部分的结构相似。第四章重构了叶利钦对制度设计的思想和决定,特别关注他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思想。第五章记录了这些设计决定的后果。本章解释了为什么叶利钦的政治改革(或改革不力)导致了政治行为体之间的极化、矛盾,直至1993年秋天发生多年来的第二次暴乱。

第三部分写的是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最初几年。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的政治游戏规则在这一时期较前两个时期变得更为制度化。第六章概述了叶利钦制度设计的新思想,包括他重建俄罗斯国家制度的计划,并将其写入他的新宪法草案。第七章和第八章讨论这一时期紧要关头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在1993年秋天期间,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对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草拟的制度设计有时起到强化作用,有时则形成挑战。第七章写的是俄罗斯新体制头两年初生的立宪主义,特别聚焦于俄罗斯的新议会(国家杜马)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上。第八章讨论了在1993年议会选举和全民公决、1995年议会选举以及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初生的选举主义。整个第三部分的分析着重于那些导致这一时期的制度较前两个时期看上去更为稳定的变量。

第四部分包含结论性的两章。第九章讨论了俄罗斯因拖延的、对抗的、强制性过渡所带来的非自由制度的遗产。这一章认为,过渡过程本身引起了俄罗斯民主秩序的许多不足。这些过渡的创伤包括强权的总统、微弱的政党体系、不发达的公民社会以及独立媒体、法治、国家能力和中央—地区关系的衰败。除了这些制度上的弱点外,精英与整个社会对俄罗斯民主的复杂态度也得到了检验。

本书最后一章重新考虑了贯穿全书分析的有关政权变迁的理论假设。在第一和第二部分讨论到的前两个有关制度改革的案例中,对新规

则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未能经由协商达成契约,各行为体置身既存的游戏规则之外追逐他们自己的利益。对立的、极化的集团诉求零和博弈战略直至一方胜出,因为争议的变迁议程范围宽泛,而相对立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又不明显。在第三部分讨论的第三个案例中,所有的主要行为体赞成由最强势的行为体强行制定一系列明确的新规则,并将之写入1993年的俄罗斯新宪法。为所有主要行为体勉强服从的局面出现了,因为:(1)行为体间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变化,而新的平衡为所有重要行为体所承认;(2)变迁议程所涉及的问题数量减少了;(3)从某种程度上讲,新规则的制定者鲍里斯·叶利钦制定了一些自我约束的机制以建构新的制度秩序。这些结论表明了对制度变迁的思考有一些修订,并在最后一章中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今天的俄罗斯,关于什么因素可能改变或破坏当前政治制度的母体,本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些结论性的推测。

注 释

1. 参见 Charles Ti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191。对于革命的概念有类似的定义,参见 Peter Amman “Revolution: A Redefini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7(1962), 36—53。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肯尼斯·谢普斯(Kenneth Shepsle)也把制度性的失败或者制度性的破坏解释为要素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形,参见 Shepsle, “Studying Institution: Some Lesson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s* 1 (1989), 141。

2. 关于对1991年、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四次作假的辩解的讨论,参见 A. A. Oobyanin and V. G. Sukhovol'sky, *Demokratiya, organichennaya fal'sifikatsiyami: Vyborny I referendumy v Rossii v 1991—1993 gg* (Moscow: Proektnaya gruppa po pravam cheloveka, 1995); Michael McFaul and Nikolai Petrove, “The Changing Function of Elections in Russian Politics,” in *Russia after Communism* ed., Anders Aslund and Martha Olcott,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 27—60; Michael McFaul and Nikolai Petrove, ed., *Politicheskii al'manakh Rossi 1989—1997* (Moscow: Moscow Carnegie Center, 1998), 319—324。对于2000年选举的其他不同的评论,可见由 Yevgeniya Borosova 在 *Moscow Times* 上撰写的特别报告,网址为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indexes/go.html>, 也可见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民主制度与人权事务部发布的报告,详见 <http://www.osce.org/odihr/election/rus00-1-final.html>。

3. 参见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7), 269。

4. 参见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vol. 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56。关于这种过渡结束的更进一步解释,也可参见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m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5. 尽管关于革命的分析家已经开始注意区分和解释这两个不同的结果,但是关于民主化的文献还是倾向于将社会及政治制度的崩溃和新的民主政体的出现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参见 Jack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和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6. 关于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区分的详细叙述,参见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s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1994): 55—69。这里关于“不完全民主”(partial democracy)的逻辑与 Joel Hellman 对资本主义的“不完全改革平衡”(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负面效应的解释相对应,见 Joel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m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50(1998): 203—234。

7. 参见 Peter Ordeshook, "The Emerging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erspective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ed. James Alt and Kenneth Sheps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

8. 关于现代化如何帮助苏联产生民主化的讨论,参见 Arthur Miller, William Reisinger, and Vicki Hesli,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Soviet Union Societies: A Future Commentary on Finifter and Mickiewicz,"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1996): 153—166; 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ed. Seweryn Bial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Francis Fukuyama, "The Modernizing Imperative: The USSR as an Ordinary Count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1993): 16—17。关于文化问题的截然相反的假设,也就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化制约着民主的产生的观点,可参见 Stephen Whi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Unio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Robert Tucker, "Sovietology and Russian History," *Post-Soviet Affairs* 8(1992): 175—196; 尤可参见 Nikolai Biryukov and Viltor Sergeev, *Russia's Road to Democracy: Parliament*,

Communis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London: Edward Elgar, 1993)。

9. 参见 Valerie Bunce and Maria Csanadi, "Uncertainty in the Transition: Post-Communism in Hungar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7(1993):241。

10. 参见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 1970): 337—364; 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47—63; John Higley and Michael Burton, "The Elite Variabl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Breakdow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989):17—32; Adam Preworski, "The Games of Transition," in *Issue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South bend,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3), 105—152; Adam Prezworks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s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关于民主化崩溃研究中以精英为中心的方法,参见 Youssef Cohen, *Radical, Reforms, and Reactionaries: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he collapse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以及 Juan Linz,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ium*, vol, 1 of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d.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entative Conclusions*; Pr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Cohen, *Radicals, Reforms, and Reactionaries*。

12. 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苏联做得最好的是 Russell Bova,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44(1991):113—138。

13. Philippe Schmitter and Terry Karl, "The Types of Democracy Emerging in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and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in *Bound to Change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d. Peter Volten (Boulder, Colo.: Weatview Press, 1992), 43。

14. 关于适用性的讨论,参见 Valerie Bunc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emocratization: The East versus the South," *Post-Soviet Affairs* 14(1998):187—211; Valerie Bunce, "Should Transitologist Be Grounded?" *Slavic Review* 54 (1995):111—127; Philippe Schmitter with Terry Karl, "The Conceptual Travels of Transitologist and Consolidologists: How Far East Should They Go?" *Slavic re-*

view 53 (1994):173—185; Roger Markwick, "A Discipline in Transition? From Sovietology to 'Transitolog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2(1996):255—276; Thomas Remington, "Regime Transition in Communist System: The Soviet Case," *Soviet Economy* 6(1990):160—190; 以及 Michael McFaul,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fining a Post-Communist Research Agenda," in *Reexami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Alexander Dallin*, ed. David Holloway and Norman Naimark(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167—196。

15. Terry Lynn Kar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8 (1991):159.

16. 可以特别参考以下文献: Terry Karl, "Dilemma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1990):1—22; Terry Lynn Karl, "Petroleum and Political Pacts: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Venezuela,"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22(1987):63—94; 以及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entative Conclusions*, Chap. 4。协定并不是成功的民主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强化了民主化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参见 Terry Lynn Kar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Democratization around the Glob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in *World Security*, ed. Michael Klare and Daniel Thoma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43—62。

17.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entative Conclusions*, 41.

18.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350—351。亦可参见 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17。

19. 强调权力分享的宪法是一种补救性措施。关于这一问题,尤可参见 Arend Lijphart,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以及 Timothy Sisk, *Power Sharing 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 Ethnic Conflicts* (Washington D. C.: U. S. Institute of Peace, 1996)。而恰当的选举顺序是全国选举应当在地区选举之前进行,这也是值得提倡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1(1992):123—140。

20.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entative Conclusions*, 63.

21. Przeworski,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63.

22. Claus Offe, "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ocial Research* 58(1991): 865—892;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 可以肯定的是,1989年之前从独裁统治的转型中也存在边界问题,这其中包括西班牙的例证。即便如此,在苏联发生的变化程度以及国界的变化,比在西班牙和早先发生的其他民主化事件要大得多。就如 Stepan 和 Linz(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西班牙案例最权威的人物)在他们重要的民主化转型研究中所写的一样,“显然地,关于此书的目的,东欧国家尤其是苏联和南斯拉夫所遇到的问题比如我们所认为的其他南欧、南美甚至中欧国家所面对的政治问题要更加浅显易懂”。参见 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29, n. 29.

24. Philip Roeder, “People and States after 1989: The Political Costs of Incomplete National Revolutions,” *Slavic Review* 58(1999); 854—882.

25. 关于波兰共识,参见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Jose Mria Maravall, and Adam Przeworski,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A Social Democratic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1。如果我们将坐标向前再推进一些的话,就会发现,在波兰,某种共有的历史和文化经历在民主化转型之前就很好地培育了这种共识。但是这些力量却是在民主化转型发生之后才显现出来的。培育共识的结构性因素并没有避免 1981 年戒严令的出现,也没有为波兰在 1989 年产生彻底的制度性变化。它只是通过社会中权力分配的程度来实现的——即正是通过 1989 年选举,这种偏好的同质性才逐渐显现出来。

26. 这种权力平衡和变迁的议程范围之间的相互缠绕关系,反映了该研究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因为权力平衡在该分析中通常被看作一个影响新政治制度出现的可能性的自变量。然而,正如本书相关章节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旦变迁的议程形成,变迁的议程和权力平衡都各自对民主化转型产生影响,正如本书相关章节中所指出的那样。

27.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entative Conclusions*, 41.

28. Russell 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29. 显然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包括由国家主导的各种程度的再分配,但是,即使是那些北欧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基于某些最基本的市场原则,而不能与指令性经济相提并论。

30.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esp. chap. 12.

31. Jon Elster, Claus Offe, and Ulrich Preuss,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32. 根据乔治·茨布里斯(George Tsebelis)的观点,“当行为体的目标变得模糊,或者当相互作用变得更加不固定和不精确的时候,理性选择的解释将不再适

用”。参见 Tsebelis, *Nested Games: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32—33。

33. Rustow,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亦可参见 Steven Fish, “Russia’s Crisis and the Crisis of Russology,” in *Reexami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esp. 158—161; Philip Roeder, “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State-Centered Approaches,” in *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 ed. Harry Eckstein, Frederic Fleron, Erick Hoffman, and William Reisinger (Lanham, Md.: Ro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201—228。

34.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87.

35. 持制度性解释的实证主义者就事先不确定性和产生高效率制度之间的积极关系达成了一种类似的意见。参见 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Buchanan, *The Reason of Ru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0; 以及 Tsebelis, *Nested Games*, 118。

36.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Market*, 80.

37. 本书早些草稿的读者赞同这个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它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着重要作用,但却很少出现在比较政治的研究中。然而,革命的确是国内政治中权力和利益而非统治或外部权威产生的成果。正如将在随后章节中谈到的那样,在苏联和俄罗斯,同时发生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司法的制度变迁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要比西欧历史上产生国与国关系的同一时刻要来得更加严重。

38. 关于此问题的详细叙述,参见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1995): 397—414。Geoffrey Blaney 在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第 26 页中进行了相似的关注。

39. 一种类似的关于国家间冲突的讨论,参见 Stephen Walt, *Revolution an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7。

40. Blaney, *Causes of War*, 246。也可参见 R. Harrison Wagner, “Peace, War,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1994): 596—597。布兰尼的方法在通过分析同一个自变量的不同价值方面,对于解释战争与和平具有理论优势。我的研究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试图通过运用同一组自变量来建构一个关于失败的和成功的民主化转型的解释。

41. 关于权力平衡和分立是一个重要的自我强化机制的论述,参见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1989): 803—832。关于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特殊意义,菲利普·罗伊德(Philip Roeder)写道:“维持一种‘平衡的共和政体’成为了民主政权存在的最重要前提。”Roeder, “Varieties of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st-Soviet Affairs* 10 (1993): 62。

42.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Chap. 9; Samuel Huntington, *Polit-*

ical Order and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266—267; Douglass North, “Five Proposi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 ed. Jack Knight and Itai Sen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18. 双方的僵局造成了久拖不决的冲突而不是和谈的一个例证就是在安哥拉, 这个国家之所以陷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战争, 是因为交战双方都没有能遵守协商的解决方案, 并且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战胜对方。

43. North, “Five Proposi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 18.

44.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37.

45. 关于次一级霸权(second-tier power)合作的动机, 参见 *ibid.*, esp. 24—25. 关于单极世界中均势的准确信息, 参见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1999): 5—41.

46. Linz,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47.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8. 关于宪法被作为协作性的工具而非社会契约的观点来自 Russell Hardin, “Why a Constitution?” in *The Federalist Paper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ed. Bernard Grofman and Donald Wittman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9), 100—120; 以及 Peter Ordeshook, “Constitutional Stability,”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1992): 137—175.

49. 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Gordon Tullock, “The Costs and Special Privilege,” in *Perspective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195—211.

50. 关于转型模式与某种民主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基本观点, 参见 Karl,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Karl and Schmitter,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以及 Przeworski,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51. 这个关于有效率的制度的明确表述来自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以及 Tsebelis, *Nested Games*。Tsebelis 特别声称: “当制度改善了(与现状相关)社会中所有(或者几乎所有)个人或者团体处境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有效率的”, (104)。

52.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88.

53. 以牙还牙是有限重复博弈的结果。参见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54. 参见 Hilton Root, “Tying the King’s Hands: 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the Royal Fiscal Policy during the Old Regime,”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 (1989): 240—258; Kenneth Shepsle, “Discretion, Institu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Government Commitment,” in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ed. Pierre Bourdieu and James Colem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245—263; and North and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55. Paul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 332—337; Brian Arthu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and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6. 参见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2000): 251—244。

57. 美国宪法被批准的因素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产生的。批准宪法的州越多,对于反对者来说就越难提出其他的替代方案。

58. 关于在制度出现过程中不断强化的平衡的讨论,可参见 Stephen Krasner,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6 (1984): 240—244。

59. 参见 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Chap. 3。

60. 参见 Shepsle, “Studying Institutions,” 142—143。

61.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266—267。

62.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54—55。

63. 这是密尔(Mill)所采取的差别方法。参见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184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64. 对于这种大量增长的评论在方法论转移上的正确性,参见 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1—222。

65. Andrew Bennett and Alexander George, “Process Tracing with Notes on Casual Mechanisms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66. 法国大革命虽然仅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但也为致力于革命研究的理论家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提供了研究的动力。而 20 世纪末期苏俄的转变也体现了另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重要性的事件。

67. 就如同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注意到的那样,“所有的解释都必须将某些东西当作是既定的:解释性的自吹自擂不得不在某处打住。要意识到目的性解释(intentional explanation)只是整个解释的一个部分,也要认识到对既定愿望和信念的解释无需目的性,从而既不排除目的性解释的需要,又不使之繁琐不堪”。Taylor, “Structure, Culture and Action in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Change,”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1989): 119。

第一篇

戈尔巴乔夫时代,1985—1991年

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的设计：改革苏联政治制度

1985年春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登上了他事业的顶峰。短短六年之后，随着他领导的党和治理的国家不复存在，他的事业落入低谷。在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以改革苏维埃国家和经济的既存制度为目标。然而，事与愿违。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最终导致了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崩溃、苏联自身的瓦解，以及戈尔巴乔夫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呢？

回过头去看看，很容易得出是历史的力量扫荡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政党与国家这么一个结论。苏共政权的经济体系效率低下，其控制信息的企图受到通信技术革新的挑战。党内官僚制度的改进不再让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感到满意。甚至拥有特权的军队也已落后于西方的技术进步。老的苏维埃政权似乎难以应对进步的力量。以后见之明看来，苏联的崩溃似乎不可避免。

但是崩溃并非不可避免，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看来肯定是如此。本书并不否认苏联制度其结构性腐败的重要性，但反对苏联的制度变迁与行为体(角色)无关的解释。结构背景影响了由个人比如戈尔巴乔夫所做出的决策。经济衰退、技术落后和现代化的压力塑造了苏联那些发起制度改革的决策者的偏好。最起码，戈尔巴乔夫在决心改革这些弊端前必须对体系内的弊端有所觉察。然而，做出开始制度变迁过程的决策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其他的苏联领导人。不同的最高领导人采取不同的决策，可能会走不同的改革道路或者根本就不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开放

了可能的领域,允许苏联社会出现其他力量,而后又明确宣布了组织联邦、政治和经济的替代性模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万众而压制个体创造力的同一个极权主义体系,也允许处于最高层的一个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苏联内部的政治制度组织把特殊的代理权集中于经过严格选择的个人决策者群体。与多元主义政体相比,苏联的政治体系不允许其他政治权力中心出现,无论它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¹苏联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它的经济体系没有为国家之外的自主经济力量提供存在的空间。骗取资源的现象发生在体制内的部长之间、地方领导人之间以及部门“乐辩士”^{*}之间,这个动态被一些人贴上了多元政治的标签。²然而,苏共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信条是如此等级森严,以至于在这些利益集团之间或者它们的代表之间几乎没有出现过公然的分裂。³在这一体系内,处于权力顶峰的少数几个人可以阻挠变迁达数十年。但是,这一体系也允许处于权力顶峰的某个人寻求对政权本质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变迁。

为此,要理解苏联制度变迁的缘起,需要仔细重构戈尔巴乔夫发起变革的动机,以及由这些动机而产生的政策。本章描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政治制度的初衷。下一章考察戈尔巴乔夫在制度变迁和重组俄罗斯政治集团以及调整他们的利益与权力方面的计划所产生的影响。这两章一起解释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苏联政治制度的思想未能导致一系列新的稳定的政治规则,反而有助于产生极化、冲突以及最终产生双重政权。

平衡的苏联体系^{**}

自 1917 年 10 月获取权力后,布尔什维克试图进行一系列能够作为

* lobbies,即游说议员。——校译者注

** 本节标题为“The Soviet System in Equilibrium”,作者论述的具体内容涉及苏联的政治制度安排、经济体系的运作等方面,因此,我们把这里的 System 译作“体系”。——校译者注

其革命议程的前锋的国家制度转型。列宁以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名义结束了临时政府脆弱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以由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支配和控制的苏维埃。最终这一政党——后重新命名为苏联共产党，或简称为 CPSU——创造了与每一个重要的国家制度相平行的管理机构。党衙（而不是某个正式的国家机构）决定了由谁来制定政策。在同样的国家制度弱化的情况下，苏维埃继续召集“被选出的”立法委员，肩负立法的任务。然而，真正的决策却是在党内做出的。国家制度要么是点缀，要么就是纯粹功能性的、只负责执行党所做出的决定。

为了管制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布尔什维克们也强加一些新的独特的制度安排。罗纳德·桑尼(Ronald Suny)说道：“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民族政治单位构成的国家，苏联是这样一个伪联邦国家，它既为了民族剔除了政治主权，又保证了它们领土特性，以及以它们自己的语言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和文化制度，并把民族干部提升到恰当的权力位置。”⁴在最高水平上，这些政治单位被称为加盟共和国——十五个以民族为基础的次级单位构成苏联。苏联领导人又把这十五个民族的加盟共和国切割为几十个自治共和国。那么，在理论上苏联类似一个国家联邦，这一历史遗产最终被证明是几十年后构成苏联瓦解的关键因素。然而，联邦结构实际上只是一个表象，它对苏联时代的决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除了把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制度以及联邦的政治单位纳入规则，共产党还创造了新的制度来组织经济。随着党加大了对价格、生产目标和分配的控制，市场被推到了经济的外围。同时，党剥夺了私有财产，这首先开始于城市的企业和住房，然后深入到农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1928年)，当布尔什维克允许独立的经济活动存在的时候，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减弱了，甚至被短暂地颠倒过来。当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建立起了对党和国家的独裁统治时，他压制了自主经济活动，而将党的影响力扩展到经济的每一个部门。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被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斯大林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制度的转型与巩固，这些制度随后统治了苏联大半个世纪。

斯大林去世之后，由于随后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改革实验并不断加大改变苏联政治制度的力度，苏联的极权主义萎缩了。但是，政治、经济

和联邦的基本组织原则——共产党指挥一切——保持不变并持续了数十年。事实上,在1985年,也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的这一年,没有征兆预示这一体系会在六年后崩溃。相反,苏联政权似乎与要求变迁的社会压力绝缘,对外界的震荡无动于衷,并受到体系内那些有能力破坏这些制度的人的支持。

1985年,苏联社会内部不存在民主运动。住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继续通过消极的抵抗行为以及策应国内偶然爆发的反抗运动——例如,在《新世界》(*Novy Mir*)主编亚历山大·塔瓦多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的葬礼上,以及歌唱家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Vladimir Vysotsky)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上来挑战苏联的独裁统治。但是,几十年来都没有有组织地、明确公开地威胁苏联政权的运动。⁵共产党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其统治期间不再用群众政治恐怖作为其治理国家的方法,但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政权仍然利用普遍存在的监视、社会渗透和政治迫害来控制反国家活动。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社会压力支配了变迁的类型和步伐,但是在戈尔巴乔夫任期的初期,社会力量甚至还没有成为政治角色。

对苏联独裁统治的外部压力是存在的,但这不是发起改革的关键所在。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采取了公开对抗策略,包括更加积极地声援苏联国内的人权活动,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在苏联的卫星国如安哥拉、柬埔寨、尼加拉瓜和阿富汗等国发起反共产主义暴动。这些压力加大了维持苏联政权的成本。但是,在1985年,这些政策对改变苏联政治秩序均未能产生直接的压力。无论是国内还是在海外,苏联政权实在是太强大了,以至于很难从外部来改变它。

同样,1985年的苏联经济也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根据统计,苏联经济(尽管不是政府)在1985年看上去比十年前要疲弱。据西方估计,其增长率持续下降已有好几年了。同样重要的是,苏联计划经济的核心一直是生产重量不重质,同时该国最好的资源中相当大的比例被专门拨给大规模的军用工业生产。经济组织系统可以大量生产出钢铁、坦克和机械工具,但它不能生产出有效率的计算机、移动电话或快餐馆。生产率正

在迅速衰退，赫鲁晓夫要在 2000 年赶超美国的誓言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似乎已成为一个空洞的威胁。

这个百病缠身的经济体系效率低下但并非岌岌不稳。许多分析家指出了苏联计划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几乎没有预言它的崩溃。相反，大多数人预测它会在很长时间里不死不活地存在下去。例如，在 1982 年中央情报局(CIA)一项苏联经济研究的结论中，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William Proxmire)得出以下结论：

本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值得强调：首先，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持续地滑坡。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苏联经济确实会继续增长。其次，经济绩效很差，存在很多违背经济效率标准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经济就失去了活力或动力。最后，尽管苏联经济的成就与其计划之间存在鸿沟，但是退一万步讲，我们认为苏联经济的崩溃只有极小的可能性。⁶

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经济，只能为国民提供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准，还要面对后工业时代日益严峻的挑战，但它并不需要激进的改革来应对。正如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绩效差的政权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幸存下来一样，苏联经济能为大多数国民提供生活物资，并仍然保持稳定。

由于构成苏联体系的政治制度的独特连接(nexus)，这一效率低下的经济体系能够得以继续。⁷苏联政府既不容忍社会利益，也不会对社会利益做出反应。数以百万的人可能会抱怨苏联的经济状况，但民众几乎没有什么渠道对苏维埃国家施加压力。同样，有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不相信苏联的政治体系具有合法性，但是，只要这些批评仅被隔离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厨房里，该体系就不会面临严重的威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协调制度的缺失，意味着是社会整体承受着增长率下降所带来的切肤之痛，而不是由那些经济管理者来承受。

在党的内部——指那些处于一定的位置并能影响变革的人当中——没什么人有偏离社会现状的动机。⁸在评估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宝座后不久的苏联帝国的国力时，亨利·罗恩(Henry Rowen)和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引用当权精英的那句“高度的内聚力”来描述该系统的“堪称典范的强大”。⁹但是，总体上效率低下的苏联体系为统治精英中的个人

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和忠诚于该体系的动机。绝缘于外部的政治压力,体系内的精英(包括苏共领导人和经济管理者)得以继续通过权力寻租进行偷窃、腐败、拿回扣,通过手中的威权中饱私囊而不必理会效率和公平问题。¹⁰官僚机构的领导、党的地方领导及私营企业之间围绕由党和国家分配的稀缺资源展开了竞争。但是,这些相互竞争的行为体的行为,并没有威胁或无意于威胁苏联体系的总体稳定。这些行为体在苏联体系所界定的制度范围内谋求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改变游戏规则。

作为外源震荡的戈尔巴乔夫

辨识苏联极权体系的衰微并非为了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变迁。结构性的矛盾、体系普遍的衰弱以及随时准备接受变迁的社会,为形成革命情势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只有处于体系顶端的行为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改变社会现状。戈尔巴乔夫的掌权是发动这样一种过渡的翻天覆地的事件。正如乔治·布勒斯劳尔(George Breslauer)所写到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国际支持上的大转型(perestroika)、公开性(glasnost)、民主化和外交政策中的‘新思维’的力量,构成了鼓励和促进变革的主要因素。的确,它们是使变革政策得以颁布、执行和维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领导层(leadership)协调着‘社会力量’与社会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¹¹。中央集权的、专制的、独裁的苏联制度体系决定了变迁的源头必须源自内部和高层。尤其是,苏共总书记是这样一个苏联制度秩序内的角色,它被授予了足以改变社会现状的权力。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回顾的,“大转型——我国的变迁过程——发端于上层。在一个极权国家不可能存在其他方式”¹²。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极权政权只能借助凭着数十年的传统和纪律发号施令的极权政党之手来摧毁。一旦总书记被选定,那么不管他说什么,你都得听他的”¹³。

戈尔巴乔夫将着手开始一定程度的改革是预料中的事。从整个苏联体系的历史来看,新的苏共总书记掌权之时也就是变革的时机成熟之时。戈尔巴乔夫掌权后出现的权力的代际更迭,强化了人们对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发生变革的期待。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执掌政权时,他几

乎比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小二十几岁，他升任为总书记象征着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的拖拖拉拉的过渡的终结，以及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走向了政治权力的舞台。在他成为总书记之前的一个政策工作报告暗示在其就任期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改革。

但是，指明戈尔巴乔夫是产生变迁的源头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他所做出的选择。我们现在转向讨论的就是这些选择。

经济改革

大多数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文献将精英为新的政治制度而斗争置于阐释的中心。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作者假设民主很快就成为所有精英的目标。对于来自旧秩序的领导人而言，默许新的民主的游戏规则可能意味着走出危机（包括经济危机）的一条出路，同时对挑战者来说，倡导民主可能为获取权力提供一系列新的规则。¹⁴然而，从任何一方面来讲，民主是被假定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差不多从定义上来讲，民主化的比较研究仅仅研究那些结果是民主的案例。

在苏联的案例中，民主化与其说是其最初的目的或目标，不如说是其寻求经济改革的一种方式。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初几年，首要的就是经济改革。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前，他就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问题比他的大多数政治局的同事们持有更多的批评意见。1982年，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波罗夫（Yuri Andropov）指定戈尔巴乔夫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内的一个关于经济的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与他未来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共事期间，戈尔巴乔夫委托了好几个学术机构——包括来自诺沃西比尔斯克（Novosibirsk）的一群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一系列的经济评估研究，这些研究描述的苏联经济前景，比苏联官方描述和西方的评估还要暗淡得多。¹⁵作为安德波罗夫的门生，戈尔巴乔夫有直接接近克格勃（苏联体系内最权威的情报机构）并从中获取信息的机会，因此，他清楚苏联经济停滞的真实程度——这些信息是其

他政治局成员所无法获取的。¹⁶对苏联经济状况的真切了解激起了戈尔巴乔夫做一个改革家的雄心。

然而,1985年掌权伊始,戈尔巴乔夫着手改革的第一波,表现出了与苏联其他几次改革努力一样的特征,即都是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使现行的体系运作得更有效率。在1985年4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指出:“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改善经济状况的问题,即阻止和扭转经济建设领域中的不良倾向。”¹⁷他的第一个经济改革是“加快”(uskorenie),即“加速”经济发展。¹⁸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苏联式的想法:只要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经济就会产出更多。就像此前所有的总书记一样,戈尔巴乔夫宣称“这里的关键词(指加快)是机械制造”¹⁹(machine building)——不是消费品的生产,不是高科技,不是私营企业,不是分权化,而是一贯的斯大林主义的核心——机械制造。这一政策重新强调对经济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他在1985年6月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把“恢复秩序”、“强调纪律”和“改进生产和劳动组织”作为摆在国家面前最重要的问题。²⁰对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来说,来自上面的控制必须加强而不是放松。

在戈尔巴乔夫一些早期的讲话尤其是1984年10月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一些更为激进的暗示。一些早期的政策变化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例如,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经济核算”(khozraschet)*的思想,该政策迫使苏联企业自行平衡账目,但在理论上,也为它们在运行中提供更多的自主性。“经济核算”甚至也极为符合经济领域中更强纪律性、更大责任性的哲学原则。如果企业的领导者为他们的支出与收入负责的话,他们就没有多少机会去逃避国家计划,把利润和产品挪作个人私用。加强控制与新的分权之间的张力与混乱,在戈尔巴乔夫自身的思想中是明显的。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解释的,“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perestroika)最重要的方向原则上是清楚的。我们必须沿着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方向前进”,这一战略包括“强化管理与计划中集中原则的有效性”、“明显扩大企业和

* 即英文中的 self-financing 或 self-accounting,可以译为“财政自主”或“独立核算”。——校译者注

联合大企业中经济独立与责任制的范围”，以及“积极运用较为深入的管理形式与方法”，比如财政自主。²¹

渐进改革产生了边际效果。第一次努力遭受挫败，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着手更为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被不痛不痒地贴上改革或“重建”的标签。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提倡这一概念来强调危机的严重程度。正如他在1987年的《改革》(*perestroika*)一书中所解释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去推动力。经济失败变得更加频繁。困难开始日益增多并恶化，悬而未决的问题急剧增多。我们称之为停滞的因素以及其他一些与社会主义不相符的现象开始出现于社会生活当中”²²。在公开谈及这些经济弊病时，戈尔巴乔夫总结说有必要进行激进的改革：“改革成为当务之急源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发展过程。”²³

新的政策开始跟进。在1987年6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经济管理激进调整纲要》(*The Fundamentals of Radical Restructuring of Economic Management*)和《国家企业法》(*Law on State Enterprises*)，制定的企业改革战略赋予企业领导者在制定价格、工资和生产目标方面更大的自主权。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及其政府推出《合作法》(*Law of Cooperatives*)，首次承认了私营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包括雇佣合同的签订和个体所有者的利润保留。²⁴

然而，改革还是一个混乱和模糊的概念，它要么意味着戈尔巴乔夫试图掩盖真实的激进改革议程以避免保守的反对者的耳目，要么意味着他和同僚们缺乏改革的综合蓝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戈尔巴乔夫及其政府从未清楚地表述这些经济革新的最终目标或终点。²⁵例如，尽管《合作法》将私人合约合法化，但是在雇用人数方面的严格限制也保证了私人部门无法与国有部门进行竞争。同样的含糊其辞混淆了在新的经济政策下企业领导者的特权与责任。事实上，新的合作法恶化了前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出现的代理问题，不断刺激着企业经理们隐瞒产品、将资源挪作私用并瞒报利润。²⁶在市场决定价格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从未清楚阐明其自身的立场，他对私人财产的看法直到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很模糊(如果不是对它带有敌意的话)。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混乱反映了他自己对市场改革的模糊认识。在批

评旧计划体系的实践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考虑过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言：“我们正在引导我们所有的改革与社会主义选择相一致，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来寻找所有既有问题的答案。”²⁷在戈尔巴乔夫任苏联领导人期间，他从未倡导过解散社会主义经济。正如雷日科夫所回忆的：“我们从未以偏离社会主义思想为目的。”²⁸相反，戈尔巴乔夫鼓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上，戈尔巴乔夫富有战斗性地揭露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劳动剥削和军国主义，并以宣布“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的世界。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永不回头”来结束他的演讲²⁹。正如在下一章所详细讲到的，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道路。戈尔巴乔夫通过改革寻找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在这一过程中，他既未能创造出一条使社会主义运作得更好的道路，也未能为市场经济奠定新的基础。

政治改革

有些人认为，模棱两可的改革目标大大提高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早期阶段的策略能力。³⁰虽然或许有起始的授权，但改革奇想最终把党内精英中负责经济的保守的反对势力动员起来了。改革的语言把不确定性带入到稳固的秩序中并威胁到（或者使人感觉威胁到）既存的行为方式。经过苏联政治体系内数十年的稳定期，非正式制度已经成熟，它们清楚地表明了各级党的领导人和经济管理者作为苏联的统治阶级享有的特权和担负的责任。本质上，这一“交易”（deal）相当于一个基本的交换——作为提供秩序和提供最低限度的经济产品的交换，体系内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国家官僚和经济管理者可以对法律上为国家所有的地方资产行使事实上的财产权。³¹该交易有自我执行的性质，尽管对社会整体而言意味着一个不利的处境，但对所有参与者来说则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威胁到这一交易。因此，旧体系的受益者力图保

护他们的财产权并抵制起初的各项改革。党内官员首先起来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因为扩大企业领导人的自主权就意味着削弱党内官僚对企业活动的控制权（并从中捞取贿赂的权力）。国家官僚也同样将经济分权化视为失去权力。据戈尔巴乔夫估计，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监管整个苏联经济管理的一个庞大机构——的官员在采纳他的新的统计程序方面尤其磨磨蹭蹭。³²而且，并非所有的企业领导人都愿意承担随扩大企业决策自主权而来的责任和职责。习惯于计划体系保守、腐败而又效率低下的惯例——它们提供了黑色的市场收入和额外的利益，这些经济管理者只想从党和各部委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而不要同时发生的体系变革。

戈尔巴乔夫对这些抵制的第一反应与先前的苏联改革者一样：清除党内异己分子。戈尔巴乔夫善于策略性地清除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对者以巩固自身的地位，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党或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将党的领导人视作其改革的主要敌人，尽管他自身就是共产党名录（nomenklatura）的产物。³³正如阿奇·布朗（Archie Brown）所回顾的：“在苏联历史上从未有总书记在其就任不久便能成功地在党的最高组织内进行如此大的人员更换。”³⁴戈尔巴乔夫掌权还不到一年，就将党内高层领导更换了几乎一半（政治局和书记处 27 个位置被更换了 12 个）。中央委员会（党的第二权力梯次）的人事变动进行得较慢，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激起党内的反叛。毕竟，中央委员会曾在 1964 年剥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总书记变得更有耐心和忍耐力了。1988 年第十九次党代会之后，除了农业和军工综合体外，戈尔巴乔夫清洗了中央委员会内的大部分经济部门，急剧削弱了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影响力。他与共产党组织内保守派的成功斗争的突出例子，是中央委员会的 74 个委员（占总数的 24%）于 1989 年 4 月的大规模辞职。³⁵

为了实现这些人事上的大变动，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一些管理党内政治的规则。例如，他恢复了召开党代会的想法，把它作为在两届党的全国大会（Party congresses）之间通过政策变革的讨论会。1988 年 6 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党代会（自 1941 年以来的第一次大会）批准了一个文件，要求今

后的党代会更新百分之二十的中央委员。然而,改变这些规则并未改变苏联政权的基本政治制度。此时,政治制度的变迁还不是戈尔巴乔夫议程的一部分。³⁶相反,在进行这些人事变动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期望使苏联共产党成为其贯彻改革的工具。³⁷作为全国上下无处不在的管理制度,党事实上是唯一一个现存的可用于执行激进改革的组织。

据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说法:“甚至一直到1987年,都没有人提出摧毁共产党的问题,更不用说国家了。”³⁸然而,戈尔巴乔夫作为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最终在党内开始失去信任。甚至在成功更换了大部分党的高层领导人之后,戈尔巴乔夫仍然担心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共产党并不接受他所指派的改革领导者。早在1988年春,戈尔巴乔夫当时的一个最亲密的助手A.契尔年耶夫(Anatoly Chernyaev),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道:“除非从上层开始发动,否则改革不可能继续。并且只有一个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和)可能两至三个政治局委员和两至三个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渴望推动改革……所有的人都明白改革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因为他在那里,改革很快就会走向终点。”³⁹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做出决定:他不能依赖既存的党和国家制度的关系来执行他的改革议程。⁴⁰正如戈尔巴乔夫1988年在波兰国会的演讲中所解释的:“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们……一开始我并不理解改革政治体系的必要性,或者更进一步说改革政治体系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在改革的第一阶段的实验将我们带到它的面前。”⁴¹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相信中层党员扮演着后卫而不是前锋,阻碍着他的改革议程。⁴²只改变党的高层领导是不够的。

由于改革议程的模糊性,这些党内的保守势力对变迁的不确定性的反应,可能要比对任何明确的政策反应要强得多。一个界定更为清晰、可增进党内合作动机的政策,可能在苏联的各级共产党员中产生不同的反应。⁴³然而,戈尔巴乔夫却追求不同的行动方针。⁴⁴他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促使社会对党施压,一方面重振了另一个统治机构——苏维埃,借此使改革可能得以贯彻。戈尔巴乔夫基本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通过激进的政治改革,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才能取得成功。⁴⁵

从上层激励公民社会

为给国家注入新的活力并使之成为保守的党组织的砝码，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激进步骤，即他所说的激活人的因素。通过在国家内部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公共声音(public voice)和较为重要的政治角色，戈尔巴乔夫相信他能够依靠国家制度而不是党作为他自己深化改革进程的政治权力基础。来自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将与社会上的改革力量相结合以挑战旧政权中的保守利益。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

很明显，党和国家官僚机构都不欢迎这些变化。由于当时官僚仍然控制着权力的主要杠杆，因此只有两条确保改革成功的道路：让拥护变革的社会大多数对他们施加很大压力，并排除掉共产党名录中的最保守分子，诱导所有那些能进行新思考的人参与到转型中来。没有政治上的策略，在极权体系下形成的至高无上的官僚机构是永远不会交出权力的。⁴⁶

戈尔巴乔夫着手刺激产生社会压力的第一个政策叫做“公开性”。这是一个允许出版界、艺术界与科学界并最终在街头巷尾有更大的言论自由的政策。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首先放松了文学与国家出版管理局(Main Administ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State Publishing)的审查制度。随后，他任命他的自由主义盟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承担贯彻公开化的任务。雅科夫列夫担任这一新职务后，邀请了一大批新的、具有改革思想的编辑来运作非常杰出的出版物，诸如《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星火》(*Ogonek*) [维特利·科洛迪奇(Vitaly Korotich)]和《共产主义》(*Kommunist*) [伊万·弗洛罗夫(Ivan Frdov)]。在新的领导下，这些出版物开始刊登苏联以前从未出版过的描写苏联历史的故事。一些胆大的专栏作家，尤其是在《莫斯科新闻》上的专栏作家，开始讨论当前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艺术与科学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放开；原先被禁止的历史书也开始出版发行，批判社会的纪实电影开始放映，而且一些因政治原因而离国的作家的作品也开始引进。自赫鲁晓夫以来，指责某位前任的罪行这一行为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因为揭批过去的失败有助于稳固新领导人的合法地位并顺利完成权力过渡。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公开性”把这一策略向

前推进了一步,其目的不只是指责其前任个人上的失误,实际上在于动员社会来反对整个旧体系,尤其是党的一些逆行。

戈尔巴乔夫还放松了压制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严酷法律。1987年的苏共全体会议修订了关于反苏联煽动和宣传的刑法条文(第70条和190条),缩小了对叛国行为的定义。而法律上的这些变化反过来使得数以百计的政治犯得以开释。1986年底,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甚至早于这些新法律颁布之前从流亡地回国,这无疑是戈尔巴乔夫新政策的最重要的结果,因为萨哈罗夫很快成为俄罗斯正在出现的民主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其他一些不是很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重返非正式的政治生活,他们为几个新的社会组织出谋划策并担任最初的领导人,这些社会组织都组建于这一公民团体形成的早期阶段。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代表了与以往共产主义实践的决裂,同时给苏联政治注入了新的利益与刺激因素。在1988年的春天*,他甚至更进一步开放了政治过程,允许对第十九次党代会的代表进行竞争性提名。尽管这是共产党的事务,但提名过程以及电视转播第十九次党代会过程本身刺激了社会参与政治,而这在以往的苏联是从未被允许过的。然而,将党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力分离开来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决策,这标志着苏联正走上一个真实的制度变迁,变迁的内容就是该如何治理苏联。在1988年夏天第十九次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公布了他最激进、最全面的变革蓝图,包括其计划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半竞争性选举。⁴⁷ 戈尔巴乔夫想将国家从党的手里解放出来。⁴⁸ 要是党不能成为经济改革的工具,那么一个重获新生的国家或许可以成为这样的工具。创造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将使戈尔巴乔夫从党那里解放出来。一旦当选为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将不再容易受到由中央委员会做出解除其总书记一职的决议的威胁。

* 应该是1988年春天,原文中的“1998年春天”有误。——校译者注

** “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里是指与党相分离的国家。——校译者注

首创于1905年并于1917年重获新生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俄语单词),作为统治制度或作为代表制度的职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便很快中止了。尽管它们是苏联政府正式的立法机构,但这些苏维埃的作用仅仅是共产党党内决策的橡皮图章而已。戈尔巴乔夫想赋予苏维埃真实的立法权力。正如他所指出的:“我将政治改革的本质界定为实现一个历史性口号,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⁴⁹人民代表大会的设计——以及对该设计的争论——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在党与国家分权问题上的认识程度和局限,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说,也体现了其对民主的认识程度和局限。

戈尔巴乔夫不是创建一个全新的议会机构,而是选择了让现存的布尔什维克制度重新恢复活力。从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来看,摧毁苏维埃体系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相信,这一共产主义的代表形式正像西方的立法形式一样是合理合法的。苏维埃制度也是方便可行的:这一组织形式已经既体现于苏联宪法之中,在共产党官员与人民大众中也可谓已经深入人心。⁵⁰

戈尔巴乔夫的确想创建一个更为独立的国家。戈尔巴乔夫提倡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初目的,是要在苏联共产党之外建立另一个统治机构。甚至在很晚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党的领导可以继续制定政策和代表大会的立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⁵¹在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拒绝多党制的想法。⁵²这些制度创新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权威地推进经济改革的政治制度。多个政党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加强新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权。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内部并非每一个成员都赞成选举代表大会的想法。例如,尼古拉·雷日科夫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首先,因为这一机构太过不便操作而难以做出决策;其次,因为对政治改革的关注会分散对更为重要的经济改革任务的注意力。⁵³党的领导集团内的其他一些人对加强苏维埃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害怕会削弱他们由入党得来的权力。因此,戈尔巴乔夫依赖他最亲密的小顾问团而不是一个庞大的全体出席的机构来起草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新规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⁵⁴这个集团在当时绝不是代表党或者社会的利益平衡,而是代表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最自由化的顾问们的观点。苏维埃制度变迁最初并不是来自下层

社会压力的结果,而是来自上层的授意。

为促使社会参与到改革中来,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认为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过程必须自由化。1988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执行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宪法修正案,勾画了一个比苏联以往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更为自由、更加公正的选举过程。这些选举仅仅具有部分的自由和竞争性。有三分之一的席位没有向竞争性的选举开放,而保留给了各种社会组织。正如在下一章所讨论到的,一些这样的社会组织允许其组织内的竞争,但大多数却并非如此。在这一阶段,没有人希望通过准许组成其他政党来挑战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必须聚集新的更进步的力量,以打破共产党对改革的桎梏。

在如何实现更新党与维持党的微妙平衡上,使戈尔巴乔夫的制度设计者们出现了分裂。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最自由化的同僚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纳托利·契尔年耶夫,主张按单一议席的选区(single-mandate constituencies)对所有席位进行直接选举。⁵⁵长期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并且身为党代会起草委员会成员的阿纳托利·卢克亚诺夫(Anatoly Lukyanov),力主较为社团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方案,那些代表特定阶级和利益(而非以领土为基础的人口)的组织将被分配到席位。卢克亚诺夫认为这种制度比西方资产阶级的多元主义民主观念更具有代表性,也更接近社会主义原则。⁵⁶

戈尔巴乔夫做出让步,允许三分之二的席位通过直选产生,同时将另外的三分之一分配给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可通过内部程序产生代表。该方案给了苏共和苏联工会大会各一百个席位,给共青团七十五个席位。这样,那些一直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党内高层领导就确保了在该立法机构中的位置。共产党控制的社会组织诸如和平委员会和知识界(*Znanie society*),也同样分到了席位。

这些“公共”组织可以自己选择挑选代表的程序,并且一些组织的确公开了选举程序。880名登记候选人将一起竞争750个分配给社会组织的席位。⁵⁷然而,在苏共党内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在1989年1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党的领导服从于其内部的秘密投票,从312人中

选出 100 个候选人。在回忆这个决定时，戈尔巴乔夫相信把权力移交给代表大会这一民主目标，可以保证用非民主的手段来进行权力移交是正当的。根据戈尔巴乔夫的逻辑：“现在我仍然相信把 100 个人民代表大会席位正好分配给共产党选出的 100 个候选人是正确的。我们只是不想那时党的某些领导成员在选举中落选。一旦落选，这将立即使他们成为变革的反对者（公开的或秘密的），并将严重恶化局势。”⁵⁸ 在试图逐步削弱党内保守派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仍然确信有必要同时追求一种笼络策略——拉拢那些在未来几年里可能对他的改革议程产生可怕后果的人。⁵⁹

在直选中提名候选人的程序是极为严格的。共产党实际上控制了全国各级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地方的提名大会，这使党对任何一个候选人都有否决权。要获得提名基本上只有两条路——通过工会（workers' collective）或五百人的公共集会。就前者而言，共产党官员紧紧监督着企业的工会，使得反党的候选人获得提名十分困难。在后者，共产党控制了所有公共建筑物。这两个渠道都确保了党对所有提名的控制，是一种党的官员（尤其是那些农村或小城镇的官员）滥用规则的权力。⁶⁰ 这些提名程序使得局外人登记进入或参与到选举过程变得十分困难。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选举的确为苏联国内社会利益的表达提供了一条出路，虽然（这种表达）是有限的。正如在下一章所讨论到的，正是竞争的选举行动刺激了动员公民并参与到改革的过程中来。

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离

恢复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统治机构的活力需要界定代表大会的权力。在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下一章将详细讨论）期间，戈尔巴乔夫很快认识到其制度设计中的关键性弱点。因为戈尔巴乔夫周详无遗地布置公开的代表大会以确保无人反对，于是他轻易地被代表大会推选上代表大会主席和最高苏联主席的位置。然而，主席这一职位被界定的权力很小，不断要受到代表们的挑战。这个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是不确定的。

为了弥补主席职位微弱的行政权力，并使其自身从该机构日复一日的活动中解放出来，戈尔巴乔夫建议设立一个新的被合法授权的总统职

位。⁶¹在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圈内,这一制度创新引起了异议。格奥尔吉·萨哈纳扎洛夫(Georgy Shakhnazarov)反对美国式总统制的想法,认为这样一种总统职位将再度以某种方式集中政治权力,而这在苏联的历史上早已被证明是一种祸害。⁶²另一方面,费尔奥多·布尔拉茨基(Fyodor Burlatsky)和亚历山大·茨浦科(Aleksandr Tsipko)积极支持这一新职位,把它当作苏联政治制度迈向现代化和摆脱神秘的苏维埃体系的一个步骤。⁶³较为保守的顾问们支持这个新设计,但理由不同,他们相信总统职位拥有体现在总书记一职中的非凡的领导权力。政治局(仍然是最重要的决策机构)最终没有详细讨论这一新职位的权力问题就同意了这一想法。⁶⁴

一旦决定了创立这一职位,下一个主要的设计问题就涉及选总统的过程。在这一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强国家(a strong state)的支持者如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安德拉尼克·米格兰扬(Andranik Migranyan)结成了联盟。他们都相信直接选举将赋予戈尔巴乔夫更多的合法性——无须代表大会的授权——也借此而拥有更大的权力。⁶⁵然而,戈尔巴乔夫反对这一主意并且最后决定由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总统。当问及为什么,经过事后的认识,戈尔巴乔夫回应道他们“没有时间”去组织另一个选举,因为变迁议程的大问题不允许激烈的讨论,比如像构建新的行政权力这样最重要的制度变迁问题。⁶⁶宪法被修正为这样一种表述,即人民代表大会将选出第一届总统,但是下一届的总统将由人民来选举。⁶⁷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轻易地通过选举,赢得了这一新的职位。

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同样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制度变革第一次没有获得来自苏维埃议会自由主义代表的广泛支持。正如一个自由主义代表埃尔亚·萨斯拉夫斯基(Ilya Zaslavsky)当时发出的哀叹:

来自下层的打破苏联共产党独裁的努力,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的、多党制的议会体系;而来自上层的打破独裁的努力,其目的则在于以个人独裁取代一党独裁。正是思想上的这个目的使改革导致了一部最反动的法律,我甚至称之为极端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律——苏联总统权力法——是如此果决、如此唐突、如此迅捷地在

(苏维埃)议会获得通过。⁶⁸

然而在当时,伴随着苏联总统职位的设立而产生的民主无规则和制度模糊性并没有给戈尔巴乔夫带来麻烦。更准确的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政体内部逐步推行政治制度变迁,特别是设立苏联总统一职,是为了给自己政治权力以更大的自主性,并借此继续其百孔千疮的经济改革政策。

一些评论家和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包括最直言不讳的米格兰扬,甚至主张行政权力的更加集中是真正拯救经济改革的唯一出路。⁶⁹然而,戈尔巴乔夫一直没有接受米格兰扬的过渡性独裁的观念。尽管充分发展的民主化可能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目的,并且保守派绝对会阻挠走向自由民主,但是,他还是克制自己采取严重违背民主原则的举动,即使在他任期的早期完全有足够的权力这样做时也是如此。

国家边界和联邦改革

与其先行一步的经济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开创精神相比,戈尔巴乔夫从未提出一个计划,以改变莫斯科与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当局之间结构关系的规则。早在1986年12月,当哈萨克学生抗议以俄罗斯人取代哈萨克人担任苏联共产党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时,“民族问题”(当时的委婉称呼)就出现在变迁的议程当中。1988年,更严重的民族主义动员使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领土争端上发生对抗。随这些抗议而来的是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要求独立。1989年格鲁吉亚的游行示威在暴力冲突中结束,当时有二十多名抗议者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为苏联军队所杀。

在这些事件中,戈尔巴乔夫对危机做出了反应,而不是着手新的制度安排。正如盖尔·拉皮杜斯(Gail Lapidus)所总结的,“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明显未能事先预料到改革进程将不可避免地重新激起‘民族问题’,并且他们当时低估了其潜在的爆炸性”⁷⁰。甚至迟至1989年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戈尔巴乔夫还没有重建中央与各加盟共和

国之间关系的坚定计划。正如他在其回忆录中所坦言的：“在族际关系问题上，我必须承认在当时（1989年）我们仍未准备好提出一个实际的改革方案，一个应该包括从一个集权制国家向真正的联邦制国家转型的方案。”⁷¹

在理论上，戈尔巴乔夫倾向于给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权。⁷²这一倾向是他的总体目标——弱化党对其代理人*的等级结构控制，进一步松动垂直指挥链——的产物。分权也符合他将国家从党那里解放出来的想法。如果加盟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把国家责任而不是他们在党内的角色看作是他们新的权力来源的话，就像戈尔巴乔夫正在将他的政治权威从党的工作向国家职务转移一样，那么，这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就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致力于制度变迁的同盟。在他1990年3月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戈尔巴乔夫强调了扩大加盟共和国自主权的必要性。⁷³因此，各加盟共和国1990年的选举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制度改革，目的在于促使低层次政府实现由党向国家的权力转移。

1990年俄罗斯人代会选举

涉及联邦关系的唯一一个来自上层的主要行动，是宣布1990年春天举行各加盟共和国、地区、城市和特别区的苏维埃选举。在最宽泛的程度上，这些选举的召开与戈尔巴乔夫试图以党为代价扩大国家制度的权力的总体策略相一致。人们不能在全国政府这个层次上将国家从党那里解放出来，在较低层次上也同样做不到。

同时，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戈尔巴乔夫或他的同僚对这些选举的关心程度，与他们对1989年的选举同样热衷。据当时政治局成员、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常委会主席维特利·沃洛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称，关于俄罗斯选举的第一次讨论是在1989年3月21日进行的，那时党的领导人把注意力集中于苏联代表大会的选举上。⁷⁴而后，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12月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正案，允许于1990年春各共和国进行选举——这一时期议程当中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国家事务。在苏联

* 即党的地方机构。——校译者注

高层领导人的讨论中，这些选举问题仅仅为少数人所关心。为了1990年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沃洛特尼科夫被委派负责起草新的选举法。作为一个资格较老的具有工程和工业背景的政治局成员，沃洛特尼科夫自称在当时日益分化的政治局内，他既非主要的政治角色也非改革者阵营中的一分子。⁷⁵苏联领导人赋予他起草选举法的职责本身就充分表明对这些选举缺乏重视。

俄罗斯选举法设立了一个具有1068名代表的大会，从中选出一个规模小一些的最高苏维埃。但是，俄罗斯选举法与选举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规则有所不同，这一法律没有为社会组织预留席位，并且曾在1989年筛选出许多非共产党候选人的地方提名大会也被取消了。⁷⁶尽管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担心直选会疏远保守派力量，但是，这种担心在1990年要么消失了，要么被其他的担心冲淡了。相反，所有的席位在两类选区中被最高票当选制选举（first-past-the-post elections）所填满——以地域来界定的选区（168个席位）和其他的以人口来划分的选区（900个席位）。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百分之五十的选票，那么两周后将在前两名之间进行投票竞选。俄罗斯代表大会的选举与下一级苏维埃代表的投票同时进行。

提名程序依然对局外者不利。比如在1989年的选举中，企业工会初步被授予提名候选人的权力。由于企业和事业单位内部的工会实际上仍然向书记报告，共产党就可以剔除不想要的候选人。1990年国家竞选的物质限制甚至还大于1989年。不过到1990年，党不再对各机构和工厂行使霸权式控制，而且投票者的创制权规定可以在有三百人的公共大会上提名候选人，而不是1989年选举中要求的五百人。

正式来讲，政党并未参加这次竞选，因为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当时还刚刚在组建之中。规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起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是在1990年2月才被废止。俄罗斯选举法同样明确规定，候选人的入党情况不会被印在选票上。设计这一规则是为了隐瞒苏共所支持的候选人的党籍情况。正如“民主俄罗斯”运动（Democratic Russia campaign）的组织者弗拉基米尔·博科瑟（Vladimir Bokser）所回忆的，“他们非常清楚，一旦‘苏联共产党员’这一条出现于选票中的候选人名字之下，

那么,该候选人就没有机会获胜”⁷⁷。该法律同样将竞选运动的费用限制在国家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数额内。

正如在下一章所讨论到的,戈尔巴乔夫过分低估了1990年选举的重要性。他和助手赞成在国家的较低层级上进行选举,相信在各加盟共和国、州、市和地区层面选举苏维埃官员只是在逻辑上可能扩大国家的自主权力,并削弱保守的党的官僚的权力。作为一次制度改革,选举不仅从党的保守中层官员,而且还从高层党的自由主义领导人那里加强了这些苏维埃的自主权。这一自主权的扩大最终给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带来非预期的消极后果。

结 论

1985年,作为苏联无可争议的独裁者,戈尔巴乔夫着手改变苏维埃政治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化次序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不是通过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或让步来开始的,也不是为经济危机或战争所迫而采取的行动。相反,他的制度设计来自上层,是与外界压力相对绝缘的情况下草拟的。戈尔巴乔夫依赖一群顾问来草拟制度设计并讨论不同制度设计的优点,这些制度一点都没有代表党和国家不同的利益,更不用说社会整体的利益了。相反,戈尔巴乔夫从该制度设计的过程中排除了关键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各个部长、军队和党的地区领导人。甚至在关键性的决策上,如1989年的新的选举法,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也是从上层发布新的游戏规则。苏联政权变迁的原动力来自个人,而不是对社会压力所作出的直接回应。

在中央集权、独裁和与外界绝缘的情况下制定改革政治制度的决策,产生了一个明显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威权政体的转型的制度变迁逻辑。与所谓的在非共产主义的独裁政权内部着手解放的报道存在显著的差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非统治精英内部妥协派和强硬派分裂的产物。尽管和早期的猜测相反,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与政治局内的强硬派斗争就成为

了总书记。在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去世前就已经有了对戈尔巴乔夫候选人地位的共识,并全票当选为总书记。⁷⁸传统上被认为是“保守的”强力的机构,“首先包括克格勃,极力推动戈尔巴乔夫的当选”。⁷⁹此后不久,他在政治局巩固了牢不可破的统治权并开始加强自己在下一级党组织中的地位。他的进一步集权——而不是在苏联统治精英内部与强硬派的争斗——给予了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和1988年进行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的勇气和信心。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有意努力避免党内分裂和多元化,以真正的列宁主义传统,把政治权力的集中看作他用于强行推行改革议程的资源。如阿奇·布朗所指出的:“中央委员会早熟的‘民主化’将延缓或阻碍政治体系更大的民主化。只有通过运用传统的属于总书记一职的权威和总书记的真实权力,戈尔巴乔夫才能在他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尤其是在他的第三年和第四年)推行针对党组织利益的制度变迁”⁸⁰。

从1987年1月开始,戈尔巴乔夫着手推进的激进改革产生了领导集体的分裂。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引起了分裂;分裂没有引起改革。政治局内被称为戈尔巴乔夫的保守反对派的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在其回忆录中回忆到“我和一些高层政治领导成员之间的意见不合在1987年后半年开始浮出水面”,即几乎在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两年。⁸¹在苏联的案例中,因果关系的箭头指向与研究文献中关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是相反的。

苏联体系的制度建构显示了为什么变迁的原动力应有望来自内部和上层。然而,苏联的制度秩序并没有强制走向戈尔巴乔夫所追求的那种制度创新,也没有现代化的压力和结构性危机。尽管结构和制度因素制约了这些特点产生的可能性,但是,戈尔巴乔夫既非被迫创新也非被逼做出他的选择。其他一些选择,包括匈牙利的改革路径、中国模式及社会现状,都是可以采用的。那么,当时为什么他着手开始一系列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制度变迁、最终导致该体系崩溃以及其自身政治生涯终结呢?正如苏联崩溃之后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中所言,他并没有故意带来崩溃,而我们可以假定他并非有意采取违背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行动。

好几个苏联改革家谈到他们曾在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早期与其交

谈过变革政治体系的必要性问题。⁸² 戈尔巴乔夫时代最认真的学者之一阿奇·布朗,援引戈尔巴乔夫在1984年12月的讲话,对未来总书记的政治改革议程作了全面的解释,其中包括民主化、公开性和自治(self-government)的思想。⁸³ 然而,戈尔巴乔夫早期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其措辞都是一些有关“发达的民主社会主义”或“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的武断言论。⁸⁴ 戈尔巴乔夫自身的行动显示,他对改革(更不用说是解散)苏联政治制度几乎没什么倾向性。他优先考虑的是恢复苏联经济体系的活力。

与拉美和南欧大多数民主转型中出现的次序相反,苏联政治改革被摆上变迁议程是在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过程自由化,其目的在于改革而不是瓦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性和民主化是激励和重建经济的手段。当保守派抵制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计划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换人,而不是改变政治制度。然而,经济改革的失败最终迫使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寻求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变迁。在讲到促使第十九次党代会召开的因素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指出是“经济改革的明显失败”⁸⁵。其他人并未参与这一战略决策。例如,戈尔巴乔夫的总理赞成中国的改革模式——经济改革第一,政治改革第二。⁸⁶ 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一个主要的战略性错误,这使得变迁的议程扩大得太快了。事后看来,许多关于戈尔巴乔夫设计创新的分析都印证了雷日科夫的观点。⁸⁷ 战略可以讨论,这意味着其他的选择是有可能被采用的。同时追求经济改革和政治变革的思路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这一选择并非深思熟虑,也没有深入了解经济和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紧跟着仔细拟定计划或一个介绍其改革手段的明确次序。正如曾经讨论过的,他和助手们在脑海里对改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设计计划也是仓促中草拟的。正如叶戈尔·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所述的:“党的高层领导对基本的路径(新的选举法)没有争议,但是对选举制度过于迅速且激进的转型过程发生了争吵。关于选举的新法律——是至关重要的且在我们的历史上是首次引入竞争性候选人的实践——却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它在只不过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匆匆通过。”⁸⁸ 同样,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回忆道:

关于新政治制度的工作推进得很快(在第十九次党代会之后)。国家的许多政治领导人包括我自己都曾说到,没有必要仓促行事,我们应该给自己再看看的机会,并对这些问题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仓促行事还是在继续……问题是复杂的,且没有时间去讨论它们。通常是,我们在晚上公开收到一些关于修改宪法的材料,但必须准备在第二天上午11点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一个人在一个晚上能做什么?⁸⁹

正如在下一章将详细讨论到的,像雷日科夫这样起初支持经济改革的温和派也不赞成戈尔巴乔夫所发起的改革的速度、仓促性,以及政治与经济变迁的齐头并进。

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联发起的政治和经济变迁源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权力优势。只要总书记不想变迁,变迁就不会发生,因为社会组织在苏联政治体系内没有什么权力。也不是来自党内的利益集团使戈尔巴乔夫采取这一行动。如果说,政府中的其他中心权力有所作为的话,那也只是制约了而非促进了戈尔巴乔夫的行动。

然而,一旦戈尔巴乔夫打开了变迁的议程,同时进行的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动力就有其自己的并最终不为戈尔巴乔夫所控制的逻辑。正如在下一章所详细谈到的,苏联统治精英内部的强硬派和妥协派,还有社会上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最终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出现了。反对派最终宣布了一个“反霸权组织:一个可供选择的未来的集体计划”⁹⁰。这种权力转移和反对派的形成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们要转而讨论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关于制度变迁思想和改变权力平衡的变通办法是如何形成与巩固的。

注 释

1. 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7).

2. Gordon Skilling,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8(1966):435—451.

3. 认为戈尔巴乔夫早期的权威无可争议,是以作者对两个人的访谈内容为基础的。其中一位是1992年6月与维特利·沃洛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的

座谈,他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对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的访谈是在1992年6月至8月。如无特殊说明,以上访谈都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其中一个抄本保存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此后所引用的都是这个抄本的页码,而不是这个访谈的具体日期。关于戈尔巴乔夫在党的高层进一步集中权力,参见 Jerry Hough, "Gorbachev's Endgame,"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1990): 639—672; 以及 Archie Brow,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9。

4. 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1.

5. 但是,正如在第三章中讨论的那样,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在发动这些非正式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参见 Peter Reddaway, ed., *Uncensored Russia: Protest and Dissent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1972); Ludmilla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of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6. 引自 Henry Rowen, "Central Intelligence Briefing on the Soviet Economy," in Erik Hoffmann and *The Soviet Polity in the Modern Era*, ed. Robbin Laird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1984), 417。当然,美国国防计划者是根据最坏的情况做出决策的,这为像 CIA 这样的机构夸大它们的估计提供了制度性动机。

7. 对无效率的经济制度如何能持久的解释,参见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在博弈论的术语中,这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定义。关于苏联政治制度如何将这种均衡保持了数十年之久,参见 Philip Roeder,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9. Henry Rowen and Charles Wolf, "The Future of Soviet Empire," in *The Future of the Soviet Empire* ed. Henry Rowen and Charles Wolf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280.

10. Jan Winiecki, "Why Economic Reforms Fail in the Soviet System: A Property Rights-Based Approach," in *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ed. Lee Alston, Thrainin Eggertson, and Douglass No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3—91.

11. George Breslauer, "Evaluating Gorbachev as Leader," in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A Reader of Western and Soviet Views*, ed.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162.

12. Mikhail Gorbachev,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6), 195.

13. 参见作者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1995年8月的访谈。
14. Stephe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 2.
15. Philip Hanson, "Discussion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USSR: The 'Novosibirsk Paper,'"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September 1983; 收录于 Philip Hanson ed., *From Stagnation to Catastroika: Commentaries on the Soviet Economy, 1983—1991* (New York: Praeger, 1992), 55—62.
16. Christopher Andrew and Oleg Gordievsky, *KGB: The Inside 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608.
17.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27.
18. Mikhail Gorbachev, *Politicheskii, доклад Tsentral'nogo Komiteta KPSS XXVII s'ezdu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yuz* (Moscow: Polizdat, February 25, 1986).
19. Mikhail Gorbachev, "K dostizheniyu novogo Kachestvennogo sostoyaniya obshchestva," 摘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4月23日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收录于 Gorbachev, *Gody Trudnykh reshenii, 1985—1992* (Moscow: Alpha-Print, 1993), 30.
20. Mikhail Gorbachev, "Korennoi vopros ekonomicheskoi politiki partii," 摘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6月11日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 收录于 *ibid.*, 33.
21. *Ibid.*, 34.
22. Gorbachev, *Perestroika*, 18—19.
23. *Ibid.*, 17.
24. 参见雷日科夫1988年5月2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上的讲话: N. I. Ryzhkov, *O roli kooperatsii v razvitii ekonomiki strany i proekte zakona o kooperatsii v SSSR* (Moscow: Polizdat, 1988).
25. 雷日科夫证实, 1983年在书记处内部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 第一次讨论到市场的观念。Ryzhkov, interview, 123.
26. Michael McFaul, "Agency Problems in the Privatization of Large Enterprises in Russia," in *Privatization, Conversion, and Enterprise Reform in Russia* ed. Michael McFaul and Tova Perlmutt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39—55.
27. Gorbachev, *Perestroika*, 36.
28. Ryzhkov, interview, 156.
29. M. S. Gorbachev, *Oktyabr' I perestroika: Revoliutsiya prodolzhaetsya: 1917—1987* (Moscow: Polizdat, 1987), 61.

30. Brown, *Gorbachev Factor*, 123—124.

31. Vital Naishui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Cato Journal* 11(Winter 1992); esp. 498—499; Micha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47(1995): 210—243.

32. Anders Å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9), 31.

33. Valery Boldin,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148—150.

34. Brown, *Gorbachev Factor*, 109.

35. Jerry Hough, "The Politics of Successful Economic Reform," *Soviet Economy* 5 (1989):5.

36. 与雅科夫列夫的访谈。

37. Mikhail Gorbachev,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27th Party Congress*, February 26, 1986 (Moscow: Novosti Press, 1986), 87—103; A. S. Chernyaev, *Shest' let s Gorbachevem* (Moscow: Progress, 1993), 90. 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必须加强中央权威来推行经济上的分权化,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时候同样也面临类似的矛盾。参见 Miles Kahler, "Orthodoxy and Its Alternatives: Explaining Approaches to Stabilization and Adjustment," in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cy Choice: The Political of Adjustment in the Third World* ed. Joan Nel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3—62。

38. Ryzhkov, interview, 124.

39. Chernyaev, *Shest' let s Gorbachevem*, 216—217.

40. 阿纳托利·契尔年耶夫与作者在1995年6月20日的访谈。

41. 引自 Jonathan Steele, *Eternal Russia: Yelstin, Gorbachev and the Mirage of Democrac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4), 19—20。

42. Gorbachev, *Memoirs*, 282. 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6月28日在第十九次党代会上的公开讲话, in *Materialy XIX Vsesoyuznoi konferentsii KPSS: 28 iyunya-1 iyulya 1988* (Moscow: Polizdat, 1988), 17。

43. 在作者与雷日科夫的访谈过程中,这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在雷日科夫看来,戈尔巴乔夫工业经验的缺乏,加剧了他对苏联体制下的技术和精英的不信任和轻视。因此,这一集团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对就在所难免了。戈尔巴乔夫应该还有其他可选择的战略。他应该尝试与这一集团的人合作而不是疏远他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讨论到的,叶利钦针对共产党名录的战略却是更加具有协作性的。比如1992年的私有化法案,就为以往旧名录下的人的参与提供了巨大的动机。

44. Jerry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一书非常有力地提出了这个观点。

45. 乔治·沙赫纳扎洛夫参见(George Shakhnzazrov)在1995年7月10日与作者的访谈。

46. 参见 Gorbachev, *Memoirs*, 278。在沙赫纳扎洛夫和雷日科夫与作者的访谈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沙赫纳扎洛夫解释道,他们试图像中国那样推行改革,但是当他们意识到党和国家的机构(apparatchiks)并不配合他们的计划的时候,他们就被迫改变战略。

47. *Materialy XIX Vsesoyuznoi konferentsii KPSS*, 120.

48. 实际的苏联宪法修正案在1988年11月份通过。阐明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作用的第727条,可以在下面文献中找到: *Vedemosti: Verkhovnogo soveta SSSR*, no. 49(December 7, 1988), 813-861。

49. Gorbachev, *Memoirs* 293.

50. 在讨论美国宪法的起源时,威廉·里克(William Riker)针对为何先前既存的制度安排(在美国,是指联邦条款)会对新的制度设计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参见 Riker, "The Experience of Creating Institutions: The Fram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n *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 ed. Jack Knight and Itai Sen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23。

51. "Deputatskie mandaty partii," *Sovetskaya Rossiya*, March 16, 1989, 1.

52. 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费尔奥多·布尔拉茨基(Fyodor Burlatsky)与作者在1998年3月16日的访谈。

53. Ryzhkov, interview, 126.

54. 根据契尔年耶夫的回忆,这个集团包括瓦丁·梅德维捷夫(Vadim Medvedev),阿纳托利·卢克亚诺夫,伊万·弗罗洛夫(Ivan Frolov),格奥尔吉·沙赫纳扎洛夫,韦尔利·博尔金(Valery Boldin)和阿纳托利·契尔年耶夫。参见 Chernyaev, *shest' let s Gorbachevem*, 214。

55. 参见与雅科夫列夫的访谈。契尔年耶夫也支持取消社会组织的席位,认为这种行为削弱了戈尔巴乔夫作为主席的合法性。参见 Chernyaev, *shest' let s Gorbachevem*, 241。

56. 参见阿纳托利·卢克亚诺夫与作者在1993年11月2日的座谈,以及对阿纳托利·卢克亚诺夫的访谈, "Evrazets Sovetskogo tipa," *Obshchaya Gazeta*, July 13-19, 1995, 9。

57. 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他们中有778个人是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103人是苏联共青团员(某个人可能同时是预备党员和共青团员)。参见 "V Tsentral' noi izbiratel noi komissii po vyboram narodnykh deputatov SSSR," *Sovetskaya Rossiya*, February 1, 1989, 1。

58. Gorbachev, *Memoirs*, 279.

59. 费尔奥多·布尔拉茨基在回顾时认为,戈尔巴乔夫严重错过了一次利用这个清单使他保守的敌人也使他激进的敌人实现中立化的机会。费尔奥多·布尔拉茨基认为,更重要的是,如果叶利钦也被列入这个名单,那么他就得不到推进其政治生涯的公开委任。参见 Fyodor Burlatsky, *Russkie gosudari: Epokha reformatsii* (Moscow: Shark, 1996), 253。

60. 关于滥用的叙述,参见 Michael Urban, with Vyacheslav Igrunov and Sergei Mitrokhin, *The Rebirth of Politics in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5—126。

61. 苏联总统的职位以前就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职位而已。

62. 参见作者与沙赫纳扎洛夫在 1995 年 7 月 10 日的座谈。相反,他建议采纳法国制度中总统作为权力的仲裁者而不是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做法。参见 Georgy Shakhnazarov, *Tseni svobody: Reformatsiya Gorbacheva glazami ego pomoshchnika* (Moscow: Rossika Zevs, 1993), 138。

63. 参见作者与亚历山大·茨浦科在 1995 年 7 月的座谈,以及与布尔拉茨基的访谈。

64. 参见 Chernyaev, *Shest' let s Gorbachevem*, 333。

65. 米格兰扬和茨浦科在 1995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办的十年改革反思的会议上做出了这番评论。本书作者参加了那次会议。

66. 1995 年 12 月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圆桌会议上,作者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提问。也可参见 Shakhnazarov, *Tseni svobody*, 137。

67. *Izvestiya*, March 15, 1990, 7.

68. Ilya Zaslavsky, "Pressing for Democracy in the USSR," *Journal of Democracy* 1(1990):125.

69. 参见 Adranik Migranyan, "Dolgie puti k evropeiskomu domu," *Novyi Mir* 7(1989):166—184; and the contributions by Migranyan and Igor Klyamkin in *Sotsializm I demokratiya: Diskussionaya tribuna* (Moscow: Institute Ekonomiki Mirovoi Sotsialisticheskoi Sistemi, 1990)。

70. Gail Lapidus, "Gorbachev's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367. Brown, *Gorbachev Factor*, 157 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71. Gorbachev, *Memoirs*, 291.

72. 参见 Mikhail Gorbachev, "O natsional'noi politike," 摘自 1989 年 9 月 19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重印于 Gorbachev, *Gody trudnykh reshenii*, 164—165。

73. 他的演说刊印于 *Izvestiya*, March 16, 1990, 2。

74. Vitaly Voratnikov, *A bylo eto tak: Iz dnevnika chlena Politburo TCK*

KPSS (Moscow; Soviet Veteranov Knigoizdaniya SI-MAR, 1995), 253.

75. 参见对沃洛特尼科夫的访谈。

76. 所有加盟共和国中,除了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外,都取消了这些社会名单。参见 N. A. Mikhaleva and L. A. Moroza, "Reforma republikanskogo izbiratel'nogo zakonodatel'stva,"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6 (1990): 31.

77. 参见作者与弗拉基米尔·博科瑟在1995年5月的访谈记录。

78. 参见与沃洛特尼科夫的访谈。霍夫(Hough)也肯定了这次选举是毫无异议的,但是,他更加重视中央委员会而不是政治局的偏好的重要性。参见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77.

79. 参见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608.

80. 参见 Brown, *Gorbachev Factor*, 167.

81. 参见 Yegor Ligachev,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85.

82. 参见与卢克亚诺夫在1993年11月的访谈;以及作者与政治局委员瓦丁·梅德维捷夫在1997年7月的访谈。

83. 参见 Brown, *Gorbachev Factor*, 79—80.

84. M. C. Gorbachev, *Politicheskii doklad Tsentral'nogo Komiteta KPSS XX-VII s'ezdu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yuz* (Moscow: Polizdat, February 25, 1986), 67.

85. 参见 Gorbachev, *Memoirs*, 237.

86. Ryzhkov, interview, 125.

87.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Joseph Stiglitz, *Whither Reform?*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1999).

88. 参见 Ligachev,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90.

89. Ryzhkov, interview, 157.

90.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s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4—55.

第三章

苏联的终结

对苏联政治变迁的解释,在1987年之前都无需讲述不同行为体之间战略互动。就像苏联制度的秩序所规定的那样,变迁的根源也是出自一个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而在1985年之后,这个人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然而,一旦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政治竞争的规则,他就促使了新的政治行为体和组织的形成,而它们原先在治理国家和代表利益方面都没有什么作为。¹突然被卷入苏联政治的一系列战略行为体,不再局限于苏共高层的领导层。对政治行为体而言,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重构是如此新奇,以至于苏联国内外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它在塑造和影响政治结果上的重要性。²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游戏规则方面的改变也引发了党内的变化。在党的高层,改革的反对派和倡导者开始公开宣布各自的政治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层的分裂导致了党内各级的分裂。到1990年夏天召开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时,代表们讨论的是三个党纲而不是一个。

戈尔巴乔夫试图取消党的统治功能,这一努力有助于解放国家。然而,当苏联的加盟国开始从党那里获得了独立地位时,日益明显的是,是党而不是国家起着维持该体系的黏合剂的作用。随着党的权力开始衰退,该体系中的各级国家行为体一起背叛了纵向的权威: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与此同时,工厂经理将企业财产私有化,而青年组织则将国家基金转变成私人银行。在高层的权威路线变得模糊不清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天、最强的国家之一的苏联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³

社会上、党内及国家中新的行为体的大量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议程。随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数量的增加,变迁议程的范围也扩大了。最终,各种政治行为体采纳的改革偏好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衷迥然相异。一些人想全面瓦解苏联的经济政治体系。其他一些人则倡导恢复苏联体系。假如这些行为体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或者权力边缘,那么,他们的偏好就无足轻重。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赋予了这些新行为体以新的影响政治的能力。最终,这些新势力——激进的和保守的——破坏了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政治改革计划而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要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政治制度的改革计划没能成功,首先需要理解这些新的政治行为体以及他们的偏好与权力。本章追溯这些新的政治行为体的出现,尤其关注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制度变迁是如何刺激新的社会行为体、党内新的独立组织和国家新的自主行为体的形成与演化的。在探讨了那一系列形成于公开化早期的最初的非政府团体后,本章随后着重于社会动员与1989年和1990年的选举之间的相互作用。选举的制度化有利于产生一个范围更大的有争议的变迁议程,而通过这个议程,支持革命性变迁的势力和苏维埃旧制度支持者的力量之间最终极化了。

本章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当支持变迁的行为体、赞成恢复(旧体系)的行为体和那些中间派试图解决扩大了有争议的变迁议程时,他们之间的战略性互动。本章展示了一个扩大了有争议的变迁议程和在竞争的团体间不确定的权力平衡,是如何阻碍了协商产生一个新的制度秩序的过程。

新角色,新思想,新权力

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政治自由化刺激了政治组织的形成,而这些组织以前在苏联是无法被容忍的。在1987年春苏共松动了有关对反苏维埃煽动和宣传的刑法条文之后,“非正式”的政治联盟迅速冒了出来。⁴ 响应戈尔巴乔夫有关更加公开的政治对话的倡导,知识界的领导人——学术

机构的学者、记者甚至一些低级别的共产党官员——召集讨论会辩论改革的意义。这些团体的政治取向和社会背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鲍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和米哈伊尔·马柳金(Mikhail Malyutin)创立的“社会主义者创新俱乐部”(the Club of Socialists Initiative)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和准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他们致力于对苏联乃至全世界的社会问题做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⁵由奥利格·鲁姆扬茨耶夫(Oleg Rumyantsev)、安德烈·布振(Andrei Buzin)、帕维尔·梅德维捷夫(Pavel Medvedev)、安德烈·法丁(Andrei Fadin)、格里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和莫斯科的伊格尔·丘拜斯(Igor Chubais)以及列宁格勒的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和皮奥特·费利波夫(Pyotr Phillipov)领导的“改革俱乐部”(Klub Perestroika)，代表了一个更具主流性质的组织，它主要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机构的青年研究团体组成，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兴趣不大，而对苏联的政治实践更有兴趣。⁶该俱乐部的总部设在莫斯科久负盛名的中央经济结算研究院(Central Economic-Mathematical Institute)，间接受到共产党权威部门的支持，很快地公开政治化了。⁷从这帮人开始，许多自由团体和雏形政党(proto-party)冒了出来，⁸诸如，公民尊严(*Grazhdanskoe Dostoinstvo*)、莫斯科人民阵线(Moscow Popular Front)、宪政民主党(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the Cadets)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

创建于1988年的“莫斯科论坛”(Moscow Tribune)，代表了另一类出现于改革初期的公民团体——由负有声望的知识界成员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苏共党员。这些成员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如尤里·阿法纳斯耶夫(Yuri Afanasiev)、安德烈·萨哈罗夫、盖夫里尔·波波夫(Gavril Popov)、列奥尼德·巴特金(Leonid Batkin)、加林娜·萨塔罗瓦多娃(Galina Starovoitova)和塔蒂亚娜·沙斯拉夫斯卡娅(Tatyana Zaslavskaya)。“莫斯科论坛”成员大都持自由政治观，且起初都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所渴望的那种社会支持。一些职业性协会——包括最有戏剧性意义的“电影摄影家联合会”——也赞成内部的民主化。这些争取民主化的斗争通过成功地挑战

党的权威,已经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影响。

其他团体选择了更具有问题特色的目标和形象。例如在1987年,来自好几个非正式协会的一群青年活动者创立了纪念社(Memorial society),这是一个为纪念受斯大林迫害的人而成立的组织。⁹1988年,像尤里·阿法纳斯耶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这样的杰出人物开始积极参与(并最终接管了)这类组织。此后不久,纪念社的分支机构在俄罗斯的各大城市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好几个主要城市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人权组织以及保护环境和反核武器的社团也在整个俄罗斯冒了出来。¹⁰

作为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的结果而产生的另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是支持改革的新闻记者和报纸。因为电视仍然为党所严格控制,报纸和杂志成为媒体中最早传播自由观念的工具。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于1986年指定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为《莫斯科新闻》的新主编之后,该周报开始对过去的苏联共产党弊政展开最直率的批评,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予最大力的支持。相似的,在维特利·科洛迪奇(Vitaly Korotich)领导下的《星火》杂志鼓励批判思维。与此同时,好几个非正式组织也开始出版他们自己的独立报纸。尽管这些报纸较之《莫斯科新闻》和《星火》的发行量要小,但是它们表达的思想却激进得多,这迫使那些主流媒体的自由派记者写作时更加大胆。这些报纸也对戈尔巴乔夫的新闻审查制度形成了挑战。在1987年,“民主联盟”的报纸《自由之声》(Svobodnoe Slovo)被认为是非法的地下出版物。但到1988年,它就自由发行了。

在这段改革的早期岁月,支持改革的团体和评论家们并未试图对诸如社会主义甚或一党制国家这类基本概念发起挑战。一些人能够自我约束是因为他们仍然信仰社会主义。另一些人通过自我审查以支持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走得太远太快可能阻碍他的改革。¹¹例如,社会主义者社会俱乐部联盟(Federation of the Socialist Social Clubs)的纲领指出:“重建是革命进程的开端,是确立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实质所在。”¹²对这些团体来说,有待解决的问题在于苏共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不足,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本身。为解决这一状况,共产党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净化,不得不改变路线,而不是不得不毁灭。

与各种支持改革的俱乐部同时存在的第二股政治潮流,同时也是更为激进的政治潮流,则以1987年和1988年结束流亡生涯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中心。起初,这些组织重谈人权、真理、道德等持不同政见者的传统主题¹³。但是,随着民主联盟在1988年的成立,这部分俄罗斯非正式运动的成员很快不再以改进社会主义为己任,不再以这一主题的讨论为方式。1988年5月,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宣布他们的组织成为政党,这也是七十年来苏共的第一个反对党。

作为自由派、社会民主派、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联盟,民主联盟之所以形成,是基于两个对1988年的苏联来说极端激进的观念:破除对列宁主义崇拜以及建立多党民主制。¹⁴民主联盟并未试图帮助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上获取成功,更确切地说,它倡导推翻整个苏联体制。为了将这些观念引入俄罗斯的政治话语中,民主联盟发起了非法的民众游行示威。他们于1988年8月21日在普希金广场为纪念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20周年而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很快被数百个克格勃驱散,民主联盟的近百个积极分子被逮捕。民主联盟并未因此灰心,他们随后于1988年9月组织非法游行以纪念“红色恐怖”的发起日(1918年9月5日),于1988年10月举行游行庆祝“国际人权日”,以及于1989年4月举行游行抗议同月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发生的针对反对者的屠杀。¹⁵

由于民主联盟在意识形态和方法策略两个方面都超越了改革的范围,因而它为那些仍然希望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回避。但是,该组织对苏联政权的公然藐视吸引了其他非正式团体的注意力。最终,主流也因为民主联盟而改变。正如俄罗斯三个有名的民意调查人员所得出的结论:

直到1988年末,“多党制”这个术语还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称谓。然而,在整个1989年的选举运动过程中,多党制作为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观念开始更宽容地被接受。这一术语开始出现在一些最激进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中。到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1989年6月闭幕时,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保持一党制度。¹⁶

除支持改革的团体和反苏联的“民主联盟”外,第三股政治潮流——

复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自由化的产物出现了。起初,民族主义者团体是在爱书社团(Book Lovers' Society)和历史文献协会(Historical-Literary Association)等诸如此类的传统协会内部形成的。后来这些团体组织了准独立的文化的、宗教的和历史的保护协会,致力于恢复革命前的俄罗斯传统。尽管一些这样的团体继续青睐于来自党内的默默支持,但是,民族主义组织看起来与民主联盟内的自由派对手一样激进和反共。¹⁷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杜米托里·瓦西列夫(Dmitry Vasiliev)领导的“国家爱国者阵线”(Pamyat')的一个分支,于1987年5月组织了最早的政治示威之一,这比“民主人士”走上街头早了整整一年。¹⁸从相当温和的“祖国”(Otechestvo)到极其强烈的反犹的民族爱国阵线(National Patriotic Front),数十个派别和俱乐部在整个俄罗斯联邦以及住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中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¹⁹

试图保存苏联旧制度的社会组织比倡导变迁的其他组织建立得要晚很多。并且,很多这类社会动员是由共产党内部的领导人来组织和指导的。然而,将戈尔巴乔夫早期自由化过程中所有的社会活动,归结为产生变迁的压力是不准确的。一些团体想维持现状并利用公开化政策提供的机会阐发其保守的立场。保守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第一个主要宣言出现于1988年的3月13日,是以来自列宁格勒的学校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a)的读者来信形式在《苏维埃俄罗斯》(Sovetskaya Rossiya)发表的,其标题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这封信向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发出战斗呼吁;据称这封信是在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利加乔夫鼓励下及其工作班子的协助下写成的,它号召结束戈尔巴乔夫激进的、破坏稳定的改革政策。它的发表标志着来自苏共内部的保守派开始在政治上公开藐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这种抵制转化成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新的组织。

第十九次党代会和大众阵线的产生

1988年6月,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前几个星期,尼娜·安德烈耶娃公开信的发表,巩固了来自上层的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改革者之间以及来自下层的倾向于改革的非正式联盟之间短暂的联盟。戈尔

巴乔夫本来希望这样一种同盟是其制度改革的结果。在过渡的这一阶段,他的计划还是行得通的。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甚至从逻辑上来讲,在自由主义的共青团和共产党地方机构的支持下,各种非正式协会组织了一周一次的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的议题。为确保戈尔巴乔夫的一整套改革能在党代会上通过,这些非正式组织发起了一个促使党代会增加自由派代表的请愿。最后,为了在党代会期间影响事件的结果,这些团体于1988年的5月和6月,在普希金广场发起了公共游行。这场试图对党的事件产生影响的游行,其公众参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党代会本身对俄罗斯新生的民主运动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回报。使大多数人失望的是,尤里·阿法纳斯耶夫——党代会上非正式运动的非官方代表的代理人——从未公开提出过他们对会议的建议。然而,党代会却间接地为俄罗斯的民主反对派的出现带来了好几个重要的结果。首先,从内部影响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企图,这证明了在一党专政的体制内这种努力多数只是在做无用功。其次,在党代会上,前任政治局候补委员鲍里斯·叶利钦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利加乔夫之间的激烈争论重起了叶利钦的政治生涯,这次他是作为一个激进的改革者而出现的。²⁰ 尽管许多非正式运动的领导人还对叶利钦的民主理念有所怀疑*,但是其他一些领导人却看起来同情这位前政治局成员,认为他是一个可能的领导人和同盟者。第三,公众通过电视播放现场对党代会的密切监督,也有助于使苏联社会进一步政治化。正如非正式领导人鲍里斯·卡加里茨基(Boris Kagarlitsky)所反思的那样,“大会的巨大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公众获得了一个直接的机会来观察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碰撞,还能够了解到一个政治领导人与另一个政治领导人之间观点的不同之处。简言之,党代会提升了大众的政治能力”²¹。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苏共十九大期间的非正式团体的政治活动有助于巩固全俄罗斯各大主要城市的大众阵线。仿效爱沙尼亚人民阵线而形成的这些阵线表明,在国家和政党之外形成新的政治力量方面迈开了巨大的一

* 在原文中,这些非正式组织的领导人表示怀疑的是叶利钦的“democratic credentials”,在此我们译为“民主理念”。——校译者注

步。²²尽管在列宁格勒、雅罗斯拉夫、斯塔夫罗波尔及哈巴罗夫斯克也组织了强大的人民阵线,但是,莫斯科人民阵线仍然是这些新的联盟中最著名的一个。

开始,莫斯科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这些人民阵线仍然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原则。例如,经过辩论,莫斯科人民阵线在其首次的组织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决定。²³莫斯科人民阵线重新打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土地属于农民”等诸如此类的布尔什维克的标语,明显是故意让苏共国家当局难堪,但是该阵线的章程仍然列出“尊重理想、和平、自由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其基本的关注点。²⁴与其说莫斯科人民阵线对改革的过程发起了挑战,毋宁说它依然支持改革,但把“改革”模糊地定义为是在体制范围内自上而下进行适当的变革。然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

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为苏联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下一个主要的催化剂。像计划中的那样,这些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为戈尔巴乔夫排除党内保守派异己,并为党内增加自由派的力量助一臂之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选举也刺激了来自党外的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挑战派势力的发展,以及党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保守反对派的发展壮大。

无党派的团体和候选人参与选举是困难的。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设计的人代会为所谓的社会组织分配了750个席位。这些社会组织中仅有一小部分允许有内部竞争。在单一议席选区,繁琐的选举程序还要经好几道可以被否决的门槛,而事实上这几道门槛都为共产党所控制,这都使得“民主的”挑战者——指系统之外的候选人——获得提名十分困难。获得提名后,地区选举委员会有权取消任何候选人的资格。第一轮共有7558人被提名,但是仅有2895个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来竞选1500个席位²⁵。这些候选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为苏共党员

或其候选成员。

尽管有这些障碍,但大多数非正式组织还是把选举看作是一次机会,而不是闹剧。在上面提到的非正式组织中,只有民主联盟选择了不参加选举。数以百计的竞选团体一时间在整个国家纷纷冒了出来,支持所有政治主张的候选人。复杂的提名程序——要求候选人参加很多公共会议——刺激了社会动员²⁶。在选季的初期,不同选区的单个投票者联盟之间几乎不存在协调或沟通。全国性组织的缺席也意味着单个候选人的意识形态倾向还是模糊的或变化不定的。确实将民主的挑战者们团结在一起的主题,是对党国(party-state)机构的批判²⁷。在因对统治精英的事件挖掘得太深而被戈尔巴乔夫解职后,特尔曼·季德利安(Tel'man Gdlyan)和尼古拉·伊万诺夫(Nikolai Ivanov)这两个国家检察官将反腐败的主题大众化了。叶利钦将这一讲台继续了下去,他严厉指责统治精英的特权和额外利益²⁸。其他稍温和些的候选人则通过他们对执政党当局的反对程度使自己与苏共候选人区别开来。在一些大城市,来自学术机构的候选人也在更开放自由的讲台上继续这一主题。

在选举运动期间,投票团体之间的协调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进展,包括莫斯科人民阵线自由派成员与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选民团体之间的合作。在1989年选举的早些时候,莫斯科人民阵线支持它的两个领导人米哈伊尔·马尔尤金(Mikhail Maljutin)和谢尔盖·斯坦科维奇(Sergei Stankevich)。阵线领导人也与莫斯科其他选区的大多数进步的候选人一起工作,从而帮助在叶利钦和季德利安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马尔尤金没能进入选举名单,但斯坦科维奇则进展顺利,最终从莫斯科的切勒穆西金斯克(Cheremushkinskii)地区赢得了一个席位。斯坦科维奇的获胜部分是因为他成功地沾了鲍里斯·叶利钦的光。在斯坦科维奇进行竞选的时候,叶利钦也正在竞争莫斯科的全国性地方选区(national territorial district)代表——这是一个包含斯坦科维奇选区的俄罗斯最大的选区。斯坦科维奇感到下台的莫斯科共产党市委书记在他的地区有很旺的人气,于是就向叶利钦发了一个电报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而后,斯坦科维奇的竞选班子又把这份电报发放给整个选区,以此把默默无闻的斯坦科维奇和赫赫有名的叶利钦连在一起。²⁹这

导致了切勒穆西金斯克地区的投票者误以为斯坦科维奇和叶利钦是关系密切的政治同盟,尽管他们从未谋面。其他九个默默无闻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候选人也签发了这个电报。此后不久,两个竞选班子的管理者开始了协调行动。

两个候选人继续进行竞争性演讲,但是支持叶利钦和斯坦科维奇的竞选班子出自不同的背景。斯坦科维奇的支持者来自莫斯科人民阵线,他们都是“非正式”运动中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自由主义观念的活动家,与共产党几乎没打过什么交道。而另一方却是叶利钦的党内盟友和民粹分子组成的混合体,以及来自科学界和军工企业界支持叶利钦的草根领导人。在这一阶段,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上的黏合剂把两个竞选班子联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在反对党国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想法。对反体制的势力来说,反对派这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具有核心地位,而且构成了叶利钦和民主运动之间联盟的基础,这种情况一直到苏联共产党下台为止。然而,反对派的这种反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只是把诸如叶利钦和因1989年选举而产生的莫斯科人民阵线的活动家这样的不同行为体团结在一起而已。由戈尔巴乔夫推动的规则变革,正在催生着新的政治行为体以及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盟。

与为选举建立游戏规则而投入巨大的注意力这种情况相反,权位较高的苏共领导人在参与选举方面几乎没有投入多少时间与注意力。高层领导人不必参与竞争,因为他们的名单已经包括在分配给苏共的100个席位之中。因此,这些人对从事竞选过程没有什么积极性。再者,别忘了,苏共政治局成员此时正在处理许多其他危机,包括经济崩溃和联盟的紧张状态。选举似乎只是他们烦心事中的最后一项。在地区和地方一级,苏共的行动也不像一个为赢得选举而斗争的政党。正如叶戈尔·利加乔夫所反思的那样,以往党对选举过程进行了最细致的监控,“现在存在的是竞争性的选举,但党却几乎完全从政治斗争中退了出来。在每一个民主制度发达的国家,在选举期间当事情变得棘手并激动人心之时,党的结构都会变得异常活跃。但在我们这里,令人不解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中央委员会向地方党的部门下发了一个又一个指令:不准介入”³⁰。然而,战略上的这种缺失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因为他想通过让党内

的保守派失去选举,从而使得他们在党内失去信任。

在1989年的选举中,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人民阵线推举民族主义者、反苏联倾向者为候选人。与此相反,共产党官员在中亚的加盟共和国精心安排了选举。在这些加盟共和国中,反俄或反苏的候选人都没有机会进入投票名单,更不用说在选举中获胜了。俄罗斯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那些后来崛起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的领导人的候选人,并没有以这些运动的代表的身份参与竞选。因为社会组织刚刚才开始组建起来,且这些组织几乎没有一个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国,所以大多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候选人是以独立的身份参与选举的。

1989年选举的后果,是使苏联和俄罗斯内部政治力量之间出现了复杂的新平衡迹象。因为大多数候选人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竞选,他们除了苏共之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政治属性,所以起初的结果是模糊的。苏共的党派属性是靠不住的,因为诸如鲍里斯·叶利钦、盖夫里尔·波波夫、尤里·阿法纳斯耶夫和谢尔盖·斯坦科维奇之类的激进分子在当时都还是共产党员。只是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力量的平衡才开始明显起来。对这些结果的说法也各不相同。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称这次选举对苏共来说是一个重要损失,因为30个权位较高的党的领导人在竞争中失利,而其中许多人是未受反对地参与竞选的。³¹政治局委员维特利·沃洛特尼科夫以及其他一些党内的温和派和保守派成员,把排斥这些权位较高的党的候选人解释为反对改革的一次投票。³²然而,戈尔巴乔夫及党内的自由派宣称,选举结果代表着苏共的一次重大胜利,部分原因是因为有85%的代表是苏共党员,部分原因是因为选举过程体现了苏共不害怕竞争性选举,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党内最顽固的保守派的失利。³³

在俄罗斯,叶利钦和季德利安在莫斯科获得压倒优势的竞选胜利,尼古拉·伊万诺夫在列宁格勒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这给他们的政治支持者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公众的支持已经从戈尔巴乔夫转向了那些倡导更加激进改革的人。一些进步的代表,包括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盖夫里尔·波波夫也通过社会组织获得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席位。但是,这些选举胜利对激进派来说只是个例外,而不是规律。在莫斯科,非正式组织

为他们中只有斯坦科维奇一个候选人赢得胜利这一事实而感到悲哀。在列宁格勒,非正式团体成功地组织了针对一些保守的苏共党员的否决运动,包括列宁格勒州的苏共第一书记尤里·索洛夫尤夫(Yuri Solovyov)。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格勒代表团转而包容了诸如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和尤里·布尔迪列夫(Yuri Boldyrev)这样热心的改革者。不过,就整个俄罗斯而言,依然只有一小部分来自非正式运动的候选人赢得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席位。旧制度的守旧派已经被1989年的选举削弱了,但是俄罗斯新的民主派并未因此而强大起来。准确地说,戈尔巴乔夫仍然是一个重心。

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围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幕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人代会内外的俄罗斯反对运动。在人代会内部,最进步的人民代表组织了一个叫做地区间人民代表团*(Inter-Regional Group of People's Deputies)的集团。由于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阿法纳斯耶夫和盖夫里尔·波波夫是非正式机构的领导人,且科学院投票者俱乐部(Club of Voter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提供了意识形态上和后勤上的支持,所以地区间人民代表团很快就显得非常知识化、城市化。像叶利钦和季德利安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开始时与该集团保持距离。³⁴然而,叶利钦不久就意识到在人代会内部的这些学术机构是有用的联盟,并最终加入了他们的议会阵营。经过一些争论,在认识到叶利钦在全国的吸引力比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人要大得多之后,这些知识分子也表示欢迎叶利钦的加入。除了与叶利钦和季德利安相联系的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和民粹分子外,来自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构成了地区间集团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地区间集团第一次把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人权运动的领导人(比如萨哈罗夫)与民粹主义“持不同政见者”(比如叶利钦和

* 在一些中文著作中,研究者将“地区间人民代表团”这个组织翻译为“跨地区代表团”,从英文的表达上来说,我们认为这种译法是不合适的。在后面的内容中,原书作者把它简称为“地区间集团”(Inter-Regional Group)。——校译者注

季德利安)拉到了一起。在它的广泛性程度方面,地区间集团号称拥有388名代表,或者说占整个人代会代表的17%。³⁵

在1989年5月人代会召开前的筹备会议上,地区间集团的领导人坚决拒绝将他们自己贴上反对派团体的标签。这一标签留给了来自苏共内部反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议程的保守派。然而,一旦大会会期开始,地区间集团很快发现自己在几个程序和实质问题上已处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地位。³⁶第一次争吵是为议程的次序问题而爆发。地区间集团的代表想先讨论国家当前的改革状况,然后再选举人代会主席和各委员会主席。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样的讨论将威胁到他自己作为主席候选人的资格,便利用他对人代会大多数代表的控制把议程的程序颠倒了过来。在议程的斗争上失败后,地区间集团便支持亚历山大·奥伯伦斯基(Aleksandr Obolensky)作为主席候选人与戈尔巴乔夫竞争。地区间集团的大多数代表允诺投戈尔巴乔夫的票,但他们想建立竞争性选举的先例。戈尔巴乔夫不是这样想的。相反,他和他的助手要确保大会只允许有一个主席候选人,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作为大会程序争议的一个结果,便是地区间集团很快在是否要支持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裂。一些人继续视戈尔巴乔夫为改革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开始把戈尔巴乔夫看作是改革的敌人。

戈尔巴乔夫和地区间集团之间的分裂,是苏联—俄罗斯过渡时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那以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急速变迁的政治光谱中不再占据最重要的改革家的位置。毋宁说,这个新团体开始清晰地表述一个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转型议程。根据戈尔巴乔夫当时的一个主要助手格奥尔吉·沙赫纳扎洛夫的说法,地区间集团开始实施革命的策略(revolutionary tactics),而与戈尔巴乔夫“进化”风格(“evolutionary” style)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沙赫纳扎洛夫所解释的那样,“实际上从大会的第一天开始,(在激进民主派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就爆发了尖锐的矛盾,因为戈尔巴乔夫体现进化的改革思想。一旦他被赋予权力,他将可能像邓小平那样去做。戈尔巴乔夫不希望发生地震,但是他们(激进的民主派)却希望如此”³⁷。

对那些关心体制转型的社会团体来讲,地区间集团的创立就是人代

会的最重要成果。来自全国的民主派领导人有机会相互影响、交换观点并最终在一个政治组织中合作共事,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1989年的选举有助于消除协调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曾经分裂了羽翼未丰的俄罗斯民主运动。该团体被党和国家承认为合法,这也同样关键。非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变得非正式性更少了,而合法性越多了。然而,当人代会内部的权力平衡变得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地区间集团的领导人意识到,作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内部的少数派,要促进激进改革是困难重重的。³⁸当派系形成的时候,共产主义派别拥有730个代表而成为最大的派系,甚至更为保守的派系联盟(Soyuz)也号称拥有500个以上的代表。地区间集团的人数要少得多,排在第三,约为联盟派系的一半。一般来讲,由于人代会是一个新的机构,因此,代表们的权利和权力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性使得人代会这一机构控制议程和程序的方式并不利于“民主”利益。这一新机构也很少得到行政上的支持,这使得苏共官员承担了草拟各种立法的主要责任。

由于对缺乏权力和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合作感到非常失望,一些来自地区间集团内部的激进声音主张抛弃联盟政治,以利于政府在最低水平上获得国家权力。³⁹在叶利钦和波波夫的领导下,该团体号召苏联人民代表把注意力集中在加盟共和国、州、城镇以及地方一级即将召开的1990年选举。

街头力量:集会和罢工

尽管地区间集团在人代会内部没有取得什么立法上的胜利,但是正是立法政治的过程——通过每晚全国性的电视播放——对整个国家来讲不啻于一堂大众的公民课。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吸引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前关注着苏联人代会的进程。为了观看前所未有的议会民主秀,工厂、商店、政府机关和机构简直停止了工作。为了利用这种新的政治热情,俄罗斯上下的非正式组织像官方召开会议一样也召开集会以试图影响大会的议程。在莫斯科,从1989年5月21日开始就充斥了大规模的人代会热身会(pre-Congress meeting),卢兹尼克体育馆附近的阅兵场成为新选举的代表与他们动员的选民之间召开经常性会议的地方。莫斯科人民阵线和纪念社每

日轮流组织成千上万人游行集会。在集会上,代表们将在每一天结束前报告人代会的活动情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直接而快捷的。

尽管其反响很难衡量,但是卢兹尼克的集会对人代会的进程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⁴⁰。特别是,叶利钦未能入选最高苏维埃——人代会的最高机构——在卢兹尼克产生了舆论震荡,在那里通过了一个决定,如果叶利钦没有被选上,他们威胁就要举行大规模罢工。⁴¹最后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折中妥协——如果人民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克(Aleksei Kazannik)的位置可以给叶利钦的话,他将从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退出,这部分是因为叶利钦获得了卢兹尼克和俄罗斯其他地方有组织的大众支持。

街头示威者的另一个重要胜利是苏维埃宪法第六条的修正。这一条款规定了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事务中享有领导地位,由此使得其他政党处于非法地位。萨哈罗夫于1989年12月首先提出要对宪法第六条进行修正的问题。在同期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只有两个中央委员——阿卡迪·沃尔斯基(Arkady Volsky)和瓦伦丁·法林(Valentin Falin)——支持把修正宪法第六条的讨论放进议程。⁴²保守的党的书记们强烈反对修正宪法。戈尔巴乔夫及其他的党内自由派也反对这一意见,认为民主派急于削弱共产党有可能在高层产生权力的真空。一个月之后,莫斯科投票者联盟(Moscow Association of Voters)在莫斯科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抗议第六条和其他问题。根据政治局成员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说法,这些示威对他的党内同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是第一个在莫斯科全城游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第一个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及其政府改革速度过慢的示威活动。追踪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足迹,这些游行示威现在看来对共产党更有威胁性。它们还对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改革家的信誉发起了挑战。几个星期以后,在3月份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苏共领导人投票决定修正宪法第六条,由此准许其他政党的建立。无论是宪法变革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对宪法变革的评价是,这个事件标志着从此以后一些真正的决策权已经从克里姆林宫内党的领导人那里转移到街头的反对运动之中。⁴³

卢兹尼克示威游行的最后一个结果是进一步明确了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反体制的组织。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社会

团体仍然期望在体制内推进改革。经过卢兹尼克集会后,这种情绪消退了。从意识形态上来讲,这意味着向更加自由的思想观念转变并反对社会主义改革。正如卡加里茨基所哀叹的:

卢兹尼克集会发挥的作用迅速发生了改变。起初它们提供一个论坛,一些新的、主要的左翼社会运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的民众投票者可以在这个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曾被保守派和自由主义的出版界所忽视——并且直接对政治家提出要求。到人代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集会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活动家与群众面对面并在他们中间进行煽动的一个地方。自由派在控制出版界之外,又增加了对街头的控制。对左派而言,这种形势逆转完全是令人惊讶的。⁴⁴

卢兹尼克将“非正式”运动变成有群众基础和以大众为取向的、旨在摧毁旧制度而非改革它的事业。

1989年夏,第二种集体行动——工人罢工——作为一种新的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方式成为卢兹尼克集会的补充。1989年7月10日,库兹巴斯的三百多名煤矿工人停下了工作。罢工很快波及了整个库兹巴斯,并随后波及顿巴斯(乌克兰)和沃尔库塔(西伯利亚)等其他矿区。一个星期之内,来自158个工矿企业的约177 000名采矿工人加入了罢工行列,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大的停工事件。起初,罢工者把要求限制在改善生活水平上——提高薪水、改善食品供应和发更多一些的肥皂。⁴⁵然而,罢工者的要求很快提高了,其中包括从禁止共产党在工作时间活动到重写苏维埃宪法等一切方面。罢工的范围,以及矿工们拒绝与地方官员协商,迫使戈尔巴乔夫要亲自卷入事件。1989年7月16日,苏联总统责成由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斯利恩科夫(Nikolai Slyunkov)领导的工作组来负责了解矿工们的不满,并与罢工委员会进行协商。不到一个星期,工作组就与库兹巴斯的罢工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协议,该协议保证增加报酬、扩大消费品供应、给予工矿在管理方面更大的自主权,以及其他事项。此后不久,又与顿巴斯和沃库塔的罢工委员会签署了协议。

罢工不仅对苏联当局,而且对俄罗斯的社会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矿工加强了激进派在民主运动中的地位。激进派不是以妥协为策

略,而是要展开对抗的;是要以大众行动而不是议会提案作为实现逐步扩大且激进的议程的一种方式。1990年的选举为激进派提供了一个向公众提交他们更加雄心勃勃的议程的机会。罢工也提醒了非正式运动的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人,他们也必须对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行为体之间迅疾变化的权力平衡保持清醒的认识。如果他们不继续跟上形势,他们也可能跟不上社会上更加好战的力量所渴望的那种变迁的步伐和范围。

1990年俄罗斯人代会选举

1990年在各加盟共和国、州、市和地区一级的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几乎没能吸引苏联政治改革的早期设计者们的注意力。共产党高层官员并没有战略性地致力于制定有关控制这些选举的规则,也没有积极参与候选人的竞争。假如对这些选举多加重视一些,其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很难判断。但是对以上问题的忽视却表明,苏维埃领导人低估了这些选举的重要性。这些选举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导致了不止一个单独事件,它们使得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出现反苏联阵线。这种事情也一样发生在俄罗斯。

俄罗斯选举法规定俄罗斯人代会的所有席位必须通过单一席位选举制选出。没有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保留席位。在理论上,提名过程与1989年的选举没什么两样。然而,有两个变化有利于来自传统的苏联当局机构之外的候选人。第一,公民集会只需要达到300人而不是500人就可以提名候选人。第二,地区选举提名大会被取消了。从实际情况来看,1990年的提名程序甚至更为自由,因为许多苏共官员现在对候选人行使否决权时更加犹豫了,尤其是在那些民主力量已经通过街头示威显示了政治力量的城市地区。有了1989年选举的经历,反对派候选人及其组织对如何应对复杂的提名程序也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例如,那次选举后不久,民主派知道了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友善的企业来提名候选人。⁴⁶相反,在一些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共产党当局仍然阻碍着自由派候

选人获得提名。

1989年的选举经验点燃了更多的民众参与1990年选举的热情。几乎有7000个候选人在1068个选区中参加竞选。⁴⁷在1989年,全部选区有49%的席位是竞选的;到了1990年,有97%的选区至少有2个候选人。全部席位的公开竞选意味着俄罗斯人口中的大部分已经参与到提名和竞选运动中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潮使一些人将1990年的竞选时期称作没有硝烟的二月革命,把它与1917年2月逐渐发展壮大的公众参与相提并论。⁴⁸

拥有近两年的组织政治示威游行的经验,俄罗斯反对派作为这些选举中的全国性政治组织具有了更强的凝聚力。在1989年与1990年的选举间歇,东欧共产党的垮台,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要求,以及苏联经济的急速滑坡,这些因素在俄罗斯产生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危机感,这种情况更有利于反对派势力的加强和保守派的重新集结。“民主派”和“共产党”两大阵营针锋相对。

MOI,“民主俄罗斯”以及1990年竞选运动

1989年的春天,由来自1989年选举中的竞选老手创立了莫斯科投票者协会或叫作MOI(Moskovskoe Ob'edineniye Izbiratelei),目标是参加1990年的选举。MOI的组织者利用在卢兹尼克和普希金广场的群众运动,建立了一个莫斯科乃至整个俄罗斯的投票者联盟与候选人之间的联系网络。⁴⁹MOI的领导者们有意回避起草一个政治纲领,因为他们害怕会导致协会之间的不和或激怒苏联当局;相反,他们散布了一系列模糊的政治宣言,然后再散发给莫斯科及其他地方潜在的候选人。

MOI融合了三个性质完全不同、但都属于俄罗斯新生的民主运动的激进派系——来自已经组建的政治组织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倡导人权的活动家,另外还有把鲍里斯·叶利钦和特尔曼·季德利安联合在一起的民粹主义团体。⁵⁰列夫·波诺马尔耶夫(Lev Ponomarev)和季米特里·卡塔耶夫(Dimitry Katayev)——与萨哈罗夫紧密联系在一起“纪念社”的活动家——是这些商议活动中莫斯科知识界最积极的代表。来自莫斯科人民阵线的有弗拉基米尔·波克瑟、奥利格·奥洛夫(Oleg Orlov)和

米哈伊尔·施耐德(Mikhail shneider)。来自叶利钦这一边的19人委员会的领导人列夫·谢马耶夫(Lev Shemayev)、亚历山大·穆兹康茨基(Aleksandr Muzykantsky)、谢尔盖·特鲁布(Sergei Trube)和弗拉基米尔·科姆查多夫(Vladimir Komchatov),让MOI与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会真正建立了联系,这些企业工会曾在1989年的竞选运动中支持过叶利钦。

在MOI创立后不久的1989年7月,其他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声称,作为一个组织的MOI太小,不足以代表俄罗斯的所有民主力量。因此,便立刻酝酿召开一个全俄罗斯改革力量代表大会的计划。1990年1月5日,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的两百个候选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全国性竞选运动战略。两个星期后,民主派高层领导人和运动的领袖为组建民主俄罗斯(Democratic Russia)而再次会晤,这个选举集团以莫斯科为中心,盟友遍布全俄罗斯。该集团采用了民主俄罗斯这个新名称,并通过了一个含糊的选举纲领。这一候选人集团的非正式领导人叶利钦任命波波夫来领导民主俄罗斯的活动。从那以后,民主俄罗斯集团建立了竞选运动总部,由米哈伊尔·施耐德和弗拉基米尔·波克瑟两个联合主席领导。

民主俄罗斯作为一个选举集团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民主派”拥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或拥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相反,在这一阶段,反共产主义是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唯一观念。这一旗帜包容了从激进的全盘西化者到好斗的斯拉夫派的一切东西。

作为一个新的组织,民主俄罗斯集团在竞选中面临着好几个难题。因为共产党仍然控制着所有的大众传媒,民主俄罗斯很难宣示自身的存在。该团体在资金来源方面也存在限制,因为在仍然为国家所控制的经济中,几乎不存在独立的基金来源来帮助反国家行动。然而,一些契机提供了消除这些财政和结构障碍的推动力。作为这些选举中唯一一个倡议改革的有组织的社会声音,民主俄罗斯没有丝毫困难地就把握了俄罗斯选民中不断升级的反对情绪。民主俄罗斯领导者们知道投票者之所以支持他们,其原因并不在他们的观点本身。因此,改变投票者的态度不是竞选运动的目标。伊利亚·康斯坦汀诺夫(Ilya Konstantinov)在回忆他作为一个来自列宁格勒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人民代表而获得选举胜利时,概述了这次选举的简单逻辑:“我赢了,因为我们

最终成功地将所有的事情浓缩到一个问题——支持还是反对苏联共产党。我是站在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发言的,而他[康斯坦汀诺夫的共产党对手]是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讲话。最终,投票者选择了反共的观点。如果这个问题有几分遮掩的话,我就会输掉,但是我们努力将这一问题放在了议程的首位。”⁵¹

在完成了对民主派或改革派完全的组织控制之后,民主俄罗斯的领导者们随后利用其批准权筛选出近 2 000 名自称是民主俄罗斯成员的候选人。这是一个棘手而又不完整的过程。第一阶段,在某个特定选区,政治组织和投票者联盟被要求从民主运动中只提名一个候选人。在一些拥有好几个强大的地方联盟的城市选区,最初的这种方法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相反,好几个团体向民主俄罗斯总部提出了不同的候选人,这迫使民主俄罗斯刚刚组成的竞选班子要挑选一至两个候选人。在提名过程的第二阶段,那些被挑选上的人要叶利钦签字同意,因此他们也为叶利钦所控制。考虑到有数千名默默无闻的候选人参与到竞选中来,叶利钦的签名[常常伴有其他人诸如波波夫、斯坦科维奇和特夫金(Travkin)等著名的民主派人士的副署]是选举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受民主俄罗斯支持的下级苏维埃代表的候选人,也在他们所有的传单中印上了俄罗斯代表大会民主俄罗斯候选人的名字,这在往下到城镇选区这个层面上,鲍里斯·叶利钦对候选人产生了巨大的提携性作用。2月4日和25日,民主俄罗斯的 leadership 在莫斯科城区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有超过二十万的人参加了这两次运动。这些集会除了抗议当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如修正宪法第六条,还为他们新生的组织提升了知名度,并将其候选人推销给公众。类似的集会一时间在整个苏联到处出现。⁵²

选举作为一个新事物,意味着投票者缺乏有助于他们选择的有用资料。能给投票者提供有关候选人政治取向的信号的非共产主义政党还不存在,或者说还不为人知。候选人也没有作为立法者的个人纪录以供他人做出判断。由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ology)做出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在莫斯科这个政治上成熟的城市,居然有 50% 的投票者不知道谁在他们的选区参加竞选。⁵³ 信息方面的真空为民主俄罗斯实施简单的、两极的反对战略提供了理想条件。

共产党的竞选运动

到1990年选举的时候,苏共不再是一支统一的力量。作为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的结果,在铁板一块的苏共内部,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团体开始分裂成独立的政治组织,起初是作为一个派系,稍后提出纲领,最终演变成一个新的政党。民主纲领派(Democratic Platform)、为了民主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 for Democracy)、俄罗斯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 of Russia)、自由俄罗斯党(Party for a Free Russia)、民主改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Reform)都产生于共产党内的自由派。虽然一些事不大为人知,但是,一些来自苏共正统派的政治论坛、阵线及党派也随着苏共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权威下降而激增。

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过的,戈尔巴乔夫的制度改革直接挑战了苏共对苏联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保守派领导人被总书记的叛逆行为震懵了,清醒过来后,他们马上进行组织抵制。第一个重要的“新共产主义者”组织成立于1989年,这一年俄罗斯工人联合阵线(Russian United Workers' Front, OFT)成立了。该团体关于要建立一个俄罗斯的而非苏联的组织的决议,对保守运动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一旦该团体做出在俄罗斯而不是在联盟层面上建立组织的战略转移,那么这一决定削弱了他们自己所呼吁的联盟统一。从意识形态上来讲,OFT提出了传统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阵线领导人号召工人抵制所有的市场改革,防止俄罗斯变成西方的殖民地,肃清合作社的投机行为,并支持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为保证工人的利益高于资产阶级的利益,OFT认为苏维埃人民代表应该代表工作地而不是居住区的利益。⁵⁴ OFT领导人还认为,俄罗斯需要重新点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与在苏联正出现的资本主义和官僚独裁作斗争。⁵⁵

工人联合阵线在其他一些新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包括创建于1990年6月19—20日;并最终发展成俄罗斯共产党(Russian Communist Party)的共产主义创新运动(the Communist Initiative movement)。苏共领导层内的一些保守派心照不宣地支持成立这一党派的想法,但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真正推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来自上层。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得太晚以至于不能以正式的、独立的组织的身份

参与1990年选举。然而,松散地附属于共产主义创新运动的保守派候选人又的确参与了选举,并在选举之后,保守派共产党代表构成了俄罗斯代表大会中最大同时也是最有凝聚力的派系。⁵⁶

来自苏共内部的改革派也在1990年选举前组织了起来。当党的讨论俱乐部开始在整个俄罗斯的地方、地区、城镇这一层面繁殖扩散的时候,要在共产党内部成立自由派的思想从草根层迅速冒了出来。⁵⁷党派俱乐部中最活跃的那些人成立了一个俱乐部间党派(Inter-Club Party)组织,最终在1990年1月20—21日召开了民主纲领派的组织大会。来自102个城市和13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大会,其中包括像叶利钦、特夫金、绍斯塔科夫斯基(Shostakovsky)、波波夫和姆拉谢夫(Murashev)那样的杰出人物。⁵⁸

成立大会上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大会通过了需要建立多党制,需要在苏共党内形成自由派和保守派,以及由苏共领导人为党在过去独裁统治期间所犯的罪行进行认罪的决议。这些立场与相同时候他们的非共产主义反对派正在组织民主俄罗斯那会儿所阐发的言论非常相似。然而,分裂的确源于战术需要。一派认为,民主纲领派必须在苏联共产党的范围内谋求更大的民主化。另一派则倡议立即形成针对苏共的轮替的政党制度。⁵⁹第三派主张在苏共内部和外部形成两个阵线的战略。⁶⁰作为妥协的结果,民主纲领派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为即将到来的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次草案自由的、轮流执政的文件,同时同意将脱离苏共的议题推迟到这次重大会议结束以后。

起初,苏共高层领导表示愿意考虑民主纲领派的建议。⁶¹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宣称很乐意把新团体的意见采纳为苏共官方纲领的一部分。共产党员也纷纷加入新组织。到1990年3月,民主纲领派的组织者宣称拥有一百多万成员。而苏共内部的保守派阻碍了民主纲领派的目标。民主纲领派的领导者们没能成为二十八次代表,并且纲领派的一些领导,诸如伊格尔·丘拜斯(Igor Chubais),甚至因为另类思想而被开除出党。⁶²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在这一阶段分裂党是危险的,因为他可能失去对苏共的控制。⁶³一些民主纲领派的代表被允许参加3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但是他们未被邀请发言或参与讨论。⁶⁴

然而,在1990年春天的选举中,民主纲领派支持几十个作为苏共党员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尽管民主纲领派起初支持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步伐,但它不是一个毫不含混的支持者或现政权的代表。民主纲领派的成员们尽管仍然是苏共党员,然而,在这次选举中他们还是作为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计划的反对者而参加了竞选。

最底层分裂为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半独立政治组织,以及最高层自由主义分子与保守派之间裂痕扩大所造成的紧张态势,这些情况都表明了苏共在1990年的选举中没有发挥其独特的、慎重的作用。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维特利·沃洛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承担着自上而下协调苏共竞选活动的任务,但他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指导。沃洛特尼科夫担心,党内所有天资很高又富有经验的人都已经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了,这就给俄罗斯代表大会没留下多少合格的候选人。⁶⁵当苏共就俄罗斯人代会选举的候选人做出最后决定时,只有两个高级官员——亚历山大·弗拉索夫(Aleksandr Vlasov)和尤里·马纳伊夫科夫(Yuri Manaevkov)——被提名参与竞选。沃洛特尼科夫推举党的杰出领导人去参加俄罗斯的竞选,诸如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尤里·马斯柳科夫(Yuri Maslyukov),但是他的提议遭到了拒绝。⁶⁶

党的各级的分裂和高层的疏忽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与这些选举的苏共候选人,极少依赖于他们的党内身份,而是更多地依赖于他们个人作为国家的和经济的管理者的声誉。然而,苏共候选人拥有相当的选举优势。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苏共官员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这在人数集聚的选举领域来说就是一个优势。在那些非正式运动尚未波及的农村地区,苏共地方领导人仅仅面临着象征性的竞争。地方上的党的书记也比他们的挑战者拥有更大的资源优势,因为他们控制着地方电视台及报纸,还有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党组织,它与附属的工会、妇女团体、退伍军人联盟和青年组织形成配套完善的组织。最后,地方党的精英仍然管理着所有的经济资源;市场改革还没有开始。在这样的条件下,毫不夸张地说,每个人都因经济生存问题而受制于苏共,这使苏共候选人购买选票时可以发挥极大的杠杆作用。

民族主义者的竞选运动

产生于1987年和1988年戈尔巴乔夫开始自由化时期的民族主义团体,与俄罗斯非正式运动中的自由派相比,在规模或影响力方面都没有什么发展。个人的分裂使纪念(Pamyat)运动陷于瘫痪,到1990年选举之时,纪念运动已经四分五裂成好几十个小的派系了。其他的爱国主义团体还必须获得全国性的声誉。为了1990年的选举,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俄罗斯创立了公众和爱国运动集团(Bloc of Public and Patriotic),但是该集团缺乏高级领导人,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地方机构,这些都使它在选举中的作用降到了很小的地步。由于缺乏自己的领导人,其他的民族主义团体只能支持那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共产党候选人。俄罗斯政治开始在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之间逐步走向两极化,这几乎没有为任何其他意识形态信念的第三种党派留下空间。

1990年的选举结果

民主俄罗斯及其同盟在1990年选举中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收获,而另一方面,苏共还在继续活动。政治局成员维特利·沃洛特尼科夫认为选举导致了苏共的大踏步倒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⁶⁷1990年4月的那次投票(无疑受到这些选举结果的影响)证实了沃洛特尼科夫的担心:有令人吃惊的80.7%的苏联公民相信党的权威在最近两三年中衰落了。有几乎一半的回答认为党在政治事务中失去了进取精神。⁶⁸

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他们自身所取得的成功惊呆了。⁶⁹他们立即宣布大获全胜,宣称其选举集团支持的候选人在有1000个议席的大会中赢得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⁷⁰然而,要讲清楚其胜利的程度是要花时间的,因为代表们同民主俄罗斯的隶属关系通常最多也只是很脆弱且微妙的。到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时,民主俄罗斯联盟宣称大概有40%的代表开始认同他们的民主目标。⁷¹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城市议会中,民主俄罗斯也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使得民主派得以在首都控制大多数的资源。

同样也赢得了将近40%席位的保守派共产党,随后也组建了俄罗斯共产党人(Communists of Russia),这是议会中最大也最训练有素的团

体。然而,这些选举对苏共来说反映着最大的倒退。尽管保守派共产党赢得了最多数的席位,但是选举形势绝对已经倒向民主反对派。更有甚者,保守派共产党的代表正越来越像他们的民主派敌人那样成为苏共领导集体的批评者。中心正在很快地消失。新民族主义团体进展不理想,仅仅赢得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席位。⁷²选举的结果意味着俄罗斯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被极化为两大阵营:支持或反对保存苏联共产党政权。⁷³

扩大的变迁议程

民主俄罗斯为俄罗斯人代会的召开做了认真积极的准备工作。民主俄罗斯代表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在大会开幕前举行会议,挑选基层领导人,确定其立法战略,并同意支持叶利钦为议会主席的候选人。紧随着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反共运动脚步,该议员团也起草了一个关于俄罗斯主权的宣言,宣称他们准备采取第一步合法行动。相反,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领导层对俄罗斯人代会几乎没有投入什么时间和精力。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新国家制度的重要性。正如政治局委员维特利·沃洛特尼科夫在俄罗斯选举结束后不久的日记中写道:“尽管有来自政治局的命令,但中央委员会机构、俄罗斯联邦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和办公厅,都没有为(俄罗斯)人代会做准备……与我们相反,民主俄罗斯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⁷⁴苏联领导层将俄罗斯人代会看作是二流政治家以及讨论边缘性政治问题的活动场所。这是最大的战略性失算。

1990年5月,在其第一个重大举措中,新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叶利钦为大会主席,但这次选举是在四轮选举之后胜出并且是以微小的四票之差险胜的。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伊万·博洛兹科夫(Ivan Polozkov)以微小差距排名第二,这显示了人代会极端的两极化现象。无

* 根据原文和实际的政治状况,伊万·博洛兹科夫不是当时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后来作为一个政党即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校译者注

论民主俄罗斯是精心筹划也好,还是共产党缺乏战略也罢,投票都反映了议会内部不稳定的平衡。“民主派”是少数派。在其强大的鼎盛时期,在议会1068个席位中忠诚于民主俄罗斯及其事业的代表不超过400个。⁷⁵鲍里斯·叶利钦草率地将其拼凑成多数派,其主要方式是通过吸引俄罗斯民主派(该派将宣言看作是解散苏联帝国的和平方式)、来自自治共和国的代表(他们害怕俄罗斯共产党的亲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以及那些想与越来越受到欢迎的叶利钦结盟的独立分子。⁷⁶

在赢得这一权位之后不久,叶利钦及其盟友开始扩大反戈尔巴乔夫和反苏联政府的政治斗争,宣称戈尔巴乔夫及其政权对改革不再起促进作用,反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叶利钦及其盟友因选举胜利获得授权,并因叶利钦当选为主席而更加信心百倍,他们要进行更激进的政治改革。尽管一开始是含糊不清的,但是,最终形成的好几个反制度的主题还是把这些挑战者置于完全反对戈尔巴乔夫旧制度的对立面。

对国家主权的渴求是非常明显的。根据民主俄罗斯领导者的观点,选举赋予了他们试图将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权限。⁷⁷正如叶利钦1990年5月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共和国面临的问题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主权便无法解决。唯其如此,俄罗斯与联盟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境内各自治地区之间的关系才能和谐”⁷⁸。叶利钦这次讲话后的两个月,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宣布俄罗斯联邦为主权国家。当然,这些宣言既没有在俄罗斯联邦内很快转化为对经济和政治行为事实上的主权控制,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合法性上的承认。在这整个时期,叶利钦自身的位置也很尴尬,因为他对主权的定义依赖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变化。在反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主权问题上不存在共识。⁷⁹尽管如此,在政治权力竞争的初期,俄罗斯的主权问题依然占据着中心位置,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与权威。相矛盾的是,俄罗斯共产党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拥护俄罗斯主权的——他们都反对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的民主派反对党第二个、但远没有得到推广的观念是要求进行市场改革。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并恢复社会主义的活力,那么叶利钦及民主俄罗斯要求的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许多激进的民主派越来

越认为根本不存在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俄罗斯反对运动的领导者也缺乏特效药。叶利钦本人也从未勾画过清晰的经济计划。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这个俄罗斯最终的激进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在回忆录中讲到他为叶利钦早期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讲话感到不安。⁸⁰叶利钦及其同僚们从未清楚地论述过何种市场经济将取代苏联计划经济,也从未讲清楚过他们将怎样完成这样的转型。在一些问题上,如价格改革方面,叶利钦一开始支持民粹主义者的反市场观点。然而,到了1991年的冬天,当苏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反对派要求新的经济秩序的声浪逐渐高了起来,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民主是反对派思想意识形态的第三个构成因素。事实上,俄罗斯的革命有效地抓住了“民主”这一术语以标榜他们自己是民主派,标榜他们的运动是民主抗议运动。这一术语有助于将俄罗斯的政治光谱分裂为两大阵营——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派,尽管所谓的民主阵营包括许多非民主派成员,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阵营也包括了好些个民主计划的倡议者。为清晰地描绘民主与反民主的鸿沟,反对派提议并促使他们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参加1991年6月刚设立的俄罗斯总统职位的选举。叶利钦被选上该职位是他三年中第三次以绝对优势的获胜,而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未提出要将自己的权力经由群众批准。尊重个人自由、媒体自由独立、法治是俄罗斯民主运动所宣传的全部主题。(民主)运动也利用群众事件来彰显它的民主可信度和广泛支持度,并反衬出戈尔巴乔夫政权的权力实践及其日益失去的普遍吸引力。然而,与它对资本主义的承诺一样,民主运动对民主的承诺既不坚定也不彻底。总体上说,俄罗斯的非正式政治组织在实践内部民主上是有瑕疵的。不过,俄罗斯内部惊人的变迁速度,以及这些组织建立起来的时间还相当短(与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好几十年的历史相比,甚或与波兰的团结工会的十年历程相比,这些组织还只有几年时间),这些都意味着民主原则还没有时间在这些组织内部得以成熟。关于民主政治是非曲直的持续的全国性辩论没有出现过。

反对派模棱两可的思想意识形态在革命时期是很普通的。作为一种策略,模糊性有助于联合不同类型的团体。实际上,革命分子对自己反对

什么要比对自己渴望什么了解得多。还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的意识形态日益倾向激进,并日益与当权派的思想背道而驰。当妥协的努力失败后,温和的主张和中间路线的政治家就失去了左右形势的影响力。⁸¹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的反党派与其他的革命运动并没有什么两样。

苏联最后一年间模糊而变化的权力平衡

如果民主派在当时三个中心问题上的立场——民族和国家的边界、经济的性质和政体的类型——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明朗,那么,在苏联的最后岁月里,运动的政治力度也不会变得那么明显。在叶利钦的支持者当中,特别是在支持叶利钦的民主运动当中,1990年秋天和1991年冬天是极为不确定的时期,充满着争论、分裂和质疑。⁸²在整个1990年,包括俄罗斯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俄罗斯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Russian Christian Democratic Movement)和俄罗斯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 of Russia)在内的好几个政党举行了成立大会。尽管建立政党的主张显示了民主思想上的进步,但是,这些新政党给人的最初印象却是民主的分歧。这些党派没有一个能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并且几乎很少具有能够与其他团体区别开来的特定的认同或政治取向。⁸³事实上,从1990年10月民主俄罗斯成立大会开始,这种(对民主的)分歧局面才开始得到改观。但是大多数观察家,包括戈尔巴乔夫,仅在更晚的时候才认识到这一点。

在俄罗斯的民主运动开始出现分裂的同时,保守势力却开始走向团结。1990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将大多数自由派与中间派分子排除出政府,同时加强了保守派在政府中的势力,特别是那些与军工集团有隶属关系的保守派。1990年12月,戈尔巴乔夫任命强硬派的鲍里斯·普戈(Boris Pugo)为内阁的内务部长,其后不久,他又任命保守派成员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为副总统,任命瓦连京·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为总理,以取代雷日科夫。作为对其保守倾向的抗议,

戈尔巴乔夫最忠诚的盟友之一、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于1990年10月退出了政府,他在辞职讲话中警告说一场政变正在逼近。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自称,他正在谋求“一种中立立场,试图让国家机构承担起维护国家秩序稳定的责任,以结束在左右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不定”⁸⁴。

然而,戈尔巴乔夫政权发出的声音和采取的行动都日趋反动,而不是走上中间道路。高层的这种权力平衡变化的意义首先在1991年1月显现了出来,那时苏联军队控制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主要报纸的印刷厂,袭击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的出版社,然后又攻占了那儿的电视台。在占领了电视台后,一个所谓的“国家拯救委员会”宣称它是一个全新的政府,并宣誓效忠于苏联政府。有14人死于暴乱,更有数百人受伤。在随后的一周,内务部特警在里加杀害了4人。

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武装干涉,以及民主运动内部显然可见的无能为力,这些都鼓舞了苏联保守派。在最高苏维埃内部,陆军上校维克多·埃尔克斯尼斯(Victor Alksnis)和尤里·博罗金(Yuri Blokhin)组建了联盟,该组织致力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苏联。联盟以“丢失”东欧和导致苏联分裂为理由,对戈尔巴乔夫发起了强烈攻击。⁸⁵联盟的产生也部分导致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10月被迫辞职,并确实对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压力,迫使其放弃改革政策。据埃尔克斯尼斯的说法,如果苏联要避免内战,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得靠边站:“今天(1991年2月),我期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拯救委员会,而不是一个像俄罗斯的共产党高层人物伊凡·博洛兹科夫所想的那样是挽救社会主义的组织。我思考的委员会应该拯救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联盟。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危险的堕落,我们会陷入内战。”⁸⁶埃尔克斯尼斯为苏维埃议会内外的保守运动注入了新的激情。⁸⁷

俄罗斯议会内部的保守派也在1991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获得了动力。在1990年春的第一次俄罗斯人代会上,叶利钦以微弱优势当选为主席,这对共产党和像工业联盟和农业联盟这样的社团派系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叶利钦巧妙运用主权问题来打造一个多数派联盟,而该联盟在其他大多数问题上都未曾实现过整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较保守的势力

通过行使手中的权力来阻碍激进改革,并压制叶利钦设置议程的权力。到了3月份,这些保守派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投票罢免叶利钦的主席职位。

在政府机构之外,共产党的组织者开始发展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俄罗斯共产党开展了与民族—爱国团体的接触,诸如纪念社、祖国(Otechestvo)和俄罗斯作家联盟(Russian Writers Union),以及发展与诸如团结(Edinstvo)、团结工人阵线(United Workers' Front)和共产主义创新(Communist Initiative)这样的新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正如该联盟的鼓吹者之一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Alexander Prokhanov)所宣称的那样:“俄罗斯共产党和民族—爱国运动彼此需要。”⁸⁸26个爱国的与共产主义的组织于1991年2月发起了一个叫做“为了伟大和统一的俄罗斯”(For the Great and United Russia)的运动。⁸⁹然而,这个联盟内部的霸主却是俄罗斯共产党。这个组织以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拯救委员会为榜样,发誓要将俄罗斯从混乱和革命中拯救出来。俄罗斯共产党变得如此反动,以至于那些起初支持该党成立的温和派开始纷纷脱离该党。苏联政治正在日益步入两极化。

然而,这些保守势力到底有多强大还不确定。最模糊的地方就是在苏联政府内外戈尔巴乔夫与保守派之间的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任命了好几个保守派到其政府就职,这一举动表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但是,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这两个集团的保守派领导人因为国家的灾难而怀疑并指责戈尔巴乔夫,这使得他们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合作变得困难重重。⁹⁰苏联的保守派和俄罗斯的保守派有时有着不同的议程,因为保留苏联和推进俄罗斯民族主义并非总是两种相容的精神。尤其是,俄罗斯共产党的创立向苏共提出了真正的组织问题和合法性问题。⁹¹保守运动内部的分裂使得它在国内真正的政治权力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民主派的重组与政治的极化

俄罗斯的民主势力对苏联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所作所为的最初反应是保持沉默。许多人相信整个苏联的紧急管制即将来临。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军事行动之后,一些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认为,已经到了决定是

暂时退却还是冒失去先前四年成果之风险的时候了。⁹²例如,斯坦科维奇就曾发出警告:“苏联的民主力量必须在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时期铁下心来。在这期间,除了接受与各种难以相容的人、思想和制度的共存外,我们别无选择。”⁹³与此同时,波罗的海事件为整合俄罗斯民主力量提供了新的焦点。对波罗的海的干涉尤其刺激了民主俄罗斯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出现,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公开其瓦解苏联旧制度的目标。⁹⁴

1990年选举之后,民主俄罗斯组织者的选举运动一直致力于建立全国性的运动。⁹⁵然而,个人的冲突、新的管理工作和政党的增长都延缓了这一目标。最终,在1990年10月,来自几乎全俄罗斯各地方和50多个组织的1700名代表,与人民代表和著名的民主运动独立领导人联手合作组建了民主俄罗斯运动(Democratic Russia Movement)。

从一开始,民主俄罗斯内部自负的领导人和分歧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该组织内部某种永久性的危机。政府的宣传又无异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主俄罗斯与鲍里斯·叶利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而紧张。尽管受到无数次的邀请,但鲍里斯·叶利钦却从没加入该运动,并极少在民主俄罗斯的活动中露面。

然而,在10月份的困难开局之后,1991年1月对波罗的海的突然行动却有助于将民主俄罗斯巩固成为一个有效的、有能力动员已被政治化的大众的反对党组织。在回应入侵波罗的海问题上,民主俄罗斯提出的解决办法宣称,与苏联当局进行妥协和协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进行公开对抗的时期已经开始。⁹⁶此后不久,民主俄罗斯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示威以抗议军队干预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二十多万群众参加了莫斯科的游行。在其后的一个月,民主俄罗斯举行了另一个重要的街头示威,主张建立独立于苏联政府的俄罗斯电视台。紧跟着这次集会,针对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有关保持苏联问题的全民公决,又组织了两次重要的示威活动(将在后面讨论)。

1990年3月1日,煤矿工人又开始罢工了,首先是在顿涅斯克,而后在库兹巴斯、沃尔库塔、萨哈林和乌拉尔。与1989年的罢工一样,他们的要求很快从地方经济问题上升到全国政治议程,包括要求苏联政府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下台。⁹⁷正如罢工委员会领导人阿纳托利·马利恒

(Anatoly Malykhin)所解释的那样,“当罢工开始的时候,矿工的要求限于经济上的关注——工资翻番。但是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政府没有能力满足这一要求。我们后来感到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我们的任何经济要求都不会得到满足。结果,我们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并号召其他地区的煤矿工人也这么做”⁹⁸。特别是通过公开指责苏联政权和戈尔巴乔夫,这些矿工很快成为鲍里斯·叶利钦及民主俄罗斯的同盟者。罢工委员会的领导者们来到莫斯科,与叶利钦协调有关他们的行动,与此同时,民主俄罗斯利用这些事件,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主要城市组织了团结一致的示威活动。⁹⁹罢工后期,劳工领导者要求俄罗斯政府而不是苏联国家承担起矿业的责任。¹⁰⁰把这些经济行动改写为俄罗斯主权的政治要求,这代表了俄罗斯草根阶层要求进行政治变革的社会动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权的衰弱。

除了矿工罢工,发生在莫斯科的新事件也有助于政治阵营的极化。对俄罗斯民主运动内部的许多人来说,1991年3月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是那些反对与支持激进变革者之间出现严重僵局的标志。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俄罗斯议会内的保守派代表发起了一个要求罢免叶利钦主席职位的动议。作为回应,民主俄罗斯正好在大会开幕之时,通过其组织化的力量在莫斯科举行了大规模的公共示威游行。戈尔巴乔夫为了显示与俄罗斯保守派代表的团结一致,宣布复活节假日结束之前禁止莫斯科的所有公共游行活动。

为执行这一古怪的法令(以往苏联政权从未认可复活节假日)——该法令强行推翻了莫斯科市政府对游行示威的法律同意——戈尔巴乔夫命令大约五万名士兵进驻莫斯科,他们简直控制了整个市中心。¹⁰¹拿着盾牌的部队联合普希金广场附近骑着马或坐在水炮车上的民兵,封闭了该市的主要道——高尔基大街。¹⁰²经过内部激烈的争论,民主俄罗斯的领导者决定继续他们原定于1991年3月28日举行的游行活动,并以和平的方式挑战苏联武装力量。¹⁰³全副武装部队紧挨着赤手空拳的俄罗斯示威者,这种景象使俄罗斯的反运动得到了政治红利。在同一天召开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中的大多数通过了一个暂停活动、直到军队撤离莫斯科为止的决议,以此表明他们反对动武,他们还搁置了罢免

叶利钦主席职务的议案。

这个新的多数派能够聚集到一起,是因为陆军上校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建立了一个誓死支持叶利钦的新派系——民主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 for Democracy)。正如鲁茨科伊在率170名俄罗斯共产党代表(鲁茨科伊本人是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集体脱党时所宣称的那样,“俄罗斯共产党正统的共产主义纲领可以概括为回到过去——维持比它本身的存在还要长久的制度”¹⁰⁴。大会非但没有免去叶利钦的职位,反而赋予主席一职以超乎寻常的权力,这为他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

在俄罗斯民主运动内部,军方对莫斯科的控制破坏了那些曾支持与戈尔巴乔夫合作的温和派的地位。相反,民主俄罗斯领导者现在将摧毁苏联政权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将对抗作为总体的战略。两派对立力量之间的分裂现在变得越来越两极化,而政治权力的分配看起来又开始转移,这次是向俄罗斯的民主力量倾斜。

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和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

如果说民主俄罗斯3月的街头示威标志着支持民主反对派势力的一次重要亮相,那么,1991年3月就维持苏联的全民公决则证明,俄罗斯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没有认同民主俄罗斯的变迁议程。事实上,全民公决在俄罗斯改革运动内部产生了真正的分裂。全民公决是二元(即二选一)的投票。可持的立场通常只有两种——支持或反对——但是,民主运动内部就这一问题却存在着两种以上的态度。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分子,诸如加林娜·萨塔罗瓦多娃(Galina Starovoitova)和列夫·波诺马尔耶夫(Lev Ponomarev)等人竭力主张投票说“不”^{*}。另一方面,当时民主运动内部的强国论者,诸如尼古拉·特夫金、维克多·阿克修切茨(Viktor Aksiuchits)和米哈伊尔·阿斯塔费耶夫(Mikhail Astafiev)等人,则认为俄罗斯的改革力量不能投票反对维持联盟。第三种立场——联合抵制全民公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民主俄罗斯希望投票者前往投票箱就设

* 即他们不主张维持苏联。——校译者注

立俄罗斯总统职位这一附加问题投赞成票。

最后,俄罗斯反对派无法就全民公决问题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民主俄罗斯敦促它的支持者在全民公决中投票说“不”,但是,运动的反全民公决战役被简缩了,也没有得到明晰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鲍里斯·叶利钦在关于联盟投票问题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他既没有在民主俄罗斯的反全民公决的集会上露面,也没有让自己的名字用于民主俄罗斯出版的反联盟宣传中。

在那些进行了全民公决的加盟共和国中,有76.4%的投票者赞成维持(苏联)联盟。在俄罗斯,76.3%的人投了赞成票,而只有26.4%的人投了反对票。

然而,三个月后俄罗斯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却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公众舆论的相互矛盾。叶利钦有着参与总统竞选的巨大力量。他在整个春季向反对者发起挑战;最重要的是,他挫败了1991年3月要罢免他主席职位的保守运动。在解决煤矿工人罢工问题上,叶利钦显示了他处理问题的能力。¹⁰⁵甚至连他的反对者也承认他们的对抗战术没有起到作用。正如一位共产党代表所哀叹的:“你知道,我们反叶利钦的每一个行动都提升了他的声誉。”¹⁰⁶

苏联的经济崩溃为叶利钦提供了另一个使他可以发动抗议投票的问题。最后两年混乱的政治问题已经将注意力从经济改革中转移开去。到1991年,苏联经济一路下滑。年底,生产下降了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25个百分点,零售价格上涨了142%,批发价格攀升了236%。¹⁰⁷显然,叶利钦就经济崩溃问题指责苏联当局,认为只有在俄罗斯从苏联政府手中夺取到更大的对自身经济事务的控制权之后,情况才能得到改善。大城市地区物品短缺尤为严重,根据民主俄罗斯领导者的说法,这是因为农村地区的保守派正在封锁那些目前被民主派控制的城市。投票者担心4月份经济会恶化,那时瓦连京·帕夫洛夫总理将宣布价格上涨计划。这一时期的民调显示人们期待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在1991年4月进行的一次调查中,苏联所有的被调查者中有38%的人称社会主义要倒台了,而只有20%的人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是我们的目标”。¹⁰⁸

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轻易地赢得了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尽管

其他五个候选人符合这次投票的资格——包括前总理雷日科夫和新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叶利钦赢得了第一轮的胜利,获得了 57.9% 的大众投票,相比之下,雷日科夫获得了 17.6% 的选票,日里诺夫斯基令人吃惊地获得 8.1% 的选票。投票反映了大众支持变迁的呼声日益强烈。

然而,对某些人而言,1991 年 3 月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更显示出,在主权这一特定问题上,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还是倾向于维持现状。如果一系列的问题和意见能促使将选票投给叶利钦,那么,全民公决则代表了对争议的变迁议程中某一特定问题的具体回答。甚至,那些支持与反对变迁的人都明白,公众舆论是权力的一个标准。最重要的标准——谁掌握枪杆子——似乎仍然为那些苏联政府中的人提供了优势。

不确定下的谈判:经济与联邦条约

到 1990 年 6 月,一种无政府的感觉席卷了整个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削弱了旧的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是,新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巩固起来以便组织经济和政治。有关制度未来的不确定性因为那些新的激进的政治行为体的出现而加剧,如果它们对苏联改革的未来恶意诋毁的话。像苏联共产党这样的旧行为体持续的衰弱,进一步模糊了对权力平衡和改革未来的估算。谁的意见更为关键? 行为体间的争论该怎样解决? 谁有权威和权力来实现其制度变迁的想法?

在苏联混乱不堪的最后一年间,意识形态的分野在几乎每个问题领域都变得明显起来。然而,没有什么比国家边界的分割和在苏联国家内部将主权移交给下级这两个问题更为事关重大。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发起改革计划之初,将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低调处理,但是,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产物而出现的新的政治行为体认为,主权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苏联这个整体的内部,关于民族(国家)边界的这些争端首先在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变得明显起来。在 1990 年的反共产主义选举

之后,民族主义者的多数控制了所有这三个最高苏维埃,波罗的海三国马上决定宣布自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则更为大胆,它在1990年3月11日通过投票一致决定,要将立陶宛重建为一个独立国家。同年夏天,乌克兰、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政府也发布了有关主权的宣言。然而,俄罗斯共和国在这场主权游戏中是最关键的行为体。如果俄罗斯离开联盟,苏联就什么也不剩了。¹⁰⁹这确实就是日后发生的事情。

这样一种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回想起来,俄罗斯反对派鼓吹的激进的变迁议程,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较为温和的改革议程看起来是势不两立的,这使得两派预先就注定了要对立,他们之间的妥协也显得不大可能。马后炮的认识玷污了这种解释。在1991年8月之前,协商妥协似乎并非绝无可能,相反,通过协商几乎就将成功地设计出一个更具进步性的过渡,即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到新的政治秩序。协商妥协的两个尝试——“500天计划”和联盟条约——差点就要起作用。

“500天计划”:尝试协约式过渡

1990年选举后,俄罗斯议会对苏联政府的斗争态度很快阻滞了上层的创新精神。到1990年春天,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及其新组成的内阁似乎准备在市场改革方面再迈进一小步。1990年5月,雷日科夫通过宣布提高(但不是放开)价格的计划来显示他的新思路。¹¹⁰然而,叶利钦及其政府不允许在俄罗斯领土上实行雷日科夫的计划,并通过组织一个他们自己的经济委员会起草俄罗斯向市场转型的计划来抵制该计划。这个由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阿列克谢·米哈伊洛夫(Aleksei Mikhailov)和米哈伊尔·扎多尔诺夫(Mikhail Zadornov)领导的团体制定了“500天计划”,这是一个比雷日科夫计划更加激进、涉及范围也更为宽广的改革蓝图。¹¹¹经济制度变迁议程的范围在扩大。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计划激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他最终认识到不能简单地忽视俄罗斯政府的行动,即便这意味着他要与难以对付的敌手鲍里斯·叶利钦共事。¹¹²但是,戈尔巴乔夫政府还没有做好妥协的准备。在8月气氛热烈的马拉松式会议中,雷日科夫及其高级部长们试图使戈尔巴乔夫相信,除非采纳他们的计划,否则苏联经济体系在今后的十二个

月内将面临全面崩溃。为此,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个会议来讨论经济改革的未来进程,在这个会议上,雷日科夫散发了四页的政府建议摘要。不过,戈尔巴乔夫也邀请了总统顾问班子成员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Stanislav Shatalin)和尼古拉·彼特科夫(Nikolai Petrakov)——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新的私人顾问——来为讨论500天计划的会议准备一个概要。据雷日科夫所述,讨论很快转到俄罗斯主权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上。¹¹³俄罗斯新的宣布自治的大胆行动,迫使戈尔巴乔夫利用经济改革来维护联邦的统一并维持苏联政府作为一个相关的政治行为体。通过在经济改革上合作制定一揽子计划,戈尔巴乔夫希望培养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以挽救苏联。因而,在500天计划上的协商妥协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制度的,它们也关系到苏联联邦的重构。戈尔巴乔夫不想同时忙着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和他的政府再也没有权力来决定或安排改革的议程了。

戈尔巴乔夫指示他的政府同俄罗斯政府一起起草一个妥协的经济改革一揽子计划。沙塔林领导苏联—俄罗斯委员会这个新的联合体,其中包括来自苏联一方的叶夫根尼·亚辛(Yevgeny Yasin)和尼古拉·彼特科夫,以及来自俄罗斯一方的亚夫林斯基、扎多尔诺夫和米哈伊洛夫等人。雷日科夫没有被邀请参加该委员会。在围绕500天计划进行协商之初,许多政治家曾猜测这个论坛为向新的经济和联邦体制的协商式过渡建立可能的范围,这个新体制能够包容苏联和俄罗斯政府的利益。正如年轻的改革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当时所写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总统和叶利钦……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性和政治上的灵活性,努力打破对抗趋势,并在深化改革的名义下组成一个政治联盟。”¹¹⁴尽管议程以经济问题为焦点,但是苏联—俄罗斯联合工作组被许多人看作可能是发起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内容更为广泛的圆桌谈判的先兆。俄罗斯民主运动内部的温和派和苏联政府内部的妥协派,不仅将这一系列的协商妥协看作是制定经济改革计划的方法,而且将它看作是一个在苏联与俄罗斯政府之间协商达成新政治安排的过程。¹¹⁵对于俄罗斯民主反对派内部诸如谢尔盖·斯坦科维奇和盖夫里尔·波波夫等这样的温和派政治家而言,该计划代表着为苏联与俄罗斯政府之间向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协商性过渡提出了一个理想模式。¹¹⁶随着在其他方面的

过渡成功地达成协约,铁杆的激进派和保守派没有被邀请参与讨论。

这一过程本来可能大有希望,但是计划本身却不是这样。要在500天时间内瓦解苏联计划经济并代之以市场体制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俄罗斯激进派推出该计划,就是把它作为攫取俄罗斯主权的方法而不是为了追求市场改革。¹¹⁷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说法,激进的民主派是利用该计划挑起对抗,而不是调和矛盾。¹¹⁸同样,雷日科夫断言,俄罗斯一方在以逐步削弱雷日科夫为目的的500天计划问题上扩大了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该目的在雷日科夫离职时的1990年12月实现了。¹¹⁹据雷日科夫称,500天计划是一个与经济问题毫不相干的政治文件。

回顾起来发现,在这些协商妥协中的俄罗斯一方认同了雷日科夫的500天计划是一个政治文件的观点。根据亚夫林斯基所言,该计划从未以在500天之内完成向市场过渡为目的而进行设计。¹²⁰的确,该计划勾画的第一步是,需要在第一年开始启动向市场过渡。但是,叶利钦却以夸大苏联政府的保守主义为策略,公开宣称过渡可以在500天内完成。尽管不是在谈判桌上,但俄罗斯民主运动内部的激进派视计划的协商为另一个削弱苏联政权力量的方法。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在1990年9月就通过了该计划,正好是苏联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的谈判结束之前。仅仅经过了两天的讨论后,该计划就被通过了,这是一个即使对该计划的制定者来讲都不过是个口号性的政治行动,俄罗斯政府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它的实施问题。¹²¹参与该计划协商的人包括旧政权的妥协派和针对苏联政权的民主挑战派中的温和派,这些是协商性过渡所必不可少的角色(players)。但是,这两股力量并非仅有的有能力影响协商过程的角色,因为俄罗斯反对派运动内部的激进派(也许还包括叶利钦本人),以及仍然一直在苏联政权内部发挥着影响力的保守派,他们并没有被这些协商边缘化。相反,他们继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围绕500天计划的辩论很快演变成一种何方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向市场过渡的争议。俄罗斯民主派领导人指责苏联政府在激进经济改革上裹足不前。作为回应,苏联政府领导人特别是雷日科夫更加起劲地公开反对该计划,认为该计划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一个纯粹民粹主

义的计划。它不可能被实施,而且任何将它付诸实施的企图都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¹²²。1990年10月之后,戈尔巴乔夫最终同意了这一观点,尽管他的政府从来就没有勾画过一个全面的经济改革计划。在意识形态上,戈尔巴乔夫还是更接近雷日科夫和他的代表列奥尼德·阿巴尔金(Leonid Abalkin),而不是萨塔林和亚夫林斯基。鉴于俄罗斯方面公开讲到需要引进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还是支持阿巴尔金的观点,即“向市场过渡绝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相反,它意味着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品质和释放它在经济、社会及精神等各方面的潜能”¹²³。

戈尔巴乔夫也相信对其改革过程的最大威胁将来自右派——也就是来自保守势力*——而不是来自左派,那些人的主张比他自己还要来得激进。由于他相信保守势力比民主势力构成的威胁更大,戈尔巴乔夫更担心会疏远了右派,而对失去左派倒并不太怎么担心。1990年9月组织的一个相当不成功的支持500天计划的示威活动,给人们造成了民主派正在日薄西山的印象。结果,戈尔巴乔夫不再紧抱500天计划以及围绕它所进行的协商不放,而是召集了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比基延(Abel Aganbegyan)来起草另外一个可以将500天计划与雷日科夫最初的经济改革蓝图两者的部分内容加以合并的文件。叶利钦与他的盟友以及戈尔巴乔夫政府内的自由派,都将戈尔巴乔夫拒绝500天计划看作是他向右转的开始,是他被苏联政府内的保守派俘虏的开始。¹²⁴回顾过去,戈尔巴乔夫也承认关于计划的谈判破裂给制度改革带来了极端的后果:“苏联和俄罗斯领导层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关于市场改革计划的斗争所产生的一个代价。俄罗斯领导人把500天计划未被采纳这一事实当作支持推进迈向主权的俄罗斯运动的更充分论据。”¹²⁵

在500天计划问题上的协商显示了苏联和俄罗斯政府关于经济改革的立场并不是南辕北辙。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不像1917年俄罗斯最后的革命大动荡期间自由派和布尔什维克的差异。达成一个经济契约并非不可思议。然而,双方最终都相信他们拥有足够的力量从一系列的妥协中走出来,并通过其他方法实行他们自己的

* 原文如此。——校译者注

变迁议程。换句话说,界定模糊的权力平衡不是促进妥协,而是阻碍了协商。戈尔巴乔夫及其政府仍然相信,他们对苏联国家的控制使其有足够的权力不用同俄罗斯政府合作就可以实行经济政策。反过来,俄罗斯政府领导人认为,他们在俄罗斯共和国获得的广泛支持使他们能独立于苏联政府而实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当然,其中一方肯定是错的。在这些谈判破裂之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日益走向两极化。双方都改变了对彼此的评价,每一方都更相信对方对协商过渡不感兴趣。圆满进行协商过渡在此刻的失败,增加了将来进行协商尝试的障碍。在协商失败后,双方都对经济改革采取不合作的战略,由此提高了未来的协商成本。

维持苏联统一:第二个契约尝试

在苏联政权和俄罗斯反对派之间的高度两极化陷于僵局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种新的武器——全民公决——来加强挽救苏联的行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拒绝一起举行苏联全民公决。在哈萨克斯坦,努尔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苏联的支持者——改变了该问题的措辞。乌克兰则加进了主权问题。俄罗斯在全民公决时补充问了一个问题,即俄罗斯投票者是否赞成设立俄罗斯总统职位。这些共和国的挑衅行为歪曲了实际的成果,还模糊了对全民公决结果进行解释的努力。对该问题的解说也是与其本意相左的。在投票时,投票者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认为有必要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联邦,以充分保证全国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吗?”动词“保留”似乎与全新的联邦体制的概念相矛盾。这句话也暗示了如果全民公决通过的话,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就可能变成主权共和国。

在那些允许开展投票的共和国(其中包括俄罗斯),全民公决问题以无异议的大多数而获得通过。不过,公投的政治结果是不能使人信服的。一方面,参与投票的苏联公民中的大多数表达了保留联盟的倾向,这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协商一个新联盟条约的新权限。另一方面,几个共和国联手对选举的成功抵制又充分显示了苏联中央政府的衰弱。另外,对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的压倒一切的支持是对戈尔巴乔夫权力的又一次打

击。当时进行的一个民意调查证实，叶利钦受到广泛的支持，而戈尔巴乔夫则缺乏公众支持。¹²⁶三个月后，叶利钦在俄罗斯首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权力平衡的模糊性开始产生新的妥协动机。仅在公投后的几个星期，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的9个领导人签署了“9+1协定”。该文件宣称，所有签约者都同意重新协商一个新联盟条约以实现双重目的——强化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以及赋予苏联中央政府在防务、外交政策和加盟共和国间的贸易等方面的责任。该条约还讲到签约方将共同努力克服国家的经济危机，包括解决煤矿工人罢工的问题。“9+1协定”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自500天计划审议以来，这是苏联和俄罗斯政府第一次同意进行谈判。

戈尔巴乔夫做出再次同叶利钦进行谈判的决定，反映了他突然转向背离了政府和党内的保守派，这些保守派对苏联总统的批评正变得越来越严厉。当与民主反对派公开对抗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之时，戈尔巴乔夫却选择了同他的对手进行谈判，即使这意味着削弱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做出谈判决定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希望在他与那些呼吁他下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共内部的保守派进行的斗争时获得新的盟友。

叶利钦做出谈判的决定也反映了他背离了与所有苏联当局进行对抗的早期战略。他对谈判的新兴趣是被某种既强又弱的感觉所激发的。从强的方面来看，叶利钦及其顾问将“9+1协定”视作朝俄罗斯获得更大主权的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与此同时，叶利钦及其同盟认识到了保守势力的复苏。正如上面所详细讲到的那样，在1990—1991年的冬天，无论是在戈尔巴乔夫政府还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内部，随着一些保守派领导威胁要动用武力，权力中心已经明显开始向右转移。“联盟”领导人、陆军上校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明确指出要对联盟内部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采取强硬的解决办法，并指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没能恢复秩序。正如阿尔克斯尼斯在1991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讲道的：“悲剧在于戈尔巴乔夫憎恨运用暴力。正如他在军队党代会上讲的那样，‘我永远不会使用暴力。我拒绝考虑提前动用暴力’。这样的人能听从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诲，但是他却不能够从事政治。”¹²⁷针对这些保守派的日益强大，叶利

钦看来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方法来对付戈尔巴乔夫。正如后来的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麦特洛克(Jack Matlock)所叙述的那样,“在2月和3月,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任何协商看起来都根本不可能。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他们都没有对决心要把他们俩一起赶下台的日益强大的右翼力量置之不顾”¹²⁸。民主俄罗斯内部的温和派也推动与戈尔巴乔夫的谈判。实际上,由来自叶利钦方面的波波夫和来自戈尔巴乔夫方面的沙赫纳扎罗夫牵头,由院士奥利格·波瑟莫洛夫(Oleg Bosomolov)居间调停的一系列秘密协商几乎在同时进行。¹²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民主运动内部的温和派一致主张以波兰和匈牙利成功的权力协商为榜样建立一个俄罗斯圆桌会议。1991年春天,圆桌会议或联合政府的想法最终赢得了民主俄罗斯领导层大多人的支持。¹³⁰

然而,所有各方的极端主义者再次对协约及随后产生新联盟条约的谈判感到失望。在民主俄罗斯内部,一些政治领导人将条约看作是实现俄罗斯完全主权的一个障碍。即使是像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y Burbulis)这样的叶利钦的亲密助手,也对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的动机抱极度怀疑的态度。¹³¹苏联政权内的保守派对联盟条约的支持还不如他们的激进派对手。他们相信这样一个条约是瓦解苏联的蓝图。¹³²

尽管有着反对声,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谈判还在继续,并且到了8月,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将准备签署条约了。来自旧政权的改革者和来自民主运动的温和派之间的一个协商条约似乎马上就达成了。

八月政变

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时间定于1991年8月20日——这是一个条约的反对者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最后期限。正如卢基扬诺夫后来写的那样,最后起草的新联盟条约“实际上将苏维埃国家等同于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一个联邦。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¹³³。在卢基扬诺夫和其他保守派看来,保持苏联领土完整的唯一出路是在条约实施之前夺取权力。

在整个暴风雨即将来临、为发起突然政变做准备的12个月里,有很多情况暗示有可能会遭到来自高层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正如我们已经讨

论过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及政治局在1990年采取了断然的反动措施。1991年1月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以及1991年3月在莫斯科街头展示武力的行为告诉人们，这个新政府并不忌惮动用武力。在1990年12月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演说开场白中，苏联政府内部的自由派高级领导人警告说，保守派正在谋划通过使用武力的复辟行动。戈尔巴乔夫本人忽视了这些警告，他不愿意相信他自己的属下会背叛他。他在苏共四十年的经历告诉他，这种不顺从不可能发生在像苏联政权那样实行等级制、实际上是中央集权的体制中。

但是戈尔巴乔夫错了。当苏联总统在度假的时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于1991年8月19日宣布，他们已经担负起了统治国家的责任。他们声称戈尔巴乔夫病了，待其康复后他将重新负责紧急状态委员会。

八个苏联高层官员策划了这次政变——副总统、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首脑根纳季·亚纳耶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奥利格·巴克拉诺夫(Oleg Baklanov)、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农民联盟主席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Vasily Starodubstev)、苏联国家工业协会主席亚历山大·季贾科夫(Aleksandr Tizyakov)和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Dimitry Yazov)。尽管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但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苏共政治局委员奥利格·舍宁(Oleg Shenin)、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莱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也是策划这次阴谋的关键人物。换句话说，大多数政变领导人已经是苏联政府的成员，这就混淆了谁从谁那里夺权的界线。戈尔巴乔夫是唯一一个直接被剥夺权力的人，即使他的丧权被说成只是暂时的。¹³⁴

在宣布紧急状态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把反对那些旨在摧毁苏联国家和经济的“极端势力”和“政治冒险家”作为解释其行动的正当理由。他们发誓要抵制瓦解联盟的阴谋，并许诺要恢复法律与秩序。他们的言论充满了浓重的苏联民族主义味道。在莫斯科，坦克占据了靠近战略要点的地方，诸如国家电信大楼、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驻地——白宫。然而，这些士兵只进行了四次逮

捕行动,没有袭击建筑物,而且在第一天没有放过一枪。政变领导人本来做出决定,要以尽可能减少干扰国家日常事务的方式夺取权力。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密切注意合法程序。开始时曾计划召开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以便这个全国最高的国家选举机关能批准他们的行动。

叶利钦及其同盟旋即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违宪的。一听到政变消息时,叶利钦便冲进白宫,开始组织一个“国家的”——也即俄罗斯——抵制行动。令人惊讶的是,当俄罗斯总统从他在郊区的乡间别墅驾车前往莫斯科市区的白宫时,苏联当局并没有去阻止他。叶利钦的抵制战略是简单的。作为俄罗斯的民选总统,他号召俄罗斯公民——市民和军队——遵守他的法令而不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法令。正如叶利钦8月19日发布的一条法令所指出的: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苏联所有的行政机构,包括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领土上活动的苏联克格勃、苏联内务部、苏联国防部,开始直接听命于由人民选举的俄罗斯总统……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内务部、俄罗斯国家防务委员会,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上暂行苏联相应机构的功能。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内务部、克格勃和国防部的所有地方机构和其他机构都必须立即贯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部长会议的法令和命令,执行俄罗斯克格勃、俄罗斯国家防务委员会的命令……苏联所有的机构、官员和公民要采取紧急措施抵制执行违宪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和命令。¹³⁵

在俄罗斯,两个独立的政府都宣称对同一块领土拥有主权权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来批准叶利钦的法令。这种对政变领导人法令的合法取代,为军队司令提供了一个不执行法令的必要借口。一种双重主权的状况随之产生了。¹³⁶

如果说叶利钦是在白宫*策划抵制行动,那么,民主俄罗斯及其同盟则承担起了在莫斯科街头动员群众进行抵制的责任。¹³⁷仅仅在政变消息被发布后的几个小时,民主俄罗斯的活动家们很快就在白宫外结集起了

* 白宫是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所在地。——校译者注

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第二天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一次是在白宫，另外一次是在莫斯科市议会大楼，十多万莫斯科人公然对抗成批成批的红军。根据民主俄罗斯活动家的说法，他们要保卫两座大楼——白宫和莫斯科市议会大楼，这一事实对他们的抗议行动而言绝对是至关重要的。¹³⁸ 政变的反对者必须到某个地方去登记他们的反对意见。换句话说，如果政变发生在1990年选举之前，那么俄罗斯的民主派就不会有地方进行防卫和抵制，因此也就很可能已经消失了，或者很容易地被驱散了。

在白宫周围，来自军队内部忠于叶利钦的人最终组织了一支俄罗斯国家卫队。陆军上将科贝茨(General Kobets)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并被任命为临时国防部长。军人转身变为政治家，比如谢尔盖·尤申科夫(Sergei Yushenkov)，这位俄罗斯人民代表和民主俄罗斯领导人，他私下里走访了全莫斯科许多军队在职人员，敦促士兵们不要反对俄罗斯政府。¹³⁹ 到第一天结束时，一位来自著名的塔曼斯卡亚师(Tamanskaya Division)的坦克司令——他的军队就驻扎在白宫外——改变了他的效忠对象，并为叶利钦这一方带来了十辆坦克。苏维埃伞兵部队首脑帕维尔·格拉乔夫(Pavel Grachev)和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Evgeny Shaposhnikov)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命令，随后也站到了叶利钦这边。其他一些支持叶利钦的军队司令敦促他们手下的士兵——不管是老部下还是现部下——抵制政变。¹⁴⁰

然而，抵抗组织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相反，只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民主活动家公开动员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其他城市，民主活动家紧随地方领导人采取观望的态度。¹⁴¹ 只有三个地区的政府首脑公开站在叶利钦这边。同样，叶利钦的全国大罢工号召也没有得到响应。¹⁴² 在整个俄罗斯，地区领导人之间支持和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均势格局看起来是有利于苏联政府的。¹⁴³

然而，公众抵制行动在莫斯科的集中展现，已经对事件的过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如盖达尔所写到的，政变发动者“没有尊重他们自己的人民，尤其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我知道在那些主张动用武力的人当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神话，即所有的民主人士是天然的胆小鬼”¹⁴⁴。在对民

主力量作出这样评价的情况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动员起来的群众震惊了,这显示,这些苏联政府官员已经变得多么脱离俄罗斯新的政治现实。¹⁴⁵ 两极化不仅渗透到俄罗斯议会,而且还渗透到军队、克格勃乃至整个社会。当一个组织化的反对派——而不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自鸣得意且实行恐怖统治的社会——对政变企图做出回应的时候,俄罗斯人,尤其是身着制服的俄罗斯人,发现他们自己有了一个要支持谁的选择。大多数人持旁观者立场,但那些做出了真实决定的人则与叶利钦站在了一起。

意味深长的是,并没有出现大众动员来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情况。然而,断然反抗的表现对政变领导人的决心形成了挑战,代总统亚纳耶夫在国家电视台宣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计划时那双紧张颤抖的手,就极为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许多战术和逻辑上的失误——例如,没有逮捕叶利钦以及没有马上占领白宫——说明他们并没有进行周密的计划。到第三天,在更多军队高层领导人背叛之后,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们走了一步险棋,派出一个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飞往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福罗斯(Foros)的避暑山庄——戈尔巴乔夫就是在那里被就地软禁起来的,请他回去担任他们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几个小时后,俄罗斯总理伊凡·斯拉耶夫(Ivan Slyayev)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率领的白宫代表团,抵达福罗斯来解救戈尔巴乔夫。那时正在福罗斯的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和白宫代表团一起飞回莫斯科,他在机场被逮捕了。自那以后不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就开始谈判来结束他们的统治。

整个1991年,俄罗斯政治在苏联政权和俄罗斯民主反对派之间出现了极化。在整段时期,两个阵营有好几次几乎就要协商出一系列新的政治规则。然而,就在签署最后的协约安排的前夕,苏联政权内的保守派背弃了谈判协定,反而选择了通过武力来追求他们的政治目标。三天后,保守派阵营瓦解了。从该阵营瓦解开始,那些中间派——首先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变成边缘化的政治角色,即便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¹⁴⁶

结 论

在戈尔巴乔夫掌权第一年的 1985 年,他开始通过进行微小的经济改革来小修小补苏联体系的制度。到他掌权的最后一年,戈尔巴乔夫才发动了事实上影响到苏联政治和经济体系方方面面的根本性变革。苏联领导人不再自上而下地控制变迁过程,相反,他不得不对那些要求对苏联制度秩序进行更快、更激进变革的独立力量做出回应。最终,他失去对变迁过程的控制,同时发现自己要回应其他行为体的利益和权力要求。戈尔巴乔夫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独裁者变成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最初改革苏联政治制度的设计以该体系的彻底崩溃而告终呢?

争议的变迁议程

戈尔巴乔夫开始就任总书记时并没有以摧毁苏联政治制度为目的。戈尔巴乔夫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经济改革而开始的。当改革遇到障碍时,他就开始放松对政治制度的管制,以此作为进一步激励经济改革的手段。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相信他不得不通过政治自由化来削弱苏共对苏维埃国家的控制,以此刺激经济活动的自主性。在选择同时实行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的战略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允许——起初他还积极提倡——建立新的政治组织。同样的制度变迁在激励新政治行为体产生的同时,也增强了苏联体系内旧行为体的自主性。随行为体的增多而来的是对戈尔巴乔夫最初改革议程的不同态度。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走得太远了;另外一些人则说他走得还不够远。还有一些人坚信他所关注的完全文不对题。只在几年时间里,新行为体和新偏好的激增极大地扩大了争议中的变迁议程。

到 1991 年,三个中心问题主导着争议中的变迁议程。国家的边界在哪里?苏联应该具有什么类型的经济体制?应以何种规则来组织政治?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早期,针对所有这些问题,总书记有着自上而下的说一不二的回答,这正是苏联体系的一种惯例。但是,到了1991年,俄罗斯(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刚刚形成的反对力量就变迁议程问题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大多数人站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对立面。他们的观点大大地扩展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再设计的可能边界。戈尔巴乔夫想通过引进一些市场机制来改革社会主义,叶利钦及其同盟则主张推进全面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想改革苏维埃联盟,叶利钦和他那帮人则主张要摧毁苏联。最终,这一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几年里掩盖了其他所有问题,阻碍了其他领域的进展,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改革。¹⁴⁷甚至在政治改革问题方面,俄罗斯激进派也超越了戈尔巴乔夫。令人吃惊的是,直到苏联垮台,戈尔巴乔夫都从来没有竞选过民选职位,反而是叶利钦已经赢得了三次选举的胜利。

回过头去看,戈尔巴乔夫政府的立场与叶利钦及其支持者提出的变迁议程之间的区别,似乎是不可逾越的,这使得对抗看起来不可避免。然而,在当时,对抗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明显。协商、妥协及协商式过渡似乎是可能的,曾经也是大家所积极追求的。正如在关于500天计划的协商期间所显示的,苏联旧政权中的妥协派与俄罗斯反对派中的温和派之间意识形态立场并非相隔甚远,联盟条约商议期间更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其他伟大的革命性转型中,比如法国大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中国革命,旧政权领导人和革命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似乎要比苏联改革者(如戈尔巴乔夫)与民主反对派领导者(如斯坦科维奇、索布恰克甚至叶利钦)之间的分歧要大得多。

像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民主反对派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分歧一样,变迁议程的范围也使得协商变得很艰难。早先发生在拉丁美洲和南欧的权威主义统治的转轨中,变迁议程被严格限定于重新协商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在过渡期间,经济制度的类型和有关国家边界的界定,通常是不被作为争辩的议题而摆上谈判桌的。然而,苏联的案例则不一样。这两个问题被同时摆上了议程。问题的激增使协商变得很艰难,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为这个宽泛的变迁议程形成一个协商程序存在着组织上的困难。协商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吗?哪一项议题应该首先加以解决呢?

谁应该参与协商过程呢？旧的制度在回答这类问题上不能提供什么指导，因为这些旧制度现在本身就处于争议之中。剧中的角色没有从过去的实践中总结出什么指导原则或约束性条件以便构造协商。

此外，宽泛的议程使行为体很难知道他们自己的偏好，更不用说知道他们对手的偏好了。在1991年8月政变企图的两年前，俄罗斯没有一个主要的政治群体清楚地表达过主张独立或赞成资本主义的立场。然而，到了1991年夏天，这些立场得到了重要行为体的支持。是否真的如此呢？尽管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曾详细阐述过摧毁苏联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他们极少费心去阐明建立何种制度来取代旧秩序。围绕新议题的变迁步伐使政治行为体难以弄清他们自己的立场，这就加剧了每个人在把握其他每个人的偏好方面的不确定程度。时间因素也不利于清晰偏好的交流：缺乏一个持续协商的时期，而只有相当短暂的接触，接着而来的就是苏联政府和俄罗斯反对派之间夸大其词的诘难和攻击。

在这整个混乱时期，也很难判断人民的偏好，这意味着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们对人民所委托的内容是不确定的。例如，在协商500天计划期间，大多数苏联公民支持市场改革，但是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提倡采取渐进式的方法。¹⁴⁸因此，是谁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呢？是叶利钦这边还是戈尔巴乔夫那边？同样，公众对新联盟条约的支持也难以确定，因为绝大多数人就在谈判前的数周投票赞成维持联盟。因此，在新联盟条约的谈判中到底谁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是叶利钦还是戈尔巴乔夫？

一个巨大变迁议程的大杂烩，对议程的偏好缺乏界定，关于公众的偏好又缺乏信息，这些情况都损害了公信力，阻碍了苏联—俄罗斯的过渡过程中战略角色之间的协商谈判。在稳定的前提下，制度把那些卷入特定战略环境下的人的偏好信息提供给政治行为体。然而，在苏联后期，苏联政权的几乎每一个制度安排都存在着问题，这给形成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余地。缺乏持续的协商谈判也限制了对立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在行为体关于扩大的改革议程的偏好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对立双方倾向于对敌人作最坏的评价。

然而，混乱状态还不能充分解释苏联的崩溃。复杂的变迁议程使新

规则的协商变得困难重重,但并非绝无可能。最终,是自觉的“不妥协的决定”产生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后一幕。变迁议程的模糊性在这一决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91年夏天,苏联政府内的保守派认为俄罗斯反对派有意用一切必要的手段破坏苏联国家。以这种判断为基础,那些决心维护旧政权的人视新联盟条约的协商为一种达到瓦解苏联这个目的的手段。结果,他们采取行动阻止协商的进行。他们对反对派偏好的判断是否正确,尚存一些疑问,但这一判断成为他们采取行动的动机却是清晰无疑的。

如果苏联政府内的保守派认为他们没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话,他们就不会采取行动。浪漫的狂热分子不是用来描述发起政变的老官僚的术语。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动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就需要用到第二个因素来解释,这就是对权力平衡的理解。

模糊的权力平衡

1991年,在支持与反对变革的力量之间出现了僵局。在第一章讨论到的有关民主化的文献中,僵局被誉为是一种妥协的有利条件。然而,在本案例中,僵局最终没能导致妥协,也没能为协商性过渡创造条件。相反,僵局最终助长了挑战者与被挑战者之间以及1991年8月突然冒出的多个主权之间对话的中断,导致了非武力不能解决以及一方战胜另一方的革命情势。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最后一年中,僵局像在其他转型(案例)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发挥了作用。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意就共同的一揽子经济改革问题进行协商,因为双方都相信(尽管很短暂)没有对方的合作就不能完成自身的改革议程。回顾那个时代,分析家都认定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叶利钦和改革者,但当时他们的优势不是很明显。相反,各方似乎势均力敌。在没有任何一方拥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走向合作。叶利钦和改革者们认识到,没有与诸如中央银行等苏联制度的合作,他们便不可能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而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则认识到,俄罗斯政府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政治行为体。但当他们对彼此宣称的真实目的产生怀疑之后(这是对彼此偏好的信息

掌握不够充分的结果),这些协商便开始崩溃了。对双方来讲,对彼此之间相对均等的权力平衡的理解,刺激了最初的合作冲动。然而,对权力平衡的同样评估也使双方都偏离了协商,因为双方都可能继续认为,他们不会单方面地被另一方摧毁。

1991年春,僵局再次产生了协商的新推力。1991年3月全民投票的总体结果让双方都宣称获得了胜利,但是也强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哪一方拥有压倒性的民众支持。武装部队出现于1991年3月的莫斯科大街上也提醒了双方,持续的对抗战略将最终燃起内战的战火。从那以后不久,关于新联盟条约的谈判产生了真正的妥协文件,双方似乎都准备遵守。对所有参与谈判的各方而言,这些用于调整中央政府—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新游戏规则看来好像是对社会现状的改进。

然而,某一群政治行为体——戈尔巴乔夫政府内部的保守派——并没有将联盟条约看作是对现存秩序的改进,而把它看作是对苏联国家完整的一个威胁。他们采取行动来阻止新条约的签署和执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这么做。毕竟,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和克格勃主席在1991年8月支持他们的紧急法令。在政变领导人的眼里,其对手民主俄罗斯及其盟友是一群既笨又嫩的乌合之众。尽管这些民主力量擅于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但他们并未控制军队,也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而且只受到少数俄罗斯民众的支持。

政变领导人低估了民主派的力量及其获得的公众支持。¹⁴⁹对不掌握军队但有群众基础的组织的力量进行精确估算,比对拥有军队的精英力量的估算要难得多。在整个1991年,苏联政府内的保守派在对付反对派时追求零和战略。1991年的冬春,戈尔巴乔夫支持这一方法。然而,当戈尔巴乔夫就重组苏维埃联盟问题突然开始同反对派谈判的时候,这些保守派决定检验他们对权力平衡的假设,并力图动用武力来恢复旧的制度秩序。

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反党派力量有能力阻挠政变企图。我们现在还知道不可能动员公众来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¹⁵⁰正如杜布森(Dobson)和格兰特(Grant)经过广泛的调研后所写的那样:“如果图谋者能对公众舆论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的话,那么,政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¹⁵¹

然而,在当时,倒是反对派内部对其自身的力量和信心存有真正的怀疑。民主反对派自己对权力平衡的模糊评判,使他们在关于过渡的谈判中成为一个难以预料的参与者。在戈尔巴乔夫1991年1月向右转之后,俄罗斯民主运动内部的许多人相信是到了谈判协商而不是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当时,叶利钦正在为保住人代会主席的位置而斗争。在民主俄罗斯内部,经常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连同党派的激增,威胁到尚未定型的运动的统一。

考虑到关于俄罗斯反对派能力的这些不确定性,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相信能够通过展示武力而牢牢控制住这个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一特别的战略形势下,权力平衡的不确定性鼓励了武力行为。

对抗性过渡模型的后果

动用武力的决定破坏了先前所有的通过协商谈判过渡到新的政治秩序的承诺。苏联—俄罗斯的过渡模型——对抗性的而非协商性的,革命性的而非进化性的——导致了过渡过程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一点要比大多数其他的向民主过渡的模式来得严重,比如早先发生在拉美、南欧甚至东欧的过渡。在所有这些地区的过渡期间,政治制度的连贯性是不确定的。然而,协商性的过渡要比非协议性的、对抗的转型更具有可预见性,因为在政体调和更大范围的竞争之前,政治制度的基本功能和边界往往是在旧的统治者和新的民主挑战者之间协商确定、详细阐述并最后被编纂成法典的。如果在任的威权主义政权依然相对团结而强大,那么它就会把很多过渡的条款强加给其他政治行为体。¹⁵² 在那些即将离职的政权不是很强大的国家中,通常会达成协约。¹⁵³ 一般而言,温和派会寻求反对派内部持合作态度的稳健派以形成“最起码秩序的谅解(first-order understanding)——最终达成契约的基础”¹⁵⁴。通常,过渡时刻发生的协议中断制约了过渡之后的制度选择。¹⁵⁵

然而,在苏联—俄罗斯的过渡中,并不存在经过协商产生的、勾画从旧到新转型的路径的规则。某一方只是在八月政变之后高度不确定的意外时刻从另一方夺取权力而已。八月政变的失败似乎使支持和反对激进变革的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清晰化了,同时给俄罗斯反对派势力一

种拥有压过其政治对手的权力和优势的感觉。这种认识使俄罗斯这些新领导人有胆量实施不与其敌人谈判的政策。同时,由于几乎每一个制度安排都服从于(再)协商,因此,1991年8月的胜利者在实施其政策议程时依然面临着高度未成型的政治环境。俄罗斯新政体的游戏规则是模糊的、不成文的和易受操纵的——这对巩固新政治秩序来说是极为不祥的。

注 释

1. 这里所采用的制度(规则)与组织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来自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2. 关于机会结构中的变化如何引发社会运动的形成,参见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Steven Solnick, *Stealing the State: Control and Collapse in Soviet Institu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Neformali*, 即“非正式”(the informals),这是一个用来描述这些政治组织的术语,以区别于那些共产党“正式的”政治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参见 *Neformal'naya Rossiya* (Moscow: Molodaya Gvardiya, 1990); and *Neformali: Ktooni? Kuda zovut?* (Moscow: Politicheskaya Literatura, 1990)。

5. 参见作者与鲍里斯·卡加利茨基于1991年4月的访谈;以及与米哈伊尔·马柳金于1991年5月的访谈。

6. 参见作者与奥利格·鲁米扬茨耶夫的访谈,收录于 Micheal McFaul and Sergei Markov, *The Troubled 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Parties, Personalities, and Program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3), 86—99; 以及 Aleksandr, Sungurov, “Leningradskiy mezhpofessional'nyi klub ‘perestroika’ (1987—1990),” manuscript, St. Petersburg, 1992。

7. Michael Urban, with Vyacheslav Igrunov and Sergei Mitrokhin, *The Rebirth of Politics in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98。

8. 在整部书中,“自由”(liberal)一词是用在传统欧洲意义之上的,而不是美国意义之上的。

9. Katheen Smith, *Remembering Stalin's Victims: Popular Memory and the End of the USS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参见 Geoffrey Hoskings,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 3; 以及 Jane Dawson, *Eco-Nationalism*;

Anti-Nuclear Acti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Lithuania, and Ukraine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正如维特利·科洛迪奇于1998年10月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想让记者获得自由,但是不让他们捣乱。

12. 转引自 Vladimir Brovkin, "Revolution from below: Informal Political Associations in Russia 1988—1989," *Soviet Studies* 42 (1990): 239。

13. 参见作者与“民主联盟”活动家尤里·斯库布科(Yuri Skubko)于1990年6月的访谈。

14. *Demokraticeskii Soyuz: Byulliten'soveta Partii*, April 1990 (Moscow), 2: 6—12。

15. 关于细节问题,参见作者与维克多·库申(Viktor Kuzin)的访谈,收录于 McFaul and Markov, *Troubled 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26—40。

16. Leonti Byzov, Leonid Gordon, and Igor Mintusov, "Reflection of Socialists on the Political Reforms," *Soviet Sociology* 30 (1991): 29—30。这篇文章首次出现于 *Robochii klass i sovremenyi mir* 1 (1990)。

17. 例如,参见瓦西列夫(Vasiliev)的强硬反共言论,见于1988年11月3日在“国家爱国者阵线”(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Pamyat')以“领袖的威望”(“Avtoritet vozhdya”)为题的宣言中。收录于 *Partii, assotsiatsii, soyuzy, kluby: Sbornik materialov*, vol. 5 (Moscow: Rossiisko-Amerikan-skii Universitet, 1992), 101—104。

18. Pamyat' 不是一个组织,但却拥有一些派别和分支机构。参见瓦西列夫与麦克福尔和马科夫的座谈, McFaul and Markov, *Troubled 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46—60。

19. Ilya Kudryavtsev, "Bataliya pod 'Brestom,'" *Khronograf* 26, May 24, 1989, 2, 6。

20. 在此前一年,鲍里斯·叶利钦已经从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成为了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的会议上,他代表了最多数的激进派和独立派势力。相反地,叶戈尔·利加乔夫则是政治局中保守派集团的高级成员。参见 Timothy Colton, "Moscow Politics and the El'tsin Affair," *Harri-man Institute Forum* 1 (June 1988); 以及叶利钦个人的讲述, Boris Yeltsin, *Against the Grain*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177—210。

21. Boris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A soviet Chronicle* (London: Verso, 1990), 21。

22. 与此同时,俄罗斯一些非正式运动的领导人前往波罗的海国家学习有关组织和出版技术。最后,一个紧密的反共产主义跨国共同体在波罗的海国家、包括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形成。参见作者与时任《觉醒》(*Atmoda*)的编辑、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夫(Alex Grigorievs)的

访谈。

23. 关于“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争议既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又是具有战术性质的。公社(Obshchina)的领导人安德烈·阿塞耶夫(Andrei Asaev)和公民尊严(Civil Dignity)的领导人维克多·佐罗塔耶夫(Viktor Zolotarev)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而在行动上他们则像鲍里斯·卡加里茨基认为的那样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像来自民主改革(Democratic Perestroika)的实用主义者奥利格·卢米扬特耶夫(Oleg Rumyantev)则在阵线的文件中支持社会主义的言辞以安抚共产主义的权威。参见作者与鲍里斯·卡加里茨基、来自公社的亚历山大·苏宾(Alexander Shubin)及维克多·佐罗塔耶夫在1991年春天的访谈。也可参见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9—11; 以及 Vyacheslav Igrunov, “Public Movements: From Protest to Political Self-Consciousness,” in *After Perestroika: Democracy in the Soviet Union*, ed. Brad Roberts and Nina Belyaeva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Studies, 1991), 22—24。

24. “Khartiya MNF,” *Grazhdanskii Referendum* 1 (Fall 1989): 2.

25. 参见对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奥罗夫(V. P. Orlov)的采访, *Sovetskaya Rossiya*, March 14, 1989, 1; V. A. Kryazhkov, “Sostoyazatel’nost’ kandidatov v deputaty,” *Sovetskoe Gosudrstvo i Pravo* 6 (1990): 40。

26. 来自苏联科学院候选人的提名被证明特别具有爆炸性,并因此导致后来的社会动员。在提名的第一阶段,130个申请者中有121位提前成为候选人。来自这个团体的23个候选人是在第一次会议时被选出,其他7个席位在随后几天确定。尽管超过50个学术机构提名了人权活动家和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但是科学院的主席团仍然没有将他的名单列入先期的23人名单之中,这激起了科学院的愤怒。为了表示抗议,支持萨哈罗夫的院士力促他们的同事不要把票投给那些名单上的候选人,因为他们需要至少50张选票才能当选。如果15个候选人没有达到超过半数的支持,那么就将进行有萨哈罗夫参加的第二轮选举,这样他就很容易获胜。萨哈罗夫的提名程序使得许多学者被政治化了,而稍后这些人在随后的俄罗斯民主化运动中成了领导人。

27. 盖夫里尔·波波夫当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最为全面的观念上的批判。参见 Gavriil Popov, *Blesk i nishcheta administrativenoi systemy* (Moscow: PIK, 1990)。

28. Boris Yelsin, *Ispoved’ na zadannuyu temu* (Vilnius: INPA, 1990)。

29. 参见作者与米哈伊尔·施耐德(Mikhail Shneider)在1996年9月的访谈。

30. Ligachev,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91.

31. Nikolai Ryzhkov,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ne-August, 1992, 166. 当然,“Senior Party Official”这个词可以从很多不同方面进行解释。霍夫更是指出,在

55 个党的地区第一书记中有 21 个被击败了。参见 Jerry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1985—1991*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165.

32. Vitaly Vorotnikov, *A bylo eto tak: Iz dnevnika chlena Polituro TCK KPSS* (Moscow: Soviet Veteranov Knigoizdaniya SI-MAR, 1995), 254.

33. Georgy Shakhnazarov, *Tseni Svobody; Reformatsiya Gorbacheva glazami ego pomoshchnika* (Moscow: Rossika Zevs, 1993), 75.

34. 参见作者在 1995 年 7 月 4 日对阿纳托利·沙贝德 (Anatoly Shabad) 的访谈, 以及 1995 年 5 月对亚历山大·索布亚宁 (Aleksandr Sobyanin) 的访谈。这两人都是帮助组织地区间集团的干将, 同时与安德烈·萨哈罗夫有着密切的联系。

35. Vera Tolz, *The USSR's Emerging Multiparty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90), 74.

36. 参见作者与地区间代表团的代表亚历山大·敏竹仁科 (Aleksandr Minzhurenko) 于 1995 年 5 月 12 日以及与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 (Ilya Zaslavsky) 于 1995 年 7 月 14 日的访谈。

37. 参见作者对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于 1995 年 7 月 10 日的访谈。

38. 参见对地区间集团成员加利纳·萨塔罗夫多娃 (Galina Starovoitova) 的访谈, 收录于 “Political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Moscow News* 41 (October 21—30, 1990): 12.

39. 参见与扎斯拉夫斯基 (Zaslavsky) 的访谈。

40. 参见 “Luzhniki, Ekho S'ezda,” *Moskovskie Novosti* 24, June 11, 1989, 14.

41. 最高苏维埃是由更大一些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尽管代表大会是在一个特别的基础上产生的, 但是, 最高苏维埃还是在苏联政府中通常扮演了一个立法机构的角色。

42. Ryzhkov, interview, 188.

43. Ibid., 189. 同时参见作者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 1995 年 8 月 9 日的访谈。

44. Boris Kagarlitsk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Monolith* (London: Verso, 1992), 63.

45. *Vestnik rabocheho dvizheniya* 3 (November 1989): 1.

46. 参见作者于 1995 年 6 月与民主俄罗斯竞选组织者弗拉基米尔·波克瑟的访谈。

47. N. A. Mikhaileva and L. A. Moroza, “Reforma respublikanskogo izbiratel'nogo zakonodatel'stva,”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6 (1990): 34.

48. 参见对纪念社活动家弗拉基米尔·李森科 (Vladimir Lysenko) 的采访, 收录于 *Put'*, February 25, 1990, 4.

49. 参见作者与 MOI 领导人米哈伊·谢伊德 (Mikhail Sheider) 于 1995 年 5

月的访谈。

50. Vladimir Pribilovsky, "Moskovskoe ob'edinennie izbiratelei (MOI)," *mimoe*, 1990.

51. 参见作者与伊利亚·康斯坦汀诺夫于1995年5月27日和6月8日的访谈。

52. Yuri Gladish, "Den' rozhdeniya vesni," *Demokraticheskaya Platforma* 3, June 1990, 1.

53. Mikhaleva and Moroza, "Reforma respublikanskogo inbiratel'nogo zakonodatel'stva," 38.

54. "Informatsionnoe soobshchenie o pervom s'ezde OFT," *Chto Delat'?* 3 (1989); 1.

55. "Nasha pozitsiya," *Chto Delat'?* 1 (1989); 1.

56. Aleksandr Sobyenin and Dimitry Yur'ev, *S'ezd narodnykh deputatov RSFSR v zerkale poimennykh golosovaniy* (Moscow, 1991).

57. 参见作者与民主论坛(Democratic Platform)的组织者弗拉基米尔·李森科于1991年5月的访谈。

58. "Sozdamim demokraticheskuyu platformu v KPSS," *Obrashchenie Moskovskogo Partkluba "Kommunisti za Perestroiku"* (Moscow, n. d.).

59. 参见苏联人民代表阿卡迪·姆拉谢夫(Arkady Murashev)在民主论坛成立大会上的观点,收录于 *Demokraticheskaya Platforma* 2 (April 1990): 6。

60. Vladimir Lysenko, "Yest' takaya partiya?" *Demokraticheskaya Platforma* 2 (April 1990); 2.

61. Aleksandr Mekhanik, "Raskol KPSS: Katastrofia ili blago?" *Demokraticheskaya Platform* 3 (June 1990); 1.

62. 参见作者与当时的民主纲领派领导人伊格尔·丘拜斯于1991年6月6日的访谈。

63. 参见作者与阿纳托利·契尔年耶夫于1995年6月20日的访谈。

64. 在回忆中,雅科夫列夫承认,党在第28次会议上没有发生分裂是他的失误。他坦承那是一个建立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好机会,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雅科夫列夫让“(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忠诚妨碍了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样行动”。参见与雅科夫列夫的访谈。

65. Vorotnikov, *A bylo eto tak*, 253.

66. *Ibid.*, 348. 事后回顾,前政治局委员瓦丁·米弗德夫(Vadim Mevedev)也认为没有让更多热衷的候选人进入俄罗斯议会是一个战略错误。参见作者与米弗德夫于1998年7月的访谈。

67. 参见作者与沃洛特尼科夫于1992年6月的访谈。

68. 引自 Graeme Gill, *The Collapse of the single-Party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5。

69. 参见作者与民主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波克瑟于1995年5月27日的访谈。

70. 在第一届议会的预备会议中,民主俄罗斯组织者估计有35%的代表是坚定的支持者,而其他20%的代表是温和的支持者。参见作者与索布亚宁的访谈。也可以参见 Sobyenin and Yur'ev, *S'ezd narodnykh deputatov RSFSR*; and Dawn Mann, "The RSFSR Election: The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Report on the USSR*, April 13, 1990, 11—17。

71. Thomas Remington, "Introductio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in *Parliaments in Transition: The new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the Former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ed. Thomas Remingt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3。

72. 参见 U.S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Report on the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Elections in the Russian Republic* (Washington, D. C.: March 28, 1990), 18; 以及 John Dunlop, "Moscow Voters Reject Conservative Coalition," *Report on the USSR 2* (April, 20, 1990): 15—17。

73. 这一时期并没有多少关于投票者偏好的投票数据。仅存的少量数据表明,1990年的选举是对执政党失信和腐败的抗议。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75%的俄罗斯选民认为诚实和公正是候选人最重要的标准,63%的人认为“高层次的文化”很重要,61%的选民认为候选人的教育水平是重要的。诸如新政治思维(39%)和企业家身份(27%)等方面的标准则是次要的。参见 Mikhaleva and Moroza, "Reforma respublikanskogo izbiratel'nogo zakonodatel'stva," 37。

74. Vorotnikov, *Abylo eto tak*, 378。

75. 参见作者与民主俄罗斯在议会中的领导人列夫·波诺马列夫(Lev Ponomarev)和格里布·雅胡宁(Gleb Yahunin)在1995年7月的访谈。波诺马列夫沮丧地表示,无论俄罗斯的公众还是西方都没有正视他们在议会中的弱势地位,因而双方在改革中对于他们期望过高。

76. 参见作者与俄罗斯联邦人代会代表阿纳托利·沙贝德(Anatoly Shabad)在1995年7月4日的访谈,以及与民主俄罗斯执行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波克瑟在2001年1月24日的访谈。

77. 参见维克多·谢尼斯(Viktor Sheinis)1990年5月的评论,收录于 John Dunlop, *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95—96。

78. 鲍里斯·叶利钦于1990年5月22日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收录于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The Soviet System: From Crisis to Collapse*, rev.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410。

79. 民主俄罗斯一些领导人诸如尼古拉·特夫金、维克多·阿克修切茨(Vik-

tor Aksiuchits)及米哈伊尔·阿斯塔费耶夫(Mikhail Astafiev)希望保留联盟。一些激进的领导人诸如尤里·阿法纳斯耶夫、盖夫里尔·波波夫及加林娜·萨塔罗瓦多娃不仅将苏联的崩溃视为不可避免的事件,而且将俄罗斯联邦的分裂看作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参见 Popov's speech in *Materiali: II s'ezda dvizheniya Demokraticheskoi Rossii* (Moscow: DR-Press, November 1991)。

80. Yegor Gaidar, *Dni porazhenii i pobed* (Moscow: Vagrius, 1996), 61.

81. Crane Brinton,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93); Youssef Cohen, *Radicals, Reformers, and Reactionaries: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he Collapse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82. 这种观察是基于作者当时与俄罗斯民主运动领导人之间多次的会谈和讨论之上的。

83. 对这种认同的精彩讨论,参见 M. Steven Fish, *Democracy from Scratch: Opposition and Regime in the New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84. Mikhail Gorbachev,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584.

85. 参见作者与维克多·埃尔克斯尼斯于1991年6月的访谈。

86. "New Arms for the Army! Ban the CPSU!",对陆军上校维克多·埃尔克斯尼斯的访谈, *Moscow News* 6 (February 10—17, 1991): 7.

87. 1991年1月,作者聆听了在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总部的一个演说。硕大的礼堂拥挤得难有容身之处,陆军上校每说出一句话都会招来热烈的掌声。

88. 参见普罗汉诺夫,引自 *Moscow News* 47 (December 2—9, 1990): 7.

89. Vladimir Todres, "Soyuz gosudarstvennogo spaseniya," *Nezavisimaya Gazeta*, March 2, 1991, 2.

90. 例如,参见由俄罗斯共产党伊万·博洛兹科夫在俄共和苏共的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批评性评价,引自 *Pravda*, February 4, 1991, 1.

91. 在一次与作者的访谈(1998年7月)中,政治局委员瓦丁·梅德维捷夫(Vadim Medvedev)把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看作是那些希望看到保持苏联的部分保守派在战术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92. 参见作者于1991年6月至7月间与民主俄罗斯联合主席列夫·波诺马列夫、格里布·亚库宁(Gleb Yakunin)和维克多·季米特里耶夫(Viktor Dmitriev)的访谈;亦可参见作者于1991年1月12—13日在莫斯科瓦(Moskva)宾馆举行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共和党联席会议上的笔记。

93. Sergei Stankevich, "The USSR's Protracted Crisis," *Journal of Democracy* 2 (1991): 56.

94. "Zayavlenie dvizheniya 'Demokraticheskaya Rossiya' o polozhenii v

pribaltike,” mimeo, 未标注日期,但在1991年1月开始流传。

95. 关于细节,参见“Orgkomiteta po sozdaniyu dvizheniya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Soobshchenie* 3(1990)。

96. 参见“Protsess polyarizatsii zavershyon,” *Dvizhenie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Informatsionnii Byulliten’* 3(February 1991): 1。

97. “Obrashchenie predstavitelei rabochykh komitetov i nezavisimogo prof-soyuza gornyakov(NPG) k grazhdanam strany,” mimeo, 未标注日期,但在1991年3月开始传播。

98. 参见作者与阿纳托利·马利恒于1991年4月的访谈。

99. “Pomosh’ Moskvi,” *Kuranti*, March 13, 1991, 2。

100. Pavel Shushpanov(矿工独立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和 Anatoly Malykhin(地区间工人协调委员会的罢工委员会主席),“Obrashenie nezavisimogo prof-soyuza gornyakov i mezhereginonal’nogo koordinatsionnogo soveta rabochikh komitetov k verkhovnym sovetam, pravitel’svam i narodnym dvizheniyam suverennykh respublik,” 未标注日期,但在1991年3月底开始传播。

101. 在他的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声称,那些军队是用来保护人代会免受民粹主义者对克里姆林宫的攻击。参见 Gorbachev, *Memoirs*, 587。

102. 作者目睹了这种暴力的景象及民主俄罗斯的示威游行。这一叙述是根据作者本人的记录。

103. 参见作者与民主俄罗斯联合主席列夫·波诺马尔耶夫在1991年4月15日的访谈。

104. 引自塔斯社1991年4月10日,收录于 *FBIS-SOV-91-069*, April 10, 1991, 62。

105. 叶利钦最后通过由俄罗斯联邦而不是苏联来接手煤矿工人福利的责任而协商解决了罢工问题。这一办法是9+1协定的一部分。在1991年6月与作者的访谈中,根据当时的“矿工独立联盟”领导人帕维尔·休斯帕诺夫(Pavel Shushpanov)的观点,矿工们都不相信这样的协议能最终解决问题。根据他的回顾,矿工们认为,由于在没有达到他们原来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情况下而同意了停止罢工,因此,他们只是叶利钦同苏联政府谈判的一个筹码。在9+1协定签字和结束罢工仅过了几个月,NGP(俄罗斯的矿工独立联盟)就威胁要针对叶利钦政府再次进行罢工。参见 Vladimir Sharipov, “Obrashchenie, sovet predstavitelei NPG Kuzbassa,” (Kemerova) December 12, 1991。

106.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尼古拉·恩格沃(Nikolai Engver)的观点,引自 John Morrison, *Boris Yeltsin: From Bolshevik to Democrat* (New York: Dutton, 1991), 239。

107.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Structural Change*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2), 7。

108. 引自 Jack Matlock, *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502.

109. 相反的事情可能也会是真的。假如俄罗斯保留在联盟中,那么其他加盟共和国要成为独立国家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110. 雷日科夫于1990年5月宣布放开物价的计划,但在年底他辞职之前仍旧无法执行。在他的回忆中,雷日科夫指出,价格改革的失败是他的政府最大的错误。参见 Nikolai Ryzhkov, *Dsyat' let velikikh potryaseni* (Moscow: KPM, 1995), 249.

111. 1990年,亚夫林斯基实际上是为政府中雷日科夫的副手阿巴尔金(Abalkin)工作。在阿巴尔金的计划被修改得越来越保守的时候,亚夫林斯基则在心中悄悄地谋划自己的方案。那年4月,亚夫林斯基在日本呆了三个星期。回国之后,他发现他的计划已经被苏联人民代表根纳季·费尔辛(Gennady Filshin)“偷”走了,而且被俄罗斯人民代表米哈伊尔·波查洛夫(Mikhail Bocharov)用来竞选俄罗斯总理职位。在亚夫林斯基看来,这种将方案占为己有的做法尤其是对计划的一种破坏,因为他是为苏联政府的蓝图而撰写这个计划的,而不是给没有制度机构来执行这些方案的俄罗斯政府而准备的。然而,为了将亚夫林斯基拉入自己的阵营,叶利钦请他来担任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职位。亚夫林斯基随即代表俄罗斯一方参加了与苏联政府关于500天计划的谈判。参见作者与亚夫林斯基于1997年3月的访谈。

112. Gorbachev, *Memoirs*, 378.

113. Ryzhkov, interview, 170.

114. Yegor Gaidar, "Alliance in the Name of Reform," *Pravda*, August 7, 1990; 转引自 *FBIS-SOV-90-153*, August 8, 1990, 40.

115. 雷日科夫强调,深思熟虑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我们国家的凝聚力”。参见莫斯科电视台(Moscow Television Service)对尼古拉·雷日科夫于1990年9月7日的访谈,收录于 *FBIS-SOV-175*, September 10, 1990, 40.

116. 参见作者与谢尔盖·斯坦科维奇于1995年5月的访谈。

117. Gorbachev, *Memoirs*, 387.

118. 参见1995年7月10日作者与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访谈。

119. Ryzhkov, interview, 143.

120. 参见与亚夫林斯基的访谈。

121. Ibid. 这个立法动作也是对苏联政府的一个信号,表明这个计划不必再被很认真地对待。参见雷日科夫的回忆, in Nikolai Ryzhkov, *Ya iz partii po imeni "Rossiya"* (Moscow: RAU-Korporatsiya, 1995), 191.

122. Ryzhkov, Moscow Domestic Service in Russia, September 24, 1990; in *FBIS-SOV-90-186*, September 25, 1990, 38.

123. Abalkin, in *Sovetskaya Rossiya*, September 23, 1990; in *FBIS-SO-90-*

188, September 27, 1990, 1—2. 也可参见戈尔巴乔夫 1990 年 9 月 17 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继续支持社会主义的讲话, 收录于 *FBIS-SOV-90-180*, September 17, 1990, 49。

124. Alekandr Yakovlev, *Gor'kaya chasha: Bol'shevizm i reformatsiya Rossii* (Yaroslav': Berkhne-Bolzhsc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4), 242; 以及 the remarks by Stanislav Shatalin, *TASS in English*, September 14, 1990; 收录于 *FBIS-SOV-90-180*, September 17, 1990, 47。

125. Gorbachev, *Memoirs*, 387.

126.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在俄罗斯所做的一个民意测验中, 14% 的回答者的选择是将戈尔巴乔夫视为他们“国家”的领导人, 而有 70% 的人支持叶利钦。这里的数据引自 Frances Clines, “Yeltsin's Foes Back Away from His Effort to Topple Him,”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91。

127. 参见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与作者在 1991 年 6 月的访谈, 发表于 McFaul and Markov, *Troubled Birth of Russian Democracy*, 234。

128. Matlock, *Autopsy of an Empire*, 507.

129. 参见作者与这些谈判的一个参与者波克瑟于 2001 年 1 月 24 日的访谈。

130. 参见 “Zayavlenie, Plenuma Soveta predstavitelei dvizheniya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o kruglom stole politicheskikh sil,” April 13, 1991, in *Dvizhenie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Informatsionnii Byulliten’* 10 (May 1991): 4。尽管是多数, 但是一些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包括尤里·阿法纳斯耶夫、列奥尼德·巴特金以及玛丽娜·塞利耶 (Marina Salye), 仍旧反对这种想法。

131. 参见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与作者在 1995 年 6 月 30 日的访谈。

132. 参见作者与政变企图的两位主要人物根纳季·亚纳耶夫和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于 1993 年 11 月的访谈。

133. Anatoly Lukyanov, *Perevorot: Mnimyi i nastoyashchii* (Voronezh: Vorenzhskaya Oblastnaya Organizatsiya Soyuza Zhurnalistov Rossii, 1993), 46.

134. 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政变中的角色仍然是非常神秘的。在与作者于 1993 年 11 月的访谈中, 根纳季·亚纳耶夫和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都声称, 从一开始, 戈尔巴乔夫就完全和政变者的计划保持一致。按照卢基扬诺夫的观点, 戈尔巴乔夫只是在回来之前等着评估国内的反对程度。包括伊丽娜·波纳 (Elena Bonner) 在内一些俄罗斯的民主领导人也持与卢基扬诺夫相同的观点。参见 Dunlop,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202—203。

135. “Ukaz Presidenta Rossiiskoi Sovetskoi Federativnoi Sotsialisticheskoi Respublika,” *Rossiia: Ekstrenyi Vypusk*, August 19, 1991. 奇怪的是, 这个由叶利钦签署的、刊登在《俄罗斯》(*Rossiia*) 上像传单一样被到处散布的法令, 把克里姆林宫列在签署的位置上, 尽管叶利钦身处白宫之中。

136. 这是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关于革命情势的定义, 参见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137. 毫无疑问,假如这场政变发生在1988年或者甚至是在1990年的话,那么,其结果将会大为不同。将焦点仅仅放在军队的分裂上的分析可能会忽视,如果在支持哪个政治集团的问题上还没有明确的选择,那么,武装力量内部的反对立场是不会形成的。比如,假如叶利钦当即被逮捕,大众抵制的成员没有走上街头去保卫俄罗斯议会大厦的话,那么,背叛的苏联军队又将会支持谁呢?

138. 参见波克瑟与作者于1995年6月的访谈。

139. 参见俄罗斯人民代表、民主俄罗斯领导人谢尔盖·尤申科夫与作者在1991年10月的访谈。

140. R. Aushev et al., "K veteranam Afganistana i drugikh lokal' nakh voin," mimeo, August 21, 1991.

141. 关于公众抵制政变的不同程度,参见James Gibson, "Mass Opposition to the Soviet Putsch of August 1991: Collective Action, Rational Choice,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1997): 671—684。

142. "Koordinatsionnyi Sovet Demokraticheskoi, Rossii, vsem, vsem, vsem," mimeo, August 19, 1991. 根据全联盟公共舆论研究中心(Vserossooskii Tsentr Izucheniya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VTsIOM)在1991年8月20日对1746名俄罗斯人进行的民意调查,只有34%的人支持立即举行罢工,而有48%的人反对这一意见。参见VTsIOM, "Data-express," *Elstrennyi Vypusk*, mimeo, August 21, 1991。

143. 关于当时支持政变的证据,参见"Poderzhka reshitel'nykh mer," *Sovetskaya Rossiya*, August 20, 1991, 2。这篇文章引用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人的语句。尽管这篇文章明显地是宣传性的,但是,许多高级政治领导人允许它引用自己的观点。

144. Gaidar, *Dni porazhenii i pobed*, 75.

145. 反对政变的动员发生在首都而不是在农村,这一事实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抗议运动扩散到了整个俄罗斯的小城市的话,那么,在莫斯科的抗议者将会发挥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46. 根据俄罗斯人民代表、8月份前往福罗斯解救戈尔巴乔夫的弗拉基米尔·李森科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简直没有理解莫斯科的权力平衡在短短的三天内是如何被改变的。戈尔巴乔夫期望重新回到苏联总统的位置上,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参见弗拉基米尔·李森科与作者在1991年10月的访谈。

147. Ryzhkov, *Desyat'let velikikh potrasenii*, 229.

148. VTsIOM所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参见*Izvestiya*, July 30, 1990;收录于*FBIS-SOV-90-150*, August 3, 1990, 33。

149. 参见对亚纳耶夫的访谈。

150. Gibson, "Mass Opposition to the Soviet Putsch of August 1991."

151. Richard Dobson and Steven Gran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4 (1992): 302—320. 当然,在政变失败以后,被访谈者更可能会说他们没有支持政变,而如果政变成功,他们可能不会这样说。

152.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vol. 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39.

153. Terry Karl,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 (1990): 9.

154.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tive Rule*, 25.

155. Terry Lynn Karl,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第二篇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 1991—1993 年

第四章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制度设计

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引人注目并根本性地改变了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即使对于俄罗斯这个既被诅咒又蒙天佑、历史上有着许多重大转折点的国家来说,这三天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自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获取权力以来,这是苏联政权首次对发生在俄罗斯的民间反抗进行镇压并且以失败告终。尽管时间是多么的短暂,并且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但这次对苏联当局的成功挑战以对挑战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旧制度与挑战者之间的权力平衡。

这个时刻是轻快的。对许多俄罗斯公民来说,跟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的最初几天比起来,也许没有哪个时刻是带着如此强烈的欣喜之情被铭记在心。¹在抵抗第三天、胜利在手之时,一首“为了你自己”的歌曲在白宫的保卫者们中间迅速传播开来,因为这个时刻不但对叶利钦和他的盟友来说是个政治成功,而且对于那些俄罗斯公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胜利。²叶戈尔·盖达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到他首次为他的民族感到如此骄傲,并且把欢快的8月同1917年2月相比较,那是俄罗斯大众对暴政的最后一次胜利。³即使戈尔巴乔夫稍后也承认,在8月事件之后产生了对独裁体制的重要突破和有利于民主力量的决定性行动。⁴西方的反应更为欣喜,报纸头栏标题宣称“奴役终结:千年独裁被推翻”⁵。

在政变失败之后,俄罗斯的革命者立即利用他们飞来横财般的政治权力逮捕政变的策划者,禁止苏联共产党活动,占领了共产党总部,推倒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雕像,他是后来的克格勃

的创始人。但是下一步该做什么？所有的革命都证明，推翻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要比建立一种新秩序来得容易。虽然1991年8月可能标志着共产党统治和几个月后苏联国家的终结，但是何种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模式能够或者应该填补空白仍然是未知数。即使国家的边界也在未定之中。特别是对那些当权者来说，围绕着苏联终结的欢乐也很快被新兴的俄罗斯未来的不确定性笼罩上了阴影。

本章描述了在利用失败的8月政变所带来的体制重组的机会时，俄罗斯新领导人在重组经济政治和国家体制时的偏好和策略。第五章追溯了这些体制设计策略，或者说策略的缺失所带来的后果。本章的第一部分将重新构建形成决策的背景，特别关注体制设计者们仍然面对着的广泛的变革议程，还有在那些支持和反对激进变革的人中间变动着的权力分配。本章的剩余部分将勾画出叶利钦在处理三个主要议题时所采用的策略，这些议题是过去时代的遗留物——即确定国家边界、重组经济、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政治制度。

制度设计的背景：众多的议程，暧昧的委托

没有决心的转型

对许多这一时刻的观察者来说，在1991年8月发生的失败政变和俄罗斯民主人士的胜利标志着过渡期的结束。这个时刻为“共产主义的死亡”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结束画上句号。⁶但是对于那些卷入这场“历史的终结”事件的人们来说，过去仍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已成定局，而且未来看起来非常难以把握。在1991年秋天最显著的就是，这场变革带来的议程仍然非常之多并难以处理，因为在政治转型期的前些年还没有解决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是大多数非共产主义世界告别威权政体的转型议程中的唯一问题——确实是俄罗斯领导人最少关注的问题。虽然如何治理俄罗斯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确定，但8月事件中的胜利者们相信，他们首先应该解决议程上的其他两

个问题——重组经济和划清国家边界。

当旧制度在 1991 年 8 月崩溃的时候,俄罗斯的革命者们被赋予了同时进行政治变革和经济转型的机会,当然,还有相应的负担。更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是厘清国界。1991 年 8 月,俄罗斯还没有主权边界,没有国家货币,没有国家军队,只有一个虚弱且定义不清的国家体制。即使在 1991 年 12 月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签署的时候,俄罗斯的政治定位、疆域定位和心理定位都还是未知数。在俄罗斯周围那些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内,3 000 万俄裔居民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侨民。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少数民族也在要求自己的独立地位。就像丹克沃尔特·罗斯托强调的那样,确定国家的边界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⁷ 在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来治理国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必须先确定他们国家的位置在哪里。对于经济而言,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彻底失败,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几年里的失败,意味着经济改革必须马上进行。

由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在缔造新的制度安排时缺少进展,这些重大的变革议程在 1991 年秋天赫然耸现。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是他的创新却没有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稳固下来,因为重要的行为体没有就一系列新规则达成一致意见。相反,他们对新规则有着相互竞争的观点,倾向于互相争斗。苏联—俄罗斯的转型模式既非强制性的也非契约性的。没有支配性的权力来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便于让他人遵守。相反,没有哪个领导人能够有权单独授权产生一套新的政治规则。也没有进行谈判来商讨一条从旧到新的路径。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竞争之后,这场两极化的政治竞争发生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叶利钦一方突然从另一方那里取得了权力。在 1991 年 8 月之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曾经试图协商出一套新的治理规则。如果政变企图没有发生,这些讨价还价的谈判也许会在苏联体制之内形成新的宪政体制的基础。然而,政变企图带来的突然震动使得谈判脱轨。特别是,1991 年 8 月决战的胜利者感到不再有必要尊重联盟条约,相反,他们开始行动起来,利用旧制度领导人的暂时虚弱以争取一个更好的安排。

这种转型的模式使得俄罗斯新体制的游戏规则中有很多暧昧不清之

处和陌生、易受操纵的地方。苏联总统是国家元首，还是俄罗斯总统才是真正的行政机构的领导人？⁸ 苏联共产党被看作是众多政党中的一员，还是被看作一个把其他民族监禁在苏联领土上的罪恶组织？此外，这些政治规则上的不确定性飘荡在更普遍的不确定性之中，包括经济规则和国家边界的不确定性。

难缠而模糊的权力分配

在经历了 1991 年 8 月的未遂政变之后，叶利钦无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全世界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种“来自街头”的权力，往好的说是非常短暂的，往坏的说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叶利钦的权威不是以政治组织和国家机构的制度化为基础的。即使是总统这个职位的权力也定义得非常模糊。一些机构诸如中央银行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基本权威没有得到很清晰的界定。

不止叶利钦权力的边界是个灰色区域，同样神秘的还有那些支持保留苏联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治力量的能力。在 1991 年 8 月的时候，它们显得微弱和涣散。然而它们迅速从这一令人蒙羞的时刻恢复过来，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中和地区政府（特别是在地区苏维埃和行政机构）中组织起来，并在街头展示了它们的力量。

到 1991 年秋天，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的指标是模糊的和相互矛盾的。叶利钦在 1991 年 6 月以绝对优势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然而，仅仅在总统选举前三个月，70% 的人还投票赞成保留苏联。相似的是，叶利钦的盟友们在保卫白宫、抵御苏联坦克时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和韧性，但是只有圣彼得堡、叶卡特琳堡和下诺夫哥罗德几个城市的市民响应了莫斯科的反抗动员。在俄罗斯的其他部分，对叶利钦和民主派人士只有零落的支持，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响应了叶利钦全国总罢工的号召。⁹ 大部分地区政府的领导人在 8 月戏剧性的日子里都保持了缄默，既不同苏联也不同俄罗斯政府站在一起。1991 年 8 月对民主派人士来说是个胜利，但是对俄罗斯未来的争夺战并没有结束。在那些支持和反对变革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分配还相对平衡和相对模糊。

作为这种革命者和保守者之间模糊的但相对均等的权力分配的后

果,俄罗斯新领导人不能——或者认为他们自己不能——彻底废除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曾有人考虑过使用武力,但俄罗斯的革命者很明智地自我限制,不试图用暴力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国家转型的目标。这一战略决定使得苏联时期的许多制度及由这些制度创立和赋予特权的组织存活到后苏联时代。历史遗产影响着所有的革命,但是过去时代的阴影在这一转型期内特别长(也特别浓厚),因为这一强调合作更甚于对抗的战略使得旧制度中的一些体制和个人得以留存。

因此,叶利钦和俄罗斯的革命者们在1991年设计新制度时并没有推倒重来的机会。¹⁰苏联体制在1991年从内部崩溃掉了,但是旧制度的构成要素仍然在一些地方得以保留。虽然俄罗斯激进的、革命性的转型模式抛弃了引领转轨的指导方针,但是,转型的非暴力本质也使得许多在苏联体制下被赋予了一定权力和权利的个人、制度和社会力量能够继续在后苏联时代扮演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与在非革命情境下的协商式转型不一样,这场转型是那种旧的角色和制度在1991年8月之前没有得到清晰定义的转型。¹¹不同于暴力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的这些力量既没有被压制也没有被摧毁。

选择的向心性

转型的模式、迟迟未决的变革议程,以及革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模糊的权力平衡,为俄罗斯领导人重建俄罗斯国家、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努力设置了限制。但是,如果认为个人对这种出现于1991年8月未遂政变之后并最终走向失败的政治制度没有发言权或者影响力,那是错误的。相反,俄罗斯革命带来的所有宏观变革都有着微观的基础。在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下,政治人物和他们所领导的政治组织因此做出了有关新政治制度设计的相应决策。在1991年秋天的动荡时刻,个人动机的潜在影响特别重要,没有一人对俄罗斯未来走向的影响力超过鲍里斯·叶利钦。

此时的叶利钦看起来是无敌的。他戏剧性地抵抗了政变,这使得他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获得了过去苏联时代任何个人、团体或者制度都未曾获得的权力。俄罗斯第二大合法的政治角色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1991年秋,议会忠于总统。因为大部分代表支持保卫白宫,因此设想这

个政治机构继续支持叶利钦不是不合理的。作为这种支持的体现,1991年12月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允许叶利钦用总统令来治理国家。

令人惊奇的是,反对叶利钦的潜在挑战者和议会都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决心。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8月前濒临崩溃,因此不再有能力对叶利钦和民主派人士进行反击。苏联共产党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随着独联体的创建而消失,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抓住了机会,把自己的身份由党的总书记变成了国家的领导人——这一身份使他们获得了完全的国际承认并给予他们在国内更大的合法性基础。苏联武装部队和克格勃是能够对俄罗斯总统发起攻击的组织,二者在政变结束之后仍然处于麻痹混乱的状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是没有反抗就自我解散,这就从政治领域消除了唯一一个在全联盟基础上有选举代表基础的政治集团的作用。¹²

也许最引人注目、最令人惊奇也最重要的事件是戈尔巴乔夫对这一新的权力平衡现状的默认。未遂政变发生后,当戈尔巴乔夫从他被软禁的夏季别墅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用他们新获得的政治权力来摆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未经反抗便默认了这一事实。¹³虽然戈尔巴乔夫宣称他自己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者”,并且有责任来维持苏联领土的完整,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多少权力来追求这些目标。¹⁴他体面地离开政治舞台的行为是勇敢的,这使苏联得以和平解体。

因此,在8月末遂政变之后的关键时刻,叶利钦有可观的回旋余地来建构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不用被传统安排所束缚,也不用被迫维持苏联体制,叶利钦和他的团队被给予了一扇机会之窗,得以进行激进的改革。¹⁵叶利钦本人深深意识到他的机会和所负的责任:“今天(1991年12月3日)对激进变革的抵抗已经被削弱了。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浪费时间和当前某些人的墨守成规,在政治上是短视的,在道德上是邪恶的,作为一个人也是愚蠢的。”¹⁶一个月之后,当他在第五次俄罗斯人代会发言的时候,叶利钦对个人在革命中所能发挥的历史作用作了更为明确的陈述:

我在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对你们发表讲话。在今天

俄罗斯的未来已经被确定了……小步小步行动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改革已经不成问题(在字面上是说雷日科夫已被扫尽)。我们在未来的数月内有独一无二的机会来稳定经济情况并开始走上改善之路。¹⁷

像许多其他经历这种转型的革命领导人一样,他可能会利用这种机会来建立一个苛刻的独裁政权:解散所有不依附于总统职位的政治组织,压制个人政治自由,运用强制性的警察力量来执行政策。¹⁸他的反对者预计他会这么做。¹⁹甚至民主俄罗斯内他的一些前支持者也在此时警告说叶利钦计划创立一个独裁制度。²⁰尼古拉·特夫金,叶利钦在苏联和俄罗斯议会中的一位同僚,担心这位前政治局成员不懂得忠实反对派的含义,会迅速行动起来重建一个一党制国家。²¹叶利钦的一些顾问催促他考虑这种权威主义策略,至少作为挽救全国国家权力崩溃的临时措施。莫斯科市长盖夫里尔·波波夫甚至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走出危机的政论文章,在其中,他宣扬建立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独裁主义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威。²²

在另一方面,叶利钦也可以采取措施来巩固一个民主政体。他可以废除苏联政府以前的所有制度,采用一部新的宪法,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以及联邦与地区之间的分权法典化,召集新的选举来促进多党制的发展。民主运动中的许多领袖都期望他采取这样的行动。

但是,叶利钦却没有采取这两种策略。更确切地说,他对建立一个治理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制度关注甚少。仅仅在挫败未遂政变数周以后,叶利钦就引退到他在索契的夏季别墅中度了三周假,很明显是对他新得到的职责不胜负荷所致。到1991年11月,民主俄罗斯副主席列夫·波诺马廖夫(Lev Ponomarev)指责叶利钦无所作为,批评说俄罗斯总统正在浪费8月政变给激进改革带来的机会。²³在同一个月内,民主俄罗斯协调会议(the Coordinating Council of Democratic Russia)采纳了一项决议,要求叶利钦马上归来,并且立即着手进行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当叶利钦真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的首要目标不是建立并巩固一个新的民主政治体制(或者是一个新的权威主义体制)。相反,叶利钦决定,俄罗斯独立和经济改革是更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用来设计新制度的大部分精力贯

注在这两个议题上。就像叶戈尔·盖达尔——当时主管经济改革事务的副总理——解释的那样，“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段时间内做完所有的事情”²⁴。叶利钦和他的新政府相信他们可以控制改革的顺序。首先，他们想通过确定独联体国家的边界来填补国家权力的真空，然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最后重建一个民主政体。他们关于体制设计的决策反映了这些议题的优先次序。

解散苏联，建立俄罗斯国家

在1991年8月未遂政变之后的数星期内，苏联迅速崩溃，然而一个有效运转和独立的俄罗斯国家还并不存在。数年之后，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指责叶利钦和他的亲密顾问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在1991年12月通过秘密会谈瓦解了苏联。然而1991年8月而不是12月标志着苏联历史上的转折点。在1991年12月签署《别洛韦日协议》（这个协议是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签署的，在法律上创建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在事实上瓦解了苏联）数年前，苏联就开始分裂了。²⁵然而，即使迟至1991年春天苏联的崩溃还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1991年整个春季，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正在和苏联政府进行严肃的谈判，以在苏联内部再造一个联邦体制。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则中断了这一谈判，根本转变了谈判的内容。在未遂政变之后，苏联内部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本来苏联中央政府在制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的谈判上扮演关键角色，现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向中央政府指示在他们之间分割权力的条件。²⁶在权力分配上的迅速变化为重铸整个体制创造了条件。

抓住这个机会，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首先行动起来，以确保对他们独立地位的正式承认。苏联人民代表J.J.彼得斯(J.J. Peters)在1991年9月1日（这一天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开幕的日子）宣布：“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在1989年选自拉脱维亚的苏联人民

代表,提议您立即颁布总统令,承认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国家独立地位,它自1940年以来国际法上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主体。对此问题的一个积极的措施将会有力地确保拉脱维亚共和国和正在再造的联盟之间的友好关系。”²⁷在做出这个请求的同时,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领导人清楚叶利钦和俄罗斯民主派人士是他们获得独立时的同盟军。就像彼得斯宣称的那样:“我,代表独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我国政府的发言人,向俄罗斯、俄罗斯人民和叶利钦总统阁下致敬,叶利钦总统拯救了和平民主和我们孩子的将来。”²⁸五天之后,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一个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的过渡政府,承认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在政变之前,戈尔巴乔夫用尽了他政治资本的最后一点能量来维护苏联。在政变之后,随着他政治资本的彻底枯竭,戈尔巴乔夫对事态的发展已经毫无影响,唯有确认其他人的行动。

其他共和国紧随其后。未遂政变之后一周内,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以压倒性的投票(321票赞成,6票反对)宣布了乌克兰独立。为了获得对这一决定的完全授权,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12月1日就乌克兰独立问题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在9月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直率地说:“对议会来说,主要的事情就是要从今天真正的权力属于共和国和人民自决这两个前提出发。我们认为议会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帮助有此愿望的各共和国的人民。”²⁹

除了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之外,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政变之后也立即再次重申了它的独立,亚美尼亚在9月跟进,以投票宣布自己完全独立。在最初的犹豫之后,阿塞拜疆领导人阿亚兹·穆塔利博夫(Ayas Mutalibov)召集了一个最高苏维埃的特别会议来宣布独立。在白俄罗斯,独立的欣喜和共产党的解散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宣布的。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德曼特(Nikolai Dementei),在政变时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因此在政变失败之后被迫辞职。只是在一场几乎势均力敌的投票之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才行动起来取缔白俄罗斯共产党并确认了一项关于独立的决议。这些分裂苏联的离心力量在中亚最为虚弱。在1991年8月未遂政变之后,所有的中亚国家领导人都相信联盟可以以某

种形式保存下来。³⁰没有一个领导人想复兴一个单一的国家,因为他们都受到地方分权的困扰。然而,甚至只是企图重开联盟条约的谈判也不再是可能的事情。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政变之后紧急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建议放弃政变前的谈判协定而代之以一个新的各共和国的联邦。这个联邦不再需要一个苏联政府或者是苏联议会。³¹为了引导向这个新联邦的转型,纳扎尔巴耶夫提议建立一个过渡性的苏联政府——国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官员组成,“在事关各共和国共同利益的国内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做出意见一致的决定”,“调控国家经济管理和以一致同意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在平等的原则下,临时创建一个由各共和国代表组成的国际经济委员会”。³²其他的一些议题留给各共和国自己处理。

纳扎尔巴耶夫保留一个修正过的联盟的建议在俄罗斯境内受到许多政治人物和组织的欢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动各加盟共和国在联盟条约本来面目上签字,同时还对苏联解体的悲惨后果发出警告。戈尔巴乔夫持久不懈地应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结果作为人民支持他立场的证据。俄罗斯民主运动的少数领导者也支持保留联盟。例如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就支持保留联盟,特别是保留一个联盟议会,主张由某个政府实体来填充苏联共产党崩溃所带来的行政空白。9月2日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索布恰克还主张只有通过创造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才能把经济衰退扭转过来。在民主俄罗斯内部,尼古拉·特夫金(俄罗斯民主党主席),维克托·阿克修切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的主席),米哈伊尔·阿斯塔费夫[宪政民主党—人民自由党(Party of peoples's Freedom)的主席]也都主张保留某种形式的联盟。当民主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提议分裂的时候,这三位领导人和他们的党退出了联盟,成立了一个新的称作“人民和谐”(People's Accord)的支持联盟的集团。³³一些民族主义者以及苏联与俄罗斯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也同样主张叶利钦对1991年3月赞成保留联盟的全民投票负有义务。

正是在国家崩溃和关于崩溃的争辩这种混乱背景下,叶利钦和他的同盟者就联盟和俄罗斯内部的体制改革做出了最初的决策。另外,最重

要的是叶利钦想防止联盟权威的重建。虽然他对保留任何类型的中央政府的承诺在这一时期内始终是模糊的,但他确实坚定地行动起来,以确定任何新成立的中央政府服从于各主权共和国的权威。他特别想确保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会再是他的上级。

取缔苏联共产党

叶利钦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反对苏联共产党,这是唯一有潜力在全联盟层次上做出和实施政策的行政组织。1991年8月25日,俄罗斯总统签署了一个法令,在俄罗斯境内取缔苏联共产党,并且没收其大部分财产。叶利钦也暂停了一些共产党报纸的出版,这些报纸包括《真理报》(*Pravda*)、《苏维埃俄罗斯报》(*Sovetskaya Rossiya*)、《莫斯科真理报》(*Moskovskaya Pravda*)、《工人论坛报》(*Rabochaya Tribuna*)、《开放报》(*Glasnost*)。为了赢得对其他媒体的控制,叶利钦更换了塔斯社和苏通社的领导人。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其中有很多也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紧跟在叶利钦后面取缔了苏联共产党并夺取了共产党在各个共和国境内的资产。

在为自己这些行动辩护的时候,叶利钦坚持认为苏联共产党对未遂政变负有责任。³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未遂政变时表现差劲,为了维护信誉,它也在1991年8月29日通过了一个类似的决议,在苏联境内禁止苏联共产党的活动。³⁵此刻也没有哪个主要的政治集团对苏联共产党的回归感兴趣,这使得人们很容易默认了叶利钦的法令。³⁶

夺取对苏联国家机关的控制

作为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的替代,叶利钦寻求建立一个俄罗斯国家,作为在俄罗斯领土上发生的所有行动的最高主权者。甚至在政变期间,他就签署了一条法令使得苏联政府部门从属于俄罗斯国家权力机构。这个法令迫使苏联国家机关的雇员在两个权威中做出选择——苏联政府还是俄罗斯政府。

叶利钦和他的盟友迅速行动起来,把大多数的苏联政府部门和政治组织重组为俄罗斯的实体。1991年8月22日,叶利钦签署了一项法令,

把苏联在俄罗斯境内所有企业的控制权转交给俄罗斯政府。他还签署了一个相似的法令,促使苏联政府部门由俄罗斯政府加以控制。在处理大多数这些国家组织的时候所采用的策略是同化而非高压或者解散之。除了那些有预谋参加了未遂政变的人之外,在苏联政府部门和机关里很少有人被罢免领导职位,这个政策使许多俄罗斯抵抗运动的人士感到失望。³⁷叶利钦不是解散苏联权力机关并在那里创立新的俄罗斯政府机关,而是更愿意改变它们的效忠对象(从而保留它们)。

苏联政府的大多数部门转移效忠对象的过程发生得极为轻松。同大多数革命接管队伍的领导人相比,叶利钦并没有指挥一支可以强制执行其法令的游击队或者革命突击队。苏联的高级官僚(含蓄地说也是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接受新指令的速度意味着在新领导者和旧党政工作人员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不是那么清晰。正如盖达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那样,他作为副总理的最初几个行动之一就是控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是苏联体制几个要害机构之一,也是最惹人厌恶的机构,它监管着整个苏联经济的运行。就在就职后的几天,盖达尔打电话给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指示召集委员同他会面。盖达尔回忆说:“当然,这个举动(打电话和召集会议)是傲慢无理的。如果这个举动发生在8月21日以前,如果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副总理打电话给这个庞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要求立即举行一个会议,那么,他们甚至连门槛都可能不让我们进。”³⁸但是这个会议召开了,此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就开始为新的俄罗斯经济部部长安德烈·列查耶夫(Andrei Nechayev)服务,切断了军备生产。盖达尔和他的助手又尝试着去控制苏联财政部,虽然这次行动要复杂得多,并且也让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当时还是苏联总统)个人卷入了这次事件,但是盖达尔还是成功地使这个部门隶属于俄罗斯管辖。同样的进程发生在几乎每一个有关经济政策制定的苏联部门里面。

1991年秋天,所有主要的政治角色都对俄罗斯的势力均衡有了相似的了解。叶利钦和他的同盟是强有力的,支持政变的保守派是虚弱的。戈尔巴乔夫在他无力阻止政变发生这件事上表明自己虚弱无力。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授权,如果它试着行使权威,则也有可能成功限制叶利

钦的同化战略。但议会没有抵制政变这件事使它大失颜面。同等重要的是,来自俄罗斯之外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们认为,新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共和国这一层面。这些代表因此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投放到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将来的制度的复活上面。苏联各部委的官僚从而也没有真正的选择范围,只有接受俄罗斯政府作为新老板这一事实。

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也采用了一个谨慎得多的策略来同化那些被称作强力部门的机关。当苏联共产党正处于混乱之中时,苏联武装部队、克格勃、内务部是唯一有能力(很可能也具有合法性)在全联盟范围内建立一个替代性的行政权威机构的组织。为了使这些组织中立,叶利钦任命了自己的忠实盟友来领导他们。³⁹(在这些首脑的任命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一个临时性的任命,但是叶利钦加以拒绝,经过这么一轮之后,这两人共同任命了瓦丁·巴卡京(Vadim Bakatin)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主席,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作为苏联国防部长,维克多·巴兰尼科夫(Viktor Barannikov)作为内务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Aleksandr Bessmertnykh)是苏联外交部的原部长,在政变期间任职并且满足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要求,因此被撤换而代之以鲍里斯·潘京(Boris Pantin)。同叶利钦处理其他部的策略比较起来,叶利钦处理强力部门的策略是允许它们在转型期保留在苏联权限之下。在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最终把这些部门合并入俄罗斯政府内,而没有尝试在这些部门内部进行任何严肃的改革或者是建立文官对这些部门的控制。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叶利钦像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害怕一支分裂的军队。许多军事领导人公开谈到创立几支军队的危险。⁴⁰然而,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加快了苏联武装力量变革的节奏。1991年9月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任命了乌克兰国防部部长,这明显代表着瓦解苏联武装力量的第一步。当俄罗斯和乌克兰竞相声称对克里米亚舰队拥有权威时,爆发出了1991年后8月时代第一次共和国间冲突的危机。对俄罗斯领导人来说,因为克里米亚危机而产生的恐惧感为慢慢重建苏联武装力量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数月之内,叶利钦并没有任命一位俄罗斯国防部长,也无限期推迟了对武装力量的重组。

解散苏联国会和废除苏联总统职位

有两个苏联国家机构是叶利钦想予以摧毁而不是夺取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总统职位。他和他的政府首先寻求通过指责苏联立法机关默认政变来使苏联国会丧失信誉。叶利钦在未遂政变一周后声明：“在政变的日子里面，这个国家没有最高立法权力，也没有议会。犹太们的手不受一点束缚。虽然最高苏维埃毫无动作，但是它为犹太们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⁴¹ 苏联议会试图通过公开抨击政变和毫无修正地认可叶利钦的一些机构变革来洗刷自己，尽管当时严格说来叶利钦只是这个机构的下属。许多代表想通过安抚叶利钦来表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应该继续存在以帮助稳定国家。然而，俄罗斯政府害怕如果保留大会它就会重获权威。同时，叶利钦也非常小心不去单方面撤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是代之以轻轻推动议会自我解散，用提供物质刺激的手段给那些合作者以达到此项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支持叶利钦，因为苏联总统感到自己在政变期间被胆怯的国会所背叛。⁴² 1991年9月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新的法律把在转型期治理苏联的权威交给称作苏联国家委员会(USSR State Council)的执行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在整个秋天继续开会，但是它已无法重新作为一个政治角色而存在。

在未遂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相信他应该保留他作为苏联总统的角色，不管这个职位会发生多么根本的变革。为了从他的前对手——俄罗斯民主运动——中获得支持，戈尔巴乔夫承认错误地挑选了一批人来治理国家。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忍受了叶利钦加在他身上特别的羞辱和奚落，因为他希望通过同叶利钦和俄罗斯国会合作而能够保留自己的职位和维持联盟的一些外表。一些共和国的领导者，例如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d Niyazov)站到了戈尔巴乔夫一边，认为“太多的石头扔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头上了”⁴³。

叶利钦不同意这一点。事实上，俄罗斯总统一边享受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内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合作所带来的好处，一边积极地把戈尔巴乔夫拉下权力舞台。即使副产品是苏联的崩溃，叶利钦也想利用8月未遂政变的机会来把他的仇敌从政治上永远消灭掉。尽管其他人把戈尔巴乔

夫看作是政变的受害者,但叶利钦公开和直接地指责戈尔巴乔夫为1991年8月政变创造了条件:

八月政变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这个国家实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苏联内权力危机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现在它正变得越来越深。一月又一月,联盟领导人进行隐秘的操作,没有一个轮廓鲜明的和清晰的政治方针,口头上讲一些正确的口号,但是在实际上却尽一切努力来延缓实施。这些改革的措施被委托给那些本质上是独裁主义者的人。看起来他们尽一切努力来防止党和国家机构免于毁灭。⁴⁴

叶利钦甚至明确表示戈尔巴乔夫了解政变策划者的计划:“在寻找政变原因的时候,我不能不提起这个国家总统的角色。他在进行改革时的矛盾,他的优柔寡断,有时对党的官僚侵略性冲击的投降(这些官僚的特权正受到危害)——所有这些都为极权体制进行复仇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我不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普戈、亚佐夫和另外一些人的本质毫不知情。”⁴⁵因而叶利钦从未接受过一种可能,即让戈尔巴乔夫继续保留苏联总统的职位。相反,叶利钦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合作以缓和地瓦解苏联。

瓦解苏联

在1991年8月到1991年12月8日签署《别洛韦日协议》(这个协议瓦解了苏联)的这段时间内,一些临时性的建议、临时政府和加盟共和国间的条约引导着解体的进程。在叶利钦的同意之下,戈尔巴乔夫成立了一个由伊万·西拉耶夫(Ivan Silayev)、阿卡迪·沃尔斯基、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领导的紧急委员会来管理联盟经济。10月,八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十分热闹地签署了《经济联盟条约》(Treaty on Economic Union),这个条约清楚地说明了在原苏联境内维持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的战略。这个行动在联盟的支持者内部激起了新的希望,使得叶利钦关于联盟的真实意图变得晦暗不明。

代表了截然不同议程的领导者们就新政治制度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一个临时的议会,一个临时的委员会,甚至一个宪法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全联盟层次上建立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一事上最主动地寻求

支持。他要求一些民主派领导人来参加,包括莫斯科市长和民主俄罗斯领导人盖夫里尔·波波夫和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前苏联政府同僚格里戈里·雷文科(Grigory Revenko)、伊杜瓦特·谢瓦尔德纳泽、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早些年反对过这些自由主义者之后,戈尔巴乔夫现在向他们靠拢以保住自己的职位。⁴⁶然而没有人接受他的邀请,因为没有人在这种时刻想和戈尔巴乔夫有正式的联系。他们的拒绝参加对旨在全联盟层次上保留政府机构的运动造成了最后的打击。

1991年11月4日,除了国防部、外交部、铁道部、电力部和原子能源部之外,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同意正式废除苏联所有的政府部门。三个星期之后,在1991年11月25日,这些领导人又在诺沃-奥格勒沃(Novo-ogarevo)最后一次会面,这是同年早些时候谈判联盟条约的地方。虽然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起草了一份新的条约,这个条约将把大多数权力转移给各加盟共和国政府,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同意签署。在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声明他仍然希望在1991年12月20日签署一项新的联盟条约,但是推动协议的动力明显是在衰退之中。

在诺沃-奥格勒沃举行的失败的十一月会议之后,叶利钦决定还需要做一些其他事情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联盟问题。⁴⁷他指示他的高级政府助手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y Burbulis)和谢尔盖·沙赫赖(Sergei Shakhrai)草拟一份使苏联解体的文件。叶利钦的助理们非常小心地使这个行动尽可能地具有合法性,他们决定由三个在1922年同意成立苏联的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来签署使苏联解体的文件。布尔布利斯和沙赫赖计划在1991年12月1日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在白俄罗斯的一个旅游胜地布列斯特会面。会面被安排在乌克兰就独立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之后,这次投票也被安排在12月1日。正如所期待的那样,乌克兰人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决定独立,叶利钦在以后引证说这是他决定支持分裂苏联的决定性因素。⁴⁸

在白俄罗斯举行的会议气氛压抑、议程机密。叶戈尔·盖达尔刚刚在前几个星期被任命为副总理,他在回忆录中说,直到出发去明斯克的时候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所在。⁴⁹只有布尔布利斯和沙赫赖两个人从头到尾安排了这次会议。从参会人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三个加盟

共和国的领导人对他们的举动极为紧张。

在认识到“关于签署一项新条约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成为新的独立国家这一客观进程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时,在别洛韦日签署的这份文件声明“苏联作为国际法和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主体已不再存在”。⁵⁰ 这三位领导人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然而同先前所有就一个新联盟条约的谈判不同的是,这个新的协议没有提出一个超国家的政治权威。

在俄罗斯,宣布独立并没有带来庆典和欢呼。⁵¹ 甚至大多数民主俄罗斯内部的领导人也被这一举动所震撼,他们担心叶利钦这个不受欢迎的举动会降低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支持率。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为自己的举动辩护说,这个协议只对已经发生的分裂这一事实进程加以法理化而已。正如叶利钦在稍后争辩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个协定)我确定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也都会分裂,只是会伴随着血腥和暴力。”⁵² 尽管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也害怕协议会激起军事政变,但创立这个协议的本意也正是为了阻止另一场军事政变。⁵³ 通过分裂苏联,他在各前加盟共和国内建立了新的政治角色,这将有助于防止任何人在将来企图重建苏联。叶利钦也相信苏联的分裂是防止俄罗斯联邦全面崩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⁵⁴ 最后,自由主义者争论说,只有在俄罗斯国家的边界被清楚界定的时候才能够进行经济改革。⁵⁵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有能力抵制这一行为的任何组织看起来也同意叶利钦和他的解释。戈尔巴乔夫予以默认。他嘲弄这一行为是违宪的,但是保持了克制,没有号召军队、克格勃或者社会组织来抵制这个协议。甚至当一些军事官员,包括叶利钦自己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也反对这一行动,但没有任何一位将军决定行动起来反对这个协定。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一些代表,例如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Ilya Konstantinov)、弗拉基米尔·伊沙科夫(Vladimir Isakov)、尼古拉·帕夫洛夫(Nikolai Pavlov)企图阻挠对这一协定的批准,公开指责叶利钦的行动是一次政变。但是,大部分俄罗斯代表,包括议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他在后来声称他们抵制过分裂苏联——都赞成这个协议。最高苏维埃审批这个协定时,只有六个人投票反对。很少

有公众集会反对终结苏联。民族主义领导人例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以及民主俄罗斯内部的国家主义者,例如尼古拉·特夫金,维克托·阿克修切茨甚至波波夫,组织了街头示威对协议进行谴责,但是只有几百个人参加。

这个体制上的根本改变被权力均衡所支撑,到了1991年8月末遂政变时,权力分配情况已经比较清楚,虽然还是粗略的。最重要的是,叶利钦解体苏联的计划为他的行动创造了十四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每一个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都有真实的动机来支持这一计划,只要他们觉得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也计划这么做。这些前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或各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主席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国家元首。一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国家不会放弃它们的主权。⁵⁶在俄罗斯,没有一个全联盟的组织能够保证如果他们行动起来保卫苏联就能够获得成功。毕竟,克格勃的首脑、苏联军队、内务部和军工联合体曾经尝试动用武力保卫苏联,但是也失败了。

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个新的权力分配的结果是叶利钦在年底创造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国家。他占据了克里姆林宫,拥有了控制苏联核力量的核密码。他不仅仅引导了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崩溃,而且摧毁了在六年之前还被认为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国家。他做出了这些壮举而没有杀掉任何人。

有关经济体制设计的决策

如果划分国家界限是叶利钦在1991年8月末遂政变之后的首要考虑,那么,俄罗斯经济改革则是他第二看重的事务。自从1990年秋天“五百天计划”的失败以来,没有人对苏联的经济政策负有直接责任。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无人关注的时期要回溯到更远的时间段上,回溯到1988年当戈尔巴乔夫追求苏联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全神贯注于一些政治议题,例如选举、种族冲突,最后还

有苏联的命运,他们对坚持更早时候开展的经济改革一事很少关注。日益加深的政治对抗和不确定性反过来造就了一种对进行经济改革不利的背景,因为没有哪股主要的政治力量有权威或意愿承担最初痛苦的经济转型的责任。价格自由化就是被这种政治结果拖累的典型的政策。虽然大部分苏联和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早在1990年夏天就认识到提高商品价格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包括鲍里斯·叶利钦公开主张过这一点。

到了1991年8月,这种无所作为带来的经济代价已经非常巨大。苏联黄金和硬通货的储备已经耗尽,预算赤字激增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钱很多但是货很少,生产则迅速下滑,贸易已经差不多快要崩溃。专家预测,1991年的冬天会在全苏联发生饿死现象,要求西方政府进行紧急食品援助。叶利钦在用俄罗斯主权国家代替苏联体制的行动中,他和他的政府也要对一个已破产的经济负责。

在这些条件下,要求激进经济改革的公众舆论迅速发展起来。在1991年秋天,在俄罗斯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警告说(经济改革)走得“太快了”。⁵⁷这种不安只在后来才出现。俄罗斯议会领导人也公开鼓吹快速和全面的经济改革措施。甚至俄罗斯议会的新任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也公开提倡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他洋洋得意地说他推动了苏联政府和总理雷日科夫的下台和辞职,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进行足够迅速的经济改革。⁵⁸哈斯布拉托夫在8月未遂政变之后立即说,他重新肯定了对市场改革的信念,警告说兴高采烈还为时尚早,因为根本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得到实施。虽然他没有展示出对稳定和取得稳定的艰难步骤的牢固认识,但他呼吁建立一个同“文明国家”相似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俄罗斯和国际公司会肩并肩合作。据他看来,俄罗斯也需要“强有力的小企业主部门”。⁵⁹他也争辩说:“经济从国家的影响中自由一分,就在社会中少一分官僚气息。”⁶⁰仅在价格自由化一个月以前,哈斯布拉托夫又再次肯定了它对经济改革所需的经济措施的支持。⁶¹

对经济做出反应的紧迫性得到了大家的承认。政府应该如何应付经济危机,谁应该实施改革,这些问题引起了争论。叶利钦懂得8月未遂政变为激进的改革创造了机遇。1991年9月在索契度假时,他认识到“现在

如果俄罗斯不去寻找它自己经济改革的建筑师,那将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⁶²。叶利钦也懂得他本人不适合为激进变革设计一份全面的蓝图。

在整个 1991 年秋天,一些候选人和经济团队曾被人们考察过,从保守主义者如尤里·斯科科夫(Yuri Skokov)、奥利格·洛波夫(Oleg Lobov),到中立派如叶夫根尼·萨博罗夫(Yevgeny Saburov),到更加自由化(也更年轻)的经济学家如亚夫林斯基和盖达尔,都在其中。哈斯拉托夫和鲁茨科伊也热切希望能够成为叶利钦政府首位后共产党时代的总理。⁶³ 在所有的候选人中,亚夫林斯基是最著名也最为人所期待的。然而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出于某些原因,最终没有采用亚夫林斯基和他的战略。亚夫林斯基宣扬在前苏联境内保留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和单一的货币。叶利钦虽然在最初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他认为这样做是不现实的。亚夫林斯基被视作“500 天计划”的创始人之一,这个计划在 1990 年秋天看起来还是激进的,但到了 1991 年秋天就过时了。1991 年春天,亚夫林斯基联合戈尔巴乔夫、同西方进行一揽子“大交易”(Grand Bargains)的举动也无助于他在俄罗斯政府内的声誉。⁶⁴ 最后人们认为亚夫林斯基没有自己的团队。

叶利钦最后选择了盖达尔和他的由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代替亚夫林斯基来领导后苏联时代的第一个政府并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盖达尔是个出人意料的选择。在这次任命之前,盖达尔没有担任过任何政治职位。叶利钦同盖达尔也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俄罗斯总统是通过布尔布利斯认识盖达尔的,布尔布利斯后来成为叶利钦和他年轻的改革政府之间的媒介。布尔布利斯回忆说:“如果我没有把盖达尔团队介绍给叶利钦,我觉得很明显的是叶利钦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改革者,也不会进行经济改革。但是我觉得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不作为盖达尔内阁同总统之间的调节者,盖达尔团队也不会取得任何成绩。”⁶⁵ 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也游说叶利钦选择盖达尔并力劝他不要选择亚夫林斯基。⁶⁶

叶利钦欣赏盖达尔的自信、直率、坚定和清晰的表达能力。⁶⁷ 盖达尔计划迅速行动,这也符合叶利钦对经济改革的步骤。虽然在经济政策决策方面没有经验,但叶利钦坚定地相信激进和快速的改革是必要的,盖达尔也承诺只需要这样的改革就行。叶利钦还认识到盖达尔有一支密切配

合和一致的团队,能够比单个人更有效地执行改革议程。

虽然从未付诸文字和演讲,但盖达尔的经济改革计划要求立即放开价格和贸易管制,同时要以控制货币发行和政府开支的方式取得宏观经济稳定。⁶⁸一旦取得稳定,就接着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盖达尔的计划同它对市场和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国家干预市场的程度越少越好。同样重要的是(在西方经常遭到误解),该计划同俄罗斯改革者的能力是一致的。俄罗斯国家——一个刚刚存在几星期的实体——没有能力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经济改革。需要以强有力的国家来实施的政策,例如逐步放开价格或者是国家主持将企业进行拍卖,在那个时候是靠不住的。当时盖达尔的顾问弗拉基米尔·毛(Vladimir Mau)写道:“虚弱的国家是一个客观现实,当选择经济—政治战略的时候不得不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⁶⁹

盖达尔及其政府早期阶段的观念是,希望能够对价格自由化震荡所带来的打击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支持。叶利钦在1991年11月第五届国会上保证“价格自由化将伴随着社会保障法令”⁷⁰。同时,稳定——包括首先最重要的是控制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所在。例如,盖达尔抵制工资指数化的意见,并说他只有在西方对这个计划做出财政援助这一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同意这样一个国家政策。⁷¹同样,担任副总理和劳工部部长的亚历山大·肖金(Aleksandr Shokhin)也不赞成储蓄补贴之类的通货膨胀政策。他在1991年11月直率地说道:“我认为来自预算的(储蓄银行账户的)指数化毫无意义。储蓄银行(Sberbank)是个商业组织。”⁷²

在这些陈述经济改革计划的早些日子里,没有多少人明白盖达尔计划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因为俄罗斯已经有七十年没有经历过市场体制了,要指望人们一下子明白供给与需求、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贸易和货币贬值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不现实的。另外,大多数人——政府内部和社会人士——都期望立竿见影。叶利钦本人承诺在年底就有经济上的起色。正如他在1991年底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这是价格自由化的前夕)所解释的:“我已经多次说过,也想再重复一遍:(在经济改革中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将会是艰难的,但是这一时期不会太长久。我们讲的是

六到八个月时间。”⁷³

由于这种对经济计划贫弱的理解，叶利钦和他的政府没有花多大心思来构筑一个政治策略对之加以支撑。同时，在政府内部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叶利钦已经拥有大众的授权来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就像著名的《消息报》(Izvestiya)专栏作家米哈伊尔·伯格(Mikhail Berger)那时所写道的：“即使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如果不实施一些不受欢迎的措施，经济也无法得到改善。而这种措施现在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它们将由一个受到广泛欢迎的政府所推行。”⁷⁴相似的是，盖达尔的顾问弗拉基米尔·毛在他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录中写到，到1991年秋天政治改革似乎已经告终，但是经济改革还没有开始，“在1991年岁末，有一种印象认为重大的政治斗争已经有了结果，权力被掌握在一个人手中，领导者也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改革上了。看起来经济不再是政治的囚徒了”⁷⁵。叶利钦在1991年10月也提出了相同的想法，他说：“我们曾经为了政治自由而战斗，现在我们必须为经济自由而准备了”⁷⁶。

此外，在俄罗斯经济改革家看来，政治是一个肮脏的事务，只能阻碍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叶利钦本人在描述盖达尔和他的同伴最初的反政治态度时说道：“盖达尔的部长们和盖达尔本人基本上对我采取这个立场：你的事就是进行政治领导，我们的事是经济事务。但我们在做我们的事的时候别干涉我们。你那些幕后的狡猾伎俩，那是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明白的。”⁷⁷在更为理论或者抽象的层次上，盖达尔和他的同伴相信能够把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行排序。首先是经济改革，其次是政治改革。考虑到重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困难重重，叶利钦的首届政府决定首要注意力应该放在经济改革上，政府相信经济改革能够产生稳固得多和快得多的结果。布尔布利斯解释道：“我们一开始决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加强经济上，国家建设的这个领域影响着大部分公民的个体利益。”⁷⁸这个有先后顺序的策略也来自一些传播更广的马克思主义理念，这些理念是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的。俄罗斯政府内部的大多数决策者在当时相信俄罗斯不得不首先根据资本主义法则创造一个能够支撑民主体制的新社会。叶夫根尼·亚辛(Yevgeny Yasin)在当时写道：

为了得到稳定，一个民主社会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即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一个可以失去某些东西的私有者阶层——这是一个构成人口相当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我们没有这个基础。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社会将会长时间忍受极端主义的折磨；人民会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他们会倾向于响应那些承诺带来迅速和轻易胜利的人的号召，即他们非常容易受到煽动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年轻的民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危险还摆在前头。⁷⁹

甚至像民主俄罗斯这样迄今献身于进行政治改革的组织，现在也接受了经济改革第一位的想法。⁸⁰

使得俄罗斯政府认为经济改革胜过政治改革而具有优先权的最后一个考虑因素就是时间。盖达尔和他的同伴相信，他们在人民对叶利钦和他们本人的信任衰退下去之间只有有限的时间可以支配。盖达尔特别不想把这些有限的时间用来同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因为他害怕这样做将不会有任何一个改革取得成功。⁸¹盖达尔和他的政府想尽快进行经济改革，使得他们在离职之前能够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⁸²任何从这个高于一切的目标偏离的事情都被认为是多余的。

关于如何设计新的政治体制的构想

经济改革的优先考虑和对有顺序改革的信仰，意味着俄罗斯领导人在1991年秋很少把注意力放在设计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上面。正相反，大多数人都相信苏联和俄罗斯在过去两年内经历了太多的政治改革，以致损害了经济改革。正如当时盖达尔的顾问弗拉基米尔·毛所回忆的，“在那时（1991年底）——无论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人们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即暂停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1988—1989年的政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密友们的第一要务，那么现在，叶利钦决定冻结这个局面”⁸³。即使后来对叶利钦经济改革的步伐和领域进行批评的人也赞同这个按顺序改革的战略。哈斯布拉托夫在同本书作者的一次会谈中说道：“我多次对他（叶利钦）说，让我们把宪法问题放在一边，一起来为经济

出力,然后再来制定一部可为大家都接受的折衷的宪法。”⁸⁴

强化行政权

就叶利钦重构政治体制的主动性而言,他和他的助手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加强行政权威上面,以便他们能够单独进行经济政策的决策并强化经济政策的实施。叶利钦及其助手相信经济政策的决策应该同大众政治隔离开来。⁸⁵ 政策实施也需要一个强有力和独立的政府行政部门。时任叶利钦政府的顾问和部长的叶夫根尼·亚辛,在提出他对经济转型的建议时指出:“我们在所有层面都需要有强大的行政权威,对权威的界限要有非常清楚的描绘。我们应该明白,没有强有力和有效的行政权威,进行我们指望的大规模改革是不可能的。”⁸⁶

这样的行政权威在1991年秋的俄罗斯并不存在。由于叶利钦击败了那些策划8月政变的阴谋家,这给他带来了非常高的公众支持,但是他的总统行政机构的正式权力还是模糊和受到限制的。事实证明,创建总统职位的宪法修正案是在1991年6月总统选举之前的几星期内草草完成的。叶利钦在选举之后和政变之前只担任了两个月的俄罗斯总统。没有人真的明白总统的权力到底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

通过获得议会批准他从1991年11月起在一年内用总统令进行治理的权力,叶利钦开始建构新的行政权威。由于享有非常广泛的大众支持,叶利钦能够完全和独立地创建一个新的政府。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他就任命自己为总理,接着又任命了三个副总理——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和肖金——用他们来管理所有其他的政府部门。

由于考虑到自己不能无限期地把政府同议会的影响分隔开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对的),叶利钦在总统行政机构——曾有效地作为政府工作的替代——的内部设立了一些新的职位和机构。例如叶利钦挑选了一大批顾问,之后任命他们为国家委员会顾问,这些顾问直接向叶利钦负责,而不从属于政府。这些顾问不能被人民代表大会罢免。不仅如此,叶利钦还非正式地在他周围安排了许多长期的私人助手,通常被叫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帮(Sverdlovsk mafia)。⁸⁷ 叶利钦的这些老同事结成的圈子负责起草总统令,并在总统和其他人(包括政府、议会和各社会组织)之间充

当缓冲器。⁸⁸

1992年7月,叶利钦创立了安全委员会,并赋予这个新的政府机构以审查、监督和协调所有政府活动的权威⁸⁹。叶利钦任命了尤里·斯科科夫为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是一个保守的前企业经理,同军工复合体关系非常紧密。虽然法律上对于设立这样一个机构从没有规定,但叶利钦还是从总统办公厅、政府和议会中任命了几个高层官员进入这个委员会,为这个机构赢得了“叶利钦的政治局”这样一个称号。

叶利钦一边在国家层次上加强总统权力,一边决定通过两项体制上的改革在地区层面上加强行政权威。首先他在地区和州创建了一个新的职位,称作 *glava administratsii*,即“行政长官”。这些“州长”(governors)有效地取代了州苏维埃中的执行委员会(*izpolkom*)主席,成为新的地区行政权威。他们直接向国家行政机构负责,而不是向州苏维埃负责。州长任命了新的市长和行政机构的头头,有效地创建了一个自总统到地方市长的等级制行政权威。

这些行政机构首脑的选举被安排在1991年11月8日。然而,叶利钦决定推迟选举而代之以单方面任命。他撤除了一些支持政变的地方领导人的职务,但是在许多地区,他任命前共产党第一书记或者副书记到这些新的岗位。即使在叶利钦任命新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作为行政首脑的地区,例如在下诺夫哥罗德,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被任命为州长,前苏联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大部分成员也得到了州的职位。⁹⁰

为了在地区层面上加强行政权威,除了这些行政首脑之外,叶利钦还发明了第二种体制——总统代表。虽然叶利钦通常任命有经验的行政管理者(例如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和副书记)来当行政机构的领导人,但是,他和他的伙伴还是挑选了更具(民主)意识形态色彩的、在私人关系上同总统挨得很近的人来充当他的代表。叶利钦希望这些总统代表能够在1991年12月前监视地方行政长官。到那个时候,这些总统代表已经具备了必需的技巧和同地方上的联系来管理地方事务,因而可以在12月的选举中竞选行政首脑的位置,代替那些共产党名录的领导人。然而,一旦叶利钦断定12月进行选举太过冒险——因为这次选举可能鼓励地方分权甚至造成联邦的崩溃——他就赋予这些总统代表新的职责,其中

最重要的是在地方上对总统令加以监督和实施。他们还非正式地审查地方上所有主要职位的任命。地方官员把这些人看作叶利钦的钦差大臣。

在创立这些新的行政体制的时候，叶利钦没有直接挑战州苏维埃的权威。相反，这些新的行政职位是有意用来制衡立法权力的。然而，什么是二者之间正确的平衡，答案仍然不清楚，因为无论是联邦宪法还是地方宪章都没有对行政首脑、总统代表和苏维埃的权威进行界定。这些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均衡因为一个事实而变得更为复杂，即在这三者之中只有苏维埃才具备了选举的合法性。另外，也没有一份文件划分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和职责。

选举

人们不能对俄罗斯在成为一个后苏联时代的独立国家后在其最初的几个月里经历的体制上的混乱估计过高。划分国家边界、管理经济和改革政体的游戏规则是突然发生激进的和根本的变革的。考虑到这些变革的范围和复杂性是同时发生的，叶利钦在1991年末最后几个月内的体制设计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瓦解了苏联，着手了市场改革，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与此同时，叶利钦及其同僚就政治游戏规则做出一些意义重大的非决策性决定，这将对此后的俄罗斯政治发展轨迹产生重大影响。不进行新的选举的决策被证明是他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正如已知的那样，叶利钦第一个拖延政治改革的重要步骤是他决定推迟1991年11月的选举，这次选举本来是要在各个州和共和国内选举行政领导人的。到10月，大部分政党都正在准备参加这次选举。⁹¹民主俄罗斯甚至一直推动在所有的苏维埃进行新的选举，以便在新的后苏联时代重组苏维埃。⁹²结果，10月晚些时候叶利钦宣布推迟选举的决定使许多人感到吃惊，这其中包括了一些民主运动中叶利钦的支持者。

叶利钦甚至没有为俄罗斯议会确定新的选举方案，尽管他的许多政治盟友催促他这样做。叶利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道：“解散议会和安排新选举时间的主张四处流传，虽然我们没有利用这一局势。”⁹³许多人从东

欧国家的变革所进行的选举次序中得到经验,认为一次开创性的选举的绝佳时机应该紧接着共产党的下台。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特别坚持及早举行选举,因为他们相信秋季选举将会产生许多正面的政治后果。民主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选举在经济改革之前进行的话,他们的组织在叶利钦的支持下会在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中赢得大多数席位。同时,民主俄罗斯也是唯一一个在全国展开活动的合法的政党和社会运动。由于刚刚顺利组织了叶利钦在1991年6月的竞选并在8月作为反对政变的先锋,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确信他们可以赢得选举的胜利。⁹⁴选举也会刺激政党的发展,这反过来也内在有助于重组议会,在政府的立法机构内树立叶利钦自己的代表性。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对早期选举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们在1991年10月就开始制定竞选方案。

然而,叶利钦和他最亲密的顾问,出于某些原因而最终否决了早期竞选的主张。首先,独立的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他们刚刚创立的国家并没有举行一场全国性选举的能力。⁹⁵在开始的几个星期内,俄罗斯没有基本的力量来为印刷选票提供资金,也没有行政能力来组织和任命选举委员会。其次,突然之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由于全神贯注于监督苏联帝国的解体和实施经济改革,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也无法举行一次选举。正如叶利钦当时认为的:“我相信构建(国家垂直结构的)最佳变量就是行政首脑的普选。但是,今天的形势使得这个程序显得过分奢侈。选举和深度的经济改革同时进行是不可能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等于摧毁一切……任命行政长官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是需要的。”⁹⁶第三,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不相信新的选举会产生一个更加主张改革的议会,或者使叶利钦的支持者在地区层面得到权力。这些选举两个月以前,阿卡迪·穆拉谢夫(Arkady Murashev)的报告说,叶利钦的国务委员会的共识是,如果政府继续如计划所安排的那样推行地区选举,共产党将会赢得大多数州一级的选举。⁹⁷由于有地区选民的支持,那些地方行政长官可能更加难以共事,如果他们是被任命的,则会感谢总统给予他们职位,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于议会选举,叶利钦讲道:“我心里有一个疑虑,担心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把正派的候选人推选进新的立法机构。”⁹⁸盖达尔和他的顾问们也不相信新的选举会产生一个更为自由主义的议会。⁹⁹第四,也是最后一条理由,叶利钦和他

的政府害怕新的选举会加剧俄罗斯联邦的分裂趋势,就像 1990 年在加盟共和国一级上举行的选举促进了苏维埃联盟的崩溃一样。¹⁰⁰

保留苏维埃体制

新的议会选举暗含着解散还在任期中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之义。在那时,许多激进的民主派人士认为,这一制度变革对于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成功都是十分重要的。¹⁰¹ 叶利钦在其回忆中似乎同意这一观点,指出“我相信在政变之后错过的最重要的机会,就是没能对议会体制进行激进的重组”¹⁰²。但是,那时叶利钦在反对俄罗斯议会这一行动上有所节制。他的主动性有所欠缺,这可以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得到解释。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叶利钦认为那时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是盟友。1991 年 8 月,叶利钦和俄罗斯议员们一起保卫了白宫——俄罗斯议会的办公地点。在未遂政变发生之后,俄罗斯议会的新任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立即反复申明他是叶利钦“最亲密的盟友”¹⁰³。1991 年 8 月,哈斯布拉托夫直截了当地说:“最高苏维埃和总统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¹⁰⁴ 同样,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的盟友也相信,立法和行政当局能够在这个转型期内作为搭档合作共事。正如布尔布利斯在回忆所指出的,“在整个 9 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大部分与为改革创造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行动都被议会和最高苏维埃所认可。大部分议员甚至认可了《别洛韦日协议》。实际上,总统从议会那里得到了领导政府和开始经济改革的权威”¹⁰⁵。如果议会不支持叶利钦的改革方针的话,他们就不会在 1991 年 11 月授予他特别总统令的权力。在未遂政变发生之后,总统和议会看起来是如此亲密的盟友(这是由他们对政变策划者共同的抵制所促成的联合),以至于俄罗斯议会的解散被看作是对叶利钦的合法性和改革进程的损害。

其次,紧接着未遂政变之后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叶利钦和他的政府对于同时摧毁太多的政治机构持谨慎态度。随 1991 年 8 月事件而诞生的俄罗斯只有为数很少的政治机构——好的、坏的、或者其他什么的。虽然不是很完美,但议会与其他地区和市级苏维埃至少建立了立法机构。此外,这些机构比其他的大多数机构都有更多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代表是

被选出来的,而不是被任命的。早先这些使这套机构合法化的努力阻碍了新机构的创立。¹⁰⁶

再次,因为叶利钦个人曾经帮助俄罗斯议会成为一个政治立法机构,摧毁它可能会伤害他个人的信誉。叶利钦和大多数俄罗斯民主派领导人在1989年做出过一个战略决策,在1990年也是如此,即参与到这些苏维埃的选举中来。虽然这一战略决策在当时的民主阵营内部引起了争论,但是,这个决定起着这样一个作用,即苏维埃作为俄罗斯开始形成的民主的一个机构而具有合法性。叶利钦和他大多数盟友随后在这些苏维埃中的参与,加强了他们在这些体制上的立场。叶利钦实际上是作为人民代表而在政治上复出的。仅仅在政变发生两个月前,叶利钦仍然是俄罗斯议会的主席。

最后,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抵制政变时所扮演的象征角色,为废除这个立法机构增添了另外一道障碍。白宫保卫战是抵抗政变的标志性一页。在8月那起伏跌宕的三天里,议会通过的紧急状态法有助于瓦解对政变组织者的支持。因此,解散议会和关闭白宫就会破坏国家独立时刻的反抗政变的体验。

宪法难题

如果叶利钦能够预见到将来同议会的冲突,他可能就会迅速行动、采用一部新的俄罗斯宪法。由于全神贯注于其他议程,例如解散苏联和开始经济改革,叶利钦及其盟友们没有推动采用一部新宪法,虽然最高苏维埃宪法委员会(叶利钦是主席)已经制定出一部最初的草案,并在8月末遂政变之前已经传播开来。

自从1990年9月最初的草案完成之后,在俄罗斯境内起草和讨论一部新的宪法就一直在进行。在1990年10月,宪法委员会投票采用了首部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将其原文呈递给议会。¹⁰⁷第一部宪法草案已经在11月得到发表和广泛的讨论。¹⁰⁸然而,俄罗斯议会在苏联崩溃之前并没有就一部新宪法举行投票。在1991年8月末遂政变发生之后,就是否需要通过一部新宪法的重大争论又开始了。宪法委员会的秘书长奥利格·鲁姆扬茨耶夫,对立即通过一部新宪法最为热情。在1991年10月10日

最高苏维埃的演说中,他列出了亟需批准新宪法的十二个理由。¹⁰⁹鲁姆扬茨耶夫认为采用一部新宪法将会给叶利钦的总统令带来更大的合法性,在总统和议会之间保持权力平衡,阻碍联邦内部的分裂倾向。鲁姆扬茨耶夫也认为需要一部新宪法来为市场经济转型提供合法依据。

在1991年11月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鲁姆扬茨耶夫试图把批准一部新宪法加到议程上来,但是叶利钦没有支持他的这一努力。¹¹⁰当时,叶利钦和他的代表们全神贯注于俄罗斯联邦瓦解的可能性。许多人害怕采用一部新宪法将会加速联邦的分离过程,因为鲁姆扬茨耶夫的草案给予地方政府特别是各自治共和国以相当可观的权力。但是,叶利钦阻碍采用一部新宪法的主要动机是他不把批准新宪法看作是优先考虑的事情。相反,在他看来,在这个严峻时期,有关宪法的争论将会把政治资本从更为紧要的议题上面转移开,例如苏联解体和经济改革——这是一些需要立即关注的议题。而且,叶利钦的一些同僚认为采用一部新宪法将会限制叶利钦本人继续从事诸如经济改革这类议题的能力。¹¹¹根据他们的估计,驾驭制度的政治规则的模糊性可能在事实上为建构新的经济体制的单方面行政活动提供方便。更为一般的是,在俄罗斯初生的政体中还没有出现宪政文化(因此正式规则中的中央集权被许多人所怀念)。一些代表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模糊的主张,即选举一个宪法会议,它接下来将起草一份新的宪法。但是这个主意也没有被接受。¹¹²

最后,在关于一部新宪法应该怎样得到批准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¹¹³如果议会被允许就一部新宪法进行投票(这是老宪法中规定的程序),那么议会也能够在今后轻易表决改变宪法。叶利钦的工作团队不想参与到这样一个批准程序中来,因为这将会重新确立议会的最终权威。同时,议会也不打算把这项权力转让给全民公决这一程序。于是僵局出现了。总统顾问米哈伊尔·克拉斯诺夫(Mikhail Krasnov)回顾道:“不可能用旧体制来创造一个新体制;冲突(在这些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¹¹⁴

总统党

另一个政治上的不作为是选择不组建一个总统党。叶利钦做出的这个决定同他最亲密的政治顾问布尔布利斯的愿望发生了冲突。布尔布利

斯把创建一个政党看作是把叶利钦的个人威望转化为更为有效地治理俄罗斯的组织工具。在8月末遂政变失败之后的欢天喜地里,人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叶利钦,但是布尔布利斯警告说他们不会无限期地这么做。在布尔布利斯看来,这种高扬的情绪因此应该被一个具有一定意识形态和计划的政党所补充,这个政党将能把新体制的目标同民众联系起来。另外,布尔布利斯看到了这个新政党的先锋角色。正如他所解释的:“直到有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新)人控制着稳定的国家机构,一个政党才能执行传统的组织职能。”¹¹⁵布尔布利斯认为,只有一个忠于叶利钦的政党才能胜任贯彻执行新政权艰难的改革政策,因为苏联体制下的老共产党政府官员只会阻碍改革的努力。布尔布利斯的这些观点得到了民主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的支持,这些人打算把他们的政治运动转化为一个总统党。¹¹⁶他们相信一个新的总统党将会帮助叶利钦在议会中推行一项改革议程,也会有助于在地区层面上执行计划。

然而叶利钦不同意。布尔布利斯以下列语言解释了叶利钦的反对意见:“叶利钦的论点(反对建立一个政党)就是下列内容:人民在经过数十年无产阶级专政后对任何政党活动都很反感。他说他不可能支持这个(政党的建立),因为他是在一个非党派的基础上被选出来的,因此应该作为全民的总统那样行事。”¹¹⁷根据布尔布利斯的观点,叶利钦也担心政党将会限制他在一些政策议题上的行动自由。同时,盖达尔也对创建一个总统党持保留意见,认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把民主俄罗斯从一个抗议抵抗运动转变为一个执政党。对主管经济改革的技术专家来说,诸如民主俄罗斯这样的人民团体只会使他们的工作复杂化。在他们看来,遣散所有的政治团体会使改革更容易进行。¹¹⁸在民主俄罗斯内部,一些领导人也认为俄罗斯没有为多党政治做好准备。另外一些人害怕成立一个总统党将最终重建一党专制国家。¹¹⁹

为了代替建构一个全国性的有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权力,布尔布利斯和他的助手有意识地寻求重新恢复一种新的个人崇拜。布尔布利斯回忆说:

我们非常诚实和公开地使用了一种经典的、有数世纪历史的俄罗斯传统——领袖魅力型的权力……我有意识地培养这种领袖魅力

式的权力,意识到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在共产主义体制崩溃、新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形式建立之时在人民心中产生一种统一的情感。一个具有权威的人来整合人民中的大多数,他作为领导,象征着所有的麻烦和希望——这就是我们在实际中培养的总统。¹²⁰

因此,由于叶利钦被赋予了这个角色——全体俄罗斯人的领导——他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政党。

清洗共产党?

在叶利钦未作出的决定中,没有比他偏袒许多来自苏联体制中的官员、保留他们在政治权力中的位置更有争议了。这些人中也包括了那些曾经是苏联共产党高级官员的人。叶利钦原则上不反对把新人带进政府里来。毕竟,他在1991年最亲密的顾问布尔布利斯,在前苏联体制中没有任何政治和管理经验。同样地,盖达尔和他的部长们对于政府生活也是陌生的。

但是哪些人有资格被任命到数以百计的国家职位上去?在这个转型时刻,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例如阿法纳斯耶夫和波诺马尔耶夫都期望能够在新的“民族团结”政府里获得关键职位。¹²¹然而,几乎没有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可能包括帕诺马特耶夫(Ponomarev)和阿法纳斯耶夫]有资格获得行政职位。该运动的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最终在转型期内占据了联邦和莫斯科政府的关键职位。波波夫于1991年6月被选为莫斯科市长,阿卡迪·穆拉谢夫在未遂政变之后成为莫斯科内务部的首脑,维克多·季米特耶夫获得了总统行政机构中负责处理与西方金融机构关系的职位。然而这三位在任的时间非常短暂,他们很快或者辞职或者被解职。民主俄罗斯的一些中层领导人的确上升成为一流的国家官员和行政领导,包括瓦西里·谢克诺夫斯基(Vasily Shakhnovsky, 1991—1997年担任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办公厅主任),叶夫根尼·索加斯特亚诺夫(Yevgeny Socastyanov, 1991—1994年任莫斯科克格勃首脑,1996—1998年成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基里尔·伊格纳特耶夫(Kirill Ignatiev, 1993—1998年担任俄罗斯最大的电视网ORT的副主管)。然而,叶利钦总体上认为,民主俄罗斯的活动家们是出色的抗议组织者,却是很差劲的

管理者。¹²²

民主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意这一点。甚至激进的民主派人士诸如穆拉谢夫,也看到了把苏联共产党官员保留在政府内对维持稳定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民主俄罗斯还没有准备好来承担管理责任。¹²³在关于这个时期的回忆中,盖达尔也悲叹缺乏合格的、具有改革头脑的人来担当关键的政府职位。¹²⁴在某些方面,俄罗斯的转型发生得太快,因为反对派还没有准备好获得权力。随着时间的过去,精英的替换发生了,但是大多数激进的民主派人士被排除在这一交替之外。¹²⁵

缺乏能力不是叶利钦对替换苏联官员持保守态度的唯一原因。叶利钦也想使他的革命和平地进行。在回忆1991年秋他看见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外面的情景时,叶利钦说:“我开始看见十月革命的幽灵在重新飘荡——大屠杀、无秩序、抢劫、经常性的集会和无政府状态,这些都是十月革命开始的条件。只要把手一挥,发出一个信号就有可能把1991年8月变成1917年10月。但是我不会那样做,我也不后悔。”¹²⁶虽然民主俄罗斯内部的一些活动家主张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应该因为其罪行受到审判,如同纽伦堡审判一样,但叶利钦害怕这样做会破坏和平气氛。因为苏联共产党渗透进苏联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如果苏联共产党的成员被肃清,那么有才能的人就很少能够留下来。同时,叶利钦的新生俄罗斯国家也极度虚弱:它没有控制武装力量;它要为一个正在崩溃的经济负责;它在一些自治共和国内面临着分离主义的威胁。一个试图挑战苏联共产党特权阶级的实际行动可能会触发倾覆叶利钦政权的反应。民主俄罗斯也在推动彻底重组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叶利钦对此也加以拒绝。¹²⁷

而且,叶利钦本人也来自旧制度。虽然他明白任命新的年轻一代来启动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个人却觉得同那些与他有相似背景和经验的人打交道更惬意一些。正像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由于这个原因,他邀请了一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同事加入他新的总统办公厅。叶利钦的管家尤里·彼得罗夫(Yuri Petrov),曾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担任党的第二书记,当时叶利钦是第一书记。秘书长维克多·伊尔尤辛(Victor Ilyushin)曾经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共青团第一书记。叶利钦另外一个亲

密的助手奥利格·洛波夫，当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¹²⁸在地区一级，叶利钦任命行政长官的决定使得他的许多前任同事——州的第一书记们——能够保持他们的政治生涯。通过使这些来自旧体制的人保留在权力岗位上，叶利钦试图否认他的政权的革命本质：

我看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和新俄罗斯之间的连贯性。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同一切决裂、摧毁一切不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在把全新的人带进政府的同时，我仍然也在考虑利用那些在政府中有着工作经验的行政人员、组织者、像尤里·斯科科夫这样的领导者、大型军工企业的厂长，以及来自情报部门和强力部门的人员，这是可能的。¹²⁹

这一政策的一个后果就是，叶利钦放弃了对8月未遂政变罪行进行调查的计划。共产党被置于宪法法庭进行审判，但是这一审判的结果没有导致清洗和逮捕。正如在下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叶利钦最终决定，干部的连续性甚至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来说也仍然是需要的。在组建了第一个后苏联时代的政府后的一年内，叶利钦把大部分新面孔都从高级政府职位上清除掉了。

通过击败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叶利钦及其盟友们为在俄罗斯实行激进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制度改革打开了大大的一扇机会之窗。在政变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叶利钦几乎没有面对任何公开的反叛。没有受到任何过渡性安排和与旧政权代表之间的协议的约束，叶利钦看起来拥有一切自由，只要他愿意，他就能任意设计一种制度。

然而，太多的自由却可能削弱那些被公开宣扬的制度改革。在所有方面同时进行变革的责任对俄罗斯新领导人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计划在1991年就掌权，他们对此毫无准备——甚至没有一份改革的蓝图。他们首要关注的是苏联的解体，他们至少已经继承了一个有着内部疆界（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盟¹³⁰。然而，路径依赖对经济和政治制度没有那么慷慨。在寻求创建一个新的、同民主政体相符的制度环境的时候，俄罗斯领导人很少能从苏联体制中找到可以利用的相关制度。在拉丁美洲、南欧甚至中东欧发生的民主转型中，被威权主义统治所压制的原有的民主制度只是被再次激活，这是一个比建立新制度要有效得多

的过程。然而,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这样的制度可以拿来重新使用。叶利钦在回忆面临这种挑战时说道:

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每一件事。副总统是什么?俄罗斯的宪法法院应该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因为俄罗斯以前从来没有这些制度,所以这是一片空白。每件事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经常要求助于分析(可从国际实践中借鉴什么?),但是,同时我们不得不懂得一件事情在国外是一回事,在国内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是不同的)。我们不得不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其他地方人们如何行动中寻找答案。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结果就是出现了一批有着优雅结构和漂亮名字的东西,但是实际上空洞无用。¹³¹

同时发生的改变、缺乏政治改革的计划产生了继之而来的一种策略。叶利钦和他的政府首先从事苏联解体,接下来处理市场改革。创建一个新的俄罗斯民主制度被排在第三位。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记者们、全球的政治家们和学者都在欢呼1991年8月未遂政变的失败,把它看作是俄罗斯民主的历史性胜利。然而在1991年,建立俄罗斯民主制度在这场胜利的英雄的考虑之中被排在最末。他们的议程中有其他的优先事务。

就像在8月未遂政变之后变革的议程仍然任务繁多一样,支持和反对变革之间的力量均衡仍然处在不定之中。在政变失败之后,叶利钦就立即享有了与其对手相比的压倒性的权力和合法性。然而,当叶利钦开始进行他的改革议程的时候,这种突如其来的权力很快就消失了。如同下一章将要详细讨论的那样,在为政治体制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失败中创造和保持了权力分配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对俄罗斯重新出现政治极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极化最终推翻了俄罗斯第一共和国。

注 释

1. 关于对那段时间的品味,参见 *V Avguste 91-go: Rossiya glazami ochevidtsev* (Moscow: Limbus-Press, 1993); Victoria Bonnell, Ann Cooper, and Gregory Freidin, *Russia at the Barricades: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August 1991 Coup*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

2. 作者对于艾伦·斯蒂文森(Irene Stevenson)提供了在政变的第三天之后

的回忆表示感激。

3. Yegor Gaidar, *Dni porazhenii i pobed* (Moscow: Vagrius, 1995), 76.

4. 戈尔巴乔夫的话引自 *Sovetskaya Rossiya*, October 22, 1991, 1.

5. 这个标题来自 *Times*, September 2, 1991, 3.

6. 关于描述这一时刻最后结局的言词,参见《国家利益》杂志(*National Interest*)的专题“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31 (Spring 1993); Martin Malia, *The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1917—1991*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David Remnick, *Lenin's Tomb*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94)。为了保持与生死修辞的一致,雷姆尼科(Remnick)将他的下一本书命名为 *Resurre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7.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 1970): 351.

8. 在确立转型的规则之前,许多正在经历民主化的国家并没有从推倒重来开始。在那些在军队和民主规则之间犹豫不定的国家,旧的制度可以在民主化之中复苏。正如奥唐奈和施密特在他们多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那样,所有的案例都验证了“在过去有过一些类似的规则和程序”。参见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8.

9. John Dunlop, *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6—237.

10. 这种制度上的推倒重来的景象经常出现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研究文献中。例如参见 Jon Elster, Claus Offe, and Ulrich Preuss,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27.

11. 在许多转型中,旧制度中的领导人和规则继续存在,但是最成功的协商性转型试图界定他们的地位和功能,使得他们不对新的民主政体产生破坏作用。智利民主化转型之后将武装力量的首脑职位指派给皮诺切特(Pinochet),就是一个在新政体中对旧角色的权力和限制进行界定的很好例子。

12. 阿纳托利·卢克亚诺夫认为这一解散是一个重大的悲剧性错误,指责戈尔巴乔夫让它如此轻易地发生了。参见 Lukyanov, *Perevorot: Mnimyi i nastoyashchi: Otvety na voprosy, prishedshie v “matrosskuyu tishinu”* (Voronezhskaya Oblastnaya Organizatsiya Soyuzha Zhurnalistov Rossii, 1993)。

13. 在苏联崩溃之后的修正主义历史学中,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一个在政变发生之后的历史变化的旁观者。但是,在政变发生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戈尔巴乔夫却非常配合地帮助破坏苏联的制度[作者在此对合众社记者阿兰·库珀曼(Alan Cooperman)表示感谢,是他提醒了作者这一点]。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

配合,政变要想有结果就会很困难。

14. 戈尔巴乔夫的话引自 Bruce Nelan, "Desperate Moves", *Times*, September 2, 1991, 27。

15. 这样的制度崩溃时刻为新的观念对未来制度的发展产生影响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参见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间断平衡(punctuate equilibrium)思想。该思想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参见 Stephen Krasner,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6 (1984): 240—244。

16. 叶利钦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议会上的讲话,参见 *Izvestiy*, September 4, 1991, 4—7; reprinted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3 (October 16, 1991): 3。

17. 参见叶利钦 1991 年 10 月 28 日在第五次议会上的演讲,收录于 *Yeltsin-Khasbulatov: Edinstvo, kompromis, bor'ba* (Moscow: Terra-terra, 1994), 96。

18. 关于这种现象,参见 Theda Skocpol, "Social Revolutions and Mass Military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0 (1988): 147—168。

19. 参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谢尔盖·巴布林(Sergei Baburin)与作者在 1991 年 11 月的访谈。

20. 参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当时的民主俄罗斯领导人维克多·阿克修切茨和米哈伊尔·阿斯塔费耶夫与作者在 1991 年 10 月 11 日的访谈。

21. 参见尼古拉·特夫金(当时是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以及俄罗斯民主党的主席)与作者在 1991 年 10 月 8 日的访谈。

22. 参见 Gavriil Popov, *Chto delat'dal'she* (Moscow: December 1991)。

23. 参见列夫·波诺马廖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当时的民主俄罗斯副主席)与作者在 1991 年 10 月 8 日的访谈。

24. 参见叶戈尔·盖达尔与作者在 1997 年 10 月 8 日的访谈。

25. Steven Solnick, *Stealing the State: Control and Collapse in Soviet Institu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hilip Roeder,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 Boris Yeltsin, *Zapiski prezidenta* (Moscow: Ogonek, 1994), 148。

27. 引自 *Izvestiya*, September 7, 1991; reprinted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3 (October 9, 1991): 6。

28. Ibid.

29. Ibid, 7.

30. Martha Brill Olcott, *Central Asia's New States: Independence,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U. S. Institute of Peace, 1996), chap. 1.

31. 参见 S. Chugaev and V. Shchepotkin, "The Parliament Has Returned to a Different Country," *Izvestiya*, August 26, 1991, 1; reprinted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3(October 2, 1991): 5.

32. 纳扎尔巴耶夫在苏联人民代表会议特别会议上的演讲,收录于 *Izvestiya*, September 2, 1991; reprinted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3(October 2, 1991): 5.

33. 参见俄罗斯民主党第三次大会发布的公告。"Obrashchenie III S'ezda DPR k Narodnym Deputatam RSFSR," mimeo, 未标注日期,但在1991年12月3日的第三届国会发布。

34. 叶利钦的演讲,参见 *Obshchaya Gazeta*, August 20, 1991. reprinted in *Yeltsin-Khasbulatov*, 91.

35. S. Chugaev and V. Shchepotkin, "Parliament Wants to Save Face—And Its Pay," *Izvestiya*, August 30, 1991, 1; reprinted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3 (October 2, 1991): 6.

36. 正如在第三章讨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之前已经削弱了苏联共产党作为统治组织的地位。联盟中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非常乐意看到共产党的解散,因为这种行动强化了地方对共和国国家制度的权威。在俄罗斯,俄共也无意继续维持苏联共产党,因为苏共的解散为俄罗斯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接手控制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甚至有希望接手联邦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财产。关于党内政治权力的长期大量流失,参见 Graeme Gill, *The Collapse of the Single-Party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7. "Zayevlenie soveta predstavitelei dvizheniya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September 15, 1991), in *Dvizhenie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Informatsionnyi Byulleten'* 14 (August-September 1991): 1.

38. Gaidar, *Dni pobed i porazhenii*, 113.

39. 起初戈尔巴乔夫在任命这些部长之前并没有征求叶利钦的意见,而叶利钦则对其中几项任命表示了愤怒。他要求戈尔巴乔夫收回对其中几个人的任命,并且将来有关部长的任命都交由他来决定。戈尔巴乔夫最后勉强同意,这一决定标志着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独立统治者开始丧失权威。参见 Yeltsin, *Zapiski prezidenta*, 144.

40. 正如苏共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参谋长弗拉基米尔·罗波夫(Vladimir Lobov)将军在一次访谈中说到的那样:"团结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单独的武装力量越多,那么共和国之间直接对抗的危险就越大。"Lobov, interview in *Pravda*, September 9, 1991, 1—2;收录于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3 (October 9, 1991): 17.

41. 叶利钦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在与作者的一次谈话中,苏联议会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召集会议,因

为他认为那个时候大多数代表都会批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参见卢基扬诺夫与作者在1993年11月的访谈。

42. “Net nichego vyshe interesov cheloveka,” *Sovetskaya Rossiya*, September 6, 1991, 1.

43. 引自“V poliskakh soglasiya,” *Sovetskaya Rossiya*, September 4, 1991, 1.

44. 叶利钦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45. Ibid.

46. 参见苏共前政治局委员各里戈里·雷文科与作者在1999年3月的座谈。

47. Yeltsin, *Zapiski prezidenta*, 150.

48. 叶利钦在1991年12月12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讲话,收录于 *Yeltsin-Khasbulatov*, 103.

49. Gaidar, *Dni porazhenii i pobed*, 148.

50. “Agreement of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December 8, 1991; 收录于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From Crisis to Collapse*, rev.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638.

51. 作者此时正在莫斯科,参加了议会的一些讨论和政治领导人之间关于俄罗斯未来主权的一些非正式讨论。俄国的情况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没有关于独立的庆典,没有围绕独立创建新的象征和神话。相反,只有那些反对解散的人在当时组织了示威抗议。苏联的国旗于12月25日降下,比预计的要早几天,主要是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简短而又苦涩的离职演讲。在权力交接的仪式上,叶利钦从没有与离去的“殖民统治者”会晤过。甚至连装有核武器密码的黑匣子的交接都是通过中间人传递的。

52. Interview with Yeltsin, *Komsomolskaya Pravda*, August 19, 1995, 1—2; 引自 *What the Papers Say*, August 21, 1995, 11.

53. Yeltsin, *Zapiski Prezidenta*, 153.

54. 参见作者与当时叶利钦的首席顾问布尔布利斯在1995年6月30日的访谈;作者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民主俄罗斯领导人阿纳托利·沙贝德在1995年7月4日的访谈。

55. Vladimir Mau, *Ekonomika i vlast'*; *Politicheskaya istoriya ekonomicheskoi reformy v Rossii, 1985—1994* (Moscow: Delo Ltd., 1995), 44—45.

56. 参见 Robert Jacks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yond the Cold War,” in *Beyond Westphalia?* ed. Gene 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55.

57. 参见与盖达尔的访谈。

58. 与哈斯布拉托夫的访谈,参见 *Sovetskaya Rossiya*, December 4, 1990, 收

录于 *Yeltsin-Khasbulatov*, 58。

59. 与哈斯布拉托夫的访谈, *Narodnyi Deputat* 15 (1991): 7—8; 收录于 *Yeltsin-Khasbulatov*, 90。

60. Ibid.

61. Khasbulatov, *Pora peremen*, December 1991; excerpts reprinted in *Yeltsin-Khasbulatov*, 60.

62. Yeltsin, *Zapiski prezidenta*, 163.

63. 根据利夫·波诺马尔耶夫的说法,他和民主俄罗斯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在1991年10月与鲁茨科伊进行过会晤,讨论鲁茨科伊的候选人资格问题。参见列夫·波诺马尔耶夫与作者在1995年7月19日的访谈。哈斯布拉托夫想成为总理的愿望随即公开化。在他与作者于1995年6月的谈话中,他明白地表示他认为自己是最适合这个工作的经济学家。另可参见 Vyacheslav Kostikov, *Roman s prezidentom: Zapiski press-sekretarya* (Moscow: Vagrius, 1997), 158。

64. 这个大交易最初是由亚夫林斯基和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进行的,意在获得西方对于苏联的财政援助。参见 Yavlinsky and Allison, *Window of Opportunity*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1991)。

65. 参见与布尔布利斯的访谈。

66.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民主俄罗斯副主席维克多·季米特耶夫 (Viktor Dmitriev) 与作者在1992年1月的访谈。彼特·普林格尔 (Peter Pringle) 也持这样的观点,参见 Peter Pringle, "Gaidar and Co.: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Moscow Magazine*, June-July 1992。

67. Yeltsin, *Zapiski Prezidenta*, 164.

68. 叶利钦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之前的1991年10月28日即指出了经济改革计划的主要原则。

69. Mau, *Ekonomika i vlast'*, 42.

70. "Vystuplenie B. N. Yeltsina," *Sovetskaya Rossiya*, October 29, 1991, 1.

71. Andrew Åslund,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68.

72. 与肖金的访谈, *Rossiskaya Gazeta*, November 1, 1991; 收录于 Aleksandr Shokhin, *Moi golos budet vse-taki uslyshan; Stenogramma epokhi peremen* (Moscow: Nash Dom-L'Age d'Homme, 1995), 11。

73. 1991年11月30日叶利钦的电视讲话,发布于 *Yeltsin-Khasbulatov*, 111。

74. Mikhail Berger, "The Union Economy: Nonemergency Committee in Emergency Conditions," *Izvestiya*, August 26, 1991, 2; 收录于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3 (October 9, 1991), 12。

75. Mau, *Ekonomika i vlast'*, 43.

76. 叶利钦1991年10月28日在第五届大会上所作的演讲; 收录于 *Yeltsin-*

Khasbulatov, 96.

77. Boris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156—157.

78. 参见与布尔布里斯的访谈。

79. Yevgeny Yasin, "A Normal Economy Is the Main Condition for Democracy," *Izvestiya*, August 27, 1991; 收录于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3 (October 9, 1991): 15.

80. 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米哈依尔·施耐德与作者在1997年10月12日的访谈。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民主俄罗斯领导层中几乎没有经济学家。直到8月未遂政变,诸如反共产主义、多党派发展及人权等主题在民主俄罗斯那里都更为突出。

81. 参见与盖达尔的访谈。

82. 阿纳托利·丘拜斯在1999年5月17日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作演讲时,重新反省了先前的经济改革战略,并强调了这一观点。

83. Mau, *Ekonomika i vlast'*, 43.

84. 参见作者与前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在1995年6月7日的访谈。

85. 更为一般地说,这种关于自治重要性的讨论和观点体现在斯蒂芬·哈格特德(Stephen Haggard)和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Kaufman)的著作中。Stephe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86. Yasin, "A Normal Economy Is the Main Condition for Democracy."

87. Pilar Bonet, *Nevozmozhnaya Rossiya: Boris Yeltsin, provintsial v kremle* (Ekaterinburg, Ural: April 1994).

88. Julia Wishnevsky, "Russian Grippped by 'Court Fever,'" *REF/RL Research Report 1* (March 6, 1992): 5; Vasily Lipitsky, "Revoliutsiya—Eto tisyachi novykh vakansii," *Nezavisimaya Gazeta*, March 27, 1992, 2.

89. Aleksei Kirpichnikov, "Yuri Skokov; Novyi samyi glavnyi," *Kommersant'* 28 (July 6—13, 1992): 2.

90. 参见作者在1992年8月20—21日与州长办公室官员以及下诺夫哥罗德州苏维埃人民代表的访谈。

91. 参见人民代表、自由俄罗斯人民党(People's Party for a Free Russia)执行委员会主席瓦西里·利皮茨基(Vasily Lipitsky)与作者在1991年10月10日的访谈;以及与波诺马尔耶夫在1991年10月8日的访谈。

92. Yevgeny Savost'yanov, "Rezolyutsiya plenuma SP dvizheniya 'Democraticheskaya Rossiya' o vyborakh mestnykh Sovetov i glav mestnoi administratsii," *mimco*, fall 1991.

93.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126.

94. 参见作者与民主俄罗斯领导人尤里·阿法纳斯耶夫、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Ilya Zaslavsky)、米哈伊尔·施耐德,以及列夫·波诺马尔耶夫在1991年10月的访谈。

95. 参见作者与布尔布利斯的访谈。

96. 参见叶利钦在第五次俄罗斯代表大会之前的讲话, *Sovetskaya*, October 29, 1991, 3.

97. 参见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民主俄罗斯副主席阿卡迪·穆拉谢夫与作者在1991年10月11日的访谈。穆拉谢夫参加了那些国务会议。

98.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126.

99. 参见与盖达尔的访谈,以及 Mau, *Ekonomika i vlast'*, 44.

100. 参见与布尔布利斯的访谈;同时参见与盖达尔的访谈。

101. Popov, *Ghto dyelat'dal'she*.

102.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126.

103. 参见作者与哈斯布拉托夫的访谈, *Sovetskaya Rossiya*, December 4, 1990; 收录于 *Yeltsin-Khasbulatov*, 58.

104. Khasbulatov, *Rossiiskaya Gazeta*, October 8, 1991; reprinted in *Yeltsin-Khasbulatov*, 93.

105. 参见与布尔布利斯的访谈。

106. 这就是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文章中讨论到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参见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7. 参见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宪法委员会秘书奥利格·鲁姆扬茨耶夫与作者在1995年5月29日的访谈。

108. 第一稿的全文可见于 Konstitutsionnaya Kommissiya RSFSR, *Knstitutsionnyi Vestnik* 4 (1990): 55—120.

109. 该演讲的全文收录于 *Konstitutsionnyi Vestnik* 8 (1991): 3—7.

110. 参见与鲁姆扬茨耶夫的访谈。

111. 参见作者与代表、宪法委员会副主席维克多·谢尤尼斯(Vikor Sheunis)在1997年10月10日的访谈。他自己并不倡导这一立场,但是向作者透露了对叶利钦顾问的印象。

112. 参见俄罗斯联邦人代会人民代表、这份建议书的作者之一玛丽娜·赛利耶(Marina Salye)与作者在1991年10月14日的访谈。

113. 参见当时任议会第一副主席的谢尔盖·费尔奥多夫(Sergei Filatov)与作者在1998年3月25日的访谈。1992年12月,他成为叶利钦的办公厅主任。

114. 参见总统顾问米哈伊尔·克拉斯诺夫在1998年3月27日与作者的访

谈。克拉斯诺夫认识到的问题并不是俄罗斯都有的。参见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以及 Jon Elster, "Ways of Constitution Making," in *Democracy's Victory and Crisis*, ed. Axel Hadeni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3—142.

115. 参见与布尔布利斯的访谈。

116. "Zayavlenie soveta predstavitelei dvzheniya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September 15, 1991), *Dvizhenie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Informatsionnyi Byulleten'* 14 (August-September 1991): 1.

117. 参见与布尔布利斯的访谈。

118. 得出这个印象是基于在 1992 年夏天和秋天与盖达尔的几个助手的座谈。

119. 参见与特沃金的访谈。

120. 参见与布尔布利斯的访谈。

121. 比如 1991 年 10 月在作者参加的一个会议上, 尤里·阿法纳斯耶夫拒绝了西方资助俄罗斯民主运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出版社, 指出他和他的盟友将会很快接管俄罗斯所有的出版社。

122.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154—155.

123. 参见 Aleksei Elymanov, "Detskaya bolezni' levezny," 以及反驳文章 Lev Ponomarev, "Oshibochnyi diagnoz," 二者均收录于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28 (October 4—11, 1991): 7.

124. 参见与盖达尔的访谈。也可参见 "Apparatnyi perevorot?"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28 (October 4—11, 1991): 2.

125. David Lane and Cameron Ross, *The 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Ruling Elites from Gorbachev to Yelts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126.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127.

127. "Zayavlenie soveta predstavitelei dvzheniya Demokraticeskaya Rossiya," 1. 叶利钦的确将克格勃分成了几个组织, 但是没有进行大的改革。

128. 叶利钦在总统行政机构中任命了几个新人, 但是通常是作为顾问或者委员, 比如谢尔盖·沙赫赖和谢尔盖·斯坦科维奇。叶利钦任命了一个民主党新人为行政高官, 任命尤里·波尔蒂耶夫 (Yury Boldyrev) 作为首席巡视员。但是, 随着开始揭露政府内腐败的运动到来, 波尔蒂耶夫并没有在他的位置上待太长时间。参见作者与波尔蒂耶夫在 1992 年 8 月的访谈。

129.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127.

130.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1.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129.

第五章

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

1991年秋,叶利钦和他的新政府开始重新改造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制度。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具有同等的优先权;保证苏联和平解体是议程上的首要安排,进行经济改革排在第二,而重塑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被放在议程的最后。然而,试图将这三种体制改革加以排序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政治、经济和国家制度上的重大变化同时发生了。变化的广度和速度同现代史上其他的革命性转型差不多一样惊人。如同其他伟大的社会革命,俄罗斯的革命威胁到了旧的利益集团,使新的利益集团受益。几乎不证自明的是,对旧的利益集团的威胁制造了阻力、敌对和反革命联盟。通常,对革命性变革的反应导致了武装冲突和国内战争。因此,如果俄罗斯的革命没有激起对激进变革的反抗,那就是空前的和违反我们直觉的一件事情物。

虽然叶利钦和他的政府拥有惊人的大众支持,特别在1991年8月未遂政变失败之后更是如此,但是,他们的改革议程仍然只是代表着他们自己的偏好,而不是所有精英的心愿和普通大众的意愿。在1991年秋,俄罗斯精英或者整个社会就改革的方针根本没达成多少一致意见。为数相当多的俄罗斯政治力量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或者他没有改革的部分提出了批评,但是俄罗斯政治精英并没有就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经济和政体达成一致意见。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例如1993年春的全民公决),俄罗斯的选民们对俄罗斯的未来没有共同的想法。动员大众去摧毁一个旧秩序要比

为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保持统一的支持要容易得多。

由于苏联解体的和平性质,那些反对叶利钦变革设想的人就处于一种有组织抵抗的地位。旧制度的支持者没有遭到逮捕或者处决,而是继续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中占据关键职位。由于反对派已经被动员和巩固起来,因此在支持和反对革命性变革的人之间的力量分配开始日益模糊起来。相互争斗的广泛的变革议程、在支持和反对叶利钦计划的人之间模糊的力量对比,这两者的联合对战略决策制定来说创造了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俄罗斯政治行动者采取的战略行动混杂在一起,在俄罗斯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上造成的冲突更胜于妥协,因此,在1993年秋天造成了许多人所说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结束。

本章追寻了这些变量之间极易造成冲突的互动。第一部分标出了主要的政治行动者在对苏联崩溃和叶利钦变革——包括引入市场改革和俄罗斯政治的重组——的反应中采取的不同立场第二部分记述的是在俄罗斯境内主要政治力量权力对比的变化:在民主阵营中发生的新的混乱,共产党的重组,共产党—民族主义者联盟或者红蓝联盟的巩固,温和派——公民联盟(Civic Union)——的出现。第三部分解释了对变革议程的不同偏好和力量分配的模糊性是怎样相互作用的,从而造成了1993年秋天的体制崩溃。在同1991年8月相似的战略环境中,俄罗斯的政治行为体通过从事对抗性的零和战略对广泛的改革议程和模糊的力量平衡作出反应。结果同1991年很相近——一方从对另一方的胜利中产生出来。

充满争议的变革议程

经济改革

关于俄罗斯第一个后共产党政府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最初战略,我已经在前一章中详细说明了。在叶戈尔·盖达尔的领导下,这届政府的

目标是通过所谓的“大爆炸”战略(big bang strategy)——这个计划要求立即放开价格和贸易自由化,同时削减国家支出和紧缩银根——来取得向市场经济的急速转型。一旦达到自由化和经济稳定的目标,接下来的设想就是随即进行大规模私有化。

当盖达尔 1992 年 2 月启动了这个计划、开始部分进行价格放开的时候,很少有利益集团公开支持他的计划,虽然有一些集团会得益于这个计划。¹在价格和贸易自由化之后,进口商几乎立即获得了突如其来的利润,庞大的贸易公司冒了出来,来满足消费者因在封闭状态下长期被压抑而积聚起来的对商品的需求。新的商业银行利用通货膨胀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助中赚取高额利润。²然而,这些自由化的受益者中没有一个组织起来成为政治上的行动者。结果在改革的早期阶段,盖达尔和他的团队不得不更依靠那些在苏联时代后期形成的政治组织,较少依靠在后苏联时代形成的经济利益集团作为获得支持的源泉。在市场改革的这一早期阶段,只有民主俄罗斯公开认可盖达尔的经济方案。这个组织的政治决定是支持政府的改革,然而这是以民主俄罗斯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在苏联崩溃之前,民主俄罗斯一直避免对经济事务采取特别的立场,作为一项战略,这是为了形成反对苏联的最广大联盟。然而,在 1991 年 8 月之后,民主俄罗斯被迫详细说明它在经济改革上的政策目标。

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懂得,他们的运动在经济改革的议题上被割裂了。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普通成员主要是社会民主派,也就是说,他们更担忧的是失业问题而不是贸易自由化。³由于这个分裂,民主俄罗斯内部激进的自由派领导人察觉到运动的大众取向是对经济改革的潜在限制;因此,他们提议从总体上解散民主俄罗斯,建立一个小的、由先进者组成的意识形态导向的政党。⁴与之相对的是,民主俄罗斯内部的中左派领导人认为,运动必须继续保留,以便对精英阶级的改革方案进行大众审查。民主俄罗斯内部自称是实用主义者的人拒绝了这两种立场,最终赢得了在经济改革中运动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的争论,公开站在支持政府的立场上。⁵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中,民主俄罗斯逐渐成为政府的主要代表,为盖达尔及其立法议程搜罗支持者。最高苏维埃经济

改革委员会由民主俄罗斯活动家彼奥特·费里波夫(Pyotr Filipov)主持,作为政府在议会中的首要立法起草机构展开工作,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法令,包括1992年6月的私有化法令。⁶

物质利益并不能激发民主俄罗斯对叶利钦经济改革的支持。虽然在长期来看每个人都会从市场经济中受益,但在短期内的真正赢家——进口商、银行家、一些特定的企业经理和生意人——并不是民主俄罗斯的成员。该运动的活动家们首先是学者和白领官员——专家阶层,他们的经济福利受盖达尔改革的威胁最大,至少在近期内是如此。⁷然而,民主俄罗斯对激进改革的支持反映了这个组织关注革命性政治更胜于物质利益。对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来说,共产党复辟的威胁仍然是真实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摧毁这一威胁的最好方法,鲍里斯·叶利钦及其政府是进行市场改革的最佳人选。对于民主俄罗斯内部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支持激进经济改革是一种激情,而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与已经对中东欧转型做出贡献的那些市场经济的提倡者不同,俄罗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在改革启动的时候只占少数。同中东欧改革者比起来,这些自由派没有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在1992年2月价格自由化开始之后,一个反对自由化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很快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同时,社会内部反对市场经济的政治组织也开始萌芽和生长。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是第一个拒绝盖达尔计划的人,甚至在计划还没有启动的时候,他就警告说如果这些改革被执行他就辞职。鲁茨科伊把叶利钦政府描述为“身着粉红短裤、红色衬衫、黄色靴子的年轻小伙子”,他提倡一种更多的由国家主导的市场转型,包括对俄罗斯企业执行贸易保护政策和宣布一年的国家紧急状态,作为避免经济总体崩溃的一种方法。⁸鲁茨科伊也提倡实施价格控制、国家补助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国家继续对土地保留所有权。议会主席卢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最终同意了他的观点。当哈斯布拉托夫这个市场改革的早期支持者呼吁叶利钦解散被哈斯布拉托夫称作低效政府的时候,价格自由法开始了仅仅数天的工夫。⁹

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并不一定是提倡重建计划经济。毋宁说,他们在经济政策上的观点相当含糊。然而,他们对叶利钦战略的批评很

快就从那些在前苏联体制中获得特权和好处的利益团体和政治组织那里获得了大量支持,这些团体和组织压根就不想要什么变革。议会中的派系,例如工业联盟(Industrial Union)和农业联盟(Agrarian Union)支持哈斯拉托夫对政府的攻击;更为激进的反市场改革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例如劳动俄罗斯(Working Russia)、共产主义者联盟(Union of Communists)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做得更为激烈。如果说哈斯拉托夫从没有提倡过重建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么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也会这样做。¹⁰在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早期阶段,这些共产党组织中的领导人特别是普通成员的目标仍然是逆转盖达尔的革命性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对其加以修正。¹¹俄共联盟领导人致力于推动对主要的消费品进行彻底的价格控制,提倡一种建立在自我管理企业体制之上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要求回到工人所有制上来,国家对战略经济部门继续进行控制和重新建立国家对于外贸的控制,所有的工资和薪水实现指数化。¹²与后共产党时代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不同,俄共联盟想要逆转俄罗斯初生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加以修正即可。以维克多·安皮罗夫(Viktor Anpilov)为首的更为激进的劳动俄罗斯甚至走得更远,它拒绝所有的资本主义,而代之以要求取消市场价格和广泛的私有化,回到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当中来。¹³

在民主俄罗斯完全认可激进的经济改革与共产党彻底拒绝这两种态度之间产生了第三条道路——阿卡迪·沃尔斯基领导下的被称作公民联盟的联合体。沃尔斯基是前俄共联盟中央委员,同企业经理们有着紧密和长期的联系,他代表着苏联特权阶层成员的利益,他们期望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继续保持先前的经济特权和优惠。¹⁴同好斗的共产党团体相比,公民联盟宣称它支持市场、私有财产,也支持后共产党时代叶利钦首届政府所勾画出来的总体改革目标。同时,公民联盟强烈地反对盖达尔首先提倡的休克疗法。¹⁵例如,公民联盟的领导人宣称盖达尔政府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的西方机构愚弄了,它们的目的是想摧毁俄罗斯的工业基础。在公民联盟领导人看来,俄罗斯政府正在允许(外部)对俄罗斯市场进行廉价进口倾销,以至于本土的制造业根本无法竞争。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公民联盟建议实行工资调整和价格指数化,对战略工业进

行补贴并予以贷款,要求对进口和外国投资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国家和工业之间执行一种合作战略——东方的而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才能把俄罗斯从成为原材料的出口地和世界经济的边缘中挽救回来。¹⁶对于私有化,公民联盟支持把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一总的目标,但是它致力于把财产权利转让给企业的经理和管理者,而不是把它们让给外部所有者。这个团体的私有化方案承诺实现低失业率和低破产率。

大体上而言,在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继续精力旺盛地讨论资本主义和市场改革的好处。经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之后,在俄罗斯没有人有过通货膨胀、市场和所有权的经验。没有人能理解政府赤字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这类基础常识。因为俄罗斯的市场改革者在解释他们正在做什么这方面乏善可陈,而反市场改革的力量就利用在资本主义俄罗斯会发生多么恐怖的事情之类的故事填补了信息空白。虽然东欧大多数国家已经讨论过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应该采取哪种资本主义形态,但俄罗斯却在继续争论要不要接受市场和私有财产。市场改革仍然是一个争议中的话题。

设计新政治制度的争论

有分歧的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所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类型和组织。这些分歧在1991年末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就形成了,但是分歧在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最初的几个月内变得更为剧烈。争论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因而混淆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分歧所在。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民主派、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各持一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是,俄罗斯应该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政体,在这个问题上,分裂紧密地沿着民主派—共产党的旧界线展开。

关于独裁制还是民主制的争论产生了奇怪的忠诚。在改革者阵营内,重要的知识分子专家,例如爱德拉尼克·米格兰扬和伊格尔·科里亚姆金(Igor Klyamkin)很早就提倡在苏联—俄罗斯转型的早期建立一个过渡型的威权主义体制。在他们看来,只有威权主义体制才能够把苏联的

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在苏联崩溃之后，米格兰扬和其他人认为他们的理论已经被经验证明——戈尔巴乔夫在推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错误地进行了民主试验。为了让俄罗斯避免相同的命运，这些威权主义的提倡者推动叶利钦创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这个国家机构将不受社会压力的影响，直到市场改革完成之后。在民主俄罗斯内部，这个观点在苏联崩溃之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991年12月，莫斯科市长盖夫里尔·波波夫发表了一篇题为《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的政论文章，提倡解散城市苏维埃，以使他的行政办公室有更多的政治自主权来进行市场改革。民主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例如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提议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相似的结构。¹⁷这种体制改革也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比如像维克多·阿克修切茨那里获得了支持，这些人认为俄罗斯在过渡期内需要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以避免国家崩溃。¹⁸更为普遍的是，民族主义者提倡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将实施激进的市场改革，而是用它来保存俄罗斯联邦和保持俄罗斯在前苏联政治空间中的霸权地位。

民主俄罗斯在这个议题上发生分裂是因为许多民主派领导人和许多新政府的成员不支持威权主义统治。相反，民主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批评叶利钦不断增多的威权主义举动，并批评他越来越紧密地依靠反民主的前苏联共产党特权人物。当时的俄罗斯民主党副主席亚历山大·特里科夫(Aleksandr Terekhov)在1991年10月发出警告说，俄罗斯的民主力量不得不扮演阻碍叶利钦“新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的角色。¹⁹副总理亚历山大·肖金采取了另外一种推理逻辑，他认为朝威权主义统治迈进会使中央政府丧失信誉，会鼓励而不是制止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²⁰

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争论与此有关，但是同这些争论也有区别。叶利钦与其在民主俄罗斯内的盟友在苏联快要崩溃之前支持创建一个总统办公厅，以此来提高叶利钦对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自主权。²¹在这个问题上，民主运动内部在一开始没有什么意见分歧。1991年冬，设立总统职位这一主张被加进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宪法委员会所提出的宪法草案之中。1991年3月，俄罗斯选民同意设立这个新职位，俄罗斯议会

随后修宪创立了这个职位,然后在1991年6月,叶利钦赢得了他的首次总统直选。

在苏联崩溃以后,民主俄罗斯支持叶利钦追求更大行政权力的要求,认为只有一个强势总统能够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²²强势总统体制的支持者批准了由谢尔盖·阿列克斯耶夫(Sergei Alekseyev)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1992年春季起草的新宪法草案,尽管他们不是最高苏维埃宪法委员会的成员。²³

宪法委员会草拟的第一份宪法草案——由于委员会秘书是奥利格·鲁姆扬茨耶夫,因此这份草案通常被称为鲁姆扬茨耶夫草案——建议创建一个弱半总统制体制。这份文件中的某些措辞强调了在政府的行政、司法、立法三个部门实行权力分立的重要性。²⁴议会将居于上风。在这份草案中,总统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²⁵但是议会则有撤换总统、副总统、宪法法院法官和任何政府高级官员的权力。鲁姆扬茨耶夫的委员会所提出的第二个主张甚至给了议会更多的权力,其中首先包括由议会来组织政府的权力。²⁶在苏联解体之后,鲁姆扬茨耶夫对于提高议会的权力更为热心。1991年10月,他在最高苏维埃发表了一次演讲:“今天的最高苏维埃仍然还没有权力和手段来有效地控制行政权力,来成为总统的一个伙伴。”²⁷哈斯布拉托夫也开始质疑叶利钦新的总统职位,他警告说:“总统制在俄罗斯数千年历史中还完全是一个新的不寻常的体制。我们没有传统,没有经验。”²⁸1992年初,哈斯布拉托夫声称议会对政府拥有主权,坚信“议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控制政府的运作”,因此政府内所有部长级职位的人选都应该得到最高苏维埃的批准。²⁹

1991年秋,俄罗斯议会已经投票赋予俄罗斯总统额外的权力。到1992年末,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多数代表全然反对总统制。他们认为,俄罗斯议会本身应该成为最高的国家机关。³⁰叶利钦及其盟友持相反意见。但是,这个议题只是因为它没有及早得到解决,才历经争论并造成两极分化。在1991年秋,叶利钦在议会和选民中都能获得支持来对这个争论做一个宪法上的解决。但由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更大的两极分化,损害了叶利钦的支持率,因而,解决这些宪法体制上的议题就变得更为困难。

俄罗斯国家边界的争议

俄罗斯国家边界的争议从苏联崩溃时就一直在延续。在1991年12月的一次单独会面中,叶利钦与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对手就苏联解体问题进行了协商。对一些政治组织和俄罗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晚上没有也不可能标志着苏联的终结。从1991年秋天的喧嚣震撼中清醒过来之后,反对解体苏联的人重新组织起来,点燃了一场关于国界划分的激烈的政治争论。

民主俄罗斯在支持政府解散苏联的决定方面最为活跃。虽然民主俄罗斯在市场改革甚至民主改革方面的立场有时模棱两可,但它一向宣称解散苏联和俄罗斯独立是该运动的首要目标。同样,较为温和的民主团体,例如共和党及其所属的民主力量协会(Congress of Democratic Forces)认可了苏联解体。共和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李森科在支持解散苏联的时候援引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为理由,认为俄罗斯从来就不是苏联帝国的中央,而只是苏联集权制度之下的殖民地。³¹

在支持苏联解体方面,民主俄罗斯和一些小党孤立无援。在不同程度上,俄罗斯其他几乎每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和大多数俄罗斯公民都对苏联的崩溃持惋惜态度。然而,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随着时间和政治团体的不同而上下波动。一开始,反对解散苏联的人看起来对于苏联的瓦解作为一种既成事实听天由命。例如,在别洛韦日协定数周之后,哈斯拉托夫对苏联的解体发出悲叹,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这一协定的必要性,支持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³²甚至民族主义者和最终成为反对派领导人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也约束自己不发出重建苏联的号召,而代之以支持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³³然而,在最初的震撼过去之后,反对解体的意见就开始壮大起来。一些在禁止苏共活动之后作为独立的政治运动而产生的共产党组织全都支持重建苏联。俄共宣称解散苏联是不合法的,因为这一举动同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投的结果相冲突。他们同一长串民族主义团体一道批评解散苏联的举动,这些民族主义组织包括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联盟和新近成立的爱国力量协会(Congress of Patriotic)。与它们对市场改革的意见不一样,它们反对解散苏联和支持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观点把俄罗

斯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了起来。

在苏联解体或者是重建的问题上,并不存在第三个立场或中立立场的空间。中立派(例如公民联盟)谴责解散苏联。同时,同经济改革议题相对照的是,解散苏联并不在公民联盟的首要议程上。

支持还是反对苏联的情绪都十分深厚,但是都没发生任何作用。回顾起来,还是叶利钦及其盟友最有效地利用了他们在政变失败之后暂时的权力优势来处理这一主权问题。在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就别洛韦日协定进行会谈的时候,俄罗斯领导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建立了一个支持解散苏联的各共和国首脑的强有力联盟。当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通过签署这份文件把自己变成国家首脑的时候,他们都与保持这种新的体制秩序有了利益关系。这个联盟有效地形成了一座防波堤,对任何未来俄罗斯主动要重建苏联的活动都会加以抵制。从1991年12月起,俄罗斯国内关于苏联的争论中就再也没有想用军事手段来重建苏联的言论了。只有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自愿提议点燃过重建苏联的兴趣,即使这样,例如白俄罗斯的情况,也没有在俄罗斯国内产生迅速的回应。戈尔巴乔夫时代末期得到解决的唯一有争议的议题就是主权问题。

俄罗斯国内没有产生一个强力支持变革的新联盟来支持市场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些庞大的体制上和经济上的难题所需的政治游戏规则还不明了。叶利钦的体制改革没有把有关规则制定的规则系统化和法律化。1991年秋,叶利钦有权力提出这样的规则,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然而,到了1993年春,他不再享有明显的权力优势,就政治规则进行的谈判不仅仅是必需的,而且正变得日益困难。在这种体制环境下,叶利钦和他的新政府继续实施他们自己的日程安排,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的对抗和分化在不断增强。随着民主派对市场改革和总统权力的支持以及共产党的竭力反对,分化变得特别剧烈和重要。这些不同思潮的支持者也在俄罗斯国家内占据了互相敌对的机构,随着总统行政机构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产生敌对,导致政治分化的情势在1993年春夏进一步恶化了。

在有争议的议程上日益增长的政治分化伴随着俄罗斯政治权力平衡的变化。在1992年和1993年间,在主要政治角色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结

盟和再结盟使人们的认识产生了许多模糊性,例如,谁在代表谁?哪一种政策享有多数支持,哪一种没有?如果政治家们采取超制度的手段来追求政治目的的话,大众和军队将会如何反应?在从1991年8月到1993年10月喧嚣的两年内,关于大众偏好的唯一可靠的信息是由1993年全民公决所提供的,而这次投票的结果却是模糊的。

民主俄罗斯的消亡

当苏联共产主义于1991年秋天崩溃的时候,民主俄罗斯存在的理由也随之消失。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曾经在一个中心思想下团结起来,那就是反对苏联共产党体制。当这个体制不再存在的时候,民主俄罗斯就经历了一场重要的身份认同上的危机。正如民主俄罗斯领导人尤里·尼斯涅维奇(Yuli Nisnevich)在回忆中所讲道的,“我们有过一个反对的平台,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积极的计划”³⁴。民主俄罗斯内部的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平稳而渐进地解散这个组织。正如尼古拉·特夫金在1991年10月所指出的:“民主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³⁵特夫金与社会民主党的奥利格·鲁姆扬茨耶夫、共和党的弗拉基米尔·李森科都相信,在共产党倒台之后举行一次新的选举,将会给他们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党提供占据中央舞台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革命政治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然而,当1991年秋选举没有发生、政党也没有占据中央舞台的时候,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决定他们不能解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组织资本来继续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他们相信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向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转型过程中,这些领导人认为叶利钦和他的新政府需要一个大众政治运动来支持促进改革议程,甚至叶利钦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这种需要。民主俄罗斯最终为自己确定了这个角色,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维护叶戈尔·盖达尔的“休克疗法”、俄罗斯的独立和叶利钦总统的权威,以此作为其后共产党时代新的议程安排。民主俄罗斯这个新角色是在1992年7月4日到5日间形成的,在那时,它同其他一些组织和领导人一起召集了“民主力量论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除了民主俄罗斯的成员和其隶属者之外,还包括政府的一些成员,其中就有盖达尔。³⁶民主俄罗斯现在被命名为“民主选择”(Demokraticeskii Vybor),其立场不是反对

政府,而是支持政府。³⁷在这次会议中,盖达尔响亮地表达了对这个重生的民主运动的承认,并警告说,俄罗斯民主力量中的不团结将导致经济改革的流产。³⁸

民主俄罗斯试着通过老一套的策略来促进这个新的议程。例如,在1992年4月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中,当盖达尔的政府遭到围攻的时候,民主俄罗斯在议会中的领导人动员了一个广泛的联盟来支持盖达尔,这个联盟把议会中的代表同议会之外的组织和运动联合起来。³⁹然而事实证明,动员群众来支持“休克疗法”比动员群众来反对共产主义要困难得多。与其他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相似的是,俄罗斯缺乏经济自由化的大众社会基础。⁴⁰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受益者主要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成员,他们已经在苏联崩溃之前攫取了对社会财富的实际控制。⁴¹从政治上来说,这些社会团体是民主俄罗斯的敌人。民主俄罗斯的骨干主要是那些短期内在市场改革中受损最多的人——教师、医生、学者、工程师和政府公务员。作为对这些新的政治条件的反应,民主俄罗斯尝试了新的战略和任务。1991年12月,民主俄罗斯建立了俄罗斯改革社会委员会(Social Committee for Russian Reform)以促进和实施盖达尔的经济改革。这一网络在全俄罗斯建立了地方组织,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市场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方面的建议。在同俄罗斯政府的紧密合作中,民主俄罗斯也帮助组建了私有化企业联盟(Association for Privatized and Privatizing Enterprises),这是一个支持市场改革的企业经理的联盟。

然而,组织的新议程和新战略疏远了队伍中的许多人。民主俄罗斯对俄罗斯独立的明确支持使组织内部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分裂。在1991年11月该运动的第二次会议上,俄罗斯民主党(Narodnoe Soglasie bloc),俄罗斯基督教运动(维克多·阿克修切茨),宪政民主党—人民自由党(米哈伊尔·阿斯塔费耶夫)退出了联盟。另外一个分裂性的议题就是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问题。尤里·阿法纳斯耶夫、列奥尼德·巴特金和玛丽娜·赛利耶指责叶利钦企图在俄罗斯实施威权统治,并指责民主俄罗斯内部一些领导人企图协助叶利钦这么做。这三位批评者试图通过此举来确保对组织的控制,希望把民主俄罗斯重建为一个针对新体制的反对派运动。在他们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就退出了民主俄罗斯,警告说独裁

统治迫在眉睫。⁴²最后,也许是最根本的分裂,是由对市场改革的不同态度所推动的。根据民主俄罗斯领导人、人民代表阿纳托利·沙贝德的说法,“民主俄罗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两种不同的派别在滋长——自由主义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⁴³在8月政变失败之后,这些派别就开始分离。盖达尔的价格改革开始不久之后,俄罗斯共和党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就开始把它们组织从日益自由主义化的民主俄罗斯运动中剥离出来。⁴⁴

民主俄罗斯政治权力的消亡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且还因为其组织上和体制上的缺陷。在后共产党时代,运动中最优秀和最知名的人物有了新的选择。民主俄罗斯的许多领导人参与到了政府之中。这种(人员上的)转移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在议会中都削弱了该运动的领导层。⁴⁵叶利钦要求这些领导人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民主俄罗斯的代表身份加入行政机构和政府,这一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民主俄罗斯运动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政党角色没有明确定义的政治体制中,对政府官僚机构和政府内部个人的忠诚比政党联系更为重要。⁴⁶其他一些领导人则进入了正在出现的私有领域,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挣钱。最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迅速变成了新的统治精英中的一员,认为民主俄罗斯太过民众化和非职业化,不能在后共产党时代扮演一个积极的政治角色。民主俄罗斯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波波夫,同苏联体制中的改革派领导人联合创建了一个更具“建设倾向”的政治组织——民主改革运动。在民主运动内部发生的分裂同样发生在俄罗斯议会内部。⁴⁷在1990年3月和1991年8月间,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分成了两大阵营——民主派和共产党,鲍里斯·叶利钦是俄罗斯议会中民主阵营的顶梁柱,俄罗斯的改革派代表之间的团结得到维持。叶利钦在当选后从议会政治中退出,这使得在议会中民主人士之间不再存在一个毫无争议的领导人。⁴⁸没有人前去填补这个空缺。到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年年末,俄罗斯议会中民主力量只控制了不到150个席位。正如米延格科夫(Myagkov)和基威特(Kiewiet)在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记录的研究中所得出的,关键的投票者几乎是在反改革派的阵营之中。⁴⁹

共产党的重组

在8月未遂政变之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运动和一种国家体制看起来注定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8月政变之后,叶利钦立即禁止了苏共与俄共的活动并剥夺了他们大量的资产。在其后的几个星期内,对于新政府是否允许共产党作为合法团体存在都有疑问。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在谈论采用革命前的地下工作策略。由于全国的反共情绪正前所未有的高涨,使叶利钦能够实施这种禁令。在党内,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根据8月未遂政变之后重建俄共的主要鼓动者之一瓦连京·库普索夫(Valentin Kuptsov)的说法,党的许多活动家都认为莫斯科的领导层使党失去了信誉——他们允许苏联解体和反共人士攫取政权。⁵⁰政变之后,党内的野心家和那些企图保住自己职位的人迅速宣布放弃党籍,这大大降低了重新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恢复潜在成员的能力。

当共产党领导人从8月政变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之后,新的共产党组织、运动和阵线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这个后苏维埃时代的早期,这些团体都渴望成为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唯一继承人。在劳动莫斯科(Trudovaya Moskva)和稍后的劳动俄罗斯(Trudovaya Rossiya)这个庞大组织的发动下,这些新共产党组织联合发起了好几个反政府示威行动。第一个是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接着是反对解散苏联,最后是反对叶利钦的市场改革。在这些会议(集会)上,新的共产党演说家变得日益大胆,他们开始谴责俄罗斯政府独裁统治的非法行动。⁵¹他们的标语和演说变得日益民族主义化并以爱国为号召,企图把民族主义者吸引到他们的事业中来。

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为重新组织和再动员共产主义忠诚人士提供了最显著的机会。受盖达尔改革是一种犯罪这一信念所驱使,激进的共产主义组织者,例如维克多·安皮罗夫,在提出要求时变得更为好战,在策略上变得更为大胆。1992年2月23日是前苏联建军节的日子,这一天发生的示威游行以莫斯科警察和共产党示威者之间的流血冲突而告终。⁵²在1992年3月17日决定苏联命运的公民公决纪念日上,劳动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外组织了另外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同年6月,共产党示

威者用纠察队包围了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十天时间,最后以内务部特种部队出动进行暴力镇压而告终。⁵³奥斯坦基诺事件特别是示威的残酷结局,为动员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同情者提供了方便。⁵⁴

然而,对共产党的复兴而言,有助于动员的最重要事件发生在法庭上而非街头。在8月政变之后不久,共产党活动家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状,要求法院重新审理叶利钦发布的“禁共令”的合法性。叶利钦政府也向法院提出申请状,要求法院审视苏联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并裁定政府措施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同纽伦堡审判有些相似的过程。⁵⁵这场审判被称为“世纪之判”。1992年11月最终的判决结果颇为含混。法庭支持俄罗斯政府,宣称苏联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组织,而且是苏维埃国家的统治机构,正是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和其他国家进行了犯罪活动。然而,法庭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党和其高级领导层是有罪的,但是其普通成员则无罪。对这一判决,共产党活动家认为是一个重大胜利并为之庆祝。⁵⁶法院的判决点燃了全面复苏统一的俄罗斯共产主义政党的运动。⁵⁷这一过程在1993年2月14—15日达到顶点,这一天,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总共651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了全国新注册的近五十万名共产党员,这使得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政治党派。几乎所有8月政变的“主犯”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言人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以及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奥利格·舍宁两人被选进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91年8月的失败者从此不再继续失败。

根纳季·久加诺夫被选为主席团主席。作为民族主义者联盟——“救国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的副主席,久加诺夫的当选巩固了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重新建立起来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内没有获得有影响力的位置。⁵⁸虽然社会民主党人为会议的举行做了许多组织上的工作,但他们还是没有被选入领导层。与东欧其他后共产党时代的共产党团体不同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没有开始向社会民主党发生演变,在定位上日益变得民族主义化。⁵⁹

融和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

在1989年到1991年自由主义政治全盛时期,民族主义处于睡眠状态。苏联崩溃之后,民族主义从共产党和民主阵营中吸引了新的信徒。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实际上是从民主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民主俄罗斯前领导人维克多·阿克修切茨和米哈伊尔·阿斯塔费耶夫,中断了他们与尼古拉·特沃金及其俄罗斯民主党之间短命的联盟关系,而与议会中更为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实现了联合,并创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派系——俄罗斯统一(Russian Unity)。在1992年春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形成的这个保守派阵营,宣称到年底将控制议会中40%的代表和最高苏维埃中50%以上的代表。⁶⁰在议会之外,这些代表于1992年2月组织了俄罗斯国家会议(Russian National Congress),其中融合了一些俄罗斯最极端的团体。

俄罗斯国家会议为一个更为严肃和成功的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的联盟——救国阵线奠定了一些组织基础。这一联盟于1992年10月组织起来,包括了个国家大部分最著名的民族主义领导者和一些共产党领导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久加诺夫自己的民族主义倾向同他参与救国阵线的活动结合了起来,把更多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口号融入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官方纲领之中。⁶¹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包括维克多·阿克修切茨,反对同共产党结成同盟,但是阵线的其他领导人对与共产党结盟而带来的组织资源表示欢迎。⁶²阵线也在人民代表大会内的反对派与日益成长的由共产党组织的、反叶利钦的街头群众行动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结。叶利钦试图查禁阵线,认为这一集团的目的是“违背俄罗斯宪法体制的基本要素,煽动全国的不满情绪,对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相邻的主权国家的独立构成了威胁”⁶³。尽管有这道法令,但阵线的创建者称这只是叶利钦的虚张声势,并继续他们的活动。这实际上显示出了俄罗斯总统的虚弱。随着叶利钦的政治同盟日益虚弱,他的对手却逐渐变得强大。

中派的兴衰

早些时候我们提到过,在苏联崩溃后成立的一个中派政治力量的联

盟——公民联盟——试图在激进的民主派和共产党——民族主义者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在1992年夏天和秋天，公民联盟看起来在国家和社会中都逐渐受到欢迎。虽然公民联盟是在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后一年才成立的，但是，到了1992年秋，公民联盟声称他们在大会中控制了超过40%的票源。⁶⁴跟公民联盟联系紧密的小团体，例如工业联盟和农业联盟，经常在重要议题上控制着游走票。民意调查显示，公民联盟虽然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比起来要小得多，但却是国家中最受欢迎的政治组织。然而，当政治日益两极化的时候，公民联盟的力量变得日益模糊起来。缺乏一个明确的中心使得联盟内更为激进的力量之间的分化和政治对抗重新开始。

合作、分化与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

依然庞大的变革议程，朋友和敌人之间权力平衡的模糊性和变动性，这些因素的结合最终产生了政治僵局、分化和武装冲突，从而终结了俄罗斯第一共和国。这种权力平衡本来可能导致双方进行合作来解决变革议程中的突出问题。在其他转型中国家，即使是复杂的国家，权力平衡所产生的僵局导致了妥协和合作。但是在俄罗斯这个案例中，对立双方之间大致相等却依然模糊的权力分配则促进了冲突的产生。认为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不可避免，这一看法或许是错误的。相反，同戈尔巴乔夫后期进行的政治进程相似的是，精英们慢慢靠近商讨一套新的组织经济和政治的规则。俄罗斯从共产党统治的过渡本来可能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并且它几乎快要做到了。

经济协商和联合政府

1992年1月，盖达尔改革开始顺利地启动。叶利钦有很高的支持率，反对派忍辱含耻，溃不成军，社会也准备应对变革，这有利于减弱价格自由化带来的最初的消极反应。价格在1月扶摇直上，但是群众没有恐慌。

令人惊奇的是,对盖达尔自由化计划的反对并没有发生在街头或者工厂里,而是发生在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里。⁶⁵在1992年4月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议会内稳固的大多数已经认为盖达尔的战略不中用,应该被废除。代表们一是对价格暴涨感到担忧,二是对市场经济原则了解不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刺激了反盖达尔联盟的产生。

叶利钦对这个反盖达尔联盟做出回应。叶利钦回忆道:“由于我最初尊敬作为一种制度的议会,所以我非常艰难地忍受了对政府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在改革的前三个月内一直紧随着政府。”⁶⁶叶利钦用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评估局势的方法,开始怀疑盖达尔改革是否存在“社会基础”⁶⁷。事实证明这个基础并不存在。这期间,叶利钦从国家和社会各界的代表那里得到地方经济灾难的日常报告,行政首脑、前苏联部长和叶利钦自己的克里姆林宫顾问们,都有同总统的直接联系,他们利用这种联系来游说总统反对盖达尔的改革计划。1991年10月,叶利钦许诺激进的经济改革“会在1992年秋取得真正的成果”⁶⁸。当这样一个快速转折并没有出现的时候,叶利钦开始怀疑他自己关于经济改革决策的正确性。正如叶利钦所回忆的:“在某一点上我开始动摇……我不能再抵挡住来自议会团体、党派、政治运动、经济学派、农业经理和企业家们施加的巨大压力。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来要求撤掉盖达尔,他们一直在要求,不停地要求。”⁶⁹随着时间的流逝,叶利钦开始仔细地把自己同政府实施的经济改革区分开来。人们逐渐知道的是,经济改革计划是盖达尔的改革,而不是叶利钦的改革。这使得叶利钦比较容易就市场转型带来的阵痛批评其他人。

盖达尔的政治难题又因新政府缺乏经验而加剧。盖达尔内阁的成员同公众相处得不好。他们轻视议会中的对手,努力把他們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而不是同他们合作来取得他们对改革计划的支持。这种策略迅速疏远了议会的领导层。⁷⁰哈斯布拉托夫尤其认为自己受到了盖达尔团队这种举动的侮辱,因为他相信自己本来应该被任命为总理的。最终,叶利钦也责怪盖达尔内阁缺乏政治判断力。当然,叶利钦作为总理和总统,在议会内和在社会上本来都应该对市场改革运动起领导作用。⁷¹这种说法(甚至在一些回顾中也能看到)明确地告诉人们盖达尔的团队是如何孤

立于叶利钦的。盖达尔团队的确也没有向俄罗斯大众解释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的是，盖达尔团队从未发布一份计划，以此作为同大众交流的手段和方式。由于大众缺乏对市场经济原则的了解，而盖达尔政府没有做出解释，这就为煽动家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来填补信息空缺。

到了1992年4月，盖达尔政府已经在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面临被弹劾的威胁。由于俄罗斯还没有制定出一部新的后苏维埃时代的宪法，因此，谁来任命内阁、谁来撤换内阁的规则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性最终成为议会与总统之间冲突的根源。在1992年4月的会议上，叶利钦对议会采取了一种调和的策略。在第六次人代会前夕，叶利钦同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进行了谈判。叶利钦提议解除盖达尔最初班子中的四位部长的职务，把更有“工业背景”的人士任命进内阁之中，为国家企业提供额外的补贴。盖达尔激烈反对这些妥协。他的反应是提交整个内阁的辞职书，而事先并没有同叶利钦讲过他的计划。这个鲁莽而出人意外的演讲是盖达尔首次精明的政治举动，也是对叶利钦妥协政策的强烈指责。正如叶利钦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就像迎面挨了一拳。”⁷²

哈斯布拉托夫对内阁辞职这一消息的最初反应是嘲笑，称盖达尔内阁是不合格的，议会决不会接受讹诈。然而两天后，哈斯布拉托夫退却了，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盖达尔内阁表示支持。在这个阶段，议会还不准备摊牌。

盖达尔及其团队把第六届人代会的这一举动视为自己的一次重要胜利，同时再次确认了对哈斯布拉托夫及其同伙不妥协策略的正确性。看起来叶利钦得出的结论却不同。虽然盖达尔和他的内阁想利用这次机会使盖达尔作为总理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下来，但俄罗斯总统没有利用这次对议会的战术性胜利来推动激进的经济改革。相反，在议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叶利钦发表了一篇调和性的演讲，承诺今后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要更多地与立法者合作。⁷³他随后任命了俄罗斯议会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舒梅科(Vladimir Shumeiko)担任第二副总理来制衡盖达尔，通过任命格奥尔吉·希扎(Georgy Khizha)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grdin)为副总理，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政府中的权力平衡。希扎从前是圣彼得堡巨型军工企业斯韦特兰那(Svetlana)的经理，代表着政府内

的军工综合体。切尔诺梅尔金以前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的经理,代表着油气利益集团。对盖达尔来说,希扎“完全不明白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从1992年5月起,希扎成为提高政府预算(从而带来预算赤字)的主要斗士”⁷⁴。

1992年6月,叶利钦通过任命盖达尔为代总理来平衡这些任命。⁷⁵然而,盖达尔和他的内阁已经失去了对经济政策制定的主导权。政府取代“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盖达尔团队认为是一项“混合”计划的東西。⁷⁶这一混合计划和联合政府导致了石油天然气价格的冻结,重新由国家财政向企业发放补贴,在政府的私有化项目上向企业经理做出让步。膨胀的企业补贴迅速破坏了稳定,把月度通货膨胀率抬到了两位数以上。⁷⁷1992年7月,叶利钦在盖达尔的鼓励下任命维克多·杰拉什琴科(Viktor Gerashchenko)来主管中央银行,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因为杰拉什琴科迅速批准印刷新的货币,并把政府债务转嫁给私营企业。到了该年末,通货膨胀扶摇直上,中央银行的债务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1%。⁷⁸当盖达尔试图辞退杰拉什琴科的时候,杰拉什琴科抓住体制模糊不清的漏洞,声称自己只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内阁负责。

盖达尔在1992年末结束了自己作为俄罗斯经济设计师的任期。在1992年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预备期内,叶利钦同公民联盟领导人靠得更近,督促他的政府同公民联盟进行合作,就经济改革达成一项妥协的计划。⁷⁹政府新的经济计划接纳了公民联盟的许多建议,涉及价格控制、国家秩序、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支持、对军工企业向民用转产提供长期低利率的贷款等诸多方面。叶利钦之所以向公民联盟做出这些让步,是因为他相信需要公民联盟的支持来保持社会和谐与政治权力。⁸⁰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几周,叶利钦也在政府内部做出了一些人事变动来安抚议会,其中包括撤销他的长期盟友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米哈伊尔·波尔多莱宁(Mikhail Poltoranin)的职务。叶利钦最后和最具有戏剧性的让步就是撤除了他的改革派总理盖达尔,以公民联盟候选人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取而代之。

在1992年12月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利钦以这一戏剧性的让步表明了他在经济改革方向上寻求与对手妥协的愿望。第七次人代会产

生的新内阁看起来比以前更多地代表了重要的经济集团的利益。通过做出这些让步,从而在事实上抹煞了政策的连贯性,叶利钦相信他正在构建一个被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多数俄罗斯人民所支持的政治联盟;也就是说,他实质上正在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来共同制定经济政策。⁸¹叶利钦解释道:

我同他们[公民联盟]形成了同盟……几天前我同他们一群人沃爾斯基、弗拉迪斯拉夫列夫(Vladislavlev)会过面。所以,我正在进行这种对话。我同意你[记者]的观点,我必须和中间派进行这种对话。右派和左派的极端分子都同样危险,但是中间力量是正常的。它占据着这样一个位置,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同人们期望的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和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⁸²

然而,同公民联盟的合作、任命切尔诺梅尔金为总理这两件事,并没有结束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之间在经济政策制定权上的斗争。虽然哈斯布拉托夫一开始对任命新的中间派人士和企业家担任政府职务表示支持,但很快他就表示对切尔诺梅尔金持保留意见。在事后评价1993年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时,哈斯布拉托夫指责说,事实证明,切尔诺梅尔金同盖达尔一样根本不愿意同议会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进行合作。⁸³对最高苏维埃主席来说,问题不在于新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本身,而在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那种排外的方式。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仍然在延续。最高苏维埃和议会最终从总统和政府手里夺去了一些经济政策的决定权。最高苏维埃获得了对中央银行、私有化基金、养老基金和反垄断委员会的控制。在预算方面,1993年最高苏维埃急剧扩大了政府开支,在8月通过了一份赤字将近国内生产总值25%的预算。⁸⁴在私有化方面,最高苏维埃试图给予企业经理更大的权利,超过了1992年私有化法——该法已经对经理们十分友好了——所给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试图对私有化法进行修正,修改其中的第四章,从而赋予企业经理对企业几乎全部的所有权。⁸⁵这个预算提案和计划中的修正案反映了特殊的工业和农业利益集团在最高苏维埃内部日益增长的主导权。⁸⁶议会代表感觉到权力分配已经向他们这一边倾斜,他们急切想获得回报。

最高苏维埃1993年的预算提案对叶利钦及其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

的,因为25%的预算赤字会使俄罗斯陷入一场超级通货膨胀之中。当时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Boris Fyodorov)把议会提出来的预算称为“灾难性”的,说这份预算除了用来“干扰行政机构的稳定”之外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目的。⁸⁷叶利钦的政府也断然拒绝了议会给予经理更多所有权的私有化提案,称它会阻碍在企业层次创造有效的私有产权。然而,总统和议会在预算和私有化上的冲突并没有形成斗争,因为另外一场发生在两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关于权力边界的冲突,最终搁置了经济争论。

立法—总统间协议的谈判

1991年未遂政变刚刚过去之后,俄罗斯议会急切盼望同戏剧般的英雄鲍里斯·叶利钦进行合作。在1991年11月的第五次人代会上,议会授予叶利钦以总统令治理国家的权力。在接下来的12月,仅有六个代表投票反对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在俄罗斯独立的最初几个月里,议会和总统似乎就主要议题持有相似的立场。结果就是,这两个政府部门之间最初模糊的权力划分没有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然而,在1992年1月经济改革开始后的几个月内,这种默契便消失了。到了1992年4月,在议会中反对盖达尔的人已经占据了稳定的大多数。当这些代表在第六次人代会上试图影响政府构成及其政策的时候,规范总统和议会之间权力划分的游戏规则的模糊性就越发明显。经济改革上的不同意见很快转变成了涉及俄罗斯政治体制结构和组织的宪法争论。

俄罗斯议会领导人在1992年11月举行的第七次人代会上发动了首次进攻。议会剥夺了总统通过总统令治理国家的权力,驱逐了代理总理盖达尔,以较为保守的切尔诺梅尔金取而代之,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来进一步限制总统权力。大多数人把这些变化视为俄罗斯议会的重要胜利,也是通向议会具有更多权力来治理国家的进展。

尽管叶利钦在人事变动上做了妥协,但是他并不接受议会通过的宪法变革,他相信这种改变会阻碍经济改革并使政治不稳定的情况进一步恶化。⁸⁸然而,现有的宪法规定,议会无权在未经总统、地方政府或人民的同意的情况下修改宪法。在第七次人代会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内,修改宪法的进程显得非常急迫。叶利钦以不合法为由拒绝了对宪法的修改,

并威胁说要举行一次全民公决,时间定于在1993年1月,由全民公决来决定:“你信任谁能使国家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和)重建俄罗斯联邦:是当前的议会和最高苏维埃,还是总统?”根据叶利钦的表述,这次投票的胜利者将获得合法性来控制改革进程,而失败者将被迫于1993年4月进行一场新的选举。宪法法院——该机构恰巧成立于1991年10月之前的数月——宣布叶利钦全民公决的提议是违宪的。叶利钦和议会之间的辩论中所产生的结果是,双方同意在4月初就新宪法的基本原则举行一场公民投票,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明确总统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划分。

在第七次人代会上达成妥协的方式说明,修改规则的规则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尽管现有的俄罗斯宪法在门面上给予议会修改宪法的权力,但第七次人代会发生的真实政治却是另外一副面孔。十年前在共产党统治下制定的宪法缺乏合法性,加上议会和总统的二元选举模式,迫使双方都在宪法正式规则之外寻求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虽然一些强硬派代表上街游行,抗议同叶利钦进行妥协性谈判,但哈斯布拉托夫、宪法法院院长瓦莱里·佐里金(Valery Zorkin)和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次违背宪法的权宜之计。

虽然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但是,在第七次人代会上出现的僵局激起了进一步的政治分化。根据人民代表、民主俄罗斯领导人阿纳托利·沙贝德的说法,第七次人代会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时刻:“当盖达尔倒台的时候,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了他的位子,事情又一次变得很明显,这里只有我们和他们的区别。”⁸⁹在第七次人代会的预备期和开会期间,中间力量公民联盟对政府构成及其执行的经济改革政策有着真正的影响。然而,在莫斯科当局的总统和议会双方发生的冲突演变成宪法问题的时候,公民联盟却失去了它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中流砥柱的地位。

第七次人代会发生的宪法争端的最终后果是,在议会内(更广义地说在整个社会内部)加重了权力平衡的模糊性。在一次人代会讨论的白热化阶段,叶利钦冲出了议会大厅,鼓励他的支持者同他一起行动。只有不到两百名代表跟随叶利钦离场,这令人尴尬地体现了总统政治支持率在不断下降。叶利钦的反对者相信他们能够在议会内获得一个稳定的多数,而这个多数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反对叶利钦和他的政策。⁹⁰

第七次人代会达成的叶利钦同哈斯布拉托夫、佐里金的妥协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对立双方就全民公决问卷上的一整套问题的设计达不成一致意见。在叶利钦的顾问和他们在议会内的支持者推动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应该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一个特别制宪?”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相信议会永远不会制定一部进步的、民主的宪法;因此,他们提议召集一个特别会议,授权它起草一部新宪法。⁹¹叶利钦也支持这个意见,认为制宪会议是制定新宪法的最好方法。

哈斯布拉托夫和议会内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者联盟不希望投票中含有关于宪法和制宪会议的问题。在第七次人代会后仅仅几个星期,哈斯布拉托夫开始质疑就宪法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可行性。他在1月的争论中说:“权力分立(也就是说,制衡体制的固定形式)的问题可以被一次全民公决所决定吗?我相信这不可行。”⁹²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内的反叶利钦派极力要求人民在投票中对总统和他的市场经济改革作出评价。

叶利钦和他的盟友反唇相讥,说议会正在试图重建苏联时代的旧政治制度。他在1993年3月说道:“现在非常清楚,所有问题的根子不是出在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冲突上,或者说出在总统和议会的冲突上。问题的根源要深得多,出在人民同前布尔什维克的反大众统治的矛盾上,这些前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受到触动。他们试图重建失去的权力。”⁹³叶利钦以“一个试图重建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努力正在出现”⁹⁴为理由,威胁说要在没有得到议会认可的情况下举行全民公决。1992年有关经济议题上出现的妥协精神,到1993年在行政权和立法权划分的议题上迅速消失了。虽然在一开始只是体制上的冲突,但是叶利钦日益用他所熟悉的共产党人反对民主人士的模式来重新形容这种分歧。

在这种互相攻击和政治分化的背景下,关于全民公决所要提出的问题的谈判几乎无法进行。经过一长串指责和反指责,叶利钦要求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他提议建立一个临时的国家机构来治理国家,直到制定出一部新宪法为止。引人注目的是,副总统鲁茨科伊和安全委员会首脑尤里·斯科科夫拒绝签署紧急状态令。⁹⁵狂怒的议会再次集会,宣布叶利钦有政变企图,开启了弹劾程序。宪法法院也判定叶利钦的总统令违

宪。叶利钦的对手差点就成功了,但是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三分之二的票数来废除总统。但是,这种僵局和俄罗斯国家机关几乎崩溃的事实迫使双方再次进行谈判——这个局势同1991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因为害怕持续的政治对抗所带来的后果而重新进行谈判非常相似。国家紧急状态令得不到支持这个事实削弱了叶利钦,叶利钦接受了由议会草拟的一套新的全民公决问题:

1. 你信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吗?
2. 你认可1992年由俄罗斯总统和俄罗斯政府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吗?
3. 新的总统选举是否应该提前举行?
4. 新的议会选举是否应该提前举行?

叶利钦同议会达成的协议中明确指出,前两个问题的答案不会带来什么明显的后果,而第三个和第四个问题需要占全体选民票数中的多数(而不仅仅是实际投票者的多数)才有约束力。

1993年3月危机和在全民公决议题上持续的冲突使得俄罗斯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叶利钦要解散俄罗斯议会的威胁巩固和扩大了反叶利钦联盟。随着立法权和行政权划分的问题日益变得突出,反对派能够在议会中征集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因为每个代表最终在维护并扩大议会权力方面都有切身利益。在议会之外,共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游行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大多数俄罗斯民主派领导人、政党、社会团体自1991年8月以来第一次团结起来,支持总统在四个全民公决问题上的立场。那些早先反对过全民公决,以及批评过叶利钦及其政府的民主派领导人集合到叶利钦一边。⁹⁶在4月全民公决的准备期间,民主俄罗斯的组织者们在莫斯科和其他重要城市组织了自从1991年8月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公众示威游行。他们也组织了俄罗斯首次全国电视宣传活动,播放了一首押韵的句子,“ДА, ДА, НЕТ, ДА”(da, da, nyet, da,“是,是,不是,是”的意思),用来指导人们怎样对四个问题做出回答。

在政治分化的激烈时刻,俄罗斯的中间派枯萎了。在1993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当好斗的“俄罗斯统一”行动起来弹劾总统的时

候,公民联盟的领导人没能扮演中和力量的角色。公民联盟虽然声称自己代表了40%的议会代表,但却无法把所有的成员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危机过程中只扮演了边缘角色。因为这些代表不是以公民联盟的候选人资格参加1990年选举的,因此他们也并不为他们现在的位置而对公民联盟感恩戴德,公民联盟在加强它对其议会成员的政党纪律监督方面毫无机制。在评论议会在一系列春季危机时期的活动表现时,人民代表、公民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瓦西里·里皮茨基悔恨地说道:“派系内部的纪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⁹⁷ 公民联盟目标的支持者鲁姆扬茨耶夫,甚至说得更远,他提到议会显示出了“中间路线的崩溃”,因为“投票模式表明,公民联盟是由工业经理、中间道路的政治家、前共产党员组成的一个强有力的稳健的政治力量,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神话”⁹⁸。公民联盟在全民公决四个问题上没有清晰统一的立场,要么“是”要么“否”的投票也没有为中间派提供第三种可供选择的余地。

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全民公决。在第一个问题上,58.7%的投票者肯定了他们对叶利钦的支持,39.3%的人反对。更使人惊奇的是,53%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叶利钦社会经济政策的认可,而只有44.4%的人不认可。至于第三个和第四个问题,近多数投票者(49.5%)支持提前进行总统选举,而大多数(67.2%)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两者都没能达到必需的全体选民的50%。这些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实际收入的迅速下降、扶摇直上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经济未来的极端不确定,考虑到这些因素,大多数政治家和分析师都预计俄罗斯的投票者就像其他处于后共产主义转型期国家的投票者一样,用他们的投票来抗议经济转型的苦痛。⁹⁹ 然而,大多数投票者不是根据他们的钱包来投票。¹⁰⁰ 如果他们对个人福利做过简单的回顾和计算,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投票反对叶利钦和他的政策。相反,大多数人是根据预期投票的,他们相信比回到苏联共产主义体制下,进行市场改革会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¹⁰¹ 此外,由于这次选举是一次全民公决,投票者只有两个选择,他们不能表达更为细微的偏好。在这只有两个选择的两极化的投票中,大多数人不管改革的现实是如何的痛苦和模糊,仍然站在鲍里斯·叶利钦和改革一边。

然而,叶利钦的胜利是以微弱多数取得的,这表明俄罗斯社会已经分

裂到什么程度。对于反对叶利钦的反对派领导人来说,票数接近的投票表明改革不应该按照叶利钦政府的实践方式继续进行。正如人民代表谢尔盖·巴布林(Sergei Baburin)在那时所评论的:“4月25日的全民公决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了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国家正在痛苦地选择进一步演进的道路。如果一个国家大部分人不支持,‘恢复民主’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呢?”¹⁰²反对派领导人虽然对投票的结果感到吃惊,但他们仍然相信他们正在走向胜利而不是走向失败,因为投票表明叶利钦的支持率从1991年选举胜利以来在大幅衰退。因此,全民公决在解决使国家陷于瘫痪的政治对抗方面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4月的全民公决没有解决宪法僵局,而是表明了社会几乎被分裂成相等的两半:一半支持变革,另外一半反对改革。

(重新)制定新宪法

1993年4月的投票前夕,叶利钦的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费尔奥多夫(Sergei Filatov)承诺说,如果叶利钦赢得了全民公决,他会立即采取步骤来制定一部宪法。因此,在投票之后,大多数俄罗斯改革派领导人期望叶利钦能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以解决俄罗斯的宪法危机。¹⁰³政治改革开始几年后,俄罗斯仍然没有完成作为民主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制宪过程。1991年秋,许多俄罗斯的民主人士并没有认识到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必要性,但在1993年春,一种新的共识出现了,即制定和批准一套新的政治规则是十分重要的。在1993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叶利钦清晰地说明了这种新的紧迫性。他说道:“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因为在那些改革正在进行的共和国(其他国家可以作为例子),以及在那些成功且迅速地制定了一部新宪法的国家,改革了的宪法现正在更快地走上改革道路。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危机。”¹⁰⁴

在转型的这个阶段,许多俄罗斯民主派领导人相信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体制是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前提条件。在全民公决之后的那天

晚上,民主俄罗斯组织了庆功宴,叶利钦的盟友们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最后的政治胜利而干杯。¹⁰⁵到处弥漫着一种预感,以为叶利钦会很快解散议会并进行新的选举。

然而,叶利钦没有利用这次投票带给他的合法性来解决俄罗斯分化的政治僵局,而是利用4月全民公决后的时机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来草拟新宪法。这个团体被命名为“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由762名来自俄罗斯政治各派的代表组成,包括各政治党派、社会组织 and 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还有商界和文化界人士。由于这些代表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这就削弱了制宪会议的权威性。但是,从哈斯布拉托夫到日里诺夫斯基的每一个人从一开始都接到了参加制宪会议的邀请,以此作为获得对这种制宪方式的广泛支持。¹⁰⁶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希望制宪会议能够达成一种政治契约,以此把俄罗斯带入一个新的政治时代。¹⁰⁷谢尔盖·沙赫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作“达成政治共识的圆桌会议”,¹⁰⁸把它同匈牙利和波兰成功的圆桌会议相提并论。看起来俄罗斯似乎正又一次从头开始向民主的转型。

总统行政部门也希望能够利用制宪会议的成果来代替几经修改的现存宪法,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正在酝酿的鲁姆扬茨耶夫宪法草案。¹⁰⁹这两份文件都确定议会高于总统之上,议会控制内阁。至于联邦制问题,鲁姆扬茨耶夫宪法只对原有宪法进行了细小的修改,即把次国家政府层次包含在旧的苏联体制之下,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的体制。这是叶利钦所不赞成的一种联邦体制。俄罗斯的自由派们也不欣赏经过修订的鲁姆扬茨耶夫宪法草案,因为这部草案拟定的宪法权利中包含了像工作权、免费教育权和免费医疗权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保障。¹¹⁰

尽管有着一系列妥协,鲁姆扬茨耶夫草案仍然没能获得议会的批准。1992年12月第七次人代会决定推迟一年制定新宪法,计划在第十次人代会上就批准宪法进行讨论。第十次人代会预计在1993年11月17日召开。鲁姆扬茨耶夫认为推迟制定宪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¹¹¹叶利钦和他的宪法顾问则认为推迟制定宪法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因为这给了他们一年的时间来草拟和推进一部自己满意的宪法。所谓的总统宪法的第一部

草案是在1993年春天开始流传的。这份草案主要是由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宪法律师谢尔盖·阿列克塞耶夫(Sergei Alekseyev)和总统助理谢尔盖·沙赫赖起草的。毫不奇怪,这部草案准备为俄罗斯确立总统制体制,把总统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得清清楚楚。¹¹²在叶利钦看来,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已经证明了人民想要总统制,这是不能被宪法的起草者所抹煞的。¹¹³然而,作为对地方领导人的让步,许多有关不对称的联邦制的文本也被纳入了这部草案之中。当制宪会议在1993年6月开幕的时候,这部草案就成为讨论的基础,虽然鲁姆扬茨耶夫草案也被包括在商讨范围之内。

公众舆论的民意测验表明制宪会议受到普遍欢迎,因为这为制定一部新宪法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互相达成妥协的方法。¹¹⁴最初,所有主要的政治活动家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了。然而,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及其他反叶利钦团体的领导人很快就对这个由总统控制的论坛表示不满,退出了制宪会议。没有谈判桌上反对的一方,制宪会议就丧失了它的政治分量和合法性。其他代表也停止参与这项活动,因为没有人还相信制宪会议有足够的权威来撰写一部新的宪法。地方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各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在制宪会议上推迟了起草程序。由于受到鞑靼斯坦代表团的鼓励,各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提出要为各自治共和国争取特别的权利。

哈斯布拉托夫把这些地区苏维埃的领导人看作是他在反对总统权力的斗争中的天然盟友,开始着手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力量。¹¹⁵9月,他召集了一次地方苏维埃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来抗议叶利钦发出要解散国会的威胁。1993年7月,最高苏维埃最终通过了一部有关宪法制定程序的法律来对抗总统的制宪程序。这部法律规定,新宪法必须首先得到议会的通过,然后还需要在一次全民公决中得到批准。制定规则的规则又一次显得模糊不清和互相抵触,因为对立双方都认为,对旧宪法进行修订的程序在新的政治背景下不再具有合法性。议会领导人希望用最终在第十次人代会上通过一部新宪法——鲁姆扬茨耶夫草案——的做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此次会议的时间现在被重新安排到1993年10月。对叶利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在这届议会上计划得到

批准的宪法草案会彻底摧毁总统权威。鲁姆扬茨耶夫回忆道,本届议会“本应该成为叶利钦统治的终结,我可以公开地这样讲,因为批准一部新宪法意味着总统受到控制,这种控制不是极权主义式的,而是受到(议会的)宪法监督”¹¹⁶。

1400 号总统令及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终结

正如(叶利钦)计划签署联盟条约为 1991 未遂政变领导人确立了一个行动的最后期限一样,对第十次人代会的担忧也为叶利钦及其盟友确立了一个行动的最后期限。出于为他的宪法草案千方百计获取合法性的考虑,叶利钦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于 1993 年 9 月 18 日召开了联邦会议,这是一个他在一个月前刚刚创设的机构,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包括了从俄罗斯各地来的地方代表(车臣除外)。然而,在这次 9 月会议的紧要关头,联邦会议拒绝认可叶利钦的宪法。结果,叶利钦决定采取单边和超越宪法的行动。1993 年 9 月 21 日,他发布了 1400 号总统令。该总统令解散了人民代表大会,要求公众批准一部新的宪法,以及在 1993 年 12 月举行一次新的选举,以此产生一个全新的两院制的议会。作为一种安抚姿态,叶利钦也声明他会在 1994 年 3 月提前举行一次总统选举。

后来,叶利钦用下列言词总结了他的这个决策: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用尽了所有其他“和平的”方法。我们更换了政府首脑(切尔诺梅尔金是由议会所挑选的),我们组织了一个调解委员会来把议会和政府拉到一块。反对派作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来弹劾我,这证明了他们的敌对立场毫无用处。然后是 4 月的全民公决,在这次公决中,人民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是支持我的。最后是包含了许多代表的制宪会议,它推动在下届议会上通过一部新宪法。为避免失败,哈斯布拉托夫下令阻挠制宪进程。¹¹⁷

议会领导人拒绝认可 1400 号总统令,认为它是违宪的,这也是大多数宪法法院成员的共同意见。叶利钦拒绝撤回总统令,最高苏维埃做出

回应,宣称叶利钦不再适合治理国家。¹¹⁸1993年9月23日晚,议会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任命鲁茨科伊为新总统。¹¹⁹鲁茨科伊紧接着任命了一个新的内阁。俄罗斯再次产生了两个行政机构最高领导人的局面,每一个领导人都宣称自己才是代表国家主权的唯一机构。为了动员公众反对叶利钦和他的政府,议会中的反对派领导人拒绝离开他们在白宫中的议会办公室,同1991年8月一样,他们以维护民主和现存宪法的名义鼓励支持者起来保卫白宫。

叶利钦起初准备在星期天派遣特种部队包围并控制白宫,占领反对派的集会场所。根据他自己在1993年8月得到的经验,他懂得反对派占据大楼进行保卫的重要性。但是,哈斯布拉托夫事先得知了这个计划,在危机期间定居白宫,挫败了这个企图。在9月末的几天内,大批的议会支持者围着白宫站岗放哨。由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组织——其中最突出的是极端法西斯团体俄罗斯国家联盟(Russian National Union)——组成的准军事人员在议会内部构建了防御工事。白宫内储藏的军火也被分发给市民。

在危机的早期阶段,大多数代表、大多数民族主义及共产主义政治组织支持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¹²⁰反对派的报纸也宣称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站在白宫保卫者一边。例如,《苏维埃俄罗斯》在1993年9月25日报道说,五十三个地区苏维埃拒绝承认叶利钦解散议会的总统令。¹²¹这样一些报道刺激了白宫保卫者的乐观主义精神,自己相信力量对比正在朝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倾斜。根据当时的白宫保卫者、最高苏维埃分析中心主任列昂迪·别佐夫(Leonty Byzov)所言,在僵局的最初几天里,白宫内的气氛是欢快的,因为白宫里的那些人相信他们将获得胜利。¹²²鲁茨科伊将军也认为,他的军衔和他本人受到军官们的普遍欢迎,这一事实能够帮助他说服俄罗斯武装力量承认他是总统。¹²³维克多·巴兰尼科夫(Viktor Barannikov)、阿尔伯特·马卡索夫(Albert Makashov)、弗拉迪斯拉夫·阿乔洛夫(Vladislav Achalov)将军迅速加入了他的内阁,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这种乐观情绪。如果说武装力量在1991年8月发生叛变,那么他们现在也能够再次这么做。

白宫的占领者也相信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支持他们这种保卫宪法的举

动。在整个 1993 年内,民意测验都表明鲁茨科伊受到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叶利钦。1993 年 4 月,一次 VTsIOM 民意测验报道说,22% 的受访者认为叶利钦是这个国家最受信任的政治人物,而鲁茨科伊以 19% 的支持率排在第二。9 月,同样的测验表明鲁茨科伊已经超过叶利钦成为这个国家最受信任的政治人物,他的支持率是 19%,而叶利钦只有 13%。¹²⁴ 现在,既然叶利钦粗暴地违反了宪法,这些在白宫构筑堡垒的人就轻易地相信大多数人会转向支持他们。在这样一个僵局中,政治力量的平衡看起来似乎相对向白宫保卫者倾斜。这样一种平衡鼓励了冒险而不是妥协。如果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在一开始就能认识到他们的失败,他们就会改用另外的方式来结束这次危机。

在路障的另一端,叶利钦及其盟友相信他们可以拖垮白宫里的人,但是,他们对胜利并没有完全的信心。在一次试图加快这一进程的尝试中,叶利钦切断了通向议会大楼的电线和电话线。恰恰在 9 月份之前,总统的私人警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Aleksandr Korzhakov)和联邦安全机构(缩写为 FSB,也就是从前的 KGB)的头头米哈伊尔·巴苏科夫(Mikhail Barsukov)已经组织了一批武装人员,这些武装人员即使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也会继续效忠于叶利钦。¹²⁵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些士兵如果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上一次(1991 年)受命突袭同样一座议会大楼的特种部队士兵,不也是拒绝遵守进攻命令吗? 总统顾问们害怕一小批军人的临阵脱逃会迅速瓦解那些忠于叶利钦的力量。126

武装冲突看来就在眼前,那些白宫“政府”更为温和的支持者开始退却。同样重要的是,久加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人在 1993 年 10 月 1 日决定他们不再参加街头抗议和示威游行,因为这些群众行动正日益变得具有煽动性和对抗性。¹²⁷ 久加诺夫判断,俄罗斯“总统”鲁茨科伊的言语和手段已经变得太过极端,且对盟友挑三拣四,只邀请顺眼的人参加到白宫保卫战之中。¹²⁸ 即使久加诺夫把叶利钦的行动贴上政变的标签,他也意识到在鲁茨科伊统治下的俄罗斯不会比在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更好。¹²⁹ 当僵局正变得日益两极分化的时候,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层的表现表明,他们比那些负责保卫白宫的人更加靠近政治中间立场。

另外,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层内的保守派想尽力避免武装冲突。¹³⁰救国阵线领导人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当时是街头抗议的主要组织者,把久加诺夫的退却称作是对反对派中其他力量的重大打击,他认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退却使得反对派人士被迫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¹³¹

1993年10月3日,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那天晚上,鲁茨科伊下令进攻紧挨着白宫的市政府办公楼。政府对这次进攻没有加以抵抗,这在白宫内掀起了一阵乐观气氛,忠于白宫“政府”的力量在不到两个小时内就夺得了这幢大楼。鲁茨科伊于是决定抓住时机,他出现于一个白宫阳台上,鼓励他的追随者去夺取对国家机构的控制权,第一个目标就是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台。一队人行进到电视台前,用自动武器攻击大楼。一场猛烈的、长时间的枪战爆发了,迫使俄罗斯主要的国家电视网关闭了数小时。

在最初的犹豫和困惑过后,叶利钦及其盟友做出了回应。叶利钦相信,他的敌人攻击市政府大楼和电视台的做法“跨越了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跨越的一条界线。他们挑起了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所有战争中最可怕的战争,一场内战”¹³²。作为回应,叶利钦命令军队占领白宫。然而,俄罗斯武装力量并没有对总统的命令显得乐于遵守。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所宣称的正向白宫挺进的军队,实际上在城市边缘的环形路上停顿了下来。¹³³正如叶利钦所回忆的,“250万武装部队甚至不能派出1000名士兵。人们发现,没有一个团到莫斯科来保卫这座城市。往轻的说,这种场景令人情绪消沉”¹³⁴。然而,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在总统私人警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协助下)最终凑齐了控制议会大楼所需的人员和装备。¹³⁵到第二天下午,也就是1993年10月4日,发生在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内战结束了。同1991年8月发生在莫斯科市区里的武装对峙比起来,有数百人而不是只有三个死于战斗之中。

结 论

1993年秋,俄罗斯第一共和国走到了尽头。叶利钦的改革同戈尔巴

乔夫的政治改革一样,没有能够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来建立一个解决政治争端的机制,结果都是:政治分化、对立,最终是武装冲突,两个武力集团都声称对同一片领土享有主权。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循环,1993年的僵局正好发生在爆发1991年僵局的地点上,只不过这一次是叶利钦占据着克里姆林宫,他的敌人保卫着白宫。1991年政治改革的失败代表着一种正式和重大的断裂,其变革作用比1993年的冲突要大。然而,在民主制度建设这个特定问题上,1993年10月可能代表着同过去改革努力的决裂。有些人会争论说,1991年8月的结果代表着民主改革的胜利,这种民主改革在这一单独事件之后继续发展,尽管1993年10月冲突的结果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时期以来的民主改革的终结。为什么民主改革会走向失败?

争议的变革议程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俄罗斯领导人所面临的改革议程要比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领导人所面临的狭窄得多。最重要的是,1991年秋俄罗斯政府领导人同其他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合作,解决了边界这一基本问题。自然,边界问题还有延续。一些自治共和国宣布独立从而威胁到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的时候,而一些政治领导人提议重建苏联。然而,边界问题并没有颠覆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各种政治角色仍然在争论苏联解体的得失,而这些争论为其他问题上的争论注入了激情。尽管如此,没有任何政治角色认真地采取过企图重建苏联的战略。换句话说,这个引起争执的话题就在戏剧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末期从议事日程上消失了。

然而,两个庞大的转型问题保留在整个时期内的议程上:俄罗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东欧国家也发生了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型的过程,在引进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认识上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同这些国家比起来,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在这个基本的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¹³⁶在这个转型阶段,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仍然指望维持计划经济,阻止市场改革。结果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鸿沟在苏联崩溃之后仍然在毒害着俄罗斯。总统和议会都无法找到关于经济改革

的为人共同认可的路线,这一事实反过来刺激着在政体上爆发冲突。宪法危机最终促成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武装冲突。荒谬的是,在1991年秋天看起来最能达成一致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民主政体——是尚未完成的、也是后来争执最激烈的任务。政治改革也是俄罗斯改革者在1991年8月夺取政权之后关注得最少的一个问题。对叶利钦及其政府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筹划如何和平地解散苏联,其次是发动市场改革。他们错误地相信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于宪政设计的问题是第三位的。他们严重失算了。

在回首往事时,一些俄罗斯改革派领导人承认他们忽略了政治改革。盖达尔当时的一个亲密顾问弗拉基米尔·毛认为,推迟进行政治改革的战略决策是不切实际的:“正如事后发展势态所展示的那样,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¹³⁷当时的国家财产委员会领导人阿纳托利·丘拜斯承认,他们进行市场改革的一些做法在本质上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那一套。¹³⁸叶利钦自己的回顾特别能够揭示问题:

也许我在事实上错误地选择了以在经济战线上发动进攻作为主要方向,而使重组政府变成了一再重复的妥协和政治游戏。我没有解散议会,而是使各苏维埃保持完整。我继续把最高苏维埃看作是推进改革合法基础的立法实体。我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议会是被指派出来的。代表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的无限权威,于是就开始了—一个永无休止的政治交易过程。¹³⁹

1991年对政治改革缺乏关注这一事实,部分是因为它被夹杂在一个庞大的改革议程之中。如果经济转型不在1991年的议程安排中的话,那么,新独立的俄罗斯领导人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新政治体制的设计上来。

此外,针对经济转型所产生强烈的分歧,部分是源于政治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当议会和总统在任命新总理、制订私有化计划或者批准新预算等事情上相互冲突的时候,他们缺少一套把争执纳入到某个框架之中以解决争论的规则。如果政治争斗的规则在这个革命性转型过程的早些时候得到制度化,那么在经济问题上发生的大量冲突就会以较少对抗性的方式得到解决。而事实却相反,每一种不同意见都变成一次制度危机。由于双方都互相威胁说要在体制上解散对方,于是双方都把每一种分歧

意见看作是一个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否定的主张。¹⁴⁰

在缺乏规则的环境中,经济改革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反过来加剧了关于规则本身的争论。随着临时的、非强制的妥协一再失败,敌对的党派互相把对方往最坏处猜想,越来越多地采取截然敌对的立场。以前的盟友,例如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总统和副总统,现在都互相妖魔化对方,称对方为极端分子。哈斯布拉托夫和叶利钦,或者鲁茨科伊和盖达尔,虽然在看待市场或者苏联的问题上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他们最终对政治体系的结构造成了打击。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在经过明确界定的政体中,激进地反对进行市场改革的反对派会不会认可共产主义体制的解散。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一些基本的事务不能通过民主程序得到解决。¹⁴¹然而,假使在第一共和国初期就能更好地明确界定政治规则的话,那么就最可能为双方超越宪法的行为划定一个界限。当1993年秋天冲突发生的时候,是叶利钦的前盟友而不是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战斗到底。如果说最初是对经济政策的不同偏好在总统和议会之间挑起了争斗,那么,是有关俄罗斯政治体制设计的对立观点最终导致了武装冲突。

在这种政治两极化的背景下,第一阶段转型期遗留下来的制度设计这一未完成的任务在第二阶段反复出现,并造成了困扰。最重要的是,1991年夏天建立总统制而总统的权力又划分得很不清晰这一事实,在苏联崩溃之后激化了俄罗斯内部的冲突和政治两极化。甚至把总统官邸移到克里姆林宫这件事情都提高了政治两极化的程度,因为这使最高苏维埃和议会有了自己的大楼、资源和地盘。假如并没有产生过总统这一职位的话,那么,俄罗斯政治团体之间武装化的两极化或许可以避免。

政治两极化反过来又为特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类型带来了好处。随着两极化的日益加剧,中间主义团体(比如公民联盟)从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逐渐退出。1992年夏天和秋天,公民联盟取代了议会中的保守派,以中间派候选人的身份从总统那里得到了政治支持。在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妥协还是可能的时候,公民联盟有效地在议会内开展工作,制定这两个政府部门都认可的经济改革立法草案。到1992年末,“公民联盟”是俄罗斯境内最关键的政治力量之一。然而,当总统和议会之间的争执转移到

政治议题上、并且两极分化成一场宪法危机的时候，公民联盟在调和冲突上显得无能为力。公民联盟领导人是训练有素的密室谈判家和说客，但作为街头政治家却根本不合格。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转向宪法议题，这也削弱了这个团体的影响力。当俄罗斯的政治家分化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分别站在总统和议会这两种对立的体制一边的时候，提倡妥协的人根本就没有制度上的框架来推进他们的目标，无论是正式的还是其他类型的制度框架。¹⁴²与此相似的是，他们用来推进这些目标的手段——谈判、游说和妥协——也都一一不中用了。

与那些协商式民主转型——在那里，那些激进分子和强硬派被排除到边缘地带——相反，这次转型却动员了俄罗斯政治领域中的极端派，使他们无论在权力上还是在成就上都有了提高。像民族主义分子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和共产党人维克多·安波罗夫(Viktor Anplov)这样的激进派，在第一共和国最初的几个月内还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到了1993年10月，他们都成了主要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在领导反对叶利钦的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民主阵营内部，民主俄罗斯中的激进分子也在国家政治中扮演了更多的角色，因为当政治斗争重新回到街头上的时候，那些当权者又一次需要利用他们的动员技能。当政治和经济争论由密室谈判所决定时，像公民联盟这样的团体就成为主要角色。但是，当政治上的争执是由街头堡垒所决定的时候，劳动俄罗斯和民主俄罗斯这样的团体被证明是更为关键的角色。

对权力分配的认识

忽略政治改革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助长了俄罗斯境内政治力量之间权力分配的模糊性。缺乏选举使得政治领导人可以声称得到了无法查证的大众支持。在快速的经济变革背景下，大多数俄罗斯公民的日子都越过越糟，反叶利钦的政治家们都特别大胆地夸大自己的权力和支持率。在议会内部，投票记录和政治家排名毫不含糊地表明反对叶利钦的阵营正在发展壮大。民意调查显示，叶利钦的支持率正在迅速下跌，而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的排名不断攀升，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对改革失去信心。¹⁴³另外，双方都分别声称总统或者议会的合法性

是无效的,因为双方都是在新俄罗斯国家建立之前被选出来的。1993年4月的全民公决为双方都提供了他们获得广泛支持的信息。尽管叶利钦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强劲,但是实际结果差不多是五五开。选民分裂成几乎相等的两大阵营,一方支持叶利钦的革命,另一方则反对。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一半的选民支持建立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另外一部分则反对。¹⁴⁴相似的是,民意测验表明,那些鼓吹扩大总统权力或者扩大议会权力的政治家得到的支持势均力敌。然而,最大数目的人(39%)支持政府的这两个机构享有同等权力。¹⁴⁵

进一步说,我们必须记住,俄罗斯国家还处在萌芽之中。国家内部的权力划分,特别是武装力量内部的权力界限还没有明确地界定,这使得测评权力的分配变得十分困难。即使大多数的俄罗斯公民支持叶利钦,反对派中的许多人也相信,如果出现公开的暴力冲突,武装力量会站到他们一边。反叶利钦联盟也相信他们的支持者对他们的信念更有激情,会采取积极行动,而那些支持叶利钦的人被认为是沉默的和消极的一群,由于经济改革的进程而失望,而这次改革是他们在两年之前帮忙启动的。

随着政治活动日益变得粗野,对彼此力量的估算也变得更加困难。在整个冬天和1993年的春天,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反对派设法动员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头进行示威。这些示威在1993年5月1日达到顶点,当时救国阵线组织了上万名支持者来庆祝这一传统的苏联节日。在莫斯科的集会以莫斯科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而告终。反对派领导人把“五一”游行看作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因为它显示了他们的步兵有能力同国家机关进行暴力对抗。由于这种对所受支持的夸大,1993年上万群众数日内二十四小时全时段保卫议会大厦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在同一时间里,人们没有看到支持总统的示威游行发生。白宫的保卫者们也相信他们能够指望军队发生严重哗变,因为他们的“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曾经是一名陆军将军。各地区的领导人对双方的态度仍然是不明朗的,最能鲜明表明这点的证据就是新成立的联邦会议不愿意支持叶利钦的宪法改革。

这种双方相对均等但仍然模糊的权力分配增大了冲突的可能性。如果双方肯定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市民和士兵都支持他们其中一个,那么较

弱的一方会更有可能愿意承认较强一方的要求。然而,双方都认为自己将在危机中成为胜利者,因而没有一方畏缩不前避开冲突。¹⁴⁶在1993年秋天俄罗斯的政治僵局中,双方都决定通过极端手段来夺取胜利。在这场零和战斗中,叶利钦胜利了。

转型中第二个对抗模式的后果

叶利钦部署武装力量的决定,破坏了以前所有的用谈判磋商的方式实现转型、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承诺,这个结果同1991年8月颇为相似。然而,与1991年不同的是变革议程和对立的政治力量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看起来不像在第一次转型中那样尖锐。叶利钦鲁莽而成功地使用了武力,从而给了他不受其他政治力量的牵制来设计新体制的权力。至少在早期阶段,叶利钦有权力来强制推行他的新的政治规则。在几年内,叶利钦第二次对其政治对手的军事胜利给了他更多的机会来构思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他是怎么构想的,新体制的遭遇如何,这将是下一部分的主题。

注 释

1. 作者与叶戈尔·盖达尔于1997年10月8日的访谈。

2. Aleksei Ulyukaev, *Rossiya na puti reform* (Moscow: Evraziya, 1996); Joel Hellman, "Breaking the Bank,"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Juliet Johnson, *A Fistful of Rubl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ussian Banking Syst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作者1991年10月8日与民主俄罗斯协调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波克瑟的座谈。

4. 这种主张经作者与下列人物的座谈而得到证实,他们是:民主俄罗斯领导人加里·卡斯帕罗夫(Gari Kasparov, 1991年10月10日)、阿卡迪·穆拉谢夫(1991年10月11日),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人民代表玛丽娜·塞利耶(1991年10月14日于圣彼得堡)的谈话。

5. 作者于1992年6月23日与民主俄罗斯协调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波克瑟的谈话。

6. 参见1995年8月作者与米哈伊尔·季米特耶夫的谈话。季米特耶夫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时任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最高苏维埃经济改革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7. “专家阶层”这一术语源于 Marc Garcelon, “The Estate of Change: The Specialist Rebellion an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Moscow: 1989—1991,” *Theory and Society* 26(1997):39—85.

8. 参见鲁茨科伊,引自 Alexander Rahr, “Challenges to Yeltsin’s Government,” *RFE/RL Research Report*, February 28, 1991, 3.

9. 参见哈斯布拉托夫,引自 *Izvestiya*, January 13, 1992; 收录于 *Yeltsin-Khasbulatov: Edinstvo, kompromis, bor’ba* (Moscow: Terra-terra, 1994), 113.

10. See, for instance, “Rezolutsii II chrezvychainogo s’ezda CPRF”, *Sovetskaya Rossiya*, February 25, 1993, 2.

11. Boris Slavin, “Nu I kak vam kapitalizm?”, *Pravda*, May 5, 1992; 收录于 Boris Slavin, *Posle sotsializma* (Moscow: Flinta, 1997), 101—102.

12. TASS, February 13, 1992, in *FBIS-SOV-92-031*, February 14, 1992, 45.

13. *Sovremennaya politicheskaya istoriya Rossii (1985—1997 gody)*, vol. 1 (Moscow: Dukhovnoe Nasledie, 1997), 392.

14. 详情参见 Michael McFaul, “Russian Centr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9(1993), 196—222.

15. 阿卡迪·沃尔斯基在 1992 年 6 月 26 日公民联盟 (Grazhdanskii Soyuz) 成立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作者参加了那次发布会。

16. 参见 Grazhdanskii Soyuz, “Programma antikrizisnogo uregulirovaniya”, mimeo (Moscow, 1992), 13—23.

17. 参见作者于 1991 年 10 月 10 日与民主俄罗斯领导人、莫斯科区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代表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的访谈。

18. 参见作者于 1995 年 6 月 7 日与俄罗斯统一领导人、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人民代表维克多·阿克修切茨的访谈。

19. 参见作者于 1991 年 10 月 11 日与俄罗斯民主党副主席亚历山大·特里科夫的访谈。

20. 亚历山大·肖金 1992 年 10 月 27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参见 Aleksandr Shokhin, *Moi golos budet vse-taki uslyshan: Stenogramma epokhi peremen* (Moscow: Nash Dom—L’Age d’Homme, 1995), 36.

21. 在其他后共产主义转型国家中,那些力求维护旧秩序的国家通常力图实施总统制。参见 Barbara Geddes, “Initiation of New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New Democracies: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ed. Arend Lijpart and Carlos Waism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23.

22. Serger Alekseyev, *Demokraticheskie reformy i konstitutsiya* (Moscow: Pozitsiya, 1992), esp. 23—24.

23. Serger Alekseyev and Anatoly Sobchak, "Konstitutsiya i sud'ba Rossii," *Izvestiya*, March 28, 1992; and March 30, 1992, 2.

24. "Konstitutsiya Rossiiskoi Federatsii(Proekt)", Variant A, *Konstitutsionnyi Vestnik* 4(1990):57.

25. Ibid., 82.

26. Article 5.4.5. B, "Konstitutsiya Rossiiskoi Federatsii(Proekt)", Variant B, *Konstitutsionnyi Vestnik* 4(1990):92.

27. Oleg Rummyantsev, October 10, 1991, in *Konstitutsionnyi Vestnik* 8(October 1991):4.

28. 哈斯布拉托夫于1991年10月30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收录于 *Yeltsin-Khasbulatov*, 98. See also "Iz istorii rossiiskgo konstitutsionalizma," *Konstitutsionnyi Vestnik* 9(1991):32—37.

29. Ruslan Khasbulatov, "Reformiravanie reform," mimeo (Moscow, 1992), 16.

30. 参见作者于1995年6月7日与卢斯兰·哈斯布拉托夫的访谈。

31. Vladimir Lysenko, "Tezisy doklada na kongresse demokraticeskikh sil respublik i natsional'no-territorial'nykh obrazovaniy v sostave RSFSR," December 14—15, 1991, in Vladimir Lysenko, *Ot Tatarstana do Chechni: Stanovlenie novogo rossiiskogo federalizma* (Moscow: Institut Sovremennoi Politiki, 1995), 19.

32. 哈斯布拉托夫的演讲, in *Rossiskaya Gazeta*, January 2, 1992; 收录于 *Yeltsin-Khasbulatov*, 111.

33. Ruskoi, "Vystuplenie na kongresse grazhdanskikh i patrioticheskikh sil," *Komsomolskaya Pravda*, February 17, 1992; 收录于 *Neizvestnyi Ruskoi: Politicheskii protest* (Moscow: Obozrevatel', 1994), 282.

34. 参见作者于1995年4月10日与民主俄罗斯协调委员会成员尤里·尼斯涅维奇的访谈。

35. 参见作者于1991年10月8日与苏联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俄罗斯民主党主席尼古拉·特夫金的访谈。

36. *DR-Press*, No.350, July 5, 1992, 1.

37. 民主俄罗斯与这一新联盟保持着不同的认同,其后,在1993年的议会竞选中,完全不同于俄罗斯选择,这将在第八章中论及。

38. 叶戈尔·盖达尔1992年7月4日的讲话,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39. Igor Kharichev and Viktor Sheinis, "Obrashchenie sobraniya grazhdan Rossiiskoi Federatsii k narodnym deputatam Rossiiskoi Federatsii," mimeo, March 26, 1992.

40. Yegor Gaidar, "Novyi kurs," *Izvestiya*, February 10, 1994; 收录于 Ye-

gor Gaidar, *Postroit' rossiya* (Moscow: Evraziya, 1994), 15.

41. 详细的阐述参见: Micha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47(1995):210—243.

42. 参见与尤里·阿法纳斯耶夫的访谈, *Det Fri Aktuelt*, in *FBIS-SOV-92-026*, February 7, 1992, 47; and *RFE/RL Daily Report* 71(April 10, 1992):1.

43. 参见作者于1995年7月4日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民主俄罗斯领导人阿纳托利·沙贝德的访谈。

44. 参见作者于1992年7月与俄罗斯共和党两位副主席雅切斯拉夫·索斯塔科夫斯基(Vyacheslav Shostakovsky)和弗拉基米尔·李森科的访谈;另见奥利格·鲁姆扬茨耶夫("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民主俄罗斯霸权政治的批评, Julia Wishnevsky, "Russia: Liberal Media Criticize Democrats in Power," *RFE/RL Research Report* 1(January 10, 1992):6—11.

45. Thomas Remington, "Ménage à Trois: The End of Soviet Parliamentarism," in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The Development of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ed. Jeffrey Hahn(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126.

46. 这在许多处于转型期的新国家中,确乎事实。参见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411.

47. 例如,在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间发生了大量难以置信的变化。收录于"VII S'ezd: Obshchoe i osobennoe," *Rossiiskii Monitor* 2(Moscow: Indem, 1993), 76.

48. 其后,议会采用循环多数制,改革派在其中几乎不占据领导职位。参见 Josephine Andrews, *When Majorities Fail: The Russian Legislature, 1990-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以及 Remington, "Ménage à Trois".

49. Mikhail Myagkov and Roderick Kiewiet, "Czar Rule in the Russian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1(1996):34.

50. 参见作者于1995年7月28日与俄共领导人瓦连京·库普索夫的访谈。另见 Anatoly Lukyanov, *Perevorot: Mnimyi i nastoyashchi: Otvety na voprosy, prishedshie v matrosskuyu tishinu* (Voronezh: Vornezhskaya Oblastnaya Organizatsiya Soyuzha Zhurnalistov Rossii, 1993); Vladimir Isakov, *Raschlenenka* (Moscow: Zakon i Pravo, 1998); and Viktor Peshkov, ed., *Kommunisty: Pravo na vlast'* (Moscow: Tsentr Isslendovannii Politicheskoi Kuk'tury Rossii, 1998)。

51. Viktor Anpilov and Vladimir Yakushev, "Nizlozhit' uzurpatorov!" *Molniya* 28(1991):1; 另外参见作者与艾尔伯特·马卡索夫(Albert Makashov)将军的访谈, "Makashov: Narod obmanuli," *Molniya* 29(1991):3.

52. "Krovavoe voskressenie," *Den'* 9(March 1992):1—2.

53. Yevgeny Krasnikov, "Trudorossy naznachili voynu na 22 iyun'ya," *Nezavisimaya Gazeta*, June 20, 1992, 2. 关于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对此事件作出的积极评价,参见"Ostankino. 22 Iyun'ya, 4.30 Utra," *Ovozrenie* 2(1992):8—9; 以及"Vinovnyye dolzhni ponesti zasluhennoe nakazanie zayavleniya," *Pozitsiya* 8(1992):1.

54. Viktor Anpilov, "Ostankino: Shag k pobede," *Molniya* 38(1992):1.

55. Aleksandr Frolov, "Nuremberg provalilsya," *Sovetskaya Rossiya*, December 3, 1992, 2.

56. 参见作者于1995年7月28日与在法庭上保卫苏共的主要组织者瓦连京·库普索夫的访谈。

57. Anatoly Minayev, "Soyuz kimmunistov karelii: Pervyi shag," *Pravda*, January 10, 1993, 2; "Partiinye konferentsii v Rossii," *Glasnost'* 6(February 1993):5.

58. 参见作者于1995年5月与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党员、《真理报》专栏作家鲍里斯·斯拉文(Boris Slavin)的访谈。另见"Vozmyomsya za ruki, druz'ya," *Levaya Gazeta* 4(November 1992):2; "Otkuda berutsya noviye vozhd'i," *Glasnost* 3(January 21—27, 1993):2.

59. 应该记住,对于大多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来说,戈尔巴乔夫代表着苏共内部的社会民主派。这些新党员完全拒绝、鄙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苏共内部先前持社会民主思想的人,或与左翼为伍,或加入了别的党派。参见 Peshkov, *Kommunisty*, 149—150.

60. 参见作者于1995年5月27日同伊利亚·康斯坦汀诺夫的访谈。康斯坦汀诺夫在1990—1993年间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救国阵线副主席。

61. "Programmnoe zayavlenie," *Pravda*, March 3, 1993, 2.

62. 参见作者与康斯坦汀诺夫及阿克修切茨的访谈。

63. Edict no. 1308 of the Russian president, "On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Rossiiskaya Gazeta*, October 30, 1992, 2, in *FBIS-SOV-92-211*, October 30, 1992, 13.

64. Volsky, as quoted in "Pridet li spaset?" *Argumenty i Fakty*, no. 34 (1992); "Red Square," Ostankino television program, November 21, 1992, in *FBIS-SOV-92-226*, November 23, 1992, 27. 在与作者的一次访谈中(1997年12月),公民联盟常委瓦莱丽·霍姆雅科夫(Valery Khomyakov)回忆说,这个数字是虚构出来的,公民联盟的领导人故意这样宣传,目的是为了树立该党是一个能同政府讨价还价的形象。然而,这种宣传策略在当时似乎有效,因为很多人相信公民联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65. 在整个后共产主义世界里,最让人惊异的事情之一是,俄罗斯国内民众没

有反对市场改革。真正抵制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是那些可能获益于部分改革的经济行为体。参见 Joel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50 (1998): 203—234.

66. Boris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165.

67. Ibid., 158; 另参见 Gaidar, *Dni porazhenii i pobed*, 173.

68. 叶利钦于 1991 年 10 月 28 日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讲话, 收录于 *Yeltsin-Khabulatov*, 96。

69. Boris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176.

70. 参见作者与哈斯布拉托夫的访谈。

71. 叶利钦的盟友和敌人都批评他没有同议会及人民代表个人以更亲密的方式工作。布尔布利斯于 1995 年 6 月 30 日与作者进行了座谈, 他回忆说, 他也认为盖达尔所领导的政府在处理同议会中的反对力量时的拙劣策略是他最大的策略失误之一。

72. Boris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166.

73. "Vystuplenie Prezidenta Rossiiskoi Federatsii B. N. Yeltsina po itogam shestova s'ezda narodnykh deputatov Rossiiskoi Federatsii", April 12, 1992, in *Shestoi s'ezd narodnykh deputatov Rossiskoi Federatsii: Dokumenty, doklady, soobshcheniya* (Moscow: Respublika, 1992), 266—274.

74. Gaidar, *Dni porazhenii i pobed*, 206.

75. 1992 年 6 月 14 日宣布了这项新的任命。其时, 叶利钦在美国访问, 访问期间,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贷款进行了正式谈判。

76. 参见肖金于 1992 年 10 月 12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政府策略的表述。Shokhin, *Moi golos budgt vse-taki uslyshan*, 30—42.

77. World Bank, "Subsidies and Directed Credits to Enterprises in Russia: A Strategy for Reform," Report no. 11782-RU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April 8, 1993).

78. Bridget Granville, *The Success of Russian Economic Reform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5), 67; and Ulyukaev, *Rossiya na puti reform*, 34.

79. Interfax, November 3, 1992, in FBIS-SOV-92-214, November 4, 1992, 2.

80. 总统的评论参见 *Nezavisimaya Gazeta*, November 5, 1992, 1; 另外参见舒梅科的评论, *Pravda*, October 29, 1992, in FBIS-SOV-92-213, November 3, 1992, 36。1992 年秋天, 作者采访了下述人物, 证实了关于叶利钦这些做法的解读: 民主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波克瑟、列夫·帕诺马尔耶夫和米哈伊尔·施耐德 (Mikhail Shneider); 公民联盟领导人伊利亚·罗伊特曼 (Ilya Roitman)、

■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瓦莱里·霍姆雅科夫(Valery Khomyakov)和彼特·菲多索夫(Peter Fedosov),以及总统办公厅负责政党与运动事务的助理伊尔·哈里乔夫(Igor Kharichev)。民主俄罗斯领导人承认这一情形,却对此抱怨,而公民联盟领导人却对此表示支持。这一情形表明,这种解读极可能确乎事实。

81. 参见作者于1998年3月与总统办公厅负责人谢尔盖·费拉多夫(Sergei Filatov)的访谈。

82. 叶利钦的新闻发布会, Ostankino Television, April 14, 1993。此处引自 *FBIS-SOV-93-071*, April 15, 1993, 17。

83. 参见对哈斯布拉托夫的访谈。

84. Anders Åslund,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56。

85. Yusif Diskin, "Mne simpatichen chetvertyi variant," *Nezavisimaya Gazeta*, July 25, 1993, 3; 同时参见 Igor Karpenko, "Chek ili schyot," *Izvestiya*, July 17, 1993, 4。

86. Mau, *Ekonomika i vlast'*, 58. Myagkov and Kiewiet, "Czar Rule in the Russian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87. 参见鲍里斯·费奥多罗夫的评述, *Segodnya*, August 31, 1993。此处引自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5 (September 22, 1993): 8。

88. See Yeltsin, "Obrashcheniya prezidenta na VII S'ezde narodnykh deputatov," December 10, 1992, in *Yeltsin-Khasbulatov*, 235—238。

89. 参见作者与沙贝德的访谈。

90. 参见作者与弗拉基米尔·伊萨科夫(Vladimir Isakov)于1999年3月16日的访谈。伊萨科夫当时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反叶利钦的领导人之一。

91. 关于采用这种方法制宪的必要性的论述,参见总统委员会成员阿列克谢·萨尔闵(Aleksei Salmin)于1993年2月2日发表的评论, "Moskovskie Novosti," February 2, 1993, 2a。

92. Khasbulatov, "S'ezd narodnykh deputatov i referendum," *Rossiskaya Gazeta*, January 10, 1992, in *Yeltsin-Khasbulatov*, 267。

93.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1993, A10。

94.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March 16, 1993。

95. Vyacheslav Kostikov, *Roman s prezidentom; Zapiski press-sekretaria* (Moscow: Vagros, 1997), 169。

96. See Viktor Sheinis, "S'ezd: Soglasie ili konfrontatsiya?" *Moskovskie Novosti*, March 14, 1993, 7a。

97. Lipitsky, "The IX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and Recent Events," pamphlet (Washington, D. C.: Civic Union, 1993), 10。

98.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March 31, 1993.

99. 关于这种周期的一般模式,参见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s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0. Morris Fiorina,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1. 关于支持 1993 年改革的数据,参见 Vserossiiskii Tsentri Izucheniya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VTsIOM), *Informatsionnyi byulleten' monitoringa* (Moscow: September—October 1993), 4。

102. Sergei Baburin, "The Russian Realities and the Vietnam Syndrome," *New Times* 26(June 1993);24.

103. 参见作者与当时的总统委员成员列奥尼德·斯米尔尼亚金(Leonid Smirnyagin)于 1999 年 3 月 18 日的访谈,以及作者与当时民主俄罗斯协调委员会成员米哈伊尔·施耐德于 1997 年 10 月 12 日的访谈。另外参见 Kostikov, *Roman s prezidentom*, 180。

104. 叶利钦的新闻发布会, Ostankino Television, April 14, 1993。此处引自 FBIS-SOV-93-071, April 15, 1993, 14。

105. 作者参加了此次聚会。

106. 参见作者于 1993 年 6 月与总统办公厅负责政党与运动的助理伊格尔·哈里乔夫的访谈。哈里契夫当时是制宪会议中政党和社会组织小组的组织者之一。

107. Anatoly Sobchak, "Dostup k vechnozelneyuchshemu delu," *Moskovskie Novosti*, March 21, 1993, 7a.

108. 谢尔盖·沙赫赖,引自 Robert Ahdieh, *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8。

109. 参见作者与斯米尔尼亚金的访谈,他当时是制宪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110. 参见 articles 2.5.2, 2.5.5, and 2.5.6 in "Konstitutsiya Rossiiskoi Federatsii(Proekt)", *Konstitutsionnyi Vesnik* 4(1990):63—64.

111. 参见与鲁姆扬茨耶夫的访谈。

112. 关于构成这个草案的基本思想,参见 Rossiiskoe Dvizhenie Demokraticeskikh Reform, *Konstitutstiya Rossiiskoi Federatsii(Proekt)* (Moscow: Novosti, 1992); Alekseev, *Demokraticheskie reformy i konstitutsiya*; Alekseev and Sobchak, "Konstitutsiya i sud'ba Rossii"。

113. 叶利钦的新闻发布会, Ostankino Television, April 14, 1993, in FBIS-SOV-93-071, April 15, 1993, 15。

114. Ahdieh, *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56。

115. 尤其参见哈斯布拉托夫在4月9日苏维埃地方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发表于 *Rossiskaya Gazeta*, April 13, 1993, 3—4.

116. 参见作者对鲁姆扬茨耶夫的访谈。

117.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247.

118. “Postanovlenie verkhovnogo soveta rossiiskoi federatsiya, ob ispolnenii polnomochii prezidenta Rossiskoi Federatsii vitse-prezidentom Rossiiskoi Federatsii Ruskim A. V.”, *Sovetskaya Rossiya*, September 23, 1993, 1.

119. Vladimir Isakov, *Gosperevorot: Parlamentskiye dnevniki 1992—1993* (Moscow: Paleiya, 1995):426.

120. “Iz Zayavleniya Agrarnoi Partii,” *Sovetskaya Rossiya*, September 25, 1993, 2; “Zayavlenie TsK KPRF,” *Sovetskaya Rossiya*, September 23, 1993, 2.

121. “Dom Sovetov. Khronika sobytii,” *Sovetskaya Rossiya*, September 25, 1993, 2.

122. 参见作者与最高苏维埃分析中心主任、1993年9—10月白宫的保卫者列昂逊·别佐夫于1999年3月的访谈。

123. Isakov, *Gosperevorot*, 436.

124. VTsIOM, “Rossiya i vybory. Situatsiya do i posle sobitii 3—4 oktyabrya: Analiticheskii otchet”(Moscow, 1993), 11.

125. 根据科尔扎科夫的回忆,1993年3月,在弹劾投票前夕,巴苏科夫采取了第一套方案阻止了议会的进攻。参见 Aleksandr Korzhakov, *Boris Yeltsin: Ot rassveta do zakata* (Moscow: Interbuk, 1997), 158—159.

126. 参见作者与斯米尔尼亚金的访谈,做出类似观点的参见 Korzhakov, *Boris Yeltsin*, 165。

127. 参见作者于1999年3月19日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团成员维克多·佩希科夫(Viktor Peshkov)的访谈。

128. 参见作者于1999年9月23日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访谈。

129. Ibid.。

130. 在向作者解释他当时的这种想法时,久加诺夫回忆说,他生于一个小村庄,二战期间,这个村庄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杀了。由于有这样的童年经历,他认为他比鲁茨科伊更反对暴力。

131. 参见作者对康斯坦丁诺夫的访谈。

132.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271.

133. Korzhakov, *Boris Yeltsin*, 168.

134.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276.

135. 科尔扎科夫详述了当时叶利钦阵营内的混乱以及最后关于攻占白宫的计划和决定,参见 Korzhakov, *Boris Yeltsin*, 168—193。

136. 关于东欧和前苏联就市场改革在国内取得共识的相对程度的比较,参见 Anders Åslund, Peter Boone, and Simon Johnson, "How to Stabilize: Lessons for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1996): 217—309。

137. Mau, *Ekonomika i vlast'*, 43.

138. 1999年5月17日阿纳托利·丘拜斯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的公开演讲。

139. Yeltsin, *Struggle for Russia*, 127.

140. 这一观点是乔治·布莱斯劳尔(George Breslauer)提出的,参见 George Breslauer, "The Roots of Polarization," *Post-Soviet Affairs* 9(1993):228。

141. Russell 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2. 关于在1993年并不存在这种中间状态的论述,参见 Yuri Korgunuk and Sergei Zaslavsky, *Rossiiskaya mnogopartiinost'* (Moscow: INDEM, 1996): 43—44; 另参见 Aleksandr Sungurov, "Stanovlenie i razvitie politicheskikh partii sovremennoi Rossii(1990—1993)," Ph. D. dissertation, Severo-zapadnaya Akademiya Gosudarstvennoi Systema, St. Petersburg, 1996, 91—93。

143. "Strukturniye reitingi politikov," *Rossiiskoi Monitor* 2(1993): 43; VTsIOM, *Ekonomicheskiye i sotsial'niye peremeny: Monitoring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5(September 1993):40。

144. Tsentr Sotsioekspres, Institut Sotsiologii, Rossiiskaya Akademiya Nauk, *Zerkalo mnenii*, pamphlet(Moscow, 1993)。

145. Stephen White, Richard Rose, and Ian McAllister, *How Russia Votes* (Chatham, N. 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7), 104; Timothy Colt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ferendum," in *Growing Pains: Russian Democracy and the Election of 1993*, ed. Timothy Colton and Jerry Hough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294。

146. Geoffrey Blaney,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第三篇

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诞生， 1993—1996 年

第六章

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设计

对俄罗斯而言,十月事件是一场国家悲剧,这一委婉的表述被生造出来,以此描述10月3日至4日在总统与议会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有关制度设计的争论在许多年后又一次超越宁静的政治领域而进入暴力对抗的地界。1991年的军事对峙夺走了3个白宫保卫者的生命。1993年,100多人死于相互敌对的政府部门间的斗争,而上一次莫斯科经历这样的暴力事件还要追溯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接管政府的时候。

除了这些死亡事件以外,十月事件还使俄罗斯不再以浪漫的姿态拥抱民主。如果1991年的军事对峙的解决标志着民众开始支持新政权以及它所宣称的代表民主理念的话,那么,1993年冲突的结束标志着民众对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率到了最低点,并且不再对俄罗斯民主的前景保持乐观。虽然赞成叶利钦解散俄罗斯议会的人要比反对的人多,但是那时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十月对峙过后不久,民众给俄罗斯的民主表现打了很低的分数。¹毕竟,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不会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标。毫不奇怪,仅有50%的选民决定参加1993年12月的大选投票。有许多消息来源暗示,当局为使宪法公决有效而伪造参选人数,实际投票人数可能更低。²十月事件也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制造了权力高度不对称的状态,削弱了权力分立的原则。换句话说,这种演变模式影响了随后出现的政治制度。毫无疑问,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证明了在短期内巩固民主制度的计划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当民主政府不再以民主的方式行事,它会失去社会合法性,转而阻碍民主制度的巩固和深化。³

俄罗斯和西方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叶利钦新政权是独裁政权——它“回到”了威权的统治。⁴这有点言过其实。矛盾的是，十月对峙所带来的，的确是为俄罗斯设计和实施新政治制度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多年后第二次击败他们的敌人，使他们获得了能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实行新游戏规则的权力。按照他们的估计，人们对共产主义复辟的恐惧已经平息，他们有机会来巩固他们认为合适的经济和政治新秩序。⁵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失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共产主义反对派认同了这种对国内新权力平衡的分析。保卫白宫的领导人要么被捕入狱，要么在逃。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参加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暴力对抗，但党的领导人仍然担心叶利钦在一场建立专制政权的运动中取缔他们的组织并逮捕它的领导人。结果是，紧接着1993年10月的冲突之后，俄联邦共产党官员并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对抗叶利钦和他的政治经济计划。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种权力平衡的变化使叶利钦和他手下的人获得了单独设计一套俄罗斯政治统治规则的权力。

1993年秋提出的新规则没有反映人们对政治和宪法问题的看法，它们也不是通过精英之间的妥协而产生的。相反，叶利钦和他的亲密顾问在制度设计上进行了一个不受其他政治角色和社会力量制约的实验。宪法的有些设想是为了确保新宪法得到大多数俄罗斯公民的支持。例如，叶利钦认为选举必须尽快举行，以便使过渡性的独裁统治只存续有限的时间。总体而言，制度设计反映了叶利钦及盟友所设想的最大利益。不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被排除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之外，而且在总统亲密关系圈之外的改革者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例如，前叶利钦政府的成员和新选举集团亚博卢(Yabloko)的共同创始人尤里·波尔迪列夫(Yuri Boldyrev)公开抨击道：“胜利者虽然‘很不情愿’谈论胜利，但他们正按照‘胜利者的权利’来行事。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那些失败者，而且也强加给了那些试图保持中立的人。”⁶

在1993年10月摊牌以后，另一个问题——市场改革还是复活共产主义——显然从变革的议程中去掉了。随着叶利钦及其盟友以暴力击败了敌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现在结束了。正如在随后第三篇各章中探讨的那样，这一评价被证明还不成熟。但是在1993年秋

天,共产主义复活的威胁看上去确实很遥远,进行激进市场改革的条件比以往更合适。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结束解决了领土争端,那么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终结结束了关于经济制度的争论。

随着苏联解体已成定局并且计划经济显然已经瓦解,改革议程中最后的重大问题就是政治改革。与1991年秋叶利钦优先考虑的问题相比,那时他关注苏联解体和经济改革问题而忽视政治改革,现在叶利钦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重新制定俄罗斯的政治规则。与戈尔巴乔夫的设想以及叶利钦第一次政治改革设想(或者说缺乏这样的设想)相比,第三次设计统治俄罗斯的新制度时延续了以往的做法,它提供一套所有主要政治角色(最终包括叶利钦在内)都会遵守的政治组织规则。本书的第三篇解释了这套规则比前两次设计的政治制度持续时间更长的原因。本章的余下部分会追溯原来的设计。然后,本书第三篇接下去的几章会探究这些新规则如何刺激并塑造此后的俄罗斯政治。

新 宪 法

在解散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法令中,叶利钦号召通过举行选举来选择还不存在的新议会的议员。在9月底法令颁布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叶利钦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费尔奥多夫的看法,总统班子还没有考虑举行一次关于宪法的全民公决。仅在1993年10月5日炮轰白宫以后,费尔奥多夫设想过举行一次有关新宪法的全国性投票。⁷在10月初还没有新宪法的完整草稿,因此,叶利钦让费尔奥多夫立刻召集一个起草委员会。

叶利钦的宪法起草者并没有从起草草稿开始工作,而是从制宪会议已有的大量工作中,以及从当时已被解散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起草的鲁姆扬茨耶夫草案中来汲取有益的东西。⁸1993年8月,制宪会议和前议会宪法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开始起草文件,这份文件最终成为1993年12月批准的宪法。十月事件以后,一个人员精简的

制宪会议被重新召集起来并正式成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虽然叶利钦的助手控制了这个过程。令人惊讶的是,该组织的第一次会议在1993年10月11日进行,差不多是1400号总统令发布的四周以后。⁹举行宪法全民公决的法令于1993年10月15日发布,而新宪法的第一稿在11月公开流转,几乎就在宪法全民公决的前四周。在一次选后调查中,仅有38%的调查对象宣称他们看过草案,这样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¹⁰叶利钦和他的班子草率而匆忙地实施了一套新的俄联邦政治规则。

政府的结构

新宪法与叶利钦9月发布的1400号法令保持一致,它保留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并扩大了其行政长官的权力,但它改变了立法机关的结构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换句话说,叶利钦设想通过赋予总统更多权力以解决两年来俄罗斯政治两极对立的制度僵局。正如他这种制定规则的方式打破了过去的那种做法,叶利钦的新组织结构与过去的国家机构组织形式真正决裂了。

新宪法设立了两院制的国家议会。上院即联邦委员会,以地区为基础组成;它有178个代表,俄罗斯联邦的89个地区(联邦主体)各选两名代表参加。¹¹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叶利钦在1993年夏天设立这个组织以获得地方的支持。虽然叶利钦和他的助手巩固了对议会的胜利,但他们仍然相信需要地方精英默认新宪法,特别是由于新宪法损害了一些共和国的权力。由地方领导人控制的上院为合作提供了一个动因。

议会的下院即国家杜马(以下简称杜马),由450个代表组成。下院作为俄罗斯政府的主要立法机构,拥有起草法律、批准预算的职责。杜马也被赋予了批准或否决总统提名的总理候选人的权力。

这一宪法草案没有特别规定杜马或联邦委员会代表的选举程序。正如以下所讨论的,为了在1993年12月举行的为立法机构选择议员的第一次“过渡的”选举,叶利钦颁布总统令来规定选举规则。同时,宪法草案有关过渡时期的部分规定这些议员仅有两年的任期。新的宪法草案规定联邦所有地区享有同等地位。叶利钦与地区领导人在第一共和国早期协商产生的《联邦条约》(The Federal Treaty),以及在此之前流传的有关建

立一个不对等联邦制度的思想,显然没有在最终稿中出现。根据当时叶利钦办公厅主任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谢尔盖·费尔奥多夫的看法,《联邦条约》没有被包括在宪法最终稿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按照费尔奥多夫的估计,最终形成的《联邦条约》类似一个邦联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一个联邦结构。第二,《联邦条约》由各共和国领导人签署,而不是由人民批准。¹²但是,第三个原因没有被提到,与1993年10月冲突以后变化了的权力平衡有关。在1993年10月之前,叶利钦需要地方领导人支持他与议会的斗争;然而1993年10月之后,叶利钦和他的政府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安抚地方领导人。¹³宪法草案仍然没有分配很多联邦权利,各共和国相对于各州而言还是享有某些特权,但是所有地区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自俄罗斯独立以来第一次被写进了法律。¹⁴文件没有提到任何脱离联邦的机制,这一点十分重要。

新宪法重新肯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并重新确认了把宪法法院作为宪法争端最终仲裁者的理念。然而,叶利钦的行动和他在机构设置上的革新直接削弱了宪法法院的权力。叶利钦9月和10月的法令含糊地暂停了宪法法院的工作,为此他辩解道,法院在它正常发挥作用之前需要一部适当的宪法。¹⁵这部宪法被命名为联邦宪法,它于1994年7月由议会两院通过。叶利钦把法官人数增加到19个,从而有效地削弱了宪法法院持反对意见法官的权力。按照这一新法的规定,总统提名宪法法院法官人选,由联邦委员会而不是杜马批准任命。新宪法法院在1995年3月举行了它的首次会议,离宪法批准生效已经过去了15个月。

国家的权力平衡

毫不奇怪,新宪法草案顺理成章地赋予了总统办公室极大权力并削减了新议会的权力。新草案甚至比叶利钦9月的1400号总统令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叶利钦的助手在十月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便开始贬低政府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分立。他们发出警告称,权力分立制造了1993年双重权力的情形。9月的总统令和11月颁布的宪法草案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任命总理的权力。1400号令把任命总理的权力给予杜马,而新宪法草案的第83条A款让杜马扮演批准总统所選人选的角色

色。此外,新宪法草案规定,如果杜马拒绝批准总统的三次提名,那么总统有权解散议会并举行新的选举。同样,新草案规定,如果杜马在三个月内两次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总统既可以解散内阁也可以解散杜马。换句话说,如果杜马代表想要让政府下台,他们就不得不承受高昂的代价并且不能保证成功。新宪法草案中大多数权力制衡都有利于行政机关。

在新宪法草案中,总理也任命他的政府部长,而且这些部长不需要经过杜马的批准。政府的最终权力归属于总统,因为他能够在任何时候解除总理的职务。这种在实际上不受制衡的总统权威把任命部长的权力赋予了总统,而不是总理。此外,总统有权任命所谓强力部门的部长,即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联邦安全局(前克格勃)局长。按照新宪法草案,这些部长直接向总统而不是向总理负责。新宪法草案也去掉了副总统的职位,因为叶利钦不想出现又一个鲁茨科伊。

与总统能轻而易举地解散议会相比,新宪法使总统去职变得极端困难。弹劾程序仅在叛国或是发生严重刑事罪行的情况下才能启动,是最高法院(宪法法庭的一个分支机构)而不是杜马有权决定总统行为是否符合弹劾条件。弹劾需要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由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确认弹劾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指控的事实是否属于弹劾事由。

实际上,所有的政府实体都有权在它们职能范围内提出法案,这些部门包括杜马、联邦委员会、行政部门、总统以及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法案首先由杜马通过并经联邦委员会批准。杜马的三分之二多数可以驳回联邦委员会对任何法案的否决。总统的否决仅在两院同时取得三分之二多数时才能被驳回。此外,新宪法草案赋予总统以行政命令方式立法的权力,以及决定军事政策、制定国家预算和掌管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

修改元规则

叶利钦没有把修改宪法的权力给予自己和他的办公厅。为了修改宪法第三章至第八章——这些章节描述了政府的结构和组织——新宪法草案规定必须通过一种“联邦宪法性法律”(federal constitutional law)。这一特别类型的法律需要国家杜马三分之二多数和联邦委员会四分之三的

多数通过,并由总统批准。¹⁶这些国家机关批准以后,修正案必须得到次国家立法机关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要修改宪法的核心部分——第一章“宪法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二章“自然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第九章“宪法的修改和修正”——需要两院的绝对多数(60%)投票同意召集宪法会议。然后,宪法会议可以修改现行宪法,或取得宪法会议成员三分之二多数批准新宪法,或在全民公决中批准新修正案。

叶利钦的班子把这些复杂的程序写进新宪法里,是为了防止出现在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最后一年中那样的情况,即无休止的修改宪法占据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全部注意力。正如谢尔盖·费尔奥多夫所解释的,俄罗斯有太多自封的“宪法天才”,因而不能有一个简便易行的宪法修改程序。¹⁷换句话说,这些宪法设计者是在回应一个具体和现时的政治事态。正如凯恩(Cain)和琼斯(Jones)提醒我们注意的,这种对当前政治环境做出的回应通常是大多数新制度设计的推动力,“如果不能说绝大多数的话,那么至少许多制度设计的变化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它们通常是因为眼光短浅的人对他们或多或少所觉察的短期需要的反应”。¹⁸假设宪法草案反映了叶利钦如此之多的偏好,有人会认为这些宪法设计者不需要为总统保留宪法修改权,因为修改宪法的动议很可能来自叶利钦的对手。

批准宪法

叶利钦的法令规定新宪法必须经过全民公决才能生效。叶利钦可以随意颁布行政命令来创制宪法,无须经历投票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但他选择全民公决以赋予新宪法更大的合法性。由于困难的修改程序有助于锁定新宪法,因此由多数公民批准的做法会增加违宪的代价。

在选举期间,叶利钦只关心宪法批准的情况。他选举期间仅有的一次重要演讲(在全国电视上亮相10分钟)是敦促选民批准宪法。在访谈中,叶利钦只对实施新宪法的必要性发表了意见,而避免支持任何单个选举集团。¹⁹联邦政府向地区行政首脑(他们仍是叶利钦任命的人)发布命令,要求他们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要确保当地参选人数超过全民公决生效所需的50%。叶利钦政府的官员们威胁说,如果哪个政党批评宪法,他们就要剥夺政党的电视出镜时间。甚至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列

波夫(Nikolai Rybov)也在全国电视上公开为全民公决助阵。²⁰

议会选举规则

除了就新宪法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外,叶利钦的 1400 号法令还宣布联邦委员会和杜马的选举将在 12 月举行。叶利钦决定同时举行全民公决和议会选举,这一决定令人感到尴尬,因为他要求民众投票选举议会代表,而这个议会还不存在。如果全民公决失败,议会选举将归于无效。这两次投票同时举行,显然表明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下定决心必须确保新宪法通过。叶利钦在掌控政治精英的同时,也真正激励他们——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去发动选民参加选举,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涯正濒临险境。

在十月事件之前,叶利钦公开承诺要提前举行一次总统选举,并已定于 1994 年 6 月 12 日与议会选举同时举行。这一保证是他向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敌人做出的妥协姿态。然而,在使用军事力量打败他的敌人之后,叶利钦不再迫切需要遵守他的承诺。就这样,1993 年 11 月 6 日,他宣布下一届总统选举将按日程于 1996 年举行。

叶利钦举行议会选举的动机是很直白的。首先,他不想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很长时间。他的几个支持者迫切要求他把选举推迟到春天。他们认为在好一点的天气下参加选举的人会多一点,这样做会有利于改革派政党。²¹其他人,包括那些最关心经济改革的人,也赞同持续一段时间的威权统治,因为这样就可以在没有民选议会制约的条件下进行适当改革。然而,叶利钦有另外的想法。正如前面所述,批准新宪法是叶利钦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与全民公决同时举行议会选举的做法有助于提高宪法公决的投票率。此外,叶利钦需要使用议会选举来选择进入新政治体系的反对派。在这段变化无常的时期,叶利钦也向反对派领导人提供关键的行政职位,以此作为分化和瓦解他们的手段。²²选举是一种更加有力的选择方式。正如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

坐在白宫里的代表(在他解散议会的法令发布以后)将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离开他们的碉堡来参加选举,要么仍待在里面,从而永远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他们已经如此习惯于“代表”这个字眼,他们如此喜欢立法,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至于他们忍受不了两个星期的禁闭。他们会逃跑。他们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收集选票,并为了再次成为代表而做每一件事情。²³

叶利钦利用他的权势来实行一套他自己的政治规则。然而,他也创造条件来获得敌人对这些规则的默许。

杜马选举规则

叶利钦在1993年10月1日发布的1557号法令中清楚地规定了杜马选举规则。与宪法相比,这一法令没有反映叶利钦的特别偏好,因为叶利钦没有很强烈的兴趣考虑杜马的选举规则。在1993年9月底,叶利钦专注于宪法以及议会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对峙。叶利钦是在他与议会斗争的过程中发布了法令,这仅是他的政府与议会任命的政府发生军事冲突的前三天,这一点必须牢记。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没有时间也不想考虑比例代表制与领先者当选制(first-past-the-post)两者间的选举效果。

早先涉足选举法争论的人反而在制定这套关键规则时起了核心作用。有关俄罗斯议会(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一个新的立法机构)的新选举程序的讨论在1992年春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最高苏维埃两个互不隶属的委员会完成了选举法草案。来自地方自治和苏维埃工作委员会的草案规定,所有立法席位都必须按照领先者当选制决定。以人民代表维克多·巴拉拉(Victor Balala)为首的法案起草者最终决定不采用比例代表制或一种混合制度,他们认为俄罗斯政党太弱小、不足以发挥代表组织的作用。²⁴中间派、无党派代表,比如维克多·巴拉拉,也认为比例代表制会让民主派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开展运动的经验和半政党组织,而非共产党反对力量的成员,特别是那些当时在议会任职的议员(包括这个草案的起草者)实际上没有政党组织。最后,比例代表制的反对者认为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会产生另一个由莫斯科政治精英控制的议会。

巴拉拉那时是中派主义组织“接班人”(Smena)的一员,这一组织在1993年期间对叶利钦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多。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包括格奥尔吉·萨多罗夫(Georgy Satarov)和米哈伊尔·克拉斯诺夫(Mikhail Krasnov)在内的叶利钦核心顾问支持巴拉拉的选举法草案。²⁵这些叶利钦的助手公开表态支持一个多数主义制度,是因为他们相信个人参加的直接选举会激起代表在选民面前的责任感。他们也认为单一议席制更具有代表性,因为所有代表按照地理区划选举产生。按照他们的估计,比例代表制会让以莫斯科为基地、很少或根本没有地区支持的政党获得立法权,这种立法权与他们在社会中获得的实际支持不成比例。萨多罗夫强烈要求法律应反映选民的利益(像他所理解的那样)而不是那些从属于政党的选民,因此他反对比例代表制。²⁶叶利钦的助手私下里也明确表示,他们相信由来自单一议席选区的代表组成的议会更容易控制一些。²⁷

选举法的第二稿在1993年春天开始流传,它来自最高苏维埃宪法委员会,主要由人民代表维克多·谢尼斯(Victor Sheinis)起草。仿效德国和匈牙利的制度,谢尼斯草案设计了一个混合制度:一部分的席位由比例代表制分配,但绝大多数席位由单一议席选区中的选举产生。谢尼斯和他的同事想用比例代表制来刺激全国性政党的发展。²⁸然而,考虑到政党发展处于初创阶段,谢尼斯草案的起草者仅仅给比例代表制分配了少数席位。

在代表大会就针锋相对的巴拉拉草案和谢尼斯草案投票表决之前,叶利钦关闭了议会并承担了起草1993年议会选举规则的职责。叶利钦安排他的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费尔奥多夫负责起草有关这些选举的总统令。费尔奥多夫邀请谢尼斯和他的工作组来到克里姆林宫,帮助起草这些命令。在这一更为顺畅的新环境下,谢尼斯和他的同事奋力争取一个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主义规则对半分的混合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席卷莫斯科的宪法危机为新观念的出现和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随后产生的草案提供了一次独一无二的时机。谢尼斯是这样解释的:平等采用两种模式能最有效保证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会被下一届杜马排除。如果他们仅保留原始方案,即仅有少量席位由比例代表制分配,那么如果

由单一席位选区选出的代表控制了下届杜马,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把选举制度改为完全多数主义制度。谢尼斯的新方案能确保实施一届以上的选举。

总统班子中未透露姓名的成员修改了谢尼斯的新草案。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把按比例代表制分配的席位从一半改为三分之一。在原定公布有关议会选举法令所剩无几的几天内,谢尼斯设法安排了一次和叶利钦的单独会面,希望能说服他把比例代表制的席位增加到50%。谢尼斯首先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论证了混合制度的优点,他认为一个混合制度会刺激政党的发展并由此巩固民主。按照谢尼斯的估计,培育政党的第一个观点没有动摇总统的决心。然而,当谢尼斯提出亲叶利钦的政党是这一选举制度的最大受益人时,叶利钦显得更为关心。²⁹就在这节骨眼上,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费尔奥多夫和总统顾问谢尔盖·沙赫赖插了进来支持谢尼斯的草案。³⁰他们两个都支持50—50方案,因为他们想成为党内候选人。叶利钦同意了并修改了法令。

第1557号总统令于1993年10月1日实施,冠以“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名称。它规定下院按混合制度选举产生:半数席位(225席)在新划分的选区内以多数主义制度选出,另一半席位(225席)按照比例代表制分配。按照比例代表制的规定,政党获得任何席位之前必须通过5%的门槛。法令不允许在单一议席选区举行二次选举。

规则上的几处微小改动对杜马选举产生了实际的影响。首先,候选人的党派身份不允许出现在单一议席选举的选票上。特别制定这条规则是为了阻挠共产党,因为它是当时唯一的全国性政党。没有了党派身份,亲共产党的选民在单一选举选票上列出的一长串竞争者中找出共产党候选人,会有一定的难度。相反,来自亲政府的俄罗斯选择(Russia's Choice)的候选人就个人而言有很高的知名度。

其次,政党登记时间很短,这使得没有组织的政党或新政党很难获取登记所必需的100 000个签名。登记规则也有利于在单一议席选区竞争中以莫斯科为基地的政党。如果候选人位列参加比例代表制选举集团的名单之中,那么他或她会自动加入单一议席选区的名单之中。然而,没有国民名单的政党及独立参选人不得不从1%的选民中征集签名来支持他

们的候选人。

最后,中央选举委员会对政党和候选人是否符合选举条件拥有独断权。委员会中不存在真正的申诉渠道。中央选举委员会公然滥用这一权力,它明显按照忠于叶利钦的政党的意思把三个著名的民族主义政党判为不合格。那时俄罗斯选择的组织者相信这几个政党大力鼓吹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口号会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不想要竞争。

当所有这些规则起草完以后,它们看起来都对最亲近叶利钦的政党有利,首先是俄罗斯选择,它是民主俄罗斯的后续组织。1993年以后,叶利钦的立场是强制实施这些规则,而不是协商产生这些规则。正如前两章所讨论的,他们所实施的选举规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它并没有实现叶利钦及其盟友的直接利益。然而,一旦这些规则生效以后,很难再次加以改变。

联邦委员会选举规则

由于叶利钦的制度设计者们在1993年秋天忙于起草新宪法和组织杜马选举,他们在联邦委员会的选举规则上关注不多。有关联邦委员会构成的争论围绕着联邦委员会是否应该通过选举产生这一焦点而展开。几个地方行政领导人想通过他们所控制的任命过程组织一个议会上院。³¹其他人则认为应该由地方行政领导人本人组成联邦委员会。

在十月事件以前,叶利钦向地方精英承诺由他们控制联邦委员会并保证向地方政府转交更多自主权,以此收买这些地方精英,特别是那些自治共和国的精英。正如叶利钦的宪法违背了后一个承诺一样,他组建联邦委员会的新计划也违背了前一个承诺。叶利钦没有采用任命的形式,而是选用了临时选举程序,这在1993年10月11日的1628号总统令中规定得很清楚。法令迫使地方精英参加一次选举,尽管这次选举是为迎合他们的利益而设计的。每一个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构成一个拥有两个名额的选区。这一选举制度有助于在职者免遭失败,因为单是知名度就能确保在任行政长官获得第二个名额。³²此外,法令规定候选人需要当地人口2%或是25000人的签名,这对参选资格的标准而言是非常高的。³³除去登记时间很短的因素外,向地方行政领导人挑战的人被这一

规则控制在最少的限度内。在许多地区,三个候选人参加选举——两个来自当地行政机关,第三个不知名的候选人被允许登记参选仅仅是为了确保选举结果合法。³⁴

叶利钦政府选择这一方案有许多短期原因,对民主或制度稳定的长期考虑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有两个因素最为突出。首先,叶利钦的班子不想听从地方领导人的建议,让他们都成为联邦委员会成员,因为叶利钦不想把上院半数席位给地方苏维埃的首脑。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反对叶利钦解散俄罗斯议会。此外,叶利钦命令地方行政领导解散地方苏维埃,并为这些重组和重新命名为地方杜马的立法机构举行新选举。新选举过后,叶利钦和他的盟友希望获得更多地方立法机构的支持。结果就是,让地方杜马主席成为上院议员的时机不合适。其次,通过叶利钦任命半数成员的方式组成上院,叶利钦和他的盟友担心这种做法在民主阵营和选民中可能带来负面反应。那时,大多数行政首脑不是选举产生而由叶利钦亲手挑选的。议会通过这种非选举方式产生,看上去是向错误方向迈出了一步——偏离了民主——那时刚刚实施了许多非民主步骤。那时与叶利钦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政党,俄罗斯选择的选举负责人担心这一动作会损害他们赢得1993年选举的机会,甚至会危及宪法公决的结果。³⁵这时,直接选举看来是更好的选择。

久拖不决的设计议题:经济制度和国家边界

经济改革

1991年秋,经济制度设计和划定俄罗斯新的国家边界是首要议题,而打造新政治制度很少受人关注。在1993年,叶利钦的首要议题发生了逆转。首先颁布法令然后通过武力解散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他的这一决定是对一场政治僵局做出的反应。叶利钦号召批准新宪法和举行新议会选举,这是他解决这场政治僵局的策略。

同时,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对立没有阻碍叶利钦的经济改革计划,而只

是延缓了这一计划。叶利钦和他的助手采取行动结束这一政治僵局,这种做法也为执行经济决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新宪法的目标是减少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并勾画经济决策的权限。³⁶ 存在一些规则总比没有规则好。更为关键的是,新宪法让总统班子和总统的行政机构牢牢掌握了经济决策的主导权。1400号总统令把中央银行置于俄罗斯总统的管辖之下。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宪法规定总理和他的内阁对总统而不是议会负责。行政机构也承担制定年度预算和实施私有化的职责。此外,新宪法赋予总统和他的政府依据行政命令统治的权力。行政命令可以被法律取代,但是新宪法所设计的否决门槛使议会很难驳回总统令。³⁷

新宪法当然没有解决相互对立的政治参与者和组织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这些相互对立的偏好变化得更慢。共产主义者依然反对私有财产,企业经理依然担心硬性预算限制,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模棱两可。在叶利钦的联合政府里,意识形态分野在议会解散和新宪法起草以后还是没有消除。³⁸ 同时,叶利钦的许多随从相信,十月事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赞同和反对资本主义两大势力之间的争斗。这些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为自由派改革者实施激进经济变革提供了新的权威和自主权。俄罗斯新的权力平衡和新宪制给予俄罗斯的改革者们期待已久的良机。³⁹

在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命令前几天,叶戈尔·盖达尔重回政府。紧接着十月事件后不久,盖达尔偕同来自财政部的自由派人士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和来自国有资产委员会的阿纳托利·丘拜斯一起承担了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职责。从10月一直到12月,这一新政府在实施政策规划上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⁴⁰ 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大幅减少了给企业的补贴性贷款,特别是砍掉了给农业和北方地区企业的廉价信贷。⁴¹ 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取消了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为了进一步减少政府开支,新政府也计划取消所有价格补贴。自改革实施以来,盖达尔和他政府里的盟友相信,他们能在年底之前削减预算以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

在金融方面,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成功保住了中央银行主席维克多·杰拉什琴科,这一决定让政府中的盖达尔派很失望。但是,在1993年10月以后的政治形势下,杰拉什琴科彻底改变了他的政策,开始紧缩货币供

给、提高利率,并在1993年11月自改革开始以来第一次允许俄罗斯登记正利率。在随后的一个月中,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3%。在行政机关的控制下,中央银行不再对政府决策构成威胁。

正如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Åslund)所写的,“到1993年底为止,俄罗斯准备实施一项完全成熟的稳定政策”⁴²。叶利钦和他的自由派改革者在莫斯科街头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以后,他们相信经济改革的论争如今就要平息了。反对市场经济的势力已经被打败;实施经济改革已经不必得到他们的同意和合作。叶利钦和他政府内的自由派消灭了与他们争论的敌人,并通过实施一部新的超级总统制宪法,使国家决策不再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他们相信他们已经约束了在经济政策上引起争议的改革议程。

未来仍然会有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情况:新政治游戏规则规定了1996年的总统大选。如果一个反对市场经济的政治人物赢得选举,原先为1993年急速经济改革服务的强大而封闭的行政机构同样会在1996年使这些改革停滞并发生逆转。但在1993年,这一威胁看上去还很遥远和模糊。改组以后的自由派政府有三年的时间实施市场改革并使之难以逆转。此外,在1993年秋,没有人相信一个反市场经济的候选人会在1996年击败叶利钦。叶利钦政府内部的大多数人和同情叶利钦改革的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对力量在1993年10月被挫败了,这是旧制度的最后抵抗。⁴³1993年12月选举的结果证明他们错了。

国界

正如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所相信的,打败白宫的反对力量缩小了经济改革争论的范围。他们也认为,俄罗斯国界之争在10月过后就结束了。他们对苏联的争论——要苏联还是要俄罗斯——保持乐观的态度,这有几个理由。在1993年之前,苏联复兴的阴影已经消失殆尽。共产主义领导人继续让每一个人都记住苏联解体的悲剧,并且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同这一悲剧观点。但是,从1991年12月到1993年9月的两年间,复兴苏联的倡导者没有提出一项可行的再造苏联的策略。同时,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开始行使主权,这极大地提

升了复兴苏联的代价。从短期来看,1993年10月共产主义者被挫败,结束了这场争论。俄罗斯那些热情支持苏联复兴的政治力量现在显得精疲力竭。

结束俄罗斯内部有关联邦的争论的迹象还不明显。正如前面所说的,叶利钦在1993年10月与议会摊牌之前对各共和国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拉拢和安抚策略。最为重要的是,他签署了《联邦条约》,给予这些共和国以特权和特别待遇。但是,1993年10月以后,《联邦条约》没有放进新宪法草案,这一疏漏激怒了各共和国领导人以及那些主张非对等联邦主义的自由派支持者。⁴⁴鞑靼斯坦总统明蒂梅尔·沙伊米耶夫(Mintimer Shaimiyev)抱怨新宪法是为了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⁴⁵作为报复,他默许抵制1993年12月的宪法公决和议会选举。车臣领导人完全不承认新宪法。

尽管存在这些反对意见,但叶利钦和他的政府相信,1993年10月之后莫斯科变化了的权力平衡会迫使地方领导人遵守新规则。有关联邦结构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有关权力分配的谈判也将继续存在,但叶利钦和他的政府坚信,他们新的制度设计消除了最糟糕的情形——俄罗斯联邦解体。⁴⁶

结 论

1993年秋天,宣称代表对立目标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分配显得相对均等一些。这种相对均等的权力分配为真正的平衡平添了不确定因素。1993年10月,双方都在军事冲突中测试了他们的实力,并且冲突的一方获得了胜利。这场冲突过后,权力平衡向叶利钦一方倾斜,他的政府、他的政治盟友及他的改革计划。那时,所有卷入冲突的人都感到了这一点。叶利钦在使用武力击败了敌人以后,他承担了重写俄罗斯政治游戏规则的任务。他和他的顾问在没有其他国家机构、政治力量和社会的影响下自主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设计新宪制时,叶利钦和他的班子想填补 1991 年过渡时期在相关政治过程中因制度规定模糊而久拖不决的真空地带。之所以出现政治对立和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 1991 年秋天忽略了正式的政治规则。叶利钦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些新规则反映了权力平衡,或者说至少是那时感知上的权力平衡。在这些年里,叶利钦在不同寻常的宪法斗争中两次击败对手,他已不再觉得会受到对手的制约。他和他的同伴打造了一部服务于他们直接目标的新宪法。这些直接目标不仅包括通过强力总统统治以实现政治稳定,也包括获得深化市场改革和防止俄罗斯从内部瓦解的能力。

那时,很少有分析家把叶利钦的最新设计解释为民主的或是稳固的。菲利普·罗伊德(Philip Roeder)预测独裁统治将成为新制度设计的结果。正如他在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早期所指出的,“行政权的结构有着许多其他继承国家*中存在的独裁标记;它看上去像是采取了一种新的苏联模式,安全委员会制定政策,批准政策实施的总统幕僚若隐若现地躲藏在政府部长的后面”⁴⁷。爱德华·沃克(Edward Walker)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反应(包括本书作者),他哀叹新宪法破坏而不是巩固了俄罗斯民主。正如他在 1993 年选举过后不久评论的,“俄罗斯最新的悲剧在于,那个对俄罗斯民主巩固贡献最大的人无意间制造了有损于既得成就的制度”⁴⁸。其他人比如奥利格·鲁姆扬茨耶夫警告,新宪法缺少合法性,因为它的起草者没有详尽考虑社会上的意见。⁴⁹

叶利钦的新设计看上去并不稳固。像戈尔巴乔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提出的第一次政治改革计划以及叶利钦在 1991 年第一次设计新制度时一样,这第三次制度设计是强制实施而不是通过协商产生的。预测那些没有参加起草过程的人会抵制这一制度设计,这完全合乎情理。许多人预测,叶利钦强制实施的解决方案会加剧紧张状态而不是解决争论。⁵⁰ 毕竟,强制实施一套新政治规则不能在一夜之间消除几年来构成俄罗斯政治生活的深刻对立。“总统和议会之间的争夺和双重权力不复存在了,但是对这个国家所发生事情的看法摇摆不定,它作为对抗的象征仍

* 指苏联解体后的一些后续国家。——校译者注

然存在……社会的对立仍然存在。”⁵¹有人甚至怀疑叶利钦政权是否有能力承受一次重大挑战。⁵²叶利钦和他的军队领导人曾召集军队在莫斯科市区镇压乌合之众一般的反对势力,但在面对一个由俄罗斯所有反对力量组织的反制度联盟时,这个政府能挺得住吗?

叶利钦班子在1993年秋天制定的新政治游戏规则仍然存在。人们既没有立刻承认这些规则,也没有明确肯定这些规则。相反,这些制度的实施过程在随后三年中不可预知,随时会有意外发生。回溯并解释这一制度延续的过程是第三篇余下几章的任务。

注 释

1. 关于支持叶利钦的行动,参见 Vserossiiskii Tsentr Izucheniya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VTsIOM), “Rossiya i vybory. Situatsiya do i posle sobitii 3—4 ktyabrya: Analiticheskii otchet” (Moscow, 1993)。对民主的失望之情,参见 *ibid.*, 2; Stephen Whitefield and Geoffrey Evans, “The Russian Election of 1993: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ransition Experience,” *Post-soviet Affairs* 10 (1994): 38—60; Jerry Hough, “The Russian Election of 1993: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conomic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Post-Soviet Affairs* 10 (1994): 1—37。

2. A. A. Sobyenin and V. G. Sukhovolsky, *Demokratiya, ogranichennaya falsifikatsiyami: vybory i referendumy v Rossi v 1991—1993 gg* (Moscow: Izdatel'stvo INTU, 1995)。

3.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s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Vladimir Pastuknov, “Comic-Opera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Megapolis Express* 41 (October 20, 1993): 19; 收录于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5 (November 10, 1993): 8; Yuri Krasnov, *Vybory-93* (Moscow: Institut Politiki, 1993), 3; Philip Roder, “Varieties of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st-Soviet Affairs* 10 (1994): 94; Donald Murray, *A Democracy of Despot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224。

5. 参见对布尔布利斯的访谈, *Izvestiya*, October 15, 1993, 5。

6. Yuri Boldyrev, “Victory But for Whom?” *Moskovskie Novosti*, October 24, 1993, A10; 收录于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5 (November 10, 1993): 10。

7. 参见作者与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费尔奥多夫于1998年3月27日的访谈。按照费尔奥多夫的说法,是一个法国外交官给他出的点子。在1998年我们访谈的时候,费尔奥多夫的皮夹里仍带着这位外交官的名片,以纪念这一不同

凡响的建议。

8. 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认为任何宪法都不可能凭空设计,相反,“每部新宪法肯定都是旧特征和革新的结合”。参见 Riker, “The Experience of Creating Institutions: The Fram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n *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 ed. Jack Knight and Itai Sen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22。

9. 参见与费尔奥多夫的访谈。

10. Timothy Colt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in *Growing Pains: Russian Democracy and the Election of 1993*, ed. Timothy Colton and Jerry Hough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293。

11. 车臣没有参加 1993 年选举,两个议席空缺。

12. 参见作者与费尔奥多夫的访谈。

13. 参见作者与当时受雇于总统办公厅分析中心 (Analytical Centre of th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的地区专家尼古拉·彼得罗夫于 1999 年 3 月的访谈。

14. 该法律草案授予各共和国的权利与义务,与授予各州、边疆区的权利与义务,存在着一些矛盾。虽然宪法有一个部分强调了所有次级国家单位一律平等,但是另一个部分列举不同次级国家单位的差别。宪法与前一阶段相比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提供了更多信息。

15. Presidential Decree 1612, issued on October 7, 1993, and summarized in Anna Ostapchuk, “Pechal’nyi koniets yeshche odnogo demokraticeskogo instituta Rossii,” *Nezavisimaya Gazeta*, December 3, 1993, 1。

16. 要让这一特别法摆上总统案头所需的票数早已超过了推翻总统否决的票数,这样总统签署只是形式上的。细节参见 Robert Sharlet,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3(1997):198。

17. 参见作者与费尔奥多夫的访谈。

18. Bruce Cain and W. T. Jones, “Madison’s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Federalist Paper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ed. Bernard Grofman and Donald Wittman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9), 11。

19. 参见作者对叶利钦的访谈, *Izvestiya*, November 16, 1993, 1。

20. 作者以一名这次选举国际观察员的身份于 1993 年 12 月目睹了这次电视广告。

21. 当时俄罗斯选择的竞选组织者弗拉基米尔·波克瑟于 1993 年 10 月接受作者的采访。高参选率是否有利于这些改革派政党的问题仍存在争议。一些调查指出,高参选率是有反作用的。参见 Whitefield and Evans, “Russian Election of 1993”。

22. 最出名的例子是尼古拉·雷亚波夫(Nikolai Ryabov), 他在议会中激烈地批评叶利钦, 在那时, 他成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23. Boris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252.

24. 他们的第一稿于1993年6月日发表, 其中没有特别指定采取何种制度。更有甚者, 它列举了四种可能的制度, 其中包括多数主义、比例代表制和混合制。我感谢维克多·巴拉拉为我提供了这一草案以及随后一系列草案。人民代表巴拉拉在1993年春夏与我进行了几次访谈, 在这些访谈中他解释了围绕这一法律的争论。以下几段来自这些访谈。

25. 参见总统顾问格奥尔吉·萨多罗夫于1995年8月22日与作者的访谈, 以及作者与克拉斯诺夫的访谈。

26. 参见总统顾问格奥尔吉·萨多罗夫于1997年10月9日与作者的访谈。

27. 参见与萨多罗夫于1995年8月22日的访谈。

28. 参见作者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杜马代表维克多·谢尼斯于1995年5月12日的访谈。

29. 参见作者与维克多·谢尼斯于1997年10月10日的访谈。当时进行的民意测验证实了谢尼斯的观点。参见 Aleksei Levinson, "Otchet o rezultatakh oprosa grazhan rossii," mimeo(VTsIOM; Moscow, 1993), 5.

30. 参见作者与总统顾问谢尔盖·斯坦科维奇于1995年7月21日的访谈。同时参见作者与总统办公厅主任费尔奥多夫的助理伊格尔·哈里乔夫于1995年6月22日的访谈。

31. 参见作者与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叶夫根尼·科勒斯特亚尼诺夫(Yevgey Krestyaninov)于1995年7月20日的访谈。他后来成为联邦委员会议员。

32. Aleksandr sobyanin, "taina vyborov 12 dekyabrya: Za kogo i kak progolosovala Rossiya v dekabre 1993 goda? Manuscript, Moscow, 1994, 4—7.

33. Article 21, in "Plozhenie o vyborakh deputato soveta Federatsii Federal'nogo sobraniya Rossiiskoi Federatsii," Decree 1626, October 11, 1993; 收录于"Vybory", no. 2, Postfactum(October 19—25, 1993), 5.

34. (俄罗斯)独特的二次授权选票也为造假创造了机会。由于不习惯投票选举一个以上的候选人, 许多选民只画了一个名字, 这使得地方选举委员会在计票期间画上第二个名字。详情参见 Michael McFaul and Nikolai Petrov, eds., *Politicheskii al'manakh Rossii 1989—1997* (Moscow: Moscow Carnegie Center, 1998)。

35. 参见作者与俄罗斯选择运动的组织者弗拉基米尔·波克瑟于1998年3月的访谈。

36. 参见 Vladimir Mau, *Ekonomicheskaya reforma: Skvoz' prizmu konstitutsii i politiki* (Moscow: Ad Marginem, 1999)。

37. 这一法令权力的至高无上在1994年夏天生动地展现出来,在杜马没有通过总统(或者说政府的)的私有化计划以后,叶利钦发布了一个有关第二阶段私有化的法令。

38. Anders Aslund, "Reforms vs. 'Rent-Seeking' in Russi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ransition*, January 26, 1996, 12-16.

39. Mau, *Ekonomicheskaya reforma*, 166—118.

40. 有关政府在年底之前实现稳定的决心的描述,参见 Boris Fyodorov, "Proigravshie v bor'be s inflyatsiei proigrayut i vybory." *Izvestiya*, Coctober 16, 1993, 4.

41. Anders Aslund,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199.

42. Ibid.

43. Richard Pipes, "The Last Gasp of Russia's Communis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993, A19.

44. Vladimir Lysenko, "Demokraty Stanovyatsya gosudarstvennikami," *Nezavisimaya Gazeta*, November 28, 1993, 3.

45. Shaimiyev, November 3, 1993,引自 Robert Sharlet, "Russian Constitutional Crisis: Law and Politics Under Yeltsin," *Post-Soviet Affairs* 9(1993):331. 他的代表也抨击宪法不合法,参见 Raphael Khakimov, "Prospects of Federalism in Russia: A View from Tatarstan," *Security Dialogue* 27(1996):69—80.

46. 参见作者与总统委员会成员列奥尼德·斯米尔尼亚金于1999年3月的访谈。

47. Roeder, "Varieties of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 Regimes," 95.

48. Edward Walker, "Politics of Blame and Presidential Powers in Russia's New Constitution,"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3(Fall 1993/Winter 1994):116.

49. Oleg Rumyantsev, *Osnovy konstitutsionnogo stroya Rossii* (Moscow: Yurist, 1994), 215.

50. Micheal Urban, "December 1993 as a Replication of Late-Soviet Electoral Practices," *Post-Soviet Affairs* 10(1994):128.

51. Yuri Polyakov, "The Opposition Is Dead. Long Live the Opposition!" *Komsomolskaya Pravda*, October 7, 1993, 2; reprinted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5(November 10, 1993):5.

52. 比如参见 Dwight Semler, "The End of the First Russian Republic,"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3(Fall 1993/Winter 1994):112.

第七章

过渡中的立宪政体

1993年选举的结果让俄罗斯精英和整个世界大吃一惊。与原来的预计相反,忠于叶利钦的自由派政党没有赢得新议会席位的多数。相反,以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新民族主义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他们获得了将近四分之一的选票。日里诺夫斯基的意外获胜使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的许多人预测,俄罗斯第二共和国将因法西斯主义而走上崩溃的道路。魏玛德国如今成为在选择问题上的历史象征。宪法公决虽然通过了,但它陷入了一场争论的狂潮之中,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选举专家都宣称选举结果是伪造的。结果,新的过渡杜马有了不祥的开端,它之所以被称为过渡杜马是因为新议会的任期是两年,而不是“正常”的四年。毕竟,在统治机构名称前面加上表示暂时的形容词,这在俄罗斯有不好的含义。许多人相信这一机构会与俄罗斯历史上其他“临时性”政府组织一样具有相同的命运。俄罗斯的立法机构特别容易发生还没成熟就已死亡的情形。¹

与它们形式上的“暂时”含义保持一致,1993—1995年的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像过渡立法机构那样运作。机构是全新的。由于不存在指导行为者如何行动的传统、常规和惯例,每一次内部规则的变更和法律的通过都是偶然产生的,并且很容易被推翻。从杜马任期的第一天起,解散的阴影就萦绕在杜马内部(虽然联邦委员会不存在这种情况)。好像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叶利钦的手中,这反衬出新立法机构脆弱和短命的实质。杜马像马戏团一样迟迟不能确定永久所在地,这凸显了新议会的临时性和微

弱权力。在6个月内,杜马曾搬进三幢不同的建筑。亚博卢领导人格里戈利·亚夫林斯基悲伤地说道:“宪法被侵犯,司法制度不起作用,议会像群流浪汉被人从一幢楼房赶到另一幢楼房,这不是民主政权。”²

尽管有如此怯懦的开端,但这一过渡议会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对稳定行政—立法机关的关系和宪法贡献良多,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巩固了俄罗斯的国家政权。杜马中的反对党没有打算挑战或是推翻现行制度,它们遵守了新宪法中规定的游戏规则。主动承认这一新秩序是因为它们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以及在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支持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力量大致平衡,那么在俄罗斯第二共和国开始阶段,权力分配有利于叶利钦。那些反对叶利钦、不承认新游戏规则的人没有进行一场将要失败的战斗。相反,他们相信合作的有限收益要超过对抗的有限收益。随着时间的流逝,因偶然因素而得到承认的新规则会被持久承认下去,这不单是一方弱小的缘故。最终,反对党一方面调整它们的预期以迎合新游戏规则,另一方面进行宪制外斗争的倡议也会减少。

改革派政党接受这些新规则,并且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政治游戏,这同样重要。那些与叶利钦结盟的人在许多方面都有更多机会运用宪法外的手段实现他们所要的政治结果,因为他们比那些在1993年10月军事对峙中被打败的人受新规则的限制更少。大多数人相信,如果叶利钦认定违反新秩序的做法有利于他,他就会用新近获得的权力去违反新秩序。³有的人力劝叶利钦把总统和议会选举推迟到经济改革完成以后。⁴更多支持叶利钦和改革的人迫切要求俄罗斯总统解散讨厌的议会、推迟选举并依据行政命令进行统治,直到所有来自共产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的反制度威胁平息为止。⁵然而,叶利钦和他的政府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选择了与议会合作,遵守新通过的宪法中划定的新游戏规则,由此巩固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新制度因权力平衡上的清晰明了而被迅速承认。在1993年10月摊牌以后,叶利钦和他的反对者都意识到,叶利钦有权强制实施新游戏规则,他的确这么做了。叶利钦的反对者被排斥在设计过程之外,他们在1993年10月后仅有两个选择——要么承认叶利钦的规则,要么反对它们。大多数人都承认了这些规则。同时,改革议程的

范围被缩小了,这使得这些规则获得承认的可能性更大。到1993年底,改革议程的两大基本问题不再是斗争的焦点。戈尔巴乔夫时代结束之际的国界问题和中央集权问题已经得到解决。1993年,许多领导人和政党仍然在哀悼苏联的解体,但没有哪个严谨的政治家倡导重建苏联。在这两年间,最重要的边界争论发生在1994年12月叶利钦决定向车臣派驻军队以后。但是,这场争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峙状态,因为反对派阵营和改革派阵营内部在车臣战争问题上都发生了分裂。有关俄罗斯应该实施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重大争论也在1993年10月以后结束了。在整个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共产主义复活的幻觉是现实存在着的。⁶与东欧那些向资本主义成功转型的国家相比,1991年至1993年间俄罗斯的市场改革仅仅是局部的和停滞的。回复到过去尽管代价高昂,但如果人民代表大会获胜的话,这样做并不是不可设想的。然而,1993年10月冲突过后,资本主义的反对者看上去被驯服了,他们没有力量阻挡市场改革。新的超级总统制赋予叶利钦和他的盟友瓦解苏联计划经济的力量。即使他们只能把权力维持到1996年,叶利钦的班子也有三年的时间确立资本主义。在1993年,最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新情况。有关经济类型和改革进程的斗争仍然很激烈,但反市场经济的势力面对一整套维护市场的法律而停止了活动,并且实际上承认了几项重要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总统令。

政治游戏规则仍是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政治活动家所关注的中心议题。第八章将讨论他们承认选举原则为分配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方式的渐进过程。本章则着重讨论宪制——一套预先制定的、用以规范主要政治活动家之间政治斗争的规则——的出现。1993年10月权力分配清晰明了的时候,叶利钦可以单方面设计一套新的政治制度。争论中的改革议题变窄,这使得这些新规则更有可能被承认,因为其他议题上的对抗到1993年已不太明显。在1993年冲突过后,过渡性的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俄罗斯宪制而言就变得十分关键了。通过这段过渡时期遵守新宪法的做法,俄罗斯的政治活动家要违反这些规则将会付出更大代价。

这一章阐述了新政治游戏规则的大规模制度化以及改革议题的争论受到约束。首先,本章探讨了国家杜马的内部组织和立法—行政关系的

演进。因为在杜马中反对这种制度的声音最为强烈,它取代联邦委员会成为这一章的重点。本章也将谈到改革议程的争议问题:杜马投票赦免那些卷入十月事件的人;有关政治制度的一系列争论,它的内容包括削弱总统权力,新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以及组成联邦委员会的不同方式;这两年内的重大经济争论;俄罗斯边界之争,特别关注车臣战争是如何考验1993年之后的新制度的。

国家杜马的内部结构

在国家杜马起初的一段时间内,那里的气氛与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个月的气氛完全不同。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在整个1993年内越来越敢于挑战叶利钦和他的政府的话,那么,新杜马则害怕叶利钦和他的盟友,杜马代表当真认为如果他们挑战叶利钦的权威,那么他会再次动用武力解散新的立法机构。他曾经做过一次,又有什么能阻止他再做一次呢?如果人民代表大会把政治制度看作是它们创造的产物(那就是说,它可以随时被改变,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那么新杜马按照由叶利钦起草而得到人民认可的政治制度行事,这将限制杜马的行为。实际上在最初几个星期的活动中,杜马代表们认为单单保留立法机构就是一个重大胜利。正如杜马代表伊利纳·祖布科维奇(Irina Zubkevich)在杜马存续的第一年中提出的,所有代表都必须秉持一个重大目标,那就是“建立杜马的权威并使之成为总统的反制力量;我们不想做得更多”⁷。按照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杜马代表维克多·佐卡尔茨耶夫(Viktor Zorkaltsev)的说法,“避免内战”是压倒一切的目标。⁸

政党的作用日益强大

在这种背景下,工作的首要次序就是为工作创建先后顺序。把代表组织起来的工作最为基本。在新议会中,没有一个政党或联盟控制多数,因此在制定议会内部议事规则的时候需要妥协和相互谅解。⁹数年来,共

产党和民主派处于相互对立的阵营。在这一新情况下,双方在避免再次与行政机关发生军事冲突上有了新的共同利益。

政党为这一机构添加了组织上的黏合力,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都缺乏这一组织结构因素。由于混合选举制的缘故,半数以上的杜马代表都有政党归属,因此领导人快速行动确立了政党的权威。¹⁰ 俄罗斯民主党领袖尼古拉·特沃金提议党团(*fraktsii*)在杜马的组织工作中应起一个基本作用。他建议所有按政党名单投票中获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应获得党团的待遇,而独立代表(或在政党名单投票中当选但随后选择退党的代表)必须联合35位代表才能成立一个新党团。¹¹ 特沃金也提议,委员会主席应在党团之间按比例分配。他还提议设立一个组织杜马议程的委员会。每一党团在这个委员会中不是按比例而是按一人一票的方式表决。¹² 新杜马也通过了一项规则,允许政党控制议会发言的优先权。最后,政党领导人通过决议,赋予政党把雇员分派给单个党团成员的权力。这些新规则迅速使政党和政党领导人成为备受瞩目的杜马活动家,同时也为杜马代表与党派结盟提供了实际的动因。

然而,杜马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欢迎这一党派主导的新格局。叶利钦的顾问格奥尔吉·萨塔罗夫把这一权力向政党集中而远离委员会的过程解释为杜马职业化进程中的挫折,而这都是因新混合制选举法的缘故。按照他的观点,杜马在起草意义重大的法律方面比先前的最高苏维埃更加不合格、更缺乏准备。¹³ 正如后面讨论的,总统行政机构试图通过去掉杜马选举法中比例代表制的内容来纠正议会的“政党化”(*partizatsiya*)。总统的助手们对杜马内部政党政治的形成追悔莫及,这个事实暗示这一新组织结构已成为最终结果。内部整合已使杜马成为总统更难缠的对手。¹⁴

杜马主席*伊万·里布金的和事佬角色

当各党派在1994年1月11日第一次正式登记时,俄罗斯选择拥有

* 原文中是“speaker”,既可以指发言人、代言人,也可以指议长。在俄罗斯,杜马议长一般叫做杜马主席。——校译者注

78席,议员人数最多,但没有其他党派公开与这一亲政府的政党结盟。¹⁵在议员名单的另一端,俄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俄罗斯农业党(Agrarian Party of Russia)一共拥有164名代表。但在杜马刚开始工作的几天里,日里诺夫斯基就明确表示,他讨厌民主派人士,同样也讨厌共产党。结果,没有一个政治联盟能持续控制多数。因此,为了选举一位议长,政党领导人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密室交易,以找到一个达成妥协的候选人。俄罗斯农业党的代表伊万·里布金(Ivan Rybkin)最终击败了持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尤里·弗拉索夫(Yuri Vlasov)而成为议长。

起初,里布金的当选使叶利钦阵营的许多人感到害怕,因为里布金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是一个直言不讳反对总统的代表。杜马内部像俄罗斯选择的自由派也担心,里布金很少表现出民主倾向,相反他可能会再造人民代表大会的“威权”结构。然而,在成为议长之后不久,里布金表示,他要在议会与总统之间寻求和解而不是冲突。在就职演讲中,他强调要与政府、总统和杜马中赞成改革的党派达成和解,并谴责卷入1993年十月事件的所有各方。¹⁶他公开表示,他更像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共产党人(这一评价激怒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人),他谴责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发出俄罗斯帝国主义扩张的号召,并发誓要使杜马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并负责任的国家机关。除此以外,里布金宣布他不想给叶利钦解散杜马提供借口;相反,他立志建立这一新机构的合法地位,以此作为独立于总统和政府的俄罗斯第三个权力中心。

政府和总统班子中的官员意识到,里布金是他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人。在担任议长期间,里布金受政府与总统的拉拢而远离了他在共产党和农业党中的同志。里布金的当选是把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工作关系制度化的重要因素。里布金对他这种议会、总统和政府之间筑桥人的角色十分自豪。¹⁷

立法—行政的和睦相处

虽然反对派在杜马中控制的票数要比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多,但是在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最初几个星期,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要融洽得多。有几个因素的结合使得这一新关系少了几分对抗色彩。新宪法确定了政

府两大部门的权利和职责,这是自俄罗斯第一共和国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虽然许多人批评新宪法,而且还有人斥之为非法,但是,所有主要的政治活动家都相信,遵守新规则要比不遵守新规则的处境更好。协商产生的规则当然比强制执行的规则要好,但在多年内经历了两场暴力冲突后,有规则总比无规则好,无论这套规则有什么样的缺陷。

1993年10月对峙的双方的偏好或倾向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双方都需要这一新关系起作用。因为许多杜马代表把新立法机构的存续作为基本目标,他们在对待总统的问题上采取一种谨慎的策略。弱势导致承认。然而,叶利钦也需要杜马。如果他解散了这个新议会——他自己创建的议会——他那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在俄罗斯公民和世界眼中将愈发变得黯淡。叶利钦和他的幕僚也相信,仔细斟酌而得以通过的法律比总统令能更好地使改革制度化,因为这种改革可能会被将来不赞成叶利钦式市场改革的总统以新法或总统令的方式推翻。¹⁸结果,叶利钦、他的班子和他的政府私底下对杜马要比宪法所规定的重视得多。正如亚博卢的代表弗亚乔斯拉夫·伊格如诺夫(Vyacheslav Igrunov)所观察到的:“叶利钦不需要应付杜马,但他这样做了……因为他出于合法性考虑而需要杜马。”¹⁹

杜马在政府组成上的合作很能说明问题。新宪法让杜马在决定政府组成时没有什么发言权。杜马有权批准或拒绝任命一位新总理,但由于切尔诺梅尔金不是新提名的总理人选,所以杜马没有就他的候选资格进行投票。杜马也不能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否则杜马代表就要冒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的风险。杜马不能影响政府政策和人事,这点让许多代表感到气馁,他们据此认为议会仅仅起一个粉饰太平的作用。²⁰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构成不反映杜马内政治力量的平衡。然而,在非正式和间接的情况下,议会对政府政策和人事的看法会影响行政机关的决策。1993年12月选举过后,政府的构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辞职,政府中仅留下一个原来的自由派改革人士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选择已经输掉了选举,于是,俄罗斯选择的领导人离开了政府。切尔诺梅尔金没有邀请任何来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方面的人参加政府,但他任命了俄罗斯农业党领导人亚历山大·萨夫罗

赫(Aleksandr Zaverukha)为农业部长,以应付杜马的压力,后来,切尔诺梅尔金任命他为副总理。最后,切尔诺梅尔金也任命了一个俄共党员瓦连京·科瓦列夫(Valentin Kovalev)为司法部长。切尔诺梅尔金政府中的其他几个成员是过去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得到了杜马中俄共和俄罗斯农业党心照不宣的支持。²¹

切尔诺梅尔金本身不是共产党及其所推行政策的敌人。为了应对1993年的选举结果,切尔诺梅尔金在言辞上反对“休克疗法”,并宣称“市场浪漫主义时代”已经终结。起初,切尔诺梅尔金提出,他打算向境况不佳的国有企业增拨政府信贷和补贴,首先包括军事和农工复合企业。²²正像他所解释的,“阻止所有经济部门产量暴跌,现在正是把注意力转向这里的时候,它是解决这个国家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无论多么先进,诸如此类的理论不能把一个巨型国家从食品、能源、商品的匮乏中解救出来……如果我们不能增加生产,那么我们就无法拯救新出现的市场经济”²³。这种言辞引起了杜马中反对派代表的共鸣,但与改革派却疏远了。虽然切尔诺梅尔金在选举之后没有正式受到要求调整政府政策的压力,但很清楚,他想制造一种印象,即他在迎合1993年选举中所表达的选民偏好。实际上,他的政策仅仅是短期变化,但他与杜马合作的姿态要比他与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共事时要高得多。

立法旋风

新宪法规定,法律一旦通过就要取代总统令。因此,法律缩小了总统令适用的范围,因为总统单方面使用政令权力的领域会随着通过法律的增多而缩小。这种情形为快速、全面立法创造了动因。此外,俄罗斯是一个没有多少法律的新国家,特别是在市场方面。为期两年的对抗政治完全阻碍了起草和批准有效法律的进程,这样,杜马代表认为许多法律漏洞都需要他们去填补。此外,许多代表认为,快速而有效地通过法律的做法,会向公众及叶利钦表明这个新议会正在认真行使立法机关的职责。结果,杜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始工作。三个会期过后,杜马召开了123次全体会议,审议了5000项事务,审查了400份法律草案。²⁴到两年任期结束时为止,杜马提交了1161份草案,其中675份一读

就通过,300多份在下院通过。²⁵1994年,杜马通过了40部法律并由总统签署生效,而在1995年,这个数字攀升到了159部,增加了四倍。²⁶与此相对照的是,叶利钦在1994年颁布了95份正式总统令,在1995年仅仅有51份。²⁷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通过的法律数量与签署的总统令数量相比在不断增加。

回顾过去,法律数量的增加暗示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家比过渡初期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了更多一致。雷明顿(Remington)、史密斯(Smith)和哈斯佩尔(Haspel)仔细研究了这一阶段俄罗斯的总统令和议会立法,从而得出结论,大多数法案都得到了总统和议会的支持。²⁸同时,几个重大争议问题仍然存在。当这些问题走向前台的时候,它们就会向俄罗斯新政治制度脆弱的稳定性发出挑战。这些挑战正是本章余下部分想要阐述的。

大赦投票

新宪法规定,杜马有权不经总统和联邦委员会批准赦免任何一个人。按照新宪法起草者的观点,这一条款有意被作为一种和解的机制。²⁹叶利钦对讲和的容忍度立刻被付诸检验。1994年2月23日,杜马在第一次实际行动中就立刻赦免了1993年秋天因保卫白宫而被捕的人,以及那些在1991年8月组织攻打白宫的人。杜马投票赦免了叶利钦政权最显赫的敌人。

俄罗斯选择反对大赦的投票结果,号召针对新一轮拆台行动采取措施。属于亚博卢集团的自由派专家提交的报告把决议称为“内战的开端”。叶利钦的军事顾问要他不理睬大赦,继续把他的敌人关在监狱里。³⁰宪法危机再一次近在咫尺。

叶利钦采取了几个步骤来阻挠大赦。据称,俄罗斯总统对他的幕僚和政府遵守大赦令的举动非常愤怒。总检察长阿列克谢·卡赞尼克(Aleksei Kazannik)在大赦危机期间辞职了,他这样解释辞职的原因:“我

辞职是因为有人要我违反法律,那不在我的权力范围内。”³¹卡赞尼克离职后不久,叶利钦解雇了俄罗斯反谍报局局长尼古拉·格鲁希科(Nikolai Glushko),因为他准许获赦免的政治家离开勒福多夫(Lefortovo)监狱。叶利钦起初威胁要采取针锋相对的回应措施,但之后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承认了杜马决议的有效性。大赦是对游戏规则较早的一次重要挑战。它以游戏规则而不是赤裸裸的权力的胜利而告终。这一事件表明,宪法不管是怎样设计的,它都不再仅仅反映权势人物的偏好,而开始从(规则的)始作俑者那里获得了一些自主权。

宪法问题

俄罗斯新宪法规定的制度构架没有立刻得到所有主要政治活动家的承认。几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他们疆域范围内暗自阻挠全民公决,然后引用其公民没有批准宪法草案这一事实作为指证文件无合法性的理由。车臣根本就没有举行全民公决。鞑靼斯坦总统沙伊米耶夫认为,鞑靼斯坦的法律高于所有莫斯科通过的法律,包括这部宪法。他的政府后来与俄罗斯议定了一项双边条约,在他们看来,这项法律文件高于俄罗斯宪法。³²

尽管存在这些言辞上的挑战,但是,所有的地方领导人——除了车臣总统杜佐哈·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都遵守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在宪法公决前,一些共和国已经停止向联邦财政预算上缴收入,其他几个共和国和州大量削减它们的支付转移。³³虽然莫斯科与其他共和国,后来是莫斯科与各个州和边疆区之间的双边协商在宪法公决之后继续进行,但是仅有一个共和国——车臣——拒绝遵守俄罗斯联邦框架下的新宪法。因此在1994年,车臣独立成为一个例外而不是定规,这是正在力图巩固国家权力的俄罗斯政府一个主要的眼中钉。

在首都,新宪法的反对者采取了相似的双重策略——在言辞上谴责而在实际上承认。俄共和它的盟友继续挑战新宪法的合法性。他们正确

地指出,叶利钦和他的同伴违反了旧宪法中规定的起草和批准新宪法的程序,这一指控几乎无可争辩。³⁴他们认为,起草新宪法的集团不代表整个社会而只是一个小派系。此外,俄共领导人宣称,新宪法是非法的,因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合格选民支持它。更为稀松平常的是,俄共领导人继续批评总统制,认为它不适合俄罗斯。³⁵

尽管有这些反对意见,但俄共及其盟友还是选择了按照新规则行事,即使他们不赞同宪法中规定的制度与批准程序。俄共参加了1993年议会选举,这一事实对新规则获得合法性很有帮助。在议会取得席位而不是坚守路障,俄共领导人表明他们实际上承认了新政治制度。俄共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在挑战宪法公决的结果上花费的精力是很少的,这也让人印象深刻。在12月投票过后不久,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索布亚宁(Alexandre Sobyanin)公布了令人吃惊但看似真实的证据,指出政府伪造了选举结果。³⁶索布亚宁宣称,政府把参选率夸大到50%以上,这是使全民公决生效的门槛。但是,主要政治力量都不支持索布亚宁。³⁷正像一个杜马代表向作者承认的那样,“每个人都知道投票无效,但是没有人有兴趣重新投票”³⁸。

共产党官员也强调了宪法和新杜马的临时性。为了强调新秩序的临时性,他们向队伍中的好战分子再三保证,他们不会向叶利钦和他的制度屈服,他们会为下一场战斗积聚力量。正如共产党评论员叶夫根尼·福琴科夫(Yevgeny Fochenkov)在1993年12月选举过后不久写到的,“两年的时间可以不紧不慢地准备一个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宪法草案”³⁹。福琴科夫和其他人把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看作是一个临时机构,它们可以运用新的委托权力创造一个更为公正和长久的政治制度。

久加诺夫也再三发表声明,敦促他的同志“按照和平的方式……通过选举箱”取得权力。⁴⁰在严厉批判劳动俄罗斯和其他非共产党组织的激进言论时,久加诺夫警告说,他们“说可能会重复1917年的十月革命。我说第二次十月革命不会成功”⁴¹。久加诺夫很明显地把他的角色定位在了依据规则行事——即使这些规则是由叶利钦制定的——他不想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新政治秩序。正如下一章所讨论的,当他有可能通过选举箱掌握权力的时候,久加诺夫愈发支持新的政治游戏规则。

从短期来看,日里诺夫斯基对宪法的态度要明确得多。他支持一个强势总统制,一方面是因为他相信俄罗斯需要一个强势首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相信他将会成为俄罗斯下一任总统。当然,俄罗斯新宪法不仅仅关注总统权力,它也保证了所有俄罗斯公民的个人自由。然而,日里诺夫斯基在此类问题上的声明,表明他不支持宪法有关此类问题的内容。但是在杜马的过渡时期,日里诺夫斯基既不支持也不提出公开反对宪法的政策。

在1993年10月和新宪法通过后不久,反对派组织没有尽全力去修改宪法。新宪法中规定的修改程序给修宪设置了很高的障碍。叶利钦在联邦委员会获得支持,这使得通过法律手段修正宪法变得不可能。至于宪法外挑战,所有反对派好像都不准备再次冒险使用暴力。在这一历史时刻,没有人想重复1993年10月的悲剧。

同时,大多数杜马代表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及团体都认为1993年通过的宪法赋予总统太多权力,而赋予立法机构的权力不够。⁴²最终,这些想法产生了一系列法律行动,它想利用宪法修正案限制总统权力。⁴³这些努力失败了。然而,事关杜马和联邦委员会构成的重大规则的变革发生了争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叶利钦的立法者在阻挠改变杜马选举法问题上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他们没有阻挠有关联邦委员会构成的新规则出台,而是把发挥的空间让给了叶利钦和地方领导人。在这两个例子中,政治斗争结果没有准确反映最有权势的人即叶利钦的偏好,制定规则的新游戏规则获胜了。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规则作为一个决定政策结果的因素开始与赤裸裸的权力进行斗争。

国家杜马选举法

在选择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的问题解决之后,有关选择何种选举法的问题成为新民主政体下一个重要的设计决策。因为选举法直接影响选举结果,决策者会选择能发挥他们最大潜力赢得选举的选举法。然而,在很少或根本没有选举经验的新民主政体中,选举规则和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经常是不甚了了。选举规则小小的改动会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正如下一章中所详细讨论的,1993年俄罗斯杜马选举戏剧性地展示

了选举规则和法律不曾预料的结果。虽然按原来的设计是使俄罗斯选择和其他改革派政党受益,但是,叶利钦 1993 年的杜马选举总统令实际上极大地帮助了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新民族主义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⁴⁴ 总统班子被这一选举结果吓坏了,因为按照它的看法,这一结果把一个法西斯领导人弹射进了国家政治,并产生了一个比以往更不职业化的新议会。⁴⁵ 结果,总统和他的班子想把比例代表制完全废除,并把俄罗斯政治改造成两党制。正如叶利钦在 1995 年向美国记者所解释的那样:

这一想法(两个中间派政党)的出现是因为在俄罗斯有 50 多个政党。当我们开始为选战行动时,他们开始争夺选民,制造政治骚动,这很难理出头绪。结果,有时候那些不合适的人进入了国家杜马。因此,我们决定消除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创造两个中间派集团,因为正像你们理解的那样,一个中间派集团太庞大了。这会是过去 200 年以来两党制的楷模,它会产生一个基于文明原则之上的文明国家。⁴⁶

在组建两个新政党——由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中右政党和由杜马议长伊万·里布金组建的中左政党——的准备正进行中的时候,行政当局意识到他们需要不同的选举规则。特别是,他们需要纯粹的多数主义制度来推动两党制的发展。⁴⁷ 因此,在接下去的一年中,总统为改变选举法而奋斗。通过与议会中忠于叶利钦的派别的合作,总统班子提出了一个新的混合制,其中 300 个议席由单一议席选举制选区分配,而仅有 150 个议席由比例代表制分配。⁴⁸ 在这一阶段的辩论中,总统顾问们试图淡化现有的由比例代表制进行分配的 225 席与他们规划中的 150 席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这一差别无关紧要。⁴⁹ 地方领导人甚至包括一些反对派(现有的杜马中很少有这些人的代表)也支持这一变更。⁵⁰ 但是,1995 年春经过辩论,修正案没有被杜马通过。

杜马中的大多数议员想保持 50-50 制度。首先,50%的杜马议员是因为比例代表制而获得了席位,因此他们有十分现实的维持现状的动机。此外,大约 70 个通过单一议席制选区赢得杜马席位的议员属于那些通过比例代表制赢得席位的政党。这意味着杜马中有稳固的多数支持 50—50

方案,这一多数派跨越了意识形态界限。这些议员也意识到,这种所谓的无关紧要的差别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225个比例代表制席位保证了多数人总是支持现存方案,而总统的建议则不尽然。1993年选举制度重新组织了政治力量,其中多数人主张维持现状。

叶利钦要把杜马的平衡从225—225席改为300—150席的修正案被否决以后,他随之否决了1995年5月杜马提出的50—50方案,他认为法律没有准确反映俄罗斯政治中政党的作用。杜马没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它获得了多数(第一次投票243票、第二次投票237票)但没有达到推翻总统否决的绝对多数。双方停止协商一项妥协性法律,并且叶利钦威胁颁布一项以杜马选举法命名的总统令,因为议会选举定于年底举行。制定规则的规则被破坏了。

1995年6月达成了一项妥协。杜马对它的法律做微小的改动,但保持了50—50的混合制。为了获得联邦委员会的批准,杜马同意不对联邦委员会新的非选举组成模式采取行动(以后会讨论)。⁵¹当确保联邦委员会投票通过以后,总统发出他会签署新法律的信号——他将在1995年6月21日签署法律,这仅是选举前的6个月。作为这一妥协的一部分,杜马几乎不加修改地通过了叶利钦5月的总统选举法。尽管有总统的反对,但指导1993年选举的基本选举规则同样在1995年的选举中起作用。

有人会认为总统和他的幕僚在这次杜马选举法辩论中屈服了,因为杜马几乎没有权力,并且这部法律无关紧要。但是,辩论的进程和总统班子在推翻旧方案时的努力程度,暗示着总统和他的助手很看重这部法律。总统班子尽管反对,但也没有使用赤裸裸的权力——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用总统令压制杜马的法律,因为这一举动会损害1995年选举的合法性。正如总统顾问萨塔罗夫在俄罗斯电视上申明的,总统不同意50—50方案,但他决定不再否决它,因为议会选举的延期会重新开始对抗和不稳定的状况,这会毁掉“改革、俄罗斯和整个国家的未来”⁵²。虽然这一制度安排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反映俄罗斯政治中权势人物的偏好,但它仍发挥作用并指导了1995年和1999年的议会选举。这一过程也显示,新的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不诉诸宪法外行动,也是能

够解决重大问题的。

组建联邦院

正如第六章讨论的,有关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的设计决定是在决定杜马选举制度的同时产生的。起草杜马选举法或影响杜马选举条例的人同样也在起草联邦委员会条例的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然而,这两种制度设计的持久力差别相当大。杜马选举令在1993年选举过后变成了法律,并在接下来的两次杜马选举中继续有效,但1993年联邦委员会条例在第一次选举之后就不再存在了。

与国家杜马的情形相反,组建联邦委员会的新设计没有在联邦委员会产生维持现状的多数派。政府的地方领导人和他们的盟友控制了新联邦委员会。许多地方行政首脑力求举行该职位的直接选举,然后再自动成为联邦委员会的成员,而不是在1995年再次举行联邦委员会的直选。这一方案将增加他们在地方上的合法性,并从叶利钦和莫斯科那里获得更大的自主权。选举产生的州长要比任命的州长更难以罢免。那些著名的、又不是州长的联邦委员会会议员,比如尤里·波尔迪列夫(Yuri Boldyrev)、尤里·契尔尼琴科(Yuri Chernichenko)和叶丽娜·米珠琳娜(Yelena Mizulina)等,敦促举行联邦委员会直选,但是他们在上院只是少数。⁵³

为了改变组建联邦委员会的游戏规则,地方行政长官不得不与叶利钦总统和杜马讨价还价。对杜马而言,在联邦委员会中取得多数是一笔交易。如果杜马批准了关于联邦委员会组成的新法律,那么联邦委员会也会通过杜马选举法而不是总统的草案。在一长串协商之后,这笔交易达成了。⁵⁴对总统而言,地方领导人赞同叶利钦的总统选举法并支持他再次参选,以回报总统对联邦委员会组织法的支持和直接选举地方领导人的默许。虽然叶利钦的班子坚持大多数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应在总统选举之后举行,以确保莫斯科能在总统选举期间维持对地方领导人的优势,但叶利钦最终还是同意了。

叶利钦对联邦委员会组成的最初设计并没有坚持到底,因为1993年秋天制定的条例根本不受权力平衡和那些受其影响最深的政治活动家的

控制。这些有权势的政治活动家把条例看作解决危机的过渡办法,他们按照这些强制实施的规则行事仅此一次。比照杜马内的权力平衡,联邦委员会的权力平衡在1993年选举后没有重新调整,权力没有按新制度设计重新分配。结果,权势人物的利益足以改变游戏规则。

总之,1993年到1995年过渡时期的宪法和国家杜马选举程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联邦委员会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比这些结果更重要的是产生这些最终结果的过程。在俄罗斯新政体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争论,所有的政治家,包括总统,都按照既定游戏规则行事。规则作为俄罗斯政治结果的决定因素开始弥补赤裸裸的权力运作。

经济问题:市场浪漫主义的终结和寡头资本主义的开始

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结果至少在最初影响了经济政策和人事安排。虽然市场改革家叶戈尔·盖达尔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不是因为选举结果而被迫离开的,但两人还是在他们的政党遭受耻辱的选举失败之后离开了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没有参加议会选举,由此避免了一次对他经济政策的直接表决,但总理对选举结果做出反应,提出了“市场浪漫主义的终结”。总理委托三套经济顾问班子为他的政府提供政策变革的建议,三套班子都建议实行某种形式的价格调控。在选举过后不久的公开声明中,切尔诺梅尔金似乎同时开始号召对市场实施国家调控和强化对亏损企业的支持力度。对于这些计划,费奥多罗夫、盖达尔和先前盖达尔班子中的西方顾问都预言要发生高通胀、巨额财政赤字和负增长。⁵⁵

然而,切尔诺梅尔金没有实施全面的价格控制,没有增加政府在工业上的支出或逆转私有化。在1993年的最后一天,切尔诺梅尔金签署了国家价格委员会起草的价格调控令,但第二个月就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举动。他放开价格和商业的举动变得更为缓慢,并在能源和农业部门维持了扭曲市场的管制。但他没有逆转市场改革,特别是在1994年10月卢布崩

溃以后,没有实施进一步的国家经济干预。

随着宪法的批准,新秩序发挥作用,这使切尔诺梅尔金从议会那里获得更大的经济政策执行的自主权。新宪法确立了经济决策权力和职责的明确界限。⁵⁶因为总统任命总理和其他政府官员,行政机关成为制定经济政策明确的领导机构。几个重要的杜马派别支持总统领导经济事务。按照杜马代表、议会党团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Party of Russian Unity and Accord)领导人弗拉基米尔·科泽米亚金(Vladimir Kozhemyakin)的看法,杜马不能胜任经济事务的立法工作。他的党团以及俄罗斯选择都拥护总统的经济法规创制权。⁵⁷

此外,新宪法明确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权力和职责。在新宪法下,总统有权任命央行行长,杜马保留批准候选人的权力。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央行行长撤职的程序,但叶利钦在1994年10月11日黑色星期四后处理行长维克多·杰拉什琴科的问题上对规则进行了实验,当时卢布对美元汇价在一天之内损失了27%。杜马中的反对派议员向叶利钦将行长撤职的权力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议会拥有这一权力,随后议会拒绝批准叶利钦提名的人选塔提亚娜·帕普莫诺娃(Tatyana Parpmonova)。⁵⁸叶利钦回避了权力之争,把帕普莫诺娃任命为代理行长。⁵⁹在帕普莫诺娃的治理下,中央银行独立于杜马控制并坚决反对货币扩张政策。

理论上,杜马仍控制着财权,因为国家预算必须由立法机构批准。然而,政府控制了预算编制权。单个预算项目缺乏透明度,以及行政机关对所有预算外支出享有控制权,这些都将大多数财政政策的控制权转移到行政机关手中。政府的预算仍须经议会严格审查。但是与前两年的过程相比,新的批准程序和修改要素变得更加清晰。

俄罗斯国家制度之间规则和关系的不确定性减少了,这为行政机构实施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俄共仍然提倡价格控制、财产重新国有化、严格控制外国投资和对俄罗斯工业实施保护的政策。⁶⁰然而,这些争论不再使俄罗斯政治对立,因为由规则指导的程序现在已经存在并将要解决这些争论。迫在眉睫时,宪法会赋予总统办公厅使那些复辟主义者边缘化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把对立政治集团分隔开来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少,这些分界线上斗争的剧烈程度也会减弱。

市场运作的时间越长,颠覆市场的成本也就越高。当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变得越来越大,反市场者颠覆市场的能力就会变小。特别因为1993年10月以后市场经济的反对者处于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他们只得顺从地接受在新经济制度下行动的事实,而不再期望推翻它。

自由化

在1993年头几个月匆匆推出新价格控制措施之后,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最终抵挡住了新任议员要求实施额外价格控制的压力。相反,它维持了盖达尔政府在价格、货币兑换和进出口控制上的基本原则。虽然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想以选民授权的方式驳回盖达尔的政策,但是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新的权力划分使得杜马不可能再制定新的价格控制或任何其他经济控制政策。

但是,切尔诺梅尔金对政府的改组并没有深化自由化。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向他的老东家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做出了一个明显的让步,推迟了进口贸易的自由化。⁶¹ 农业利益集团确保了对国外加工食品实施进口关税,汽车制造商对竞争对手的产品维持了高进口税,俄罗斯银行业极其成功地限制了国外竞争者的营业范围。⁶² 当议会控制政府的能力下降时,这些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上升了。⁶³

预算争论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1993年12月令人吃惊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切尔诺梅尔金起初疏远了他自己与为经济稳定而采取的激进措施之间的关系,这些措施是他较趋向改革的政府于1993年秋天实施的。在1月份盖达尔和费奥多罗夫辞职以后,切尔诺梅尔金组成了一个新的班子,工业利益集团在其中有很多代表。但是,切尔诺梅尔金也没有完全放弃稳定政策。切尔诺梅尔金政府不等杜马和工业利益集团提出开支请求,便抢先于1994年春天向俄罗斯立法机关提交了下两季度的联邦预算,新成立的杜马仅做了微小改动就批准了预算。⁶⁴ 在他的努力之下,月通货膨胀率从1月的18%降为8月的4.6%。但是,政府全面实施稳定政策是在1994年10月11日卢布崩溃之后,这场金融灾难导致中央银行行长维克多·杰拉什琴科的去职

以及政府按照强化改革派的路线重组。

紧接着10月早期的卢布崩溃之后,于1994年10月底提交杜马的1995年度政府预算在财政上更为保守,目标定在1%的月通货膨胀率和占GDP 8%的年度预算赤字。⁶⁵这份文件促使杜马代表进行更加认真的审议。在预算辩论的过程中,俄共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力主提高最低工资,而俄罗斯农业党的代表主张增加农业部门的补贴。⁶⁶当农业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要求得到满足后,预算最终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通过,这一模式在有关经济事务的投票上会反复出现。1995年度预算的最终投票也于1995年3月以一个令人欣慰的优势——289票对81票——顺利通过。⁶⁷在1996年预算批准过程中显示了相同的先反对后妥协的过程。

虽然俄共和亚博卢一贯投票反对政府预算,但是无论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派都不抵制预算批准过程中的原则。像俄共和亚博卢这样的反对集团抨击的是政策结果,而没有抵制政策过程。同样重要的是,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也很看重预算的法律批准程序。尽管那时他们力量占优,叶利钦和他的政府可以强制执行预算,但他们意识到了公开批准过程的政治收益。正如政府经济改革中心副主任姆斯提斯拉夫·阿法纳斯耶夫(Mstislav Afanasiev)所注意到的:“尽管存在着各种围绕预算的争论、冲突和辩论,但是它是一种整合的力量。所有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公开解决分歧,而不是暗地里斗争。”⁶⁸

编写一份紧缩预算比实际遵守容易得多。1994年和1995年底,政府迫于农业、煤炭、重工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勉强同意向它们提供更多补贴,导致两年的后两个季度政府开支急剧升高。同样,批准预算比监督预算执行情况要容易得多。政府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权力不平衡,使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会执行他们认为有利于己的部分预算,而不考虑其他财政义务。⁶⁹这种做法最终腐化了预算过程,因为议会开始通过越来越多的不现实的预算以补偿行政机关任意执行预算所带来的后果。然而,起草预算和发展财政稳定项目的过程表明,市场改革的争论已经相当狭小,而争论进行的过程已经变得更为制度化。如果说1993年的预算争论导致了宪法危机并最后导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武装冲突的话,那么1993年以后的预算争论没有产生相同的情形。相反,预算过程表明人们对新

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有了新的接受度。

私有化

在1993年十月事件的前夕,人民代表大会威胁说要掌握国家财产委员会并同时停止私有化。因此,叶利钦解散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为私有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刺激因素。1993年10月后的情况越来越明显,行政机关将继续其私有化计划;先前反对私有化的人,特别是那些大企业的经理极力推动私有化,以确保他们在1994年7月私有化领取凭证阶段结束之前得到他们的那份馅饼。到第一阶段结束时,超过100 000个企业被私有化了。

批准一部新的指导第二阶段私有化(或者说是现金阶段)的法律显得十分困难。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反对私有化的人采取更加好斗的姿态,相比较而言,共产党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已经软化下来了。久加诺夫甚至承认“国有制占优会导致停滞和经济瘫痪”,他说这种情况行不通。⁷⁰然而,俄共和农业党的代表推崇“混合经济”,这会给予“社会和集体所有制以特别的优先权”。⁷¹在他们看来,由于新私有化计划不容许有这种混合经济,因此,他们就阻挠政府提出的有关私有化的法律草案获得通过。⁷²但是,在杜马休会以后,叶利钦签署了1535号总统令,强制实施杜马反对的法律草案。随后又产生了规定所有权转移的法令。⁷³叶利钦明确表示,他的法令是临时性措施,会在新私有化法批准以后失效。然而,这样的法律从来没有出现。叶利钦的单方面行动使得杜马难以回应,因为在杜马内部,无论反对还是赞同政府新私有化计划的人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多数。⁷⁴结果,第二阶段的私有化是按照行政命令而不是法律开始的,这一做法从远期看给市场的产生和经济的增长带来了问题。

第二阶段(“现金”阶段)私有化正式开始于1994年7月1日。第二年,政府再次不经议会同意批准了“贷款换股权”(loans-for-shares)的计划。⁷⁵在一年中,俄罗斯政府基本上分送掉了俄罗斯几个最富有的公司。按照“贷款换股权”计划,一小批俄罗斯银行向政府发放贷款以换取12家大公司的临时控股权。这些贷款从未被归还,因此,这些银行保持了股权。其中一些银行从贷款换股权的计划中成长为巨大的金融和工业帝

国。⁷⁶例如,奥尼克西姆银行(Oneximbank)以它旗下的工业组织英特罗斯集团(Interros group)为伪装,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镍出口公司诺列尔斯克镍业(Norilsk Nickel)和诺沃里比茨克冶金联合企业(Novolipetsk Metallurgical Combine)的控制权。奥尼克西姆银行把它与国家的紧密联系转化为资本,摇身一变成为瓜分石油公司竞争中独占鳌头的赢家,获得了那时被认为是俄罗斯第四大公司(Sidanko)的绝大多数股权,并与俄罗斯第三大公司(Surgutneftegaz)结成战略伙伴。⁷⁷

米纳特普(Menatep)银行也在贷款换股权的热卖中有所斩获。当时它的军火企业罗斯普罗姆(Rosprom)控制了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超过80%的股权——它在1996年占俄罗斯石油总产量的11.2%。⁷⁸虽然公司的预计收益要以数十亿美元计,但是国家仅从交易中获得微不足道的700 000美元。⁷⁹虽然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的公司(Logovaz)起初只是在电视业和航空业(Aeroflot)占据排名,但是,它最终通过贷款换股权计划拥有了自己的石油公司(Sibneft)。贷款换股权计划由丘拜斯和奥尼克西姆银行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设计的,它为抵挡共产主义复辟筑好了一道防波堤。参与的寡头们十分聪明地在1996年总统选举之后获得了这些公司的控制权。

然而,这种方式的私有化仅取悦了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几个政治集团。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把私有化过程怒斥为犯罪,并发誓如果他当选总统就要收回这些非法的分送。⁸⁰亚博卢、农业党和俄罗斯选择的个别代表也谴责贷款换股权计划的不公正和低效率。1997年7月,叶利钦签署法令禁止将来贷款换股权的分送行为。然而,批评者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反复出现的行动计划*,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同意新私有化计划,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意识到新宪法的立法程序使他们没有机会推翻叶利钦的法令。他们也都没有考虑宪法外行动。俄共领导人也只是准备在西丹科面前设置路障,因为他们相信,与叶利钦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他们还是会失败的。换句话说,所有人都承认的新权力平衡,把这个问题**从改革的争

* 指继续进行的分送行为。——校译者注

** 指通过宪法外的行动即发生武装冲突来解决争论。——校译者注

议议程中去除了。与此同时,通过对私有化类型的争论,叶利钦政府的这些反对者实际上把私有化设为一个合法的政策目标。正如杜马代表、俄共党员维克多·佐卡尔茨耶夫(Viktor Zorkaltsev)所解释的,“共产党杜马代表不再把逆转私有化进程作为目标”⁸¹。相反,俄共领导人现在强调各种形式所有权的合法性,但偏爱“国家,社会所有制”,因为“其优越性在于符合(俄罗斯)国家性格……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明显不符合俄罗斯性格的传统”。⁸²

杜马于1994年夏天通过新的民法典,这似乎印证了佐卡尔茨耶夫对他的政党的判断。被一些人称为俄罗斯市场经济宪法的民法典,由一套建立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成,这些制度保证私有财产权和契约的履行。⁸³这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法典取得了进展,表明议会的议程与上届议会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否发展市场经济现在已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发展何种市场经济。

土地改革仍是保守派继续占上风的重大经济问题。虽然新宪法保证土地所有权为私有财产权,但是,叶利钦和他的政府没有通过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化立法或总统令来实施这样的改革。相反,政府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策略,十分热情地阻挠由共产党和农业党起草的保守土地法获得通过。⁸⁴叶利钦和他的幕僚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在这一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上颁布总统令,以取得对杜马反对派的胜利。叶利钦被他自己创造的制度束缚住了。

资本主义类型的争论

俄罗斯的精英及其政治组织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上存在分歧。新自由主义者继续抱怨俄罗斯政府在市场制度化上做得不够。相比之下,共产党还是对西方发起的“休克疗法”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悲伤不已,把政府的改革计划称为“俄罗斯病”(russophobic)和逆发展潮流而动,其目的在于要使俄罗斯经济殖民化,为美国帝国主义服务。⁸⁵然而,这些辩论在新俄罗斯政治制度界定的范围内进行。他们没有助长反制度力量向现状挑战。虽然一些边缘共产主义组织如劳动俄罗斯(Working Russia)的言论仍然无一例外地反对市场经济,但是所有主要政治家的行为仍在新制度

限定的范围内。违反新政治秩序的最大举动来自克里姆林宫,而不是反对派。

这种争论框架的变化是由几个相关原因引起的。首先,在反对党、工会和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激进力量,在1993年10月后被推到了一边。诸如刻毒的反资本主义者维克多·纳皮罗夫(Viktor Napilov)这样的人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失去了领导地位,而那些希望与叶利钦政权和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的人地位上升了。久加诺夫和俄共领导人米哈伊尔·拉普辛(Mikhail Lapshin)试图与政府及它的经济政策相安无事。几个共产党作家虽然严厉谴责“私有财产的信徒”,但他们开始意识到需要一定的私有财产权以刺激经济增长。⁸⁶ 共产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例如党的第二书记瓦连京·库普索夫(Valentin Kuptsov)仍号召大部分财产应由国家和集体掌握,但他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现在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⁸⁷ 1993年10月以后,左派不再期望恢复共产主义,而现在则开始促进资本主义改革。俄罗斯的反对力量在多年之内被两次打败,他们已经被失败的冲突搞得精疲力竭。相反,他们听任由胜利者制定的新经济规则的摆布,并寻求通过参与制度来改变这些规则。

此外,认真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会势力并不存在。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of Russia, FNPR),一个旧苏维埃时期的工会联合会,已经与企业经理密切合作来实现企业的私有化。⁸⁸ 一直到1993年担任FNPR领导人的伊格尔·克劳奇科夫(Igor Klochkov),因在十月事件中与反政府势力合作而被推到一边。他的继任者米哈伊尔·希马科夫(Mikhail Shmakov)迅速肯定了他与政府合作的意愿而不再想推翻它。⁸⁹ 新的独立工会在苏联被削弱的岁月里蓬勃兴起,它们一直以来就与叶利钦政府结成同盟,因为它们把共产党工会看作是它们最大的敌人。⁹⁰ 在第一次私有化计划的最后一年中,无论是FNPR属下的工会还是新的独立工会,都把注意力放在确保工人和工会的财产权上,而不是为延续国有制而向议会游说。⁹¹ 后来,通过罢工和全国性的抗议,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工资拖欠问题。然而,没有一个工会支持革命的目标或实施革命策略。

至于民族主义反对派,几乎没有一个组织公开支持反资本主义的纲

领。日里诺夫斯基和他的杜马党团十分支持政府的经济倡议。因为日里诺夫斯基在1993年获得了大量有异议的选票,他的合作对叶利钦政府十分有利。在经济事务上,叶利钦政府不再面临反对势力的联手挑战了。

总之,俄罗斯反资本主义的势力在1993年10月以后变得更加弱小了。这些政治团体多年以来被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两次击败,他们不准备就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分歧第三次藐视政府。相反,他们选择了接受新制度并修改它的做法。

边界问题:苏联、俄罗斯联邦和车臣

到了1995年杜马任期结束的时候,有关俄罗斯领土的争论已经被缩小了。对苏联的怀念之情没有因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建立而消失。久加诺夫仍倡导“自愿重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⁹²,而民族主义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赞成恢复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叶利钦也回应了这些计划,宣布俄罗斯在过去苏联的范围内拥有特殊的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1996年3月,叶利钦朝着统一的方向采取了具体步骤,他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四国联盟条约,这份文件号召这四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在后来的几天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的盛大典礼上建立了主权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Sovereign Republics),它向重新合并迈出了更加大胆的一步。

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提议在前苏联内建立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但他们对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机制达不成一致意见。他们的意见包括从自由主义者提议的市场驱动、渐进方式,到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政治驱动、强制方式。所有政治势力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进一步的经济整合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无论是在里海石油开发审议中为代表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利益,迫使独联体成员加入国家间经济委员会(Interstate Economic Com-

mittee,这是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超国家机构,旨在规范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强迫乌克兰向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支付天然气运输费用,俄罗斯第二共和国开始积极推进它在前苏联地区的经济利益。

然而,这种在经济联合上达成的新一致与俄罗斯在独联体中的特殊地位,并没有转换成对迅速和强有力地重建苏联的支持。相反,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公开支持此种方式或目标。久加诺夫一贯强调和平、自愿联合的重要性。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也同意这种主张。只有日里诺夫斯基把暴力当作大俄罗斯统一的手段,但到1995年为止,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过日里诺夫斯基的主张。重新界定俄罗斯国家的外部边界仅是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次要争议议程。

俄罗斯联邦主义与车臣战争

俄罗斯联邦内部的领土界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几个共和国的政府没有立即承认新宪法的合法性。然而,没有一个主要政治势力——无论是自由派、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支持各共和国对新宪法的蔑视。在联邦委员会,叶利钦得到了大多数地方代表的支持,这进一步制约了反联邦联盟的形成。这一问题在车臣战争期间变成一个突出的民族问题。在这两年的过渡时期里,围绕车臣战争的政治对俄罗斯国家新政治制度形成的挑战,比任何单个问题都要多得多。1994年12月1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命令俄罗斯军队开进车臣共和国。八个星期之后,俄罗斯军队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起了组织混乱但具有残酷毁灭性的进攻。在大约4000名俄罗斯士兵,几千名车臣武装分子,15000到25000名车臣居民——俄罗斯人和车臣人——死亡之后,俄罗斯军队控制了车臣首府。⁹³随着格罗兹尼的沦陷,车臣武装分子转移到车臣山区和临近的印古什地区,继续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十分成功的游击战。大约两年后,估计有100000俄罗斯平民死亡,俄罗斯士兵因战争失败而回家。⁹⁴

按照克里姆林宫官员的说法,俄罗斯为了恢复宪法秩序和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而被迫对叛变的车臣政府使用武力。⁹⁵车臣领导人杜佐哈·杜达耶夫在1991年秋天的混乱局势中上台执政,他宣布这个拥有

850 000人口的共和国独立。⁹⁶然而,俄罗斯从来没有承认车臣独立。因此,按照俄罗斯官员的说法,莫斯科为了确保它的国际边界和保护在杜达耶夫政权的恐怖统治下的俄罗斯平民,它不得不重申它对车臣领土的主权。⁹⁷在1993年12月俄罗斯人民批准新宪法之后,车臣站了出来,成为唯一一个公开反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共和国。如果说其他共和国在1993年后与莫斯科就主权争端达成和解的话,那么车臣则继续藐视莫斯科的权威,这使得车臣的独立要求成为例外而不是规则。⁹⁸

武力解决是一场军事上的灾难。随着战事的拖延,公众支持度迅速下降。到1995年1月,仅有16%的俄罗斯人赞成在车臣使用武力,而71%的人则反对战争。⁹⁹对战争的反对转变成了对叶利钦的反对。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70%不认同叶利钦在1994年9月作为总统时的表现,而这一数字到1995年1月达到了80%。¹⁰⁰

如果危机会损害俄罗斯政体的新游戏规则的话,那么车臣战争就算是一个危机。但是它没有(损害政治游戏规则)。对战争的政治反应把俄罗斯政治制度带到了悬崖的边缘,但从来没有把它推下去。反叶利钦联盟没有联合起来挑战干涉的合宪性。¹⁰¹人权运动分子想在宪法法院对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但法院里充斥着叶利钦的拥护者,因此他轻而易举地就获胜了。对战争更广泛的反响跨越了俄罗斯政治光谱中已有的分隔,这使得对叶利钦政府采取集体行动变得十分困难。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赞成或是反对战争的阵营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支持和反对叶利钦的阵营,就像1991年到1993年期间那样,因此没有出现再次对立的情形。杜马在支持叶利钦进驻车臣决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关于1994年12月最后一周应对车臣危机的50次投票的研究中,杜马分析家亚历山大·索布扬宁(Aleksandr Sobyannin)和爱德华·杰尔曼(Edward Gelman)发现,杜马通过的继续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议数量大致相当。¹⁰²如表7.1所示,俄共在战争问题上没有一以贯之的立场。

只有俄罗斯选择和亚博卢集团坚决反对战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车臣战争导致俄罗斯改革派内部发生分化,这对俄罗斯选择最为不利。由叶戈尔·盖达尔和谢尔盖·科瓦列夫(Sergei Kovalev)领导的俄罗斯选择的核心理坚持他们反对车臣战争的立场,但俄罗斯选择的几十个

代表则站在了总统一边。他们最终从政党中分裂了出去,组成了两个新的亲总统的议会党团——俄罗斯(Rossiia)和稳定(Stabilnost')。

表 7.1 关于车臣战争的政党投票

单位:%

政党(杜马中的席位)	反对干涉的投票	主张干涉的投票
俄罗斯选择(67)	71	1
亚博卢(28)	64	2
12月12日联盟(22)	39	13
俄罗斯妇女(22)	63	42
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30)	21	14
独立候选人(32)	24	21
新地区政治(61)	34	33
俄罗斯民主党(15)	21	31
俄罗斯道路(12)	46	6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45)	55	83
俄罗斯农业党(54)	33	75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60)	1	89
杜马合计(448)	39	42

注:表格中显示的是各党派支持反对干涉解决方案或支持干涉解决方案的总百分比。党派对这两种解决方案都有投票表明对战争还缺乏共识。表格中百分比小的党派表示它们不愿意采取坚定的战争立场。

资料来源: Aleksandr Sobyenin and Eduard Gelman, "Yanvarskie (1995) golosovaniya deputatov gosudarstvennoi dumy: Byudzhnet i chechenskii krizis" (Moscow, 1995), 6.

杜马中三个主要的反对党——自由民主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农业党——也没有对战争采取相同立场。自由民主党坚定地站在总统一边。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和组织也毫不含糊,但大多数民族主义组织起初是为了鼓吹他们维护俄罗斯领土完整的功德。然而,随着战争的拖延,一些民族主义者转而反对叶利钦,把战争看作是由错误的领导人实施的正确政策。¹⁰³ 共产党反对战争,但具有细微的差别。因为俄共和它的盟友支持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和一个重新统一的苏联,他们不能表现出反对把车臣留在俄联邦的姿态。相反,久加诺夫和他的同伴把战争作为一个莫斯科现政权无能的例子,他们警告说,车臣战争在俄罗斯其他地区可能会鼓动更普遍的内战。¹⁰⁴ 反对派和改革阵营内部都在车臣战争问题上出现了分裂,这抵消了围绕这一问题的对立。此外,在车臣问题上反对叶利

钦的人与在经济问题上反对他的人不是同一批政治家,这一情况也阻碍了强大的反政府阵线的形成。

战争和对战争的反应检验了新政治游戏规则的可适应性。战争引发的最富有戏剧性的测试发生在1995年夏天,当时一伙车臣武装分子在俄罗斯南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布迪扬诺夫斯基(Budyonnovsk)劫持了上百名俄罗斯人质。切尔诺梅尔金总理选择与车臣武装分子谈判而不是战斗,这一策略使得被捕平民得以释放。然而,布迪扬诺夫斯基危机促使杜马各个派别开始攻击政府处理人质危机、战争和更普遍的国内事务的手法。1995年6月21日,布迪扬诺夫斯基危机为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这在第二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反对政府的意见来自反对战争的自由派、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对处理布迪扬诺夫斯基危机的批评,以及像俄罗斯民主党这样投票反对政府一般经济政策的党派(参见表7.2)。¹⁰⁵

表 7.2 对政府不信任的政党投票

政党	支持	反对	弃权	未投票
俄罗斯选择	3	39	1	11
亚博卢	25	0	0	11
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	1	3	0	15
俄罗斯妇女	2	0	13	6
俄罗斯民主党	10	0	0	0
俄罗斯共产党	45	0	0	2
俄罗斯农业党	44	1	0	5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44	2	0	9
新地区政治	20	2	1	9
稳定	3	13	2	21
俄罗斯	10	6	1	18
独立候选人	33	5	2	13
总计	240	70	20	120

作为回应,政府立刻要求进行第二次投票,并且切尔诺梅尔金发誓如果不赢得多数信任票,他就会辞职。一个僵持的局面好像正在形成。然而,在第二次投票之前,叶利钦应杜马要求做了一系列人事变动,他撤销

了谢尔盖·斯捷帕申(Sergei Stepashin)的联邦安全局局长职务,维克多·叶林(Viktor Yerin)的内务部部长职务、尼古拉·叶戈罗夫(Nikolai Yegorov)的副总理职务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叶夫根尼·库兹涅茨索夫(Yevgeny Kuznetsov)的州长职务。这些撤职令表示杜马获得了重大胜利,因为它对这些官员没有正式监察权。¹⁰⁶在这样的背景下,切尔诺梅尔金和他的政府为了确保第二次投票通过而与杜马中的党派,特别是农业党就财政转移支付问题达成了交易。这一策略起了作用。在一周以后的第二次投票中,仅有193名代表投票反对政府,刚好少于决议通过所需的226票。

游戏规则幸存了下来。在整个布迪扬诺夫斯基危机中,所有主要政治家都按照危机之前明确规定的一套规则行事。叶利钦在赞扬这一过程的时候说:“我们很幸运能消除那个危机。之所以有可能,主要是因为宪法的缘故,它为类似的情况规定了规则。我必须开诚布公地说,宪法有助于维持当时俄罗斯政治的稳定。”¹⁰⁷尽管有相反的预测,但是车臣战争没有使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新政治制度脱轨。¹⁰⁸相反,俄罗斯政体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了下来而没有崩溃,这表明新秩序的适应力正逐渐增强。

结 论

在俄罗斯政治这一新时期的开始阶段,几乎没有人预测到新政治制度会比前四年的制度设计存活更长的时间。政治游戏规则是崭新的并且未经试验的。之前的经历显示俄罗斯政治家倾向于冲突,甚至是武装冲突,而不是妥协。然而,新规则在这一临时宪法时期起了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政治冲突在新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许多人把这些规则贬为不公平、不民主和偏向于总统,但所有主要政治家都承认了叶利钦和他的幕僚在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瓦解之后制定的新制度安排。当叶利钦想改变其中一些规则(比如杜马选举法)的时候,一个维持现状的多数派获胜了。正如那时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费尔奥多夫总结的,“就我看来,去年

(1994年)最重要的成果如下:俄罗斯社会终于意识到现实中的政治稳定是个什么样子”¹⁰⁹。当然,悲惨的车臣战争在国家层面上没有损害俄罗斯新政体的轮廓。¹¹⁰

制度崩溃和内战都没有发生,这已经是重大成就了——这与此前四年俄罗斯无序的对抗性政治有很大的不同。自从1989年引进真正的选举以来,1993年选举产生的杜马(尽管是过渡性的)是第一个完成全部任期、没有被反宪法行动解散的立法机构,然而,重要的不是宪制本身的存续,这一时期制度化的意义更大。首先,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的产生有利于使政治远离街头而进入一个更为有序的政治环境。在杜马占据席位的政治家被迫与议会内的意识形态敌人以及总统和他的政府妥协。里布金在杜马最富有戏剧性的第三次会议结束时评论道:“尽管有冲突和高昂的热情,但是大多数杜马组织、委员会和理事会,以及大多数代表已在一个稳定的立法过程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¹¹¹

总统和政府在这期间也学会了如何建设性地处理与议会的关系。宪法赋予行政机关在这一关系中的有利地位,总统利用权力不平衡否决法案,按照总统令进行治理并威胁解散杜马。¹¹²然而,总统和政府宁愿选择法律而不是政令,为了立法机关批准大多数重大政治决定而与杜马合作,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按照雷明顿、史密斯和哈斯佩尔的说法,叶利钦签署了四分之三的由杜马制定而到达他案头的法律。¹¹³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选择效应,杜马可能只会通过那些他们认为有机会签署的法律。然而,这种行为与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对抗做法相比是一个重大进步。仅有一项重要政策是由政令实施的,即政府私有化计划中的现金阶段。

明显有利于叶利钦的权力平衡变化对新政治制度得到承认提供了最直接的原因。反对力量在多年以来两次被击败,他们拥有反制度的主张,但不相信他们有力量第三次发起挑战。这些势力算计好了,无论制度有怎样的缺陷,他们还是最好遵守叶利钦的新政治秩序,这要好过重新动员、再进行一次革命斗争。此外,一项新游戏规则——选举——有助于使那些最激进的反制度团体边缘化。正如下一章所讨论的,许多激进分子拒绝参加1993年的选举,当政治的主战场从路障转移到议会走廊的时候,他们因此而失去了政治过程中的发言权。

争议的改革议程的缩小也有助于宪法获得承认。1993年10月冲突过后不久,反对叶利钦的势力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再继续一项反变革的议程。如果1991年的冲突把苏联留存的问题从台面上移走,1993年的冲突则有利于把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争论从台面上搬开。只有政体的争论保留下来。叶利钦为这最后一个争议问题强制执行一个解决办法,以此迫使反对者举手同意。他们要么接受他的有缺陷的规则,要么回到对抗的游戏里去。他们选择了新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利钦的反对者按照新政治游戏规则行事的决定限制了他们推翻新政治规则的能力。叶利钦的反对者同意加入叶利钦规定的政治制度中去,并因此接受这一制度限制他们阻挠叶利钦政策的能力,他们正在抬升他们将来反对的代价。在政治、经济和领土形成的早期阶段起作用的规则越多,那么它重蹈历史覆辙就越难。

这种锁定的逻辑在经济改革领域最明显。新政治规则在1993年后建立,叶利钦的私有化计划就很难被反对势力阻挡,更不用说停止。俄罗斯反对势力在短期之内放弃了运用其他更加革命和富有对抗性的方式实现政治主张的机会。他们大体上同意不通过暴力手段重新统一苏联。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统一的代价会增加,因为从前苏联独立的共和国会投资于增强新制度秩序的军队、货币和新机构。

改革中争论议程的缩小更容易实现政治领域的合作。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争论不再与一些基本问题相关,比如经济的性质或苏维埃帝国的未来。少一些争议的问题会让合作更有可能些。渐渐地,当俄罗斯的精英们习惯了在宪法的约束下玩政治的时候,“锁定”的逻辑也会在政体中得到认同。特别当杜马内部以及议会、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程序变成惯例时,这些做法被具体化,与此同时,其他非民主的做法就少了吸引力并变得更为昂贵。

注 释

1. 别尔尤科夫(Biryukov)和塞耶夫(Sergeyev)统计出在过去的90年中有6个(这样的情形)。Nikolai Biryukov and Viktor Sergeyev, *Russi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a Nascent Democracy* (Aldershot, United

Kingdom: Ashgate, 1997), 3.

2. 引自 Leonid Bershidsky, "Parliament Rejects Yeltsin's Bank Chief," *Moscow Times*, November 24, 1994, 2.

3. 叶利钦实际上是否有权力这样做只是一个假设。然而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对权力平衡的认识在这些情形中至关重要。

4. 联邦委员会议长弗拉基米尔·舒梅科是一个说话直率的人,他支持推迟第二轮选举。参见 Interfax, June 21, 1994, 收录于 *RFE/RL, Newslines*, June 22, 1994。总统顾问谢尔盖·沙赫赖提出了类似的支持推迟选举的观点,参见 Interfax, June 25, 1994, in *FBIS-SOV-94-123*, June 27, 1994, 21。

5. 例如参见俄罗斯银行家奥利格·波伊科(Oleg Boiko)的观点, in "Russian Tycoons: Entrepreneurs Piling Up the Wealth," *Moscow Tribune*, May 30, 1995, 6; 以及 Yuri Fedorov, "Gruppy interesov i politicheskie sily v Rossii," in A. Zagorskii, A. Lopukhin, and S. Rossi, eds., *Ot reformy k stabilizatsii* (Moscow: MGIMO, Promyshlennyyi vestnik Rossii, 1995), 24。在1994年11月与作者的一次访谈中,当时俄罗斯最富有的人奥利格·波伊科强调需要强有力的行政当局来实施经济改革和在这一过程中承担选举的危险。

6. 回溯过往,这一担忧好像被人为夸大了,也许是改革派为替他们的行为辩解而故意夸大。然而我们知道了结果,这些断言就难以避免了。那时好像是可以避免的。

7. 参见作者与杜马代表、俄罗斯民主党成员伊利纳·祖布科维奇于1994年7月28日的访谈。

8. 参见作者与杜马代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维克多·佐卡尔茨耶夫于1995年7月25日的访谈。

9. 亚历山大·索布亚宁(Aleksandr Sobyanin)这位备受尊敬的议会专家在评价杜马第一年工作的时候认为,没有一个政党控制议会多数,这种情况产生了杜马内部的稳定。参见作者与索布亚宁于1995年4月10日的访谈。

10. Moshe Haspel, Thomas Remington, and Steven Smith,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Party Cohesion in the Russian Duma," *Journal of Politics* 60(1998): 417-439.

11. 原始数字是50,但这一门槛经投票而降低了。参见 *Dnevnik zasedanii gosudartvennoi Dumy*, January-March 1994 (Moscow: Izdanie Gosudarstvennoi Dumy, 1994), 4。

12. 有关这一制度创新的结果,参见 Thomas Remington and Steven Smith, "Theories of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Russian Dum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1998): 545。

13. 参见作者与总统顾问格奥尔吉·萨塔罗夫于1997年10月9日的访谈。

14. Aleksei Sitnikov, "Power from Within: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Power

■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with the Russian Duma,”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1999.

15. Grigory Belonuchkin, *Federal, noe sobranie* (Moscow: Fond razvitiya parlamentarizma v Rossii, 1995), 78.

16. 里布金 1994 年 1 月 13 日在国家杜马的演讲; 收录于 Ivan Rybkin, *My obrecheny na soglasie*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e, 1994), 22.

17. 参见 his interview in *Rossiiskie Vesti*, May 14, 1994; 收录于 Rybkin, *My obrecheny na soglasie*, 106.

18. 莫斯科的总统代表弗拉基米尔·科姆查多夫(Vladimir Komchatov)在 1994 年 2 月 20 日举行的新当选杜马代表的圆桌会议上发表的公开演讲中, 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作者旁听了该圆桌会议。

19. 参见作者与杜马代表、亚博卢集团的成员弗亚查斯拉夫·伊格如诺夫于 1994 年 8 月 1 日的访谈。

20. 参见作者与杜马代表弗拉基米尔·科瓦索夫(Vladimir Kvasov)于 1995 年 4 月的访谈。科瓦索夫是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办公厅前主任。

21. “Pravitel'stvo ego Prevoskhoditel'stva: Ne vse mogut'koroli,” *Izvestiya*, July 5, 1994, 5.

22. 切尔诺梅尔金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德烈·伊莱列奥诺夫(Andrei Illarionov)对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不偏不倚的描述和介绍, 参见 Leyla Bolton, “Money Oils Old Russian Mach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0, 1994, 2。盖达尔对这些(政策)变化的苛刻评价, 参见 Yegor Gaidar, “Novyi Kers,” *Izvestiya*, February 10, 1994, 1 and 4.

23. Chernomyrdin, 引自 Interfax, January 21, 1994, in *FBIS-SOV-94-015*, January 24.

24. Ivan Rybkin, “The Fifth State Duma,” *Moscow Times*, August 11, 1995, 8.

25. Thomas Remington, Steven Smith, and Moshe Haspel, “Decrees, Laws, and Inter-Branch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ost-Soviet Affairs* 14(1998):298.

26. Vladimir Ryzhkov, *Chetvertaya respublika: Ocherk politicheskoi istroii sovremennoi Rossii* (Moscow: Ad Marginem, 2000), 48.

27. Ibid. 帕里什(Parrish)引了高出很多的两年数字, 虽然这一数字可能包括非实体法令。参见 Scott Parrish, “Presidential Decree Power in the Second Russian Republic, 1993—1996 and Beyond,” in *Executive Decree Authority*, ed. John Carey and Matthew Shug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103.

28. Remington, Smith, and Haspel, “Decrees, Laws, and Inter-Branch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9. 参见作者与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费尔奥多夫于1998年3月25日的访谈。

30. Robert Sharle, "Reinventing the Russian State: Problems of Co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28(1995):779.

31. Pyotr Yudin and Thomas de Waal, "Amnesty Panic Reveals Chaos in Yeltsin's Ranks," *Moscow Times*, March 1, 1995, 3.

32. 参见作者与沙伊米耶夫的总统顾问雷菲尔·哈吉莫夫(Rafael Khakimov)于1998年5月的访谈。

33. 参见作者与总统行政机构分析中心的成员埃米尔·佩恩(Emil Pain)于1998年5月的访谈。佩恩宣称五个共和国已经停止支付联邦税。其他专家认为只有鞑靼斯坦和萨哈两个共和国。特雷斯曼(Treisman)更是笼统地宣称三分之一的次国家政府单方面减少了税收支付。参见 Daniel Treisman, "Fiscal Redistribution in a Fragile Federation: Moscow and the Regions in 1994,"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1998):185.

34. Zhanna Kas'yanenko, "Sovest'sud'i," *Sovetskaya Rossiya*, February 4, 1994, 4.

35. Gennady Zyuganov, "Vo imya otechestva, v interesakh naroda"(提交给1995年1月举行的俄共第三次大会的报告),收录于 V. A. Mal'tsev, ed., *Zyuganov o G. A. Zyuganove* (Perm', December 5, 1995), 142.

36. A. A. Sobyenin and V. G. Sukhovol'sky, *Demokratiy, organichennaya fal'sifikatsiyami: Vybory i referndumy v Rossii v 1991—1993 gg* (Moscow: Proektnaya gruppa po pravam cheloveka, 1995).

37. 只有由维克多·尤尔金(Viktor Tyul'kin)领导的极端共产主义组织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Russian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RKRП)试图挑战全民公决的结果,宣称政府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全民公决的法律。然而,这一挑战毫无结果。参见 "RKRП obrashchaetsya v sud," *Sovetskaya Rossiya*, January 27, 1994, 1.

38. 作者与一个不愿具名的“亚博卢”集团资深代表的座谈(1995年5月)。

39. Yevgeny Fochenkov, "Ne deistvuet zakon-Umiraet vlast," *Sovetskaya Rossiya*, January 11, 1994, 1.

40. Zyuganov, *Rossiya*, no. 40 (October 19—25, 1995), 引自 Sven Gunnar Simonsen, *Politics and personalities: Key Actors in the Russian Opposition*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ebruary 1996), 201.

41. Gennady Zyuganov, "Nashe delo pravoe," *Sovetskaya Rossiya*, June 23, 1994; 收录于 Mal'tsev, *Zyuganove*, 76.

42. 关于共产党支持宪法修改的声明,参见 Gennady Zyuganov, *Rossiya, Rodina, Narod! Mimeo*, 1996。除了来自俄罗斯选择叶利钦的支持者及其他支

持总统的小团体外,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反对修改宪法。

43. Pyotr Zhuravlev, "Duma prinyala Pervye popravki k Konstitutsii," *Segodnya*, June 22, 1995, 1.

44. Robert Moser, "The Impact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on Post-Communist Party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1993 Parliamentary Election," *Electoral Studies* 14(1995):377—398.

45. 关于这一评论,参见总统行政顾问安德烈·洛琴沃(Andrei Loginov), in Indira Dunaeva, "Proekt presidenta otvergnut," *Nezavisimaya Gazeta*, March 16, 1995, 1.

46. 参见对叶利钦的采访, *Time*, May 8, 1995, 38.

47. 有关创建这两个政党的努力,参见 Michael McFaul, *Russia between Election; What the 1995 December Elections Really Mean*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6)。有关选举制度与政党数量之间的关系,参见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 Barbara North and Robert North (New York: John Wiley, 1954)。

48. Olga Tarasova, "Prezidenta i deputatov razdelili proporsii," *Kommersant'-Daily*, February 14, 1995, 2.

49. 在1995年4月12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一个公开演讲中,总统顾问米哈伊尔·克拉诺夫(Mikhail Kranov)做出了这样的观点陈述,作者参加了这次演讲。

50. Veronika Kutsyllo, "Rossiiskim senatoram hertovski khochetsya porobatat," *Kommersant'-Daily*, May 5, 1995, 2.

51. "Zakon prinat v prezhnei redaktsii," *Rossiiskaya Gazeta*, May 12, 1995, 2.

52. Satarov,引自 *OMRI Daily Digest*, May 12, 1995.

53. 参见作者与联邦委员会会议员尤里·波尔迪列夫于1995年5月的访谈;同时,米珠琳娜的评论参见 Christian Loewe, "Council's fate with Yeltsin," *Moscow Tribune*, July 22, 1995, 2.

54. Yevgeny Yure, "Duma reshila provesti chlenov soveta federatsii cherez gornilo vyborov," *Kommersant'-Daily*, July 6, 1995, 3.

55. 参见对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采访, "They Are Going to Pursue Dangerous Policies," *Time*, January 31, 1994, 90; George Graham, "IMF Will Not Ease Stance on Moscow Cash Aid,"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7, 1994, 1; Leyla Boulton, "Chubais sounds Inflation Warning,"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3, 1994, 2.

56. Vladimir Mau, *Ekonomicheskaya reforma: skvoz'prizmu konstitutsii i*

politiki (Moscow; ad Marginem, 1999).

57. 参见作者与杜马代表弗拉基米尔·科泽米亚金于1994年7月24日的访谈。在访谈中,科泽米亚金列出了四名有经济才干的杜马代表名单。

58. 参见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和格奥尔吉·亚夫林斯基的评论,引自 Leonid Bershisky, "Parliament Rejects Yeltsin's Bank Chief," *Moscow Times*, November 24, 1994, 1.

59. Lev Markarevich, "Otkaz ot tak i nenachavshikhsya reform obrekaet Zakon o Tsentrobanke na medlennuyu smert'u," *Finansovye Izvestiya*, June 22, 1995, 4.

60. Gennady Zyuganov, "Vo imya zhizni, dostoinoi cheloveka," *Sovetskaya Rossiya*, October 27, 1994, 1.

61. John Thornhill, "Russia Fails to Liberalise Oil Export Trad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3, 1995, 3.

62. "Oleg Davidov: Povyshenie poshliny na import prodovol'stviya vygodno tol'ko agrariam," *Sgodnya*, May 16, 1995, 2.

63. 一般而言,总统制可能衍生出利益中介的社团性机构,而议会制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多元主义机构。参见 Juan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Juan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3—90; 以及 Philippe Schmitter,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Group,"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5(1992):422—449。

64. *Dnevnik zasedanii gosudartvennoi*, April-May 1994 (Moscow: Izdanie Gosudarstvennoi Dumy, 1994), 18.

65. "Vse stat'i kak na podbor," *Kommersant*, November 1, 1994, 8.

66. 俄罗斯农业党的代表与政府协商的时候提出政府投入翻倍的建议(128亿卢布),而政府只同意为春种划拨5.5亿卢布并在将来为农业财政实施1.5%特别增值税。参见 Leonid Bershidsky, "95 Budget Passes Key Hurdle in State Duma," *Moscow Times*, February 29, 1995, 1.

67. Petr Zhuravlev, "Byudzhets-95 prinat okonchatel'no," *Segodnya*, March 16, 1995, 1.

68. 引自 Leonid Bershidsky, "Budget: The Duma's Political Football," *Moscow Times*, January 31, 1994, 4.

69. Andrey Kounov, "Co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1998 Russian Economic Crisis,"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199.

70. 久加诺夫于1994年8月10日的演讲, in Mal'tsev, *Zyuganov o Zyuganove*, 88—89。

■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71. Zyuganov, in *Sovetskaya Rossiya*, October 24, 1995, 引自 Simonsen, *Politics and Personalities*, 206。

72. 投票得到了 212 名代表的支持。参见 *Dnevnik zasedanii gosudarstvennoi Dumy*, June-July 1994 (Moscow: Izdanie Gosudarstvennoi Dumy, 1994), 38。

73. Ryzhkov, *Chetvertaya respublika*, 49—50。

74. 这一设定议程的权力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总统的特权。参见 Terry Moe and William Howell, “Presidential Power of Unilateral Action,”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75. Alfred Kokh, “Gosudarstvo-prodovets,” in *Privatizatsiya Po-Rossiiski*, ed. Anatoly Chubais (Moscow: Vagrius, 1999), 248。

76. Juliet Johnson, *A Fistful of Rubles: The Rise and Fall of Russian Banking Syst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rystia Freeland, *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00)。

77. Freeland, *Sale of the Century*, 182—183。

78. Sector Capital, “Who Rules the Russian Economy?” (Moscow: Sector Capital, December 9, 1996), 11。按照多伊奇·摩根·格林菲尔 (Deutsche Morgan Grenfell) 的统计,米纳特普银行到 1996 年底为止控制了尤科斯公司 86% 的股票。参见 Deutsche Morgan Grenfell, *Russian Daily Report*, February 20, 1997, 2。

79. Andrew Palmer, “Darkness Rising,” *Business Russia*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February 1997, 5。

80. 久加诺夫在 1996 年 2 月 15 日的俄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收录于 *Informatsionnyi Byulleten'* (CPRF) 2 (February 20, 1996), 28。

81. 参见作者与佐卡尔茨耶夫的访谈。

82. Zyuganov, *Rossiia*, no. 40 (October 19—25, 1994), 引自 Simonsen, *Politics and Personalities*, 206。有关俄共随后接受私有产权的论述,参见 Mikhail Dmitriev, “Party Economic Programs and Implications,” in *Primer on Russia's 1999 Duma Elections*, ed. Michael McFaul, Nikolai Petrov, and Andrei Ryabov, with Elizabeth Reisch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 31—66。

83. 一位分析家把这部法典的通过称为俄罗斯过去四百年里最重要的立法行动。参见 A. Makovsky, “Novyi grazhdanskii kodeks Rf,” *Rossiia: Ekonomika, Politika* 1 (1995): 71。

84. Nikolai Obushenkov, “State Duma to Consider ‘Communist’ Land Code,” *Izvestiya*, July 14, 1995, 1, quoted in *What the Papers Say*, July 14, 1995, 3。

85. Konstantin Dushenov, "Russkaya ideya' v tiskakh demokratii," *Sovetskaya Rossiya*, January 29, 1994, 3.

86. I. Lavidenko and A. Portnov, "Model' antirazvitiya," *Sovetskaya Rossiya*, January 11, 1994, 3.

87. 参见作者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团成员瓦伦丁·库普茨索夫于1995年7月28日的访谈。在当时,他是党内仅次于久加诺夫的第二位最高级官员。

88. Linda Cook, *Labor and Liberalization: Trade Unions in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97), 74.

89. 参见作者与杜马议员、前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领导人伊格尔·克劳奇科夫于1995年5月的访谈。关于FNPR在1993年10月危机期间的活动的详细描述,参见Walter Connor, *Tattered Banners: Labor, Conflict, and Corporatism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129—135.

90. 参见作者与著名的独立工会联盟SOTSPROF的主席谢尔盖·赫拉莫夫(Sergei Khramov)于1995年8月2日的访谈。

91. "Aksioner ili rabochii," *Privatizatsiya*, vol. 1 (Moscow: Russko-Amerikanskii Fond Profsoyuznykh Issledovaniy o Obpocheniya, 1996), 18—25.

92. Zyuganov, "Vo imya otechestvo, v interesakh naroda," in Mal'tsev, ed., *Zyuganov i o G. A. Zyuganove*, 141.

93. 总统人权事务专员谢尔盖·科瓦列夫在2月20日国家杜马委员会上作证,他估计死于初次进攻的人数在1万到2.5万之间(作者当时列席该次会议)。

94. 10万这个数字来自Grigory Yavlinsky, "Where Is Russia Headed? An Uncertain Prognosis," *Journal of Democracy* 8(1997):4.

95. Ukaz Prezidenta No. 2166, "O nekotorykh merakh po ukrepleniyu Pravyoporyadka na Severnom Kavkaze," December 12, 1994.

96. Emil' Pain, "Da zdravstvuet revoliustiya," *Izvestiya*, February 7, 1995, 1 and 3.

97. 有关介入的决定和决定的后果,参见John Dunlop, *Russia Confronts Chechnya: Roots of a Separatist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atol Lieven, *Chechnya: Tombstone of Russian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arlotta Gall and Waal, *Chechnya: Calamity in the Caucasu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98. 鞑靼斯坦领导人没有正式承认俄罗斯宪法高于它自己的宪法,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挑战新政治秩序。

99. Fond Obshchestvennoe Mnenie (FOM),引自 *Segodnya*, January 28, 1995, 3。这些数字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不变。FOM在1995年秋天主持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10%的人支持介入,而69%的人反对。Fond Obshchestvennoe Mnenie, *Obshchestvennoe mnenie nakanune vyborov-95*, 3 (Moscow, October

25, 1995), 15.

100. Vserossiiskii Tsentri Izucheniya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VTsIOM) poll, 引自 *Segodnya*, January 17, 1995, 2.

101. 有关行动合法性的一般性辩论, 参见 Robert Sharlet, "Transi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Second Russian Republic,"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4 (1996): 495—521.

102. Aleksandr Sobyenin and Eduard Gelman, "Yanvarskie (1995) goslosovaniya deputatov gosudarstvennoi dumy: Byudzhet i chechenskii krizis" (Moscow, 1995), 1.

103. 正如《明天》(*Zavtra*) 头条报道, "俄罗斯军队的敌人不是车臣, 而是民主党人"。 *Zavtra* 2 (January 1995): 1.

104. Postanovlenie Plenuma Tsentral'nogo Komitet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Rossiiskoi Federatsii, "Ob otnoshenii CPRF k konfliktu s Chenchnei," 收录于 *Informatsionnyi byulleten'* (CPRF) 1 (January 15, 1996): 23.

105. *Gosudarstvennaya Duma; Stenogramma zasedanii* 111 (June 16, 1995): 15.

106. 一些言论上的少数派把这些官员的去职看作是一次失败。日里诺夫斯基严厉斥责把这些官员解职的决定, 并且赞扬了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和总统贴身保镖科尔扎科夫(Korzhakov)为车臣战争所做的贡献。他因为这次战争而谴责西方, 指出西方正在致力于摧毁俄罗斯。最稀奇的是, 他宣称叶利钦不再清楚将要发生什么, 因为西方情报机构已遥控总统的大脑。日里诺夫斯基的新闻发布会, 1995年6月21日(作者参加了这次记者招待会)。

107. 参见叶利钦接受记者的采访, *Komsomolskaya Pravda*, August 19, 1995, 1—2。转引自 *What the Papers Say*, August 21, 1995, 13。

108. 例如, 列别德(Lebed)预测车臣战争会导致现政权的崩溃和另一次革命。参见亚历山大·列别德接受记者的采访, *Rossiia: Ekonomika, Politika* 1 (1995): 51。

109. 参见作者与谢尔盖·费尔奥多夫的访谈, *ibid.*, 50页。

110. 一个相似争论的例子发生在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身上。英国政治制度没有因争论而崩溃, 但法国政体却将近崩溃, 葡萄牙专制政权因殖民地争论而分崩离析。俄罗斯的例子与法国相近但肯定和葡萄牙不一样。

111. Rybkin, "Fifth State Duma."

112. 虽然他们的文章覆盖时期不仅包括了1994—1995年, 而且包括了接下来杜马任期的第一年, 但是雷明顿、史密斯和哈斯佩尔指出联邦委员会在这三年期间否决了杜马通过的178部法律(26.3%), 而总统否决了198部(29.2%)。参见 Remington, Smith, and Haspel, "Decrees, Laws, and Inter-Branch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13. *Ibid.*

第八章

过渡中的选举政治

在1993年10月使用武力打败了对手以后，叶利钦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他有实力和决心实现他的目标。在清晰表达了他的力量和意愿的信号发出以后，他向其他政治精英和俄罗斯人民提出了一个组织俄罗斯政治的新制度设计。叶利钦的敌人和广大人民不得不决定，是承认还是拒绝承认这一套新的政治规则呢？叶利钦让他们尽快做决定，他在摧毁旧秩序仅两个月后提议进行新选举并对宪法进行一次全民公决。

接受或拒绝这些新规则的决定受到俄罗斯国内新权力平衡的影响。当时，这一平衡显得急剧向叶利钦倾斜；人们的确担心那些拒绝承认新规则的人会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受尽折磨。那些拒绝承认新规则的人也有被边缘化和淘汰的风险。反对解散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家和政治组织如今不得不计算，他们是要在叶利钦用暴力行动建立的政治制度中表达反对意见，还是最好完全不参加叶利钦的制度。作为一项战术性的行动，一些人极力主张短期内参加，以此为今后的对抗作准备。另外一些人认为，短期内任何形式的加入行动都有利于叶利钦政权的合法化而因此宽恕他的行为。

即使在那时受限制的情况下，叶利钦的对手也有选择他提出的新政治规则的机会。那时，几乎没有人相信，叶利钦用法令强制实施的解决宪法僵局的办法会长久存在下去。仅是叶利钦最新的制度创新不会使政治对立消失。相反，他的新超级总统制保证会助长而不是化解冲突。一些

人预言会发生内战,其他人则预计会出现法西斯主义。¹此外,叶利钦在十月事件之后比此前更有势力,这一看法被越传越神。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叶利钦竭尽所能聚集用于驱逐守卫白宫者的武装力量。俄罗斯其他部分军队的政治态度仍不得而知。当时叶利钦也仅仅得到大众不温不火的支持。虽然一些民意调查宣称大多数人称赞炮轰白宫,但随后议会的选举结果显示,大多数选民对叶利钦和他的盟友表示了不满。最后,几乎没有任何地方领导人公开支持叶利钦使用武力的决定。

在这些情况下,反对叶利钦新制度设计的政治反对联盟可能会挫败总统的新规则和总统本人。例如,如果大多数俄罗斯地方领导人服从鞑靼斯坦总统沙伊米耶夫的领导,组织一次宪法公决的抵制行动,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或者,如果那些反对叶利钦解散议会的人决定不参加选举,而是从制度外向他的新规则挑战,那又会怎样呢?

然而,这些冲突没有发生。相反,俄罗斯主要的政治家同意参加1993年和1995年的议会选举,更为重要的是参加1996年的总统选举。即使是叶利钦,这个最有能力违反选举法的人,也承认新制度的含糊不清,并把他的权力交付给1996年全民公决。随着利益随时间推移而增加,俄罗斯民众也参加了这些选举。化解争端的因素与把选举作为唯一可取的游戏的因素同样重要的是,所有重要政治家都承认了这些选举结果合法(虽然并不一定自由和公正)并接受了选举结果产生的政治后果。这三次全国选举的顺利完成依次抬高了将来违反选举过程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在1999年和2000年下一个选举轮次中,对取消或推迟选举的担心将不再成为一个需要进行严肃讨论的话题。

为什么俄罗斯所有主要政治家承认选举过程呢?这一章提出的解释基于三个方面。首先,在最初两个阶段阻碍新政治制度出现的因素在第三阶段已经不太明显。从1985年到1993年,改革的争议问题已经少了很多。1993年的边界问题已不再讨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争论的强度已经削弱。叶利钦在1993年10月的胜利使得市场改革者占了上风。具有更普遍意义的是,市场作用的时间越长,它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加入市场的人数增加(并最终得益),共产主义复兴的可能性就越小。俄罗斯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以后并没有度

过不再回到共产主义的关口。相反,在1993年和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号召清算市场并回到苏联的计划经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持上述观点的人越来越少。

1993年10月以后,政体的组织形式成为改革进程中唯一明显有争议的问题。1993年10月以后,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因为出现了第二个新因素——对立政治力量的权力平衡清晰了。在前两次政治设计中(1985—1991年和1991—1993年),政治对手之间的权力分配相对平等但也不很精确。这种平衡和含糊不清助长了冲突。这一新情况容许叶利钦为最终的改革进程指定一个解决办法。1993年秋,僵持的结果给予了叶利钦勾画一个解决办法的权力,这使不同的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要么合作,要么不合作。在最初些许犹豫消除以后,大多数人因担心不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而承认了他的规则。

范围缩小了的改革进程和有利于叶利钦的权力分配被更好地理解,这能解释新的一套选举规则会在1993年秋天出现。然而,仅仅关注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选举会成为在俄罗斯取得权力的唯一合法和公认的途径。为了解释它们的伸缩性,这需把第三个因素——路径依赖——引入分析。简而言之,这些新政治规则存续下来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发现遵守这些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拒绝承认新规则的代价比承认它们的代价要大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拒绝承认的代价会增大。叶利钦的选举规则在当初起草和提出的时候仅仅是为叶利钦服务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这些规则似乎也可能在为叶利钦的敌人服务。当叶利钦的对手在1993年和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表现得格外出色的时候,这些强劲的选举表现促使他们遵守选举程序。1993年和1995年的选举结果也使权力平衡向反对力量倾斜,叶利钦和他的盟友要抛弃选举程序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了。1993年以后,叶利钦及其盟友的势力并不强大,他们甚至不能修改选举规则而使之有利于他们。1993年和1995年两次更迭选举以后,从选举程序中得益的联盟变得比没有从选举中得益的联盟更为强大。选举过程中的这一庞大同盟的参与,反过来增加了以其他方式取得权力的代价。

承认选举程序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1993年选举开始了把一个偶

然产生的、只为少数人承认的规则转化为大多数人认可的更加稳定的政治惯例的过程。然而,从1993年到1996年总统选举,信守这些规则的前景依然模糊不清,存在偶然性。1996年以后的选举成为常规事件,但俄罗斯第二共和国创建之后的头三次选举仍有许多临时的性质。这一章通过简单讨论这三次选举——1993年、1995年和1996年——来阐述作为俄罗斯政治制度特征的选举政治(electoralism)的演变。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解释这些选举结果的实质,而是解释为什么参加者同意进行选举游戏。然而,这些选举结果构成了这些有关制度稳定的解释的核心成分,因此讨论都将在这一背景下进行。

1993 年 选 举

1993年10月还不能确定谁会参加,谁被允许参加,不同政治团体会怎样决定参加选举。反对党不得不进行最重大的战略行动,因为不参加这些选举的决定会对新政治秩序的制度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矛盾的是,俄罗斯改革派做出的如何参加选举的决定,也对新政体的制度化产生实实在在的后果。民主派人士做出的以几个政党分开参加而不是以一个联合团体参加选举的决定,使人产生了反对派会赢得1993年选举一边倒胜利的印象。这次选举游戏的胜利有利于反对党参与新政治制度。

共产主义的分裂

共产党领导人对是否参加议会选举和宪法公决最为头痛。²叶利钦对议会的挑衅意在摧毁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同时,叶利钦迅速撤销了对俄联邦共产党的禁令,迫使共产党领导人就参选问题做出选择。共产党领导人相信这些选举不是自由和公正的,然而,如果他们决定不参加,他们会冒继续与叶利钦政权作对的风险,如果其他党派跟进填补议会中反对党的空缺,他们也会有政治上湮没无闻的风险。最终,不同的共产党领导人和组织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从属于劳动俄罗斯组织及其领导人维克多·安皮罗夫的激进共产党领导人和组织决定抵制1993年选举。在他们看来,叶利钦政权是一个军事小团体,新宪法仅认可独裁规则;因此,参加这种选举就有了问题。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反而发誓要进入地下与资本主义专制作斗争,就像他们政党的英雄在70年前所做的那样。

国内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则是另一种想法。为了回应1400号总统令,久加诺夫和其他领导人起初支持保卫白宫和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的新政府,把叶利钦的行动称为政变。随着僵持的继续进行,保卫白宫的部队变得愈发激进,久加诺夫和他的政党与白宫保卫保持了一定距离。在武装冲突发生前几天,俄共领导层决定从僵持中脱身并反过来敦促双方避免公开冲突。十月事件以后,久加诺夫甚至谴责这些参与暴力的白宫保卫者,把他们称为“极端革命者”³。久加诺夫相信鲁茨科伊和他请来保卫白宫的极端主义分子向往暴力,并有可能像叶利钦那样毁灭俄罗斯。⁴

十月事件以后,久加诺夫最害怕与叶利钦发生另一场冲突。新形成的叶利钦和他的敌人之间的国内权力平衡,对久加诺夫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年以来,他的政党两次被禁,党内一些人相信他们正处在灭亡的边缘。⁵地方上的领导人纷纷退党,以获得莫斯科毋庸置疑的新统治者的支持,而其他一些领导人则分别参加了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为了制止这种涣散状况,久加诺夫采取了非对抗政策,并提议参加议会选举。⁶

参加议会选举的理由有许多。成为一个议会党团会给俄共在政府权力结构中留下一个立足之地。正如久加诺夫后来所说的,参加这次选举的决定对共产党来说是“近一段时期以来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决定”,因为它指出了一条避免灭亡的道路。⁷在实际运作上,像办公室、传真和复印机、轿车和免费在全国旅行这样的物质资源也与这些席位相联——这些资源能被用来重建政党。久加诺夫也解释道,强大的对抗性竞选会向政党的忠实追随者显示他们正通过议会途径坚持不懈地与叶利钦邪恶政权作斗争。⁸最后,俄共几个领导人认为,他们留在制度内作为一个反对党会比在制度外去推翻制度要更有效些。⁹虽然他们认识到新杜马的权力十分

有限,但是他们解释道,有些权力总比没有权力要好得多。俄共内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久加诺夫对得失的计算。正统共产主义者认为,参加选举会使叶利钦 1993 年 10 月的进攻和他的新专制政权具有合法性。然而,在 1993 年 10 月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俄共压倒性地通过了参加议会选举的决定。¹⁰同时,共产党也投票支持叶利钦的新宪法。

民族主义者的默认和拒绝

民族主义领导人和组织也不得不就参加叶利钦的选举是否会增加他的行动的合法性做出决定。大多数人找到了参加的理由。民族主义理论家,比如被查禁的《白天报》(*Den'*)编辑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Aleksandr Prokhanov),认为叶利钦莽撞的行动实际上巩固了他们的长期议程。虽然他们在战斗中失败了,但普罗哈诺夫相信他们会赢得战争,因为叶利钦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习性正是这些政治思想家所梦寐以求的。¹¹同样,另一个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想家谢尔盖·库尔琴延(Sergei Kurginyan)在 1993 年选举过后宣称,叶利钦、日里诺夫斯基、鲁茨科伊在政治上的差别已微乎其微。¹²1993 年 10 月反对叶利钦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想参加 1993 年 12 月的选举,包括谢尔盖·巴布林、米哈伊尔·阿斯塔费耶夫和维克多·阿克修切茨。¹³只有那些最极端的民族主义组织,例如法西斯组织俄罗斯民族联盟(Russian National Union),一起抵制了选举。甚至 1993 年 10 月抵抗的主要组织者、救国阵线创始人之一的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在回顾往事时认为,叶利钦 10 月的断然行动推进了反对派要建立一个强大俄罗斯国家的目标。¹⁴1993 年,康斯坦丁诺夫拒绝参加选举,因为他认为参加选举就等于承认叶利钦专制政权的合法性。然而 1993 年选举之后,他改变了他的看法,并在 1995 年选举中成为候选人。

参加选举的战术决定不能等同于对民主原则的战略承认。在竞选期间及之后,许多人产生疑问,这些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他们掌权之后是否会继续按照相同的民主规则行事。希特勒作为一个历史隐喻解释了新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参加选举的原因,日里诺夫斯基没有反对这一比方。¹⁵当时日里诺夫斯基的许多声明和讲话实际上暗示,他不是民主主义者,而仅仅是把这些选举看作通向专制权力的一种方式。¹⁶与此同

时,民族主义者做出参加这些选举的短期决策暂时瓦解了宪法外对新政治秩序的挑战。小规模的革命民兵和反政府组织继续开会、训练和组织。然而绝大多数民族主义领导人和组织都决定参加选举游戏。第三次战斗的代价太大了,而参加选举的收益无论多么小仍是切实存在的。

分裂了的民主主义者

对支持叶利钦的政治家和政治组织而言,做出参加1993年选举的决定是很容易的。1993年10月僵持过后,叶利钦的支持者立刻开始准备议会选举,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会赢得大多数选票。如何参加选举的决定则要困难得多。最终,形成一个改革派、亲叶利钦的联合阵线被证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权力平衡已向有利于他们倾斜的看法,实际上分裂了俄罗斯改革派的力量。俄罗斯的民主力量不再因害怕共产党复兴而联合起来,他们相信他们能奢侈地分别组织政党参加竞选。

俄罗斯选择这个亲政府的联盟曾希望把所有民主派政党联合在一个选举集团里,但是他们失败了。副总理谢尔盖·沙赫赖不但拒绝参加,反而组织了他自己的新政党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虽然沙赫赖明确支持叶利钦,但是他想在政治认同上标榜自己是独立于盖达尔和俄罗斯选择的自由派,因为他把12月选举看作他参加总统选举的踏脚石。¹⁷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是另一个忠于叶利钦和自由派改革的政治组织,它拒绝参加俄罗斯选择。由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和前莫斯科市长盖夫里尔·波波夫领导的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在意识形态上与俄罗斯选择毫无差别。¹⁸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领导人仅想利用他们的政党名单获得杜马席位,他们相信他们会毫无困难地通过5%的门槛。

最终建立了亚博卢的政治领导人和团体组成了最后一个自由、民主改革派组织,它在1993年的选举中独立于并反对俄罗斯选择。与俄罗斯选择和俄罗斯自由民主改革运动相比,亚博卢领导人作为叶利钦政权的批评者更受到信任。因此,参加这些选举的决定对亚博卢而言是一个比其他“改革派”选举集团严肃得多的决定。亚博卢背后的政治领导人和牵线人是以起草500天计划而著称的经济学家格利戈里·亚夫林斯基。在1991年秋天,叶利钦曾考虑任命亚夫林斯基为他的总理。当叶利钦选择

了盖达尔和他的班子时,亚夫林斯基成为“休克疗法”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由于他具有成为叶利钦政府的民主主义反对派领导人的能力,亚夫林斯基在未来领导人的全国评分上渐渐而稳定地攀升。¹⁹

十月事件对亚夫林斯基和他的伙伴提出了一个挑战。一方面,亚夫林斯基公开谴责叶利钦炮轰议会的决定。在他看来,妥协是能够达成的。²⁰ 亚夫林斯基也拒绝承认叶利钦的新宪法,在他看来,新宪法为实施独裁统治创造了条件。同时,亚夫林斯基不想抵制议会选举,因为他想用选举来启动他已经停滞不前的政治生涯,他不想失去这个机会。然而,亚夫林斯基发誓不与亲政府集团俄罗斯选择联合,相反,他与尤里·波尔迪列夫(Yuri Boldyrev)和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一道成立了一个新政治组织亚博卢。²¹ 俄罗斯共和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三个政党的大部分也加入了亚夫林斯基的集团,这使得亚博卢成为俄罗斯选择在俄罗斯政治图谱中改革派和自由派一边最严肃的挑战者。

1993 年的选举结果

在 1993 年议会选举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认定俄罗斯选择会获胜,并且改革派政党将获得两院的多数。由于有这些期望,日里诺夫斯基的强劲表现震惊了每一个人。虽然在开始选举之前的民意测验中,日里诺夫斯基和他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小于 1%,但这一恶毒的民族主义政党几乎获取了杜马选举比例代表制中四分之一的选票(见表 8.1)。

表 8.1 1993 年议会选举结果

选举集团	公众投票百分比
俄罗斯农业党	8.0
亚博卢	7.9
俄罗斯未来—新名字(Future of Russia-New Names) ^a	1.3
俄罗斯选举(盖达尔)	15.5
公民联盟 ^a	1.9
俄罗斯民主党	5.5
高尚与博爱(Dignity and Charity) ^a	0.7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2.4

(续表)

选举集团	公众投票百分比
建设性生态运动(Constructive Ecological Movement) ^a	0.8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22.9
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	6.7
俄罗斯妇女(Women of Russia)	8.1
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 ^a	4.1

注释:a 没有达到经比例代表制获得议席所需的5%票数的标准。

他通过不停喷涌出恶毒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词汇赢得了选举。这把俄罗斯政府和世界吓坏了。具有嘲讽意味的是,选举政治看上去产生了一个新的反制度力量。

粗看下来,1993年选举结果表明,反对派势力获得了巨大收获。俄罗斯第一次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选举——在许多方面,像是俄罗斯的奠基选举——看上去好像是一次反对革命的选举。然而,再仔细地考察一下结果又会表明,社会上对叶利钦政权的支持和反对在1993年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支持革命性变迁的民众与反对的民众以相对平均的比例维持着极化对立的状态。

至于宪法公决——一场只有两个选项的投票——选民好像恰好也分裂了,正如先前的二元投票中的情况(见表8.2)。

表 8.2 二元投票:1991年6月总统选举与1993年4月和12月的全民公决
单位:%

改革派得票(亲叶利钦)	反对派得票	
1991年6月	59.7	40.3
1993年4月	58.7	39.3
1993年12月	58.4	41.6

资料来源:1991年6月,投票者被分为那些支持叶利钦的人对那些支持其他所有候选人的人。1993年4月的结果来自全民公决中的第一个问题“你是否信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3年12月的结果来自宪法公决。

同样,如果有人把政党投票人分为亲改革和反改革集团(俄罗斯选择、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亚博卢、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妇女为一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农业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为另

一方),结果会成为 47.8 对 43.3。这一百分比与 1993 年 4 月的全民公决或 1993 年宪法投票中对第二个问题的选民划分没有太大的不同。

认为自 1993 年 4 月以来(或者说从 1991 年 6 月以来)选民的总体偏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不表示选民安于现状。²² 1993 年 GNP 下降了 12%,最后一个季度的月通货膨胀率盘桓在 20%—25%,实际工资没有增加,实际汇率在第三季度末和第四季度初下跌。²³ 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选民感受到了这些结果。11 月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两千人中,31.5%的人认为俄罗斯的总体经济情况自 6 月以来变得“相当糟糕”,而有 30%的人认为经济情况“有点糟糕”,只有 8.5%的人觉得有所改善。²⁴ 同时,对改革的总体支持率和反对率保持相对稳定。同一调查显示 45.9%的受调查者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俄罗斯的一条正确道路,而只有 27.4%的人看法相反。²⁵ 同样,这次调查显示 44.5%的人支持私有化,而只有 34.5%的人反对把国家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中。²⁶

然而,1993 年的议会选举在力量平衡上显现出剧烈变化。最重要的是,塑造 1993 年选举结果的制度与先前的制度有极大的不同。组织 1993 年 12 月宪法公决的规则与那些塑造先前二选一表决——比如 1993 年 4 月的公决和 1991 年的总统选举——的规则十分相似。这三次选举的结果也十分相似,表明当选民被迫投票支持或反对叶利钦和他的改革政策时,选民的偏好在这一阶段相对稳定。然而,在 1993 年杜马选举中,选民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并能表达更细致的偏好。在竞选中,俄罗斯选择故意制造一种 12 月的投票中只有两种选择的感觉:投票赞成改革(俄罗斯选择)或是投票反对改革(其他党派)。然而,这种战略失败了。相反,这种多元选择的投票超越了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模式,正如日里诺夫斯基惊人的表现所生动展现的那样。

改革派集团内部的分裂也改变了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认识。俄罗斯选择获得的 15%的选票比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的 23%的选票要少得多,但是总共四个拥护改革的政党(俄罗斯选择,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亚博卢和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加起来的 34%要远远多于自由民主党的 23%,毫无疑问,投票类型从二选一的公民投票转向多选一的政党选举,这极大地影响了对议会选举的认识和实际结果。

俄罗斯的新选举制度既塑造了实际结果,也塑造了人们对结果的感知。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叶利钦的议会选举令规定,50%的杜马席位由比例代表制分配。因为比例代表制的选区是整个国家,这一制度降低了地方组织的重要性,增加了由一个富有魅力的领袖主导的政党的选举机会。这些条件帮助了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妨碍了俄罗斯选择和其他改革派政党。²⁷新选举制度的设计者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相反,他们之所以极力推行比例代表制,是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派政党会控制比例代表制的选票。相形之下,纯粹的单一议席选举制会使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它只赢得了5个单一议席选区的席位。

大多数解释1993年选举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选举获胜上,因此得出选举是俄罗斯民主巩固的障碍这一结论。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反映了当时许多著作的观点(包括这个作者自己),他写道:“1993年12月的选举成为俄罗斯民主无法否认的障碍。”²⁸其他人评论道,投向日里诺夫斯基的选票不仅仅是反对经济改革的抗议票,而且也是反对所有制度内政党的投票。²⁹作为一个好斗的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公开赞成反制度的目标,并威胁要使用反制度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日里诺夫斯基没有缩小改革的争论议程,相反,他还想增加争论的新角度。一个替代性的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现在出现了,许多西方观察家同意查尔斯·费尔班克(Charles Fairbank)的说法,他在1994年春写到“法西斯主义的许多先决条件正在或将要在俄罗斯呈现”³⁰。他的胜利也刺激了其他反对组织(首先包括了俄共)保持他们好斗的观点。在日里诺夫斯基瞠目结舌的胜利之后,许多人士预测上一年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制度僵局将会重现。³¹一些人甚至预言会出现专制统治或内战。³²

然而,对叶利钦而言,1993年最重要的选举不是杜马的比例代表制投票,而是新宪法的全民公决。叶利钦及其盟友把新宪法的批准理解为在法律上使出现于10月的权力平衡变化实现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在秋天选季的唯一一次公开讲演中,叶利钦敦促选民支持新宪法。全国电视网收到指示,播放支持宪法的“公开声明”。叶利钦政府的官员威胁要禁止那些批评宪法草案的政党。克里姆林宫当局也向地方领导人发出了总

统对公决所抱希望的精确指示。³³ 这场胡萝卜和大棒的战役十分成功。在公决中,58.4%的人支持新宪法,而41.2%的人反对。据报道参选率达到了54.8%,这确保了公决的有效性,即使一些人包括一些来自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政党代表宣称参选率被叶利钦政府过分夸大了。³⁴ 作假的指控使公决投票的有效性暗淡无光,这促使几个观察家断言这些选举比之前的选举更不自由和公正。尽管存在这些可靠的指控,但没有人想挑战宪法公决的结果。无论有怎样的缺陷,每个人都对建立某些新游戏规则而不是根本没有规则感兴趣。³⁵ 全民公决与议会选举同时举行的决定也是一种战术上的胜利,因为如果宪法公决无效,那么潜在的挑战者也会有所损失——失去他们的新议席。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公决的结果。好斗的共产党组织把程序贬为不合宪法的,并发誓要恢复旧宪法。车臣领导人根本不允许在车臣举行公决。在鞑靼斯坦,沙伊米耶夫总统没有取消选举,但以一种不确定的言辞表示他不想让人参加,这一建议导致了13.8%的参选率。³⁶ 公决总共在联邦的13个地区失败了。³⁷ 甚至那些在杜马取得了议席的政党和个人仍质疑新宪法的合法性。然而,这些批评者通过参加选举和按照这些选举结果组成议会的行动使新规则合法化。

抛开对新宪法合法性的狭小关注不谈,举行这些选举的事实有利于巩固俄罗斯的新政治实践。在1993年10月军事对峙过后不久,大多数人相信俄罗斯会迅速成为一个专制国家。12月选举的举行——后共产主义时代俄罗斯的第一次选举——是为了推倒这一俄罗斯不可避免走向独裁的断言。英国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的公共舆论调查显示,“在选举期间认为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人数戏剧性地增加了20%。这一数字上升最明显地出现在反对派选民中”³⁸。在10月震动之后,人们慢慢开始再次相信选举事关重大。

1995年议会选举:变化中的平衡,持久的规则

在1993年和1995年议会选举之间的过渡时期,正如前一章所讨论

的,所有主要政治家遵守宪法中有关行政—立法之间关系的规定。虽然这些新规则在一些方面看起来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在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最初两年中,它们没有受到宪法外的挑战。在同一时期,对手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也缩小了。到1995年选举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或政党公开支持使用武力重新统一苏联。有关俄罗斯所需经济类型的争论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只有最激进的共产党领导人仍极力主张回到苏联的计划经济。至于政治制度,大多数政治家公开保证支持民主和选举作为选择政府领导人的唯一合法途径。

反对势力特别热心支持民主原则,因为他们相信选举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获权力的机会。在1993年和1995年之间,反对派领导人和政权领导人都认为公众支持的平衡已明显有利于反对派。经济萧条、犯罪增加和车臣灾难性的战争这三者的强大结合,已把公共舆论转向反对叶利钦政府及其改革派盟友。选举为反对派组织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能够把这种公众的不同意见转化为政治权力。在这两年里,俄共采取了几个战略性步骤,以取代日里诺夫斯基和他的自由民主党而成为俄罗斯处于领导地位的反对党。俄共的重新崛起使共产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重新展开竞争。特别是1995年议会选举过后,共产主义运动看上去比以往任何选举期都要来得强大。叶利钦的规则正在加强他的政治反对派。

混乱中的民主派

俄罗斯民主派以一种分裂、无组织、精疲力竭的形象蹒跚进入1995年议会选举。在1995年之前,俄罗斯改革力量分裂过几次,但是1993年至1995年间发生的分裂特别具有破坏性。1993年选举给俄罗斯改革力量,特别是俄罗斯选择[在1994年更名为俄罗斯民主选择(Democratic Choice of Russia, DVR)]一记重击。为了避免1995年再次失败,许多人号召俄罗斯民主力量形成新的联合。由于魏玛德国的阴影萦绕心头,俄罗斯民主主义的几个领导人倡议建立一个新的联合阵线,以此作为打败俄罗斯日益成长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唯一方法。³⁹虽然叶戈尔·盖达尔忙着创建他自己的新政党俄罗斯民主选择,但是,他也成为这一联合阵线策略的最主要倡议者。盖达尔公开宣布他愿意联合亚夫林斯基,默认亚

夫林斯基作为联合民主阵线的总统候选人。⁴⁰叶利钦干涉车臣的决定为民主人士的联合提供了一个潜在催化剂。盖达尔和亚夫林斯基立即对于涉行动进行了批评,这助长了形成新的民主反对派的期望。

对盖达尔而言,他对战争的批评在短期内对他自己的政党组织是有害的。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退出了俄罗斯选择,并对盖达尔没有支持总统感到十分愤怒。百万富翁、盖达尔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副主席奥利格·博伊科(Oleg Boyko)也不同意盖达尔对政府的批评。由于博伊科的主要商业利益与叶利钦政权有着紧密联系,他不能承受处于反对地位的代价。超过12个俄罗斯选择的杜马代表退出政党,以回应盖达尔对战争的批评。对战争的意见不一也是俄罗斯民主选择没有与我们的家园——俄罗斯(Our Home Is Russia)融合的原因,这一新党派力量由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牵头。⁴¹

但是,车臣问题没有推动俄罗斯自由派实现力量联合。亚夫林斯基没有赞成联合,相反,他还故意与盖达尔及其俄罗斯民主选择保持距离。他认为,他们因经济改革计划的失败和1993年10月明确支持叶利钦使用武力反对议会而处于危险的境地。不仅反对联合,亚夫林斯基还倡议形成一个新的“民主反对派”联合,它既反对过去的苏联也反对现在的专制政府。他估计到若与名誉扫地的盖达尔结成同盟,他便会失去大众的支持。⁴²亚夫林斯基指出:“民意测验显示,如果我加入盖达尔先生的行列,我会失去46%的选票。”⁴³

但是,到1995年夏,亚博卢只是仅有的几个背离联合意见的组织之一。在1995年选举的日子日益临近之际,民主改革阵营的几个领导人决定建立他们自己的选举集团,并独立参加竞选。到1995年选举登记截止时,许多政党争夺改革派选票;其中的8个直接脱胎于俄罗斯选择,而令人吃惊的是,有20个选举集团是从原来的民主俄罗斯运动中脱颖而出的。

创建新执政党

在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之后,叶利钦的顾问们相信,有必要创建一个政治上支持政府和总统的新的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一基础必须超越

传统的民主派,而要把那些在旧名录中支持现状的人、先前不参与政治的企业家、老公民团体领导人包括进来。车臣战争后,这一看法得到了更大的推动,当时除了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之外没有一个议会党派公开支持总统的决定。此后不久,副总理谢尔盖·沙赫赖和总统顾问格里尔吉·萨塔罗夫开始号召组建两个新的中间派政党——一个为中右、一个为中左——它们将会联合几个小一些的政治组织,把政治光谱两边的激进势力推向边缘,并确保1995年议会选举之后政府的持续性。正如切尔诺梅尔金1995年4月在宣布集团成立的时候所解释的,“为了不让极端分子赢得下一届选举并有可能组织一个基于杜马多数席位的政府,我要建立一个强势的选举集团”⁴⁴。按照萨塔罗夫的话来说,克里姆林宫有意建立一个新组织而不是扩充既有组织这一策略,是要“在政治上重新洗牌”⁴⁵。

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把政府的全部力量押在了他的新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上。除了少数几个重要人物,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大多数官员参加了这个政党,大多数地方行政领导人要么与集团合作,要么表示要与新党团结一致。最重要的是,叶利钦公开支持两党制,并在切尔诺梅尔金宣布他的党派成立的时候向他表示祝贺。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被迅速贴上了新的亲政府或“执政党”的标签。⁴⁶

从1995年4月创立到1995年9月候选人登记,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发生了几次衰变。首先,车臣战争后组建的亲政府的议会党团在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中被边缘化,迫使这些刚刚产生的党团中的数十个杜马代表去独立参加单一选区的竞选,他们通常是反对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其次,在几个地方领导人贬低沙赫赖的联邦政策、认为其彻底失败之后,切尔诺梅尔金最终抛弃了长期以来政府中的同事和支持者谢尔盖·沙赫赖。作为回应,沙赫赖指责党内的专制主义倾向,并组织了一个地方领导人的新政治联盟。第三,在1995年8月斯韦德洛夫斯克州的州长选举中,爱德华·罗塞尔(Eduard Rossel)在二选一的选举中击败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候选人阿列克谢·斯特拉霍夫(Aleksei Strakhov),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输掉了第一场重要的选举考试。在我们的家园输掉这次选举之后,几个地方领导人暗暗地与新政党保持一定的距离。叶利钦本人

与我们的家园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该集团的领导人起初与叶利钦的班子协调行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变得更加疏远。在1995年秋季选举中,叶利钦及其班子没有支持该选举集团的候选人。

由杜马主席伊万·里布金领导的亲政府的中左政党从来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由于里布金说服了支持者支持他以反对党的形象参加竞选,因此,1995年春天叶利钦对里布金的支持拆散了党内脆弱的联盟。⁴⁷此后不久,几个重要的盟友,包括独立工会联合会人、短命的工业党(Industrial Party)和鲍里斯·格罗莫夫(Boris Gromov)将军,都抛弃了里布金。他们称这个组织对叶利钦过于忠诚。里布金自己的农业党也批评里布金,并因他过于亲叶利钦而将他逐出党的领导集体。当切尔诺梅尔金和里布金正宣称要巩固议会外的中间派势力的时候,现实中的中间派联盟已经瓦解了。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巩固

与改革派和中间派阵营形成鲜明对比,俄共在杜马选举的两年间歇期里经历了发展、联合和巩固。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对俄罗斯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来说,标志着一个困难的转折。在1993年12月,俄共党内的许多人仍然疑虑,他们是否应该参加被他们视为非法的叶利钦议会选举。1993年,俄共的未来似乎也很不确定。虽然农业党只是在1993年选举之前荫蔽于俄共而创立,但是,候选人和组织者的友好分化最初削弱了母党。对俄共构成沉重的心理打击的不只是俄共的破落,还有叶利钦在1993年10月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这使许多人相信作为一种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垃圾桶”⁴⁸。

在这些制约条件下,俄共领导人把他们1993年获得12%选票的表现称为一个令人惊奇的胜利,并为将来打下了一个稳定的选举基础。他们确实打下了这个基础。在1993年至1995年间,俄共投入了大量精力去重建和巩固一个在俄罗斯每个城市、乡镇、村庄和集体农庄都有代表的草根性政党。它的领导人把原本拨给俄共议会党团的资源用于议会之外的政党发展。俄共领导人最重要的是久加诺夫,使用他们杜马代表的旅行权广泛访问俄罗斯的广大地区。当改革者飞往巴黎和华盛顿的时候,共

共产党人乘火车去了库尔斯克和布尔扬斯克。这期间,俄共领导人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去结交新的社会团体,他们重新激活了共产党的青年一翼即共青团(Komsomol),加强了与工会以及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妇女团体的联系,甚至开始接触可能会从共产党领导下的“未定的”未来中得益的商人。⁴⁹在1993年至1995年之间的议会选举中,地方选举的成功进一步激励了全国范围的政党组织。

到1995年,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的俄共在俄罗斯没有竞争对手。俄共对现政权的不懈反对——无论怎样的政策问题——有助于把共产党树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当农业党和日里诺夫斯基经常与叶利钦和他的政府妥协的时候,俄共却没有这样做。受到他们在组织建设上的成功和社会主义者赢得东欧选举的激励,俄共领导人开始了他们的1995年选举战役,坚信他们会取代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而成为俄罗斯反对派的新领导。正如久加诺夫在听到瓦文萨在波兰总统选举中失败的消息之后所欢呼的,“横贯欧洲的左派运动也正在这里(俄罗斯)发生”⁵⁰。

民族主义重新洗牌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和他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1993年议会选举中获得近四分之一公众投票,他们似乎为俄罗斯政治光谱带来了激进民族主义生境,也是新的,第三种生境。日里诺夫斯基既批评过去的俄罗斯共产党,也批评现在的民主政府,他鼓吹一个民族主义的新未来。许多政治家和领导人回应了日里诺夫斯基对俄罗斯选情的解释,预测(并预备)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题将上升为俄罗斯政治的中心问题。

日里诺夫斯基利用他1993年摧枯拉朽一般的胜利为资本,建立了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地方支部网络,它在组织的广度和深度上仅次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日里诺夫斯基的政党组建了青年组织,出版了地方报纸,并像俄共一样以它在杜马的工作为基础向社会延伸。作为一个公众政治家,日里诺夫斯基盖过了所有的竞争者。要么在杜马讲坛上指责共济会(masons)和犹太人,要么在边远村庄对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密谋大吼大叫,日里诺夫斯基这样度过了在竞选的整个两年间歇期。他在俄罗斯广泛游历,也访问了苏联的传统盟友,诸如伊拉克和印度。在这

期间,日里诺夫斯基公开把无限的财政资源用于传播他的讲话(通过报纸和小册子)、他自己的演讲或用于自由民主党参加地方选举:自由民主党在政党发展上的巨大花费招致了许多人的质疑,即日里诺夫斯基是否暗中接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其前身是KGB)的资助。

日里诺夫斯基的不断亮相对政党成长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结果。他在议会中滑稽和粗鲁的举止(包括拳击一位女代表,这在全国电视上被播出)玷污了他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救世主的形象。自由民主党两年的议会表现也使那些叶利钦政权的反对者感到迷惑。虽然日里诺夫斯基及其同伴经常在改善社会福利问题上联合共产党和农民党,但是他也支持政府的预算并支持叶利钦进驻车臣的决定。此外,从他的立法成果来看,日里诺夫斯基不会(或没有)履行任何他的竞选承诺,这造就了夸夸其谈、只说不做的形象。

日里诺夫斯基的政治前途似乎特别受到1995年议会选举前奏时出现和再现的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威胁,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将军。列别德最初获得的名声是因为他使摩尔多瓦饱受战争创伤的外德涅斯特地区恢复和平。无论是事实还是杜撰,公众认为列别德使该地区免于内战。在他的军队中,列别德具有了传奇式的地位。在他们看来,他具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大脑和阿诺德·施瓦辛格的体格”⁵¹。然而,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于1995年春把他贬为十四军司令之后,列别德即刻作为受害者而成为一个更有名的公众人物。列别德没有担任这一职务,而是选择从军队中辞职,搬到莫斯科成为俄罗斯社区协会(Congress of Russian Communities, KRO)的副主席,与军事工业家尤里·斯科科夫和反对派经济学家谢尔盖·格拉兹耶夫(Sergei Galziev)结成联盟。

俄罗斯社区协会不是唯一的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选举党团。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组织了他自己的政党德扎瓦(Derzhava)。前苏军驻阿富汗司令格罗莫夫将军也在退出伊万·里布金的选举党团之后,组织了一串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代表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尼古拉·李森科的民族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也登记参选,这使选民有机会把选票投给一个公开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候选人。总之,12个

民族主义选举党团出现于 1995 年的选举中,而在 1993 年的选举中只有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一个政党。

1995 年议会选举的结果

与 1993 年的结果相比,1995 年的选举结果没有什么惊奇之处。在政党选举中,与改革派相比,反对派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公众选票(参见表 8.3)。

表 8.3 公众投票,1995 年和 1993 年对比 单位:(%)

	1995 年	1993 年
改革派		
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10.3	—
亚博卢	7.0	7.9
俄罗斯民主选择	3.9	—
俄罗斯前进(Forward Russia)	2.0	—
帕姆费罗娃(Pamfilova)/李森科	1.6	—
共同的事业(Khakamada)	0.7	—
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	—	4.1
中派		
俄罗斯妇女	4.7	8.1
斯夫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Svyatoslav Fyodorov)	4.1	—
劳动党(公民联盟)	1.6	1.9
伊万·里布金	1.1	—
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	—	6.7
未来俄罗斯/新名字(New Names)	—	5.5
反对派		
俄共	21.1	12.4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11.4	12.9
劳动俄罗斯	4.6	—
俄罗斯社区协会	4.4	—
俄罗斯农业党	3.8	8.0
德扎瓦	2.6	—
人民的权力(People's Power)	1.6	—
戈伍卢亨(Govorukhin)	1.0	—
我的祖国(My Fatherland,格罗莫夫)	0.7	—

注:表中的横线表示这些政党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得票率未获得超过 0.5%的政党没有

在表格中显示出来。

当所有的党派都被编上改革派或是反对派时,1993年与1995年议会选举结果的比较显示,俄罗斯的反对党有了重大收获(参见表8.4)。

表 8.4 1993 年和 1995 年议会选举的编组结果

	1995 年	1993 年
改革派	38.2	49
反对派	52.8	42.8

相对于1993年而言,俄共收获颇丰,它赢得了几乎四分之一的选票。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所获选票还不到其1993年所获选票的一半,但仍然以11.4%而排名第二。在总体数字的另一边,作为新执政党的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突破两位数的改革派政党。亚博卢获得了7%的选票,比预期的要低,并且几乎比1993年要低整整一个百分点。前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和他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在1995年遇到了最大的挫折,只获得全部选票的3.9%,还不到1993年他们所获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

这些结果的即时分析显示,反对派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纽约时报》的头条宣布“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做得比预期的要好”,以及“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先一倍于执政党”。⁵²《纽约时报》的社论编辑在对这些结果发表评论时推测,“选举是改革力量的逆转”⁵³。关于俄罗斯选民急速变化的声明,以及政治力量之间权力平衡发生剧烈变化的声明,总体上说是被夸大的。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现状者的核心选举基础在1993年到1995年之间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与1993年获得的全部选票相比,俄共获得的选票份额翻了个倍,但是,它的胜利是以挤占农业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其他非改革政党的选票为代价的。共产党的震荡上升、农业党的崩溃和日里诺夫斯基相对差劲的表现,结合这三者考察意味着,投给反对派的总票数增加了,但仅仅是微小的变化。1993年,这三个政党加起来赢得44%的选票。1995年,同样这三个政党加起来赢得38%的选票。我们同样可以在1993年和1995年改革派的选举结果的比较中观察到这种选举结果的稳定性。在1993年,亲政府的自由主义政党——俄罗斯选择、亚

博卢和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加起来共赢得了 28% 的选票。1995 年，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亚博卢和俄罗斯选择——共获得了 21% 的选票。除了这三个领头的改革派政党，政治光谱同一边的几个小型政党获得了总共超过 7% 的选票。如果这些选票被计算在投向改革派政党的选票总数中（这一计算不包括像俄罗斯妇女或斯夫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之类的政党），选票总数只略微少于 1993 年。

然而，在 1995 年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两大选民阵营内的选民支持平衡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在反对派阵营中，俄共获得的支持比 1993 年有急剧的提升，而农业党和日里诺夫斯基只获得了不到 1993 年一半的支持。在改革派阵营中，新近创建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选举党团以叶戈尔·盖达尔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前执政党）为代价而获得了胜利。这些变化会再次产生所谓的改革派和共产党之间的对立。俄共再次获得了反对党的领导地位，以共产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再次对抗现政权。

对权力平衡的看法和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动力好像来自共产党一边。对某些人而言，这代表了对现行秩序的严重威胁，因为俄共没有表示要完全遵守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他们反制度的调子是软化了，但是没有完全消除。然而，对初生的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真正威胁在于叶利钦政权内部如何回应那些 1995 年选举的胜利者。1995 年议会选举结果使叶利钦的几个最亲近的助手相信，共产党将不可避免地获得 1996 年总统选举的胜利。对这些人来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推迟 1996 年选举。当 1996 年选季开始的时候，民主派失败的威胁显得比以往更大了。

选票至上主义

1995 年议会选举显示出了选举向更高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许多好征兆，选举成为唯一可取的游戏。⁵⁴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按照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所通过的法律进行的选举。此外，在 1995 年选举中起作用的选举法与 1993 年组织上一届议会选举的总统令十分相似。法律明确规定比例代表制与单一议席选举制的席位对半

分,维持了相同的门槛并划分了相同的选区边界。重复与常规化是制度化的关键属性。

选举也准时举行并获得了广泛的参与。在整个1994—1995年期间,许多人原本认为1995年选举既不受欢迎也没有举行的可能。联邦委员会议长弗拉基米尔·舒梅科曾公开赞同推迟杜马选举,杜马代表里布金、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谢尔盖·沙赫赖也对此表示赞同。⁵⁵几个俄罗斯银行家和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也加入了要求推迟(选举)的大合唱中。然而,在杜马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些要求推迟的呼声被忽略了。此外,所有主要政治家都参加了这些选举。许多没有参加1993年选举的人,包括像激进民族主义者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和激进共产主义者维克多·安皮罗夫都成为这些选举的候选人。一些参与者仍然坚持反制度的目标,并且把这些选举看作是实现他们长期目标的短期手段。然而,他们参加选举的决定赋予选举更大的合法性。

1995年选举在程序上并不完善。选举舞弊,包括车臣的大规模无序状态玷污了选举结果。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也明显违反了开支限制,并独占了国家电视频道。然而,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选举违规的情况在重要方面影响了最终结果,1995年对作假和不公正竞选行为的强烈抗议远远少于1993年。⁵⁶

最后,65%的选民参加了这些选举,这比1993年选举有了很大的进步。考虑到这些选举:(1)在隆冬举行;(2)只是改选议会中没有什么权力的一院;(3)不包括总统选举;以及(4)被43个政党参加的情况搞得很乱,那么,这样的一个参选率是很可观的。俄罗斯人民顶着12月寒风,在一场不一定重要的选举中投票,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在认真对待民主的新规则。

1996年总统选举

1996年的总统选举为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新政治规则提供了一次

期末考试。1993年和1995年的选举已经为机构选出了拥有有限权力的官员。然而,1996年的投票是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第一次具有真实结果的选举。俄罗斯几乎没有通过这次考试。正如前面所报道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平衡在1995年急剧朝俄罗斯反对势力方向倾斜。许多人同意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的看法,他断言“90%的选民会在(1995年)12月投票反对叶利钦主义”⁵⁷。这种解释逻辑上的结论就是,叶利钦肯定会在1996年6月输掉一场自由、公正的选举。⁵⁸

历史也显得是在与鲍里斯·叶利钦作对。在整个东欧,在第一次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反共领导人都在第二次选举中输给了前共产党领导人。俄罗斯好像已经准备好了沿着相同的轨迹行进。毕竟,俄罗斯经济改革产生的困难比任何一个东欧国家都要多,任何一个东欧的当权者都没有发动一场不受欢迎的内战,就像叶利钦在车臣那样的内战。此外,由于共产主义是通过革命来到俄罗斯的,而不是通过红军坦克上的炮塔,许多分析家因此断定,共产党在俄罗斯比在东欧其他国家享有更多的合法性。

对久加诺夫取胜的恐惧以两种方式威胁俄罗斯的新政治秩序。首先,如果久加诺夫获胜的话,他会在他的意图中添加不确定因素。有些时候,他说起来、做起来好像他接受新政治机制、新市场经济和俄罗斯的新边界。而在其他时候,他要求摧毁现有边界并恢复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政权。其次,许多人相信叶利钦不会把权力移交给共产党的当选总统。因为一次自由、公正选举的结果是如此明显,许多人预测叶利钦要么伪造结果,要么彻底推迟选举。⁵⁹他的几个顾问催促他这么做,他也倾向于采用他们的建议。

然而,叶利钦最终没有取消1996年的总统选举;相反,他竞选连任成功。在1993年到1996年间,公众支持的平衡没有急剧转向反对派。总统选举的机制与1993年和1995年议会选举的机制对参与者和投票者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此外,叶利钦享有使他足以组织一场有效选战的巨大资源,来着重针对久加诺夫的胜利所包含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对制度崩溃的担心也有利于叶利钦获胜,尽管在那时,即使叶利钦及其随从也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如果他输了,很难预测他是否会承认选举结果。不过,他的胜利有利于巩固现有的政治秩序。

大众力量的真正平衡：极化的俄罗斯选民

受到他 1995 年令人震惊的议会选举胜利的推动，久加诺夫早于其他党派开始准备总统选举。与之相对照的是，叶利钦在 1996 年 1 月的支持率为 5%（有上下 4% 的误差）。然而，这些百分比和比率不能用来衡量叶利钦和久加诺夫在面对面的总统选举中的总体支持度。相反，1996 年的俄罗斯选民仍然以支持政治和经济改革——当然是宽泛的定义——与反对改革来划分。⁶⁰正如本书所讨论的，所有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在变化的程度上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有着区别。如果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基本包括政治制度的转变的话，那么，后共产主义的成功转型就既会改变政治制度，也会改变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后共产主义的成功转型就会摧毁旧阶级，创造新利益集团，并且至少暂时会迷惑每一个生活在转型期的人。在这些情况下，利益分野更多地受到普通人对革命计划所持观点的影响——赞成还是反对革命，而不是特定的经济、社会甚至是种族利益的影响。更加传统的分野仅在新经济和新政治制度巩固之后出现。⁶¹贯穿于 1995 年和 1996 年的民意测验肯定了这一单一分野的持续存在。⁶²

当投票者面对代表两个可相互替换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而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很少会严格按照个人的、自我为中心的偏好做出决定。⁶³在变革的这段时间内，当国家政治对个人生活形成直接冲击的时候，选民们对制度问题或意识形态信仰的关注就会胜过钱袋的问题。⁶⁴俄罗斯 1996 年的总统选举就是这些少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选举中的一次。在这些条件下，俄罗斯选民就不怎么关心当权者过去的表现，而更关心选择一个最密切代表他们对俄罗斯未来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候选人。

如果这种对 1996 年俄罗斯选民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选民的支持向有利于反对派方向的急剧转化可能就不是那么剧烈了。相反，1996 年选举的总计结果——53.3% 支持叶利钦和 40.3% 反对叶利钦——与整个 10 年内的二元选举的结果相当一致（参见表 8.2）。两极化好像在 1993 年和 1995 年淡化了，因为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还有全民公决）包含了不同的逻辑。最为重要的是，俄罗斯议会选举引发了分裂以及原生政党的发展，而总统选举则加强了早先已经显现的社会极化的趋势。⁶⁵像在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的比例代表制鼓励政党分化，不鼓励政党巩固。⁶⁶相形

之下,总统选举趋于产生两党制、多数主义和两极格局。⁶⁷ 仅有一个候选人获胜的选举为投票前巩固联盟和缩小(议题)领域提供了强大的诱因,这促使政治制度趋向两极化。

叶利钦的竞选运动

在竞选开始之前,对立的选民和二元选举表明一个维持现状的候选人和一个反对派候选人会在最后一个回合面对面交锋。但是,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因素没有指出这两个候选人会是谁。1995年12月,俄共的议会选举胜利明确把久加诺夫树为反对派领导人,但是,在1996年1月,对手方面还没有明显的领跑者。

叶利钦最初的竞选运动战略没有区分领域。⁶⁸ 叶利钦第一次的竞选班子由第一副总理奥利格·索斯洛夫茨(Oleg Soslovets)领导,他把1995年选举的结果解读为民主党人及其政策的失败。因此,为了1996年的获胜,索斯洛夫茨建议叶利钦从根本上改变他的改革计划和改革班子。叶利钦同意了,并开除了他政府中三个关键性的改革人物——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办公厅主任谢尔盖·费尔奥多夫和第一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在向议会所做的年度报告中,叶利钦严厉批评了他的政府没有增加社会开支,没有对1992年价格自由化中失去生活保障的那些人进行补偿,以及忽视了农业和军队的改革。他也下令加大保护俄罗斯企业的力度,这一声明是在一系列抬高进口关税的举动之后宣布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表示“讲话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从共产党的文件中抄袭来的”⁶⁹。叶利钦以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这是一个同时受到日里诺夫斯基和共产党人称赞的苏联时代的幸存者——取代了科济列夫。叶利钦的新办公厅主任尼古拉·叶戈罗夫(Nikolai Yegorov)被认为是强硬派的民族主义者,他在1994年进驻车臣的行动中充当先锋。⁷⁰ 这些新任命被有意用来赋予叶利钦班子一个更强硬、更民族主义的形象。然后,叶利钦把言辞付诸行动,他1996年1月下令对在达吉斯坦(Dagestan)的彼沃麦斯克(Pervomaiskoe)的车臣武装分子和他们的人质实施大规模武装行动。

虽然竞选主席索斯洛夫茨精通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政治,但他对选举

政治还是表现出无能的一面。他的班子拼命要让叶利钦通过选举成为候选人,然而,他把叶利钦塑造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策略没有改观总统在民意测验中的表现。索斯洛夫茨甚至聘请了美国选举顾问,但也于事无补。索斯洛夫茨的反对者和同伴开始在叶利钦面前提出,这一“新面貌”政策失败了。在1995年12月议会选举之后不久,叶利钦的政治事务顾问格奥尔吉·萨塔罗夫召集了一个自由讨论小组,来设计一个可供替代的选举策略。小组迅速得出结论:叶利钦只有以代表改革和稳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才有可能获胜。⁷¹几个关键的俄罗斯商人在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也一致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来挽救叶利钦的竞选。⁷²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来自莫斯特银行(Most Bank)的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和来自罗哥瓦兹公司(Logovaz)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rezovsky)这些老对头决定抛开成见,在选举期间为使叶利钦再次当选而共同工作。因为古辛斯基拥有NTY(第四频道),而别列佐夫斯基控制了ORT(第一频道)。这一战略联盟至关重要。

从达沃斯回来之后,别列佐夫斯基和他的商业伙伴就拜见了总统,表示要赞助他的竞选活动,但只有他召集以阿纳托利·丘拜斯为首的新竞选班子时,他们才会这样做。叶利钦同意了这一要求。丘拜斯和他的自由派班子在3月份控制了叶利钦的竞选活动以后,他们重新设定了叶利钦竞选连任的策略。新竞选班子不相信叶利钦像共产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那样行事就会赢得选举的说法。他们也不认为叶利钦依靠自己的业绩就能获胜——这一业绩包括拖拖拉拉并痛苦万分的经济改革、1993年10月发生在俄罗斯市中心的本可避免的小型内战、持续两年的车臣全面战争以及犯罪和腐败的大爆发。为了获胜,叶利钦和他的竞选活动就必须对共产主义进行另一次全民公决。选民必须明白(或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正在两种制度中而不是两个候选人之间做一选择。为了顺利实施这一策略,叶利钦的选举运动必须再次把叶利钦树为一个民主人士,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它包括了结束车臣战争。⁷³竞选官员普遍希望把叶利钦重新塑造成一个能够领导俄罗斯渡过难关的强力领导人。

极化战略也要求所谓的第三方候选人格利戈里·亚夫林斯基和亚历

山大·列别德保持中立。首先出现的进展是在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那里。叶利钦向列别德提供了一笔交易。为了在第一轮过后获得支持,叶利钦和他的竞选顾问准备让列别德获得财政赞助人和总统亲密选举顾问的鼎力相助;在第一轮结束后,列别德将得到叶利钦政府中的一个重要职位。通过在第一轮留在竞选行列,列别德会吸引那些从来也没有投过叶利钦票的人。⁷⁴随着第一轮过后列别德加入克里姆林宫一方,那时这些选民可能会投叶利钦—列别德的票。这一交易也意味着列别德在创建第三方力量联盟时,不会与亚夫林斯基合作。没有列别德,亚夫林斯基在第一轮对叶利钦就构不成威胁。叶利钦的竞选主管估计,亚夫林斯基的支持者不管他们的领导人会做出什么举动都在第二轮支持叶利钦,不像列别德的支持者那样改换门庭。⁷⁵

到4月为止,叶利钦的竞选运动已经把亲改革派团结在他们的候选人身边,它现在开始要更多地关注所谓的中间选票。⁷⁶为了吸引这些中间选民,“稳定”成为竞选的中心思想。叶利钦的竞选民意测验显示,担心久加诺夫获胜会发生一场政治地震的人,要比担心叶利钦连任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多得多。⁷⁷因此,在巡回演说中,叶利钦把自己摆在一个稳定、持续和进步保证者的角色,他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发生一场内战”的人。⁷⁸叶利钦的竞选运动强调,人民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斗争,渴望安宁和持续。在叶利钦发起的电视节目中,普通人参与讨论当今俄罗斯的一系列问题;然后在电视节目结束的时候,同样这些人表示,与其处于变革的旋涡之中,还不如维持现状。

叶利钦的竞选运动把叶利钦治下的稳定的信息与如果久加诺夫赢得选举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稳定这样一种微妙和不怎么微妙的景象进行比较。在整个竞选期间,特别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中,叶利钦的竞选运动让俄罗斯选民回忆起过去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恐怖。电视广告强调苏联共产党与俄共之间的连续性。当播放苏联时期死刑、饥荒和摧毁教堂的电影胶片时,正像一个广告所警告的,“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甚至没有改变党的名字;他们也将不会改变他们的策略”。除此以外,这些负面信息暗示,如果共产党接管政权,不稳定和暴力将随之发生。叶利钦的班子周而复始地想让选民选择一个危害较小的魔鬼。

作为一个当权者,叶利钦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大的财政优势。在竞选的过程中,叶利钦向每个人都允诺了一些东西,包括向产业工人和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工资,向年长者提供高额养老金,并承诺在选举日之前付清拖欠的工资。此外,叶利钦得到了俄罗斯几乎每个主要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支持,这实际上给他的竞选带来了无限的预算。这些私人的钱款受到联邦政府开支限制的支持,叶利钦大胆地利用这些钱来为竞选利益服务。总统选举法规定了竞选开支限额,但每个人包括叶利钦的竞选班子都承认,叶利钦的竞选活动粗暴地破坏了这些限制。然而,叶利钦最亲近的竞选资源是所有三大国家电视对他的忠心耿耿。欧洲传媒研究院估计,ORT, RTR 和 NTV 这三大俄罗斯电视网,把其 53% 的新闻报道用于叶利钦。这不仅仅是数量在起作用,而且质量也在起作用:与他们对久加诺夫的批评报道相比,所有三个电视网对叶利钦的一举一动都提供了最有利的报道。⁷⁹叶利钦也得到了几乎所有全国性报纸和最重要地方出版物的支持。

久加诺夫的竞选运动

久加诺夫在 1996 年总统选举开始之初有几个主要优势。最为重要的是,在久加诺夫身后有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支持他,它在 1995 年的议会选举中锻炼了筋骨。由于这些选举,俄共明显恢复了 1993 年之前俄罗斯反对党的领导地位。1995 年选举的胜利赋予久加诺夫第二个重要优势——冲劲。按照久加诺夫的估计,1995 年的结果显示在俄罗斯不存在反共情绪,选民在过去两年中变得左倾。⁸⁰作为 1995 年选举胜利的部分结果,久加诺夫迅速成功地把大多数反对党和反对运动联合在他参选的名义下。⁸¹久加诺夫在获得自己政党的提名以后转向左翼,早早得到了共产主义政党联盟(Union of Communist Parties)的支持和由维克多·尤尔金(Viktor Tyulkin)和维克多·安皮罗夫领导的好斗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Russian Communist Workers' Party)的较为勉强的批准。

久加诺夫在共产党根基稳固之后开始结交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对派领导人和团体。在前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领导下,久加诺夫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民族—爱国力量集团(Bloc of National and Patriotic Forces)。在竞选结束的时候,俄共官员宣布有 136

个组织正式支持久加诺夫。⁸² 在选举开始之前,久加诺夫说服像亚历山大·鲁茨科伊、谢尔盖·巴布林和斯坦涅斯拉夫·戈夫卢亨(Stanislav Govorukhin)这样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参加这个集团。这些领导人都意识到,在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这个阶段,任何爱国运动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参与。⁸³ 日里诺夫斯基是唯一一个未被邀请参加的民族主义阵营的重要人物。几年来俄罗斯的红色和棕色势力第一次联合在了一起。

久加诺夫在年初巩固了他的基础之后,他开始忙于结交新选民这一核心战略任务。理论上,久加诺夫有两个选择。像东欧的同志一样,他会试图把他自己和他的政党塑造成为社会民主党——这一策略通过中左的社会政策议题来动员新选民。或者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地位上,通过爱国主义的口号结交新选民。

久加诺夫实际上在1996年总统选举之前采用了后一种战略。⁸⁴ 在1990年俄共建立的时候,久加诺夫是以这个新组织中的中央集权论者(*gosudarstvenniki*)领导人的面目出现的。在苏联崩溃以后,久加诺夫找到了新盟友和导师——强力民族主义报纸《白天》报的编辑亚历山大·普列汉诺夫(Aleksandr Prokhanov),以及创建精神遗产(Spiritual Heritage)的前情报官员阿列克谢·波特勃列兹金(Aleksei Podberezkin),精神遗产运动致力于民族主义事业。⁸⁵ 正如前几章所讨论到的,久加诺夫是在1992到1993年间鲁莽的对抗政治中担任救国阵线领导职务的最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的演讲和著作中,久加诺夫强调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题,而很少提到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竞选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主导了他的巡回演讲,其中他嘲笑叶利钦是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奴仆。当被要求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主题时,久加诺夫回答道:“在俄罗斯,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没有实现的机会”⁸⁶。实际上,俄共领导人强烈反对社会民主的标签。⁸⁷ 按照他们对俄罗斯选民的理解,通过爱国口号结交中间选民的决定会取得胜利。久加诺夫及其顾问认为,俄罗斯选民相对平均地分成了三种类型——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⁸⁸ 如果久加诺夫能够赢得后两个集团的支持,他就会赢得选举。⁸⁹

然而,久加诺夫的竞选策略在扩大他的选举基础上没有获得成功。

在整个竞选期间,他忠实的追随者仍在他左右,但他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在第一轮之前没有吸引新选民(参见表 8.5)。

表 8.5 1996 年总统选举期间久加诺夫的支持率 单位: %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VTsIOM	24	25	26	26	24
FOM	16.4	25.8	28.06	22.4	20.0

资料来源: FOM, 公共舆论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VTsIOM, 全联盟公共舆论研究中心 (All-Uni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虽然俄共的内部调查更为乐观,但是,甚至连俄共竞选官员到 4 月的时候也开始相信,久加诺夫到达了他支持的上限,它的范围在 2 400 万到 2 500 万张选票之间。⁹⁰

选举后果: 结果和过程

如人所愿,叶利钦和久加诺夫在第一轮获得了比其他候选人多得多的选票(参见表 8.6)。

表 8.6 第一轮投票结果

	百分比	投票总数(百万)
总票数	69.81	75.7
叶利钦	35.28	26.7
久加诺夫	32.03	24.3
列别德	14.52	11.0
亚夫林斯基	7.34	5.6
日里诺夫斯基	5.70	4.3
费奥多罗夫	0.92	0.7
戈尔巴乔夫	0.51	0.4
萨克库姆(Shakkum)	0.37	0.3
弗拉索夫(Vlasov)	0.20	0.2
布雷恩特萨洛夫(Bryntsalov)	0.16	0.1

叶利钦竞选运动的领导人对第一轮选举结果表示谨慎乐观,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叶利钦只以三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这一轮。⁹¹要是

叶利钦排在久加诺夫之后,那么推迟第二轮选举的建议就会变得更强。其次,叶利钦竞选运动组织者推论,差距不大有助于在第二轮再次动员亲改革派的选民。如果叶利钦在第一轮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的支持者就会不再操心在第二轮投票中出场。第三,正如叶利钦班子所希望的那样,列别德排名第三。列别德将军竞选的最后闪击战,使他获得了三分之一在选举前几天才做出决定的选民的选票。⁹²第四,久加诺夫没有扩展他的选民基础。

第一轮投票过后两天,叶利钦任命列别德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两个职位分别对国防部和内务部拥有新近扩充的权力。按照两轮选举之间的调查显示,57%的前列别德选民打算在第二轮支持叶利钦,而仅有14%的选民打算支持久加诺夫。⁹³更加普遍的是,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认为,叶利钦把列别德带进政府的做法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叶利钦和他的竞选班子也与亚夫林斯基举行了磋商,但热情就小得多了。调查数据显示,每四个亚夫林斯基的支持者中有三个打算在第二轮支持叶利钦,即便亚夫林斯基不是叶利钦班子的成员。叶利钦的班子不公开地与日里诺夫斯基接触,因为他们的民调结论认为,如果两个人公开结盟,叶利钦就会丧失他17%的选民。⁹⁴与此同时,叶利钦的班子希望得到日里诺夫斯基心照不宣的支持。在一次戏剧性和声情并茂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这样做了,嘲笑说久加诺夫和他的盟友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是没经历改革的共产主义者。⁹⁵

在两个回合之间,叶利钦选举活动的最后一个优先关注的焦点是选民参选率。民调结论显示,参选率越高,叶利钦就越有可能获胜。大多数分析家预测第二轮的参选率会下降。对叶利钦而言,第二轮的时间安排——仲夏的一个星期天——或许是最糟糕的了,因为富裕的城市居民(也就是叶利钦的支持者)总是在夏季的周末去他们的郊外别墅。叶利钦的竞选运动注意到了参选率问题,把第二轮的时间改到了7月3日的星期三,以确保亲叶利钦的选民都在城里。同时,他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电视活动来泄露投票信息,并增加了反共电视广告的数量,以期威吓选民参加投票。

久加诺夫公开表示对第一轮选举结果感到高兴。尽管有叶利钦的媒

体闪击战和奢侈的花费,还是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投当权者的票。然而,当摄像机和麦克风关闭的时候,竞选官员没有为第一轮选举结果欢呼。⁹⁶虽然久加诺夫的总票数略微高于民意测验所估计的票数,但是,在经过六个月的竞选活动以后,实际数字没有多少改变。在1995年,俄共、农业党、安皮罗夫、鲁茨科伊和雷日科夫加起来总共收到2400万张选票。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根纳季·久加诺夫收到2420万张选票。对久加诺夫竞选阵营内外的分析家而言,第一轮选举结果显示,久加诺夫除了核心反对票之外没有获得任何新选民的支持。第二轮结果肯定了久加诺夫的支持缺乏活力(参见表8.7)。

表 8.7 第二轮选举结果

	百分比	总投票数(百万)
叶利钦	53.82	40.2
久加诺夫	40.31	30.1
全反对	4.83	3.6
投票人数	68.89	74.7

违规的阴影

在整个1996年选举中,推迟选举的阴影一直很大。总统卫士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及其盟友公开游说以非选举方式挑选俄罗斯的行政首脑。在杜马投票通过了重新统一苏联的决议之后,科尔扎科夫旋即于1996年3月提议推迟选举,叶利钦认真地考虑过这个建议。5月,科尔扎科夫再次提出了为避免内战而推迟选举的意见。正如他所坦率地指出的,“许多权势人物支持推迟选举,我也支持,因为我们需要稳定”⁹⁷。不祥的预兆是,莫斯科军区司令列昂迪·库兹涅茨索夫(Leonty Kuznetsov)公开支持科尔扎科夫推迟选举的主张,并警告说选举会使俄罗斯不稳定。⁹⁸科尔扎科夫也得到了被称为“13人团”(Group of Thirteen)的强力银行家和工业家集团的支持。1996年4月26日,他们以“打破僵局”为题发出一项呼吁,要求叶利钦和久加诺夫实现团结,组建联合政府,以避免竞争性选举。根据很多人的解释,6月发生在莫斯科地铁的炸弹爆炸事件,成为科尔扎科夫长久以来想取缔反对派和推迟选举的借口。在整个

竞选运动期间,科尔扎科夫的分析中心为叶利钦提供选情的预报,比丘拜斯班子所做的评估要悲观得多。为了让推迟选举更合共产党的胃口,科尔扎科夫和他的盟友甚至建议组成一个包括久加诺夫在内的国家委员会,一个新的类似政治局的机构。⁹⁹

科尔扎科夫和他的同伴想避免选举,因为他们推论,一旦叶利钦得到一次新的选民委托,他就会不再依靠他们进行统治。叶利钦选举运动中的自由派都共同具有这样的假设,并打算一旦选举结束就对科尔扎科夫派系采取行动。在第一轮结束以后,有情况显示叶利钦在第二轮获胜是确定无疑的时候,科尔扎科夫为了继续掌权而做出了一个绝望的举动。在第一轮选举之后三天,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他们忠于科尔扎科夫)逮捕了丘拜斯的两个助手,指控他们从政府办公室拿走了50万美元现金。科尔扎科夫想用这件事让丘拜斯和他的班子丢脸。几位分析家和政府官员推测,这次逮捕行动是宫廷政变的开始。预计下一步将被逮捕的是丘拜斯和几个银行家。

当丘拜斯听到逮捕行动后,他给了叶利钦一个最后通牒——要么开除那些涉嫌逮捕他助手的人,要么丘拜斯和他整个竞选班子辞职。叶利钦同意丘拜斯的意见并赶走了他的卫士长、亲密私人顾问和十多年的老朋友科尔扎科夫。他也赶走了科尔扎科夫的盟友、联邦安全局局长(前克格勃)米哈伊尔·巴苏科夫和第一副总理奥利格·索斯科夫茨(Oleg Soskovets)。对俄罗斯脆弱的选举过程的最大威胁已经勉强避免了。

如果叶利钦推迟选举,那会怎么样呢?他最新的回忆录显示,1996年3月,他确实谨慎地试图推迟选举。只是丘拜斯和叶利钦女儿塔提亚娜·蒂亚琴科(Tatyana Dyachenko)在最后一分钟的干预才制止了反民主的行动。¹⁰⁰如果叶利钦输掉了选举,那会怎样呢?他会把权力移交给久加诺夫吗?最终,他选择了参与他自己缔造的制度而不是采取非选举的手段。一方面,总统这样解释,他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太虚弱,以至于无法发动政变。¹⁰¹1993年10月摊牌以后,叶利钦本身违反游戏规则的能力变小了。即使他和盟友想用宪法外手段实施他们的政治主张,军队代表再次干预的可能性和民众对他的支持度都在1993年10月以后要低得多了。¹⁰²另一方面,尽管他的支持率不高,但是叶利钦还是有信心赢得选

举。¹⁰³此外,叶利钦想以俄罗斯民主之父留名青史。正如叶利钦的一个竞选顾问伊格尔·马拉申科(Igor Malashenko)在竞选期间所说的,“我认为他会举行选举,因为他想成为振兴俄罗斯的人”¹⁰⁴。推迟这一历史性的选举会对这一遗产造成永久损伤。

叶利钦遵守了选举程序,他按照他设计的游戏规则行事。然而,他的行为不是很公正。正如前面所说的,最重要的是,叶利钦的竞选活动粗暴地违反了总统选举法中规定的开支限额。对全国媒体报道近乎垄断的控制为叶利钦在1996年的竞选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同样,这次选举发生了弄虚作假和恫吓投票者的现象。在像鞑靼斯坦、达吉斯坦和卡尔梅克等共和国,久加诺夫在两个回合之间支持率的急剧下降只能被解释为国家官员的干预,把假票投入选举箱或是威胁当地官员改掉正确的选票数。

然而,尽管这些证据非同寻常,但久加诺夫和其他的反对派领导人都没有挑战选举结果。久加诺夫谴责叶利钦“史无前例地动用国家资金”为他个人选举服务,但他从来没有谴责叶利钦政府的欺诈行为。¹⁰⁵他从来没有号召对造假的报道或滥用竞选资金的情况进行调查,即使他有理由这样做。俄共官员相信合法请愿不会有任何结果。然而,更一般的情况是,所有俄罗斯的选举专家——包括俄共的分析家——都认为叶利钦和久加诺夫之间1000万张选票的差距太大了,以至于难以造假。这种胜利的差距让这些造假动作不值一提。虽然俄共并没有认真对待这种观念,但是俄共官员最终承认他们并没有进行一场平行计票的组织能力,这就更难证明造假行为是否真的事关重要了。¹⁰⁶

许多人曾认为,199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是预先设定好的,因为叶利钦不想让久加诺夫获胜,而且更确定的是,如果久加诺夫获胜,叶利钦肯定不想让他接管权力。然而,在竞选期间,这样确定的想法并不存在。证明选举结果不确定的最有力证据是这些候选人及其盟友的行为。如果久加诺夫没有获胜的机会,他就不会参加选举。如果叶利钦事先知道他会保住权力,他就不会撤换他的竞选班子,就不会如此卖力地参与竞选(如此卖力以至于他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得了心脏病),他的资金支持者就不会用掉他们已经用掉的资源。科尔扎科夫和他的班子也就不会去设计如何通过宪法外方式以保住权力的突然行动计划了。选举的临近让叶利

钦和久加诺夫都全身心地投入选举游戏。如果久加诺夫的胜利在选举日之前就已定下,叶利钦就可能更积极地采取宪法外手段来保住权力。如果叶利钦的胜利(比如说通过作假)众所周知,那么久加诺夫就不会参加选举。

参与(选举)的行为对俄罗斯选举至上主义的制度化有重要的意义。从1993年以来,俄罗斯公民第三次通过选举选择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而且从1993年以来,所有主要的政治家第三次参加选举并接受选举结果。仅在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头两次议会选举胜利结束后的两年,就迎来了后共产党时期第一次总统选举的胜利完成,这对于把选举树立为俄罗斯政治中的正常事件是有助益的。到下一次选举周期到来的时候——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和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没有人会质疑这些选举的如期进行。当然,这些选举因违反竞选开支法、媒体操纵和一些伪造的结果而带有污点。¹⁰⁷200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比1996年的选举更早确定了。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那么选举的意义就会消退,即使它们仍然是正常事件。但是依然还不能下这样的判断。许多杜马代表在1996年12月失去他们的席位之后已经宣称,在俄罗斯,选举没有实质意义。

结 论

叶利钦在1993年10月使用武力摧毁旧秩序以后,强制实施了一项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新设计。这些新规则中的一条就是选举至上主义。正如叶利钦新规则所规定的,国家政府官员(后来是地方政府官员)要在新制度内拥有权力,就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反对叶利钦的新设计。他们特别害怕强势总统制的出现。其他人因这些规则是强制实施而不是协商产生的而反对它。然而,当面临是加入新制度还是在制度之外反对新政权时,几乎每一个重要政治家最终都选择了前者。

权力平衡的变化和变革议程的缩小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权力平衡

和对权力分配的认知在选举至上主义制度化时起了一个十分诱人的作用。在决定参加 1993 年选举的时候,明确有利于叶利钦的权力平衡使叶利钦的反对者都相信,他们除了承认新游戏规则外别无选择。然而,1993 年和 1995 年的议会选举结果让同样这些叶利钦的反对者继续效忠这些新规则,因为这些新规则看起来对他们有利。在这两次选举中,叶利钦的反对者看上去取得了对叶利钦及与其政府合作的那些政党的巨大胜利。他们想把这种选民的变化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变化,而实现这一转化的唯一机制就是选举。选举力量平衡的明显变化让俄罗斯的反对力量遵守新游戏规则。

对反对派有利的选民支持变化看上去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许多人相信叶利钦会经不住诱惑去违反他自己的规则以继续掌权。按照叶利钦自己的承认,他的确受到了很大的诱惑。但是,有利于反对派的权力变化和两次议会选举的顺利完成,也使叶利钦发动的宪法外行动更不可能和代价更高。1993 年 10 月,叶利钦在为他解散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辩解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也拼尽全力这样做。在 1996 年,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会支持叶利钦取消或推迟总统选举。叶利钦那时仍掌握许多权力,并可能受到诱惑,通过残忍的暴力手段将这种非法行动付诸实施。然而,假如支持反对派的选民变化发生在 1993 年和 1995 年的话,那么他对 1996 年胜利的把握要比 1993 年小得多。几年后,当时的内务部部长阿纳托利·库利科夫(Anatoly Kulikov)称他拒绝参加这样的计划,这一消息的透露表明,与 1993 年相比,叶利钦在 1996 年的强制能力相对较弱。¹⁰⁸

最终,为了保住权力,叶利钦没有诉诸武力,而把选举游戏进行到底。尽管 1995 年的议会选举中的选民支持明显向俄共倾斜,但是仍有充足的理由预测叶利钦会赢得 1996 年的总统选举。参加这种竞选,叶利钦利用了二元选举制度中的对立选民和两极格局,从而以决定性的差距赢得了总统选举。

1996 年总统选举的胜利,反过来传达了一种关于俄罗斯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区分他们的改革议程的重要信息。叶利钦的胜利并不能肯定他的改革进程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但它表明一个具有稳定数量

的大多数人不想回到过去的制度。选举向所有政治家提供了明白无误的公民意向信息；无论过程多么痛苦，大多数公民想伴随改革前进。这一新数据消除了早先关于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变化的力量平衡的模糊认识（侥幸行为随着这些模糊认识而产生）。久加诺夫明确的败北打消了计划好的反宪法行动的动力，或者至少是打消了共产主义激进分子的威胁，如果久加诺夫选举失败的话。如果选票得数再接近些，这些极端分子就有可能宣称结果是伪造的，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他们的议程。久加诺夫自己迅速承认了选举结果，并随后肯定了他对政治力量之间权力平衡的承认。他没有号召他的支持者起来通过宪法外手段以获得权力。相反，久加诺夫参加了叶利钦的宣誓就职典礼，并在1996年8月听凭杜马批准叶利钦新政府的成立——这是自1993年宪法实施以来立法机关第一次投票批准一位新总理。在叶利钦第二任期内，杜马里的俄共领导人不时想对总统发动弹劾程序，但这些针对叶利钦的斗争也是在既有秩序的限制范围内发动的。它们不是宪法外的挑战。

俄罗斯所有主要政治家对权力平衡的这种默认，反过来缩小了1996年总统选举之后争议的改革议程。争议的改革议程在1993年到1996年之间有相当的缩小。叶利钦的竞选胜利给一个革命性转型打上了终止的符号，虽然其中反制度的挑战仍在起作用。在叶利钦的第二任内，久加诺夫和共产党没有采取复辟行动或立场。俄共没有在杜马阻挠叶利钦政府预算的通过，没有使财产重新国有化，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重建苏联的措施。俄共官员为赋予立法机构更多权力的修正案进行游说，但没有一个党内的著名政治家提出放弃民主的主张。几个极端主义领导人和组织拒绝承认新政治经济制度，把它斥之为“通敌卖国”并发誓继续与新政权作对，但是这些力量渐渐被排斥到俄罗斯政治的边缘地带。总之，1996年的选举结束了俄罗斯拖延不顺的并不时伴随暴力的告别共产主义统治的转型。

注 释

1. Vladimir Pastukhov, "Comic-Opera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Megapolis Express* 41 (October 20, 1993): 19; 收录于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5 (November 10, 1993):8.

2. 参见作者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下列成员的访谈:瓦连京·库普索夫(1995年7月24日)、维克多·佐卡尔茨耶夫(1995年7月28日)和维克多·佩希科夫(1999年3月19日)。

3. 参见久加诺夫的观点,引自 Joan Barth Urban and Valery Solovei, *Russia's Communists at the Crossroad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90.

4. 参见作者与根纳季·久加诺夫于1999年9月23日的访谈。

5. 参见作者对佩希科夫的采访。佩希科夫不相信党正处于毁灭的边缘。在这次访谈中,他提到了俄共其他领导人的观点。

6. "Kommunisty Sankt-Peterbrga Primut uchastie v vyborakh v gosudarstvennyuyu dumu," *Postfactum*, October 27, 1993.

7. 参见久加诺夫俄共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收录于 *Sovetskaya Rossiya*, December 23, 1993, 3.

8. 参见作者与久加诺夫的访谈。

9. 参见作者与杜马代表、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伊万·梅尔尼科夫(Ivan Melnikov)于1999年11月18日的访谈;以及与杜马代表、俄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维克多·伊尔尤金(Viktor Ilyukhin)于1999年9月24日的访谈。当时,伊尔尤金是俄共强硬派的领导人,然而,即便是他也认为他们最好参加选举而不是在制度外与叶利钦作斗争。

10. 按照厄本(Urban)和索洛维(Solovei)的说法,89个地方组织中有85个投票决定参加选举。参见 Urban and Solovei, *Russia's Communists at the Crossroads*, 107。梅尔尼科夫在1999年11月18日与作者的访谈中称,在关于参与选举的投票中,只有两个代表弃权,没有人反对。

11. 参见作者与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于1993年11月的访谈。

12. 参见作者与谢尔盖·库尔琴廷于1995年5月18日的访谈。

13. 在递交了签名的21个选举集团中,有8个不合格,其中包括三个著名的民族主义选举集团——由谢尔盖·巴布林领导的俄罗斯全体人民联盟(the Russian All-People's Union),由米哈伊尔·阿斯塔费耶夫领导的宪政民主党—人民自由党和由尼古拉·李森科(Nikolai Lysenko)领导的民族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请不要和弗拉基米尔·李森科领导的共和党相混淆。

14. 参见1990年到1993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救国阵线”副主席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与作者于1995年5月27日的访谈。

15. John Dunlop, "Zhirinovskiy's World,"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994):28.

16. Vladimir Zhirinovskiy, *Poslednii brodok na yug* (Moscow: TOO Pisatel, 1993).

17. 参见作者与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运动组织者弗拉基米尔·佐里金(Vladimir Zharikin)于1993年11月的访谈。
18. "Bitva za izbiratelei nachalos," *Izvestiya*, October 13, 1993, 4.
19. Aleksei Levinson, "Otchet o rezultatakh oprosa grazhdan rossii," mimeo (Moscow: VTsIOM, October 1993), 6.
20. 参见作者与亚夫林斯基于1997年10月13日的访谈。
21. Yabloko的名称(俄语中“苹果”的意思)来自三个领导人名字的首个字母。
22. 选举结果总体稳定当然不意味着单个选民不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参见Gerald Kramer, "The Ecological Fallacy Revisited: Aggregate-versus Individual-Level Findings on Economics and Election and Sociotropic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1983):92-111。
23. 参见"O razvitii ekonomicheskikh reform v Rossiiskoi Federatsii (Yanvar'-Sentyabr', 1993 goda)" (Moscow: Goskomstat, 1993);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1995* (Lodon: EBRD), 205。
24. Tsentr Sotsioekspres, Institut Sotsiologii, Rossiiskaya Akademiya Nauk, *Zerkalo mnenii* (Moscow, 1993), 5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Zerkalo mnenii*). 另可参见 Vserossiiskii Tsentr Izucheniya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VTsIOM), *Ekonomicheskie i sotsial'nye peremény*, vol. 8 (Moscow: VTsIOM, December 1993), 42。
25. VTsIOM, *Ekonomicheskie i sotsial'nye peremény*, 6. 同期有关支持经济改革的人数更高的数字, 参见 Aleksei Levinson, "Otchet o rezultatakh oprosa grazhdan rossii (VTsIOM)," mimeo, 1993, 2。
26. *Zerkalo mnenii*, 7.
27. 有关比例代表制导致极端主义分子执政的危险, 参见 F. A Hermans, *Democracy of Anarchy? A Study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 1972)。
28. Dunlop, "Zhirinovskiy's World," 27. 相似的反应参见 Michael McFaul, "Nut 'n' Honey: Why Zhirinovskiy Can Win," *The New Republic*, February 14, 1994。
29. 参见记者对安德烈·法丁的采访。 *Obshchaya Gazeta*, December 17—23, 1993。
30. Charles Fairbanks,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994):41。
31. 盖达尔在1993年12月1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时记者参加了这个发布会。

32. 参见奥里格·鲁姆扬茨耶夫的评价, in Fred Hiatt, "Democrat Looks Back in Anger," *Moscow Times*, September 23, 1994, 4; 以及格利戈里·亚夫林斯基的评价, in Paul Norton, "Yavlinsky Offers Grim Assessment of Russian Reform," *Moscow Tribune*, January 27, 1995, 6.

33. 直接发送给行政首脑和总统代表的副本, 发表于 Nikolai Medvedev, *Novye na staroi ploshchadi: Kremlevsko-provintsial'nye istorii* (Moscow: Respublika, 1997), 217—218.

34. A. A. Sobyenin and V. G. Sukhovolsky, *Demokratiya, ogranichennaya falsifikatsiyami: Vybory i referendumy v Rossii v 1991—1993 gg* (Moscow, 1995); Mikhail Myagkov and Alexandr Sobyenin, "Irregularities in the 1993 Russian Elections: Preliminary Analysis," manuscript,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4.

35. 参见作者与梅尔尼科夫的访谈。

36. 参见作者与在卡赞市的候选人和政府官员的访谈(1993年12月)。当时作者是选举国际观察员。

37. Oleg Rumyantsev, *Osnovy konstitutsionnogo stroya Rossii* (Moscow: Yurist, 1994), 217.

38. Matthew Wyman, Stephen White, Bill Miller, and Paul Heywood, "Public Opinion, Parties, and Voters in the 1993 Russian Elections," *Europe-Asia Studies* 47 (1995): 602.

39. Sergei Kovalev, "Pis'mo tret'emu s'ezdu partii Demokraticeskii vybor Rossii," *Otkrytaya Politika* 6 (October 1995): 14.

40. 盖达尔于1995年2月13日和5月19日的公开演讲。作者参加了这两次演讲。另可参见 Tsekhmistrenko, "Slushaet li 'Yabloko' yegora gaidara?" *Kommersant'-Daily*, February 10, 1995, 2.

41. "Rezolyutsiya o vozmozhnykh soyuznikakh partii DVR na predstoyashchikh vyborakh," mimeo, May 19, 1995.

42. Grigory Yavlinsky, "V paskole demokratov tragedii net," *Izvestiya*, part 2, July 13, 1995, 2.

43. Quoted in Alessandra Stanley, "A Russian Reformer with Rough Edg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1995, 1.

44. Quoted in Natalya Arkhangel'shaya, "Tri lidra-Dva bloka," *Kommersant'-Daily*, April 26, 1995, 3.

45. 参见作者与总统顾问格奥尔吉·萨塔罗夫于1995年8月的访谈。

46. Sergei Chugaev, "Partiya vlasti" zayavlyayet o namerenii sokhranit' vlast," *Izvestiya*, April 27, 1995, 1.

47. 参见作者与杜马代表、“俄罗斯民主党”党团负责人谢尔盖·格拉兹伊夫

(Sergei Glaziev)于1995年5月26日的访谈;以及与赫拉莫夫(Khramov)的访谈。这两人最初都已经计划加入到里布金集团。

48. 参见作者与库普索夫的访谈。

49. 有关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参见 Yevgeny Krasnikov, "Profsoyuzy ishchut vygodnuyu partiyu," *Moskovskie Novosti*, August 6—13, 1995, 4。有关它与妇女组织的关系——它的策略是直接从俄罗斯妇女手中赢得选票,参见 Elena Shubalova, "Russkie Zhenshchiny," *Dialog* 11—12 (1995):26—27。有关它与商业团体的关系,参见作者与佐卡尔茨耶夫以及与久加诺夫的访谈, in *Kommersant'-Daily*, July 6, 1995, 4。

50. Quoted in *OMRI Daily Report*, no.227, part 1, November 21, 1995。

51. Chrystia Freeland, "Soldier Who Appeals to Craving for Order," *Financial Times*, June 3—4, 1995, 8。

52.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95, A1; and December 19, 1995, A1。

53. "The Communist Comeback,"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1995, A18。另可参见 Peter Reddaway, "Red Alert," *The New Republic*, January 29, 1996, 15。本书作者自己在那时的评论和描述,发表于 Michael McFaul, "A Communist Rou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1995, A19。

54. 分析拉丁美洲制度安排的学者使用选票至上主义(electoralism)这个贬义词特指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选举结果不会影响那些实际上做出政治决策的人。按照这些早先著作的说法,我把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为了刻意强调选举仅仅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部分。同时,我用这个词是为了暗示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把选举的制度化作为获取权力的唯一方式。选票至上主义对苏联的极权主义而言是真正的进步。如果评判的标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话,那么选票至上主义是个反面教材。然而如果评判的标准是极权主义的话,那么选票至上主义是一个积极的进步。

55. 参见 Shumeiko,引自 Interfax, June 22, 1994, in *FBIS-SOV-94-I22*, June 24, 1994, 20; Shakhrai, Interfax, June 15, 1994, in *FBIS-SOV-94-I23*, June 17, 1994, 21; Burbulis, quoted in *Kommersant'-Daily*, July 12, 1994, in *FBIS-SOV-94-I33*, July 12, 1994, 19。

56. 这是1993年选举顶尖评论家亚历山大·索布亚宁发表的意见,参见作者与他在1995年12月的访谈。

57. Quoted in *Moscow Times*, February 1, 1996, 1。

58. Daniel Singer, "The Burden of Boris," *The Nation*, April 1, 1996, 23; Jerry Hough, Evelyn Davidheiser, and Susan Goodrich Lehmann, *The 1996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6), 86。

59. Lilia Shevtsova, "Yeltsin ostanetsya, dazhe esli proigraet," *Nezavisimaya Gazeta*, April 26, 1996, 3.

60. Michael McFaul, *Russia's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End of Polarized Politic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7).

61. Sharon Werning Rivera, "Historical Cleavage of Transition Mode?" *Party Politics* 2 (1996): 178—208; Ger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Identifying the Bases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Eastern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1993): 521—548.

62. 参见作者与公共舆论基金会(Foundation for Public Opinion)主席、1996年叶利钦选战的首席民意调查人亚历山大·奥尔森(Aleksandr Oslon)于1996年12月的访谈。

63. 关于“个人经历”假设与“国民评价”假设(“national assessments” hypothesis)之间的区别,参见 Roderick Kiewiet, *Macroeconomics and Micropolitics: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15—20。

64. Morris Fiorina,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65. Juan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Arned Lijphat, "Presidentialism and Major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Juan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3—90, and 91—105.

66.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 Barbara North and Robert North (New York: John Wiley, 1954).

67. Matthew Shugart and John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68. 以下几段仅是竞选策略的简要概述。详细情况参见 McFaul, *Russian's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chaps. 3—5。

69. 引自 Michael Specter, "Grim Yeltsin Blames Own Government for Russian's Ill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1996, 3。

70. Valery Vyzhutovich, "Staraya Ploshchad, novaya komanda," *Izvestiya*, March 26, 1996, 1.

71. 参见作者与其中一个起草小组成员阿列克谢·卡拉-穆扎(Aleksei Karamuza)于1996年7月的访谈。

72. Chrystia Freelan, *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00), chap. 9.

73. 有关结束车臣战争作为赢得传统改革派选民支持的论述,参见 Fond Obshchestvennoe Mnenie, “Klyuchevye problemy predvybornoi kampanii v zerkale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Rezultaty Sotsiologicheskikh Issledovannii* 29 (May 10, 1996):4—5。

74. Fond Obshchestvennoe Mnenie, “Vozmozhnye ‘peretekaniya’ golosov mezhdu elektoratami politicheskikh liderov,” *Rezultaty Sotsiologicheskikh Issledovannii* 10 (April 22, 1996):1—2。

75. 这一假设被证明是正确的:VTsIOM 的出站调查显示,在第一轮支持亚夫林斯基的人有 64% 在第二轮支持叶利钦。VTsIOM, “ekspress 96—20,” mimeo, July 12, 1996, 2。

76. 参见作者与叶利钦竞选运动发言人伍亚乔斯拉夫·尼科诺夫(Vyacheslav Nikonov)于 1996 年 9 月 18 日的访谈。

77. Fond Obshchestvennoe Mnenie, “Klyuchevye problemy predvybornoi kampanii v zerkale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Rezultaty Sotsiologicheskikh Issledovannii* 29 (May 10, 1996):2。

78. 引自 *OMRI Daily Digest*, no. 97, part 1, May 20, 1996。

79. European Institute for the Media, “Media and the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ewsletter), no. 2, June 4, 1996。

80. 久加诺夫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收录于 *Informatsionnyi Byulleten’* (CPRF) 1 (January 115, 1996):3。

81. See *Rossiia: Partii, vybory, vlast’* (Moscow: Dukhovnoe nasledie, 1996), 277。

82. 参见媒体对瓦连京·库普索夫的访谈, *Vek*, June 14, 1996, 5。

83. 参见作者与杜马代表、俄共党团成员尼娜·布尔特尼科娃(Nina Berdnikova)于 1996 年 3 月 26 日的访谈。

84. 有关久加诺夫意识形态上的演进,参见 Veliko Vujacic, “Gennardy Zyuganov and the ‘Third Road,’” *Post-Soviet Affairs* 12(1996):118—154。

85. 有关普列汉诺夫和他在意识形态上对俄共的影响,参见 John Dunlop, *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9—177。有关波特勃列兹金和他的组织,参见 *Chto takoe “Dukhovnoe Nasledie”* (Moscow: Obozrevatel, 1996)。

86. Zyuganov, Interfax, March 31, 1996, 此处引自 *Moskovskii Komsomolets*, April 2, 1996, 2。

87. 俄共副主席亚历山大·萨巴诺夫(Aleksandr Shabanov)于 1996 年 3 月 28 日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演讲。

88. 俄共的杜马代表、久加诺夫竞选战略的负责人之一阿列克谢·波特勃列兹金于 1996 年 6 月 10 日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演讲。波特勃列兹金的观点,参

见 *New York Times*, May 2, 1996。

89. 参见久加诺夫对选民的孤注一掷,引自 Viktor Khramaev, "Gennady Zyuganov ob'yavil pobeditelem," *Segodnya*, June 14, 1996, 1。

90. 作者与俄共竞选运动官员马克西蒙·迪阿诺夫(Maksim Dianov)和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Vladimir Akimov)于1996年6月的交谈。

91. 参见作者与叶利钦竞选运动的组织者弗拉基米尔·佐里金和瓦莱里·霍姆亚科夫(Valery Khomyakov)于1996年6月的访谈。

92. VTsIOM, *Prezidentskie vybory 1996 goda i obshchestvennoe mnenie* (Moscow: VTsIOM, 1996), 70。

93. Dmitry Polikarpov, "Poll says Lebed Alliance Boosts Yeltsin's Chances," *Moscow Tribune*, June 26, 1996, 1. 参见 Leonti Byzov, "Novyi Pere-del golosov," *Obshchaya Gazeta*, June 20—26, 1996, 8。

94. Fond Obshchestvennoe Mnenie, *Rezultaty Sotsiologicheskikh Issledovaniy* 67 (June 5, 1996); 4。

95. 笔者参加了在第一轮选举前两天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96. 作者在当时与大量俄共官员进行了访谈。另可参见 Aleksei Podberezkin, in Richard Boudreaux, "Zyuganov erred in Courting Nationalists,"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7, 1996。

97. Korzhakov,引自 *The Observer*, May 6, 1996, 5。

98. Timothy Heritage, "Yeltsin Team Nervous Amid Talk of Postponing Poll, Reuter, May 8, 1996。

99. 作者成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将军的代表进行的座谈(1996年3月)。

100. Boris Yeltsin, *Midnight Diarie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0), 24—25. 在与笔者的访谈中,丘拜斯回忆他第一次试图向叶利钦摆出理由证明推迟选举是一件错事,即推迟选举会损害叶利钦启动的民主化进程。但丘拜斯也用了—个策略性的观点,他断定推迟选举的法令会被俄共提交给宪法法院裁决,那样的话宪法法院会做出不利于叶利钦的裁决,那时选举进行而叶利钦就再没有机会赢了(作者通过通信对丘拜斯的访谈,2000年10月25日)。换句话说,权力制衡很明显地体现在反对推迟选举的理由当中。

101. 参见作者与总统顾问格奥尔克·萨塔罗夫于1996年3月的访谈。

102. Deborah Yarsike Ball, "How Reliable Are Russia's Officer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May 1996, 206。

103. 参见作者与所有叶利钦竞选运动的官员于1996年3—4月和6月的访谈,他们是:亚历山大·奥尔森、伊格尔·哈里乔夫、瓦莱里·霍姆亚科夫、伍亚乔斯拉夫·尼科诺夫、格奥尔克·萨塔罗夫、米哈伊尔·施奈德(Mikhail Schneider)和弗拉基米尔·扎里金。

104. Igor Malashenko, quoted in Michael Specter, "My Bori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26, 1998, 27.

105. Zyuganov, 引自 *Moscow Tribune*, July 5, 1996, 2.

106. 参见作者与俄共杜马人员的立法顾问亚历山大·索夫列夫(Aleksandr Sovelev)于1996年12月18日的访谈。

107. 参见 *Moscow Times* 发表的关于弄虚作假的特别报道,主要由叶夫杰尼亚·鲍里索娃(Yevgniya Borisova)汇编, www.themoscowtimes.com/indexes/90.html, 以及由欧洲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Europe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的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发表的报告, www.osce.org/odihr/election/rusoo-1-final.html。

108. 参见媒体对阿纳托利·库利科夫的访谈, *Nezavisimaya Gazeta*, July 23, 1999, 1.

第四篇

俄罗斯民主的未来

第九章

俄罗斯民主的质量

共产主义统治的终结并不紧接着民主统治的开始。比如俄罗斯就夹在两者之间。那些有利于俄罗斯民主制度出现的因素不一定改善民主制度的质量。有利于产生选举民主的基本游戏规则的不同因素,也会导致非自由的制度。1993年之后出现的俄罗斯民主制度,仍然缺乏自由民主制度中许多制度和观念上的特征。本章认为,俄罗斯从共产主义统治转型的特性——漫长、冲突和强制的过渡——已经阻碍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民主价值的巩固。换句话说,在转型的类型和出现的民主政体的类型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¹本书第一和第二篇所讨论的失败了转型对俄罗斯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结果。此外,更深层次的文化 and 历史力量也有助于非民主制度和规范延续到转型期之后。俄罗斯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陷于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之间的模糊区域。²

民主的巩固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概念——如此含混以至于许多人掷地有声地提出,它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³“巩固”这个词承载着比民主的稳定性更多的含义,还包括了民主的质量。自由民主制度几乎被定义为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们很少崩溃。然而,许多非自由的民主制度延续长达几十年之久,这表明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政治制度的质量是有区别的分析范畴,它们不应被归于“巩固”一词。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自由民主制度比选举民主制度更加稳定和巩固。此外,“如果民主政体是自由的话,它就更有可能得到巩固”⁴。结果,那些强化民主质量的因素和发展也会增进民主的稳定性。同时,选举民主或非自由的民主可能会有稳定的

性质,而不会表现出向更民主或更专制变化的动态标志。俄罗斯政治制度看上去显示了延续的迹象,但没有向着自由民主巩固的方向进展。

为了展开这些观点,本章首先评估俄罗斯政治制度,揭示了几乎所有领域都缺少自由。对俄罗斯政治制度各个部分的简要讨论包括行政—立法关系、政党制度、公民社会、媒体、国家、法治以及联邦主义。⁵ 随后一节讨论俄罗斯人对民主的态度。这一部分假设实践中表现糟糕的民主会减弱对民主的支持。然而,尽管表现糟糕的政治和经济已经经过了十年,但是大多数俄罗斯公民仍然支持基本的民主制度和规范,即使在承认国家的民主表现很糟糕的时候也这样。本章的最后一节想预测现行制度的这些非自由特征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

超级总统制

超级总统制是俄罗斯变化多端的转型过程中留下的最富争议和最具影响力的遗产之一。许多分析家把俄罗斯的总统制与独裁政体或是君主政体进行比较。⁶ 即使是那些反对专制标签的人也同意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像奥唐奈所说的是委托性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这就是说,在这一制度中,“无论谁赢得总统选举,都被赋予他或她所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权力,这一权力只受到现有权力关系的刻板事实与宪法规定的任期的限制”⁷。关于在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实际的总统权力实践的经验研究已经指出,克里姆林宫的占据者并不是如通常所想的那样无所不能。⁸ 然而,总统拥有太多权力这种看法意味着超级总统制妨碍了民主的巩固。胸怀挑衅性议程的精力旺盛的总统,比如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可能会利用这些总统权力以实施那些会进一步阻碍自由民主政体发展的政策。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对自由民主的发展没有好处。

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文化 and 历史向往一个强力领导人。⁹ 相反,总统职位直接产生于转型过程,然后不少权力被分配到这个职位。正如第三章所详述的,作为一种把叶利钦与俄罗斯人代会

隔离开来的制度创新,创建总统职位的主意在1990年俄罗斯民主界流传开来。民意调查显示,叶利钦在人民中受欢迎的程度要比代表们多得多。如果他能够确保直接选举授权,他就会比俄罗斯议会中的和苏联政府中的反对者获得一个更强有力的政治地位。推动建立俄罗斯总统职位是对一个具体的政治情景的回应,而不是精心安排的战略的结果,也不是为了迎合关于权力分立或制衡的政治哲学的需要。实际上,在总统的实际权力被写入宪法之前,关于俄罗斯总统的全民公决已经开始了。此外,这一制度创新的反对者没有认真对待公决动议。在公众投票以后,反对设立新的总统职位的人相信,他们会使它大体上成为一个象征性的职位。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投票之前,或在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之前,总统的权力没有明文规定。因为俄罗斯议会对修改宪法有独断的权力,叶利钦的反对者据此推断,议会可以通过修宪程序来限制总统的权力。

1993年9月设立俄罗斯总统职位的全民公决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3个月后叶利钦赢得决定性的选举胜利,而成为俄罗斯第一任总统。然而,那时总统的权力仍然十分模糊。只是1991年8月出乎意料的政变企图急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形势,使叶利钦获得了加强总统权力的机会。在1991年8月的政变企图以及随后局势不稳的几个月中,叶利钦总统在承担所有主要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动议的重大职责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总统职位的工作是开始建立处理这些危机的组织能力和权力——一种涉及新人员、新机构和对国家预算拥有更大的行政控制权的资源转移。起初,政府中总统部门的扩张没有遇到多少阻碍。然而,在1992年1月的激进经济改革开始以后,抵制的力量开始增长。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对立超越了经济问题,最终变成了议会或总统哪个政治机构最高的争论。正如第五章所述的,僵持最终变成了政府两大部门之间的武装冲突。

正是叶利钦在1993年10月冲突中的获胜为超级总统制宪法的生效创造了条件。叶利钦利用了他在10月的胜利而制定了新的超级总统制宪法,随后在1993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成功地使这个新的基本法获得批准。过了最初的犹豫阶段后,所有主要的政治家,包括那些1993年秋天被叶利钦镇压的人都承认了这一新的宪法秩序,并开始调整他们的行

为以按照这些新游戏规则行事。在 1996 年和 2000 年总统选举期间,所有主要的政治团体都竞选行政职务,包括那些早前抵制设立总统制观点的组织。对新职位的承认有利于使强力总统合法化和制度化。特别是在 1998 年 8 月的金融危机以后,新联盟周期性地赞成约束已经成型的总统权力。1993 年宪法使宪法修正极端困难,特别是如果制度中最有权势的人有意维持现状的话。这一非自由主义的制度发展——一种直接由俄罗斯转型的特性所产生的制度设计——将很难逆转。

政党制度

俄罗斯转型的类型也在正负两方面影响了政党制度的发展。在多元主义民主政治中,政党传统上作为“复杂的民主社会中代议结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起着聚合社会利益并在国家中代表这些利益的作用。¹⁰然而在俄罗斯,政党到目前为止在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中介上仅仅起了细枝末节的作用。没有较强大的政党,国家就永远不会遇到真正的反对。

俄罗斯政党制度已经发生了一些巩固的迹象。最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混合选举制度中比例代表制的一面有利于刺激杜马内以利益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型政党的发展。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三次议会选举之后,多党体制的核心得到巩固。¹¹这一核心由四个全国性政党组成——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亚博卢、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右翼力量联盟(Union of Right Forces)。这四个政党拥有许多在其他政治制度中议会政党的属性。首先,它们全部都参加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举行的所有议会选举。¹²它们四个中的三个在所有三届议会中都拥有代表席位。其次,所有四个政党都有相对定义清晰的政治取向、忠实的选民和有名的领导人。在 1990 年 12 月作者调查的焦点团体中,选民指出他们很了解这些政党。¹³最后,正如表 9.1 所示,四个政党中的三个在 1999 年选举中获得了与 1995 年大致一样的比例。

表 9.1 1995 年和 1999 年俄罗斯杜马选举中
政党投票的结果(全国比例代表投票的百分比)

政党或集团	1999 年	1995 年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24.29	22.7
亚博卢	5.93	7.0
右翼力量联盟	8.52	3.9(俄罗斯民主选择) 8.1(所有右翼政党)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日里诺夫斯基集团)	5.98	11.4
统一(Medved')	23.32	N/A
祖国—全俄罗斯	13.33	N/A
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1.2	10.3
其他得票率 5% 的政党	18.63	49.6

注: N/A 指不适用的, 因为没有参加这次选举。

考虑到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俄罗斯过去四年——1996 年总统选举、1998 年 8 月金融崩溃、走马换灯式的总理以及科索沃和车臣战争——这些数字代表了稳定。同样引人注意的是, 没有新的意识形态型政党为他们的政治职位而设法挑战这些既有政党。

这种原生型政党制度作为 1993 年秋天比例代表制引入杜马选举法的直接结果而出现。它不是结构或历史力量的产物。只有俄共作为一个政党在没有这一重要的制度创新的情况下设法成功地生存了下来。正如第六章所述的, 这一制度设计的决策是在 1993 年 10 月事件的混乱中做出的, 这部分是因为叶利钦政权的失算。然而在 1993 年之后, 叶利钦的班子无法凑足必要的票数来修改这一选举制度——一个有助于维持议会政党发展的制度遗产。

然而, 既有议会政党的核心集团没有主导其他选举, 并且对杜马围墙外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的每次总统选举的胜利者和大多数州长选举的获胜者都不是政党的党员。¹⁴ 虽然政党在弱势杜马中发挥作用, 但它们还不能渗透进任何一个行政部门, 这些是俄罗斯最具权力的政治机关。政党实际上在联邦委员会也不起任何作用。只有俄共在地方议会和市议会中有重要的表现。¹⁵ 在大多数地区, 一个由地方统治精英主导的、以国家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那就是, “执政党”制度——仍然主导着政治。

政党控制杜马选举和杜马活动也不能被假定为俄罗斯政治的永久特征。在单一议席选举中——它占了杜马席位的 50%——非党候选人在 1999 年选举中比他们在 1995 年选举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政党对党派代表名单的控制也受到了挑战。两个新联盟,由前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和在这次选举前几个月才成立的亲政府的统一党,在政党序列选举上加在一起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票数。这两个联盟意识形态取向微弱,没有组织能力,但有强劲的财政支持,并且领导人都是著名人物。它们的成功,特别是虚拟组织统一的成功,反映了巩固俄罗斯多党制的受挫。政党继续在组织国家杜马选举上发挥重大作用,在杜马内拥有重要代表权,但它们没有扩大对这一国家机构的支配权,实际上它们正在丧失其优势地位。如果政党丧失这块党派避风港,它们向俄罗斯政治生活其他领域的扩张就会遇到严重困难。

俄罗斯政党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七十年的共产党统治在俄罗斯社会内部造成了对政党政治严重的过敏反应。在 1990 年退党以后,叶利钦发誓不再加入其他政党,俄罗斯许多人对他的誓言深有同感。其他东欧国家能从前共产党时期恢复老政党,但是俄罗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仅有零星半点的竞争性政党政治,这样就没有政党文化可以复兴。当然,苏维埃制度产生了大量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实际上,苏维埃时代形成的组织和网络——它们是政党细胞(Party cells)、共青团网络(Komsomol networks)或是工会组织——继续成为后共产党时代最大组织的基础,首先包括最为重要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然而,这一继承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阻碍,而不是推动草根政党的发展。毕竟,这些苏联时代的组织是用来控制人的,让社会原子化并阻碍真正的政治参与。

第二个阻碍政党发展的因素与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的规模有关。如果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过渡包括首先改变政治制度的话,那么,成功的后共产主义转型就必须重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摧毁旧阶级和利益集团、促进新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成长。俄罗斯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表明,我们应该预见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的形成也会同样缓慢。俄罗斯政党在定位它们的纲领性方面或利益基础方面存在着困难。相反,20 世纪 90 年代的利益分野所表现的更多地是对改革的一般看法,而不是根据特

定的经济利益甚至是族族利益。¹⁶1990年至1997年之间的俄罗斯,政治形势和选举抉择经常极化为两个阵营——赞成改革的阵营和反对改革的阵营。在其他国家给稳定的政党制度划分界线的是更加一般性的分野,这种一般性分野现在在俄罗斯或许已经开始发展,极化开始消退,而政党认同开始产生。在2000年1月由蒂莫西·科尔顿(Timothy Colton)和本书作者进行的调查中,58%(N=1846)的应答者称他们与一个政党、运动或协会关系密切,而仅有35%的人回答没有这种关系。

今日俄罗斯政党发展的虚弱,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长时间的专制主义阴影和毫无结构可言的后苏维埃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政治行为体做出的决定也阻碍了随后政党制度的产生。政党发展的第一个战略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是总统制的发展。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总统制对政党发展的因势利导作用要小于议会制。¹⁷同样的情况已经真实地发生于俄罗斯。¹⁸这一制度约束在俄罗斯尤其明显,因为政党不控制政府组成甚至安排总统选举。谋求一官半职的人不需要有政党归属就可以获得职位,而在获得之后,他们无须与政党合作就能统治。

除了总统主义外,戈尔巴乔夫时代和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关于选举的时机和顺序的决定也完全妨碍了政党发展。一般来说,在转型期,政党在第一次选举或奠基性的选举中占据中心舞台。¹⁹然而,在苏联-俄罗斯的转型中,政党只是在头两次全国性选举——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1990年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才被组建起来。在接下来的一次重要选举即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政党也只发挥了微乎其微的作用,因为除了日里诺夫斯基外,所有的候选人都是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的。要是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举行选举,那么俄罗斯的政党就能够跟进,并为选民提供纲领性的选项。然而,叶利钦否决了在苏联终结后便立刻进行这样一种奠基性选举的建议,把新政党晾了两年,使它在政体中不起任何政治作用。下一次选举直到1993年12月才举行。到这个时候,大多数建立于1990年到1991年民主运动全盛时期的政党已经消失了。自由主义政党受到新选举推迟的损害最严重,因为许多选民把1991年到1993年痛苦的经济下滑与自由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及政策联系在了一起。毫不惊奇,新的抗议团体像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以

及老的共产党反对派组织,诸如俄共和俄罗斯农业党在头两次选举中表现出色,而自由派政党表现差劲。叶利钦也把选举岔开以便使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不同时进行,这一日程也阻碍了政党的发展。²⁰

第三个阻碍有效的政党制度发展的转型因素,是俄罗斯新的“经济社会”的特殊组织。²¹叶利钦的经济改革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被称为寡头资本主义——它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利益表达。²²资本仅集中在少数几个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具有活力的经济活动只存在于贸易与服务、银行业以及原材料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领域。1990年到1991年间所有种类的制成品生产急剧下降,在随后的10年里保持稳定。经过戈尔巴乔夫时代末期的繁荣以后,小企业的发展按GNP份额来计算已渐渐下降。资本从地理上看也高度集中,大约俄罗斯70%的资本集中在莫斯科。最终,资本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国家转移、私有化和贷款换股份计划的运作,俄罗斯银行依赖于国家提供的内幕消息、国家资产和金钱。国家和所谓的私人部门的亲密关系支持了寻租活动,而不是逐利活动。财富集中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俄罗斯公司财团的渗透程度已非同寻常。有研究估计,12个金融工业集团可能已控制了俄罗斯30%的GNP。²³

一个集中的、核心化的资产阶级如果不是像寄生虫般地也至少是密切地与国家勾结,这意味着利益表达已经被大企业控制,它们不必依赖政党来代表它们的利益。实际上,俄罗斯许多寡头经常在政权中担任职务,同时继续经营他们的金融帝国。就这些寡头对政治家和他们竞选活动的投资程度而言,他们更愿意直接与个人联系而不是通过政党结构。²⁴少数金融工业集团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已经盖过了俄罗斯其他经济主体的财富和权力,而这些主体传统上与政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先前国有企业的经理们曾经组成一个联合的游说集团,而现在已经分裂成几个行业和地区组织。农业部门保持了团结,并发展了与政党俄罗斯农业党的联系,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得更好,因此通过政党结构而在杜马和政府中代表了它的利益。同时,农业部门是虚弱的并处于没落之中,这意味着农业党也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正如他们在1999年选举的糟糕表现所呈现的那样。最容易被过度集中的资本主义所窒息的经济团体也

许是小企业和刚开业的企业。²⁵ 波兰这个人口不到俄罗斯四分之一的国家,夸口它到 1996 年为止除农业外还有 200 万个私有企业,而俄罗斯同一年只有大约 90 万个。²⁶ 过高的税收、通货膨胀、地方层面上的缺乏自由、黑手党和为垄断所控制的市场,已经联手为市场进入制造了一个艰难的环境。²⁷ 结果,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这一经济利益集团——它通常是许多巩固的民主政体的支柱和自由派政党的支持者——在俄罗斯是虚弱的、无组织的以及非政治化的。

劳工也无人指引且缺乏组织,因此它不能为政党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老的苏维埃工会在重新组织以应对资本主义挑战上反应迟缓。一个以行业为基础的声称拥有 4 000 万成员的工会联盟——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of Russia, FNPR)——经常认同经理而不是工人的利益,且已经渐渐丧失了这两个群体的信任,这使它在选举政治中式微。在 1993 年和 1995 年的议会选举中,独立工会联合会加入到了只获得了不到 2% 选票的选举团体。在 1996 年和 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独立工会联合会没有支持一位候选人。然而,新的工会没有填补空白。在 1991 年使苏联政府屈服的罢工委员会联盟——独立矿工联盟 (Independent Union of Miners)——因一贯支持叶利钦政府而在 90 年代早期就丧失了信任。其他新工会在联邦层面没有取得多少组织上的成功。²⁸

总之,一个初生的政党制度在俄罗斯已经产生,这主要是由议会选举制度中的比例代表因素所推动的。但是,这个制度是支离破碎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因而,在俄罗斯政治制度中组织和利益表达方面处于边缘化地位。像总统主义一样,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弱势,部分可归咎于拖拖拉拉的、对抗的转型。一个不同类型的转型——建立议会体制、进行真实的奠基性选举、或成功地培育一个更加成功的市场转型——可能会产生一个更加巩固和意义重大的政党制度。

公民社会

其他以大众为基础的组织没有填补俄罗斯弱势政党所留下来的代表

权真空。作为全国性反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公民组织公开的参政活动在9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²⁹自那以后,独立的公民组织在组织和管理国家政策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调查显示,只有很小一部分俄罗斯公民——在我们的调查中占9%——参加了非政府组织。³⁰各类公民组织仍然存在,虽然很难统计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但在后共产党时期的俄罗斯已经增长到了五万多个——这对苏联时代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³¹然而,公民组织占人口的百分比越来越小,对国家越来越不感兴趣并日渐与国家脱离关系,它反而在私人领域追求狭隘的议程。运动误入歧途已有若干年。

在解释俄罗斯脆弱的公民社会时,人们一定会明显地想到共产主义的遗产。苏维埃制度旨在摧毁所有独立的协会生活,并几乎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在家庭之外并不存在,它们被分割、非政治化并刻意避开国家,而不是影响国家。同时,苏维埃制度把私人生活堆砌在社会组织的金字塔里,它们在名称上模仿公民组织,但在实践中被用来控制社会。结果,当这个制度开始崩溃的时候,公民社会必须从头开始重建。在非共产主义的转型中,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它允许分层的并得到很好利益表达的公民社会在自由化过程中复兴。³²然而,俄罗斯没有公民社会可资复兴。帮助公民应付苏维埃时代生活困难的广泛的社会网络仍然存在于后苏维埃时代,以帮助俄罗斯人处理持续的经济困难。³³这些非正式的联系能在将来作为社会组织成长的基础。然而当前,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已主要被用来维系生存,而不是用来促进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利益。³⁴

在所有向民主过渡的转型中,尤其是那些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结合在一起案例中,公民组织在旧社会制度崩溃以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崩离析。在独裁统治之下,公民组织经常用来反对现有政权。当旧制度崩溃的时候,这些公民组织存在的理由也消失了。³⁵在适应新的经济制度方面存在的困难也进一步挫伤了对公民社会的热情,限制了对公民组织的经济支持。这个一般性的解释模式肯定适用于俄罗斯的转型,因为重要的和具有影响力的苏联时代的组织,比如民主俄罗斯,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的时候履行了委托给它们的权力。这些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的创立不是为了表达或汇集社会利益或游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

它们是为了摧毁国家。

俄罗斯转型道路上其他几个独一无二的因素进一步阻碍了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俄罗斯公民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来自俄罗斯经济的持续萧条。俄罗斯经济改革严重地打击了苏联时代自然产生的公民社会。一个新的内嵌于市场的社会不足以稳固地支持内嵌市场的社会组织。新公民团体和工会还只是刚开始界定它们的利益并确定它们的支持者。它们进行这一转型的时候,手头实际上没有任何经济资源。中产阶级——西方大多数公民组织的资助者——在俄罗斯发展缓慢,它在1998年8月金融崩溃的时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新劳工组织也控制不了什么经济资源,因为它们大多数的潜在支持者拼命要保住工作。外国资金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是过渡时期的临时措施;外界资源的支持可能会在培育俄罗斯公民组织和俄罗斯社会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时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公民组织开始迎合外国人的意愿而不是它们国内选民的意愿。³⁶

此外,已经威胁到以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同一经济改革过程,加强了一小部分在俄罗斯国家内部享有特权地位的经济行为体。³⁷在后共产党时代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可能是社会中唯一有组织的部门。

除了经济转型的类型以及从这一转型中产生的经济社会的类型,俄罗斯政治制度巩固的次序和类型也进一步阻碍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后共产主义公民社会的发展。俄罗斯的转型模式对公民社会——自由民主政体发展的关键部分——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1991年至1993年间政党发展的暂时中止使公民团体脱离了国家政治。如果政党制度不发达,那么公民组织影响国家(尤其是通过选举过程)的能力也会受到损害。到政党开始在1993年议会选举后的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割裂了。公民组织看不到参加选举过程的好处,而同时,政党看不到迎合所谓小的和能力不足的公民组织的选举利益。³⁸行政权力在俄罗斯国家的所有层次上的发展,已经对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最后一种负面影响。以大众为基础的公民组织与议会一起运作,比与行政机构一起运作要更加成功。³⁹总之,许多阻碍政党发展的相同转型因素也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起了相同的负面影响。俄罗斯不发达的公民社会使得国家能够以不受以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的制约而进行统治。

这种国家责任的缺失反过来损害了大众对民主的信心,并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阻碍了民主文化的发展。

媒 体

与政党的巩固或公民社会的发展相比,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独立的媒体方面——这是自由民主政体的重要因素——获得了较大成功。这一成功是转型时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实施的政策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诞生了新一代具有独立思想的记者和评论员。在改革的高峰时期,《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Argumenty i Fakti*)、《星火》和《消息报》站在政治阶级和公民社会的前列,领导着对民主改革的批评。新的独立报纸,诸如《独立报》(*Nezavisimaya Gazeta*)、《商人报》(*Kommersant*)和《编钟》(*Kuranti*)也第一次出现。附属政治组织的报纸和消息单也爆炸式地出现。在 1991 年,莫斯科的读者能在每一个市区的地铁站找到好几打各个政治派别的出版物。

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以后,市场化改革起初仍然进一步推动独立媒体的发展,包括最重要的电视。⁴⁰ 第一个私人电视网 NTV 由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创办,它提供了一个超出莫斯科的完全独立的信息来源。NTV 藐视政府取消其许可证的威胁,甚至对其创办者的人身威胁,对第一次车臣战争提供了严肃的全面报道,以一个严肃新闻机构的形象赢得了信任。私人的地方有线电视公司也在全国快速成长。虽然这些地方电视网在有线电视发展的初期用于新闻的时间很有限,但是它们成为一种独立的媒体,而不同于那些候选人在选举期间购买时间的媒体。随着这些电视台的成熟,它们就不断扩大自己的新闻报道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变得越来越不独立。俄罗斯寡头控制了大多数传媒资源,而国家继续成为所有媒体的最大所有者。⁴¹ 俄罗斯全国电视网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在 1996 年选举期间结束,当时 NTV 加入 ORT 和 RTR 而支持叶利钦。当 NTV 的总经理伊格尔·马拉申科

加入叶利钦竞选连任的班子而没有从他的电视岗位上辞职时,他模糊了竞选和媒体之间的分界线。在选举期间给予叶利钦毫无掩饰的正面报道,而对久加诺夫进行了很苛刻的批评报道,电视官员认为他们正在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他们认为,如果久加诺夫成为俄罗斯总统,它们都会被封闭。⁴²然而,自从做出这个妥协之后,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就没有完全恢复它们作为独立消息来源时的声誉。相反,它们被看作是它们所有者的传声筒。在普京统治之下,俄罗斯国家采取积极行动让媒体评论保持沉默。当 NTV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和 1999 年议会选举期间再次批评国家的时候,电视网受到了猛烈攻击,其中包括古辛斯基的被捕,最终 NTV 在 2001 年 4 月被大部分为国有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收购。忠于普京的人也控制了古辛斯基的报纸《今日》(*Segodnya*)和《结论》周刊(*Itogi*),这些行动表明不会容忍持批评态度的媒体。

俄罗斯金融机构和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小集团也吞并了俄罗斯许多全国性报纸。⁴³诸如《明天》(*Zavtra*)、《苏俄》(*Sovetskaya Rossiya*)等反对派出版物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发行的出版物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幸存了下来,但它们的发行量很小。地方报纸仍然对莫斯科的寡头保持独立,但它们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

俄罗斯从共产主义统治的转型的性质允许新信息来源和具有活力的独立媒体爆炸式的发展。总体来说,俄罗斯的印刷媒体仍不受国家控制并提供各种观点——这是俄罗斯麻烦重重的转型的正面遗产。同时,国家在拥有和管理这些媒体资源上仍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全国电视网上更是如此,这削弱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这一重要的民主制度。此外,新传媒公司没有盈利,这使得它们更容易受到国家控制。一个更加成功的市场改革会产生更加独立的媒体。

国 家

近来学术界已经强调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对民主巩固的重要意义。⁴⁴

在这一项中,俄罗斯的得分很低。俄罗斯国家成为其苏维埃前身的空壳。莫斯科做出的决策在“公园圈”(“garden ring”)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影响。^{*}苏联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比如单一货币、共同市场、安全、福利和教育等等,不再总是公共产品。国家的雇员必须通过谈判和罢工才能获得已完成工作的报酬。契约安排必须自我实施才能成功。^{**}黑手党、保安公司和私人武装已承担了保障个人安全的主要职责,这从根本上挑战了国家对使用武力的垄断。20世纪90年代的几年时间里,大多数交易都是用易货或美元的方式进行的,这使国家货币的作用变得微不足道。⁴⁵

然而,国家并没有萎缩和崩溃。相反,国家机构和官僚继续运作,甚至有所发展,它们为那些运作它们的人的个人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执行政策。⁴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家内部的腐败现象十分猖獗。对包括小企业在内的俄罗斯人的调查显示,人们把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不是黑手党(mafia)或高利率——看作是做生意最大的阻碍。⁴⁷更为稀松平常的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仍然是巨大的。经过十年的市场改革,俄罗斯的国家仍然是这个国家中最大的所有者。一般性的政府开支在90年代的后半期平均占GDP的40%,这一比例大大高于美国和其他成功的转型经济体。⁴⁸俄罗斯国家财政转移也仍比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大得多。⁴⁹然而,“大”不等于“有效果”。俄罗斯政府领导人在重建福利转移上无所作为,这意味着福利开支要高于西欧标准,而社会中最需要福利的人却没有得到关照。⁵⁰在整个90年代,供热、交通和电力服务提供给包括百万富翁在内的每一个人,而领取养老金的人过着低于贫困线的生活。在一项关于社会救助目标的跨国比较中,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报告说,与波兰的29%、爱沙尼亚的36%和美国的78%相比,仅有6%的俄罗斯社会救助达到占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最底层。⁵¹正如叶利钦雄辩地说到的,“国家在不应该它干预的时候干预了经济,而在它应该干预的时候

* 指国家的决定出不了莫斯科,比喻国家权威的式微。——校译者注

**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保证契约(合同)得到强制实施。但在转型中的俄罗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包括暴力)来实施契约,从而大大加大了交易成本。这说明了俄罗斯国家的衰弱。——校译者注

却毫无作为”⁵²。

苏维埃国家的衰弱比本书所讨论的转型时期要早。⁵³然而,近十年做出的个别决定加速了这一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采取的是致力于增加国家自主权的经济改革战略。然而,为了实施这一战略,两位改革者对由国家构成并内嵌于国家之中的利益集团发起了挑战。高层的极化对立产生了,使得按等级结构往下排列的国家机构追逐它们自身(通常是“私人”)的利益。当中央政府最终就基本政策再次达成一些微末的一致意见的时候,国家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也丧失了自主权。虽然国家组织化的制度变迁有利于把国家决策者与以大众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的影响隔开(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也是错误的),但是,这些相同的制度创新使国家更容易受到新经济精英小团体压力的影响(这是他们最不担心的,也是错误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益中介的这一结合方式反过来阻碍了一个有效率国家的发展。在普京统治之下,联邦政府从寡头那里获得了更多自主权,但到目前为止他没有用这一新的国家权力去推进民主。实际上,他做了相反的事情。

法 治

司法独立的缺失以及遵守法治的程度不够,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构成了俄罗斯自由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制度障碍。当然,苏维埃遗产阻碍了法治的发展,因为苏联的制度无论怎样都没有赋予法院自主权,并传播了一种犯罪和规避法律的文化。⁵⁴转型时期进一步损害了司法独立和法治制度的观念和实践。

在最高层次,独立的司法制度的观念在政治自由化的最初阶段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经常谈到建立一个法治国家的需要,在那里,所有公民都服从法律的权威。俄罗斯的立法者没有用言辞而是用实际行动于1991年创建了俄罗斯宪法法庭。宪法法院与司法制度其他部分的

关系特别是与最高法院的关系没有被很好地界定,但是,宪法法院的建立被大多数人看做是俄罗斯向法治发展的一个进步。

宪法法院迅速摆出一个积极的姿态。美国最高法院等了几十年才做出它的第一个重大判决,而俄罗斯宪法法院却在让共产党为苏联时代所犯罪行承担责任案同意举行听证的时候,便立即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法院在这次审判中的判决是含糊的,它让双方都宣称获得了胜利。然而,一个采取积极立场的法院的先例就这样建立了。此后不久,法院在没有行政资源执行判决的情况下裁决各种案件。当1993年时任宪法法院院长的瓦莱里·佐里金在秋天危机中毫不含糊地支持白宫保卫者时,法院因放弃了在总统和议会间的仲裁权威而受到损害。此后的一年里,法院不再发挥作用,只是在叶利钦增加了法官数量以削弱反对者的发言权之后才重新开始工作。自从重开宪法法院之后,法院以及日益自命不凡的最高法院在树立一些独立于总统的自主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进步是逐渐增长的。

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做出重大判决的时候,这些判决的意义不大。连联邦行政权力都不能执行它们自己的法令,更不用说执行法院的判决了。对法院的资助是个无底洞,导致了全面腐败。此外,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在管辖权上发生了冲突。这一高层的僵局让那些较低级别的法院,特别是共和国的法院,不理睬联邦的决定。更一般的,这些较低级别的法院在应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的挑战方面变革缓慢。保护财产权、主持破产程序、履行合同以及保障竞争的司法制度纳入制度轨道的进程刚刚开始。⁵⁵1995年议会通过的《民法典》是创立这些制度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些法律的执行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当企业经理们寻求创造性的法律手段来确保履行他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时,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进步表现得最为明显。⁵⁶法治在刑法和民法事务上更为薄弱,特别是因为法院和警察用于执行法律的资源更少。

为了建立一个遵守法治的国家,单个俄罗斯法官、律师和公民必须采用一种与法律的全新关系,使之成为来自社会的防卫工具而不是国家手中的控制工具。虽然国家利用法律实施高压统治的能力已经被削弱(尽管它肯定没有消失),但是各种社会角色没有让法律为他们的目标服务。

相反,一种法律的缺失感,特别是在刑法案件中,让俄罗斯社会感到害怕并要求国家采取更多专制行为,而不是相反。但是,俄罗斯衰败的国家没有能力执行法律,无论它们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产生了一个虚弱国家的相同转型因素也阻碍了法治的发展。

分 权 化

阻碍俄罗斯自由民主巩固的最后一个制度因素,是在国家和次级国家机关之间缺乏明确的权责界限。重要的是,俄罗斯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赞成联邦解体,那些共和国领导人除了车臣之外同样也没有公开赞成完全独立。俄罗斯联邦看起来已经避免了崩溃,许多人曾在1991年8月苏联解体之后预测过这种崩溃的命运。与此同时,联邦主义也没有被制度化。

联邦制国家是非凡的创举,它其实是让两个政府管理同一块领土。为了实现真正的联邦制,国家必须在国家和次国家单位之间“划定权力范围”,以便每个政府在它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保持自治;地方政府也肯定享有“制度化的自主权”,这限制了国家政府任意使用权力。⁵⁷保持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对所有联邦制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历史上大多数此类国家在某些时候没能达到这一标准。中央政府经常会通过插足地区和地方政府的管辖权来搞乱这一联邦制的平衡,而地方政府通过把责任转移给联邦政府或逃避其分配公共产品的义务,也会损害联邦结构。⁵⁸甚至最强健的联邦制国家的历史也表明,中央和次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总是处于游移之中。

更加困难的是从单一制国家的废墟中来创建联邦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苏维埃遗产在影响俄罗斯内部联邦关系的产生方面起了强大的作用。与美国的情况相比较,有主权的各州走到一起,同意出让一部分自己的主权,以在一个新联邦的层面上产生公共产品。在那些从单一制国家转变成联邦制的案例中,就像俄罗斯的情况那样,次国家政府已经享受了一定

的合作收益,计谋或骗局是让它们自愿为这些收益付出代价。同时,单一制的中央政府也必须放弃一些权力。更一般地,当单一制国家开始走向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权化时,结果经常是增加构成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联邦化”中的同时性问题通常导致国家的崩溃和解体。⁵⁹然后,就俄罗斯的联邦主义而言,历史遗产在阻碍民主的巩固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俄罗斯内部在苏联时代建立的以族群为基础来划分共和国的结构,构成了另一个延缓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发展联邦制度的历史遗产,因为这些边界为国家的进一步解体提供了自然的现成的分界线。⁶⁰

同时,俄罗斯转型模式的性质进一步加重了联邦的困境。在挑战苏联权威的过程中,叶利钦和他的政治盟友自觉和有意识地把他们的斗争刻画成与主权相关的问题。叶利钦对主权话语的运用,部分是为了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形成一个与自治共和国和州领导人的联盟,敦促他们在1990年夏天“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然而,在苏联解散以后,这些宣言成为叶利钦的噩梦。为了扩大他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联盟,叶利钦使用了主权的话语,威胁说要损害他的新国家的领土完整。像与他之前的戈尔巴乔夫一样,叶利钦想与各共和国领导人签订一个新联邦条约。当有关新宪法的协议拖而未决的时候,俄罗斯联邦看上去越来越像要崩溃了。

然而,1993年10月的悲剧性冲突为设计一个更加持久的联邦制度创造了新的契机。在新宪法通过以后有关联邦的争论并没有自动停止,这部分是因为新宪法没有包括联邦条约,这一疏漏让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和鼓吹不对称联邦制的自由主义者十分愤怒。尽管存在这些反对意见,但是,1993年的十月事件和随后新宪法的通过,这些举动开始收回俄罗斯联邦内被下放的权力。新宪法书面上取消了赋予各共和国的许多特权,使它们与其他领土单位——边疆区、州和自治区相平等。与此同时,宪法允许非对称联邦主义的实践继续存在,但安排了一个允许中央政府参与单个地区间的双边协议的条款。⁶¹新宪法也没有规定脱离条款,这一制约除了车臣之外被所有的地方领导人所接受。⁶²其他各共和国也继续使莫斯科参加到一系列双边条约中,把它作为一种索取更多让步的方式。⁶³但是,除

了车臣之外的任何一个共和国完全独立的威胁看上去已成为过去。相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和管辖权分割仍处在变动及持续协商之中。只要中央政府仍然很虚弱，莫斯科便不会有兴趣制定明晰的规则——这是一个稳定的联邦秩序的必要条件——因为任何明晰化的举动都会引起地方明显的违抗并由此使中央的弱点暴露无遗。⁶⁴相反，叶利钦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特别想和单个地方领导人进行个别协商。这一策略在解决避免解体的问题上成功的，但也使与联邦主义相对立的做法制度化了。⁶⁵

分权化和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增长对莫斯科的专制统治形成了最为重要的制约。这是俄罗斯麻烦重重的转型的正面结果。普京总统在2000年春上台以后，发出威胁要逆转分权化的趋势。如果实施重新集权的错误措施的话，这场斗争将损害民主。不过，俄罗斯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率的政府——有效的、民主的中央政府。作为多年以来中央内部对立和僵持的一个结果，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国家机关实施国家政策的能力受到了相当大的削弱。甚至连基本的国家运作，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转移，在20世纪90年代也没有持续地运行。⁶⁶中央政府的软弱也使地方独裁得以巩固。俄罗斯稳定的联邦制的巩固仍只能在遥远的将来出现，在情况发生之前，自由民主一般不会得到发展。

俄罗斯民主脆弱性的个人态度指标

俄罗斯久拖不决、困难重重的自共产主义统治的转型有损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它也损害了社会内部对民主观念和习惯的支持。在苏联—俄罗斯转型的早期阶段，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民主观念和自由价值的态度与那些处于同样转型的东欧国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⁶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支持下降了，并落在了实现成功转型的东欧国家之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公民仍相信诸如言论自由、更多的个人权利和有限及分立的政府之类的自由观点。1998年的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禁止集会和游行(66%)、取消选举

(62%)或建立传媒检查制度(53%)。⁶⁸由蒂莫西·科尔顿和本书作者在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进行的调查中,85.7%的俄罗斯受访对象声称,选举国家领导人很重要(10.4%的人认为不重要),74.9%的人认为言论自由很重要(15.3%的人认为不重要),69.4%的人认为宗教自由很重要。当被问及“你支持民主观念吗”的问题时,62.9%的人作肯定回答,只有18.6%的人作否定回答。在回答“个人权利必须被捍卫,即使有时免去罪责”问题的时候,8.6%的人完全同意,31.1%的人表示同意,而只有24.8%的人不同意和4.1%的人完全不同意。当被问及“如何在俄罗斯产生秩序”的问题时,只有15.2%的人回答“不惜一切代价”,而有令人吃惊的51.3%的人回答“不得侵犯权利”。当被问及“你准备支持能带来秩序的国家紧急状态吗”的问题时,一个相当高的数字——31.0%的人作了肯定回答,但大多数人(52.4%)作了否定的回答。当被问及“军队是否应该统治国家”的问题时,70.5%的人回答这将是相当糟糕或糟糕透顶的统治方法。大多数俄罗斯人明确支持民主的一般理念。关于精英的定性研究也显示了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强烈支持。⁶⁹

表 9.2 公共舆论调查

单位: %

总体上,你对于民主在俄罗斯正在如何发展,是完全满意、满意、不满意或是完全不满意?	
完全满意	0.4
满意	11.0
不满意	54.4
完全不满意	24.3
很难说	9.6

资料来源:科尔顿/麦克福尔的调查,1999—2000年。

然而,对俄罗斯民主给出的评价在20世纪90年代末很低(参见表9.2)。同时,选择共产主义制度而非新政治经济制度的人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在1998年的一次调查中,72%的俄罗斯调查对象对前戈尔巴乔夫政府表示认可,而只有35%的人倾向于现政府(表9.3)⁷⁰。我们在1999—2000年进行的调查显示了一种对旧制度的怀念之情。行为与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但这两个变量在这一转型中表现出相当模棱两可的关系。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后期,“在

(1991年8月)政变之前进行的所有公众调查都表明了对民主的强烈支持态度,但直到(1991年)政变才有行为上支持的证据”⁷¹。十年之后,相反的情况发生了。调查显示,大众对民主的支持态度正在衰减,而到目前为止,支持民主的行为上的证据仍很强烈。态度上的这一趋势对自由民主的发展不是很有利。

表 9.3 公共舆论调查

单位: %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俄罗斯的?	
改革前在我国实行的苏维埃制度	46.6
当今存在的政治制度	11.3
西方模式的民主	11.7
很难说	18.5

资料来源:科尔顿/麦克福尔的调查,1999—2000年。

学者认为,要维持民主就必须让公民崇敬民主并愿意为之奋斗。⁷²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在俄罗斯还没有取得受尊崇的地位。大多数人仍然支持民主,就俄罗斯民主在上一个十年的表现如此之差来说,这一事实让人吃惊。当然,我们只能在事实发生之后——即在那些握有国家权力的人采取行动改变民主游戏规则以后才能知道俄罗斯社会是否准备捍卫民主的实践。然而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俄罗斯重新出现一个专制联盟的话,大众的抵制行动是不可能的。⁷³

传统因素而非长期的文化特质导致了俄罗斯对民主支持的下降。低落的经济改革记录在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当前对政治制度不满时表现得最为突出。没有哪种政权能够承受十年之久的经济衰弱。在俄罗斯,经济增长方面史无前例的下降发生在一个标榜自己是民主的政权统治之下,这让民主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公众意见调查已经指出,人们不仅仅对总体经济情况不满,而且也对俄罗斯民主政权实施的特定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例如在1999年,80%的俄罗斯人对俄罗斯私有化持否定的态度。⁷⁴

虽然很难汇总公众对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清醒认识,但是政府糟糕的政治表现显然也能揭示俄罗斯公民对民主支持的下降。俄罗斯共产主义之后的领导人和叶利钦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但作出非民主的举动,他们做了太多让民主名誉扫地的事情。例如,1993年10月叶利钦决定以

武力解散议会,这是对民主原则的真正打击。虽然支持叶利钦解散议会的人要多于反对的人,但是那时的公众舆论调查显示人民给俄罗斯民主的打分很低。⁷⁵同时,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之后,替换政治制度的呼声开始上升。毫不奇怪,只有一半的人口参加1993年12月的选举,而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一个与10月悲剧性冲突的双方都毫不相干的持异议的候选人。叶利钦进驻车臣的灾难性决定损害了他“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因为他做出这一决定没有征求反对战争的大多数意见。1998年,俄罗斯公民把车臣战争列为现政权的最大政治失败,排在了苏联解体、丧失国际声望以及犯罪和腐败之前。⁷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选举过程有助于结束战争,因为叶利钦1996年的竞选班子相信,要想使叶利钦连任成功,他必须结束战争。然而,公众投票和公共政策之间像这样的直接因果关系很少见。⁷⁷

俄罗斯有缺陷的民主:临时的还是永久的伤疤?

超级总统制,一个制度化很弱的政党制度,一个组织不力的公民社会,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和进展缓慢的法治,这些都构成了俄罗斯新民主政体的一长串缺陷。虽然自1993年以来得到巩固的俄罗斯制度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巨大改进,但它缺少许多自由民主的特性。这些制度缺陷反过来损害了俄罗斯国内对民主的支持态度。没有理论上或经验上的理由来假定,选举民主是通往自由民主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俄罗斯可能会在不完全民主阶段盘桓很长时间。同时,这些重要的自由制度持续的弱点肯定会销蚀选举的意义或是宪法的重要性。在1996年和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国家与它经济上的盟友在弱化竞争和保住那些掌权者方面动用了巨大的力量。国家强势和社会弱势也发生在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中。大多数重要职位的选举已经变得只有很少竞争性而不是很多的竞争性。

俄罗斯当前政治制度的非自由主义属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转型期所做出的决定建立了这些制度。将来的决定也会改善这些制度。例如强

势总统在俄罗斯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在1999年和2000年我们进行的调查中,只有24.7%的调查对象认为,议会应该比总统强或强得多,44.5%的人回答总统应该与议会平起平坐。几乎每一个政党都对加强议会权力感兴趣。地方行政长官虽然对强力地方议会感到担心,但他们也对削弱总统特权感兴趣,因为一个被削弱的中央权威会增加他们自己当地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企业也对削弱总统的权力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一个强大到能给予他们财产的总统也有足够的力量夺取他们的财产。

俄罗斯寡头们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获得了财产转让契约,他们现在开始对限制总统的做法感兴趣,以便普京或他的继任者不会拿走这些契约。1998年的民意测验显示,40%的俄罗斯人想修改宪法以削弱总统的权力,而只有26%的人想给最高行政长官更多的权力。⁷⁸当然,支持强势总统的唯一有力量的角色是总统,是普京或他的继任者。宪法规定的艰难的修宪程序强化了总统维持一个强势总统制度的能力。转变不会来得很容易。

从长期来看,政党发展显得比削弱行政权力的未来更有希望。与已经经历了后共产主义转型的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在减少议会中“有效政党”的数量方面进展得更加缓慢。⁷⁹然而,它的轨道好像是朝着巩固而不是碎片化的方向。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参与竞争的政党要比1995年的议会选举来得少。选民的支持也大多集中在一小部分政党上,因为选民不想把他们的选票“浪费”在不能通过5%门槛的政党身上。⁸⁰1995年,有半数的选票投向了那些跨越5%门槛的政党。1999年,这一数字降到了18.6%。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我们应该期待政党会更坚定地与受到良好定义的社会团体站在一起,并拥有更清晰表达的议题。政党发展的结构、制度和地理上的阻碍因素仍将存在,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弱点仍将长期存在。但支持政党发展的因素的存在表明一个弱势政党制度不应该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永久特征。

不必看透水晶球。关于非自由制度长期存在的同样的不确定性,可以被援引来说明当今俄罗斯民主几乎每一个非自由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人们更了解资本主义与利益中介是如何运作的,公民组织会具有扩张的潜力。⁸¹选举的反复进行有助于教育公民群体关于动员和

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当经济增长最终持续了一段时期以后,它会让公民群体获得现在匮乏的资源。同样,资本主义的成长会为法治的发展创造动因。当所有者成为逐利者和投资者而非寻租者的时候,他们会出于保护其财富的考虑而增强他们通过法治进行协商的能力。⁸² 甚至俄罗斯虚弱的国家也不会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永久特征。新的高层领导人、俄罗斯寡头的进一步被削弱以及经济增长,是三个会改变国家现在的虚弱状况的外在触动因素。最后,从长期来看,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遗产对民主的巩固有一定的正面效应,这一点必须牢记。与发展中世界许多正在经历民主化转型的国家相比,俄罗斯具有极高的识字率和相当高的中位数收入,这些因素有利于维持和改进民主制度。⁸³ 虽然在过去的十年平均收入下降的同时贫富差距在增大,但是从长期来看,俄罗斯仍然有维持民主的社会经济面貌。

这些变化没有一个必然会发生。俄罗斯非自由制度的延续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也会存在若干年。这些非自由制度反过来使得俄罗斯发生民主崩溃的可能性要高于中东欧国家较为自由的民主国家。同时,俄罗斯民主的非自由特征也不像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永久特征。重要的是,社会中的重要集团有改变现今这些非自由制度的动因。这一权力平衡表明,俄罗斯自由民主的斗争将会比选举民主的斗争更为持久。

注 释

1. Terry Lynn Karl,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 (October 1990): 1—22; Terry Lynn Kar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8(1991): 159.

2. 有的时候,这些制度被称为未巩固的民主或非自由的民主,它们在上一波民主浪潮中流行起来。参见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s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 2, 此书中出现了模糊区域的隐喻;同时参见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6(November-December 1997): 22—43.

3. 特别参见 Guillermo O'Donnell,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7(1996): 34—51.

4.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20.

5. 这个列表中提到的项目形同于胡安·林兹(Juan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蒂潘(Alfred Stepan)所讨论的“巩固”领域,参见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Peter Reddaway and Dmitri Glinski, *Market Bolshevism: 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 (Washington, D. C.: U. S. Institute of Peace, 2000); Lilia Shevtsova, *Yeltsin's Russia: Myths and Realitie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

7. Gu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994): 59. 然而,与其他使用这个定义的人不同,奥唐奈认为“委托性民主并不与民主传统相背。它比代议制民主更民主,但少了些自由”(p. 60)。

8. Thomas Remington, Steven Smith, and Moshe Haspel, "Decrees, Laws, and Inter-Branch Relatio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ost-Soviet Affairs* 14 (1998): 287—322.

9. 有关俄罗斯在文化上倾向专制统治的内容,参见 Stephen Whi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对这些争论的评论,参见 Russell Bova, "Political Culture, Authority Pattern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New Russian Democracy," in *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 Explorations i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ed. Harry Eckstein, Frederic Fleron, Eric Hoffmann, and William Reisinge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177—200.

10. Seymour Martin Lipset, 引自 Philippe Schmitter,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Group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5 (1992): 43.

11. Robert Moser, "The Impact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on Post-Communist Party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1993 Russ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14 (1995): 377—398; M. Steven Fish, "The Advent of Multipartyism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1 (1995): 340—383; Michael McFaul, "Party Formation and Non-Formation in Russia: Institution, Actors, and Cha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forthcoming.

12. 右翼力量联盟没有参加 1995 年和 1993 年的选举,尽管这一选举集团内的核心政党俄罗斯民主选择参加了 1995 年的选举,它的前身俄罗斯选择参加了 1993 年的选举。

13. "Formirovanie politicheskikh ustanovok i prepochtении naseleniya Rossii v khode parlamenstkikh vyborov; kratkii otchet" (Moscow: Fond Ruskii Proekt, January 2 000), two volumes. 有关派性的内容参见 Timothy Colton,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 4.

14. Michael McFaul and Nikolai Petrov, "Russian Electoral Politics after Transition: Regional and National Assessments,"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38(1997): 507—549.

15. 凯瑟琳·斯托纳-韦斯(Kathryn Stoner-Weiss)根据她对地方立法机关政党代表的细致研究,提出在1999年只有11.5%的地方议会议员有政党归属,其中7.3%为俄共,前面提到的其他三个议会政党的比例小于1%。Stoner-Weiss, "The Limited Reach of Russia's Party System: Under-Institutionalization in Dual Transitions," manuscript,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23. 同时参见 Aleksei Kuzmin, "Partii v regionakh," in *Formirovanie partiino politicheskoi sistemy v Rossii*, ed. Michael McFaul and Andrei Ryabov (Moscow: Moscow Carnegie Center, 1998), 137—151.

16. 参见 Stephen Whitefield and Geoffrey Evans,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Partisan Divisions in Russian Politics," in *Elections and Voter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ed. Matthew Wyman, Stephen White, and Sarah Oates (Glasgow: Edward Elgar, 1998), 68—99.

17. Juan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Arned Lijphart, "Presidentialism and Major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Juan Linz and Arturo and Arturo Valenzuel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3—90 and 91—105;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18. Robert Moser,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Presidentialism in Post-Soviet Russia,"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4(1998): 54—75.

19.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vol. 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57.

20. Matthew Shugart and John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 有关这一概念的表述以及它对民主巩固的重要意义,参见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22. 有关这些寡头发迹的情况以及他们在国家中的权力,参见 Vladimir Lepckhin, "Gruppy interesov kak osnovnoi sub'ekti sovremennoi rossiiskoi politicheskoi sistemy," in *Michael McFaul and Andrei Ryabov, Formirovanie partiino politicheskoi sistemi v Rossii* (Moscow: Moscow Carnegie Center, 1997), 97—136; Juliet Johnson, *a Fistful of Rubles*; and Chrystia Freelan, *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apitalism*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00).

23. Sector Capital, "Who Rules the Russian Economy?" (Moscow, December 9, 1996), 6.

24. 参见作者与竞选运动顾问团尼科拉 M(Nikkola M)的副主席叶卡特琳娜·叶戈洛娃(Yekaterina Yegorova)于1999年5月的访谈。

25. Anders Åslund,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Private Enterprises in Russia,"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y* 38(1997):191—205.

26. Timothy Frye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1997):353—359.

27. Barry Ickes, Peter Murrell, and Randi Ryterman, "End of the Tunnel?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3(1997):105—133.

28. Leonid Gordon, *Polozhenie naemnykh rabotnikov v Rossi 90-kh godov* (Moscow: IMEMO, 1997), esp. chap. 5.

29. Mark Beissinger, "Protest Mobiliz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ssue and Event Analysis,"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June 1995; William Reisinger, Arthur Miller, and Vicki Hesli, "Political Behavior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Soviet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s* 57(1995):941—971.

30. 俄罗斯在1998年利用 VTsIOM 的数据提出,仅有9%的俄罗斯公民参加志愿组织。参见 Richard Rose, "Getting Things Done with Social Capital: The New Russia Barometer VII,"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Glasgow) 303(1998):60。蒂莫西·科尔顿和本书作者在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尽管所用的限定词范围更小,但还是发现只有2.4%的调查对象参加非工会的政治组织或协会。就工会而言,34.4%的调查对象称他们为工会会员,64.6%的人不是工会会员。在11月13日和12月13日之间总共访问了1919位的选民,杜马选举后的12月25日至1月31日之间再次访问了其中的1842位。他们选自多阶段区域——达到选举年龄人口的可能性样本,在俄罗斯联邦33个地区都有样本。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担这项工作,它由波利纳·科兹列娃(Polina Kozyreva)和米哈伊尔·科索拉波夫(Mikhail Kosolapov)领导,赞助方为自然科学基金与欧亚和东欧研究全国理事会。第三阶段有关总统选举的调查于2000年4月和5月完成。这些调查随后被称为“科尔顿—麦克福尔1999年和2000年调查”。

31. 慈善援助基金估计俄罗斯有6万个非政府组织,而美国国际发展署的统计是8万个。我要感谢利萨·麦金托什-森德斯特伦(Lisa McIntosh-Sundstrom)提供了这些资料来源。参见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Working With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Russia* (London: Basic Books, 1997);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U.S. assistance to the NIS, *U.S. Government Assistance to and Cooperative Activities with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FY 97 Annual Report, Publication 10547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8)。

32. O'Donnell and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48.

33. See James Gibson, "Social Networks,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nsolidating Russi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manuscript,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9.

34. Rose, "Getting Things Done with Social Capital."

35. Marcia Weigle and Jim Butterfield, "Civil Society in Reforming Communist Regime," *Comparative Politics* 25(1992):1—23.

36. Valerie Sperling, *Organiz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Engendering Tran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 9.

37. Terry Moe, *The Organization of Intere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91—192.

38. 这一观察的结果建立在作者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和在俄罗斯为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而工作的外国人的大量访谈基础上。

39. Lijphart, "Presidentialism and Majoritarian Democracy."

40. Ellen Mickiewicz, *Changing Channels: Televis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1. 有关的观点,参见 Mark Whitehouse, "Buying the Media-Who's Behind the Written Word" *Russia Review*, April 21, 1997, 26—27; Floriana Fossato, "Russia: Changes Sweep through Two TV Networks," *RFE/RI*, November 5, 1997。

42. 在 1996 年竞选期间作者经常与俄罗斯记者联系,因此听说了这一辩解之辞。

43. Oleg Medvedev and Sergei Sinchenko, "The Fourth Estate-Chained to Banks," *Business in Russia*, no. 78 (June 1997):38—43.

44.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and 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45. David Woodruff, *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46. 换句话说,一直作祟的旧苏维埃国家运作的机构问题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日益恶化了。参见 Vladimir Pastukhov, "Parodoksal'nie zametki o sovremennom politicheskom rezhime," *Pro et Contra* 1(1996):6—21。

47. Andrei Schleifer, *Government in Transition*,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783 (October 1996).

48. Andrei Illarionov, "What Went Wrong? The Roots of Russi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Democracy* 10(1999):73.

49. World Bank, *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122; Gilles Alfandari, Qimiao Fan, and Lev Freinkman, "Government Financial Transfers to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Restructuring," in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and Economic Policy in Russia*, ed. Simon Commander, Qimiao Fan, and Mark Schaffer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6), 166—198.

50. Mark Foley and Jeni Klugman,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Errors of Leakage and Exclusion," in *Poverty in Russian: Public Policy and Privacy and Private Responses*, ed. Jeni Klugman (Washington, D. 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the World Bank, 1997), 189—210.

51. Branko Milanovic,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8), 113.

52. Quo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97.

53. Thomas Graham, "A World without Russia?" paper delivered at Jamestown Foundation Conference, Washington, D. C., June 9, 1999.

54. Kathryn Hendley, *Trying to Make Law Matter: Legal Reform and Labor Law in the Soviet Un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有关苏联时代犯罪的情况, 参见 Arkady Vaksberg, *The Soviet Maf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55. Karen Halverson, "Resolving Economic Disputes in Russia's Market Economy,"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1996):59—113.

56. Kathryn Hendley, Peter Murrell, and Randi Ryterman, "Law Works in Russia: The Role of Legal Institutions in the Transactions of Russian Enterprises,"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9.

57. Yingyi Qian and Barry Weingast,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Essays in Public Polic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5), 4—5.

58. William Riker, *Federalism: Origin, Operation, and Signific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59.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0. 有关以民族为基础的共和国在这场联邦的斗争中所拥有的优势, 参见 Daniel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a Post-Communist Order," *World Politics* 49(1997):212—249.

61. 然而, 宪法中仍保留了发展不对称联邦制的空间。参见 Edward Walker, "Federalism-Russian Style,"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42(1995):3—12.

62. 从正式的角度来说,图瓦共和国宪法仍保留了脱离联邦的权力,但是共和国没有采取实现这样目标的行动。

63. 参见 Kathryn Stoner-Weiss, “Central Weakness and Provincial Autonomy: Observations on the Devolution Process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5 (1999): 87—106。

64. 参见 Svetlana Tsalik, “Reputation-Building for Domestic Audiences: Governance of Center-Regional Relations in Weak States,”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65. Steven Solnick, “Hanging Separately? Cooperation, Cooptation, and Cheating in Developing Federations,” manuscript,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66. 例如,伊拉列奥诺夫(Illarionov)曾计算出联邦政府在1997年仅获得政府收入33%中的11.6%,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留下了税收的大头。参见 Illarionov, “Routs of Russia’s Financial Crisis”。

67. Boris Kapustin and Igor Klyamkin, “Liberal’nye tsennosti v soznanii rossiyan,” *Polis* 2(1994): 39—75; Ada Finifter and Ellen Michiewicz, “Redefin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USSR: Mass Support for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992): 587—874; James Gibson, Raymond Duch, and K. Tedin,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Politics* 54(1992): 329—371。

68. USIA, “Russians Value Civil Liberties, but Know They Are Long Way from Democracy, Rule of Law,” *Opinion Analysis*, M-158-99, August 6, 1999, 4. 这一调查是由 ROMIR 于 1999 年 7 月进行的。

69. 参见 Sharon Werning Rivera, “Explaining Elite Commitments to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Arthur Miller, Vicki Hesli, and William Reisinger,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among Mass and Elite in Post-Sovie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1997): 157—190; Judith Kullberg and William Zimmerman, “Liberal Elites, Socialist Masses, and Problems of Russian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1 (1999): 32—358。然而,库尔伯格和齐默尔曼(Kullberg and Zimmerman)发现在精英和公众价值观之间存在一个现实的鸿沟,后者表现出的是更加非自由的意识形态。

70. Richard Rose and Doh Chuill Shin, “Qualities of incomplete Democracies: Russia, the Czech Republic and Korea Compared,”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Glasgow) 302(1998): 21。

71. James Gibson, “Mass Opposition to the Soviet Putsch of August 1991: Collective Action, Rational Choice,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1997): 672。

72. Barry Weingast,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1997):251..

73. James Gibson, "A Mile Wide but an Inch Deep(?): The Structure of Democratic Commitments in the Former USS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1996):396-420. 波兰 1981 年的经验不具启发性。虽然“团结工会”宣称拥有 1 000 万会员——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波兰军队在宣布军事管制法之后数周内成功镇压了所有的叛乱。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性。

74. Elena Avrayamova, "Vliyanie sotsial'no-ekonomicheskikh faktorov na formirovanie politicheskogo soznaniya," in *Rossiiskoe obshchestvo: Stanovlenie demokraticheskikh tsennostei?* ed. Michael McFaul and Andrei Ryabov (Moscow: Moscow Carnegie Center, 1999), 13.

75. 有关对叶利钦的支持以及对民主的失望情绪,参见 Vserossiiskii Tsentri izucheniya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VTsIOM), "Rossiyai vybory. Situatsiya do i posle sobitii 3—4 oktyabrya: Analiticheskii otchet" (Moscow: VTsIOM, 1993), 8。

76. USIA, "Russians Value Civil Liberties," 2.

7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次车臣战争可能是它们其中的一个。大多数俄罗斯公民(60%)支持 1999 年夏天发起的自卫反击,在 1999 年秋天、2000 年冬天和春天整个战役时期继续支持车臣战争。这种公众对战争的支持被解读为普京作为政治领导人所获得的积极评价。到 1999 年底,他获得了令人诧异的 72% 的公众支持度。有关战争的支持度,参见由公共舆论研究中心(Center of Study of Public Opinion)即 VTsIOM 所进行的跟踪调查, www.russiavotes.org。有关对普京的积极评价,参见 Aгенство Regional'nykh Politicheskikh Issledovaniy (ARPI), *Regional'nyi Sotsiologicheskii Monitoring* 49(December 10—12, 1999):39。

78. USIA, "Russians Value Civil Liberties," 3.

79. Robert Moser, "Electoral System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World Politics* 51(1999):359-384.

80. Colton, *Transitional Citizen*, chap. 3.

81. 有关如今俄罗斯社会对资本主义的迷茫和这种迷茫情绪如何妨碍集体行动的情况,参见 Debra Javeline, "Protest and Passivity: How Russians Respond to Not Getting Paid,"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82. Kathryn Hendley, Peter Murrell, and Randi Ryterman, "A Regional Analysis of Transactional Strategies of Russian Enterprises," *McGill Law Journal* 44(1999):433.

83. 有关收入和民主持续性的有利关系,参见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1997):155。

第十章

不完全民主的稳定性

俄罗斯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转型是拖拖拉拉的、暴力的和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把起点定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中期,那么,俄罗斯迈向民主制的转型是近时期里经历时间最长的转型之一。林兹(Linz)和斯蒂潘(Stepan)把成功的民主转型描述为下列状态的到来:“在产生一个选举政府的政治程序上达成有效的一致意见,政府执掌政权是自由和普选的直接结果,这个政府实际上拥有权威来制定新的政策,新的民主制所产生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不必被迫同其他实体分享权力。”¹俄罗斯在1993年12月之前确实不符合这些条件,自那之后,俄罗斯的选民批准了一部新的宪法,选举出了一个新的全国性议会。这个转型一直到1996年总统大选之后才算结束。在那之前,国家首脑不是在一部新的宪法下被选出来的。有人认为,只有当行政权力经历了某个变化,即政府任职者通过一个选举过程发生了从一个倾向性向另一个具有不同倾向性的挑战者转变之后,转型才算是宣告完成。不论转型期的结束日被认为是在1993年、1996年、2000年或者2004年,这一过程都是一个长期的阶段,特别是同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转型的东欧国家比起来更是如此。²

俄罗斯的转型之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对抗,时不时会有暴力冲突。旧制度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民主派挑战者之间的谈判协商,从不曾诞生出协议或者是临时的制度安排。即使是1991年8月僵局的胜利者们也没有在一套新的政治规则上达成一致。更恰当地说,强制是转型的唯一模式。正如本书结构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经过了三次而不是一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开始于苏联时期,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启动了一系列自由化措施。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首脑,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了这些改革。然而,这些自由化措施最终创造出了新的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人对改革议程的看法要比戈尔巴乔夫自己意义深远的改革所触及的还要激进得多。虽然苏联旧体制中的温和派,例如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一段时期内试图同俄罗斯新民主运动中的温和派进行协商谈判,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就一个通过协商进行的转型达成协议。相反,强硬派试图通过在1991年8月实施紧急状态统治来逆转改革,这是俄罗斯民主力量得以成功抵制的行动。

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为进行民主转型所做出的第二次努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俄罗斯民主派力量在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在苏联崩溃之后有过特别的机会来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体制。进行新的选举和制定新的宪法这两个政治行动可能会有助于使一个新的民主秩序获得合法性。但是,叶利钦决定不进行新的选举,推迟采用一部新宪法。实际上,叶利钦在设计俄罗斯新的政治体制方面只花了很少的时间,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散苏联和启动经济改革上。他的政治改革战略(或者缺乏这种战略)最终导致了新的政治分化,这在1993年秋天导致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另外一场军事对抗,这两个集团对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有着相互冲突的看法。叶利钦在这次僵局中又获胜了,但是同1991年比起来,是以高得多的代价获胜的。

与1991年相反,叶利钦利用他在1993年秋天暂时的政治优势通过命令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从而开始了俄罗斯在转型道路上的第三次努力。他于1993年的11月公布了一部新宪法,并宣布决定这部宪法采用与否的全民公决将在1993年12月举行。与此同时,要求选民选出新的两院制议会的代表,以此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多数人(或者接近于大多数,实际参加者的数字可能被修改过)参加了这些选举,并且投票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同等重要的是,来自反对阵营的主要政党在长时间争论之后决定参加这些选举。它们指使其追随者投票反对叶利钦“不合法”的宪法。然而,在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之后,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或组织就投票的有效性或新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过争执意见。

1993年以来,所有重要的政治角色都遵循着新宪法所勾画出来的这套基本的政治游戏规则。宪法成为解决政治争论的最终标准。克里姆林宫内外的任何政治团体都没有寻求使用明显超越宪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样,所有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和组织都参加了1995年和1999年的议会大选,1996年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以及发生在这一时期内的数十次地方行政和立法代表的选举。在1996年总统选举后不久,共产党领导人有着正当理由抱怨说叶利钦违反了选举开支限制,但是,无论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候选人根纳季·久加诺夫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正式提出抗议或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对于200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甚至更少有人发出抱怨,尽管发生了无数次违规行为。在地方上,一些选举结果被错误地废止了,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偶尔被不公平地加以限制。然而在总体上,这些选举是富有竞争性和有成果的:在1995年和1999年的选举中,1993年当选的杜马代表中有三分之二没有能够赢得重选;在1996年到1997年选举周期中,差不多一半的地方政府首脑在重选中失利了。有成果的选举已经成为获取政治权力唯一可取的游戏规则,宪法也成为解决政府内行政和立法机构冲突的最终标准。在规则变得更为确定的同时,这些规则产出的成果却不确定,这就是选举民主的特点。³

本书为前两次试图设计新的政治体制的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功、为什么第三次要相对顺利得多这个事实提供了解释。这项研究也揭示了俄罗斯的选举民主是怎样和为什么能从苏联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遗产中产生出来。这个新的政治体制缺乏一个自由民主政体所应有的许多关键制度:总统和议会之间正式的权力分配过分向总统一方倾斜,而政党体制、公民社会、法治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缺乏健康的自由机制这一事实可能为独裁统治的回归提供条件。在普京总统当政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民主倒退的明显迹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民主制度——虽然是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的确出现了。2000年的这套制度在性质上同戈尔巴乔夫任期开始的那套制度是不同的。最后,本书还指出为什么这种转型(拖拖拉拉的、暴力冲突的和被强行推行的)在俄罗斯的民主秩序上产生了严重的漏洞。

这个体制会延续下去吗?为了给这个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本章探

索了有可能会损害俄罗斯脆弱的民主的一些因素。不过,即使这套体制崩溃了,它的失败也不会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消失也不会消除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民主体制无论如何脆弱,也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产生了。考虑到俄罗斯的独裁统治和共产主义已成过去,对于这种民主制度的出现需要有一种解释。

最后这一章简单地回顾一些论点,这些论点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的前两次民主制度设计的努力失败了,为什么第三次努力相对要成功一些。本章的第二部分致力于解释这些新制度的适应力,对路径依赖的力量予以特别关注。最后一节对俄罗斯民主的将来提供了一些观察。

解释转型道路的成功与失败

本书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身上,关注他们的偏好,以及他们提出关于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变迁的权力的权力。结构因素——它们是现代化、社会满意度、文化或者历史——塑造着政治角色个人的偏好。在本书主要的三部分中,每个导论性的一章为这些偏好提供了一个说明,说明它们的源起。然而,本书提出来的这些分析指出,结构性因素并不决定着结果,个人因素才决定着结果。结构变量特别不适合解释短期变动。本书提出了有关产生民主制度的两个失败的例子和一个成功的例子。由于它们发生在一个短时期内,成功和失败就都不能用同一套静态的、不变的要素——例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或者文化——来加以解释。为了揭示短期内发生的这种变动,就必须从个体层次和他们之间决策的互动的战略背景下进行分析。两个直接变量影响着决策者的战略行为——他们面临的互相争执的改革议程的宽度,以及他们对彼此间权力分配的认识。

有争议的变迁议程

同其他制度转型(历史上的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相比较,苏联——俄罗斯转型中相互争执的改革议程要大得多和难以控制得多。拉丁美

洲、南欧国家从独裁统治向民主转型时,或者我们谈远一点,两百年前的美国,它们所要准备讨论的只是政权的政治制度(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regime)的转型。有关经济组织的问题是明确被禁止涉及的。如果对经济体制提出挑战的话,那么政治转型很可能就遭到失败。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里,那些同时也挑战国内的经济组织的反独裁运动,要么不能实现第二项目标*[这方面的例子有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要么成功地改变了基本的经济组织但却没有达到使民主制度化的目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安哥拉、越南、尼加拉瓜和古巴)。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许多民主化的理论家最初对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相信同时实行经济与政治双重转型是不可能的。与在拉丁美洲和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的民主化转型努力(这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有关转型的文献的主要关注对象)比起来,在共产主义统治的转型扩大了变革的议程,因为经济问题也被摆到了桌面上。由于许多理论家和实践者认识到同时系统地推进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复杂性,他们建议进行一系列渐进的改革——经济优先,政治其次。

回顾起来,我们现在知道同时成功地进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可能的。实际上,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里,那些最精力旺盛地推进民主改革的国家也正是那些成功地发展出了最健全的市场体制的国家。⁴然而,从本书对苏联—俄罗斯经验的分析可以看出,把经济转型置于改革议程安排之中可能会阻碍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顺利产生。更通常的情况是,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民主的有限成功使得下述假设继续保持着活力,即同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其成功的可能性要远小于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所进行的制度变迁,在后一条件下,基本的经济组织不是协商的目标。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制度仍然是独裁制而不是民主制。

一小部分后共产主义国家还必须面对第三个重要议题——划定新国家的边界。多民族国家,例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稍后的格

* 即挑战国内经济组织。——校译者注

鲁吉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联邦,都必须应付对其领土完整的挑战。较早期的民主化理论家,包括最具说服力的丹克沃尔特·罗斯托,认为国家边界的划定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⁵林兹和斯蒂潘曾提出“国家”(stateness)问题是影响民主是否巩固的一个变量,而戴尔蒙德(Diamond)和沙立克(Tsalik)则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假设,即国家的领土规模和民主制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联系。⁶

那么,在复杂性方面,比起波兰(更不用说西班牙)的领导者来说,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应付这三种转型。除了这三种转型之外,俄罗斯的巨大规模使得俄罗斯可以被称为20世纪后期转向民主制的最复杂的转型。

是改革议程中众多相冲突的偏好刺激了對抗的产生,延长了转型的过程。改革计划中议程的争议程度,是反映政治角色间取得共识程度的函数。共识程度越大,改革议程的争执就越少;分歧意见越多,改革议程的争执就越广。虽然不相关的结果难以测量,但是,本书中所提出的对政策偏好的分析表明了俄罗斯的精英人物和普通大众在一些基本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他们基本上信仰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国家。

在苏联—俄罗斯转型的初期,对于民族或国家边界、经济的本质以及政治体制的理想形式,政治精英并没有取得共识。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角色在主权问题上相互冲突的理念最终导致了1991年8月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其中一方在军事对抗中获得胜利之后,胜利者通过解散苏联解决了这个激烈争论的话题。解散苏联这个行动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角色联盟——从前苏联中脱胎出来的新独立国家的首脑们——这个联盟足够强大有力,足以抵挡住重建苏联的可能运动。换句话说,管辖权问题是通过单边行动得到解决的,这一举动接着产生了一个有利于这一新方案的新的权力平衡格局。

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经济组织问题上也有所表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和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前几年里,共产党领导人完全反对市场改革,鼓吹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于1990年夏天和秋天试图在经济改革问题上谈判,达成一项双边计划,但是苏联政府中保守的反对派最终否决了这项努力。叶利钦在1991年8月末遂政变后获得新的政治优

势后,他和他的由年轻的经济改革家组成的新团队启动了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一揽子方案,开始是价格自由化,接着是稳定宏观经济和私有化。然而,仅仅在改革进程开始后几个月里,一个新的反对派——这次是产生于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中——一开始动员起来,修改、阻碍、最终终止了这个改革日程。

如果说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争论的是在共产主义失败之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市场改革,那么俄罗斯争论的是要不要进行市场改革。只有在叶利钦于1993年10月通过暴力手段击败其对手之后,他的政府才有能力来执行一些单方面的政策,他们认为这些单边政策对于保证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是必需的条件。这些政策既包括一些忽视反资本主义力量(和普通大众的偏好)的单方面行动——诸如股份项目的债务——也包括贷款换股权项目,以激励苏联精英中的关键支持者接受资本主义。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身的虚弱,大多数资本主义的反对者都最终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市场的必要性。即使在1998年8月金融危机之后,一个由共产党主导的联盟控制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总理的政府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试图再取消市场改革。虽然普里马科夫政府做了一些口头上的威胁,要进行价格控制、管制俄罗斯境内美元的使用,以及要把主要的企业重新国有化,但他们也并没有执行任何一项倒退的政策。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较为成功的转型比起来,在俄罗斯的转型中,所有的政治角色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共识是在相当晚之后才达成的。同样,俄罗斯关于应该发展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的争论的内容参数也比东欧国家要宽广得多,特别是因为在俄罗斯出现的资本主义的类型有着太多的漏洞。⁸不过,自1993年以来,没有一个主要的政治角色把重要的资源用在破坏俄罗斯的资本主义上。

然而说到底,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与其说是在1993年秋天引起武装冲突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对政治规则的分歧意见激发了暴力冲突。在一些方面,1993年10月僵局的解决并没有结束关于政治体制设计的争论。直到1993年秋天,共产党人还坚持用苏维埃体制作为苏联和俄罗斯政府的基本组织。一些民族主义者主张要重建君主制。甚至连反共产主义运动在关于民主是否适合于转型期的俄罗斯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分裂。叶

利钦的许多重要顾问坚持认为,俄罗斯需要一个威权主义政体来摧毁旧的计划经济,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最小的意义上,这些顾问推动叶利钦建立一个强大的行政体制,以此来摆脱社会压力,实行经济改革。

只有在1993年10月的悲剧之后,叶利钦才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上面来。他发布了一条命令来解决先前关于政府形式的争论,然后给了他的对手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承认要么拒绝这个命令。由于自身的虚弱,也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反对派承认了这个新规则,选择了参与到这个新的宪政秩序中来。但是,叶利钦是否同意遵守这些新的规则呢?这个问题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是不确定的。当时没有人知道,叶利钦是否会同意进行1996年总统选举,或者,如果他失败了,他是否能接受199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关于1993年规则是否牢靠的模棱两可的解释,一直持续到1996年总统竞选的最后一段时间。尽管有这些戏剧性的东西,但叶利钦没有破坏选举过程。自从1996年投票之后,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明确提出另一种选择领导人的方式。叶利钦和他的盟友——在1996年最有能力破坏宪政进程的一班人,其中大部分也希望这样做——不再有权力来破坏政治游戏规则,即使他们想这么做也不行。自2000年春天执掌政权以来,普京总统已经削弱了俄罗斯原本就很脆弱的许多民主制度,但他依然还没有明确宣布一个新的非民主体制的计划,更不用说是要复兴民主制度。

因此,关于俄罗斯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机制的共识,只有在变迁议程上的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之后才产生。虽然这可能是在回顾过程中产生的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说法,但是事实所表现的是,在本书所讨论的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中都有一个议题主导着当时的政治。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主权问题作为一个最突出的争议问题而爆发出来。只有当对立双方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在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经济转型主导着争议的变迁议题。这个议题又是在对立双方的武力冲突之后才得以解决。这些议题都得到解决之后,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才最终就一套普遍的政治规则达成共识。

回顾起来,苏联和俄罗斯的各种角色之间就民族国家的边界和经济组织所发生的争议程度,使得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解决之前阻碍了民主制

度的产生。民主在解决根本性问题上是不起作用的,它们更适合用来规范边际问题的冲突。⁹争执不下的宽泛的变迁议程分裂了苏联和俄罗斯的精英,作为这种分裂的一个后果,从共产主义向民主过渡的转型期被拖长和延误。戈尔巴乔夫时代和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制度设计的失败实验,也为苏联—俄罗斯的精英人物提供了学习的经验,他们从中学到了各种不同设计的后果和缺点。在当时,冲突及因此而来的强制接受看起来并不是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不可避免的转型路径。精英人物倾向于协商转型安排的态度是不稳定的。确实发生过的这些协商表明,最终的结果——武装冲突及随之而来的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强迫——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巨大的、有争议的变迁议程塑造了偏好,个人受到了这种偏好的激励,但是,推动这部苏联—俄罗斯转型戏剧的,是最终由这些个人在关键点上偶然做出的决定。

对权力平衡的理解

构建民主制的力量与保留独裁制的力量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平衡所产生的僵局,能够产生出有利于民主转型的条件。早期许多关于民主化的著作都先验假定,僵局甚至是转型的前提条件,因为对立双方均无能力击败对方的事实将迫使他们进行谈判和协商。然而,僵局也能产生恰恰相反的效果。如果对立中的一方相信另一方没有能力击败他们——或者倒过来说,他们有能力通过冲突击败另一方——他们就会尝试用武力来保护或者推翻现状。在那些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分配很难评估的转型中,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诱惑。当变迁议程的偏好鸿沟很宽的时候,这种诱惑也是更有可能产生的。

在苏联—俄罗斯的经验中,对立双方的僵持或权力分配的相对均衡在转型的前两个阶段中起着负面作用。对立双方相对均衡的权力平衡,连同变迁议程上的两极化观点,不是迫使对立双方进行妥协,而是鼓励并最终激发了冲突。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末期的第一个转型阶段内,旧制度的支持者和挑战者之间的权力分配没有明确地向有利于一方或另一方倾斜。在这种条件下,苏联政府中的保守派能够在1991年8月决定用武力来维持苏联和镇压反对派,并相信他们有正当的成功机会。他们

能够获胜的估计是非理性的。到决定使用武力的时候,他们已控制了苏联政府,因为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几乎所有的温和派都引退了。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保守派显示权力的行为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最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枪杆子。民主反对派人士只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一些城市动员起来反对这次政变企图。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孤立的抵抗起了决定作用。叶利钦及其盟友成功地挫败了政变企图。

民主派在1991年8月的权力优势是短命的。同波兰、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比起来,俄罗斯的民主运动既没有在精英中也没有在总人口中获得压倒一切的支持。¹⁰重要的是,再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转型中的事件相比,共产党团体拒绝承认民主派在1991年8月获得的胜利,他们随后认为民主派人士所推行的政策是非法的和不民主的。特别是,叶利钦解散苏联的决定和开始激进的经济改革的决策并没有获得广泛支持,也不是同他的政治反对派进行协商的结果。

如果叶利钦对他的政治反对派享有权力优势的话,他就会忽视反对派对这些重要决策的意见。然而,由于赞成和反对革命性变迁的人之间的权力分配大致相等,叶利钦的反对派从1991年8月的挫折中恢复了过来,并重新动员起来挑战叶利钦政权。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军事力量来达成政治目的,受此诱惑,双方最终在1993年10月再次发生战斗。向某一方倾斜的权力分配可能会阻止武装冲突的发生。要是叶利钦知道使用军事力量不会有助于强化他解散人民代表大会的命令,他就可能不会采取这种具有对抗性和违宪的举动。如果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或者白宫的其他保卫者不相信人民和军队会站到他们一边,他们就可能不会抵制叶利钦的命令。

叶利钦在第二次暴力冲突中再次获得胜利。如果在冲突前权力分配格局还是模糊的话,在1993年10月冲突之后,叶利钦对武力的鲁莽、果断且成功的使用,立即向所有人清楚地传达了权力分配格局的信息。布兰尼已经观察到:“任何提高国家商定他们的相对权力的可能性,都是和平的潜在原因。和平的一个有力来源就是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因为战争提供了广泛接受的权力尺度。”¹¹叶利钦的军事胜利最清晰地明确了权力

平衡格局,也具有讽刺意味地为冲突的党派提供了一扇构建和平框架的机会之门,即使是一方把和平强加于另一方头上。

与1991年相比,叶利钦运用他1993年暂时的权力优势而强制性地通过了一套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在这些年里接连两次武装冲突失败之后,叶利钦的反对派对他们的相对实力有了更好的认识,并因此不相信他们有足够实力来抗议这些新规则。他们也获得了关于失败的真正代价的精明认识,而这些代价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上升。¹²叶利钦的反对派没有转入地下策划第三次直接冲突,而是承认了新政治秩序的强制性。叶利钦为他的一些反对者提供了经济刺激和政府中的任职,来说服他们认识到承认的好处。一些反对派领导人,例如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在1993年僵局刚结束的时候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因为他们被投入了监狱。然而,其他重要的反对派角色,包括最有影响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人,做出了一个承认新规则的谨慎决定。他们推断,即使在失败之后,通过参与到新体系之中,他们的境况会比通过对抗继续与叶利钦及其盟友进行斗争要好得多。¹³双方都认为在一套新规则下他们的境况会好起来,即使一方比另一方要获益更多。¹⁴反对派决定根据新规则游戏行事,这为俄罗斯的政治活动建立了少许的共识。虽然这些强制实施的规则反映的是叶利钦个人的偏好,但是,1993年之后出现的新的制度秩序把选举树立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手段,把宪法提高到最高法律的地位——一部不能轻易被修改的法律。

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之后,许多分析家想当然地认为叶利钦的权力优势会是永久性的。一些观察家认为新的政治秩序宽宏大量,把这一政治秩序描述成为一个超级总统制;他们不那么宽厚的描述则包括了选举君主制、权威主义政体或者独裁制。¹⁵这些断言被证明是不成熟的。选举有助于校正权力平衡,至少是社会内部支持的平衡,因为叶利钦的反对者在1993年和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叶利钦赢得了1996年总统大选,这次投票与其说是对叶利钦本人的肯定,不如说是一次真正的关于革命的全民公决。¹⁶此后很快,他违反政治规则的能力开始下降。1996年后叶利钦权力的弱化有助于稳定政治秩序,直到他在1999年12月31日离职。

反事实条件* 和个人决策的中心地位

在强调两个背景性变量——争议的变迁议程和对敌对政治力量之间权力平衡的认识——的重要性的时候,本书重点强调了情境因素,而不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把情境因素看作是影响设计新政治制度的决策变量。与此同时,本文的叙述揭示,即使那些是最直接的因素也不能决定事情的结果。相反,个体决策者彼此之间的战略互动决定了结果。个体做出了是战还是谈判的决策;是为了单方面追求最高纲领而全力以赴,还是追求妥协并达成契约、宪法与新条约。在一方做出进行战斗的举动的时候,另一方也必须做出反应,要么进行冲突,要么屈服于强制。议程的争议程度和对权力平衡的认识影响到这些决定,然而他们个人自己做出了这些选择,这些选择随后影响到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进程。

对反事实条件的思考有助于揭示个人决策在苏联—俄罗斯的转型戏剧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例如,如果苏联政府中的保守派决定宽容地对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谈判的联盟条约,那会怎么样呢?苏联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在今天依然存在。1991年春,一些加盟共和国,比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格鲁吉亚等已经明确表示要脱离苏联。但是许多其他的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自己,对独立都有着更加暧昧的态度。在俄罗斯,整个民众对俄罗斯享有主权这一观念的支持程度是不清晰的。在1990年和1991年,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对旧制度的幻想,但是对共同的可选择的未来的接受程度却很低。为让俄罗斯人民做一些真正观念上的调整以便适应这场政治危机花了很长时间,这是一场为俄罗斯争取主权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因为没有民族分裂牵涉在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他们各自的支持者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把莫斯科看作首都。1991年3月,当一次全民公决要求人们对是否保存苏联进行表态的时候,有71.3%的俄罗斯投票者回答说“是”,而26.4%的人回答说“不”。

* 这一节标题中的“counterfactuals”也就是逻辑学上的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是指反事实条件陈述。作者在这里用来分析转型中的俄罗斯经常出现的在不同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的那些条件。——校译者注

叶利钦自己对独立的承诺也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叶利钦支持主权观念的目的,是以此为手段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最终是成功的政治联盟,以反对苏联国家和戈尔巴乔夫本人。¹⁷然而,在整个转型期,他对俄罗斯完全主权的承诺是暧昧不清的。过了很久,他声称自己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维持苏联。1991年4月,他积极地参与了关于一项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只有当1991年8月危机迫使他采取明确行动的时候,叶利钦在俄罗斯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才明朗起来。

叶利钦和俄罗斯的反派对1991年8月政变企图的反应,就是宣布对所有的苏联国家机构都拥有主权,包括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作为俄罗斯新的主权领导人,叶利钦于是向被召进莫斯科的苏联军队发布了军事命令。有足够的部队站到叶利钦一边,使他赢得胜利。然而,假如未遂政变没有发生,那么叶利钦及其盟友会不会推动俄罗斯完全的主权独立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俄罗斯领导人把他们自己同解散苏联的决定之间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公众舆论也不支持这一举动。五年以后,超过三分之二的俄罗斯选民认为解散苏联是一个馊主意。¹⁸叶利钦自己也在回忆录中为苏联的崩溃感到悲哀,并争辩说自己除了引导(苏联)走向和平破裂外别无选择。¹⁹因此,人们可以提出一个看起来有道理的论点,即苏联的崩溃既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不是最应该为此负责的俄罗斯领导人所希望的。毋宁说,苏联的崩溃是1991年8月苏联政变策划者的决策以及对政变的反应所导致的结果。假如政变策划者没有诉诸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同盟。如果叶利钦及其盟友没有做出抵抗政变企图的决定,那么政治和经济改革可能会推迟许多年,如果不是数十年的话。²⁰叶利钦所做的最坏打算——内战——也能发动的话,那么,要么政变策划者会被更快地解决,要么(苏联)联盟将维持得更长久。

同样,既不是争议的变迁议程也不是对权力平衡的认识导致了1993年10月的武装冲突及其结果。这两个因素影响了决策,但是,导致冲突的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这种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1991年8月那样,引发冲突的原因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内部做出的采取超越宪法行动的决定——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在这种战略背景下,叶利钦的反对者所能做出的只有一种决定:是战斗还是投降。大多数人民代表包括共产

党领导人最终都屈服了,并接受了叶利钦的命令。假如这些表示承认的政治力量的优势盖过更为激进的同伴,军事冲突也许就能得以避免,一部不同的宪法就会得以精心设计,而叶利钦最有可能支持在1994年3月重新进行选举。但是他们没有占到上风。在9月底的僵局期间,当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视察白宫防御情况的时候,更激进地反对叶利钦及其政权的人加入到他们中来,但那些温和派支持者都抛弃了他们。最后,那些保卫白宫的极端分子在10月3日决定进行反击,试图夺取权力。他们的失败给了叶利钦及其盟友强制规定新游戏规则的权力。

假如1993年早些时候谈判就成功的话,俄罗斯就不会采用一部超级总统制的宪法。如果叶利钦决定不解散人民代表大会的话,议会也就不会决定废除总统职位。假如鲁茨科伊及其盟友决定不采取战斗的话,俄罗斯总统一职所享有的宪法权力就可能会小得多。甚至叶利钦可能在1994年春天的总统大选中落败,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他们的支持者在1993年10月占上风的话,俄罗斯也许就会走上一条不同的政治轨道。最后,假使叶利钦采用了他的知己兼保镖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建议,俄罗斯可能就不会举行1993年、1995年和1996年的选举。虽然很难去预料,但俄罗斯的轨道可能会包括任何可能,从重建苏维埃体制到威权主义独裁统治,到俄罗斯联邦的解体。

这些反事实条件陈述表明,个人决策对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转型的发展有着真正的影响。不同的决策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共线性的问题

本书认为,在苏联—俄罗斯转型中出现的三个不同案例中的失败或成功的制度中,第三个案例较为成功,因为受到争议的变迁议程的范围缩小了,权力分配格局也得到所有人更好的理解。这两种因素是同时发生的,这使得我们很难看清楚哪个变量要相对重要一些。实际上,一种变量可能只是另外一种变量的反映而已。

然而,进一步检验这两种变量的效用(value)*的变化,我们发现,一

* 也就是这些变量在解释上的重要性。——校译者注

种因素可以独立于另外一种因素而得到测量,每种因素都有独立于另外一种的因果效应。需要用来测量这些变量效用的证据类型是截然不同的。在评估争议中的变迁议程时,我们必须检验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争议范围。在测量对权力平衡的认识时,我们必须推想每一方如何看待敌人的权力。当然,这两种评估本来都很难得出。在评估争议的变迁议程时,研究者不能把宣传同偏好等同起来。就争议的议程而言,比起对纲领和宣言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分析,受意识形态说教激励的行动,是一个更好的指标。至于评估对权力平衡的认识,研究者可以检查衡量支持和权力的独立手段,诸如全民公决、选举结果和武装力量的效忠程度,但是行动(基于这些对权力平衡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评估。无论怎样的不完美,对争执的议程和权力分配的认识的评估,都要求对一系列不同的数据进行详细检验。最后,独立的评估可以从两个自变量中得到理解,而无需知道作为因变量的结果,也就是,(无需知道)它在设计新的、持久的政治制度上的成功或失败。

即使对每个变量都能进行独立的分析,当两个变量同时改变它们的效用时,我们又怎能测量因果关系呢?解决的办法是更精确地检查它们的效用是何时发生变化的。争议的变迁议程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缩小,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正如先前讨论过的,1991年后主权问题看起来得到了解决,而1993年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也丧失了热度。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而是随着时间而慢慢消失的。有关重建苏联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96年总统大选,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到1996年大选时还一直持续着,而关于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的争论则永远不会彻底终止。然而,从比较的角度说,这些争论的突出程度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主权争论在1991年达到顶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在1992年的某个时候或1993年到达顶点,而关于民主或独裁统治的争论则在1996年春叶利钦及其顾问欲冒险中止选举过程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因此,作为一个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变化的变量,争议的变迁议程可能被更好地理解影响设计新民主制度成败的可能性因素或背景性条件。议程范围越窄,达成协议或一致意见的可能性越大。不过,很难认为是范围日益缩小的争议的变迁议程导致了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成

功地产生新的政治制度。毋宁说,作为高度突出的问题,范围缩小的议程为产生新的政治制度创造了合适的条件。

第二个变量——对权力平衡的认识——的效用的变化,对制度设计的结果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持续的时间可能没有争议的变迁议程变量来得长。对权力平衡模糊不清的认识助长了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的冲突。当叶利钦在1993年10月赢得了胜利,所有有关的行为体都共同认识到叶利钦对反对派拥有权力优势的时候(即使这是短暂的),这个变量的效用发生了根本的和清晰的变化。所有人都认识到的这笔权力横财,使得叶利钦能够支配俄罗斯新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然而,叶利钦的权力优势——或者更精确地说,对叶利钦权力优势的认识——没有延续下去。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或许已经预料到,他强制推行的规则重要性的丧失与他自己的权力(或被认识的权力)的衰落同始终。²¹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最小的意义上,在这些权力平衡的变化与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制度变化之间存在着一个时差。

在解释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的延续性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范围已经缩小了的争议的变迁议题可能被证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果力量。随着争议议程涉及的得失缩小了,各行为体挑战现行的政治规则以招致代价上升的意愿下降了。如果争夺克里姆林宫这场战斗的后果事关保存还是摧毁苏联,那么,行为体可能受到诱惑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非选举的手段。如果战斗的结果对政府来说是建立资本主义或恢复共产主义,那么,行为体也会受到诱惑使用极端的手段以获得胜利。然而,当这些大问题不再处于议程之中,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夺取权力的诱惑就下降了。

路径依赖和俄罗斯民主的稳定性

自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以来,政治和经济危机持续地挑战着俄罗

斯初生的民主制度。自1993年僵局以降,再没有其他事件像1998年8月的金融崩溃那样动摇了政治体系。随即,金融危机改变了政治角色和制度之间的权力分配现状。权力分配格局上的变化反过来逐渐削弱了俄罗斯的宪政稳定。然而,在宪政于崩溃边缘动荡了一段时间以后,国家杜马与叶利钦合作形成了一个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的新内阁,由此化解了危机。对宪政稳定的另一个挑战发生在1999年春天,当时杜马开始启动对总统的弹劾程序。就在启动弹劾投票的几天前,叶利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反击,撤除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即使普里马科夫获得了由共产党主宰的国家杜马压倒性的支持,而且他本人在那时也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叶利钦解除普里马科夫职务使俄罗斯缓慢走向了一场宪法危机。如果杜马弹劾了叶利钦,同时又否定了他对谢尔盖·斯捷帕申的总理提名,那么俄罗斯宪法就无法为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态提供解救方法。许多人担心叶利钦会试图用超越宪法的方式来走出这个绝境。然而,议会退却了,因而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国家杜马没有能够召集到三分之二的必需票数来通过五个弹劾案中的任何一个,它还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叶利钦的总理提名。

在这些1993年后的危机中,俄罗斯的政治行为体达成了妥协,为所有人都理解并认可的一系列规则为达成这种妥协提供了框架和组织。在这些对既存的政治秩序的挑战中,关于推迟选举的讨论也浮出了水面。然而,迄今为止,对俄罗斯民主崩溃的口舌上的关注已经超过了现行体制的实际威胁。

对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新生的政治制度的适应能力的经验观察,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些制度的未来的分析线索。社会科学家已经证明自己在预测制度崩溃上相当无能为力。事实上,许多理论家认为对制度崩溃的解释超出了分析能力的范围。一些人,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相信任何形式的预测都是危险的:“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没有掌握对任何一个领域的变化可做出预测的理论。也许我们永远做不到这点。”²²一些研究民主化的作家把时间的测度,诸如“两次权力移交”规则或二十年的民主,视为评估民主制度稳定性的重要里程碑,但是,这些经验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基础。²³

显而易见,现在要对俄罗斯现行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性做出预测还太早了一点。苏联和此后的俄罗斯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两次崩溃,这表明发生第三次崩溃也是有可能的。俄罗斯还没有经过高层的两次权力移交,也还没有经过二十年的民主统治。然而,我们来的目的不是要用这种或者那种方法对民主的未来进行预测,而应该是找出那些有助于维持稳定的因素,以及那些会破坏现行体制的因素。

如果说自由民主对反民主的挑战要比选举民主更有免疫力的话,那么,俄罗斯的政治体系肯定要比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不稳定得多。虽然自1993年以来已经得到巩固的俄罗斯体系比起苏联共产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缺乏许多自由民主制的性质。没有理论上和经验上的证据可以假定,选举民主是通向自由民主道路上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俄罗斯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自己有缺陷的政治体系。由于这些非自由的制度和规范的存在,俄罗斯的民主比起自由民主更容易发生崩溃。反对威权主义的制度屏障,诸如繁荣和独立的媒体、发达的政党制度和生气勃勃的公民社会,在俄罗斯并不存在。同样,规范的保卫民主反对专制的信仰和行为并没有深入到精英人物或整个社会中去。为保卫民主而战的意愿尤其微弱。如果威权总统普京决定他想要成为独裁总统普京,那么他将几乎不会遇到抵制。

然而,民主质量和制度稳定的衡量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任务。虽然自由民主很少发生崩溃,但非自由民主或者非民主也不一定容易崩溃。一个没有自由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稳定的。²⁴同样,一个并非自由民主的选举民主也可以是稳定的。²⁵在民主政体中,稳定可以通过自由制度的发展而得到增强甚至激励,但是,表明原因的箭头也可以指向相反的方向。*

俄罗斯1993年以来出现的政治制度具有许多不完全民主或选举民主的特征,虽然仍然缺乏自由民主制的特征。然而,与当初为新政体设计制度的第一次努力相比,这种制度表现出了均衡的特点。奈特(Knight)用下列语句把制度定义为均衡的结果:“即使既没有社会效率,也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一种社会制度也可能是稳定的。如果没有人想要违反制

* 指稳定也可以成为自由制度发展的原因。——校译者注

度规则——假定所有其他人都履行这些规则——那么这一制度就处于均衡之中,在较弱的意义上它将会是稳定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违反规则的动机。”²⁶ 在今天的俄罗斯,所有重要的行为体都表现出对选举和宪政的兴趣。没有一个重要的团体相信他们能违背选举和宪法规则以改善处境。不同的行为体想要变更宪法的特定形式或者是管理选举的特定规则,但是,在今天的俄罗斯,没有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违反这些宪政主义或选举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动机,这些理念建构起了俄罗斯新政体的基本游戏规则。在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时期,俄罗斯领导人有时候确实违反过这些规则。但是,单独这些违背制度的行为并不是制度失败的证据。只有在一个重要的行为体或者一些行为体提出一套替代性的制度设计的时候,才可以认为这一制度处于危机之中²⁷。迄今为止,这样一种对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威胁还没有出现。

与苏联—俄罗斯转型的早期的政府体制相比较,现行体制因为两个重要的变化而更加稳定。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一个稳定性因素是范围缩小了的变迁议程。既然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都已经制度化了,如今政治斗争的赌注要比它们在1991年或1993年时低得多。虽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日益走向一个重新统一的国家,但是,当今俄罗斯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行为体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控制克里姆林宫来重建苏联。也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行为体相信,如果他们通过超越宪法的手段夺回克里姆林宫,他们就能够逆转资本主义。自1993年以来,对俄罗斯民主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是那些从现状中获得好处的人,而不是那些企图推翻现状或者企图重新回到以前状态即苏联共产主义的人。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它自己恶意的反民主威胁。在市场改革开始十年之后,国家仍然控制着巨大的财政资源,这些资源激励着那些现在从俘获国家中得到好处的人进行反民主的图谋。然而,对民主的这种类型的威胁不同于那些曾经企图以控制克里姆林宫的方式来维持苏联或计划经济的人所造成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接近国家的边际利润与在市场中可获得的利益相比在逐渐降低,这种新形式的反民主威胁应该会逐渐消失。

随着掌握政治权力的好处降低,那些寻求政治权力的人的眼界就放

到更为长远的未来。在苏联的命运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各种政治行为体不太关心未来,而把注意力唯一集中在国家崩溃或维持的短期后果上。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各种政治行为体正确地认为,关于这些结果所做出的最初决定会有着长期的影响,所以,为影响最初的轨迹而采取行动的時刻是在现在,而不是在将来。由于这些行为体并不知道输掉这些争论的后果可能会是什么,因此他们孤注一掷,相信他们要是输掉的话就没有明天。²⁸ 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两种真正的解决方式(即维持或不维持苏联,保留或不保留共产主义),这使得妥协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然而,随着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立即采取行动不再是显见的需求,因为这些行动者现在被迫适时地在总的政治和经济框架下采用长期的政策议程。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战斗中的失败者没有遭到流放或监禁,而是作为重要的角色重新出现于新的政治体系中。²⁹ 对失败者越是安全,政治家们就越能够长期地参与民主游戏。

除了缩小了的变迁议程,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时期产生的第二种稳定化的力量,就是1993年摊牌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改进的权力平衡。它采取了倾斜的权力分配格局,以有利于其中一方在1993年为制度的出现去构建一个中心。^{*} 如同国内或国际上所有的霸权体系一样,俄罗斯案例中的霸权也强制推行了规则,体系中的弱势行为体承认了这些规则。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正是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衰落,才有助于维护1993年的制度设计。1993年10月以后,叶利钦及其随从在俄罗斯建立了一支有实力破坏新的政治游戏规则的政治力量。1996年初,就在大选前的几个月里叶利钦的支持率还一直盘旋在个位数之内时,许多人预测叶利钦会运用他不相称的权力(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他被别人认为具有的权力优势)以一切手段来保住自己的位子。当时的总统安全警卫长、叶利钦最亲密的顾问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曾催促他这么做。叶利钦犹犹豫豫地倾向于违反他自己定下来的游戏规则。1996年3月,他差点取消了1996年的大选。³⁰ 在小心翼翼地接近独裁制之后,叶利钦最终决定反对超宪法的

^{*}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何产生一种新的制度因此成为人们的焦点或注意力聚集的地方。——校译者注

举动。最后,正如我们第八章所详细讨论的,总统衡量了自己的机会,断定自己根本没有发起一场成功的政变的实力。军方车臣蒙耻之后也不再是1996年叶利钦的忠诚支持者。1996年的内务部长阿纳托利·库里科夫(Anatoly Kulikov)警告叶利钦说,他和他的部队、他的势力不会支持政变企图。³¹丘拜斯告诫叶利钦说,宪法法院会否决叶利钦推迟大选的命令,假使叶利钦决定通过军事力量强制实施推迟选举的命令的话,反过来可能会激起普遍的抵制。³²换句话说,叶利钦无法保证若违犯选举过程也能获胜。如果失败的可能性不断增大阻止了叶利钦采取超宪法行动的阴谋的话,那么,选举游戏中成功可能性的增加肯定鼓励了叶利钦去遵守宪法。到1996年4月,叶利钦有信心能赢得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³³如果他相信会赢,那么通向权力之路的选举是代价较小的方法。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叶利钦在1996年大选中落败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许多人相信他不会安宁地离开克里姆林宫。但是,我们确实知道,1996年后叶利钦以宪法外的方式来保住权力的能力在下降。叶利钦糟糕的健康状况渐渐削弱了他对俄罗斯政治的控制。1996年夏天对威权主义人物的解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包括科尔扎科夫——也减弱了叶利钦推行(或威胁要推行)反民主政治的能力。那些代替科尔扎科夫成为叶利钦顾问的人并不欣赏科尔扎科夫的强人形象,他们也没有控制科尔扎科夫主导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所能支配的强制力量。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再一次给了叶利钦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曾忠于叶利钦的强势金融寡头在8月危机中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这些经济精英中的某些人鼓吹威权主义政策以保持稳定,但金融崩溃之后这种威胁也消失了。这场危机也削弱了总统直属机构的制度,虽然只是暂时的。³⁴权力平衡的变化限制了叶利钦通过其他手段来保持权力的能力。这种权力分配格局可能鼓励了叶利钦和平地、符合宪法地离职,就像他在1999年12月31日所做的那样。

外部挑战者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叶利钦地位的弱化并没有转而加强克里姆林宫之外反民主力量的地位。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仍然有一些反体系的政党,

诸如维克多·安皮罗夫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劳动俄罗斯,或者亚历山大·巴卡索夫(Aleksandr Barkashov)的新法西斯团体俄罗斯国家联盟(Russian National Union),该组织公开宣称推翻现行政治秩序。虽然这些团体都拥有一部分忠实的拥护者,但它们没有表现出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动员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民意测验显示,几乎没有人支持重新回到共产主义或者建立法西斯主义。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激进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情况很糟,没有一个激进团体赢得超过1%的选票。另外一场经济危机或者是高加索战争的扩大化能鼓励诸如劳动俄罗斯或俄罗斯国家联盟这样的团体。毕竟,即使是微弱的革命运动也能够推翻虚弱的国家。然而,在这十年的末期,法西斯主义者或共产党人对俄罗斯民主的威胁看起来不像90年代初那样咄咄逼人了。

1993年议会选举之后,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作为一支突出的政治力量,是由于对新秩序模糊的承诺而出现的。日里诺夫斯基一向持偏执的法西斯主义观点。他宣扬执行经济改革的道路是禁止所有的政党和建立独裁制度。他的文章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然而,日里诺夫斯基实际上从来没有把真正的资源花在开发反体系的结构和武器上,而是相反,他经常轻易接受叶利钦政府的贿赂,同政府进行合作。自1993年以来,日里诺夫斯基在每个选举周期的投票中,其选举得票率都下跌了差不多50%——从1993年的22.9%下跌到1995年议会选举的11%,1996年总统大选的5.7%,1999年议会选举的5.98%,以及2000年总统选举的2.7%。如果日里诺夫斯基想策划一场从内部进行的政变,那么,事实是他只拥有希特勒在策划政变时所获得的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如果日里诺夫斯基私下里想从外部攫取权力,他没有议会力量,没有同军队的强有力联系,没有海外支持者。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能够测量他进行超宪法行动的能力,到目前为止,他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在不断减弱。

一些分析家继续把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归类为反体系政党。然而,来自俄共的专制主义威胁与莫斯科精英的出版物中所表述的并不相符。正如本书整个第三篇所讨论的,俄共自己的宣传已经渐渐远离了反体系的立场。俄共几乎不关心重新统一苏联的目标,而

是接受了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这些基本原则。在政治战线上,俄共领导人一直在宣称要废除强有力的总统职位,建立议会制民主。但是,久加诺夫和俄共党内的任何一个重要人物都没有用超宪法的手段来推进这些变革。相反,俄共参加了所有后共产主义的选举。在1996年总统大选失利之后,久加诺夫保证忠于选举过程:“[1996年总统大选的一个教训是]选举是一个展现我们拒绝权力争斗、进行和平竞争的机会。我们必须继续抵制任何用强力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企图,即使在更大多数人的处境变得更糟、可怕地产生破坏性的自发无序状态的时候也是如此。”³⁵

选举的成功有助于把俄共纳入到选举进程中来,因为久加诺夫和其他俄共领导人继续相信他们能够在未来通过获得选举获得执政。³⁶ 俄共亲体制的行为比它的宣传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俄共已经坚持选举和宪政程序,已经作为俄罗斯新政治体系中一个活跃的和重要的主体来参与政治生活。自1994年以来的每一个年头,俄共都让叶利钦的预算大体上完整地在议会内顺利获得通过。除了一次例外,反对派主导的议会都认可了叶利钦所有对总理的提名。

从1998年8月一直到1999年5月,在俄共候选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违背叶利钦的意愿而成为总理之后,俄罗斯的共产党人有了挑战现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最好机会。1998年8月的金融崩溃之后,公众对市场经济的信心越来越低,而对稳定的期望越来越高。普里马科夫任职之后邀请了一位俄共领导人尤里·马斯柳科夫扮演经济沙皇。普里马科夫和马斯柳科夫在宣传中承诺要逆转激进的经济改革,提高养老金和工资,削减西方机构的活动以减少其影响,以及把1000个银行家关进监狱。然而实际上,普里马科夫和他内阁中的共产党盟友如同历届改革派内阁一样实行保守的财政政策,在金融上收缩银根。普里马科夫并没有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赶出国外,而是继续同这个“帝国主义的工具”进行谈判,甚至还同意进行IMF所推荐的一揽子立法。在同世界银行进行的谈判中,普里马科夫政府确实拒绝了世界银行关于养老金的过高建议。当俄罗斯共产党人有机会来扭转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确实接受了那些已经成为该制度的一般原则。参加并支持联合政府的这个行动表明了俄共愿意维持现存的秩序。

内部挑战者

对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最大的挑战,将是一个新的强有力领导人从国家内部的兴起。叶利钦作为一个弱势的和丧失了名誉的总统结束了自己的任期。即使他想超出其第二任期继续留任总统,他也没有能力这么做,即便采用超宪法手段。1999年,他实在没有能力稍加推迟。如果一个倾斜的权力分配格局在1993年秋为建立新规则创造了机会的话,那么,一个更加平衡的权力分配格局有助于此后维持这些规则。新的不平衡将为重新设计俄罗斯政治体制创造一个新的机会。这种情景也许会带来俄罗斯民主制度的进步。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也许会进一步弱化现有的已经很脆弱的民主程序。

普京总统可能代表着这样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政治角色。对车臣1999年夏天入侵达吉斯坦事件的果断反应而使他的公众形象的迅速飙升,使得他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普京的权力优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他是否会运用他的权力来根本改变政治游戏规则。他宣誓效忠宪法,也没有支持(目前还没有)建立新的独裁制度以进行跳跃式市场改革的呼声。不过,他也还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民主维护者。

在选举政治领域,普京及其盟友以对民主制度造成巨大损害的方式,掌握了俄罗斯国家的权力。普京及其盟友于1999年10月无中生有地凭空建立了一个政党——统一党,然后就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将近四分之一的选票。³⁷ 国家电视台不间断地宣传这个新政党,并通过一系列以往俄罗斯政治中从未见到过的负面宣传来摧毁它的反对者。普京接着运用国家电视台来推广他的反竞选的总统竞选活动。2000年的总统选举的结果是如此的板上钉钉,以至于如果下一次总统大选还出现相似的过程的话,使人不得不怀疑俄罗斯是否是一个选举民主国家。

普京最令人生厌的地方,就是以保卫俄罗斯边界为由漠视车臣公民的人权。普京在车臣的举动表明他几乎没有把民主原则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在他执政的第一年,普京已经削弱了州长的权力,重新修订了联邦委员会的构成规则,着手遏制NTV(俄罗斯唯一能够进行全国广播的私有电视网)。而且,在普京领导下的国家安全机构也屡次破坏公民社会

的核心要素,包括调查新闻记者、环境保护者和人权活动家。毫无疑问,普京和他的计划对俄罗斯民主制度的适应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普京的政治改革计划虽然含糊不清,但看起来也是非民主的。普京的顾问公开宣称要从杜马选举法中去掉比例代表制,任命州长,并把俄罗斯总统的任期从现在的四年增加到七年。

现状的惯性

如果一个人的意见可以决定俄罗斯政体的轮廓,那么很显然,这种体制不能被认为是民主政治。如果普京试图建立一种威权制度,他将不得不克服过去十年的路径依赖轨迹。选举和宪政已经制度化,而要破坏这些实践的成本已经很高昂。

所有派别的政治团体依然对叶利钦在 1993 年强行建立的制度结构感到不满。不过,他们也认识到要通过不民主的手段来推翻俄罗斯并不完美的民主,其代价要比参与到这种不完善的民主中去所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没有人,包括普京,认为有更好的选择方案或能为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拿出一套方略。这是民主的缺点。也没有一个重要的行为体有背离现存的选举和宪政等制度安排的巨大动机。普京可能削弱了选举和宪政的意义,但是,它们作为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活下来,将为未来的挑战者提供机会。对所有相关的行为体而言,如今接受现存的游戏规则是理性的,不接受则会有惨重代价。³⁸虽然危机可能会改变普京的偏好,但即使普京也从现有的政治秩序中获得了好处。这种情况符合通常被引用的制度稳定的定义。³⁹制度稳定进一步被偏离现状的消极制裁所强化。一些行为体,例如久加诺夫和普京的某些顾问,可能偏好不同的政治制度。不过,他们实现这些偏好的行为受到背离(现状)失败而引起的成本增加的制约。与下一次政变失败的代价相比,输掉下一次选举的代价是最小的。即使普京或其继任者能在俄罗斯成功重建独裁统治,社会上对民主规范的高度支持表明,未来的威权主义制度将是短命的。重要的是,即使 2000 年普京获胜之后,大多数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依然相信它们有赢得下一次选举胜利的些许可能性。⁴⁰它们通过投票箱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要比通过枪杆子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要高。虽然它们是在更为

确定的环境中产生的,但新的游戏规则已经有助于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制度化。我们有理由对2000年的总统选举缺少不确定性表示关注,但是,要从一次选举结果中来进行总结还为时尚早。

这些制度的持续存在使它们更加具有持续性。各行为体习惯于新秩序。⁴¹今天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成本要比1993年首次强制性地建立宪法秩序的时候高得多。⁴²正如拉塞尔·哈丁所指出的,一旦行为体就一套给定的规则实现协调,并据此开始组织政治竞争,“再协调的成本便是迈向任何假定是良好秩序的首要障碍……即使新秩序在事实上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⁴³。现行制度被采用的时间越长、重复次数越多,则改变该制度需付出的代价就越高。哈丁继续说:

[一旦]我们已经确立了宪法安排,就不可能为了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利益而背弃这种制度。由于与制度安排共存,我们的利益将得到更好的保障。这种情况通常是真实的。这倒不是因为如果我们不遵守这种宪法安排,我们将会被强迫去遵守,而是因为除了遵守这种安排,我们不能做得更好。要想做得更好,我们将不得不伙同其他人去创立一种替代方案,但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通常不值得为此付出这种努力。⁴⁴

通向制度稳定的这种方法是最低限度的,它并未预先假定或者依赖于任何有关现存秩序的正确和正义的规范性承诺。如果俄罗斯加深对民主的规范性承诺,那么民主制度将比现在稳定得多。当今,制度的持久性通过利己主义行为得以维持:每一个人——或者更低限度地,一系列重要的参与者——的处境从遵守现存规则中而不是从想方设法反对规则中而变得更好。

在形式上,新宪法设计本身也有助于提高制度变迁的成本。写入1993年宪法的规定使其难以被修订。1993年秋,叶利钦和他的顾问们在一起起草这些规定时正忙于应付当时的紧急情况。他们想要避免修订过程中宪法的两极分化。由于这些文件仅仅代表着一方的偏好,而不是在所有主要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妥协,因此,如果叶利钦的反对者们有足够的权力的话,他们将很有可能变更宪法。然而,为了不给他们这种机会,叶利钦也必须放弃修订宪法的任意决定权。叶利钦创造了一个有关宪法的更加可靠的承诺,在约束自己的同时,也有效慑止了反对者们改变新制度秩序

的意图。⁴⁵正如在宪法中所限定的那样,定期选举的承诺也向叶利钦的反对者表明,他不会永久统治下去。

投票者也有助于限制叶利钦的任意决定权。一旦受到大众审批这一过程的制约,阻止宪法修订的严格规则就更进一步限制了叶利钦的未来行动,因为俄罗斯总统有可能会强奸民意而违反这些规则。1993年,强大的反对修订宪法的浪潮孤立了叶利钦的政治权力。然而,1996年,当总统选举中共产主义者看似胜利在望时,叶利钦周遭的许多人却对这一修订过程产生了质疑。因此,在1996年,叶利钦操纵自由的权力被1993年制度设计的决定所约束。虽然叶利钦在1996年可能拥有修改或者超越宪法的能力,但是,由于有了1993年12月的宪法全民公决,他这么做的代价要高于他在1993年10月这么做的代价。叶利钦对选举过程的屈从,以及表现出来的负责任的行为,有助于提高未来的领导人否定(现存政治秩序)要付出的代价。⁴⁶

说得直白一些,选举变得更仪式化和常规化,取消选举制度就更加困难。⁴⁷对于宪政过程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坚持选举主义和立宪主义有助于改变所有重要的行为体的偏好及其追求这些偏好的手段。当行为体逐渐习惯于这套规则,他们就在遵守现有规则方面下功夫,而不在那些在新体制下无助于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方法上下功夫。由于行为体在现存秩序下重新衡量自己的利益,制度最终导致了行为体改变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现有制度秩序所引导的行为的改变能够产生态度上的变化,从而减少规则——即使是强制规则——与偏好之间的不协调。

1991年未遂政变之后,民主俄罗斯支持建立一个准军事组织。在1993年僵局之前的几个月,副总统鲁茨科伊同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准军事组织建立了联系。在1993年对抗结束之后,叶利钦给了他的保镖和顾问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建立一支忠于总统的私人武装力量的权力。在过去几年里,这种尝试逐渐减少。伯顿(Burton)、甘瑟(Gunther)和希格利(Higley)把不稳固的民主的特征描写为这样一种体系,在那里,“重要的和强有力的精英人物否认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并企图推翻它”⁴⁸。虽然这可能是从1990年到1991年的苏维埃政体和其后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1991年到1993年)的倾向性特征,但是,如果考虑到

1993年以来的俄罗斯政治,情况就不符合这种定义。同叶利钦政府时期相比,普京总统为军队和情报机关拨出了更多的款项,但是,是否可以说这些资源分配上的边际转移就标志着企图建立独裁统治运动的开始,目前还为时尚早。

然而,关于俄罗斯制度稳定的观点依然被看作只是一种推测性的看法。争议的变迁议程范围的缩小,关于权力分配的看法改变(既包括产生了新秩序的霸权,也包括了有助于维持新秩序的更平衡的权力),以及路径依赖,三者结合在一起表明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比起第一共和国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都更加稳定。第二共和国存活的时间比第一共和国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都长。但同时,对现有秩序的政治威胁仍然存在。因为这些规则是被强行规定的,它们应对挑战的弹性就比协商产生的制度要小得多。另外,现有制度仍然缺乏许多自由民主政体所具有的制度和态度上的品质,这些品质有助于加强制度的稳定性。克里姆林宫内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团体有实力改变这些规则,这一事实有助于维护现存体制。同时,戏剧性的经济崩溃或俄罗斯各共和国的民族自由化运动的再次复兴可以改变权力的平衡。在国家内部出现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和强有力的人物,则更加有可能对现有的制度秩序提出挑战。如果普京总统,或者是类似于他这样的人物,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大众的支持和军队的效忠,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就能再次最终处在一个改写政治游戏规则的地位上。在其他国家里,军队和情报机关在经济危机中对虚弱的民主制而言是一个传统的威胁,而俄罗斯的军队和情报机关对介入俄罗斯内部事务没有表示任何的兴趣。⁴⁹但是,危机能够剧烈地改变人们的想法。现有的秩序能够保持平衡,但只是微弱的平衡。

结 论

超越俄罗斯:朝向体制变迁的一般理论

本书寻求对一个国家(或者是两个国家,这取决于谁来做这个计

算)——苏联及其后的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进行解释。本研究设计分析了一个国家中的三个“案例”,然后识别出因变量的变化。当然,这项研究不是对前面提出的观点的“测试”,因为其中的一个案例或者三个案例都没有构成一项测试。尽管如此,本书通过有意将苏联—俄罗斯转型同其他国家的转型进行对比,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高度普遍的自变量上,为思考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这可能会有助于理解其他国家发生的转型。把这个框架放到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案例中去,很明显是下一个目标。

这个框架以几种方式对现有的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这种方法为解释民主转型的成功和失败提供了一个思路。许多民主化的研究因为存在选材上的偏见而价值受到损害,研究者抽取一些成功进行转型的例子,试图找出它们的普遍模式。本书试图应用同样一套自变量来解释民主转型设计的成功和失败。通过把民主转型的讨论融入更广泛的体制变革的讨论中去,这项研究为转型学家和新制度主义者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论的桥梁。

本书也对有关制度争论的文献做出了贡献,它为制度出现和制度缺失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社会科学在解释制度的影响上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解释制度的起源上就差了很多。通过对制度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上的案例进行检验,本书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普遍性的一些变量上——变革议程中争论的范围和对权力分配的认识。这些变量在其他的民主体制出现的情况中也可以被识别到,例如在中国民主体制的出现过程中,规范国际军事干预事务的国际机制的出现过程中,或者是管理电子商务的机制的出现过程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变量。

其次,同讨论民主化的文献比起来,本项研究把因果分析深化了一个层次,也就是说,它对转型模式的出现提供了一种解释,而不仅仅是把所有的分析都放在模式本身。苏联—俄罗斯这个例子证实了一个假设,即转型模式影响着(随后)产生的政治体制的类型。同时,本书展示出了不同的能够导向民主制的转型模式,虽然未必完美。如果不同的转型模式能够导向同样的结果,那么以前我们所认为的模式对于民主制的成功和失败所具有的决定意义就不一样了。如果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能够通过

达成一项协议来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体制(虽然是有缺陷的),那么协议本身就不能作为实现民主化的原因。相反,本书提出的两个更重要的变量能够帮助我们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预测达成协议和新的制度设计的可能性——变革议程的争论范围和对权力平衡的共识程度。政策偏好和权力,以及有关政策偏好和权力的信息对于分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这个方法还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肯定,但是,我们在知道结果之前就能赋予自变量一定的价值,从而避免根据转型的结果来定义转型的模式。

第三,本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新的、稳定的制度秩序的出现而言未必是积极的条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政治人物具有就一个更好的民主制度进行谈判的动机,这提高了权力的分立程度,增加了反对的门槛,增强了权力之间的分权制约。矛盾的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政治人物也最不可能用谈判来达成这样的事务。

第四,这里阐述的有关变迁议程的争论范围的重要性的观点,为对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和非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进行比较和对比提供了一条道路。这种变量足够普遍,在不同类型的案例中具有不同的价值,为在不同的案例中检验自己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方法。

第五,本书表明,僵局和权力的相等分配被看作是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观点。对于权力分配的共享的理解可能比实际的权力分配本身在推动成功转型方面更加重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本书所提出的框架再次把权力引入到分析之中,这是一个被近来许多有关民主化的文献所忽略的对象。

这些发现没有一个是案例特有的(case-specific)。当然,特定的人所做出的特定的决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塑造着苏联—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同时,在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很普遍的因果变量上时,本研究也提供了一种方法,在本研究中揭示出来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够在其他的制度变迁和其他的制度出现的例子中得到检验。

俄罗斯民主的未来

在经过数百年的专制统治、七十年的共产党统治以及近来十年的转型期之后,俄罗斯成为了一个选举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y)。然

而,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走到要巩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这一步的道路充满了障碍。事情的发展可以不同吗?是的。在本书内,这项研究指出了对俄罗斯民主的出现有着深远影响的若干紧要时刻和关键决策。然而,俄罗斯选举民主成功的建立和自由民主制的虚弱都不能归结到一个人或者是一项决策上去。毋宁说,变革的幅度和支持或反对变革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必须被置于分析方程式之中。

考虑到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在驾驭由共产主义统治的转型时面临着广泛的变迁议程,我们对在政治自由化开始仅十年后就期望在苏联或俄罗斯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可能是过分乐观了。解散一个帝国、把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在共产党专制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民主政体,这三重挑战甚至会难倒美国那些充满智慧的国父们。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做出了许多关键的错误决定,但是他们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做出这些决定的。事态本来也许会发展成另外一种样子,相比较起来,这次转型还是相对和平的。特别是同当代发生的巨大的社会革命相比,苏联—俄罗斯转型还是相对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个民主机制,虽然有着缺陷和脆弱不堪。

假如俄罗斯的领导人能够就采取共同行动达成一致意见的话,他们也许能够处理这么宽泛的变迁事务。但是他们没有。俄罗斯曲折转型的根基就缺乏这种共识。如果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角色都同意叶利钦的有关解散苏联、实现俄罗斯联邦的统一、推进市场改革和总统制的总体战略的话,那么,冲突及其对自由民主有害的结果本来就能得以避免。或者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大多数人都同意久加诺夫早期的关于改革的意见,那么冲突也不会发生。然而,俄罗斯也不会是一个选举民主国家,更不用说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就像流行威权主义统治的中亚国家所主张的那样。俄罗斯延长了的和充满冲突的转型来自这两派政治力量的战略互动,而不是一方或者另一方某种决策的结果。它使双方互相调情,也使双方进行战斗。

俄罗斯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比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或者比戈尔巴乔夫时期引进的新制度存活了更长的时间。但是,俄罗斯的民主仍然是年轻而脆弱的。这个体制坚持了下来,因为没有人能够想出一个替代方案。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的政治力量之间相对均衡的

权力分配维持了这种秩序。但是,该体制本身仍然缺乏制度的和社会的制约因素,来抵挡住新的强势人物和运动的出现,特别是如果这个人物想控制国家的资源的话。俄罗斯采取的这条从共产主义向民主过渡的艰辛道路使得民主的巩固更加困难。

如果选举民主制存活下来了,俄罗斯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演变成自由民主制吗?本书对俄罗斯民主体制的出现所做出的以角色为取向的解释表明,存在着这种希望,在将来可能会有积极的改变。如果单个角色在不久前做出的决定产生了非自由的民主制度,那么,单个角色能做出在未来将进行自由化改革的决定。然而,为了建立起选举民主而进行的长久的和对抗性的斗争表明,在俄罗斯建立自由民主制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注 释

1.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2. 当然,也有很多人仍然认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向民主转型。另一些人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威权体制,这不是因为历史遗留,而是由于叶利钦及其改革所造成的。参见 Peter Reddaway and Dmitri Glinski, *Market Bolshevism: 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

3. 2000年开始总统竞选运动时,其对总统投票的结果要比1996年开始总统竞选运动时的结果要确定得多。如果这一趋势得以继续,那么选举的意义将受到质疑。然而,要对2000年的选举是失常还是正常做出评论,则还为时尚早。

4. Joel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50 (1998): 203—234; M. Steven Fish, "Democratization's Requisites," *Post-Soviet Affairs* 14(1998): 225—226; Valerie Bu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 *Slavic Review* 58(1999): 756—793; Jean-Jacques Dethier, Hafez Ghanem, and Edda Zoki, "Does Democracy Facilitate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manuscrip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June 1999;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1999: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9), chap. 5. 虽然民主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联性

是很强的,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因果关系仍知之甚少。可能的情况是,意识形态上的共识、远离柏林、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引起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与市场改革。

5.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 1970): 337—364;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7.

6. Linz and Stephe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chap. 2; Larry Diamond with Svetlana Tsalik, "Size and Democracy," in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s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7—160.

7.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Without a Map: 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8. 参见 Clifford Gaddy and Barry Ickes, "An Accounting Model of the Virtual Economy in Russia,"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0(1999): 79.

9. Russell 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p. chap. 7.

10. 关于这一比较,参见 Valerie Bunc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forthcoming; Michael McFaul, *Post-Communist Politics: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

11. Geoffrey Blaney,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247.

12. 正如贝茨等人正式指出的:"进行惩罚的确实有效的威胁因此构成了子博弈均衡的本质特征。博弈者忍住了偏离轨道的行为,因为考虑到其他博弈者可预期的反应,他或她预料到这将会变得更糟。对等待有人出轨而产生的后果的担忧,促使博弈者遵守平衡行为。确实有效的威胁因此在产生制度化的行为模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obert Bates, Avner Greif, Margalit Levi,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Barry Weingast,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13. 这是纳什均衡的定义。参见 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 国际关系的分析家已就战争终结提出了一个相似的逻辑。例如参见 Donald Wittman, "How a War Ends: A Rational Model Approa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3(1979): 743—763。

15. "选举君主制"(elected monarchy)的术语来自谢夫特索娃。Shevtsova, *Yeltsin's Russia*, 289;也可参见 Reddaway and Glinski, *Market Bolshevism*。

16. 虽然在投票的前些日子,叶利钦的个人支持率最高只达到 29%,但是,在第二轮投票中,叶利钦赢得了 54%的选票。详细的情况参见 Michael McFaul, *Russia's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End of Polarized Politic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7)。

17. 考虑到叶利钦信奉功利主义的主权思想,还有一件有趣的反事实条件值得思考。如果选举是相反的结果,共和国层次上的选举产生了更为保守的议员,而联盟层次上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更激进的立法机构,且或许更有甚者,叶利钦被选为苏联总统的话,那又将会怎样呢? 他会容许苏联和平解体吗? 甚至时日再往后推,设想一下如果叶利钦在 1991 年 8 月未遂军事政变后立即当上苏联总统,苏联解体的轨迹会是怎样。

18. Vserossiiskii Tsentri Izucheniya Obshchestvennogo Mneniya (VTsIOM), "Pyat' let reforma," manuscript, 1996 年。

19. OMRI *Russian President Election Survey*, no. 5, May 29, 1996.

20. 在此,1991 年 12 月波兰通过的戒严法是一个有益的类比。当时,团结工会声称在这个有 4 000 万总人口的国家中拥有 1 000 万党员。然而,军事镇压几乎未遭遇抵抗就获得了成功,这使波兰改革又推迟了 8 年。1991 年的苏联,支持变革的力量较之 1981 年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支持变革的力量要弱得多,而支持旧制度的力量则要比 1981 年的波兰支持旧制度的力量要强得多。

21. 这个论点的提出,参见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82。

22.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7。

23. 两次权力移交规则是由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参见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266—267。

24.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25. Guillermo O'Donnell,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i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ed.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n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40—57。

26.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37。

27. 克拉斯纳(Krasner)就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制度提出了相类似的观点。参见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28. 关于不确定性是如何导致对未来失去信心,参见 Michael Taylor,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9. 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是1991年事件的失败者之一,后来他当选为杜马代表和立法事务委员会主席,而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是1993年事件的失败者之一,后来他当上了库尔斯科州的州长。

30. Boris Yeltsin, *Midnight Diarie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0), 24.

31. 参见媒体对库里科夫的采访, *Nezavisimaya Gazeta*, July 23, 1999。

32. 作者于2000年10月25日以通信方式对阿纳托利·丘拜斯进行了采访。

33. 参见作者于1996年3至4月和6月对叶利钦全体竞选官员的采访。他们是亚历山大·奥尔森、伊格尔·哈里乔夫、瓦莱里·霍姆亚科夫、伍亚乔斯拉夫·尼科诺夫、格奥尔吉·萨塔罗夫、米哈伊尔·谢奈德和弗拉基米尔·佐里金。

34. 参见 Igor Klyamkin and Lilia Shevtsova, *This Omnipotent and Impotent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Moscow: Carnegie Moscow Center, 1999), esp. chap. 6。

35. 久加诺夫于1996年8月7日的讲话,收录于 Gennady Zyuganov, *My Russia: The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of Gennady Zyuganov*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7), 185。

36. Ibid., 同时参见作者于1999年9月23日对久加诺夫的访谈。

37. 有关详细的情况,参见 Timothy Colton and Michael McFaul, “Reinventing Russia’s Party of Power: Unity and the 1999 Duma Election,” *Post-Soviet Affairs* 16(2000): 201—224。

38. 正如兰德尔·卡尔维特(Randall Calvert)所指出的,这是所有制度的共同财产。Randall Calvert, “Rational Actors, Equilibrium,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in *Explaining Social Institutions*, ed. Jack Knight and Itai Sen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60。

39.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37。

40. 普沃斯基将其称之为“制度化的不确定性”,并将其作为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见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14。需要注意的是,普沃斯基所讨论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本书所讨论的“不确定性”是有区别的,我们不仅关注规则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关注行为者在非选举竞争中的权力平衡。

41. 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113。

42. 这是一个经典的路径依赖观点。参见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W. Brian Arthu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000): 251—268。

43. 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16。

44. Russell Hardin, "Why a Constitution?" in *The Federalist Paper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ed. Bernard Grofman and Donald Wittman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9), 113.

45. 关于限制自由裁量的制度的重要性,参见 Kenneth Shepsle, "Discre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Government Commitment," in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ed. Pierre Bourdieu and James Colem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245—263; Hilton Root, "Tying the King's Hands: 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the Royal Fiscal Policy during the Old Regime,"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 (1989): 240—258; John Elster, *Ulysses and the Sirens: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6. 关于负责任的行为作为遵守一系列规则的可信承诺的方式的论述,参见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1989): 803—832。

47. 这个假设并不是说政治行为体将不再批评这些游戏规则,而是说它们将开始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关于这些差异的论述,参见 Ronald Jepperson,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 Walter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esp. 146—147。

48. Michael Burton, Richard Gunther, and John Higley, "Elite Transformations and Democratic Regimes," in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ed.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1.

49. Zoltan Barany, "Controlling the Military: A Partial Success,"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1999): 54—67.